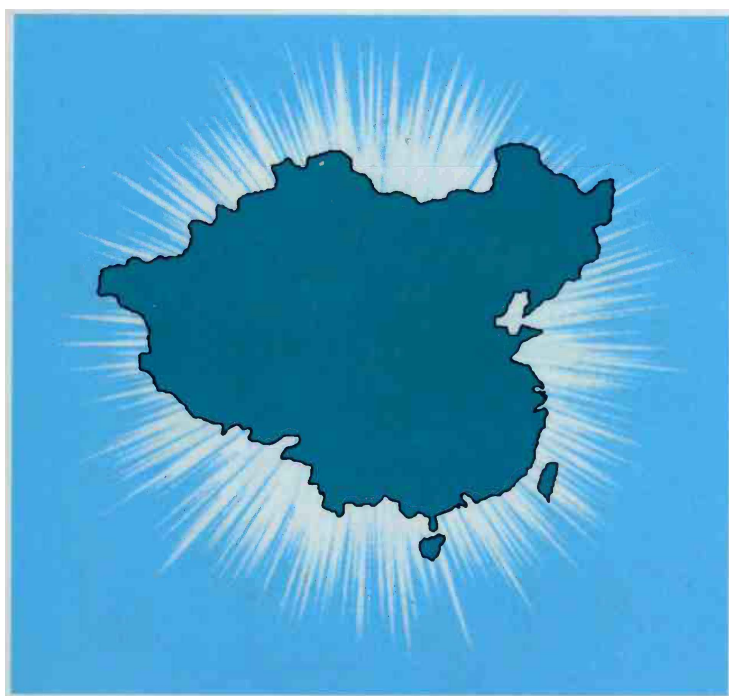


一個中國英勇歷史的記錄
不朽的光榮——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鄭浪平著

一個中國英勇歷史的記錄

不朽的光榮—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1931 – 1945)

鄭浪平

稼軒書房

Copyright © 1999 by Cheng, Lang-Ping 鄭浪平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s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publisher.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May of 1999.

Typeset by Kang-Kang Computer Typesetting Workshop, Ltd., with the L^AT_EX Documentation System (by Leslie Lamport and the L^AT_EX2 ϵ team), which is based on Dr. Donald E. Knuth's *tour de force* T_EX program. Chinese extension is provided by Werner Lember's CJK L^AT_EX and TTF2PK packages. Grateful acknowledgment is made to these fine people for their superb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uter typesetting software and their generosity in making the programs freely distributable to everybody.

Published by Chia-Shuen Book House, 1999.

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1931–1945)

An Everlasting Glory —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作者：	鄭浪平
責任編輯、校對：	鄭紀陽
編審：	鄭紀倫
排版：	康康文字工作室
出版者：	Evergreen Publisher 760 W.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發行人：	鄭浪平

一九九九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0-939083-54-X

書店買不到本書的讀者，請聯絡：

電子郵件：	info@npla.org
網路地址：	http://www.npla.org/glory **
通信地址：	JHC 2648 W.Workman Ave, #448 West Covina CA 91790
電話：	724-458-5075
支票受款人：	J. H. Chiang
訂價：	三十美元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227085920/http://www.npla.org:80/glory/>

謹以本書獻給

先父 鄭璟青（浪萍）

家慈 李桂芳

「苟吾人自暴自棄，而不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友皆成為明日之敵。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始不可成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國難之際，惟有努力自助與自求而已。」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但是一旦最後關頭來臨，中國將會絕對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縱使戰到一槍一兵，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

目錄

序 — 略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研究	xix
序言與導論	xxv
1 引爆柳條湖段鐵路 — 九一八事變	1
1.1 日本關東軍的陰謀行動	1
1.2 沒有敕令的軍事叛變行動	5
1.3 日本第二次侵華戰爭的開始	8
2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軍國主義	10
2.1 離奇的陰謀事件	10
2.2 明治維新的歷史變局	12
2.3 主導日本政略發展的大陸政策	14
2.4 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16
2.5 日本軍方逐漸失控	17
2.6 少壯派軍官把持日本決策核心	18
3 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	22
3.1 日本在東亞擴張與美、俄的衝突	23
3.2 田中義一與兩次東方會議	25
3.3 板垣與石原的歷史密謀	26
3.4 刺殺張作霖 — 皇姑屯事件	28
3.5 流產的日本國內軍事政變行動	29

3.6	關東軍開始密謀行動	31
3.7	日本政府企圖阻止關東軍行動	32
4	不擴大方針下的擴大侵略	34
4.1	表裡矛盾的日本政府與軍部	35
4.2	少壯派軍人企圖發動政變	37
4.3	「臨參命」約束不了關東軍	39
X 4.4	日本帝國覆滅之路的開端	41
5	不抵抗主義下的浴血抵抗	43
X 5.1	不抵抗主義的原委	44
5.2	衰弱與分裂的中國	45
✓ 5.3	中國面臨解體的危機	46
5.4	東北軍入關支持統一	47
5.5	南京國民政府的困境	48
5.6	東北的國防實力空虛	50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個人誤事	51
5.8	東北軍民浴血抗日	53
6	弱國的奮鬥與掙扎	56
6.1	中國分裂與衰弱而招來外患	57
6.2	外交無法挽回東北失地	59
6.3	政府改組危機擴大	61
7	一二八事變的奮戰迎敵	63
7.1	日本在上海製造衝突事端	64
✓ 7.2	十九路軍奮勇抗日	65
7.3	日軍在上海踢到鐵板	66
7.4	顧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戰	68
7.5	事變的分析與檢討	69
8	無中生有的滿洲國	72
8.1	臨時起意的滿洲國	72

8.2	日本全力炮製的傀儡王朝	74
8.3	日本悍然拒絕李頓報告	75
8.4	滿洲國對中、日歷史決戰之影響	76
9	劃時代的歷史巨變	78
9.1	關東軍造成日本的亡國之禍	79
9.2	可以不宣戰，但是不能不抵抗	80
X 9.3	不抵抗主義擴大了歷史悲劇	81
9.4	歷史的後見之明	82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實力為後盾	83
9.6	東北義勇軍吹響了民族復興的號角	85
9.7	蘇聯幕後的謀略與野心	85
9.8	九一八事變的內涵與影響	86
10	熱河與長城之戰	88
10.1	東北義勇軍的浴血反抗	89
10.2	關東軍改組後武藤信義出任司令官	90
10.3	中國再度爆發內訌	91
10.4	張學良面對著危機四伏的處境	92
10.5	汪精衛離職所引發的政治風暴	93
10.6	實力懸殊的熱河之戰	95
10.7	長城浴血抗戰	99
11	熱河與長城之戰的檢討	104
11.1	中國軍隊首度聯合抗日	105
11.2	中國全方位落後是作戰失敗的原因	105
11.3	人心向背是戰爭的關鍵因素	107
11.4	日軍掌握作戰的優勢	108
11.5	華軍作戰需要大幅改進	109
11.6	長城作戰對日本侵華策略的影響	109

12 兵臨城下的塘沽協定	111
12.1 中、日在戰略對抗上的比較	112
12.2 日本企圖建立漢奸政權的失敗	113
12.3 黃郛設法收拾殘局	114
12.4 極為苛刻的停戰條件	116
12.5 黃郛力撐大局的困境	117
13 談判桌上的折衝對抗	120
13.1 日本天羽聲明的蠻橫立場	121
13.2 最後關頭的抵抗心聲	122
13.3 何梅承諾與秦土協定	124
13.4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緩衝組織	127
13.5 日本導演的蒙古國登場	128
14 中國在危機之中掙扎圖強	131
14.1 奮鬥圖強走出歷史的困境	132
14.2 設法結束分裂與內戰	134
14.3 財政、金融與貨幣的改革	135
14.4 振興農業與發展工商	138
14.5 引進德國的軍事編組制度	140
14.6 令日本憂慮的廬山軍官訓練班	142
14.7 新生活運動	143
14.8 以抗日為由的內部紛爭	144
14.9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	145
14.10 抗日準備的檢討	146
15 中國的內憂與外患	148
15.1 民國初年中國嚴重分裂的危機	149
15.2 國民黨力圖振興中國	149
15.3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150
15.4 國共的合作與分裂	151
15.5 中國共產黨抗日策略的變化	153

15.6	中共的長征	154
15.7	蔣介石的聯蘇的抗日策略	155
16	最後關頭之前的最後努力	158
16.1	兩廣的統一	159
16.2	中、日的外交互動接觸	161
16.3	宋哲元的折衝斡旋	163
16.4	百靈廟之戰	164
17	歷史的轉折點 — 西安事變	166
17.1	事變之前的局勢	167
17.2	安內攘外與聯蘇容共的矛盾	169
17.3	東北軍受到不平的待遇	172
17.4	蔣介石一連串政策上的錯誤安排	174
17.5	張學良的斷然行動	176
17.6	發動兵諫、擁蔣抗日	178
17.7	釋放蔣介石以進行抗日準備	180
17.8	蔣介石聲望達到頂點	182
17.9	國民政府「聯蘇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現	184
18	歷史轉折的檢討	186
18.1	事變突然、政策不突然	186
18.2	蔣介石錯失歷史復興良機	189
18.3	容共在於引進蘇聯的支援而非中共的力量	190
18.4	歷史轉折的深思	191
19	事出意外的盧溝橋事變	193
19.1	中、日、蘇之間的三角戰略關係	193
19.2	劍拔弩張的華北局勢	196
19.3	小意外演成全面的衝突	198
19.4	中國全體軍民決心絕不退讓	201
19.5	日本決定出兵華北	203
19.6	宋哲元處置失當	204

19.7	日軍決定攻佔平津	207
19.8	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戰爭	208
19.9	七七事變的檢討	211
20	中日全面戰爭的戰力解析	214
20.1	中日雙方總體國力的比較	215
20.2	雙方軍力的對比	217
20.3	中國民族主義所激發的潛能	219
20.4	戰略上由中國主導全局	220
20.5	中、日領導層面的評比	221
21	沒有出現決戰的北方戰線	225
21.1	華軍佈陣的零亂	226
21.2	南口之戰	227
21.3	蔣介石決定改變決戰地點	229
21.4	日軍組成華北方面軍與上海派遣軍	231
21.5	意外提前引爆太原會戰	233
21.6	平型關大捷的歷史真相	234
21.7	激戰空前的忻口作戰	235
21.8	華北作戰的檢討	238
21.9	日軍大本營缺乏戰略遠見	239
22	驚天動地的淞滬大會戰	241
22.1	中國決定在上海應戰	242
22.2	八一三上海事變	244
22.3	中國空軍英勇禦敵	247
22.4	中日在上海形成主力決戰	249
22.5	中日兩軍在上海全力拼鬥	250
22.6	日軍決定從金山衛登陸	253
22.7	改變中日戰略軸線的會戰	255
22.8	淞滬會戰的檢討	256
22.9	粉碎國際公認的「日本三月亡華」論	259

23 陰錯陽差的南京保衛戰	261
23.1 日軍爲應否進攻南京而激烈爭論	262
23.2 日軍前線部隊抗命決定進攻南京	264
23.3 蔣介石力主防守南京	265
23.4 唐生智臨危受命	268
23.5 日軍對南京進行全面攻勢	270
23.6 南京守衛佈置失當	271
23.7 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	273
23.8 日軍戰術成功但政略徹底失敗	275
23.9 中國決心繼續作戰到底	276
24 千鈞一髮的台兒莊大捷	278
24.1 會戰前日本軍方的戰略構想	279
24.2 中國決定誘敵深入	280
24.3 韓復榘不戰而棄守山東	282
24.4 第五戰區的戰略佈署	284
24.5 臨沂序戰	286
24.6 台兒莊血戰十三天重挫日軍	288
24.7 失去的機會 — 徐州會戰	291
24.8 圍攻土肥原師團	295
24.9 華軍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日軍追擊	296
24.10 徐州會戰的檢討	297
24.11 日軍從此陷入了中國的戰略陷阱	299
25 戰略泥淖的武漢會戰	301
25.1 日軍和戰舉棋不定	302
25.2 中國決心保衛武漢	303
25.3 日軍對武漢發動鉗形攻勢	306
25.4 廬山的死亡陣地	309
25.5 萬家嶺大捷	310
25.6 富金山的惡戰	311
25.7 日軍攻陷武漢空城	313

25.8	武漢會戰的檢討	316
25.9	中國決定犧牲到底也不屈服	317
26	中國對外通路的爭奪	319
26.1	對外通路決定戰爭的勝負關鍵	320
26.2	日本進攻廣東	320
26.3	英、蘇兩國的戰略陰謀	324
26.4	蘇聯切斷中國的作戰生命線	326
27	從和平運動到叛國結局的汪精衛	329
27.1	皇民與漢奸	330
27.2	汪精衛的背景	331
27.3	堅守立場的和談是鬥爭而非投降	332
27.4	高宗武的穿針引線	332
27.5	對日和談的幻想	333
27.6	第三勢力斡旋的構想	334
27.7	汪精衛逐步成為漢奸傀儡	336
27.8	「和平反共」的偽政府	338
28	勇挫日本皇軍鋒焰的三次長沙大捷	341
28.1	第一次長沙會戰	343
28.2	第二次長沙會戰	347
28.3	第三次長沙會戰的起因	351
28.4	日軍貪功而臨時更改作戰任務	354
28.5	華軍四面合圍、日軍全面敗逃	355
28.6	中國躋身為主要盟國	356
29	百團大戰與共產黨的游擊戰	358
29.1	拋開政治的包袱、面對抗日歷史的真相	359
29.2	共軍抗日獨樹一幟	360
29.3	日軍的「治安肅正」及「三光政策」	362
29.4	游擊戰付出的人民成本極大	363
29.5	共軍發動百團大戰	364

29.6	共軍突擊成功與日軍的反擊	366
29.7	百團作戰的檢討	368
29.8	國共之間的衝突	368
29.9	新四軍事件	369
29.10	蘇聯紅軍全力支援共軍在東北發展	371
30	滇緬作戰	372
30.1	英國事前不願中國出兵協防緬甸	373
30.2	最後一刻才向中國求援	374
30.3	中國軍隊力擋日軍攻勢	376
30.4	史迪威錯誤的作戰佈署	379
30.5	中國軍隊在緬甸慘遭重創	380
30.6	史迪威棄軍逃命	382
30.7	第一次滇緬作戰的檢討	383
30.8	反攻緬甸計畫 — 盟國打擊中國的陰謀	385
30.9	丘吉爾決心出賣中國	388
30.10	史迪威的窩裡反	390
30.11	致命錯誤的反攻作戰	393
30.12	得不償失的勝利	395
31	中國戰區與史迪威事件	400
31.1	日軍在太平洋橫掃美、英、荷的部隊	401
31.2	西方為挽救亞洲戰局而成立中國戰區	403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國戰區無望論	403
31.4	盟國設法陰謀壓制、打擊中國的策略	405
31.5	出力最多、獲得最少支援的中國戰區	408
31.6	悲劇的誕生 — 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409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務	411
31.8	中國戰區內部的「陸、空大戰」	413
31.9	羅斯福總統遭到馬歇爾的蒙蔽	415
31.10	史迪威出賣中國戰區利益	418
31.11	抗日戰爭史上最錯誤的決定	420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職	422
31.13 撤換史迪威以挽救中國戰區	424
31.14 魏德邁力挽狂瀾	426
32 保衛重慶	430
32.1 日軍曾經研擬進攻四川的五號作戰計畫	431
32.2 驚動國際瞻觀的鄂西會戰	433
32.3 中國的「史達林格勒」	435
32.4 史迪威的謊言	436
32.5 片瓦無存的常德會戰	437
32.6 悲壯卓絕之守衛戰	440
33 歷史分水嶺的開羅會議	443
33.1 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444
33.2 盟國爭取私利而出賣中國	447
33.3 美國支持中國的立場	450
33.4 中國代表團的內憂	451
33.5 中國為戰後亞洲奠定發展方向	452
33.6 史迪威開始進行報復	454
33.7 德黑蘭會議全面大翻案	456
33.8 盟國對中國背信棄義	458
33.9 惡夢開始降臨中國	460
33.10 中美關係突然瀕臨破裂邊緣	463
34 日軍孤注一擲的瘋狂反撲	466
34.1 規模空前的「一號作戰計畫」	467
34.2 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	469
34.3 日軍打通平漢鐵路	472
34.4 日本十一軍發動長衡會戰	476
34.5 鬼泣神嚎的衡陽保衛戰	481
34.6 日軍「一號作戰」的檢討與其造成之後果	486

35 從重創中復原與反攻的計畫	491
35.1 日軍決定發動廣西會戰	492
35.2 日軍作戰的內部衝突	495
35.3 緊急馳援獨山阻擋日軍攻勢	498
35.4 中美合作戰局好轉	499
35.5 青年軍的組成與日軍的末路	501
35.6 日軍最後的求和	503
36 碧血長空的英雄	505
36.1 以寡擊眾的中國空軍	506
36.2 「中國之虎」陳納德	508
36.3 美國志願空軍的英勇表現	509
36.4 癱瘓日本絕對國防圈	510
36.5 日本企圖不惜一切以摧毀第十四航空隊	514
36.6 盟國空軍在中國戰區的浴火重生	515
36.7 空戰英雄永留青史	516
37 出賣中國的雅爾達密約	518
37.1 史達林開始謀畫奪取大戰利益	520
37.2 雅爾達密約決定出賣中國	522
37.3 美國鑄成歷史大錯	524
37.4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526
37.5 中、美、英發表波茨坦聯合宣言	527
37.6 蘇聯紅軍準備大舉劫掠中國東北	528
37.7 關東軍最後不堪一擊	529
37.8 悲劇的發生與歷史的代價	534
38 戰爭的結束，勝利的代價	539
38.1 日本在華駐軍正式向中國投降	540
38.2 河山殘破中國再遭出賣	543
38.3 日本受到美國的特別優待	544
38.4 列強設計對日和約的陷阱	545

38.5	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回顧	548
38.6	沒有完全落幕的歷史悲劇	551
38.7	中國抗日的光榮不能遭到抹殺與扭曲	552
38.8	歷史的鑑戒是人類共同的資產	554
	後記	556

附圖目錄

1.1	關東軍引爆南滿鐵道地點圖	4
1.2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東北路線圖	6
10.1	熱河長城作戰圖	100
21.1	華北作戰圖	228
21.2	太原會戰圖	236
22.1	淞滬會戰圖	245
23.1	南京保衛戰要圖	272
24.1	台兒莊會戰圖	287
24.2	徐州會戰圖	293
25.1	武漢會戰圖	307
28.1	第一次長沙會戰圖	345
28.2	第二次長沙會戰圖	349
28.3	第三次長沙會戰圖	353
30.1	第一次滇緬作戰圖	378
32.1	鄂西會戰圖	434
32.2	常德會戰圖	439

34.1 日軍一號作戰計畫河南會戰 474

34.2 日軍一號作戰計畫長衡會戰 478

35.1 日軍一號作戰計畫廣西會戰 497

序 — 略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研究

李恩涵

李恩涵先生，美國加州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所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Reader, A.P.）。著有《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戰時日本販毒、「三光作戰」研究》（印刷中）、《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等書十冊，中英文學術性論文八十餘篇。

第二次中日戰爭（1931–1937–1945）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日本蓄意強力支裂中國、征服中國的一次總力戰，也是中華民族在忍無可忍、無可妥協的情況下全力奮起以與強敵仇國的日本做生死存亡、有進無退、有我無敵的一次拼命大戰；而此一戰爭在全面展開的約略八年期間與在此之前斷斷續續作戰不停的約略六年期間，也正充分形成為中華民族起衰振昧、轉弱為強的關鍵年代——經過了長達約略十四年之久、運用各種方式的軟拼、硬拼、死戰、纏鬥的全面性各種方式的抗爭，中國終於與美、蘇、英、荷等國一起贏得了最後的勝利，迫使死敵日本俯首就降，吐出它自一八九五年以來「偷

竊」自中國的所有果實。中華民族竟然奇蹟似的像浴火後重生的鳳凰一樣，驀然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遍體鱗傷、在物質外貌落後衰敗的舊中國，一躍而蛻變為在全世界各國外交總坵壇的聯合國內昂首闊步、巍然為五個核心領導國的成員之一，為舉世所尊敬。此後，中國人在戰後的艱困年代中，雖然繼續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在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的過程中，舉步艱難地掙扎向前，但她的成就是豐碩而輝煌的：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所殷切寄望的中國應在國際社會居有平等自由地位的願望，是完全實現了；當年二、三十年代主持中國「革命外交」的外交鬥士所畢力想竟其全功的撤廢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的奮鬥，也早完全達到了。中華民族現在昂然雄立於世界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的大國之林，正逐漸能恰如其份地表現其十二億人應有的份量了。

推始溯源，我們不能不追溯到我國族復興契機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了。我們對於影響我國族命運、總結我國族百年受夠列強欺凌、全民為之痛心疾首的過去與開創嶄新而光明的輝煌的前景的此一偉大事件，應該如何地深入探索而多方研究一番才對，因為這才是發掘中華民族真正精髓力量的泉源與重振我國族靈魂的關鍵性大課題。因此，我對於著名時事評論家鄭浪平先生的大著《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出版，而且有機會先睹為快，是感到非常高興和興奮的。而鄭先生在本書中以他一貫綿密、警辟而鞭辟入微的闡述與分析的寫作風格，深入淺出，將此一民族聖戰在不同階段與不同方面的種種風貌，很清晰地很全面地呈現出來，讀後令人有時執卷為之唏噓嘆息，而有時又令人為之振臂興奮，感人肺腑，久久不能釋懷。我要誠心地向鄭先生完成此一大著恭賀致敬：恭賀他完成此一具有深意、有根有據而又通俗化十分強的大著之完成與出版。我相信廣大的讀者群對於本書所顯現的一些細膩而生動的闡述與解釋，當會有普遍的共鳴的。

事實上，正如鄭先生在本書中所描述的，戰後初期中國人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撰著，都不脫國、共內爭、內戰的扭曲性與局限性。此一情形，甚至時至今日，都不能完全擺脫其痕跡與影響。早期國府資料性的官方著作，如何應欽將軍的《八年抗戰之經過》（1946）、白崇禧將軍的《抗戰八年軍事概況》（1946）、陳誠的《八年抗戰之經過》（1946）、國防部史政局的《抗日禦侮》（1966、1978）、張其昀的《黨史概要》（又名《近八十年中國革命史》1979 第二版）等，固然如此；民間專家學者如吳相湘教授所撰

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1973）、鄭學稼所著《日帝侵華秘史》（1975）等書，亦難於擺脫此類時代的痕跡。同時期內，中共所出版的同類著作，如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概況》（1953）李新、蔡尚思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三卷，1961）等等，在內容與解釋上，其局限性與扭曲性的情況亦同，甚至較國府方面的撰述，猶有過之。而且，自戰後一直到七十年代，由於國、共內戰所導致的中國動亂，曾無或已，中國學術界在無充分的政治自由與物質貧乏的條件下，對於此民族聖戰性質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完全無法做充分深入的探索與研究；所以，此時期的中國人所撰寫的有關論著無論在品質上與數量上都無法與該論題的重要性相比配。

1982年秋，日本政府教科書檢定（審查）事件發生，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公然想否認過去侵略中國的罪行、暴行，不只否認曾製造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甚至還在國定教科書中將侵略中國改之為「進出」中國，引起海峽兩岸的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強烈抗議，也勾起了中國人對日本新軍國主義者的深仇大恨。對於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術界，特別是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的史學界同人，都是一大刺激，雙方都感到極有加強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研究的必要。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學術界劍及履及即連續召開了數項有關抗日戰爭的大型學術研究研討會，如1984年8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主辦的「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亦收有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論文）及1985年8月的「抗戰建國史研討會」；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亦於1985年11月舉辦「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1986年10月舉辦「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1987年7月舉辦「抗戰建國學術研討會」等；而這些學術研討會在舉辦之後，都很快出版了個別的「論文集」，等於是集體性的包括許多冊巨帙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而黨史會在此期間也編纂出版了資料豐富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計為七編，分列為若干巨冊。在私人著述方面，則有劉鳳翰的《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週年》（1987）、李恩涵的《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1994）。

大陸學術界在受到日本否認侵略的重大刺激之後，也在全力努力於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他們首先出版的一批論著，有龔古今、唐培吉主編的《抗日戰爭史稿》（1984）、何理的《抗日戰爭史》、羅煥章、支紹增合撰

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1987）、馬仲廉的《抗日戰爭史話》等書；又出版了原國府將領中曾經親身參與過對日作戰的抗日戰爭回憶錄性質的《抗日戰爭親歷記》，如《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華夏壯歌》等等，陸續出版。至九十年代之初，除王輔撰寫的《日本侵華戰爭》（四大冊，1990）、李振民、趙保真合撰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綱》（1992，約百萬字）外，1991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編輯的《抗日戰爭研究》（季刊，每年出版四冊），也正式發刊，至今持續不脫一期的出版下來，內容堅實，多有相當優良的研究論文刊佈。而該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在劉大年教授、張振鷗教授的領導下集體撰寫的《日本侵華七十年》（1992）約計六十六萬字，也是一部堅實有據的一般性通論性質的極佳著作。大陸的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更於1992年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三大冊，分上、中、下三卷，合計為一百五十萬字的巨帙。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社科院合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的各主題下的檔案資料如《九一八事變》、《東北經濟檔案》、《細菌戰與毒氣戰》、《東北歷次大慘案》、《華北歷次大慘案》等，也陸續出版。至1992年止，大陸出版的有關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專著、譯著等總計已有約四百種，論文、回憶錄等則有約兩千篇。

1993年之後，由王檜林教授主持總纂、而由數十位中、壯、青年史學者所撰著的《抗日戰爭史叢書》陸續出版，預計全部將出版五十多冊，每冊約二十萬到三十萬字，分自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探討對日戰爭期間的全貌。其中已經出版者，包括《日本侵華戰略》、《國共談判》、《鐵血遠征》、《歷史的怪胎》、《第二次國共合作》、《苦難的人流》、《兵火奇觀—武漢保衛戰》、《大捷—台兒莊戰役實錄》等等（叢書尚未完全印完）。1997年為紀念盧溝橋事變六十週年，社科院近史所與中國史學會合編的《抗日戰爭》（章伯鋒、莊建平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亦告出版。這是一項資料編纂性的巨帙，全書計分七卷十一冊，包括戰爭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對外關係，日偽政權與淪陷區、侵華日軍暴行等方面，合計近一千萬字。另有劉大年主編、張振鷗教授等集體撰寫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1997）一書出版，全書雖只三十萬字左右，但內容相當精粹而涉及面甚廣。此外，盧溝橋抗日紀念館等所編

著的《紀念盧溝橋事變六十週年叢書》八大冊也及時發行問世，其中包括一巨帙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及《抗戰時期的對外關係》、《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等七冊，內容均係綜論性質而資料則相當堅實。

不過，所有上述海峽兩岸近十六、七年所出版的有關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論著與資料性的編纂作品，與鄭浪平先生所著作的本書，都在性質歸類上有所不同。鄭先生大作的價值，在於綜合各家之說而萃取其精義，並分就抗日戰爭期間的重大事件，一項一項地以深入淺出、輕鬆靈活、娓娓動聽、撥人心弦的妙筆表達出來——它更能觸動讀者心靈上的共鳴。這也是我最高興向廣大讀者推介的一本通俗性的上佳著作。

現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十四年之久了，新日本也在歷經崛起為「經濟大國」、「科技大國」、「經濟超強」的過程之後，正在向「政治大國」之途邁進了。新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美國所提供的核子傘的保護之下，正在極力想「漂白」其過去不名譽的「侵略惡行」（實際此等不名譽的「侵略惡行」在日本未誠心地、全面地、合乎法律要件地向中國、韓國、朝鮮道歉與賠償之前，真正的「漂白」是不可能的，新日本在這方面完全無法與新德國之撇清當年納粹德國之惡行劣跡相提並論），此外，似乎新日本已在去年開始向朝鮮半島與台灣做其明顯的政治性的覬覦與探索前進了。新日本的此一意向，特別在日美安保條約之適用範圍與研究布置 TMD 飛彈防禦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等重大問題上表現出表面模糊實際上則非常清楚的意向了。

不過，廿一世紀強而有力的中國（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擁有全球性第三核子武力的國家，其鋼產量一億一千多萬噸，已早超過了日本和美國）與廿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已大大不同了。在核子時代「地球村」式的東亞國際現勢中，無論新日本是如何強大，它如果再想做非分地利用過去「以華制華」的老把戲來重新侵犯中國與韓國（朝鮮）的主權事項，它是絕對要好好考慮它是否可能第二度淪為殘酷戰爭廣島、長崎式悲劇的主角角色了。未來的廿一世紀應該是一個國際和平、經濟繁榮與科技高超的新世界，是各主要大國在和平競爭的前題下，各自發展其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新藍圖的新時代。在此總的原則之下，中國人絕不怕與日本人或美國人進行和平競爭的，但前題是中國人一定要摒棄過去李鴻章式的對日本苟安短視、保守防禦的政策，而應該大踏步地勇敢向前，在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思

想等方面，無畏地與新日本和平競賽；而且，最重要地，手中勿忘提著一根大棍 (speaking softly but with a big stick) 才對。這才是瞻望未來，追索未來的良策吧！

李恩涵 謹識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台北市南港

序言與導論

每次看到有如秋海棠葉般的中國地圖，心裡就不自覺的感到陣陣的刺痛，久久不能釋懷。因為我很清楚的知道，這幅地圖已經不能代表真實的現狀，兩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領土，早已經離中國而去，這就是中國完成抗日戰爭勝利的代價之一。事實上，沒有向日本索賠或要求日本認錯道歉，與國共內戰及台海分裂，都是源自中日戰爭後遺症的歷史傷痛。

政治干預導致的歷史失憶症

當然中日戰爭的最大後遺症，就是在政治煙幕影響之下，歷史的真相受到扭曲與變造，因而給中國人民帶來集體歷史失憶症的危機。雖然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付出了一切的力量、忍受過所有的煎熬、做出重大的歷史貢獻，但是目前多數的中日戰爭歷史敘述，實在是離真相仍有著極大的差距。所以目前中國人與世界都不清楚，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所擔任的角色與所做出的貢獻。也就是說，中國人在這場人類歷史決定性的戰爭中，所有的貢獻與犧牲，大都遭到了政治力的抹殺、扭曲與淡化。中國人於是成爲一個患了嚴重歷史失憶的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道路上，艱難地掙扎前進。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欲興其國，先興其史。歷史的形成與演變，就決定了國家民族的特性與命運。既然目前中國人，多數都不清楚，這個影響自己半世紀命運最深的抗日戰爭歷史真相，當然也就很難掌握自己的現在架構，以及面對未來的考驗與挑戰。一個失去歷史真相與歷史觀念的民族，是很難掙脫歷史悲劇宿命之考驗的。

第二次中日戰爭，是決定整個中華民族存亡的歷史之戰，也是世界能夠

戰勝法西斯暴政的關鍵所在。可是從戰爭結束到現在的半世紀，中國人對於抗日戰爭歷史的真相，仍然有著太多的問題與謎團存在。真相到底在哪裡？答案又是什麼？我們當然可以假裝地迴避問題，或是拿經過政治變造過的歷史來加以搪塞，但這就會造成中國人集體性的重大「歷史失憶症」。假如歷史中，有著太多的疑問，虛假的答案以及扭曲和掩飾，那麼這個民族的歷史失憶症，就會造成社會性的精神問題，進而會影響到整個社會集體人格心理狀態的正常。

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達半個世紀以上了，目前全球主流的歷史，甚至包括中國人的歷史在內，仍然無法公正地記錄中國人曾經在這個人類史上，最為悲壯的大戰中所有的表現。三千五百萬中國人的犧牲，一億多人民妻離子散、九死流離的悲劇，幾百萬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戰火摧殘的浩劫，中國以最大的犧牲，消耗了日軍的主要力道，同時粉碎了軸心國會師合流的戰略企圖。中國力戰不懈的焦土戰略，與絕不屈服的抵抗意志，導致日本戰略佈局的一錯再錯，最終讓盟國能夠戰勝法西斯軸心國的侵略。

在二次世界大戰反抗法西斯的同盟國中，中國是最早挺身與軸心國裡的日本展開全面戰爭的國家。在這場全世界的大戰中，中國犧牲最多、獲得援助最少、對盟國勝利的貢獻卻最大。中國在大戰中英勇的表現，是使得同盟國陣營能夠勝利的非常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國的這些犧牲、貢獻，與最後贏得的勝利，在戰後卻使得中國失去了領土、主權、統一與尊嚴；最後，連中國在抗日歷史光榮的記錄，還要被主流歷史扭曲與抹殺。中國為什麼會遭到這樣的結果？難道所有的中國人就不會質疑許多歷史明顯受到扭曲的疑點，並渴望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嗎？

國際強權對中國的欺凌

翻開近兩百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奮鬥掙扎、忍受屈辱與付出代價、企圖追求國家富強與進步的血淚記錄。而當時中國一再遭到失敗與挫折，主要是由於她太受限於封閉與內鬥的傳統歷史架構之影響，導致了各種片面救亡圖存的改革，不但無法出現立竿見影的正面效果，反而產生了不斷矛盾與內戰的歷史悲劇。中國要面對先付出極大破壞的代價，然後才能獲得有限進步的歷史發展定律。

但國際強權爲了保障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對於中國採取各種的欺凌與侵略，並設法破壞中國的革新的努力，介入中國的分裂與內戰，當然更加深了中國改革瀕臨失敗的危機。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爆發的第二次中日戰爭，更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命運發展到危機之頂點，在這場人類歷史曠古未有的大戰爭中，中國真正面臨了百年落後歷史危機的總清算，這幾乎是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酷考驗。

從歷史全方位的角度而言，這場戰爭不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決戰而已。第二次中日戰爭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主要戰場，也是終結西方帝國主義對外侵略與殖民歷史的開端，更是國際共產主義興起的歷史起點，因此這場戰爭的複雜性與影響力，都是超越了當時的時間與空間，而成爲影響世界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

在中日這場國力處在不同時代而實力懸殊的戰爭中，中國可以說是腹背受敵而且險狀萬分。不過由於中國以其長遠歷史所累積的民族主義力量，加上擁有廣大的戰略空間，以及人民願意付出無比犧牲的代價，中國終於通過了這個最爲嚴格的考驗，不但爲自己民族在歷史上爭取到繼續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也爲二十世紀全球結束西方殖民主義歷史，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原本中國應該有權利，與所有在二次大戰得到勝利的國家一樣，於戰後分享歷史光輝一頁的新開始。但因爲國際強權陰謀運作，以全力防止中國的興起，使得她在戰後不但領土遭侵佔、主權被出賣、外國勢力直接介入而加速內戰的擴大，連帶著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事實，也遭到有意的遺忘與曲解。甚至連絕大多數的中國百姓，都不清楚中國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大戰中，有過這個歷史性的、不朽的光榮與偉大的勝利，更不知道同盟國的國家，共謀出賣與算計中國的凶險程度，其實並不下於日本的侵略。

歷史真相遭到扭曲

許多人非常奇怪日本不能以史爲鑑，直到如今，日本人還不肯對侵略中國的罪行，以行動與誠意對中國表達真心的認錯與道歉。其實，這個背後有著國際強權謀略的支持，與日本人缺乏正確歷史真相認識之問題存在。但假如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能了解這個歷史的真相，那麼日本人又怎麼會面對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呢？假如中國人繼續要日本人「以史爲鑑」，日本人可以反

問，中國人自己知道歷史的真相嗎？

事實上，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國成爲全球第一個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參戰的時間最長、犧牲最大，得到的援助更是最少。最後中國不但沒有得到勝利的果實，反而遭到盟友的出賣與打擊。

扭曲與淡化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貢獻，原是世界強權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的手段之一。因爲唯有淡化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大犧牲與貢獻，才能「合理化」地遮蓋國際強權所有對華的權謀。當然中國人自己也同樣在國共戰爭的政治禁忌之下，由於政治立場的考慮而扭曲歷史的真相。由於這兩個因素，使得中國人與全世界，直到戰爭結束的半個世紀之後，仍然無法正確了解這個史實的真正原委，所以至今中國仍然成爲這個大歷史真相被蓄意扭曲的犧牲者。

一個民族的歷史，就是這個民族集體人格的記憶主體，假如影響這個民族命運的重大史實長期受到嚴重的扭曲與壓抑，就容易產生可怕的民族歷史失憶症，這種失憶症當然會造成整個民族集體人格的變形，甚至是變態。這樣的民族，在刺激與誤導之下，很可能會出現極其恐怖與違反人性常態的異常行爲，最終會導致無法想像的歷史悲劇。

例如中國與日本兩個民族，都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經歷過幾乎不可言喻的歷史災難（原因則剛好完全地相反），但是中日兩個民族，至今都沒有實在地面對歷史的真相與關鍵。這種對於歷史真相的逃避與壓抑，當然會造成嚴重的民族集體人格缺陷，及其所導致的心理問題。在面對激烈的競爭與快速變遷的新世紀挑戰之下，文化會嚴重地失調，共識會輕易地破裂，整個國家與社會，很可能會出現極大的不穩定危機。

抗日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意義

這就是爲什麼中日兩國的人民，要了解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真相的迫切原因。中國人要知道自己歷史的光榮與犧牲，以建立民族應有的自信與共識。日本人需要知道他們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與暴行，以建立悔過的良心與從歷史鑑戒中學到警惕。

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時中國所面對的歷史危機，並非只有日本的侵略而已，就連所謂的盟國，竟然也在一面依賴中國抵抗日本，一面就在

算計如何出賣中國。此外，中國自己內部，也沒有停止過內訌與戰爭。因此這場中、日的歷史大決戰，之所以有其空前重大的歷史地位與意義，是因為中國在這段時間之內，面臨了下列三方面的嚴厲考驗：

- 一、 中國以一個在軍備、科技、經濟、政治乃至於社會文化都落後的架構，竟然能夠抵抗日本絕對優勢的侵略，實在不能不說這是中國人，以無法想像的毅力與犧牲，所得到的成果。
- 二、 中國在與盟國合作中，一直是全力配合同盟國做成的戰略決定，但所得的回報，卻是一直遭到相當程度的欺凌與漠視。中國所真正得到的援助是杯水車薪，但是她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無比的重大。中國幫助盟國贏得戰爭的勝利，但是卻被盟友聯手陰謀出賣。
- 三、 即使在面對這場事關中國生死存亡的外患考驗時，中國內部仍然出現嚴重的分裂與鬥爭，因此一直讓外力有機可乘，抗日的力量因而經常被分散與消耗。

中國面對這樣三重的鬥爭，但是仍然能夠支撐到底，贏最後的勝利，這是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在遭到存亡挑戰時所迸發出的堅忍與毅力，實在強韌到令人無法想像的地步。

中國四面受敵的處境

在中國對抗日本侵略之前，蘇聯早於一九二一年，就首先侵略中國的外蒙古，又在一九三九年派軍染指新疆，製造了一系列的暴動，最後連「東土耳其斯坦」的分離名號，都在蘇聯的策畫之下出現了。同時，英國始終沒有放棄在西藏策動分裂的活動，以及繼續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從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想盡辦法，以各種不平等的方式與藉口，侵害中國領土、主權與利益，強權之間甚至爲了霸佔在華的利益而大打出手。最後由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1899），成爲國際強權共享對中國侵略與壓榨之利益的「方程式」。只是後來日本基於「抗蘇」、「防美」的戰略考慮需要，率先打破了這個遊戲的規則，企圖先「獨吞」中國的利益，以獲得對抗美蘇的資源與戰略空間，因而破壞了國際強權的利益平衡，最終引爆了人類歷史中最

大的決戰¹。所以就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處境來看，盟國與敵國的概念其實是非常複雜，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所面對的又豈只是日本的侵略而已？

因此中國在所謂的「盟國」與「敵人」之間，有著既聯合又鬥爭的歷史矛盾。這全都來自一個結構性的歷史問題——西方的國家無法接納一個迅速崛起與富強的中國。一旦中國以其土廣民眾與優秀文明的基礎，完成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勢必成為亞洲甚至世界歷史的重心，亞洲各國多數都要成為中國的衛星國家。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際強權是既要「抗日」又要「防中」，而中國則是既要與日本進行決戰，最後又要給日本留下復興的餘地；中國既要與蘇聯、英國合作抗日，但是中國又不能不提防這兩個國家侵略中國的陰謀。就連美國，因為其決策者對中國在戰爭中的實況與貢獻被嚴重誤導與蒙蔽，也差點使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最後關頭面臨崩潰的危機。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日本是公然侵略中國，蘇聯是要在幕後宰制中國，英國設法弱化中國，美國則是陷在左右為難之中，與中國既合作、又發生摩擦和矛盾，最後也加入了出賣中國的陰謀。當時的中國是個弱國，又有著嚴重的內鬥，因此敵國也好，盟國也罷，都沒有在這場歷史的戰爭中，放棄打擊與分裂中國的設計。

歷史絕非單純的「過去」事件而已，而是決定現在，以及影響未來發展走向的「過去」。由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戰後責任處理等等遭到其它同盟國家之刻意扭曲，造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一直徘徊在歷史的暗角，甚至正在以一種變體的方式，開始快速地發展滋生。這對於日本、東亞甚至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極大的潛在威脅。日本至今仍然設法否認侵華戰爭的責任與罪行，是日本恢復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心理建設基礎。

而過去海峽兩岸的政府，竟然各自因為本身的政治利益與立場，不敢正視抗日戰爭的史實，當然更無法要求國際社會拿出應有的正義，共同聲討日本的野心動機。日本人這種扭曲甚至抹殺歷史的政治手法，實在令人感到不安與反感，而中國人自己對於抗日歷史的光榮事蹟與不朽的貢獻，同樣缺乏了解（甚至有許多錯誤的刻板觀念與印象），豈不是更為可悲嗎？

¹沒有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的珍珠港，而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是否參戰仍是個未知數。

許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爲什麼德國不斷要對其二戰的責任而賠償道歉？但日本卻可以含混地推脫其罪行？」其中之一的答案是，「因爲中國」。以英、美、蘇爲首的西方國際強權集團，在共同擊敗納粹德國的挑戰後，這些國家爲了制止德國的再起，當然設計了一系列的方法，要德國人永遠記得過去錯誤的歷史。

但是對於日本戰爭罪行的處置就變得複雜很多。由於這中間包括了盟國出賣中國的權謀，以及冷戰時代的戰略對抗佈局，所以在國際社會的歷史中，就採取嚴重扭曲中國抗日歷史真相與貢獻的手段（單是比較日本東京審判與德國紐倫堡大審，就可以知道盟國對日本有多寬大了）。現在既然連侵略中國的歷史實況都還被故意弄得含混不明，日本在戰爭責任的問題上，也就難以清楚追究了。既然連盟國都儘量避談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那麼日本更是有理由推卸自己曾發動凶殘侵略的責任了。

西方強權驚恐中國的復興

中國能與美、蘇、英並列，成爲創建聯合國的四強，是源於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負擔力抗日本的重責，而有重大貢獻的結果。中國在經歷這場嚴酷的考驗後，已經出現了復興與統一的歷史發展契機，但這卻引來了國際強權打壓與出賣中國的陰謀，當然也是導致日本「必須被」西方強權原諒與扶植的動機所在。西方對於日本能在明治維新之後，竟然只以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能挑戰歐美強權數百年的基業，大感震驚；它們對於中國能在抗戰時期，孤軍奮戰的優異表現（華軍的潛力實質上超越了西方軍隊的作戰能耐），更爲憂心忡忡。國際強權「圍堵」與「分裂」中國的策略，不是出在後冷戰時代，而是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事實。

事實上，在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之前，西方強權對於中國能夠獨力對抗日本長達十年之久（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一），簡直是不敢相信。中國表現出如此強韌的內在民族生命力，因而造成國際強權的驚恐，擔心一旦中國通過戰爭的考驗，她再以全球最多的人口與極廣的領土，完成現代化的復興之後，這不正是西方國家千年以來的「黃禍」之惡夢成真²？這些短視的西方強權謀略家，卻沒有考慮到，假如中國走上衰敗與分裂，或被外面的威脅逼

²典型的種族歧視觀點，就是把中國強大與黃禍畫上等號。

到要全力反抗，對於亞洲與世界會產生多大的損失與危機？

從這些強權狹窄的國家利益觀點看來，他們會認為，假如中國在戰後真的興起，她會成為比日本更為難以對付的東方國家，甚至會進而影響到亞洲其他的民族，起來抗拒西方殖民主義而尋求獨立。如此一來，西方殖民主義支配全球的時代，就此將要完全結束了。另一方面，當時的蘇聯正設計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的新興全球勢力，也要藉著中國歷史巨變的機會而發展。所以國際強權一面在與日本作戰，一面就在開始設法如何削弱與防範中國的發展，這就是盟國兩手策略的運用。

說來相當的諷刺，在中日全面戰爭正式開始時，侵略中國最早、最為凶狠的蘇聯，竟然是首先支持國民政府抗日的國家。這是因為蘇聯知道，只有支持中國長期抗日，以戰爭拖住與消耗日本，蘇俄才能坐收中日決戰的最高漁利。在中日戰爭擴大為全球的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先是支持中國抗日，以牽制日本的軍力、減少美國所受的壓力，讓美國有時間佈署反攻，同時減少美軍可能遭到的重大傷亡。但是當反軸心國戰爭已經勝利在望之後，強權們就開始了壓制中國興起的戰略佈置。如何擊敗日本，與如何分裂、弱化中國，就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盟國對付亞洲戰場的最高政略指導原則。

因此，最先利用中國牽制、消耗日本的力量，然後再反手削弱中國的，就是蘇聯。蘇聯不但在中日戰爭進行到重要關頭時，承認滿洲國、中斷了對中國的援助，而且還不准美國援華的物資借道蘇聯，造成中國的戰力耗竭；同時設法分裂中國的新疆，最後更設計了雅爾達密約，分裂中國的外蒙古，以及深入中國東北、控制遠東的戰略利益，並且直接支持、鼓動中國的內戰。另外一個「盟友」英國，則是誓死不將香港九龍歸還中國，同時不肯提前反攻緬甸以打開援華的命脈通道。美國則是對於中國最為友好以及援助最多的「盟國」，但是美國竟然也曾經有將東北與台灣，交給國際共管的戰略規劃，以及負責強迫中國接受雅爾達密約的做法。

這些盟國既以這樣可怕的手段出賣了中國，要想有一個合理化的交待³，就是設法抹殺或是扭曲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在西方國家的通俗史書

³由其是英、美兩國，向來以民主、人權與正義白詡，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一定要加以掩飾。何況它們的政府與傳播媒體都有相當高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只要多費些心思，常常可以先把事實弄得很混淆，漸漸地就可以說某些事件很具爭議性（controversial），接著在新聞、言論自由的掩護下開始可以各說各話。最後，歷史事實都可以扭曲、顛倒了。

中，捏造一個歷史上極其荒謬的謊言，就是設法用暗示或是抹黑的手法，在二次大戰中把中國說成根本沒有、或是僅僅少有貢獻。這樣西方國家就可以比較合理化地辯解，既然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真正的貢獻，中國自然沒有權利得到戰勝國應有的待遇；同時為了顧全大局的戰略安排，中國被犧牲「一些」權利，也是可以接受的處置。正如盟國犧牲了所謂沒有「貢獻」的東歐國家人民之權益一樣，根本沒有考慮東歐人民的意願，就把它們關進鐵幕達半世紀之久。

國共內戰導致抗日歷史失真

而國共戰爭所造成的兩岸分裂，則是抗日歷史事實被遺忘與扭曲的國內因素。國民黨政府退到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需要依賴美國與日本才能生存，因此不願大量公開與深入發表抗日歷史真相，而影響到與日、美的關係。目前台灣的主政者，更是有著極強的親日情結，甚至公開反對日本為侵華的暴行而道歉，這樣台灣的官方如何會重視中日戰爭的史實？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因為是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大受益人⁴，因此不願對於抗日歷史真象，做太多的報導，與深入的教育，以免讓蔣介石與國民黨領走了抗日歷史的光榮。當然，最近中國大陸對於抗日戰爭的歷史觀點，也開始有了調整，在「不動聲色」的狀況下，已經可以在學術研究的觀點下，有系統地撰寫了一些立場超然的抗日戰爭歷史。但是整個推廣、大眾化的努力，仍然相當不足，對於整個中國社會與人民，擴大宣揚與教育抗日戰爭歷史的真相，還是有著政治上的禁忌。

所以無論中、外，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史實，都有著自己難以告人的政治利益考慮，因此對於中日戰爭史的真相，都有扭曲與淡化的做法，造成了整個歷史事件缺乏有深度與廣度的記錄與報導。一個失真的歷史記錄，是無法解答歷史問題的，而且是產生歷史失憶症的遠因。總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勝利了，但是中國人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權益，甚至連他們自己在戰爭中的歷史真相，也被出賣與遺忘了。中國人對抗日戰爭歷史的失憶症，成為了現代中國問題併發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⁴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議員佐佐木更三等人的名言：中國共產黨『感謝日軍侵華，能讓中共提前執政』

中國人是英勇的戰士而非人質

近年來，部分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的華人，特別熱衷「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宣揚，還進而暗示將中國人與猶太人的遭遇做對照。這種做法當然是有事實的支持與其特別的觀點。但是過度強調南京大屠殺單一事件，又沒有全面抗日歷史的掌握，反而會出現一種偏差，就是把中日戰爭的英勇抗敵歷史，僅僅濃縮成爲南京大屠殺的面貌，結果會造成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另外一種被曲解的形象。好像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只是受害、無助的「人質」，而非英勇抗暴的「戰士」。這點對於抗日戰爭歷史的真相而言，是極其不公的。

歷史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絕對不是東方的猶太人，或單純的「受難者」，只能完全無助地受欺等死，或只有等待盟國的大軍來拯救。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日本的戰爭是一場無比英勇、無數犧牲的大戰，中國在戰爭中的貢獻是導致同盟國獲得勝利的主要因素。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絕對不是國際強權，因爲中國人被日本戕害或屠殺而贈送的一個安慰或是補償，唯一的原因，實實在在是因爲中國血戰不屈的功勞。沒有中國對日軍的奮戰到底，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結局可能要完全改寫，就是因爲中國是戰勝法西斯不可或缺的主要一員，她才會得到這個國際社會崇高的地位。（想想看有多少國家想要這個極其重要的國際地位，中國若是沒有重大的歷史貢獻，誰會把這個崇高的地位「送給」中國？）

國民政府主導與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另外一個在華人團體中，也非常普遍的問題是：抗日戰爭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打的？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也是抗日戰爭歷史至今無法顯出真相的主要理由之一。根據歷史的事實，無論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全體的中國人民，都有參加這場中日戰爭。但是以戰場的表現而言，國民黨是當時領導政府的政黨，當然是負起領導全局戰爭的主要歷史責任，而共產黨則是以游擊戰方式與日軍作戰。

「中日戰爭是那個黨打的？」並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事實是，當時中國所有的黨派與全體的軍民，都參加了這場中日的歷史性決戰。與其歸功是哪個政黨的功勞，不如回歸歷史真相的記錄，大家可以心平氣和的從真相記錄中，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改朝換代歷史的結論，可能是由成王敗寇的邏輯所支配，但是用千萬中國人民的血淚寫成的歷史記錄，卻不能因這樣的邏輯，而予以歪曲與抹殺。中國人絕對不能認為許多國民黨的領袖們，有著留日背景與日本關係，就斷下結論，認為國民黨媚日或是懼日。事實上，多數國民黨領袖是很傳統的中國人，中國民族主義一直是支配他們的主要力量。只要看國民政府最後會採取「聯蘇容共」的抗日政策，就可以知道，為了準備抗日，蔣介石甚至放棄自己所一向堅持的政治信念與原則，而尋求蘇聯的援助與允許共產黨參加抗日。全面抗戰的八年中，國民政府肩負了巨大的責任與壓力⁵，而終於將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卑微地位，提升到聯合國的四強。

中國共產黨當然有參加抗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當時最為重要的政治路線。但是中共的終極革命目標，是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日本的右翼軍閥政府，正是這個革命要推翻的重要階級敵人之一，所以中國共產黨會抗日。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並非把抗日當成必須全力出擊的首要目標，因為它的歷史使命，是要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勢力、壯大自己的革命隊伍，所以中共只是把抗日當做達成革命成功的一個環節而已，當然不會主動盡全力去與日本拼戰⁶。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無法舉出自己在抗日戰爭中，到底締造過那些重大、光榮的戰役之真正原因之一。平型關作戰只是太原會戰中的一個戰役，共軍在這場戰役中，也只擔任了敵後游擊戰五分之一的責任，成功伏擊到一個日本的補給運輸隊而已。百團大戰也是一系列游擊戰的統計總數，個別的作戰規模，連戰鬥⁷都算不上。假如中國抗日的真相，只有平型關與百團大戰（兩場作戰加起來，日軍的死亡人數只有三千人不到），再加上一些游擊戰，那麼中國就真的對於二次世界大戰，沒有貢獻可言了（幸而這不是抗日

⁵它對內必須兼顧對日作戰的龐大支出、後方地區的經濟與建設、全國軍、公、教人員的薪餉與實物配給、各級學校教育工作的推動等等，每一件工作不僅需要規劃與執行，更必需經費才能運作，而國民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沿海精華區的關稅與收入）已完全被日軍切斷了。對外則是以外交的交涉提升中國在世界的定位，廢除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等等。

⁶本書第二十九章「百團大戰與共產黨的游擊戰」是專門探討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其他許多章節亦有作相關之論述，書後附的索引也提供了一個找尋問題與答案的工具。

⁷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十萬人以下的一場作戰稱為戰鬥。

戰爭的事實)。假如中國在盧溝橋事變後就是「這樣」對抗日本的侵略（僅有打了就跑的游擊戰），根本就別想成為創立聯合國的四強，恐怕在戰後連台灣、東北都要被國際共管了。

雖然如此，共軍仍然在黃河南北，長江兩岸，各種大大小小的游擊戰中，與日軍進行非常艱苦的對抗，八路軍抗日的犧牲，也是非常的慘烈，共軍有自己一套非常難纏的游擊作戰能耐，讓日軍與偽軍遭到嚴重的牽制與可觀的損失。但是這些抗日的行動，終究是戰略的牽制⁸，而非戰略正面的主動對抗。

抗日史實需要肯定

歷史必須還原它本來事實的真相，否則歷史將會繼續出現嚴重的不公，也會導致歷史悲劇的重演。中國人曾經為維護人類免遭法西斯暴政的侵略與蹂躪，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但當時中國人的血淚、犧牲與貢獻，到如今還是幾乎完全地被歷史所遺忘與抹殺，難怪中國人在自我認同上，常會遭遇到非常重大的困難。

當全世界在探尋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之時，多數的中國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在這個重大歷史裡的定位，也不知道中國做了那些重要的貢獻。多數人也不明白，為什麼在贏得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反而會喪失領土、陷入內戰⁹？直到現在，多數的中國人，還是不能知道自己光榮歷史的實情。這些嚴肅的問題的答案，當然包括了中國人要負起自己民族不爭氣的責任，但是國際強權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中國上下其手，用盡了各種破壞與出賣的做法，也要負起同樣的責任。

因此作者寫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所有的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抗日的歷史真相。依照歷史事實的記錄而言，中國是英勇奮戰的戰士，而不是人質，中國在二次大戰中，對於全世界的人類，共同追求歷史的正義與和平，有著極大的貢獻。但是中國在歷史上應有的光榮與權

⁸我們不能忽略的一點，即是共軍部隊也是日軍要「一視同仁」消滅的敵人，因此八路軍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避免的會與日軍對抗，這和主動的抗日作戰有非常重要的分野。

⁹一般流行的解釋是盟國為了「顧全大局」而用中國（她只是盟國對日作戰的累贅）的領土、主權作為引誘蘇俄參戰的戰利品（但無法解釋為何不用英國的殖民地？），所以雅爾達密約也是個不得已的選擇。這種論點本身矛盾百出，其他的不講，這個說法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如果中國如此毫無用處與不堪一擊，為什麼日本必須把超過一半以上的精銳部隊放在中國戰區作戰？為什麼日本一直設法要與蔣介石和談停戰？中國豈不早應該亡國了？

利，卻都被強權的政略所出賣了。

本書不是一本抗日戰爭全史，沒有巨細靡遺地記載抗日戰爭中所有主要的戰役與事件，它只是設法從整個抗日戰爭的歷史中，挑選一些重大的事件，找到中國在這場歷史大決戰中的貢獻，以及點出歷史曲折與變化原委的所在。本書更是不諱言地指出中國在國際強權的運作下，在歷史中遭到出賣的掙扎。本書絕對無意去醜化日本所犯下之暴虐的戰爭行爲，也不想挑撥盟國對中國出賣的是非爭議，更不想要爲哪一個政黨的形象而辯護。本書只想設法將抗日戰爭歷史的真相，告訴全世界與所有的中國人，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做出了多少的貢獻，以及最後如何遭到出賣與陷害。

這本書比較著重歷史事件原因的探討，與歷史教訓的反思。因爲作者認爲，目前離開中日戰爭歷史發生的時間，已經有半個世紀以上了，在這麼長的時間之後，歷史就不能只滿足於事實的考證與收集而已，更要能從實際的資料，發掘、思索其意義，才能發揮歷史教訓真正的價值。作者認爲，歷史的因要比歷史的果更爲值得思考，而設法分析歷史當時的情況，找出相同狀況之下的不同佈局與選擇，也是一種提供瞭解歷史教訓意義的重要思考方式。

因此在寫作歷史之時，難免會針對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爲，來發掘其事實的真相以及作出褒貶的評價。但對於這些已經成爲歷史的人物，作者並無任何的個人恩怨與利害可言。對於歷史事實的敘述，一樣必須抱著歷史就是歷史的態度，無意（也不會）討好某些政治立場或利益的觀點，否則就會再度扭曲了歷史。作者全書的立論觀點是，在人類最爲關鍵的一場歷史決戰之中，中國人爲全人類的正義與自由做出最大的貢獻，這是中國人不朽的榮耀。歷史的真相不能永遠地被扭曲。

但是沒有人能夠完全超脫自己的環境、身世與觀點的歷史敘述，由於涉及到歷史人物與黨派的批評，或者應該透露一點作者自己家世的政治背景。先父諱璟青（原名浪萍、礎堅），爲了早日投身抗日，曾經參加過共產黨抗日的軍事訓練活動（當然不是共產黨員），因此了解共產黨的抗戰策略。雖然先父很快地脫離共產黨團體，而積極參與國民政府軍隊的抗日工作，最後成爲國軍的陸軍上校軍官。但是在退到台灣之後，只因爲過去這點的「紅色」記錄，而成爲台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後半生都活在政治的監視之

下，失意潦倒。先父的基本立場是，看清共產黨，也看輕蔣介石（典型的粵派軍人觀念）。先父當初絕對沒有想到，自己爲了在抗日戰爭中，想要多出一分力量的結果，導致了後半生失去自我發展與貢獻國家的機會。這也許是作者內心之中，永遠感到不平與遺憾的地方。

日本對華的全面侵略迫使中國抗戰禦侮

作者對於第二次中日戰爭歷史的看法，大略可以簡單歸納如下：假如單就兩國之間的關係而言，中日的全面戰爭，原來是不必一定要發生的，或是可以避免發生，因爲在長達二千年的歷史之中，中日間親善與互不侵犯的時間，遠比矛盾與衝突的時候，長得太多。就算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中日關係出現衝突的發展，雙方也沒有爆發全面戰爭的絕對必要。但是日本在錯估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前題之下，冒險發動了這場戰爭。其實日本也曾經過幾度掙扎，希望避免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決戰，也多次希望能夠早些停止對華的戰爭。因爲日本知道，當時日本真正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蘇聯與美國；與中國進行決戰，絕對會是日本決策所造成的歷史悲劇。

以當時歷史的狀況而言，中國沒有能力挑起這場戰爭，日本也沒有能力結束這場戰爭。中日戰爭對於參戰的兩個國家，註定是沒有贏家只有輸家，而真正獲利的大贏家，反倒是蘇聯。不過日本卻是在恐懼它將來與蘇之歷史大決戰，以及未來與美爆發衝突的戰略思考下，決定要設法在中國擴大日本的戰略空間，與增加決戰籌碼，而悍然侵略中國。日本誤以爲很快就能結束中日戰爭，但是這場戰爭竟然成爲拖垮日本的歷史決戰。雖然中國付出近乎無法承擔的代價，但是中國也獲得浴火重生之最大突破與發展，假如不是蘇俄、英國聯手發動另外一種對付中國的「侵略」，中國現在歷史的發展會非常不同的。

本書將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時間，上溯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與一般的抗日戰爭歷史，從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開始，有所不同。因爲日本是從九一八，開始第二次正式地侵略中國。假如抗日戰爭是從七七算起，那麼如何能夠解釋，在中日戰爭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淪陷，五千萬人民被奴役的事實？歷史大事件應該注意其發生之因，所以作者對於這段時間的歷史變化，用了不少篇幅加以論述。

當然，中日雙方是從七七事變之後，才進入全面戰爭的階段。雙方這場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總共進行了八年一個月又三天，兩軍雙方總共進行過二十二次的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以及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一次的小型接戰。中國軍方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日軍傷亡了一百一十萬人，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萬人，人民的財產損失估計，超過六千億美元。另外中國無數的文物與古蹟，都遭到日軍大量的摧毀與劫掠。日本最後在中國戰區共有一百二十萬部隊向中國投降，六十萬的關東軍向蘇聯投降，日軍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陷在中國的戰場。這就是中國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無與倫比的貢獻。這些數據就是一個駁不倒的事實，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會成為聯合國四強的根本原因。歷史的敘述可以受到觀點的扭曲，但是數字仍然會說話。

整個中日戰爭，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中國孤軍奮戰的時期。在這個長達十年的時間中，先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是想盡辦法步步蠶食中國的東北、內蒙與華北，中國是忍辱負重、設法爭取時間、完成統一與建設，以凝聚國力來面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歷史決戰。

在七七事變之後，中國雖然沒有完成準備，但是被迫全面應戰。日本是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以優勢的兵力，擊潰中國的抗戰意志。不過中國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作戰，在三場關鍵性會戰的導引下，以重大的軍民傷亡，成功地使日本陷入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在武漢會戰之後，日本企圖改用「以戰養戰」的戰略，扶植漢奸政權，來搜刮中國作戰資源，並且迫使國民政府最後因為力竭而放棄抵抗。此時中國採取長期「戰略相持」的方式，消耗日軍的作戰能力，迫使日本在戰爭資源面臨耗竭之前，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奪取南洋的戰爭資源。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國與全球反法西斯國家結合，共同對日本作戰。中國在形式上結束了孤軍的態勢，但是由於盟國對於中國戰區，是採取極端歧視的戰略資源分配次序，蘇聯又已經切斷中國的對外聯絡通道，因此造成中國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不但沒有得到更多的援助，反而還要分出已經不足的軍力與資源，以維護緬甸的戰略地帶安全。更糟的是，由於企圖分裂與弱化中國的國際勢力，藉機滲入了中國戰區之中，造成中國戰區內部的紛爭不斷遭到引爆與擴大。但盟國只是空應許中國大量的外援，讓國民政

府有如望梅止渴般的還願意繼續撐下去，卻始終沒有實際得到所需的大量援助，於是中國的戰力逐漸枯竭。結果使得中國在一九四四年，在日軍最猛烈的攻勢下，遭到一連串嚴重的作戰失利，一度幾乎在亡國邊緣掙扎。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國戰區的局勢才出現好轉，但是已經伏下了中國將遭到出賣的悲劇命運了。

盟國「抗日防中」的策略

檢討中日戰爭的歷史，日本是在中日爆發全面的戰爭之後，才知道錯估了中國民族主義所產生的反抗力量，因而陷在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而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一方面只想利用中國來困住日本的軍力，一方面設法防止中國利用抗日勝利而進入現代化，因此只願意以「最低限度」的援助，來維持中國繼續抗日所需的戰力¹⁰，同時還要設法分化中國、介入其內部的鬥爭。其中以蘇聯最為狠毒，英國最為陰險，美國則是徘徊在正義與權謀之間。最後的結果是，中國為世界而戰，但是世界卻出賣了中國。當然中國人自己的內鬥，也是造成中國無法保障自己權利的主要原因。

若是分析中日戰爭的成敗因素，我們可以說日本是應勝未勝，中國是應敗未敗。以兩國整體的國力，或是直接交戰的軍力而言，日本都是居於絕對的優勢，因此以力而言，日本應該可以擊敗中國。但是在政略與戰略的運用而言，中國卻能以民族主義的熱血，充分運用對抗的智慧，使得日軍無法施展其力的絕對優勢而擊敗中國。日本竟然陷入欲戰不能盡其全力，欲和又不能拿出決心的困境，因此日本的「力」優於中國，但是「智」卻輸給了中國；在「理」上面，日本更是站不住腳，因此最終日本還是失敗了。

在中日戰爭的發展過程之中，中國的民族近乎永無止境的內鬥劣根性，是整個中國現代史危機不斷發生的問題所在。但是源自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力量，卻在戰爭爆發之後，克服了一切的問題，在絕對劣勢的作戰條件之下，仍然能夠全始全終地完成對日抗戰，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戰爭歷史上近乎前所未有的奇蹟。

日軍擁有火力與戰技的優勢，以及現代化的工業與社會組織，中國在這

¹⁰美國軍方的講話就是：China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is war (to ease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in the Pacific).” 詳見《Wedemeyer Reports!》。

些方面，是全面的落後。中國人只有以比鋼鐵還要強韌的意志，以血肉之軀抵擋槍林彈雨，在中國壯麗的河山之中，不惜一切的犧牲，築成一條又一條的血肉長城，最終能夠擋住日本的攻勢，贏得最後的勝利。最爲遺憾的是，在列強的陰謀支配下，這個重大的歷史性勝利，沒有給中國帶來和平，反而引爆了中國更大的內戰。中國就在戰後，失去了建設與發展的機會，不但不能走上勝利的富強之路，反而陷入了更大分裂與內戰，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有中國抗日的英勇事蹟，也就被政治掩埋與忽略了。

本書既然把這次的抗日戰爭，稱做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當然有其特別的用心。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展開的抗日戰爭，事實上，是可以上溯清朝時代的甲午戰爭的「未完成之戰」。本書的目的之一，也在對日本示警，由於日本至今仍然不能面對它自己的戰爭責任，同時繼續推展新軍國主義政策，企圖控制釣魚台與幕後支持台灣「獨立」，那麼或者就會有「第三次」中日戰爭衝突的可能。而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已經覺醒、國力已經增強，中日雙方若是再有第三次的軍事衝突，恐怕日本會受到更大的打擊，這剛好與第一次中日戰爭之時的情形與狀況相反。

作者希望藉著這本書，來回答一個非常嚴肅的歷史問題：『當全人類參予二次世界大戰之時，中國人在那裡？』答案是，中國人率先挺立在反抗法西斯暴行的戰場中，成爲貢獻最多、犧牲最大的戰士。人類在二次大戰之所以會有戰勝軸心國的成果，中國人的貢獻最多。歷史不應忘記中國人的光榮與貢獻，她所有的犧牲不能被扭曲與遺忘。對於列強聯手出賣中國的歷史，中國人應當有所警戒與提防。而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發展上，中國也要出更多的力量。否則中日之間的衝突，可能又要歷史重演了。

中國團結自強乃世界之福

作者對於歷史反省後的想法是，中國是一個人口、資源、地位都極其重要的國家，因此強大與團結的中國無可避免地必須負起大國的責任，東亞與世界才能得到穩定與發展。假如中國處於歷史性的衰弱期或是發生內亂，必然會引發全球戰略與經濟的不穩與失衡，甚至造成全球性的衝突與災難。也就是說，世界人類要想在現在與未來過好日子，就要希望中國能夠穩定、統一與富強。

中國的地理與結構，是如此之龐大與複雜，她絕對不能採取封閉的政策，否則容易會造成內部嚴重的鬥爭與分裂，也就會產生中國與國際的歷史危機。現代的國際社會，一直不能妥善面對中國復興之後的世界局勢，因此她總是容易遭到孤立與誤解。從歷史的事實中，全世界都應該清楚了解，尊重中國應有之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讓中國成為富強與穩定的大國，這樣亞洲與世界才能安全與繁榮。國際上任何曲解與孤立中國的做法，都可能會造成世界新的危機與問題。而中國人也要從歷史的苦難中，記得中國必須團結進步，並且永遠不要成為霸權國家，把侵略造成的痛苦帶給別的民族（因為自己曾經忍受這種無理的飛來橫禍超過百年之久），這樣才能從歷史中學得教訓。

而作者認為，中國嚴重的內訌與分裂，也是她會遭到日本侵略與盟國出賣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的中國人，幾乎永遠不會停止自己內部的惡鬥與分裂，因此才給外國的帝國主義勢力，有了更多侵略中國的機會與藉口。中國人甚至在抗戰期間，仍然進行各種的內戰與內鬥，坐視日軍消滅不同政治觀點的軍隊，或是自己軍隊互相進行火拼，而放過日本人。今天的中國人能否從歷史的血淚中，學到團結合作的教訓呢？

有一點必須要特別強調的是，雖然在抗日戰爭之中的戰場表現，中國處於失敗的局面居多，但是這絕對不能說，華軍不善於作戰，事實上，由於中國軍隊的訓練、裝備、後勤都太過於落後，所以戰場上常常失利。在中日戰爭之中，假如換成日軍擁有中國的裝備狀況，華軍擁有日本的裝備，恐怕日軍根本就不堪一擊了。只要檢驗接受美援之華軍的作戰表現，就可以發現，當中國軍隊的裝備與訓練，接近日軍水準之後，日軍就被華軍打得無力反擊了。

作者個人認為，日本人基本上是一個危機感很深，相當崇拜「力」的民族，同時有著很強的集體群性，對於細節非常認真與講究，但是卻缺乏真正的遠略與心胸。日本人對於能夠打敗他的超級「強者」，有著無限自卑感式的尊敬。反過來，日本人對於弱者就有近乎殘暴、凌虐的反常表現。日本人是一個「知恥」但「不知錯」的民族，對於挫敗的反應是極端地敏感，但對於是非善惡卻沒有深刻分辨的勇氣與智慧。而日本只要輸得徹底，它就會百依百順，如果它贏得意外，就會盛氣凌人而忘了原則。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更是展現對於強者崇拜，對於弱者暴虐的心理，甚

至在日軍侵略中國之時，也有這樣的表現。對於誓死反抗、造成日軍重大傷亡的中國作戰英雄，日軍甚至會表達出敬意與愛慕，但是對於不戰而逃的對手，日軍是沒有任何的憐憫與好感，甚至會以殘酷的手法來發洩心中的鄙視。中國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的近鄰，當然要有更多的了解與對策，但是基本的原則是，中國絕對不能示弱，是避免中日歷史再出現決戰危機的基本原則。

作者非常感謝多位歷史學者前輩，在中日戰爭史上所做的重大貢獻，他們盡其畢生之力，為搜集與保留抗日戰爭史實，留下非常珍貴的資料。作者要特別感謝梁敬錚教授、蔣永敬教授、吳相湘教授、李恩涵教授、劉鳳翰教授、黃仁宇教授、郭廷以教授、張玉法教授、王輔先生，從他們的著作中，建立了可敬的抗日歷史資料與論述，這些史料對於作者寫作本書給予極大的幫助與影響。這是一本為社會大眾所撰寫的歷史書籍，因此避免學術的論證與眾多的註解，希望能夠引起讀者對於中日戰爭的歷史，有進一步去了解的興趣，與閱讀更為專門與普及的著作（請參看作者的參考資料書目）。

必須忠於歷史的基本立場

為了忠於歷史的資料，本書一些人物與事實的描述，有可能會與一般人現有的歷史印象，有些出入，不過這是對歷史負責而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歷史很清楚地表明，每個偉人都有弱點，每個英雄都有畏懼，每個領袖的能力都有其限制，好人有其缺點，壞人也有其特點，那是一個非常的時代，當時許多歷史性的決定，不能僅以現在的常理來做評斷。

因此作者對於中、日、美、蘇、英等國裡的主要歷史人物，沒有刻板的成見，對於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日本的軍政決策人士，英美蘇的領袖，不同政治派系的抗日部隊，都儘量以事實與是非加以評論，有時給予正面的肯定，有時則給予負面的評價。看過這場人類史上最大的戰爭，更能感覺得到，歷史人物的功過，不一定是以成敗論英雄的，當然也不能以國籍黨派來分善惡。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一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清算，既是英雄人物輩出的時代，也是梟雄縱橫的時代，更是無名小卒不朽的時代。寫完這本書，對照現今的時局，真有一種「後英雄時代」的寂寞感慨。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作者常不自覺而追念先父，曾在抗日時代，為

了愛國犧牲一切，一介文人投身戎馬，成為所有抗日無名英雄中的一位，最終半生坎坷，也是為了這場戰爭，他所付出的血、汗、淚，其實就是這部不朽的中國歷史裡的一個小縮影。當然家慈亦復如此，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在那個被遺忘的時代，她是歷史巨變過程的見證人之一。因此作者與兄弟們，從小也就從父母的言談中，建立了最初對於抗日戰爭的印象。

推而廣之，作者的三叔鄭永平（現居澳門辦報）也曾在廣東參加抗日的游擊隊，大舅李承鼎是東北軍的騎兵團團長（為國犧牲），二舅李北光是國民黨東北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在被日軍逮捕後遭到嚴刑拷打與監禁。單是作者這個小小的家族中，就與抗日戰爭，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曾經歷過中日戰爭時代的五億多的中國人，以及三千五百萬同胞為之犧牲的事實，更是讓這個抗日戰爭的歷史，成為與每個中國人都有切身關係的事件，他們都應該是歷史上不朽的英雄。單是為了這些無名英雄的血淚犧牲，我們就不能讓這個歷史被有意地遺忘與扭曲。（哪個中國人有這種權力呢？）

本書的初稿，曾得到史學先進李恩涵教授的過目，承蒙李教授提攜後進的推薦，其實李教授更大的用意是鼓勵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設法了解這段歷史的真相，以學到歷史的鑑戒。個人也非常高興看到李教授在序文中，對於相關史料的介紹，足見兩岸的學術界，的確在努力建立這個歷史真相的史料。像李教授這樣窮其一生心力，研究中日歷史的學者，著作等身，更是令人感佩。

在最後定稿之前，作者也衷心感謝徐耀寰先生在百忙之中，仍詳細地校對全書的內容與文字，而及時糾正了不少的錯誤。這種感人的熱忱是現今中國人力量團結的一個很好的象徵。

這本書能夠寫作出版，當然要感謝舍弟紀倫與紀陽的幫忙與鼓勵，紀倫在中央研究院任職，得以方便的提供大量豐富的歷史資料，並且耐心的閱讀我的初稿，給與個人許多非常重要的指正與建議，他豐富的歷史資料記憶，常令我感到佩服。紀陽在內容與編排方面，給我極多的幫助，作戰地圖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更是一位非常有價值的原稿讀者，許多的內容經過與他的反覆討論，才有更深入的敘述與更正確的修正。事實上，這本書中一些的內容與見解，有著他們的貢獻與影響，當然書中若有錯誤與偏見，則是屬於作者本人的才學有限。另外，立法委員謝啓大女士，優秀作家嚴曼麗女士，對於本書也有熱誠的幫助，在此特別致謝。

最後，謹以本書獻給作者的先父、家慈，與曾經歷抗日戰爭所有的中國人，是你們的奮鬥與犧牲，才讓中國擺脫歷史的挫敗與羞辱，使得全世界追求自由與正義的人類，得以戰勝法西斯的侵略者。我們以你們的貢獻為榮，世界與中國絕對不能忘記你們。我也可以很自豪地告訴所有的中國人，在這場決定人類歷史的大戰爭中，中國人是最為英勇的戰士，中國人的不屈不撓，對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最為重要的貢獻。中國人如此重大的血淚與犧牲，應該永遠留在歷史鮮明的記錄中，成為人心世世代代的一個感恩與警惕。

鄭浪平

一九九九年五月於洛杉磯

1

引爆柳條湖段鐵路 — 九一八事變

揭開全球人類歷史最大戰爭之序幕的「九一八事變」，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都沒有正式同意的狀況下，由日本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自行設計與發動的軍事作戰。對於日本而言，可以說是一場導至日本政府體制失控與毀滅的「兵變」，而對中國而言，則是第二次遭受日本正式武力侵略的歷史開端。

追溯導至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犧牲最慘烈，影響最深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遠因，是來自中國東北一條鐵路上的破壞陰謀。這個在當時僅僅只能稱做破壞未遂的微小事件，竟然在人類的歷史上，開啓了全球最大戰爭浩劫的序幕，實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不過，在這個微小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國際強權歷史大決戰的戰略佈局，而中國的東北，成爲這場國際強權世紀戰略對抗中，兵家必爭之地的戰爭導火線。

1.1 日本關東軍的陰謀行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時，日本關東軍的南滿鐵路守備隊柳條湖

分隊隊附河本末守中尉，帶領著六位全副武裝的部屬，出外進行夜間的巡察。巡察的地點，正在中國東北軍政中心瀋陽市的最大駐軍地點 — 北大營附近的鐵路沿線。在他們的背包之中，還夾帶著炸藥、引信以及野戰電話機。在中國東北的九月夜間，已經是有著秋涼的寒意，但是對於這些出巡的關東軍而言，心裡則是充滿了膨脹的殺機，他們知道他們準備要「破壞」中國的鐵路，假如中國的部隊要想阻止他們的行動，他們將格殺勿論。

事實上，他們主要的任務，不是要破壞鐵路，而是要藉此造成衝突，以造成關東軍攻擊中國軍隊的「藉口」。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想到，他們所準備進行的鐵路小小破壞行動，竟然是引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戰爭浩劫的最初導火線，最後也給日本帶來歷史上第一次亡國的悲劇。

對於河本中尉而言，已非常清楚當天晚上自己的任務，因為早在半年前，關東軍參謀部的作戰參謀主任石原莞爾中佐，已動員屬下的參謀人員，擬出一個由關東軍發動軍事攻擊，以佔領整個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而這個軍事攻擊行動，需要一個引爆行動的「藉口」，以方便日軍有個對外宣示其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經過石原的規劃，這個藉口就是選擇「破壞」在北大營附近南滿鐵路柳條湖段的鐵軌。

其實這是一個連正式名字都沒有的地方，附近的地名叫做柳條湖，鐵路是在平地上鋪設的，但是在日本記者發出事件的新聞號外時，擅自命名稱為「柳條溝」，也有名為「柳條橋」。而將這個無名地方，硬加上「溝」或「橋」的原因，是暗示被破壞的地方是一座鐵路橋樑，因此這個破壞鐵路的行動，對於日本所管理的南滿鐵路運輸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脅，所以關東軍不得不為護路而戰，因為有誰會在離兵營極近的平地上破壞鐵路呢？而這個引爆中日歷史大戰前因的事件發生地點，就被無中生有的被誤傳為「柳條溝」了，從此所謂「柳條溝」就這樣成為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起源地，其實原本就是沒有這個地名的。同時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預備了兩個穿著軍裝的中國人屍體，當成現場被日軍擊斃的人證。

由於爆炸地點，離中國東北軍的主要防衛據點北大營是如此的近，難道不怕受到中國軍隊的發現與阻止嗎？事實上，這正是關東軍求之不得的事情，因為關東軍認為，只要有爆炸聲響，中國軍隊必然會出營察看（這就是為什麼爆炸地點要選在北大營附近的原因），這樣關東軍理所當然的將鐵路被破壞的責任，推給出來察看的中國軍隊，然後在混亂的黑夜現場，設法安

排與製造中、日軍隊相互射擊的衝突。只要有了槍戰的現場與死傷的記錄，這樣關東軍立刻就能夠以自衛與護路為名，發兵攻佔中國東北南部的所有軍政中心。最後再取得日本軍部的支持，全面奪取中國的東北，建立「滿蒙」，以做為日本未來的日蘇決戰的戰略基地所在。

而出身工兵懂得爆破的河本中尉，被參與石原計劃的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佐，特別被選為執行這個任務的領導者。河本率領爆破小組的成員出外夜巡，在當時而言，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因為自從年中以來，整個駐防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部隊，由於萬寶山與中村事件所產生的高度緊繃情勢，早已進入一級備戰的狀態，高密度的實兵實彈軍事演習，幾乎不斷的在持續進行。而河本的上級長官川島正隊長，早已與石原等人互通聲氣，完全知道今天晚上排演的戲碼。

關東軍經過完整的參謀作業與多次的全盤操演，早已經完成全面進攻中國東北的所有作戰細部計劃，而且關東軍進行日以繼夜的反覆實兵操演，使得不斷的槍砲聲，已經成為東北軍民日夜都最為熟悉的噪音。就像九一八當天夜間，在瀋陽北大營附近的日軍南滿鐵路守備中隊，已經由川島隊長下令，進行夜間出擊演習，地點正在離北大營不遠的文官屯附近，而川島也非常清楚，部隊的演習只是一個軍事活動的藉口，而日軍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爆炸的訊號出現，就開始對北大營的東北軍發動攻擊。

河本在離中國駐軍的北大營不到八百公尺的地方，下令部屬在南滿鐵路的鐵軌上，開始佈置炸藥，河本知道，炸藥的設計是，只能造成重大的聲光效果，但是不能實際的產生破壞鐵路運輸能力（這就是為什麼不能選擇鐵路橋樑的原因，怕爆炸造成交通的中斷與搶修的困難），因此他特別用心的計算過，用藥的份量與埋藏炸藥的方式，這個爆炸的聲響既要能引起北大營中國守軍的出外察看，以製造與日軍武裝衝突的機會，但是又不能真的破壞了鐵路運輸的功能，因為隨後關東軍的整個攻佔南滿的軍事調動，還要使用這條鐵路做為運兵的主要工具。

炸藥很快就裝置妥當，河本看錶，等著從長春開到瀋陽的夜快車經過，十點二十分，火車聲音遠遠的傳來，當火車通過埋置炸藥的地點時，河本壓下引爆的電制，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震響了夜空，而鐵軌的一邊只受到約略一·五公尺的破壞，並未影響到南下夜快車的行進，整列火車通過爆炸的現場時，只是搖晃幾下，仍然安全的通過爆炸現場，而準時的在十時三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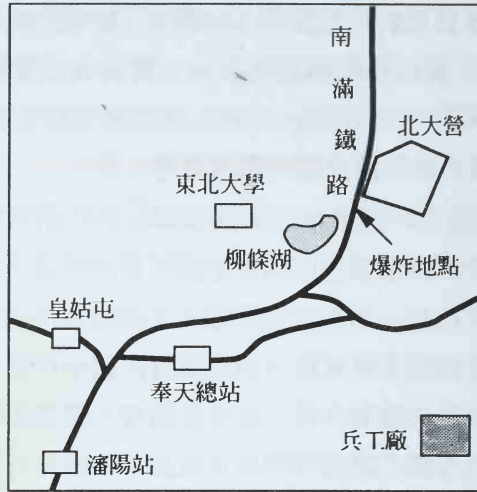


圖 1.1: 關東軍引爆南滿鐵道地點圖

駛達瀋陽車站，沒有任何的人員傷亡，也沒有其他運輸設備的損壞。

但是令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聲雖然震動了北大營，但是卻沒有任何的中國軍人出外察看，雖然在附近演習的日軍，在聽到爆炸聲之後，立刻向爆炸地點集合，但是卻沒有看到任何的中國軍人或是平民出現，因此關東軍根本不能乘機開槍製造衝突現場，只有推出兩具身穿軍服的中國人屍體。不過河本仍然下令部屬，逕自朝向北大營開槍射擊，一方面以軍用電話向在瀋陽城內的日本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佐報告狀況。這時候，等在北大營四圍的演習的日本部隊，在聽到爆炸聲與槍聲之後，立刻按照演習的計劃，開始向北大營進行正式的武裝攻擊，這時槍砲聲開始響徹瀋陽城的夜空。

而在花谷正身邊的，正是執行這次「滿洲事變」的靈魂人物，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當板垣聽到河本的報告，中國軍隊並未因為聽到爆炸聲音而出外查看，因此無法製造日軍與中國軍隊衝突的現場時，仍然斷然決定，關東軍按照原訂計劃對中國東北各地發動攻擊。同時以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中將的名義，對在東北所有的關東軍部隊，發出了事先已經準備好的四項作戰指令，要求關東軍立刻依照最近的演習計劃，全面攻擊瀋陽、長春、營口等在南滿地區的中國軍政中心。

1.2 沒有敕令的軍事叛變行動

板垣的這項作法，可以說是近乎一種軍事的「叛變」，因為根據日本軍隊的作戰規定，日軍任何正式的對外作戰行動，一定要奉到日皇的敕令許可，但是板垣不但沒有得到日皇的正式命令，甚至也沒有徵求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竟然以一個高級參謀的地位，就以司令官的名義，對關東軍發出全面作戰的命令，這種目無軍紀與長官的做法，正是日本當時最為可怕政治失控的「病態」

在當時日本的少壯派的軍人，根本不把國家的法律，軍隊的軍紀，人民的意願當成一回事。這群軍人根據自己的「理念」，決定採取斷然的行動之後，他們就會鋌而走險的獨斷專行，遇到任何的阻礙，就動用刺殺或是政變的手法拔除障礙，假如真的失敗，就來個鼓動人心的切腹自殺。日本少壯派軍官這些狂熱的斷然行爲，往往能夠以鮮血刺激日本不安的民氣，在民氣反應熱烈的狀況下，一種民粹主義的「類民主」熱誠，就成爲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背後動力，日本少壯派軍官認爲，日本人民會堅決的支持他們，他們可以至死不悟的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大業。

板垣在發出作戰命令，各地的日軍開始展開作戰攻擊行動之後，才向關東軍在旅順的司令部報告，聲稱『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並且與護路の日軍發生戰鬥，日軍不得不發動反擊』。這時候已經是夜間十一時半之後了。

當時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內，絕大多數的參謀軍官，都是這次事變計劃的知情者，特別是作戰參謀主任石原莞爾中佐，更是整個計劃的倡議者與製訂者，板垣、石原與花谷三人，是發動這個奪取滿蒙事變計劃的核心鐵三角。因此當天夜晚，石原早就在司令部內，等待著板垣的報告，在接到報告之後，關東軍司令部立刻舉行緊急軍事會議，所有的與會參謀軍官們，根本不去查證事件的真相，立刻異口同聲的表示，關東軍必須立刻進行對中國軍隊的攻擊，佔領中國東北所有的軍政中心，以「膺懲暴支」¹。

當時剛剛到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將，雖然事先沒有「直接」的介入這個事變計劃詳情，但是本庄在八月一日正式出任關東軍司令官時，就已耳聞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們，正在推動攻擊中國軍隊的各種軍事準備。本庄也明知，當時中國東北當局，根本無意也不敢惹關東軍在滿洲的任何行動

¹後來石原因爲反對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凍，戰後逃過了審判，而列爲甲級戰犯的板垣征四郎 (Itagaki Seishiro)，則在東京大審之中被判處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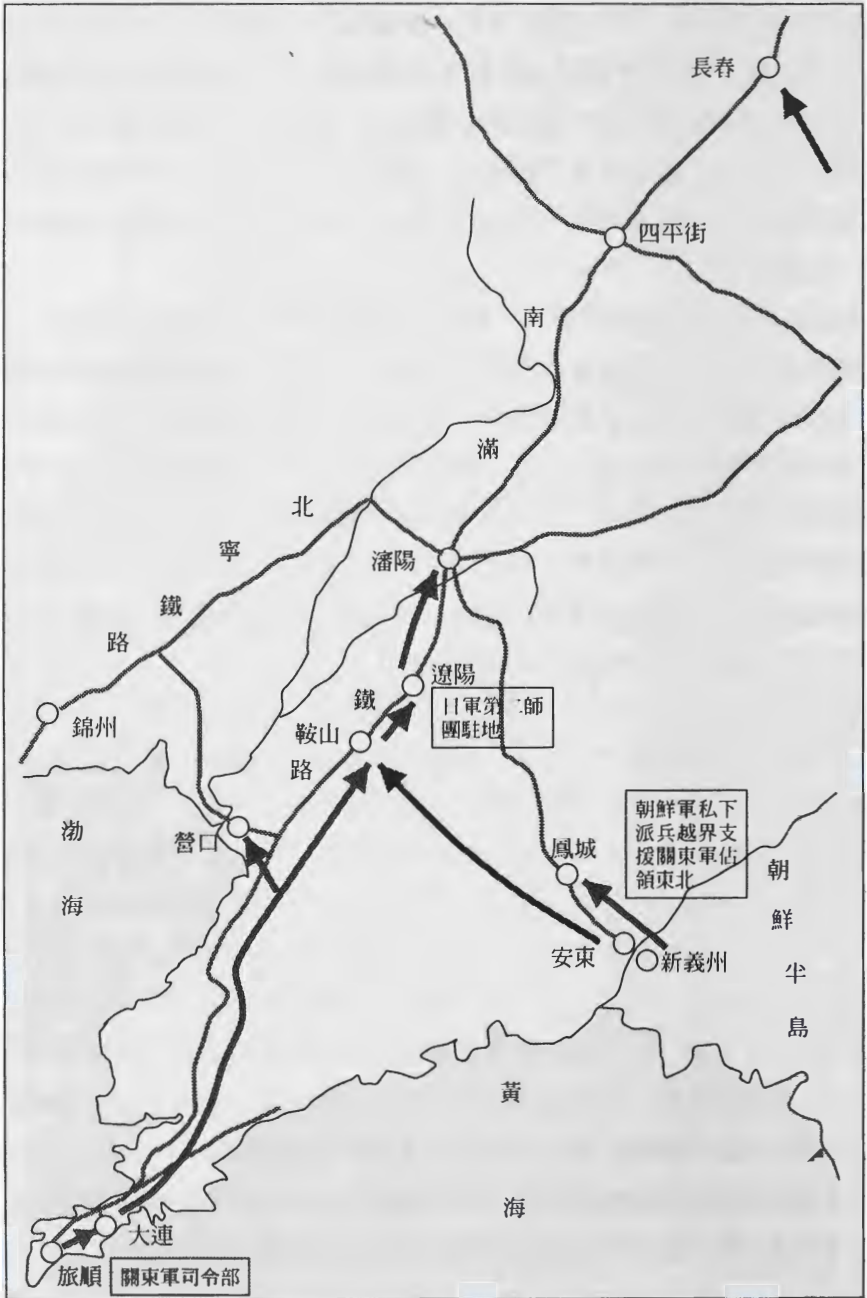


圖 1.2: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東北路線圖

（當時東北軍主力早已入關一年了，因此東北的中國軍力空虛，自顧尚且不足，那裡有能力去招惹關東軍？），但是本庄中將卻鄭重其事到處視察關東軍的戰備演習，並且一再發表嚴厲的指令，要求關東軍的部隊，隨時做好反擊中國軍隊製造事端的準備，同時故意的不去追查各種有關關東軍正在準備發動滿洲事變的「謠言」，而這個謠言的中心，就是在關東軍司令部之內。

因此，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軍官，在接到板垣的報告之後，幾乎立刻做出對中國發動攻擊的作戰建議，而且在午夜晉見司令官本庄繁，報告這個根本沒有中國軍隊出現的軍事「事變」，但是本庄卻立刻毫無疑義的接受了對中國軍隊發動攻擊的建議，同時追認了板垣先前以他名義發出的作戰命令，並且簽署了由石原所事先擬好的另外八項全面作戰的命令，下令關東軍進入全面的作戰反擊行動。更為嚴重的是，本庄竟然還以私人的名義，通知當時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要他立刻派兵越過鴨綠江支援關東軍作戰，本庄繁並且斷然決定，當晚立刻率領關東軍司令部移往瀋陽，以就近指揮全局²。

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在沒有請示東京軍部，就直接下達全面軍事作戰命令，同樣是一種軍事上的「叛變」，因為關東軍是在沒有奉到敕令的情形下，自行發動國外的戰爭。而通知朝鮮軍的越界助戰，更是違背了日本的軍事指揮結構系統，因為任何日軍的調動，若是逾越自己防區，同樣要奉到日皇敕令，何況是進行一場國際戰爭。

但是這些駐防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軍，同樣根本不把軍法、軍令，以及東京軍部的約束，放在眼裡，可以說是愛怎樣做就怎樣做，最多來個陣前請罪，而他們在軍部內的「同志們」，自然會設法替他們解脫責任。於是在柳條湖爆炸不到兩個小時之後，整個關東軍都已經進入全面動員作戰的局面，關東軍按照早就詳細規劃以及充分演練的方式，分別在中國東北進行攻城掠地的侵略戰爭。

由於當時中國東北的守軍，屬於東北少帥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主力，早已在一年前（非常湊巧的是同樣是九月十八日）離開東北防地，跟著張學良進入山海關之內，進行中止中國內戰與穩定華北政局的任務。而留守在東北的少數部隊，又早就奉到命令，對於日軍的任何挑釁與攻擊，都採取不抵抗主義，有些部隊甚至把所有武器都集中保管，因此事發當時，許多東北留守

²日本在戰敗後，本庄繁因為擔心為此受審，而畏罪自殺。

部隊手邊根本沒有武器，在遭到日軍開始進攻的時刻，更沒有統一的指揮與作戰，因此東北軍在遭到日軍有計劃的全面攻擊之下，只有設法自己應變，進行有限的自衛反擊，然後突圍退卻。

1.3 日本第二次侵華戰爭的開始

雖然九一八事變的本身，並未引爆一場全面與激烈的戰爭衝突，但卻是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全面軍事佔領行動，是日軍一場大規模的國外軍事行動，但是關東軍司令部卻沒有在軍事行動之前，請示日本的軍部，以等候敕令，就連一個正式的報告，也沒有送回軍部。當時是由日本在瀋陽的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以其長官土肥原賢二的名義（當時土肥原正在東京述職），向日本東京軍部，發出兩項簡單的報告，指出由於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因此關東軍開始進行懲罰性的反擊。在東京軍部震驚追問之下，關東軍才把預先準備的行動劇本，向東京軍部報告了事，這時候，關東軍早已經在沒有奉到敕令，以及沒有遭到攻擊的情形下，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了。

而日本軍部、政府與社會，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可以說是萬分的震驚，不單是因為關東軍先斬後奏的軍事行動，更是因為日本軍部才剛在前兩天，在受到日皇與內閣的關切與壓力之下，決定派遣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中國東北，準備了解並壓制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一時之間，日本社會面對著一長串的問題：例如怎麼會在建川剛到瀋陽的當天夜裡，就爆發了關東軍全面作戰的軍事行動呢？難道建川遭到關東軍的綁架或是刺殺？關東軍的行動，在當時追求和平與裁軍的國際社會中，將會給日本帶來多少的壓力？蘇聯又會採取怎麼樣的反應態度？蕭條的日本經濟能夠承擔戰爭的高昂成本嗎……？但這許多重要的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因此當時日本上下出現了莫衷一是的紊亂反應，東京股市與匯市立刻陷入一團混亂。但是日軍的少壯派軍官卻了解，這個軍事行動是一個歷史性的冒險，假如能夠獲得成功，那麼他們將可以主宰日本的命運。

總之，這個揭開全球人類歷史最大戰爭之序幕的九一八事變（Mukden Incident），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都沒有正式同意的狀況下，由日本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自行設計與發動的軍事作戰。對於日本而言，可以說是

一場導至日本政府體制失控與毀滅的「兵變」，而對中國而言，則是第二次遭受日本正式侵略戰爭的歷史開端。所以九一八事變對於日本的打擊，遠比對中國的為大。這個事變開啓了日本帝國亡國歷史的禍端，日本從此逐步淪為一個被軍閥支配的國家，最終成為侵略亞洲與世界的人類公敵。

2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軍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在當時不但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日本，更震驚了世界，因為這是日本對中國不折不扣的正式侵略，這也是日本軍方不敢想像的「兵變」事件。所以在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整個中國立刻陷在受到侵略屈辱的憤怒與掙扎之中，日本的軍方與朝野，則是驚疑的看著日本歷史大局的變化，開始由一群狂熱的軍人脅迫，走向一個全面失控的未來。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在人類的歷史上，可以說是有著非常奇特的歷史結構與內幕。因為在事變的引爆原點，只是一個沒有造成傷亡，沒有產生嚴重破壞，甚至沒有引起衝突的「破壞未遂」事件而已。因此，這個連衝突現場都沒有引爆成功的事件，之所以會造成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北的歷史起點，應該是百分之百源自關東軍的陰謀與安排，主導了日本野心畢露的「大陸政策」。

2.1 離奇的陰謀事件

但是說它是陰謀事件，又有些離奇，至少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並不「直接」知情，同時，連日本的軍部也不同意關東軍的做法，日本政府更是不贊

同，甚至在事件爆發的前夕，政府與軍部還驚動日皇，企圖設法化解這場危機的發生。

但是，這個事變卻最終還是爆發了！最後的結果是，造成一系列中、日以及世界歷史危機的開端，中國東北一百多萬平方公里資源豐富、白山黑水領土的淪陷，三千三百萬的東北同胞成爲亡國奴，日本迅速取得在整個東北亞戰略地緣的絕對優勢，因而加速日、蘇、美之間矛盾的惡化，種下中日全面戰爭的禍因，所以九一八事變就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浩劫的正式開端。

因此，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在當時不但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日本，更震驚了世界，因爲這是日本對中國不折不扣的正式侵略，這也是日本軍方不敢想像的「兵變」事件。所以在九一八爆發之後，整個中國立刻陷在受到侵略屈辱的憤怒與掙扎之中，日本的軍方與朝野，則是驚疑的看著日本歷史大局的變化，開始由一群狂熱的軍人脅迫，走向一個全面失控的未來。

如同人類歷史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樣，九一八事變同時包含著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因素；更爲重要的是，這個重大歷史事變的悲劇，在當時也並非完全不能加以預防與阻止的。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最終一切的反應都太遲了，九一八事變終於演變成爲人類歷史上，最大悲劇與災難大戰的第一槍，中國東北的軍民也成爲這場人類歷史浩劫最先的受害者。

從歷史事件發生的角度觀察，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可以說是事件急轉直下的「偶然」，因爲關東軍少壯派軍人原先的滿洲事變計劃，是準備在當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設法製造柳條湖事件，引爆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然後再發動戰爭攻掠中國東北。不過由於事前佈署走漏了風聲，引起了日本政府與軍部的關切，因此日本軍部正式派遣特使建川美次前往關東軍駐地，進行了解、調解以及壓制。板垣 等人事先得到建川即將阻止行動的情報後，爲了怕整個軍事行動計劃遭到正式命令的制止，因此決定提前在九月十八日發難。

若是更進一步的了解日本當時的政治狀況，就會發現九一八事變，原本只是日本內部，一系列軍人奪權的行動方案之一而已，因爲當時日本在國內的少壯派的軍人，原來準備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先在日本國內發動軍事政變，以建立軍人政府。如果那次軍事政變成功的話，也許日本關東軍就不會發動「九一八」的滿洲事變來刺激日本國內，推動右派集團的「昭和維新」了（當然日本侵略中國的主方向不變，但是很可能不是採取由關東軍少壯派

軍官，自行設計與發動的軍事攻擊）。因此就日本政局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可以說是日本政局畸形發展的一個國外激變因素。

2.2 明治維新的歷史變局

從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以及包括中日兩國近代史所有的衝突，都和日本的明治維新，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關連。明治維新之前的兩千六百年歷史，中日的關係是以和平與交流的狀態為多，明治維新之後，中日的關係就成為衝突與戰爭了，因此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歷史全面轉變的關鍵，也是中日關係全面改變的歷史開端。

日本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是被日本所欽慕、畏懼、模仿甚至崇拜的對象，日本傳統文化與典章制度，主要都是來自中國的「變體」。而中國縱使在最為強盛之時，也從來沒有把日本當成自己政治或是軍事勢力範圍的企圖，但是日本卻有一種假如有朝一日，能夠逐鹿中原稱霸華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補償日本民族集體性的對中國自卑與自制的歷史情結。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積、經濟與文化的全面國力而言，它是無法也不可能與中國正面對抗，更別提要取代中國而稱霸東亞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採取對外發展的國家策略，最多只有入侵一下朝鮮半島或是任由日本海盜掠奪中國沿海地區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才發現這是一個歷史轉變的契機，假如日本能夠比中國先完成現代化，它可以利用現代化所產生的巨大優勢，去支配與宰割當時仍然處在封閉與落後的中國。這樣日本就能超脫二千年來，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國之自卑心理的歷史格局。它將以現代化的船堅砲利做為工具，來建設一個威震華夏、萬邦來朝的「太陽帝國」。

在美國以艦砲打開日本的鎖國政策之後¹，日本朝野都受到極強的刺激，於是同心推動明治維新，對內結束了近七百年的軍人專政與割據的局面，對外開始大量吸收歐美的現代化科技與制度，當時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在內外巨大的歷史性壓力下，決心奉還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開始進入推動明治維新的歷史新頁，這是日本吸

¹美國的海軍艦隊在代將裴里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的領軍下，於 1854 年強迫日本對西方國家開放門戶。

收西方文化、制度與工藝的一個全面性歷史改革，這種歷史性的大變革，對日本而言，並非完全陌生，而是有歷史前例可循的。因為過去日本的全面漢化，一樣經歷過全盤性倣效中國文化與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歷史發展中，日本是一個善於吸收與模仿外國文化制度的國家，它對於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強，何況在全面的西化之後，日本可以迅速成爲富國強兵的國家，而稱霸東亞，是日本立國以來，想都不敢想的歷史大業，如今竟然有實現的機會，對於日本人而言，當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維新的重點，主要在於尊君立憲、引進科學、發展產業，建立富國強兵的國家發展戰略。日皇制度維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時所需的政治穩定，立憲造成新的人才體系運作，封建階級轉化成爲大大小小的財團，武士階級轉化成爲皇軍的骨幹，因此日本的明治維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價，就建立起一個類似近代西方強國的新基礎。可是日本是一個資源非常有限的小國，缺乏與強權直接對抗的本錢，日本若想擺脫這個資源短淺的夢魘，而尋求霸權的發展，它就必須設法取得支配中國廣大市場與資源的地位。當時的中國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時期，因此，日本在推動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同時，也急於掌握這個歷史的機會，設法掌控中國，這樣才能建立「八紘一宇」的日本帝國。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政治結構，可以說是一種變體的封建與民主制混合後所產生的新威權體制。日皇擁有神聖的地位以及絕對的權威，因此他不親理庶政，政府分成內閣、國會與軍部三大部分。國會當然不能監督日皇，只能在預算與法律上，對內閣產生制衡作用，內閣的首相負責總理政務，而由日皇諮詢政治元老的意見而任命，但是內閣對日皇而不是向國會負責。最爲特別的是軍令運作，在日皇單獨擁有「統帥權」的前提下，所有軍令都由軍方領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後奉敕令行動，政府的首長不得參與軍令決策會議，這種運作特稱「帷幄上奏」（因此有時候甚至連內閣的首相，都是看到報紙才知道日軍已經發動軍事作戰行動）

另外在軍政方面，也是由軍方獨斷的運作，軍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內閣或是拒絕推荐軍方將領入閣，因而造成政府倒閣（當然後來又加上乾脆由少壯派軍官直接刺殺不接受軍方立場的政府首長）。更令政府感到爲難的是，海軍與陸軍又是各有獨立不同的立場與系統，有時政府接受陸軍的要求，又會引發海軍的杯葛，反之若是順從海軍的要求，又會引來陸軍的反彈。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內閣最大的困擾，就是如何與軍方的意見達成協

調。

一八七〇年，日本明治維新首腦人物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決定模仿普魯士的強兵政策，建立直屬日皇指揮的「皇軍」制度，接著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獨立的軍令最高機構參謀本部，日本的軍部就逐漸發展成爲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現日本過去的幕府大將軍，以日皇名義秉政的局面，只不過是以軍部的形式出現而已。當時日本君臣與人民，其實都很習慣於「軍人干政」，因爲七百年來，日本幕府大將軍秉政的制度，就是軍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維新之後，幕府大將軍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權，但是新的軍部，其實又在遙控甚至是主導著政局，加上強國必先強兵，爭取海外資源與市場是引進工業革命、建立產業資本制度的成敗關鍵，因此明治維新基本上展開了日本的新軍國主義的發展。

2.3 主導日本政略發展的大陸政策

在過去的歷史中，日本對於自己「資源有限」無法發展成爲一等強國，而且必須步步爲營，避免與大國直接衝突，以防自己國家遭到傾覆，可以說是有著無限的恐懼情結。日本深知中國的資源豐富，市場廣大，因此日本錯誤的認爲，只有主宰中國，日本才能走出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而如何經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就成爲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一致的對外目標。所謂的大陸政策，當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國的日式說法而已。於是如何能夠操控與主宰中國，以得到日本發展與競爭的所需資源與市場、確保它能擁有富國強兵，威震東亞與世界的基礎——即所謂建立一個「八紘一字」的日本帝國——成爲當時日本朝野一致的國家政略共識。

只是日本對於如何完成這個政略目標，政府與軍方有著方法與路線的爭議，其中強硬派主張模仿普魯士的方法，以軍事力量爲主，直接對中國進行侵略與統治。溫和派則主張，由於中國實在太大，因此難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國式的策略，運用經濟、政治與外交的手段，加上軍事的威懾，而將中國的市場與資源，設法納入日本支配的範圍。

甲午戰爭是日本這個征服中國夢想的初試鋒芒，結果明治維新之下的日本，以工業化的基礎以及舉國團結一致的力量，擊敗了中國虛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兩千年以來對中國作戰的首次「大勝」後，它是竭盡所能地

要屈辱中國與劫掠中國。因此在馬關條約 (Treaty of Shimoneseiki, 1895) 中，日本以極其高傲的姿態，窮極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國主義剝削與壓榨中國的特權，同時要求中國賠償二億兩的白銀²，以用來建設「富強的日本」，並且要求中國割讓對朝鮮的宗主權以及遼東半島與台灣的領土，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夢想的開始。不料因為日本的佔領遼東半島，與帝俄在遠東南下，攫取中國不凍港的戰略利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日本在俄國聯合德、法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佔領遼東半島（由中國增加賠償三千萬兩白銀給日本，以「贖回」自己的領土），但是遼東半島乃是日本準備侵略中國大陸的地緣橋頭堡，日本當然不會真正甘心放棄它所覬覦已久的大餅。一八九八年，李鴻章在中俄密約之下，將東北權益交給俄國，以連俄制日，結果是種下日、俄在遼東半島歷史大決戰 (1903-1904) 的主因。日、俄之戰，是日本以傾國之力，進行孤注一擲的戰爭（英、美都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場），結果雖然是日本戰勝俄羅斯，但在國際強權都要瓜分中國市場與資源的壓力之下，日本無法如願以償的獨佔遼東半島，它只能取得經營中國東北南滿鐵路の特權，及大連、旅順的租借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與帝俄開戰，但是在戰勝國的主要戰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佔領與剝削中國領土和利益的特權（中國根本沒有參與這場戰爭），可見日本謀中國之深，以及西方帝國主義手段之狠毒。

對於日本而言，侵略中國既然已經成為明治維新的對外一致國策，因此日本會設法利用一切的機會，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一九〇〇年日本利用義和團事件，與國際強權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取得在中國天津到北京的駐屯軍權力，以及又一大筆的「賠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圖利用滿清政府瓦解的機會，策動滿蒙獨立，準備佔領中國的東北，但是在俄國強烈的牽制下作罷³。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軍推翻滿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國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時日本面對另一次歷史發展的機遇，就是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機會。雖然中國的革命軍

²這是中國對外戰爭中，單一國家所壓榨最大的賠款，也僅次於對八國聯軍的賠償金額，日本一舉把中國多年的國庫收入，完全劫掠一空，這和中國打敗日本卻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真是有天壤之別。

³從此這成為日本在本世紀侵略中國的標準方式，先在中國各個地區，不斷的利用機會，收買政客、漢奸，欺騙人民，無中生有的製造獨立、自治與分離的論調，其實最終的目的都是一樣，假獨立之名行分裂之實，實際上這些「獨立國」都成為日本所統治的附庸「假貨」，從無例外。

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國，但中國的民主政治，一時根本無法在舊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下生根發展，中國頓時淪為軍閥支配與割據的國家，軍閥的內戰更將造成中國進一步的支離破碎，正給予帝國主義侵略者更好的機遇——日本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2.4 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日本看到西方國家受到歐戰的嚴重牽制，無法顧到日本在亞洲勢力的發展，因此藉口參加對德國作戰為名，入侵當時德國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省；同時也看準了袁世凱要想當皇帝，中國正處於分崩離析的危機之中，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正式向袁世凱提出等於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內容涵蓋了日本要求在山東、東北、長江流域，以及全國各地的特權，以及監督中國政府的政治運作的條款，除了極少數條款仍待保留商量之外，袁世凱在壓力下屈服，簽字接受二十一條中絕大部分的內容，但是在密約曝光之後，中國人民激起的強烈反彈，迫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密約。

同時西方國家在歐戰結束後，發現日本獨佔中國利益的企圖，並由於日本接收了德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開始威脅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與戰略安全，所以它們又再度關切中國市場利益開放的問題，支持中國反對日本所提二十一條的亡國勒索，使得日本企圖鯨吞中國計劃的失敗。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國的目標，先集中在中國的東北——這是一個在東北亞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以及擁有非常豐富自然資源的地方。

日本經過兩次戰爭，仍然無法實地的佔據中國的東北，同時日本企圖利用歐戰機會來獨佔中國利益的企圖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準備利用在遼東半島的租借地與經營南滿鐵路特權的機會，逐步經略中國東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標是推動「滿蒙分離」，因為日本實在想不出侵略中國東北的漂亮藉口，所以自己先發明了新的名詞，將中國東北稱做「滿洲」，同時開始泡製「滿洲主權未定論」，因此所謂「滿洲人不是中國人」，「滿洲自古並非中國領土」的論調，成為日本當時輿論的顯學，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移民與浪人，更與部分滿清貴族後裔與失意的野心政客聯合，積極的製造輿論與事

端，鼓吹滿蒙獨立，以推動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的歷史大業⁴。

當時組成日本經營中國東北南部特權的機構，分成四大部分，日本將遼東半島南部，包含旅順、大連地區的租借地，設立了關東廳，成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展殖民地的總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與浪人前往開發，也收留、培養漢奸政客與軍閥。而負責關東廳以及在中國東北南部的南滿鐵路沿線防衛需要的部隊，稱做關東軍 (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國當年以「東印度公司」經略印度的方式，組成了「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管理從長春到大連的鐵路，控制鐵路的營運及其沿線的土地、礦產以及市鎮。

另外，日本在東北的軍政中心瀋陽，設立「奉天總領事館」（在當時，遼寧省稱做奉天省，是東北的軍政與經濟中心），直接與中國東北地區政府，進行各種侵佔中國國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南部與南滿鐵路的沿線，以開發與移民的方式，大量進行掠奪資源與土地，逐漸構成了日本在中國東北非法竊佔的「海外領土」。在日本經略中國東北的四大機構之中，又以關東軍最為慍悍與胡作非為。

2.5 日本軍方逐漸失控

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一度出現弭兵的潮流，日本的軍國主義在國內外都開始受到壓力與排擠，由於多數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夠建立更為民主與和平的政府，國會也出現不滿日本軍方強悍與恐怖的高壓做法，設法削減日本軍部的擴軍預算。同時在國際社會中，因為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破壞，也出現希望能夠建立以外交與和平方式解決國際利益爭端的方法，因此積極的提倡裁軍。特別是中國的利益必須由國際均分，不許日本獨占。蘇聯更是虎視眈眈的等待機會與日本再做決戰，以報日俄戰爭的失敗之恥，並要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的各種資源與利益。日本軍方的強硬派，確實受到一些制約與壓力。同時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種「八紘一宇」的雄心與膽識，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戰後，順應潮流，先後的減少軍費支出，加入國聯組織，簽定九國公約，裁減陸海空的兵力，對於「大陸政策」的推動，也採取溫和派的立場。

⁴日本人對於分裂中國的手法，永遠都是一個模式，鼓吹中國各地獨立或是自治，要將中國分割成為十幾個國家，更是日本舉國上下、及外銷出口的中國政治結構理論。直到今日，竟然還得到一些「中國」政治運動人士，以「民主」為名給予支持。

但日本政府的這些和平轉變，造成日本強硬派軍方的不滿，因此刺激軍中所謂少壯派軍方勢力的發展，這些充滿日本戰國時代武士意識的軍人，一心的希望能夠繼續明治大帝的功業，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他們輕視民主與自由的普遍原則，恐懼共產主義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國的利益。這些懷有野心與決斷的軍方少壯派軍官，開始盛行秘密結社，這種進行秘密結社的少壯派軍官，竟然成為日本政局不穩與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輕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夠的政治歷練與才幹，來處理日本內外巨大變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勢發生逆轉，經濟大恐慌的爆發，造成全球各國對於民主政治體系，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樣無法拿出有效的政策處理這些問題，造成日本的經濟與社會陷入了失控的危機之中，而共產主義在亞洲地區的快速發展，也讓日本封建意識極強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財團與軍方少壯派，感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

2.6 少壯派軍官把持日本決策核心

因此這些保守派的人士與軍方的將校，開始提倡日本對內應該推動強硬的軍國主義政策，壓制共產主義的顛覆，對外推動疆域的拓展與資源市場的掠奪，日本才能走出發展的危機。而日本軍方的少壯派軍官，就成為這種理念的實際推動者，軍方出現了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對立，少壯派軍官又成立各種的秘密團體，其中又以「櫻會」與「一夕會」最為著名。

參與秘密結社的少壯派軍官，事實上，主導著日本軍部的決策。因為日本的社會運作體制中，領導者很少會主動的展現自己的決心與企圖，以免捲進直接的決策選擇、衝突之中，日本社會集體心理最怕的，就是內部意見的分裂，所以日本社會中，有著極強的從眾行為壓力。因此它的領導者多半是以暗示與誘導的方式，被動的等待部屬達成一致的共識之後，然後接納這種共識成為正式的決策。（當時日皇與政府和軍部的關係如此，現在日本的企業運作也是如此。）

所以當時日本的軍部，表面上好像是由高級將領在指揮，實際上他們經常聽任部屬參謀自行獨立運作，而會接受參謀所達成的一致意見，雖然這種意見不一定符合事實或是他們的想法，但這些高級將領不願也不會公開的反

對屬下所達成的一致意見，以免破壞和諧的共識。

更糟的是，日本軍方系統的結構，是典型的外重內輕，通常在內閣中的陸軍省長官，只要有師團長的資歷就可以出任，海軍省首長的地位也與艦隊司令平行，就算是參謀本部的總參謀長地位高些，也不過是相當於戰區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軍直接隸屬日皇，軍部也只是日皇的軍事參謀，不能直接對軍隊發號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統兵的將校，並不會把中央軍部的意見，真正的放在眼裡。

而中央軍部唯一能夠節制統兵將校的法寶是，請求日皇發出敕令，這種敕令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正式經由帷幄上奏之後決定的日皇命令，一種是經由日皇授權參謀本部，在一定的指導原則內，以日皇名義代行的「臨參命」。無論是那種形式，都是以日皇名義發出，在形式上，對於日軍的行動，有著最高的控制權威。

但是因為日皇對於日軍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樣的極其崇高，軍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絕對不敢也不願在日皇面前，展現不同立場的爭執，而讓日皇陷入裁決的苦惱之中。因此中央軍部對於在外統兵的將校，多半是用「交情」來牽制其行動，所以在軍令運作的過程中，經常是由次官、參謀與部隊中的長官進行意見溝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識之後，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請旨行動，而軍部的參謀與部隊的長官，當然都是同屬希望能夠以戰爭來建功立業的少壯派軍人，因此他們的意見，事實上就決定了軍部的意見。

而日皇對於軍部一致的意見，通常很少會提出質疑，更別說是反對了。這就出現日本的少壯派軍官，可以實際把持軍部決策的現象，這些在軍部與參謀本部的少壯派軍官們，自己組成的小團體運作，戲稱「秘密參謀本部」，他們與海外駐軍以及右翼激進的團體，都有直接連繫的管道，而右翼團體的看法，又主導著日本的輿論媒體，造成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對內可以普遍的以下剋上，對外隨時都有支持他們各種做為的「民意基礎」。因此在當時，真正領導日本國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選擇的國會，不是神聖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級將領，而是日軍的少壯派軍官。當然這不能說日皇、元老、將領在日本的戰爭罪行上，沒有責任，因為他們至少是「誘導」、「認可」、「知情」與「夥同」等的共犯，他們對於所有的戰爭罪行，至少是犯了「應注意而未注意」，「應阻止而未阻止」的責任。

雖然日皇、軍部與政府發現少壯派軍官秘密結社的危機，曾經在一九三〇年正式頒佈法律與軍令，不准日本軍人參加秘密結社組織，但是這個法令對於少壯派軍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們照樣半公開的進行各種秘密結社，公然的在政治與民間團體中，發表他們的立場與主張，甚至公然的批判與反對政府的政策。少壯派軍官的言行，往往誘導著日本民意產生強烈的反應與支持，造成少壯派軍官認為，自己代表著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軍少壯派軍官，不在乎做出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只要能夠獲得「民氣」支持，他們並不把法律與制度放在眼裡，而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最後大不了切腹自殺⁵。

事實上，軍部與政府也拿這些少壯派軍官毫無辦法，因為他們的果斷言行，會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們互相照應、敷衍應付上級的命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殺以示警抗議，就是乾脆對他們所不滿意的政府首長與上級軍官，進行刺殺行動，甚至發動真正的軍事政變。這種製造成民氣可用假象的民粹主義，逾越一切法律制度與制衡力量的體制，表面上，一切的決策都有所謂的「民意基礎」，但是，實際上不過是獨裁集團操縱民意的手法，在當時的日本，有誰敢向這種鐵血的民粹主義挑戰？但是這正是造成日本最後亡國的主要原因。因為當時日本的大政方針，竟然任由這些沒有能力考慮國家全盤利益與責任的少壯派軍官們，強迫政府事後追認與接納他們褊狹的看法與血氣衝動的決定，終於誤導國家步入滅亡的絕境，當然也給其他國家，帶來無法承受的戰爭浩劫。

總之，在當時的日本政局，可以說是政府控制不了軍部，軍部控制不了駐軍部隊，駐軍部隊控制不了少壯派軍官，日本的少壯派軍官，已經逐漸的成為國家步向軍國主義命運發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個群體性極強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參加組織，很容易現出完全盲目服從的本能，而缺乏個人獨排眾議的能力與膽識。日本的社會意識是最怕破壞和諧，因而許多怪異行為都是在群體的壓力下，出現的過度反射動作。

因此，日本有著過多的群體服從壓力，以及強烈的模仿能力，卻是極其嚴重的缺乏領導與創新領袖，當時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維新時代軍國主義的發展格局，在國家發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夠模仿明治維

⁵這就是「諸法皆空，自由自在」所代表的日軍少壯派觀念，對於知識與事實的真相，缺乏整體的宏觀想法，但是卻有著強烈的唯意志主義信念，在褊狹的信念支配下，想要達成什麼，就會不擇手段的做到，而他們最為痛恨的就是法律制度的約束。

新時代的整軍經武，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以解決或是轉移日本的問題。所以少壯派的軍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動做出決定的小團體，他們缺乏深謀遠慮卻是敢違法亂紀，一旦他們以行動開創出方向，而且獲得重大的勝利，就會在一夜之間，贏得日本社會上下一致盲目支持與跟從。

3

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

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之後，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於東京召開會議，決定日本政府今後如何推動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綱領」，歷史稱之為「東方會議」，這個會議總結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所有策略得失，並且進一步擬訂了日本今後應該如何侵略中國的步驟。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秘摺上奏給日皇的「田中奏摺」裡就開宗明義的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體政策步驟。

從歷史的事實分析，無論是漢、唐、明、清（尚未漢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時代，雖然中國處在國力非常強大的時代，她不但從來沒有想到要征服與統治日本，而且只會給這個島國帶來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歷史中，由於中國國力富強、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國的文化，分享中國的資源與利益，就可以受益無窮。

但是長久以來，日本卻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它若想追求亞洲的霸權，卻必須要先弱化與分裂中國不可。因為日本的資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圖稱霸東亞的戰略地位發展，都無法避免地受到中國地緣的威脅，因此「只有」中國的分裂與衰弱，日本才會有「出頭」的一天。日本之所以會舉國一致的推

動明治維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強權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時看到中國正處在衰弱的歷史困境之中，這絕對是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日本只要比中國搶先達成現代化，那麼它就有機會壓制落後的中國而稱霸東亞。

因此，日本整個明治維新的改換制度與整軍經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現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國強兵，日本一旦要準備稱霸東亞，侵略中國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時代，日本前後發動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在這兩次的戰爭中，對象雖然不同，但目標卻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國。特別是能否控制中國東北的資源與戰略位置，已成為日本帝國維持霸權發展成敗的關鍵所在。

3.1 日本在東亞擴張與美、俄的衝突

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雖然經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兩戰兩勝，使得日本躋身成為東方的一等強國，這對於在兩千多年歷史之中，從來沒有建立過國際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簡直是無法忘懷的勝利與榮耀。（不像中國，身為天朝大國的歷史太久，已經習慣認為自己是世界的領導與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現有的優勢地位，設法繼續的割裂中國與入主中原，這樣才能確保日本的霸權地位。

日本最為擔心的是，當然就是假如當時的中國一旦覺醒，團結起來，追求現代化，那麼日本的霸權地位，就有如櫻花盛開又凋謝般的，成為過眼雲煙而已，因此當它看到中國正在掙扎著追求統一與現代化之時，就產生著極強的時間壓迫感。是要與中國進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利益呢？還是要加速侵略中國，以支配宰割中國的市場資源？

當然，日本稱霸之後，舉國上下還有另外的一層恐懼，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各種策略，已經在國際上造成孤立與敵對的壓力——日本既在日俄戰爭上，與俄國結下歷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礙了美國開放中國門戶利益的立場。日本知道，以俄國那種凶狠的發展野心，是絕對不會放過它的，俄國要成為太平洋強權，取得不凍港，以及奪取中國東北與塞北的富源，都會與日本的侵華政策發生直接的衝突。因此當時日本的軍政領導階層幾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戰爭衝突只是遲早的問題，以及日本必須搶先在中國取得優勢戰略地位的先機，才能增加擊敗俄國的籌碼。而日本在中國的獨佔特權與在

太平洋迅速的發展，也開始危及到美國的利益，因而日、美間的摩擦也開始快速的增高。當時全球有遠略的政治與戰略專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與日、美的戰爭衝突，已經勢難避免¹；日本的參謀本部早已長程計劃未來與俄國進行決戰的準備，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就任之後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經召開內閣特別會議，討論美日可能爆發戰爭的各種狀況。

日本政府在面對這些危機的壓力之下，一直抱著必須「先發制人」的觀念，其政府領導人認為，日本（一個資源貧乏與戰略弱勢的國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國廣大的資源與支持，才能在未來與美俄的決戰中，取得不敗的地位。因為日本立國二千六百年，從來沒有被外國直接的擊敗或佔領過，因此更為恐懼萬一面臨戰敗命運的可能性。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搶先侵略中國與控制其廣大的資源，為繼續稱霸東亞的優先戰略選擇。

此時日本內部對於如何經略中國，分成兩個派系，其中一派認為，除非日本採取武力侵略中國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國的市場與資源，同時取得中國領土的優勢戰略縱深，未來在與美俄決戰中，勝算才高。另外一派則認為，中日兩國不妨以親善合作的方法，結合彼此的利益與資源，這樣日本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又可得到中國的支持，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看法與孫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亞細亞主義」有些接近。不過，日本當時陶醉於對外戰爭的連番勝利，認為侵略中國比友好中國，更能滿足日本渴望強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葉（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國內部的局勢逐漸出現了一種改變，那就是來自南方的國民政府，一方面聯俄容共，一方面整軍經武，開始展現統一中國、結束中國之分裂與衰弱的歷史企圖心。同時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也以日本的軍閥與財團政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假想敵；史達林全力推動的蘇聯工業化建設，特別是在在國防工業上的發展，已有飛躍的進步。日本參謀本部估計，蘇聯的現代化軍力，開始威脅到日本的安全。因此無論是中國之統一與復興，或是蘇聯的強大與擴張，都會影響到日本稱霸東亞的計劃，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採取反制中、蘇發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別擔心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會與蘇聯全面的合作，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脅。

¹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在一九三四年就著書提出這種警告。

3.2 田中義一與兩次東方會議

當時對於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最為狂熱的人物就是日本預備役將領田中義一 (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當時「出將入相」的軍政強人，他曾經大量收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的所有相關情報，以及深入地調查中國的資源分佈與市場發展潛力。當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後，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於東京召開會議，決定日本政府今後如何推動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綱領」，歷史稱之為「東方會議」，這個會議總結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所有策略得失，並且進一步擬訂了日本今後應該如何侵略中國的步驟。

這個日本決心完成侵略中國的歷史性東方會議，前後召開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請所有日本重要與相關的軍政、外交、情報與經貿人員，都參予這次會議，這個會議在動員所有的日本軍政經貿歷史與社會精英，經過完整與深入的討論之後，日本終於完成了具體侵略中國的策略與步驟，而正式建立了指導日本大陸政策的基本綱領。

不過日本政府於東方會議閉幕之後，對外發表了所謂「對華政策綱領」八條，只是約略的公佈東方會議的一部分內容，而東方會議更為重要的結論，則是表現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秘摺上奏給日皇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就是歷史上一個非常有爭議的「田中奏摺」之謎²。

這兩份一明一暗的歷史文件，成為了主導日本日後整個大陸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開的「對華政策綱領」中，其實日本政府已經非常露骨的提出，當中國的政局發展，若是出現「日本權益受到損害」、「日本僑民生命財產受到侵害」以及「動亂波及滿蒙」之時，日本政府將會對中國採取直接的反制行動，包括了直接干預中國的內政，以及在中國境內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摺之中，更是開宗明義的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體政策步驟，根據這個具體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導的「東亞帝國」，這個日本的大陸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擴張，終必可能與「米國」以及「赤俄」發生軍事衝突，因此日本征服滿蒙，

²日本政府是從頭到尾都一直設法否認這份秘摺的存在，也有許多歷史的學者質疑它的真實性。但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日本對中國的策略，以及最後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每一步，都是準確地照著這個奏摺的方略進行。當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實來否定愛國的台灣志士蔡智堪先生，抄錄這份奏摺的直接證據。

進而侵略中國，是日本東亞爭霸，必須克敵致勝的關鍵戰略所在。此外田中奏摺更是在如何征服滿蒙上，大做文章，從泡製滿蒙的主權並不屬中國的理論，一直到日本最後如何以實力介入來分離滿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導方向。

因此，依照東方會議的結論，日本未來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就是以侵略中國做為前提，而分離滿蒙，則是這個侵略中國政策成敗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著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國的大連（當時被日本強行租借，其實形同實際的佔領），進一步的召開大連會議（或稱第二次東方會議），把策略集中在如何製造滿蒙分離上。從東方會議到大連會議所得的結論，已經使得日本在基本國策上，確立了由滿蒙分離做為基礎的侵略中國政策，而無論是日本政府、軍部還是關東軍，都在設法等待時機以採取實際的行動，將這個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正式的加以實現。

雖然當時駐紮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日本關東軍，依照條約只有一個師團以及數個獨立守備隊，駐軍總數最多只有兩萬人左右，但它卻是日本的大陸政策中，以軍事行動分離滿蒙的先鋒軍。當時日本軍隊中的少壯派軍官，更是把前往關東軍服役，當成實踐帝國擴張，完成個人志業的最佳場所，因此在關東軍中服役的少壯派軍官，全都是日本軍官團中，最為狂熱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們毫不諱言他們的決心與企圖，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陸政策。

關東軍少壯派軍官，不但在中國的東北盡其所能的製造事端與惹事生非，同時更是不斷的與日本中央軍部的少壯派軍官，建立秘密結社的特殊管道，而且這些少壯派軍官，更是經常的與日本社會中的浪人，右翼的社會團體，有著非常直接與密切的關係。他們經常的出席各種相關的集會，發表煽動的策略演說，發行各種鼓吹日本必須佔領滿蒙的宣傳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會中多數的輿論，對於分離滿蒙、侵略中國，產生了一種近乎「天職」的錯誤意識：好像日本政府與軍部一天不能決定入侵滿蒙，就讓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機之中似的。當時日本的少壯派軍官，正是依照東方會議所設立的侵略滿蒙方針，競相開始設計與推動自己的分離滿蒙計劃。

3.3 板垣與石原的歷史密謀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壯派軍官中，以執行手段強硬著稱的中國通板

垣征四郎大佐，出任關東軍的高級參謀。同年十月，素有謀略家之稱的石原莞爾中佐，調任關東軍司令部的作戰參謀主任，這兩位同屬日本士官學校前後期畢業的少壯派軍官，本來就在同一個秘密組織中活動，現在又在關東軍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進一步合作無間的推動侵略滿蒙的政策，而他們的計劃與行動，最終決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國東北的悲劇歷史。

石原本人並非一個眼光短淺的黷武軍人，他策劃攻佔中國東北的密謀，不是因為他對於侵略中國有著特別的野心，他是從歷史與全球的角度，考慮日本當時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石原明瞭日本與蘇聯之間的危機與矛盾，正在朝向全面決戰的方向發展，他也進一步的了解到，日本會因為太平洋與東亞的戰略、經濟利益而與美國起衝突。因此石原決定策劃關東軍搶先攻佔中國東北，是爲了在日後，若是日本與美蘇兩國決戰之時，可以增加日本的戰略防禦縱深與作戰空間，和充實其作戰資源的必要先制行動。

所以石原就著手擬定「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文件，除了設計出類似閃電戰般的果斷作戰計劃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佔領中國東北的政治規劃，與進一步對蘇作戰，以及最後必然會與美國爆發衝突的作戰準備。石原計劃的基本構想是準備以關東軍的兩萬部隊，與中國東北奉系二十萬以上的部隊進行作戰，所以整個作戰需要果決、集中與快速的行動，才能順利的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動時，是絕對的需要以寡擊眾）。同時石原更清楚的規劃，一旦能夠順利的佔領中國東北後，日本應該如何治理所佔領的地方、如何開發東北的資源的務實方案。石原主張日本直接設立關東督護府，在中國東北「廢省設縣」，由日本實施直接的統治。雖然石原有如此全盤周密的計劃，但是他卻不支持日本與中國進行全面作戰的構想。因為石原策劃日軍突襲佔領中國的東北前提是，擴大日本與蘇聯決戰的戰略空間，與增加日本戰爭資源的腹地，因為只有日軍搶先攻佔中國東北，才能威脅到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的戰略安全，同時阻止中國取得在東北的國防重工業資源。

在石原開始擬定滿洲事變秘密計劃的同時，日本政府以及關東軍其他的將校，也在分別的進行奪取中國控制權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國民政府北伐軍節節勝利之際，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以護僑名義出兵山東，爆發極其凶殘的濟南慘案，雖然給予山東人民造成極大的損害，對於國民政府更是帶來極大的威望打擊，但是日本仍然無法阻止國民政府的繼續北伐。因此田中決定利用軍事支持與外交恫嚇的手段，說服將當時東北軍政負責人張作霖，在日

本人的掩護下退回東北，然後與日本人合作，搞一個完全親日的東北「獨立王國」，日本已經公開的警告國民政府的北伐軍，絕對不得進入東北地區，而影響到日本在南滿的權益。

3.4 刺殺張作霖 — 皇姑屯事件

同時，日本政府也已經取得張作霖的口頭同意，允許日本在東北全境有更多的築路權力，以做為日本繼續支持張作霖的交換條件（在當時的東北，任何一條鐵路只要有日本的資本，整個鐵路以及沿線的各種資源、市場都將被日本人優先控制，日本還可以派軍護路，移進僑民，因而形成日本的準殖民地，因此所謂日本的築路權，即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特許權）。但是當時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河本大作卻自做主張，決定刺殺張作霖，企圖造成東北陷入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然後乘機由關東軍發兵，直接的佔領中國的東北。

在河本指揮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膽大妄為的佈置下，設計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車站爆炸案，雖然成功的刺殺了張作霖，卻因東北軍政首長的巧妙應變，一方面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一方面內部又迅速與成功的推舉張學良，出任東北軍政的最高負責人。關東軍的軍力不足，計劃又不夠周延，沒有攻占中國東北的作戰相關安排，東北當局也沒有因為張作霖的遇刺，而爆發東北的內戰動亂，因此關東軍佔領東北的計劃告失敗。

而張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殺的，張學良當然與日本人有著「殺父」之仇，也就拒絕承認張作霖與日本的口頭密約 — 允許日本在東北進一步築路與發展的權利。雖然在日本強大的壓力之下，張學良卻斷然決定，與國民政府合作，使得東北易幟，接受國民政府的號令，張學良在此非常清楚的表明，東北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關東軍的魯莽暗殺張作霖的行動，破壞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國東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導至日本政府、中央軍部與關東軍之間高度的緊張，田中義一原本堅持要嚴懲關東軍這種「叛變」與破壞國策的做法，連日皇裕仁都關切這場暗殺陰謀的調查，但是最後竟然是在軍部少壯派軍官的堅持下，請出陸軍位階極高的白川義則大將出面關說，田中只有讓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給予河本行政處分而已。這個事件給了關東軍一個教訓，就是任何的奪取東北計劃，一定要有充分與周密的準備，不能魯莽行事。但是也給關東軍

很大的鼓勵，那就是關東軍在事實上，已經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節制，而可以自行決定行動。

此時關東軍內部，在石原與板垣的合作之下，如何佔領滿蒙，已逐漸凝聚出共識。石原發現，併吞中國東北的計劃，需要拉攏與利用一批中國的政客漢奸做為內應，因此特別延攬當時的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滿洲事變」計劃，形成侵略中國東北的「鐵三角」，由花谷負責聯絡漢奸，培養內應以及製造事端。而石原與板垣更是經常來往關東軍與日本軍部之間，交結同志，並且發表公開的言論，以煽動日本的民情，當時日本的強硬派軍人與激進的民間團體，都把這兩人視為改變日本歷史命運發展的明日之星，他們的計劃主張，都受到這些團體熱烈的擁護與支持。

一九二九年，這些有志於佔領中國東北的日本少壯派軍官，決定收編各個分散的團體，組織一個體制更大的同志會，以設法推動「昭和維新」的歷史大業，這個日本少壯派軍官的秘密組織正式名稱為「一夕會」，組織成員包括日本士官學校十六期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十七期的東條英機、二十一期的石原莞爾。這個少壯派軍官結合的一夕會，在歷史上實際主導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的發展，而在當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陸軍省懲處主導暗殺張作霖的少壯派軍官河本大作之時，就是一夕會成員軟硬兼施的抵制，而讓陸軍省長官無計可施，最後河本只落得一個調職與不得晉升的「處分」而已，因此一夕會實際上已經控制軍部的決策，在內神通外鬼的情況下，關東軍更是這個組織的「計劃執行單位」。

3.5 流產的日本國內軍事政變行動

在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發動滿洲事變計劃的同時，在東京的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們，也沒有閒著，他們同樣在著手進行，如何在日本推動徹底的軍國主義，如何以武力完成對滿蒙的佔領。一九三〇年日本軍部在參謀本部作戰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導下，組成所謂「五課長會議」，包括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人事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制課長山脅正隆，歐美課長度久雄，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共商擬定「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這是日本中央軍部研擬的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

不過存在於日本軍部與關東軍少壯派之間的立場差異是，軍部的少壯派

主張先在日本國內發動軍事政變，以完成改造日本成爲完全軍國主義體制的運動，然後再以此爲基礎，推動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這樣才不至於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蘇等國的壓力而退縮，讓日本無法完成獨佔中國利益的歷史覆轍。所以軍部少壯派認爲，關東軍應該設法隱忍，等待國內的改造成功之後，才能在中國東北進行武力侵略——這就是日本少壯派軍官當時的「國內改造」派立場。

但是關東軍少壯派則是認爲，日本人民對於軍國主義支持的狂熱，仍嫌不足，同時軍部高級將領以及元老重臣們，也不敢輕易的認可或是支持少壯派所發動的軍事政變，最爲難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態度，因此不如由關東軍先在中國東北發動「發揚皇威」的軍事行動，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使高級將領與元老重臣們，在「民氣可用」的民粹主義壓力之下，會因對外用武的成功，而改變其審慎的立場，轉爲支持國內建立完整的軍國主義體制——這就是當時的「國外舉事」派立場。雖然雙方的行動方針順序不同，但是最終的目標則是一致的，對外侵略中國與對內建立軍國主義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國內的少壯派軍官決定，準備先以軍事政變方式，推動他們的改造日本的政變計劃。但是不出石原莞爾所料，日本高級將領在「師出無名」、民氣支持不足、以及擔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慮下，在最後一刻不肯支持政變的行動，因此造成三月政變的流產。當然也引起日皇與日本政府對於少壯派軍官膽大妄爲的企圖，發生了戒心，日本國內的少壯派軍官，不得不暫時的有所收斂。

日本國內的政變既然胎死腹中，當然就輪到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來推動他們的「滿洲事變」計劃了。不過東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認爲三月流產政變之後，日本國內政局對於少壯派軍官的強硬做法，仍然無法完全的認同；同時他們擔心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在軍力上以寡擊眾作戰，風險較高，萬一戰事進展得不順利，軍部沒有把握能夠在必要時，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關東軍的武裝侵略。因爲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當時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極其嚴重，根本沒有能力負擔沈重的戰費，以及應付國際強權的外交壓力。

所以日本軍部的長官，企圖設法說服關東軍少壯派，延後一年發動「滿洲事變」。而軍部特別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將原先駐防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軍

力骨幹，十六師團調回日本，改派第二師團（多門二郎）接替任務，並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國通」（曾任張作霖政治顧問）的本庄繁中將，出任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日本軍部希望這樣的調動，將會減低關東軍兵、將之間的默契，而可以壓制住關東軍少壯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動。

3.6 關東軍開始密謀行動

當時日本政府一直在設法透過外交與政治手段，來擴張它在中國東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幣原同時與南京國民政府以及張學良的東北軍政當局，進行談判，以取得日本人在東北興建五條鐵路的特權。但關東軍卻認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軍事行動攻佔中國東北，才能把中國東北建設成爲日本國防與發展的生命線。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鮮移民與中國農民在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發生水源衝突，關東軍利用機會強行介入，攻擊中國農民，造成「萬寶山事件」，日本軍方要求中國退讓，否則將會派兵維護其權益；幾乎在同時，又爆發關東軍間諜中村震太郎上尉，在東北境內違法進行軍事偵查工作，被東北駐屯軍逮捕並處決的「中村事件」。關東軍與日本軍部爲此感到萬分的震怒，日本軍方一再的揚言，假如中國東北當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給日本一個滿意的交待，日本將會採取強烈的報復行動。日本的輿論更是來勢洶洶的煽動民意，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強力的行動，懲罰中國的「暴虐行徑」。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關東軍司令官之後，在八月三日，日本陸軍省特別邀請關東軍、朝鮮軍（林銑十郎）與台灣軍（真崎甚三郎）司令官，舉行海外司令官會議，共商日本海外駐軍的任務，及彼此之間如何保持密切的聯繫。陸軍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調派日本第十九與二十師團，進駐朝鮮半島，以提高日軍在海外應變的軍力。而關東軍的高級參謀板垣更利用機會，與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大佐，進行了軍事支援的聯繫。這種安排，就使得滿州事變發生之時，朝鮮軍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動支援，關東軍就不必擔心自己兵力不足的問題了。

這時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在石原、板垣與花谷共謀下，已經正式決定，當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製柳條湖事件，正式發動日本奪取中國東北的「滿洲事變」，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軍部時，已經把準備發動事變的計

劃，秘密告知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而且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與軍部長官，仍然認為直接發動滿洲事變的軍事作戰，計劃過於魯莽，同時也擔心蘇聯以及國際強權的干預，當時日本的經濟，正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也經不起戰爭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強烈的不贊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進行特別的會商之後，擬定出「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八條，主要內容是要求關東軍暫時等待與加強準備，假如外交方式無法在一年內，做出令人「滿意」的結果，關東軍才能設法配合指令採取行動。為此，軍部特別召回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告知他必須以此大綱，來約束關東軍少壯派的行動。

3.7 日本政府企圖阻止關東軍行動

但是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仍然決定不顧日本政府與軍部長官的意見，而準備在中國東北斷然行動，日本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以及關東廳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報告急，指出關東軍可能不顧國內的指示，在九月底以軍事攻佔滿州的行動。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電告林久治郎，設法約束與監視關東軍與浪人的活動，同時決定請出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來調解。西園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學，在日本政壇的威望極高，同時日皇裕仁對他相當的尊敬。

日皇裕仁對於日軍少壯派軍官的飛揚跋扈，早已有著不滿與憂慮，因此西園寺的建議，以及他的叔父閑院宮親王戴仁的要求下，於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場演習時，召見陸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約束關東軍，南次郎又晉見西園寺，西園寺相當露骨的批評關東軍軍紀不彰的問題，讓南次郎感到非常惶恐。

而在內閣會議中，外相幣原也公開質詢陸軍省，是否對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知情；在九月十四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密電軍部，表示他無法掌控關東軍少壯派的行動，因此要求軍部派員前來協調有關滿洲問題的具體政策。在這些反應與壓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協商，決定派遣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設法約束關東軍，好暫緩發動滿洲事變計劃。

由於事機緊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東京出發，但是軍部的少壯派

軍官橋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辦公室中，立刻拍發三封密電，通知關東軍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將到達中國東北，執行阻止關東軍行動的任務。橋本並且催促板垣等人應該把握時機，在中國的東北，立刻採取先斬後奏的斷然行動。

板垣、石原與花谷接到橋本的密電之後，立刻連夜密商大計，經過幾度的猶豫與討論之後，最後還是決定提前發難，先把「生米煮成熟飯」，迫使軍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既成的事實。好在建川本來就是一夕會的同志，軍部方面更有少壯派的同志進行打點，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與責難。就算是發生了重大的問題，他們也準備扛下所有的責任，因為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是已經徹底的奉行「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則，只堅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軍紀、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裡。

因此，三人最後決定，滿洲事變的軍事行動提前在建川到達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發動。但是由於臨時更改時間，各方面配合還是有些困難，所以又決定延後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達瀋陽的當天晚上發難。誰也沒有想到，這個造成歷史巨變的九一八事件，最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巧合的是，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日軍殲滅中國北洋艦隊的後一日；也是東北軍領袖張學良發表「巧電」，決定率領東北軍部隊入關平息中原內戰的一周年。

4

不擴大方針下的擴大侵略

經過一番政潮與兵變的角力鬥爭之後，關東軍終於全面的獲勝，日本參謀本部與內閣則是慘敗。由於日本人民迷信權力即是正義，全力支持獲勝、但卻企圖陰謀叛變與嚴重抗命的關東軍。日本軍閥終於控制了中國的東北，但是日本軍閥也同樣的控制了自己的國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國的歷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無論是日本的政府與東京的軍部，都反覆的重申「不擴大方針」，並一再的表明，日本對於中國東北「沒有任何的領土野心」，只要中國答應與日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日本當自會撤兵。但是關東軍以及「地下」參謀本部的少壯派軍官，則是想盡辦法利用機會，不斷的擴大攻擊範圍、殺害中國的軍民、佔領中國的東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場以及軍部的命令當做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擴大方針」，為下階段繼續擴大侵略的時機做好準備。這種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擴大方針宣告，而逕行不斷擴大事變的做法，造成關東軍的系列侵略行動，終於拖垮了當時的日本內閣、改組了軍部，當然也同時強佔了中國的東北。

在表面上，對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軍部與關東軍之間，是曾出現「不擴大」與「不斷擴大」的立場嚴重對立，而在軍方本身，也有陸軍省與參謀本部之間立場與做法的衝突與競爭：在事變剛開始時，陸

軍省比較接近內閣的意見，希望能夠約束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而參謀本部則是傾向讓關東軍有些表現之後，再看情形定奪。而在事變後期，關東軍開始進攻北滿之後，陸軍省則比較支持關東軍的擴大戰果立場，但是參謀本部則開始有意施展統帥權來控制關東軍。本來關東軍就已經表現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強悍態度，在發現政府與軍部、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立場與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狀況下，關東軍的脫軌與抗命，更是可以預期的了。因此實質上，日本侵略中國的總方針不變，大陸政策的最終目標，在於宰制中國，這是日本政府、軍部共同的立場，紛歧的只是時間與方式而已¹。

4.1 表裡矛盾的日本政府與軍部

事實上，當時日本已經陷入發展的困境：在軍國主義的威權體制之下，民主政治無法生根落實；財團壟斷的資本主義，又不能解決全球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共產主義的發展又成爲日皇封建威權制度的最大威脅。日本當時沒有眼光遠大與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沒有真正能夠威震群雄的軍人領袖，在此關頭，一群敢於獨斷專行、違法抗命、胡作非爲的少壯派軍官，就成爲了決定日本國家方向的領航者。而這些日本的少壯派軍官，除了知道對內建立軍國主義政府、對外進行侵略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能耐來解決一個國家所遭到的各種問題與挑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國東北駐防的日本關東軍，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開始依照演練的計劃，分頭在中國的東北進行血腥的攻擊行動之際，位在東京的軍部，亦陷入既興奮、又迷惘的狀況。因爲根據東京軍部的計劃，侵略中國東北的時間表，是設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軍部尚未準備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內閣又可能會有反對意見的狀況下，一旦關東軍的行動遭到堅強抵抗或是受到重大傷亡，那麼是能否派兵支援，以及龐大的軍費是否能夠得到國會的批准，都是極大的問題（這就是軍部決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與疏導的原因之一）。何況軍部最爲擔心的還是日皇裕仁的態度，因爲關東軍的這次行動，不但可以說是「違法」的，同時

¹日本政府部門比較傾向以武力威攝的外交折衝來取得中國東北的市場與資源；東京的中央軍部，則是希望以比較穩健的軍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蠶食中國的東北；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則是希望採取閃電戰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國內戰分裂，以及國際社會白顧不暇的時機，一舉攻占中國的東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來，關東軍的責任還真不小。上次爲了關東軍刺殺張作霖的問題，軍部就已經受到日皇的責難，這次更不知將如何收場。

不過，日本軍部高級將領的顧慮並沒有發生實際的影響力，因爲東京軍部的決策運作，實際上是由少壯派的軍官把持，他們與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根本就同屬於一個秘密組織的，他們當然會全力爲關東軍的做法護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時，軍部先召開參謀本部與陸軍省的聯席會議，在少壯派軍官的把持下，軍部一面倒的決議支持關東軍「膺懲暴支」的行動，並且要求陸相南次郎在內閣會議上，提出積極援助關東軍的提案。

而日本內閣方面，當然更是爲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感到震驚，雖然軍部企圖封鎖事變真相，但是內閣仍然從駐奉天總領事館林久治郎，以及南滿鐵路株事會社的相關人員那裡，得到事件真相的報告。因爲這些單位先前就曾事先秘報日本政府，關於關東軍即將「胡作非爲」的情報。

反倒是日本的關東軍是早有預謀，連佔領東北的「保境安民」佈告，都已事先準備妥當了，日本人出任東北的地方行政首長，也公開派任，日軍整個佔領東北全境的攻擊作戰，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計劃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絕日本領事館的調停。

十九日上午十時，日本內閣爲九一八事變，召開內閣特別會議，雖然陸相南次郎企圖爲關東軍的「兵變」與「侵略」關說，但是在內閣拿出來自東北現場的報告之後，鐵路交通沒有中斷，中國部隊沒有出現，日本軍人與僑民沒有傷亡，只是有一聲爆炸聲音而已，而關東軍的行動，是從南到北的全面攻擊，根本遠遠的超出護路與護僑的自衛說法²。

面對這些證據，陸相南次郎實在無法爲關東軍的行動辯護，不過既然關東軍已經出兵「自衛」作戰，日本政府總不能打擊關東軍的士氣，因此內閣通過了不擴大方針的政府立場，表示日本「絕對沒有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³，同時責成軍部約束關東軍進一步的行動，只限在自衛與護路的範圍之中，並且希望能夠循外交方式，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善後問題。

²由於關東軍的所謂「柳條湖事件」，造假得過分離譜，中國軍隊連營門都沒有出，手上更是沒有武器，連鐵路也沒有真的被炸毀，如何能夠歸罪於中國？同時中國方面又宣佈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內閣會議中的事實總結是，九一八根本沒有「暴虐支那」破壞鐵路，攻擊日軍的這回事。同時日本政府也擔心這個軍事行動，會破壞外交部與中國交涉的擴大在東北利益的談判，以及引起國際強權的出面干涉。

³這與今天日本國定歷史教科書把對華侵略改之爲「進出」中國相對照，可以說是異曲同工、「妙不可言」。

雖然日本政府通過了不擴大的政策方針，同時要求軍部約束關東軍的行動，但是日本內閣仍然在軍部的壓力下，認定在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是基於自衛與護路而做的「正當」反應，只是要求關東軍儘量不要擴大戰爭，以免問題成爲國際性事件而遭受干預。但是軍部內部的少壯派軍官，根本就不把內閣的決議放在眼裡，他們儘量在設法拖延發出內閣訓令的時間，修改內閣決議的用語，同時「地下」參謀本部的橋本中佐，更搶先直接拍發急電給關東軍的板垣征四郎，叫他們放膽行動，不擴大方針只是應付內閣的官樣文章而已，他們會設法在軍部替他們護航。更爲重要的是，內閣的決定，無法影響參謀本部下令約束關東軍的行動。參謀本部認爲這是關東軍自衛與護路的正當反應，無需報告日皇，來下達正式有約束力的敕令。

4.2 少壯派軍人企圖發動政變

而在瀋陽現場的軍部特使建川少將，根本就是與板垣、石原同屬一夕會的兄弟，對於日本侵佔滿蒙早就就是有志一同的。因此建川不但沒有就地對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執行壓制的使命，反而鼓勵關東軍大舉的完成滿洲事變計劃，建川主張關東軍應立刻擴大攻擊吉林與黑龍江，他願爲關東軍的行動，向東京軍部提出辯護。有了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現場支持，這樣關東軍當然更爲有恃無恐的擴大侵略行動，在東北各地攻城掠地了。建川又在十九日與二十日，在瀋陽日領事館中，舉行會商，不但爭取到總領事林久治郎支持軍事行動，而且與板垣、石原和土肥原達成歷史性的規劃，以推動滿洲國獨立的方式，來操控中國的東北。

由於軍部的訓令一直拖延沒有發出，倒是關東軍司令部開始連續傳來日軍告捷的捷報，十九日下午六時，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向東京軍部報告，關東軍已經完成攻佔南滿的奉天、長春、營口、安東等所有主要大城，而同時幾乎沒有遭遇到抵抗，本庄繁認爲這是不可錯失的歷史時機，因此他要求軍部立刻加派三個師團支援關東軍，以迅速完成佔領東北全境的計劃，所有的軍費，關東軍可以就地劫掠，加以供應。

東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對於這個報告，當然是歡聲雷動，這才把內閣的不擴大決議，通知關東軍，而關東軍正陶醉在「完勝」的激情之中，又有建川特使以及東京軍部自己人的支持，哪裡會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裡，本庄立

刻回電軍部，重申關東軍絕對不能放棄這個攻佔滿洲的大好機會，並且十萬火急的要求東京軍部，立刻派兵支援關東軍攻佔中國的東北⁴。

這時東京的軍部，可以說是陷在決策的困難之中，軍部的少壯派軍官是一面倒的支持派兵，以完全佔領中國的東北，但是內閣卻又提出不擴大的政策，要求軍部約束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更令軍部感到難以交待的是，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根本沒有奉日皇的敕令。因此夾在兩難之間的軍部，只有以「關東軍正在進行護路保僑的自衛交戰」而無法立刻遵照政策撤回，來應付內閣。陸相南次郎幾乎每天拿著中國東北的地圖，劃出關東軍的行動禁制線，以回答若槻首相的詢問。當參謀本部知道朝鮮軍竟然越界派兵支援關東軍之後，更是急電表示強烈的反對，但是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決定，不顧軍部的警告，繼續派兵越界協助關東軍作戰，這樣當然使得關東軍的士氣大振，更為放膽的擴大侵略了。

關東軍在十九日攻佔遼寧之後，二十日立刻向吉林省進兵，由於當時的吉林代理省主席熙洽，是滿清朝廷的後裔，滿腦子復辟思想，早就和關東軍搭上關係，因此立刻宣佈組織獨立政府，向日本全面靠攏，所以吉林省根本沒有正式的抵抗，就被關東軍順利的佔領。當時哈爾濱的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也是一個典型無恥的投機政客，在九月十八日夜間關東軍攻城的時刻，他正在在瀋陽與日本關東軍代表談判如何「起義來歸」的條件，以配合關東軍接收哈爾濱的行動。因此在整個東北的三省一特區中，就剩下黑龍江省是需要關東軍真正加以解決了。

這時候，日本政府與軍部都發現關東軍，一再的擴大軍事行動，已經不是單純的「侵略」中國東北而已，關東軍事實上已經不聽日本的軍令，而正式的「叛變」了，因此迫使軍部將領只有一再的嚴令關東軍，遵守命令，並且加派特使橋本虎之助大佐前往東北，希望能夠控制住軍事行動不要再擴大。但是軍部的少壯派軍官，私底下卻不斷支持關東軍的行動，最後終於導至關東軍少壯派軍官決定，利用他們在中國東北大勝的威勢，聯合日本國內的少壯派同志，推動十月政變，建立軍人政府，以免日本政府與軍部老在扯後腿。

這個政變計劃，由板垣征四郎通知參謀本部俄國課長橋本欣五郎中佐，

⁴在日式的觀念中，對與錯並不重要，贏或是輸才是真理，所以有無正當理由侵略中國，根本不是重點，而是能否順利的佔領中國的東北，才是重點。

與櫻會的少壯派軍官共同策劃，準備在十月二十四日，由少壯派軍官率兵發動奇襲，控制參謀本部，然後出動軍隊佔領警視廳，包圍首相官邸，屠殺內閣官員，拘捕陸軍省內不肯合作的高級將領，然後推出東鄉隆盛元帥出面奏告日皇，組成軍事內閣，由陸軍大將荒木貞夫出任首相，甚至準備假如裕仁不肯接受這個政變要求，將逼裕仁退位，由其弟秩父宮親王接任。

但是這個行動，因為波及到日皇裕仁的地位，因此受到日本憲兵司令部的反對，荒木貞夫大將也不敢予以支持，所以軍部在十月十七日調動支持日皇的部隊出動，搶先化解了政變的企圖，但是當時的政府與軍部，卻擔心假如大舉的追究政變責任，會使日本關東軍真正的「叛變」，也會造成滿洲事變會以失敗收場，因此日政府仍然對少壯派軍官做了讓步，就是只對準備帶頭政變的橋本中佐進行隔離審訊，其他參加政變的軍官僅給予行政處分，並且由日皇派專使到關東軍司令部，表達日皇對關東軍的關懷，才消弭了關東軍與東京之間可能決裂的「戰爭」。

4.3 「臨參命」約束不了關東軍

日本政府此時簡直不知道應該如何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了，當時日本不願關東軍擴大軍事行動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蘇聯，害怕與其在東北霸佔的利益發生衝突。因為當時蘇聯控制著所謂「北滿」的中東鐵路沿線，假如關東軍北上進佔黑龍江省，蘇聯是否會進行自衛反擊？雖然蘇聯在十月中旬，對日軍攻佔東北的軍事行動，表達了中立的態度，但是日本的參謀本部仍認為，對於蘇方真正的軍事意圖不能不加以防範⁵。所以日參謀本部決定強制約束關東軍，不得進入北滿生事，參謀本部決定祭出最後的軍令王牌，由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帷幄上奏日皇裕仁，頒發指揮與約束關東軍的「臨參命」給參謀本部，這是參謀本部決定以「臨參命」的最後手段，來控制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這個消息迫使關東軍暫時改變進攻北滿策略，決定招安一批東北邊防軍裡的失意軍閥與部隊，在黑龍江充當爪牙，關東軍則在幕後提供支援，以減少與東京軍部直接的對抗。

這時在北平的張學良，眼看自己在東北的根據地，在不抵抗政策下，在

⁵誰知道老謀深算的史達林準備將計就計、借力使力，讓日本暫時在東北完全得逞，結下中日爆發大戰的歷史引信。中、日之戰，必將是兩敗俱傷，蘇聯就可以一石二鳥，一方面來對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國。

幾天之內，就丟掉了遼寧、吉林二省，剩下的黑龍江省，也在投降日本的偽軍的進攻下，顯得岌岌可危。因此張學良在十月八日，決定任命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主席，統帥部隊進行反擊。結果在十月十五日的江橋一戰中，馬占山部大敗偽軍的進攻。關東軍擔心東北百姓的抗日義勇軍，很可能會因為江橋起義的勝利槍聲，而跟著風起雲湧的發展，因此斷然的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設法全力殲滅馬占山的抗日力量，否則會後患無窮。

關東軍既然決定自己親自出兵，那麼也就是公然的挑戰參謀本部的要求，當關東軍開始集結進攻黑龍江的東北軍陣地時，此舉當然驚動了東京，於是日參謀本部從十一月五日起，正式發出「臨參命」，企圖制止關東軍進攻的軍事行動。但是臨參命卻沒有達到軍令如山的斷然效果，關東軍在朝鮮軍加派兩個混成旅團的支持下，發動了江橋作戰。馬占山部再次奮勇迎戰，同樣給予關東軍出乎意料之外的嚴重傷亡打擊，但最後日軍再度發動陸空聯合攻勢，東北軍在後援與兵力不足下後撤。當然關東軍更大的勝利是，打敗了日本參謀本部，被日軍視為最高命令的臨參命，已無軍令上絕對的權威了。

關東軍之所以敢對臨參命有所違背，除了抗命成習的跋扈傳統之外，當然也是受到陸軍省的支持。這時候的陸相南次郎，已經看出若槻內閣陷在搖搖欲墜的邊緣，他自己也被陸軍省內部少壯派軍官所包圍，因此南次郎在內閣中，竟然提案，要求內閣增兵支援關東軍進攻黑龍江。這等於宣佈陸軍省與政府政策不合，陸相隨時可以辭職而導致內閣總辭。

同時，這也出現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政策衝突問題，既然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意見不合，關東軍就有看風向、鑽漏洞的機會了。而參謀本部對於關東軍的抗命，真的有些按耐不住了，於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參謀次官二宮前往關東軍司令部，監督關東軍執行軍令，但是二宮在關東軍司令部，居然並未嚴格的執行參謀本部的命令，反而一再為關東軍的立場向本部提出申辯。這真是日本軍事歷史的奇觀：九一八事變，一方面是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的事變，另外一方面則是關東軍與日軍參謀本部之間的權力戰爭⁶。

不過，至少在表面上，關東軍的違抗參謀本部的臨參命，還是要有所限度的，因此在參謀本部連發九道臨參命，嚴厲限制日軍在黑龍江省的軍事活動

⁶這再一次的證明，日本人只有贏與輸、沒有對與錯的觀念，關東軍既然獲得連勝，成功佔領了中國的東北，那麼關東軍就沒有抗命與違法問題存在，反而是約束關東軍侵略的參謀本部，成為了需要整肅與改組的機構。

下，關東軍只好在擊敗馬占山部後，暫時有所收斂。既然軍部暫時不准關東軍在北滿攻掠，剛好土肥原賢二又在關內的天津，製造事端，因此關東軍回師向南，進攻遼西的錦州，以徹底瓦解張學良在東北的軍政影響力。但是參謀本部立刻下達四道臨參命，強力約束關東軍，不得逕自採取襲取錦州的攻勢，但參謀本部沒有想到，這已是自己將要被關東軍擊敗的前兆了。

4.4 日本帝國覆滅之路的開端

在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本政府充滿困惑，百姓則是人心惶惶，東京金融市場一團混亂，大家都不知道關東軍這樣抗命蠻幹，會把日本推到何種危機的深淵之中？但是基本上，日本是一個崇拜實力與英雄的民族，日本人關心贏、輸的結果，遠遠的超過對錯的選擇，因此，當關東軍接二連三的捷訊傳到日本之後，日本人民開始熱烈崇拜神威無敵、又能開疆闢土的關東軍，連日皇裕仁都被這種突然的重大勝利沖昏了頭，裕仁實在非常驚訝中國軍隊的「不抵抗」，認為中國軍隊簡直是「有如滿清的太監」，至於關東軍陰謀叛變與違抗軍令的「小問題」，日皇都忘光了。

於是，一種繼承明治大帝開疆擴土的勝利情緒，影響到日本上下的意見，日本民意開始轉為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包括日皇在內的日本高級將領，開始認同關東軍「揚皇威於海外，開疆域於萬里」的壯舉。關東軍是勝利者，因此就是贏家。參謀本部的日皇軍令，最後竟然鬥爭不過關東軍的自做主張！若槻內閣與金谷範三大將既然站在「抑制」民族英雄的立場，那麼只有面臨改組下台的命運了。

這時候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熱情，已經大大的受到刺激而陷入狂熱之中，這些受到操縱的民意輿情都認為，關東軍「揚皇威於海外」，替帝國爭取「生存發展的空間」，政府實在不應再扯關東軍的後腿。若槻內閣在對內無法控制軍部與關東軍的行動，對外無法應付國際社會的壓力，終於在十二月一日提出總辭。十三日犬養毅內閣成立，皇道派的荒木貞夫大將出任陸相，真崎甚三郎出任參謀本部次官（隨後參謀總長金谷範三也下台，由閑院宮親王戴仁接任），而新的內閣正式同意，將第四與第八師團調往滿洲支援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並且追認第二十師團從朝鮮移防滿洲的事實，內閣通過陸相荒木貞夫的提議，正式劃中國東北地區為日本「綏靖區域」。

經過一番政潮與兵變的角力鬥爭之後，關東軍終於全面的獲勝，日本參謀本部與內閣則是慘敗。由於日本人民迷信權力即是正義，全力支持獲勝、但卻企圖陰謀政變與嚴重抗命的關東軍。不過當時力主關東軍應該撤兵的外相幣原重喜郎，曾經說過一句歷史的預言：「關東軍的進佔滿洲，將給日本吃下一顆炸彈」。但是當時陷入勝利狂熱的日本君、民，一致認為關東軍是為日本吃到了天鵝肉。後來的日本外相重光葵指出，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逐步成為軍人專政的國家，日本軍閥終於控制了中國的東北，但是日本軍閥也同樣的控制了自己的國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國的歷史之路。

5

不抵抗主義下的浴血抵抗

國民政府對日軍挑釁採取盡量容忍與暫時不抵抗政策的立場，甚至可以遠溯自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告誡，以及蔣介石自己親自的觀察。當時日本已經躋身為世界級的工業與軍事強國，不但擁有全球最為精銳的陸、海軍，並且國家與社會都已現代化，隨時可以完成總體戰的動員。而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幾十年不息的內、外戰之中，加上國家意識極為薄弱、工業沒有基礎、政府財政運作困難、社會仍是處於封建時代的農業結構；軍隊不但裝備落後、訓練不當，更沒有保衛國家的認識與能力。因此蔣介石認為，假如當時處在分崩離析狀態的中國，要想和日本正式的進行作戰，其結果要比甲午戰爭還要悲慘——恐怕不但要割地賠款，甚至還會亡國滅種。所以他認為首先中國必須設法統一，然後才能集全國之力，推動現代化的建設與發展，如此才能擁有與日本一戰的實力。

在九一八事變之中，日本的關東軍竟然能夠在百日之內，就以有限的傷亡，大體的完成東北三省的占領——當時的東三省面積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關東軍這種軍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說是閃電戰的經典之作。看起來，「皇軍無敵」不是神話而是事實，但是若是分析

當時的戰局，就可以知道，中國在東北的守軍，原來就是實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義」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鎖在倉庫中，就是不戰而退，當然更有邊防軍響應日軍的招降，自動的把武器、倉庫獻出而成爲漢奸的。因此關東軍的百日大勝，只是在中國軍隊「禮讓」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說是「勝之不武」。

5.1 不抵抗主義的原委

爲什麼當時中國的東北邊防軍，會無視於東北的領土與主權的受到日軍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資敵方式，採取「不抵抗主義」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兩個，其一是不能戰：當時中、日兩國的軍力與國力，相距實在太懸殊¹，因爲當時的中國，在四分五裂的狀況下，根本連國家的認同共識都沒有，更別提有現代化的政治、財政、工業與軍事組織系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若是直接與正面的對日本作戰，結局不是簽下正式割地賠款的屈辱和約，就是真的亡國一途。

其二是避免衝突引爆戰術，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首長，在面對日軍可能侵佔東北的挑戰之時，對於日本關東軍的企圖，以及日政府控制軍方行動的能力，都出現嚴重估計的錯誤。當時國民政府與東北邊防軍，都以爲關東軍所炮製的滿洲事變，只不過是關東軍違抗政府政策的軍事挑釁而已，當時的日本政府並沒有佔領中國東北的真正意圖，日本更要擔心蘇聯的立場與反應，所以國民政府認爲，關東軍是不可能在沒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與面臨蘇聯的反對之下，真正公然的佔據中國東北的。

因此，中央與東北軍的領袖錯誤的認爲，只要中國採取「不抵抗主義」，可以讓關東軍失去了繼續出兵的藉口，同時也可以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干預與支持，如此一來，好讓日本政府有機會來約束關東軍的行爲。這樣國民政府認爲，中國最多在東北再多讓一些鐵路的修建權益給日本，就可以平息這場事變，因爲中國仍需要時間完成統一與凝聚國家共識，更需要時間來

¹光是從馬關條約（甲午戰爭）與辛丑和約（八國聯軍）的賠款，日本就直接榨取中國十幾年以上國庫的歲入，加上強佔台、澎與遼東半島的領土、與各種日本在中國享有的經濟特權、最惠國待遇等等，中國若不能擺脫這些不義的枷鎖，如何有效地推動建設？反之，日本同時期的強大也並不全是它人民努力的結果（如果劫掠燒殺鄰邦不算是一種「努力」）。進而言之，有多少日本皇軍用來屠殺中國軍民的飛機、軍艦、槍砲、毒氣等武器，以及他們身上所穿之耀眼的制服，其實是用中國百姓的血汗錢所造的？

建設現代化的國家結構。

當然國民政府與東北軍政首長的這個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可是當時的日本已經是步入一個畸形體制的國家，政府管不了軍部，軍部約束不了部隊，日本舉國上下，更是唯力論者，中國的不抵抗，反而讓關東軍輕易獲勝，那麼全日本都會對勝利者，給予忘情的支持。而蘇聯對於侵略中國的歷史與謀略，更是超過日本，史達林正想利用這個機會，玩弄中、日矛盾，以擴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國民政府合理的對策，不幸成爲喪權辱國的政策。

5.2 衰弱與分裂的中國

中國當時內亂與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國主義，「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積弱問題，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大結構，面臨全面崩解前的危機，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約兩百年間（清代乾隆中葉以降，1700s – 1900s），中國歷史發展的迷失。中國雖然在清朝初期，曾經以傳統的農業結構，配合邊塞民族驍勇的精神，而締造一個強大而且繁榮的大帝國，威震東亞。但是，面對同一時期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後的突飛猛進，中國的整個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卻仍完全陷在農業社會與封建體系的傳統結構之中。當滿清政府遊牧民族的開創精神消退之後，中國無論在組織、精神與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對西洋工業化社會「船堅砲利」軍事優勢的挑戰，更無法凝聚全民的共識，發出改革與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組織的現代化社會，當然中國也缺乏開放的、科學化的知識體系，來啓蒙中國人的自然觀與世界觀。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獨步東亞的唯一強國，久而久之就把自己當成世界的中心與體系的終極，中國自己發展與營建了一個非常龐大與複雜的封閉結構，這個體系當然有其穩定的架構，但卻有排斥改革的慣性與難以凝聚共識的問題存在。天朝大國做慣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別的強烈，因此中國很難在一連串受創與高壓的屈辱下，全盤超越自己的傳統而接受西洋的工業文明。

這種自我封閉的大陸文化結構，當她面對歷史性的挑戰與困境之時，想要推動全盤的改革，會遭到極大的困難與阻力。當然中國幾次現代化的失敗，也與她當時的國運有關：清末的最高權力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

位精明猜忌、手腕強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與修養，也更沒有超越時代和環境的遠見與魄力；而當時廟堂的決策者，都是出身農業、封建社會研讀八股文的科舉生，見識也是同樣的落伍與封閉。因此中國面對西洋挑戰所回應的「自強運動」，在最高領導人沒有雄心與遠見，上層領導人沒有足夠的共識與決心，中下層社會更是缺乏認知與自覺的格局下，使得這個模倣西洋的運動，主要侷限在軍事相關的項目，而就算在軍事相關的領域之中，也作得根本不夠徹底。所以中國在面對與日本的甲午戰爭中，簡直是一敗塗地；接著中國再遭到八國聯軍的空前蹂躪，從此中國幾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與全面改革的能力。

雖然當時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結構，無法因應產業革命所帶來的全面歷史挑戰，是中國積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世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全面的欺凌與壓榨，也是讓中國的改革無法順利推動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那時的西方國家，全都是參與侵略中國的同路人，只不過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八國聯軍為止，短短的六十年內，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無論是割地賠款還是喪權辱國的各種條約，都已讓中國的藩籬盡失、民窮財盡、甚至連國家主權都為之不保。因此，許多中國的官員與人民，連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喪失，投靠帝國主義的強權而賣國求利者是大有有人在。

所以中國要想整軍經武、發展產業、投資教育，根本不但沒有本錢可以運用（幾乎被帝國主義國家給剝光了），而內在的分裂與共識的缺乏，就幾乎耗盡中國所有的復興資源，她長期徘徊在接二連三的歷史危機風暴之中。中國的積弱不振，就使她成為列強侵略與欺凌的「最佳對象」。主權不保、領土喪失、民生困苦、國家分裂、政治腐敗、軍事落伍，正是當時在亡國邊緣之中國的寫照。

5.3 中國面臨解體的危機

在這個歷史背景之下，以中國的整體的環境與狀況而言，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說是到達一個歷史危機的高點：當時的中國正陷在最為嚴重的分裂、內戰與嚴重的天然災難之中，她共有三個政府（南京、廣州、瑞金）、兩個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十幾個分

裂的軍政系統（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川軍（又分三個系統）粵軍、桂軍、湘軍、滇軍、黔軍、紅軍，以及實際接近獨立的邊陲地區——新疆與西藏），在這些的分裂勢力之間，不斷的爆發軍事衝突以及地盤爭奪，嚴重的耗損國力，也妨害了國家的建設與經營。

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表面上號稱中國的中央政府，實際上直接掌管的地區，只有長江中下游的幾個省而已，這個地方型的中央政府，還需要負擔從滿清、北洋軍閥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數字的外債與國債。同年一場空前的水患，幾乎把中國長江流域的精華地區，全都泡成水鄉澤國，上億的災民流離失所，國民政府爲了救災與財政負擔，正弄得焦頭爛額。這就是日本關東軍堅持選擇在一九三一年，做爲最佳發難時機的主要原因。

因此當時面對九一八事變的中國政府，其狀況甚至要比滿清時代甲午戰爭前夕的局面，還要危急。因爲當時的滿清政府，至少還是個統一的朝廷，但是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只是一個管理長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對中國內戰與分裂的挑戰，經常連政府自己是不是還能維持下去，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還能拿什麼力量跟當時世界第一等的軍事強權——日本——拼命？

5.4 東北軍入關支持統一

一九三〇年，中國內部又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內戰，歷史稱爲中原大戰，這場動員百萬軍隊的內戰，造成中國另外一次生靈塗炭的悲劇，國民政府國庫因爲軍費的超支，而幾乎出現周轉不靈的財政危機。幸而東北軍的張學良在消弭內戰的號召下，於當年的九月十八日發表「巧電」，要求政治改革與平息內戰，張學良更率東北軍大舉入關，因而促成與南京政府對抗之閻錫山、馮玉祥聯軍瓦解，提早結束了這場內戰，張學良則以三十歲的年紀，出任國民政府的三軍副總司令，同時坐鎮華北，遙控東北，負責整編晉軍與西北軍。

這時候東北軍的主力，既然已經大部離開東北入關，也就暴露出東北邊防更爲空虛的問題。當時東北軍，共有二十七個步兵旅²，五個騎兵旅，三

²其中十六個旅是直屬張學良掌控，其餘是招安的地方軍閥部隊，而東北軍的旅轄有三個團，軍力接近一般輕裝的師級部隊。

個砲兵旅，兵力總數號稱在二十五萬人左右，而隨張學良入關的全是東北軍的主力，有十二個直屬步兵旅，兩個騎兵旅，以及全部三個砲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戰平息不到一年的時間，一九三一年中國又再度發生戰爭與分裂，蔣介石企圖利用機會清剿在江西發展的中國共產黨紅軍，而此時廣州方面又爆發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場新的內戰，又在中國的南部展開。

因此，日本關東軍則利用這個分裂與內戰的時機，決定在華北放火，以牽制蔣介石，同時吸引更多的東北軍入關。因此日軍以專機，從大連運送晉軍領袖閻錫山回山西，再收買在河北的西北軍石友三部，以及策動主控山東的西北軍將領韓復榘，準備聯手攻擊張學良的東北軍。

不過，由於閻錫山回到山西之後，並沒有依日本的計劃再行出兵叛亂，韓復榘也採取觀望的態度，只有石友三興兵作亂，因此東北軍得以集中力量，迅速的解決了石友三部隊的叛變。那時張學良本人剛好患上嚴重的傷寒病住院治療，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屬于學忠負責帶兵平亂，先後又從東北調進五個旅的兵力入關支援，這樣原先已經兵力不足的東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為空虛了。留守的直屬部隊多數是在遼西佈防接應，而竟然只有一個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屬部隊來防守東北的軍政中心瀋陽。瀋陽近乎空城的佈署，就給予關東軍一個前所未有的用兵時機。

早在張學良帶兵入關，坐鎮北平之時，東北的時局，已開始日趨緊張。關東軍正在加強演練各種軍事攻擊的計劃，特別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與八月之間，又爆發萬寶山事件與中村事件，都顯示出日本關東軍極有可能會乘機鬧事，在東北留守的各級軍政長官，先後多次專程到達北平，向張學良面報關東軍的威脅與野心，因此張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請示對策。但當時的蔣介石與南京中央政府，對於張學良唯一與不變的答覆，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國民政府的困境

此時南京政府的財政因為大規模天災的破壞，與南方的軍事行動的經費，國家因應所需的支出幾乎是毫無著落，又因為蔣介石當時急於解決華南的內戰問題，在國民政府自顧尚且不暇的狀況下，自然極不願東北再發生任何事端。同時蔣、張二人也都認為，日本政府正在積極的與中國進行在東北

擴張發展的交涉，只要中國避免給關東軍找到軍事衝突的藉口，日本政府應該會約束關東軍，而沒有理由來放任關東軍公然併吞中國的東北。

我們必須了解當時中國的全盤狀況，才不至於誤以為不抵抗的政策，是蔣、張二人「親日」的選擇。這個對日軍挑釁不抵抗的權宜性政策，其中實在有著太多主、客觀不得已的環境與背景。假如蔣張二人要是親日，張學良隨時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擁立，早就成為所謂的「東北王」；蔣介石也可以放棄東北主權，而得到日本大量的軍經援助，以掃平群雄，成為中國的新領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對統一與建國的眾多挑戰。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國民政府內部多數主管的認同，不是蔣張二人私下可以說了就算數的，雖然這個政策是否是當時最佳的選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評與極大的壓力，甚至幾乎成為蔣張二人「不抗日」的歷史罪名。但是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清楚的證明，在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中，蔣介石雖非「反日派」，但是絕對非「親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蔣介石當成他們大陸政策最為主要的障礙，張學良與日本人更有國仇與家恨。而在七七事變之後，為抗日盡力最多的，正是蔣介石，而不是批評他們的人。

國民政府對日軍挑釁會採取盡量容忍與暫時不抵抗政策的立場，甚至可以遠溯自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告誡，以及蔣介石自己親自的觀察。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曾經與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觸與合作，他深知當時中日兩國的總體國力，相差太遠，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兩國斷交宣戰，十日之內中國就會亡國。」而蔣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對於中日之間的國力與戰力，更是有著清楚的了解，當時日本已經躋身為世界級的工業與軍事強國，不但擁有全球最為精銳的陸、海軍，國家與社會都已現代化，隨時可以完成總體戰的動員。

而當時的中國處在幾十年不息的內戰之中，國家意識極為薄弱，工業沒有基礎，政府財政運作困難，社會仍然處於封建時代的農業結構，軍隊不但裝備落後，訓練不當，更沒有保衛國家的認識與能力。因此蔣介石認為，假如當時處在分崩離析狀態的中國，要想和日本正式的進行作戰，其結果要比滿清末年的甲午戰爭還要悲慘，恐怕不但要割地賠款，甚至還會亡國滅種。所以蔣介石認為首先中國必須設法統一，然後才能集全國之力，推動現代化的建設與發展，如此才能擁有與日本一戰的國力與軍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時，日本藉口護僑，出兵山東，迨蔣介石下野，日始撤兵；次年，革命軍克濟南，日本再度出兵山東，在濟南慘殺中國軍民，造成濟南慘案（五三慘案），就是企圖造成中日戰爭的衝突，以阻撓國民政府的北伐統一中國，蔣介石明知日軍惡意的挑釁，但是仍然採取極低的姿態進行退讓，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發戰爭，而阻礙中國統一的大業，這就是中央軍在山東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蔣介石對於這個屈辱，不但在其日記中，有著誓必雪恥的決心，其後蔣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標，都在設法尋求如何的統一中國與復興中華民族，以使中國有力量來擊敗日本的侵略。之後日本在國際社會反對以及中國抵制日貨的壓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東的問題才暫時得到解決。這個結果也讓國民政府認為，國際社會可以對於日本在中國無理的軍事行動（若是妨害到其它國家在中國的利益），應該是可以產生某種程度的牽制作用。

5.6 東北的國防實力空虛

而當時在東北守土有責的東北邊防軍，其實只是奉系地方軍閥所改編的部隊，根本沒有現代化的作戰編組、訓練與作戰能力，同時又不接受國民政府直接的號令與支援，全是「土法煉鋼」、自求多福的獨立發展與運作，以軍事的標準而言，只是改編的民團而已。多年以來，對於日本與蘇聯在境內擁有現代化裝備與訓練的的駐軍部隊，一直是採取忍氣吞聲與息事寧人的做法。

一九二九年，張學良企圖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準備強行收回蘇聯在中東鐵路的各種特權、搜查哈爾濱蘇聯領事館，結果激怒了蘇聯，史達林立刻調動大軍反擊。張學良事前根本沒有想到會遭到紅軍部隊如此強大、迅速的反應，故沒有動員足夠的兵力。蘇聯紅軍以現代化的作戰威力，在極短時間之內，就圍殲了東北邊防軍在中東鐵路上的守軍。當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正在忙於對付內戰，而無力支援（其實就是要支援，恐怕也是一樣的慘敗），張學良只有忍辱簽下城下之盟，這就是「中東路事件」。這次的經驗，讓張學良覺得自己的維護國家的主權行動受到出賣，也讓張學良了解到，南京的國民政府根本自顧不暇，無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東北對抗強權，而東北軍的實力，真的還只是地方部隊而已，根本沒有力量與日蘇世界級的

軍事強權單獨作戰，因此張學良清楚的知道，假如東北軍與日蘇爆發任何的衝突，一切只有由東北軍自求多福。

在日本關東軍的威脅日盛之時，張學良卻將大軍主力調入華北，以協助南京國民政府平亂，東北留守的兵力實在不足，部屬又不斷的發出告急的請示，造成他極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趕回瀋陽，處理對日本的交涉。但是張學良在五月底因為傷寒住院，七月底病癒之後，又因為華北的局勢，出現日本策劃的反南京政府的兵變，造成張學良進一步增派五個旅的兵力入關平亂。雖然華北的兵變很快的就被平息，但是局勢仍然緊張，軍隊無法抽調回防東北。最後，張學良準備九月五日返回瀋陽，不過在行前，又得知關東軍可能會對他進行刺殺，因此打消回瀋陽處理危機的計劃，這時候，關東軍準備在東北發動軍事行動的準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個人誤事

在這種危機與低迷的局勢下，不但張學良滯留北平不歸，東北大部分的軍政首長，也都紛紛的離開職守，以規避應變事變爆發的決定責任，像身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張作相、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都不在職責所在地掌控局勢。在這種從南京、經北平到瀋陽的「不抵抗政策」，阻礙了任何全局與深入的應變計畫的擬訂，而在事件爆發的緊急時刻，更是沒有領導的主管可以指揮與應變，因此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大部分的東北軍都沒有進行守土有責的有組織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說的：「中國守軍有如宮廷太監一樣的無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變當晚的現場，日軍在北大營附近的柳條湖，爆破南滿鐵路之時，中國守軍根本沒有因為聽到爆炸聲音而出營查看，當日軍向北大營發動軍事攻擊之時，駐守北大營的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當時根本不在營內（人在瀋陽參加水災募款晚會），下屬的六一九、六二〇與六二一等三個團長，只有六二〇團長王鐵漢於槍響後趕到營內。旅參謀長趙鎮藩連絡不到旅長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電話請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應該如何應變，所得到的答覆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軍進入。

假如東北軍執行這個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軍全成戰俘，當然是東北軍所不能接受的。最後旅參謀長趙鎮藩決定突圍，而王鐵漢團長決定下令自衛

還擊，這樣北大營守軍才一面突圍，一面開槍還擊。大體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東山嘴子（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識），最後輾轉進入山海關進行整補。

而當時在東北留守的最高軍政負責人榮臻，在事發之後，雖然設法立刻與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的張學良取得聯繫，向張學良報告日軍的攻擊事件，由於當時無法確定日軍攻擊的真正意圖，因此張學良初步的認為，這只是日軍的演習挑釁而已，因此告誡榮臻，叫東北軍絕對不可以開槍還擊，以免給關東軍製造軍事衝突的藉口。之後當榮臻發現，整個局勢發展嚴重，日軍這次的行動既不是挑釁，也不是演習，而是日軍真正的軍事佔領之時，再設法請示張學良，但是電話已經被日軍切斷。

事變的當晚，張學良連夜在北平召開東北軍政首長會議商量對策，最後的結論是，假如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全面對日作戰，東北軍自當為前鋒，否則目前可行的辦法是，一為訴之國聯，一為設法與日本進行直接的交涉。張學良也將狀況與結論立刻報告南京。問題是，當時蔣介石剛好離開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營，準備督導第四次對中共的圍剿作戰（其實就算蔣介石當時坐鎮南京，也不可能有什麼緊急應對的辦法），因此當蔣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之後，他除了指示東北軍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趕回南京處理這個歷史的重大變局。

蔣介石在與南京國民政府領袖會商之後，以中國的局勢危機四伏，日軍甚至可能會藉機發起對中國的侵略，當時的國民政府根本自顧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張學良下令東北軍，採取維持不抵抗的原則，以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同時要求廣州的國民政府，立刻派員與南京共商團結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九一八事變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強調在中日國力懸殊之下，國民必須逆來順受，政府將設法在國際聯盟中，爭取國際正義的支持。因此無論事前與事後，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立場是，軍事上採取不抵抗政策，來應付日本關東軍的挑釁，外交上則是訴之國聯來主持公道。

總之，當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之所以沒有進行有組織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絕對不是如同謠言的說法或政客的批評，說因為當時的張學良，正在沉迷歡場女色，所以沒有及時處理而誤了大局，同時也不是蔣介石的不抵抗電報指示而誤事。在基本上是出於國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選擇，同時對日本軍政情勢判斷發生的錯誤，因而造成歷史悲劇的結果。

事實上，由於當時政府保持著消極與被動的不抵抗政策，影響到政府對於日軍在東北的侵略，毫無應付事變的周延策略與準備，所以沒有佈署防禦的部隊，也沒有設計應變的作戰計劃，當事變在倉卒之間爆發之時，中國根本無法進行應有的應變。同時國民政府也誤以為只要中國部隊不抵抗，日本總不至於在連藉口都沒有的狀況之下，公然的發動侵略³。何況當時日本政府，的確不贊成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甚至連日本軍部也要壓制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的行動。

順帶應該要澄清的事實是，東北軍政領袖張學良，的確由於年少得志，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但是比起當時的其他同級的軍政人物，甚至黨國大老們的表現，張學良並不算聲名狼藉的。可是當時流傳最廣的錯誤印象，莫過於與汪精衛唱和的文人，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寫的打油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這類以訛傳訛的宣傳，只是純粹爲了羞辱張學良的「文鬥」而已，毫無歷史根據。因爲根據所有的查證，名影星胡蝶女士，事實上根本沒有與張學良有過任何交往的記錄，事變發生的當天與前後，胡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歸，雖然當時朱家幾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與張絕對沒有任何的關係。朱五女士是張學良部屬之妻，與張更沒有任何的感情牽扯；只有趙一遜女士（趙四小姐）是張學良的紅粉知己，而張、趙之間不是露水姻緣的男歡女愛，而是攜手走過人生富貴與失意的真正情侶，他們最後在台灣完成正式的婚禮。假如說真正影響張學良處理艱鉅挑戰的，恐怕是他的體能問題，先前張學良染上了嚴重的毒癮，在緊要關頭身體更難負荷重大決定的壓力。但兩年後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 東北軍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變時，中國的東北共有三省、一個特別行政區，事變發生之後，關東軍可以說是按照預定的演習計劃，在中國軍隊毫無抵抗的狀況下，

³可惜這個想法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驗，在近代史中，日本與俄羅斯兩國對中國的侵略，不但是連藉口都不需要，而且還會一面侵略，一面否認。

一天之內就順利攻佔了遼寧大部分的地區，而接著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軍自動投降，日軍在三天之內也就完成了對吉林的佔領，至於哈爾濱的東省特區，早有漢奸張景惠做內應，只待蘇聯方面允許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軍企圖攻佔黑龍江省時，才正式遭到中國軍隊有組織的抵抗。

由於關東軍一擊成功佔領遼寧，又有漢奸接應「接收」吉林與哈爾濱，面對進一步的控制黑龍江省，則因為關東軍的兵力不足，以及參謀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滿的壓力，迫使關東軍指使已經投降關東軍的偽軍張海鵬軍閥，率兵進攻黑龍江，不料受到黑龍江的于兆麟部反擊，並且連絡馬占山部隊，燒毀了江橋鐵路橋，擊敗了漢奸部隊的進攻，關東軍唯恐東北軍抗日的英勇形象，會積極帶動東北百姓的抗日風潮，使得關東軍決定直接介入。

這時東北軍第三旅的旅長馬占山，已經被張學良任命為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在擊敗偽軍的進攻之後，決定繼續堅守江橋，而關東軍則決定出兵江橋，引發了關東軍違抗參謀本部「臨參命」的重大事故。結果馬占山部在江橋奮勇迎戰關東軍，同樣給予關東軍出乎意料之外的嚴重傷亡打擊，一度造成關東軍極大的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動員關東軍所有的部隊參戰，同時緊急向朝鮮軍借兵助戰，日軍在十一月五日，對馬占山發動前所未有的陸空聯合攻勢，日軍猛攻了半個月，最後馬占山在缺乏後援與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只有後撤，但是卻打響了日後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起義旗號，激動了中國人民支持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民族主義熱情，也暴露出關東軍並非無敵的「神話」。

面對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東北變局，張學良當時唯一的軍事佈署，就是在遼西的錦州，設立了臨時的軍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張學良下令在錦州設立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以及遼寧省政府行署，同時把留駐東北突圍的部隊集中錦州，張學良希望保有遼西，做為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基地，以及與關東軍交涉的籌碼。

這種佈署當然立刻激怒了關東軍，關東軍在十月八日，不顧東京軍部的反對，斷然先以空軍攻擊錦州，然後集結軍隊，準備強行進攻。這些軍事行動造成國際社會對於日軍強悍侵略的反感，因為攻擊錦州的軍事行動，日本是既無護僑的藉口，也沒有確保鐵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顯示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爲。

因此日本的參謀本部，只有為此再度發出四道臨參命，以控制關東軍企

圖佔領錦州的行動，在臨參命的壓力之下（這回關東軍不易為自己行動找到辯護的藉口），關東軍只有暫時停止進軍，但是設法派遣投降日軍的漢奸軍閥部隊，前後三次攻擊錦州，但是都被東北守軍所擊敗，因此關東軍對於遼西的張學良據點，是幾乎一籌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與軍部都進行全面的改組，新的日本政府與軍部，都決定支持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的大政方針，因此日本正式從本土派遣大量部隊進入中國東北，同時軍部也同意了關東軍攻佔錦州的計劃。

正當日軍準備動員大軍圍攻錦州之時，南京的國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亂與鬥爭之下，進行改組，蔣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蔣張的粵派人士孫科等人，主導國民政府的政局，並由反蔣、張最力的陳友仁，擔任外交部長，雖然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一連發出兩道命令，叫張學良死守錦州，但是由於粵派的國民政府，根本無法挽回財政混亂的危機，又不能有效的掌控軍隊，與張學良的關係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張學良根本無意聽從這個搖搖欲墜的南京政府，所下達「死守錦州」的命令。（其實當時沒有一個地方勢力願意接受這個國民政府的命令，就連上海的銀行，也不敢接受它所發行的債券）。

在關東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對錦州發動攻擊之後，東北軍只在外圍進行局部的抵抗，張學良在確定粵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無法也無力支持東北軍抗日之後，於次年元月二日下令，東北軍自動棄守遼西，因此日軍輕取錦州，直逼山海關的華軍防線。

日軍既然順利攻佔錦州，又得到蘇聯方面不干預日軍佔領中國東北的立場宣示，這時已經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關東軍，再度揮軍北上，以優勢的兵力，順利的攻佔了黑龍江省與哈爾濱市，整個中國的東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的被日軍佔領了。只剩下不願意成爲日本奴役的東北軍民，自動自發的組織抗日義勇軍，在白山黑水的東北大地，與日軍進行殊死決戰，表現出中國人豪勇的民族氣節。他們也開始驚醒全國同胞，中國人需要團結奮鬥，以扭轉可能亡國的考驗。

6

弱國的奮鬥與掙扎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政府可以說是陷入中樞無主的狀態：要戰沒有實力、要和沒有決心，四分五裂的國家、民窮財盡的政府、加上只知內戰相殘的軍隊、激動絕望的學生、興風作浪的政客、賣國求榮的漢奸，中國真的能夠面對進一步即亡國的挑戰嗎？從蔣介石的觀點看來，中國唯一的機會，只能從死裡求生，那就是設法忍辱負重、爭取時間，統一與建設國家，然後設法組成一支有現代戰力的軍隊，才能再與日本進行決戰。但是在當時而言，這種想法卻是不會被輿論所接受的，民情激動得現在就要與日本一決生死，「立刻抗日」更是當時所有割據勢力，反對蔣介石進行統一與建設的護身符，使得蔣介石在準備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無數與不必要的困難。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於中日兩國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分水嶺事件，由於日本政府不但無法控制少壯派軍人違抗命令，而且還逐步的認同他們為帝國開疆闢土所做的貢獻，從此之後，日本演變成為一個由少數軍人專政的國家，從此國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後換得了亡國的歷史結局。

而中國卻從九一八事變的慘痛打擊之下，開始逐步的覺醒。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受到這個危機的刺激之下，出現了死裡求生的掙扎，從一個近乎

完全破碎與衰亡的局面，開始凝聚出一點國家認同的元氣，慢慢的獨力進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經歷了極其艱苦的十四年，最後是熬過歷史的浩劫，獲得了光榮的勝利。雖然中國的復興立刻又受到英、蘇、美強權的聯手陰謀出賣的打擊，但是經歷過抗日戰爭之後，她已經走出歷史的最低點，開始有了國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國分裂與衰弱而招來外患

九一八事變爆發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低迷的危機時刻（要不然關東軍的這幾個少壯派軍官，也不敢這樣膽大妄為的侵略中國東北了），當時的中國，分為兩個國家，三個中央政府，十幾個地方獨立政府，以及邊陲地區（蒙古、新疆、西藏）實際上被外國幕後控制的局面。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真正能夠直接掌控的地區不過是長江中下游幾省的地區而已，連年不斷的內戰，把原本已經落後貧困的國家，更是拖到破產的深淵之中，從清朝中葉以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更是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在這種中國面臨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國。

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面對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說是焦頭爛額。蔣介石一貫的主張是，只有先統一內部，才能完成建設與發展，這樣才有能力與帝國主義力量爭取中國應有的權利。蔣以及絕大多數的國民政府領袖們，雖然都多少的了解到東北局勢已經出現危機，但是他們絕對沒有想到，連日本政府與軍部，也無法控制住關東軍的獨斷行動，史達林更是順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勢發展，因此國民政府對於東北所面臨的危機，除了再三的交待張學良不抵抗之外，並無進一步的準備與對策。

事實上，當時的蔣介石，甚至沒有把握能否解決關內分裂（中共與廣州）的危機，那裡還能有力量去對付關東軍在東北的侵略與挑釁。基本上，中國政府仍然認為，至少當時的日本政府方面，還沒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國的東北的準備，同時日本軍部也一直擔心蘇聯從背後突襲，因而不願在中國東北採取公然的軍事行動。所謂不抵抗政策，原是針對杜絕關東軍的挑釁藉口而發的（並非當日本真正武力侵略東北時，仍不予以抵抗）

回顧九一八事變之前的中國局勢，剛剛結束民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內戰之

後，張學良的「奉系」一夜之間成爲中國內部，僅次於寧系（蔣介石）的軍政勢力，於是造成粵系極大的不滿與反彈。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國民黨高層派系，爲了是否應該制定約法、實施訓政的問題，再度爆發水火不容的政爭。這次政爭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見的，蔣介石竟然採取軟禁黨國元老胡漢民的強硬手段，因而激起國民黨中的粵、桂系統，正式的叛離南京國民政府，而在廣州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並且開除南京國民政府所有領導人的黨籍。他們特別憤恨張學良的迅速興起，因此廣州的國民政府，進一步的準備連絡其他割據的軍政勢力，再度發動討伐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竟然到日本進行活動，要求日本政府以軍力，支持廣州政府討伐南京國民政府。這種做法，雖然當時沒有被日本政府接受，但是給予日本政府相當大的鼓舞，認爲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在分裂與亡國的邊緣了。

在面臨這種內戰不息，與內鬥不斷的情形下，南京的國民政府可以說是分身乏術，只能疲於應付各方的挑戰，而就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實際上只是地方型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單獨面對國際強權的侵略。在這種的危機之下，經過緊急的商討對策，南京政府只有決定不對日宣戰，而採取一面進行對日的交涉，一面訴之國聯，要求國聯能主持國際正義。同時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也立刻釋放胡漢民，並且要求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會商團結之道，以組成新的政府來共赴國難。

國民政府決定不對日宣戰，原因很簡單，因爲當時中國，無論就軍力與總體國力而言，中國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對手。別說正規的戰場作戰是必敗無疑，就是長期的游擊戰也沒有準備好，所以中國一旦正式的對日宣戰，結果必然是戰敗亡國。何況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和關東軍存有立場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夠以外交方式與中國政府洽商解決之道，然後可以壓制關東軍的行動。因此中國與日本原是準備進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變的危機。

當時無論在中國或是日本，都有不少軍政領袖，認爲九一八事變只是關東軍的強出頭的爭功表現，而不是政府主導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國能夠在交涉的過程中，多讓些利益給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終會壓制關東軍，不至於就此直接佔領中國東北。

但是這種想法，很快的就被強大的政治壓力所否決了。國內民意強烈的激盪，認爲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的侵略，做出任何的妥協與讓步，因此「不

撤兵、不交涉」成爲中國輿論與政界的主流意見，迫使國民政府不敢進行中日之間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關東軍行動的空前勝利，已逐漸贏得軍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無法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而放棄已經佔領中國東北的利益。

當時的東北軍之所以採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整體國策指示之外，也有著實質生死利害的考慮，因爲東北軍主力在華北，負責處理中原大戰之後的善後工作，當時口服心不服的晉軍閻錫山部、山東的韓復榘部都與日本有聯繫，而剩下的西北軍又與東北軍有過慘烈戰鬥的私仇，因此張學良就算想要緊急調兵出關應戰，在中央方面是兵餉都無法支援，同時誰也不敢保證，其他在華北不同派系的部隊，會不會乘人之危的攻擊東北軍後路，這就是張學良不能不顧忌的地方。

張學良原先也一樣認爲，當時日本最終的目的，只是要擴大日本在東北的利益，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已經超過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指令，何況日本無論如何都要考慮蘇聯的立場。所以只要不在東北與關東軍正式開戰，關東軍就沒有作戰的藉口，然後經由與日本政府交涉，達成利益的讓步，最後關東軍還是會退兵的。張學良清楚的知道，目前自己既失東北的根據地，前途已經危機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隊拼光，那麼自己以及東北軍系，將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無法挽回東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是確立不宣戰的方針（其實也無兵可戰），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擊，財政部長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進行接觸，同時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中國的緊急控訴。宋子文與重光葵經過密集談判之後，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贊成關東軍的行動，因此決定由中日雙方派員組織一個代表團，直接到東北監督停火，然後商議撤軍的問題，這個方案已經被日本外相幣原重喜郎所接受¹。

但是這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意已經陷入激動與失控的狀態，國人一致認爲日本若是不先無條件撤兵，中國根本沒有與日本進行交涉的必要，激動的

¹假如中日雙方繼續的直接交涉下去，是否會達成進一步的協議以解決九一八事變？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問題。至少蔣介石在後來的檢討中，有過這樣的想法。

學生衝進外交部毆打外交部長王正廷；輿論對於政府的不抵抗與對日本的交涉，都當成漢奸般的嚴厲批判，造成整個南京國民政府幾乎爲之癱瘓。「不撤兵、不交涉」便成爲民意強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針，造成當時政府中沒有人敢再談與日本交涉的事，訴之國聯變成當時國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選擇。

但是當時的國聯，雖然在表面上是一個超國家的維護和平國際組織，但是實際上確在幾個國際強權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實際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國駐國聯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國的緊急控訴，二十二日國聯就做出要求中日雙方停戰撤兵的決議²，但是日本政府當時根本弄不清楚狀況，更控制不了關東軍的行動，反正日本政府發表了所謂「不擴大」聲明來敷衍國聯，因此這個決議根本發生不了任何的影響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關東軍停戰撤兵，反而坐視關東軍擴大侵略的狀況下，國聯在中國的要求下，於九月三十日再度做出決議，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國需要能夠確保日本僑民安全與南滿鐵路運輸』的前題，這樣日本政府就可以辯稱，中國無力保護日本在中國東北僑民與鐵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還要繼續增兵以護僑與護路。最後國聯看到日本實在是胡作非爲、公然破壞和平進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決議，要求日本撤兵，這時候日本政府只有設法做出緩兵之計，由日本外相幣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則，以解決中國東北的問題。

幣原的五原則是：一、中日雙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對方領土主權完整。三、中國禁止排斥日貨。四、中國負責保障日本在華僑民安全。五、中國承認與日本之間的一切條約、義務。表面上看起來這五原則還算合理，但是玄機就在於第五條——日本要想國民政府承認已經被宣告無效之「二十一條」的效益，這是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條件。

這時候，國民政府已經陷入重組的過渡狀態，沒有人能夠當家主事，所有的軍政負責人，光是要應付十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四全大會的召開，有關寧、滬、粵各派的內部紛爭，就已經分身乏術，加上輿論的強烈批評，根本沒有人敢去負責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動與絕望的學生不但進行罷課，而且到處衝擊國民政府的機關，強佔列車開向南京，向政府請願，要求「與日本宣戰」，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高級首長出面對學生解釋政府的立

²當然可以看出這個決議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中國根本沒有進軍，甚至沒有抵抗，完全是日軍單方面的侵略，從那來的雙方停戰與撤兵？

場，只得到更爲強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國學生的請願代表，極度不滿黨政首長的解釋，甚至在南京中央黨部，圍毆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與教育部長蔡元培。

6.3 政府改組危機擴大

在民意的強大壓力之下，廣州的國民政府終於願意與南京的國民政府進行團結禦侮的會談，加上汪精衛的擴大會議派人馬，三個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別舉行國民黨四全代表大會，各自選出自己的人馬，所有叛黨與割據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爲拼湊的「團結」政府，廣州放棄國民政府的名號，卻在「西南政務委員會」的旗號下，繼續保持獨立狀態。而在胡漢民的強烈堅持蔣介石必須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決定辭去本兼各職，而由廣州的國民政府入主南京，負起對日交涉的重責大任。

這時候，日本的若槻禮次郎內閣，也因爲無法處理九一八事變的內外危機而下台，而由犬養毅首相接任。犬養是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對於中國的革命以及孫中山的理想，都相當的同情，與廣州國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領導人，更是有著私人的情誼。因此國民政府在孫科主政，以及陳友仁出任外交部長的情況下，中日雙方進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當時陳友仁還非常樂觀的認爲，犬養將會盡力化解日本內部爭議，最後還是會以外交協議的方式歸還中國東北。但就事實的發展而言，這時候日本朝野都已經改變原先的觀點，開始支持「勝利者」關東軍的奪取中國東北行動了（要記得日本是一個崇拜唯力的民族，誰的力大誰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國會正式通過嘉勉關東軍的決議，當天日皇也正式核准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綏靖行動」。因此就算是犬養毅真的有心想要約束軍方，這時候已經是心餘力絀了。而日本的軍方懷疑犬養毅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更爲排斥中日以外交解決東北的構想³。

不當家不知家道的艱難，廣州派的人馬入主南京之後，才發現國庫的空虛，與國家的混亂。當時每個割據的派系人馬都「高言」抗日，但事實上，每個派系的人馬都知道打不過日本，誰若是要當出頭鳥，誰就成爲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而當時中國財政的困難，更是超過廣州派人馬想像的程度，他們

³犬養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壯派軍人刺殺身亡。

根本發不出糧餉，弄得公務員罷工，軍隊要嘩變，這時候日本又在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直接威脅到南京的安全，國民政府倉惶遷都洛陽辦公，粵派的國民政府只有請辭，再度讓蔣介石復出，來處理艱鉅的國事了。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政府可以說是陷入中樞無主的狀態：要戰沒有實力、要和沒有決心，四分五裂的國家、民窮財盡的政府、加上只知內戰相殘的軍隊、激動絕望的學生、興風作浪的政客、賣國求榮的漢奸，中國真的能夠面對進一步即亡國的挑戰嗎？從蔣介石的觀點看來，中國唯一的機會，只能從死裡求生，那就是設法忍辱負重、爭取時間，統一與建設國家，然後設法組成一支有現代戰力的軍隊，才能再與日本進行決戰。但是在當時而言，這種想法卻是不會被輿論所接受的，民情激動得現在就要與日本一決生死，「立刻抗日」更是當時所有割據勢力，反對蔣介石進行統一與建設的護身符，使得蔣介石在準備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無數與不必要的困難。

在當時，比較展露出希望的，就是一般國民自動自發出現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馬占山發動江橋抗日的反擊之後，中國各地的民眾，都自動自發的興起支援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活動，國人在極度的窮困之中，設法慷慨捐輸，東北人民在不到半年之內，組成多達四十多個抗日組織，與日本關東軍進行浴血抗戰，從南到北攻擊關東軍在東北各處的據點、切斷日軍的鐵路運輸、刺殺賣國的漢奸，甚至數次進攻像瀋陽、長春等重要城市，迫使日本動用五個師團以上的部隊，在東北各地進行屠殺式的鎮壓。

東北義勇軍的奮戰成果，一度可以說是震驚中外，但是在蘇聯協助日本封閉外援，以及日軍進一步佔領熱河，切斷關內的支援管道之後，東北的抗日義勇軍，終於在缺乏外援，沒有武器與彈藥的補給下，才逐漸的被日軍所壓制住，但是仍有許多東北的熱血青年，設法輾轉入關，或是成為流亡學生，或是投身軍旅，成為抗日的先鋒與烈士。而像「長城謠」等的愛國思鄉歌曲，更是激厲起同胞愛國的民心士氣。一部分的國人開始了解統一與建設的重要，中國於是開始逐步走上團結與準備抗日的道路。但是日本對華的侵略卻是沒有一刻停止過。

一二八事變的奮戰迎敵

日本為了替滿洲國粉墨登場進行掩護，希望能夠在上海挑起事端，以分散國際注意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日軍進入上海市區，對中國守軍發動了攻勢，十九路軍立刻加以還擊，「一二八事變」就這樣在上海開打。雖然十九路軍的裝備落後，而且當時的糧餉不濟，但是一種基於民族主義熱血的精神，激發著這些軍人決定與日軍進行一場血戰。因此當日軍還以為「支那兵是太監兵」之時，華軍就以陳舊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氣與無畏的熱血，給予入侵閘北的日軍，迎頭痛擊。日軍指揮官鹽澤幸一作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軍隊會進行浴血抵抗，迫使日軍面對逆勢的包圍，因此他只有下令陸戰隊在吳淞登陸增援，在中國守軍猛烈的反擊之下，而無法登陸成功，另外一支的日軍在江灣竟然遭到圍殲的命運。

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在中國東北悍然抗命而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居然能夠贏得日本多數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結構發生激變，少壯派軍官從此實際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發展方向。而由於關東軍極欲無中生有的完成「滿洲國」獨立大業，不希望國際社會過於集中注意力，觀察其粗劣炮製一個傀儡政權的技倆，因此由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聯繫

在上海的日本特務機關，設法在上海大都會，製造事端，以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7.1 日本在上海製造衝突事端

這時日本的海軍，對於陸軍順利的攻佔中國東北，贏得大筆的軍費以及全國的民意擁戴，相當羨慕，當然也希望能夠藉機表現，以扳回一些顏面與利益。因此海軍對於在上海發揚皇軍神威，特別感到興趣，而日本的犬養毅政府，已經完全受到軍方與軍國主義的民意牽制，對於上海的緊張局勢，只有完全信任與授權海軍來處理。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的主要都會地區，在學生與工人階層，都發動了極強的反日運動，最令日本感到壓力的，就是抵制日貨的民間活動。在九一八事變的三個月後，日本輸往中國的產品，減少了近六〇%，使得日本經濟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機之中；中國人民對於在中國境內耀武揚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憤慨與敵視。此時在中國境內的日僑與日本產品，都成為中國人民排斥與攻擊的對象，所以要想在國際的都會上海，製造中日衝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駐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與投靠日本的特務川島芳子¹，操縱日本浪人共同設計一個中、日的民間衝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實業社門口，發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擊的事件，日方立刻歸罪為中國工廠自衛隊的暴行。這個消息傳出之後，日本在上海租界的僑民（有許多是後備軍人與浪人），馬上組織了自衛隊與後援會，擅自攻擊與火燒三友實業社，並且要求日軍立即動員前往上海，對中國興師問罪。

而早已等待機會表現的日本海軍，當然立刻抓住這個機會，大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調派更多的海軍與陸戰隊前往上海，一方面對上海市政府提出極其無理的要求。這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在中央政府已經陷入不知誰在當家的狀態之下，只有設法委屈求全的答應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國懲凶、賠償、道歉，而是要想找個軍事攻擊中國的藉口，希望能夠在上海挑起事端，為滿洲國粉墨登場進行掩護；另一方面也要給海軍機會來扮演「膺懲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讓其陸軍專美於前。當

¹川島是滿族後裔，由日本人養大，在抗戰勝利後，依法被處死。

時日本海軍認為，說不定上海的中國守軍，又是來個「不抵抗」，那麼海軍也就可以撿個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軍奮勇抗日

但是日本這次沒有這種運氣了。當時駐防上海的守軍，是經過中央收編廣東的十九路軍，這支部隊並非中央軍的嫡系部隊，對於中央的命令也不會完全言聽計從。這時候的十九路軍，真是鬼使神差地從江西蘇區前線調防上海，進行整休，指揮十九路軍的將領是蔣光鼐與蔡廷鍇，他們對於日軍在東北的侵略，可以說是敵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當日本海軍又想在上海鬧事之時，當然就興起守土有責的決心。十九路軍的高層指揮官們，觀察到日軍有可能在上海進行挑釁的意圖，同時當時的國民政府又陷在改組的過渡狀態，因此便自己決定，假如日軍真的在上海進行挑釁，他們絕對會給予反擊。這個護衛國土的決心，也得到十九路軍部屬的衷心支持。

當時的粵派主掌的國民政府，可以說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本身無糧無餉可發，到處借貸又無門，地方割據勢力根本不聽指揮，帝國主義的壓力又難以招架，內部還經常爆發內訌。當時蔣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已經面臨失控狀態，日軍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擴大衝突、威脅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十九路軍「打招呼」，希望不要與日軍衝突，假如發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處理。

這種低姿態的不抵抗政策，當然無法得到十九路軍的支持。何應欽原本乾脆下令，準備調憲兵接替十九路軍在上海市內的防務，不料日本海軍卻搶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調兵進入上海市區，對中國守軍發動了攻勢，十九路軍立刻加以還擊，「一二八事變」就這樣在上海開打。

原先日本海軍對於自己的戰鬥優勢，有著絕對的信心與把握，他們認為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失去指揮部隊的能力，蔣介石又不在職務上，中央軍大部分仍在江西蘇區作戰，以及部分支援策應華北的局勢，因此根本無法調軍救援上海，以日本陸戰隊的兵力來對付疲弱的十九路軍，根本是牛刀小試，絕對會一戰功成，而能與關東軍的勝利爭鋒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軍指揮官鹽澤幸一少將，在日軍出動時曾狂妄的表示，日軍只要四個小時，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閘北。

雖然十九路軍的裝備落後，而且當時的糧餉不濟（已經兩個月沒有領到錢了，其他的部隊也差不多沒有領到糧餉），但是一種基於民族主義熱血的精神，激發著這些軍人決定與日軍進行一場血戰。由於十九路軍早有迎戰的準備，因此當日軍還以為「支那兵是太監兵」之時，華軍就以陳舊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氣與無畏的熱血，給予入侵閩北的日軍，迎頭痛擊。鹽澤作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軍隊會進行浴血抵抗，迫使日軍面對逆勢的包圍，因此他只有下令陸戰隊在吳淞登陸增援，在中國守軍猛烈的反擊之下，而無法登陸成功，另外一支的日軍在江灣竟然遭到圍殲的命運。

這種戰果，大大振奮了所有中國人民的愛國情緒，海內外的中國人慷慨捐輸，前往前線勞軍與看顧傷兵，更有青年人報名參軍以支援守軍抗敵²。

7.3 日軍在上海踢到鐵板

上海是當時亞洲最國際化的大都會，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立刻驚動國際社會，外國輿論開始對於中國守軍的反擊，充滿了佩服與驚訝。而日軍當然是丟不起這個顏面，立刻下令撤換鹽澤幸一，改由日本海軍的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將出任指揮官，繼續向上海發動軍事攻擊。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軍的戰力，與中國人民熱情支持華軍的士氣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飛機與艦砲的掩護下，猛攻蘊藻濱、曹家橋，以包抄據守吳淞口的華軍，但是在徹夜的激戰中，中國軍隊幾乎是有死無退，在華軍大膽的運用逆襲之後，幾處重要的陣地是失而復得，日軍根本無法在上海的作戰中，取得勝利。

這時日軍連續在上海作戰失利，使得東京的軍部為之震動。軍部必須要立刻挽回皇軍無敵的顏面，因此馬上決定由陸軍接管上海的作戰，以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率領陸軍精銳，與增援的海、空軍到達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團參戰。植田到了上海，先設法安撫一下國際社會的不安，表示日軍的作戰不會影響到大家的商業利益，日軍的目的只是要中國軍隊撤退，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利益」，但其實植田只是為日本陸軍部隊的攻擊行動，增加一些準備時間而已。

²作者的先父是當時報名參軍的熱血青年之一，據先父說，還有當時來自東南亞的華人，不但踴躍地捐助抗日經費，也有華僑青年離開學校與工作，兼程回國共赴國難，投入抗日作戰。可見只要中國決心抗日，所有海內外的華人，都是一心一德、義無反顧，來參與抗日行動。

粵派主掌的南京國民政府，在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後，更是到了山窮水盡、無力運作的地步，當然更無法挑起抗日的責任，最後只有宣佈總辭。國民黨高層在緊急會商之後決定，重新起用蔣介石指揮軍隊，汪精衛負責政務，胡漢民返回廣州，國民政府先遷洛陽辦公，以避免日軍從上海沿江而上，長驅直入防務空虛的首都。當日本開始向上海增兵之時，蔣介石也立刻將自己的嫡系部隊中央警衛師，編成八十七與八十八師，加上中央軍校的教導團與特種部隊，組成第五軍，由張治中將軍率領，投入上海的戰鬥序列，接防左翼防線，以支援十九路軍作戰。

植田謙吉的任務就是上海狠狠地「教訓」一下中國的軍隊，因此在佈署大軍完畢之後，於二月二十日，在海空軍強大砲火掩護之下，在江灣與廟行之間，由坦克支援步兵，發動中央突破的猛烈攻擊。這場作戰對中國軍隊而言，是前所未見的三軍立體攻堅戰，但是十九路軍的豪氣干雲，第五軍更是蔣介石的王牌軍，兩支部隊立刻聯手反擊日軍的攻勢，多處的陣地是浴血的反覆衝殺，日軍絕對沒有想到中國軍隊居然有如此強大的戰力，在激烈的爭奪戰中，日軍並沒有突破中國守軍的陣地而達成任務，特別是在廟行爭奪戰中，日軍被八十八師逆襲，而遭到慘敗。此時中、外的輿論興奮與譁然，中國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極，國人支持軍隊抗日的情緒，因此達到了空前高漲的地步。

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國陸軍只有十七個師團，現在四個師團支援關東軍，兩個師團派到朝鮮，一個半師團在上海，再要調兵就要影響到日本整體的防務了，所以日本現在只想趕快在上海做個軍事的了結。日軍的參謀本部，不顧陣前易帥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別派遣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大將，恢復現役，出任新組成的「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增派第十一與十四師團，以及飛行團加入上海戰鬥序列（這時候幾乎多達一半的日本軍隊，已經在中國執行任務了）。

這時重掌兵權的蔣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時與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開會商定，將全國劃分五個防衛區，分別要求割據各路的將帥，團結抗日為國效命。但是各方反應卻是非常的複雜，這些割據一方的軍閥將帥們，仍在計較自己的利益是否會因為參加這場戰爭而有所損失，更不願自己的軍隊調離自己的地盤，也擔心別股勢力的部隊會乘機襲擊，因此反應冷淡，更無出兵響應的實際行動與計畫。

7.4 顧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戰

這種缺乏全國一致抗戰的局面，迫使蔣介石真實的了解到冷酷的現實，假如中國要想真的進行對日長期抗戰，現在只能就要見好就收，以圖凝聚共識與發展實力。因為假如真的在目前這個階段，把上海事變發展成爲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那麼當時四分五裂的中國，是既無兵、又無錢與日本作戰（當時中國連徵兵的制度都沒有建立，當然也沒有現代化的貨幣與稅制），而沒有國家觀念的各路諸侯，也可能會見風轉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組織之中，中國最後只有面臨亡國一途。

在上海抗敵的中國守軍，面對日軍的大舉增援，一再的電請國民政府增加援軍，但是蔣介石也到了無兵可調的困境，因爲各路諸侯根本擁兵不救，原本由蔣介石所主控的部隊不過六十多個師而已，主力則是用在對剛剛在江西建國的共軍作戰。在與共軍對峙的國民政府部隊，在奉命抗日而調動之後，就會立刻就受到共軍的尾隨追擊，因此根本很難抽調援軍佈陣。

何況蔣介石發現日軍已經決定準備見好就收，因此決定給日軍一個下台階，而沒有必要立刻以大軍增援上海守軍，只調動江西的蔣鼎文師、在河南的胡宗南師，長途趕赴戰場³，以及要杭州的上官雲相師在縱深陣地集結待命。

蔣介石的戰略考慮以及調兵的困難，當然沒有得到十九路軍的同情。十九路軍眼見日軍大舉增兵，但是自己卻沒有辦法得到更多戰力的補充，因此大爲激動，強烈批評蔣介石擁兵不救。中國軍隊的將帥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戰的困難。蔣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軍注意瀏河的側翼防守，但是十九路軍根本已經不把他的命令當成一回事了，十九路軍忘了參戰的第五軍，其火力與兵力都比自己要強，而在第二線的中央軍也奉命抽調兵員，秘密補充十九路軍的陣亡缺額，一場十九路軍與軍委會之間的「誤會戰」，增加了整體協同作戰的困難。

日本的白川義則臨危受命，負有「不能失敗」的任務。白川大將對於迂迴作戰有著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戰名言是，「只要能夠迂迴攻擊敵人，就不要正面攻擊敵人」，因此他決定在表面上，仍然採取中央突破攻擊，引誘中

³ 由於當時中國根本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長江水路又遭到封鎖，因此等到增援部隊到達上海時，戰事已經結束了，這又充分顯示中國是全方位的落後，如何能夠與日軍進行全面的決戰？

國軍隊投入預備隊，然後採取主力大迂迴包圍的戰術，白川下令日軍在海空軍強大火力的掩護下，從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灣與廟行，然後在中國守軍投入預備隊反擊之時，就展現他迂迴作戰的本事，下令日軍十一師團由崇明島直接在瀏河附近登陸，迂迴包抄中國守軍的背後。結果華軍在兵力沒有得到補充，火力又遠遠不及日軍的狀況下，無法兼顧瀏河的側背防線。十九路軍也沒有與第五軍做好緊密的聯繫，就抽調走防守瀏河的部隊，等到日軍從瀏河進行側翼登陸，迅速的發動迂迴攻擊，威脅到上海守軍補給線的安全，第五軍再想緊急的調動八十七師的預備隊襲擊登陸的日軍，已經遲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華軍全線被迫進行撤退。

這時候，國際強權國家擔心戰事擴大會妨礙到他們在上海的商業利益，因此紛紛的介入調停，日本眼見滿洲國已經炮製成功，也不想與國際社會完全的決裂，而在上海的作戰又不順利，因此願意接受停戰。而國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實力仍然無法進行抗戰，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援，因此也就同意與日本簽定停戰協定。當然日本在這個停戰協定中，必須退回原來的陣地——但是日本仍然討到一個便宜，就是中國的部隊不得直接進入上海市近郊⁴。

在上海簽定停戰協定之前，日本上海派遣軍與上海日本的領事、僑民，在四月二十九日，慶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長節）的閱兵群眾集中，遭到韓國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彈攻擊，白川大將當場重傷致死，駐華公使重光葵的一條腿被炸斷，植田師團長的一隻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級將校與官員負傷，使整個日軍的驕氣為之震懾。

7.5 事變的分析與檢討

一二八事變的上海浴血抗戰，雖然中國方面以低姿態的和局收場，但是中國軍隊在上海作戰時的英勇表現，足以洗刷中國軍隊在東北不戰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國平民百姓，自動自發的熱烈支持軍隊抗日的各種表現，開始凝聚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對於後來中國的政局與歷史，發生極其重大的影響。這場浴血抵抗，不但讓中國人民感到驕傲與興奮，也讓國際社會對於

⁴可是中國負責簽定停戰協定國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郭泰祺，不但被輿論批評得無法做人，還被群情激動的學生圍毆以致重傷住院。其實這個協定，已是自清朝以來，與日本軍事衝突之後，能夠得到的最好條件的協議了，中國既沒有割地，也沒有賠款，就能讓日軍退出所佔領的長江出海地區。

中國軍隊抵抗侵略的決心與能力，出現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過其中也有不利的結果，就是輿論過於同情十九路軍的「孤軍」抗敵，因此強烈批評蔣介石的「擁兵不救」，更反對就此見好就收，而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這些可以說是見木不見林的看法，最終為十九路軍發動「閩變」而背叛國民政府留下伏筆。而廣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認為這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的賣國行爲，有意打擊與抹殺「粵軍」的威信與表現，因此再一次蘊釀發動與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動。

若從事實的真相來分析，十九路軍堅持不待命就自動的奮勇抗敵，當然表現出中國軍人守土有責的英勇士氣，否則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陷入低迷與絕望的中國人心，在中國軍隊繼續不敢抵抗的之後挫折，真的有可能會面臨分崩離析的狀況。但是若是跟著當時的輿論，認為國民政府只要學十九路軍的「跟日本人拚了」的戰法，就可以在上海擊敗日軍，或是進一步收復東北失地，甚至還有可以「遠征東瀛」的高調，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與過於幼稚了。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在上海與日軍浴血奮戰，而初步戰績令人振奮，但這只能夠暫時擋住過度自大與「輕敵」的日軍攻勢而已。真正的要和日軍一決高下，以當時中國的軍隊以及中國的國力，還是相差得太遠了⁵。

但是當時政客與所謂輿論的批評下，蔣介石成爲不肯支持十九路軍「打敗」日軍的「親日」份子——只差一點沒有宣佈他就是漢奸。事實上是，當時蔣介石才剛剛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際復出，這時已經支離破碎的國民政府，又在慌亂之中，剛遷到洛陽，蔣介石實在是既無充足的兵力可以調動，更無足夠的糧餉可發，一點維持政府運作的經費，以及安撫軍隊不要嘩變的糧餉，還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關係，在上海的銀行團中，軟硬兼施的勉強給湊出來的。假如蔣介石沒有派遣精銳的第五軍（那是蔣介石當時唯一能立刻調動的中央軍看家部隊），及時的支援十九路軍對抗日本的陸軍攻勢（第五軍兵力爲五萬，十九路軍爲三萬，裝備又以第五軍爲佳），那麼上海的戰局，根本不待白川義則增援的大部隊到達，十九路軍就很可能會以慘敗收場。

而日軍之所以會無法在上海一擊而勝，當然是嚴重低估了中國軍隊反擊的決心與戰力，等到日本正式組成兵力強大的上海派遣軍之後，情勢就不同了。此刻蔣介石頒佈了全國防禦計劃，但中國各地擁兵割據的領袖們，卻無人真正的聽命派兵響應，那麼蔣介石就算是能夠再湊出幾師的部隊支援上海

⁵在後來的對日的長城作戰中，就清楚的顯示出這個事實。

作戰，最多也只能再挺幾天或是幾星期而已，根本也是無濟於大局，卻徒然給國家增加更多的危機。

既然國際強權出面調停，日本也有意見好就收，蔣介石卻仍然儘量的調兵，在縱深陣地佈署以防萬一，因此從蔣介石的上海戰略佈局看來，他絕對不是見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中央嫡系部隊就擁兵不救（在上海血戰的中央嫡系部隊，要多於十九路軍），而是蔣必須顧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繼續的再打下去，分裂與落後的中國，必然會吃大虧。但是在當時，由於有心人士不斷藉著十九路軍事件，來攻訐蔣介石，更多的人便誤以為蔣介石不敢或是無心抗日，也更為加深了廣州與南京之間分裂的心結。

一二八事變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暫時的穩住了中國的民心士氣，也增加了國際社會同情中國的輿論，但是在戰術上，卻給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戰的經驗與準備⁶，同時日軍也秘密的加強在上海租界內的防禦工事，構建出中國軍隊火力無法破壞的要塞式據點。而在中國方面，則是誤導了日後作戰準備的方向，以為中國軍隊在都會區作戰中，可以佔到死守的地利，而輕忽了縱深作戰的準備與佈署，結果在以後的八一三松滬會戰（1937）中，中國方面派出大軍在上海市區與日軍進行大規模決戰，甚至企圖逆襲日軍陣地，結果華軍部隊付出超過預期的死傷代價。

⁶因為當時日本陸軍一直都對蘇聯作戰為假想敵，日軍編制與戰術的準備，是為在西伯利亞大平原會戰所設計的。

8

無中生有的滿洲國

滿洲國的拼湊建立，是造成中日兩國日後關係的發展，除了走向最後決戰之外，無法達成任何外交妥協的基本原因。因為東北是中國的領土，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認滿洲國的；同時日本自有歷史以來，也從來沒有得到如此一塊資源豐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絕對不可能「捨得」放棄滿洲國，九一八事變演變到滿洲國的出現，就已經註定中日之間最後的全面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的第二天，參與抗命與逕自採取軍事行動的關東軍少壯派軍官，就忙著與前來宣達皇命、約束關東軍行動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進行如何處理事變之後政治佈署的討論。因為當時的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與日本軍部，對於經略中國東北，以至併吞整個中國的基本大陸政策，方向雖然一致，但是有關發動軍事行動的時間與佔領中國東北的方式，仍然存在著歧見。

8.1 臨時起意的滿洲國

在侵略中國東北的時間上，關東軍主張是在一九三一年，軍部則是希望

能在一九三二年，結果，關東軍不顧軍部的約束，以近乎悍然抗命的方式，在軍部特使到達瀋陽的當天，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在如何佔領中國東北的方式上，關東軍主張直接治理，廢省置縣，由日本直轄的滿蒙都督府統治中國東北。而軍部則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親日的中國漢奸領袖，在東北出頭維持局面，因此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板垣、石原、土肥原與軍部特使建川，在瀋陽的日本領事館內，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如何佔領中國東北的歷史性策略磋商。

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關東軍就已經迫不及待依照自己的佔領計劃，派遣日本軍政的人員，出任所佔領地方的行政長官，例如日本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就正式出任奉天（瀋陽）市長，一群日僑也接管了市政府，分別出任市政府的各級主管。這已清楚地暴露出九一八事變的本質，就是關東軍自導自演的侵略行動。因為當時日本政府還在搞不擴大方針，它也沒有宣佈要佔領中國的東北，就連關東軍本身也不過表示其軍事行動，是爲了護路安僑而採取自衛措施，因此如何會出現由關東軍自己任命一批日本人，出任中國領土的地方行政首長？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長的消息，當然引起日本軍部與政府的驚訝，立刻去電要求關東軍「自制」，因為日本所有掩飾侵略中國的手法，就快要被關東軍「吃相難看」的侵略行動，弄成一場穿幫的鬧劇了。

而在建川與關東軍少壯派軍官長經過徹夜的政策辯論之後，在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壓力、東北人民的反抗、關東軍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漢奸幫忙等因素下，石原莞爾終於賣建川學長一個面子（因為建川根本沒有達成原先壓制關東軍行動的特使任務），願意放棄日本直接統治中國東北的計劃，而建川也做出妥協，不堅持指派一名漢奸領袖出頭維持一個在形式上屬於中國，但事實上是親日的傀儡政權。最後雙方各自退讓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折衷的建議，決定推出一個由日本政府幕後操縱，但是脫離中華民國的主權架構，而由滿清遜帝溥儀所領導的獨立政府¹，並爲它取了個名字，叫「滿洲國」（Manchukuo）。

這個決定日本如何佔領中國東北的歷史性大計，就由這幾名日本少壯派軍人私下討論而決定了。根據這個計畫的原則，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立刻

¹因爲土肥原剛剛從天津特務機關調到關東軍司令部，而溥儀自從被逼離開故宮之後，遷居天津日本租界，就經常與日本領事館有所接觸。

召開參謀會議，通過了更為詳細的計劃細節，然後呈請司令官本庄繁認可。這時候司令官本庄繁，已是整個滿洲事變的主導人物了，他立刻與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協商，決定了所謂收拾滿、蒙問題的三原則：一、滿蒙與中國分離。二、扶植中國親日人士組織傀儡政府。三、日本實際控制中國東北所有的軍政與經濟大權。

這個計畫由宇垣一成等人先帶回日本進行溝通，日本新任犬養政府，就派遣前陸相南次郎，到中國東北，了解關東軍的政治安排。此時在關東軍「宣揚皇威」的大勝威勢之下，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已經得到多數日本民意的支持，日本軍部與政府也就完全照章的接受了關東軍的「滿洲國」計劃，日皇裕仁因此還特別破例召見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聽取關東軍所導演的滿洲國計劃；在日皇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只有完全支持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所提的「滿、蒙三原則」。因此這個三原則完全主導了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的政策立場，也成為建立滿洲國這個「子虛烏有」國家的政策根據。

8.2 日本全力炮製的傀儡王朝

甚至在日本政府還沒有接受建立滿洲國的政策之前，關東軍就已經自己動手推動這個政策，由土肥原與板垣分頭開始行動。土肥原在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進行「劫持」溥儀的計劃。雖然在當時，日本外相幣原曾經急電日本駐天津領事館，要求總領事桑島設法阻止土肥原的計劃，以免影響到日本正與國聯交涉的立場，但是當時單是以幣原外相的力量，是不可能牽制得住關東軍的決定了。土肥原在十一月二日與溥儀進行接觸，使用所有威脅利誘的手法，以及欺騙耍賴的技倆，要溥儀離開天津，到東北立國，溥儀在貪戀權位的野心支配下，於十一月十一日，化裝成為日本軍人，在日本製造天津動亂的掩護下，與日本特務潛離天津，乘船經營口再轉赴旅順，從此溥儀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淪為日本人操縱的政治傀儡。而板垣則立刻在關東軍內設立「自治部」，開始在各方面招納漢奸，在中國的東北，大搞各種無奇不有的獨立自治運動，當然所有的獨立與自治，其實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機構，而所有自治的組織機構，都開始大力的推動滿洲國立國運動。

雖然溥儀到了旅順之後，就已經發現日本人的野心所在，根本不是誠心幫助他重建滿清王朝，而是把他當成「滿奸傀儡」，但是他既然人已在關東

軍的控制之中，要想不答應關東軍的條件，也是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因為在當時，別說溥儀無力反抗關東軍的意志，就連日皇、日本政府與軍部，也都要附和著關東軍的意見行事，去無中生有地搞出個滿洲國來，而關東軍當時甚至準備推出溥儀的弟弟溥偉，當做以防萬一的「備胎」

於是溥儀、漢奸群，以及日本政府與軍部，都在關東軍的主導之下，配合歷史荒唐鬧劇滿洲國的上演。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一日，滿洲國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儀先當滿洲國的執政，一年後再繼任皇帝，定都長春，改名新京，年號康德。當時滿洲國的漢奸領袖們，包括國務院總理鄭孝胥，臧式毅（原遼寧省長），熙洽（原吉林代省長），張景惠（原哈爾濱特區首長）等。在滿洲國成立的同時，溥儀也與關東軍簽下了一系列的賣國條約，這些條約承認日本在滿洲國內，控制一切的軍政、外交、交通與經濟資源開發的特權，一個莫名其妙的「國家」，就此由日本關東軍一手導演，無中生有的「獨立」了。滿洲國也就成爲日本未來佔領中國的政治統治範本，日本即將要陸續在中國成立一系列的分裂傀儡國家。關東軍絕對沒有想到自己這種政治創作的「天才」產品，後來會成爲日本無法擺脫中國戰略泥淖的致命因素，最後日本除了走上亡國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8.3 日本悍然拒絕李頓報告

號稱維護國際社會和平的國聯，在九一八事變後一連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兵無效之後，只有玩弄緩兵之計，自找個下台階。國聯在十二月十日與日本政府達成協議，決定派遣調查團到中國東北，實際了解事件真相。而當國聯的調查團，由英國的李頓 (Lord Lytton) 率領，到達中國東北時，滿洲國已經由日本炮製下登場，日本政府竟然設法塑造自己「大仁大義」的國際形象，說日本完全是爲了支持中國東北人民要求獨立自治的意願，而出兵「義助」溥儀成立滿洲國。

但是就在李頓調查團在東北進行活動之時，東北的抗日義勇軍，仍然在東北的各地，風起雲湧般的與日本進行浴血作戰；而東北人民也設法告知調查團，九一八事變的真相以及人民真正的意願，因此李頓調查團當然了解日本軍閥的野心與血腥的手腕，但是這個調查團也不敢開罪日本（當時日本已經揚言要退出國聯），又同時想爲西方國家爭取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因此在

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公佈了一個自相矛盾、參雜了一部分真相與更多曲解事實的報告。這個報告成爲人類歷史上，又一個國際組織（不論其來頭有多響亮）無法主持正義的歷史文獻。

李頓調查團的報告結論是，承認中國對於東北擁有主權，也發現九一八事變是個預謀的軍事行動，並且指出整個行動早已超出護路保僑的自衛範圍，甚至表示滿洲國根本得不到東北人民的支持，全靠日本軍隊的護持。但是這份報告竟然也包括讚賞日本在東北所做的各種「建設與貢獻」（其實是侵佔、掠奪中國的資源與領土），以及同意日本在南滿所擁有的各種特權，認爲中國抵制日本產品，準備收回日本的特權，都是造成日本發動軍事行動的起因。

這個報告所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可以說是荒唐至極，它表示承認中國擁有東北的空頭主權，但是要求把中國東北的行政權，交給國際強權共管，讓國際強權來共同開發與分享中國東北的所有資源（當然日本擁有較高的比率）——真是不知道這種建議是根據何種道理或國際法？國聯竟然這樣對待中國這個擁有主權的會員國，國聯還能成爲國際正義與和平的維護者嗎？難怪二次世界大戰是無法避免了。

李頓的報告，其實根本是反應西方國家對瓜分中國東北利益的興趣而已。國民政府當然表示不能接受，日本軍部更是不可能吐出這個自己獨佔的禁臠，而此時的日本政府，已經是日本軍部的傀儡了。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國聯的十九國委員會通過李頓報告書、拒絕承認滿洲國之後，日本乾脆進一步的宣佈退出國聯，自己張羅未來繼續侵略中國的行動。

8.4 滿洲國對中、日歷史決戰之影響

滿洲國的拼湊建立，是造成中日兩國日後關係的發展，除了走向最後決戰之外，無法達成任何外交妥協的基本原因。因爲東北是中國的領土，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認滿洲國的；同時日本自有歷史以來，也從來沒有得到如此一塊資源豐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絕對不可能「捨得」放棄滿洲國，九一八事變演變到滿洲國的出現，就已經註定中日之間最後的全面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了。

由於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而且製造了一個滿洲國，破壞了國際強

權在中國的「利益均衡」原則，因此結下了日本在國際社會孤立的危機。當時日本政府與軍部最爲擔心的，就是蘇聯政府的態度，因爲自從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政府很清楚的知道，日、俄遲早會再爆發一場決戰。事實上，石原等人決定奪取中國東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爲了未來日俄決戰的佈局先取得優勢；而日本參謀本部當時多次動用臨參命控制關東軍在北滿的行動，主要原因也是擔心蘇聯的軍事干預。

不料，史達林的佈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許日本關東軍的佔領整個中國東北，一方面又支持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行動，雖然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會給蘇聯在遠東地區造成戰略上的極大壓力，但是史達林寧可犧牲這個局部的戰略利益，以換取中國與日本爲此結下決戰的歷史情結，當然他也同時設法將美國推向與日本發生衝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蘇聯乾脆把中東鐵路的利益賣給日本、完全放棄在北滿的利益與駐軍——讓日本能夠完完全全控制滿洲國，並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國的中原——來換取日後日本與中國、美國之間的衝突。史達林長期戰略佈局的狠毒，在當時的世界真是無人能及。

而美國一向主張列強各國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對於日本佔領中國的東北，破壞各國在中國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滿。美國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夠壓制軍部與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日本製造滿洲國之後，美國總統胡佛 (Herbert Hoover) 的國務卿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發表外交文件，指責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並且確立「不承認主義」(nonrecognition doctrine)，美國政府拒絕承認任何東北主權的改變。但是其他的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在綏靖主義迷漫的狀況下，雖然不願承認日本所控制的滿洲國，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願公開支持美國的這項立場。這樣缺乏國際正義的政治現實，不但造成中國只有單獨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進行孤軍奮戰，最終也給國際社會帶來無法避免的世界大戰之危機。

9

劃時代的歷史巨變

從大歷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變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國進入復興的一個歷史分水嶺，關東軍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軍閥終於開始主導了日本的命運；而中國人民卻因此覺醒，導致各種分崩離析力量的開始整合，最後形成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從此走上對抗日本強權侵略的道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處於十八世紀形態、全方位落後的弱國，卻要對抗日本這個二十世紀的先進強國——但中國卻以絕不屈服、義無反顧的民族氣概，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與全人類的自由與民主，並做出了最大與最早的犧牲和奮鬥，與最不朽的歷史貢獻，而這一切都從九一八事變開始！

檢討九一八事變的內涵與影響，真可以說是人類近代歷史上，最大戰爭悲劇的起源，它是引導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劃時代事件。因為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亞強權的日本，從此逐步的淪為由軍人來控制大政方針的國家，日皇與日本政府都逐步成為這些軍閥的幫凶與傀儡。同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則開始復甦，逐漸地產生了巨大無比的能量，支撐中國完成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近代中國復興與國家認同發展之基礎。西方國家因為沒有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動，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

戰爆發的先機，最後讓全球人類付出無法彌補的歷史代價。

9.1 關東軍造成日本的亡國之禍

雖然單就九一八事變的事實本身而言，並不是出於日本政府與軍部的直接計劃與指揮，但是由於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以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來看，關東軍只不過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時機，來執行日本的大陸政策而已。

進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變的史實，更可以清楚的得到結論，這是一個完全由關東軍自導自演的侵略行爲，中國方面既沒有破壞鐵路、沒有攻擊日軍、更沒有傷害日僑，因此在整個事件之中，中國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蘇聯的袖手旁觀，也是讓九一八事變，發展成爲歷史劃時代悲劇的主因之一（假如蘇聯爲了保護它在東北亞的利益，而動以軍事威攝的手段，那麼關東軍恐怕就會遭到日本軍部的制裁了）

對於中國來說，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侵略了她的東北，而日本國而言，則是關東軍控制了日本的政局。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都對關東軍的「侵略」，採取「不抵抗主義」，任其胡作非爲，最後的結果是，日本政府與軍部無法控制關東軍的行動（甚至連至高無上的臨參命都形同廢紙），而由其少壯派軍官實際接管軍部、控制大政。這個由野心軍人支配的政府，最後必然會使整個國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當然在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的情報分析的精確周密，以及行動計劃的大膽果決，可以說是一個軍事行動上的「傑作」，關東軍掌握了東北國防近乎真空、指揮系統陷入癱瘓、作戰準備與作戰意志都缺乏的情報，而對中國東北進行果斷的攻擊；同時關東軍能夠利用貪生怕死，愛慕權力富貴之輩的人性弱點，引誘出一大群漢奸，附和一個滿洲國傀儡政權，使得關東軍在大部分的狀況下，能夠不戰而勝而佔領中國東北各地。關東軍的快速與細密的軍事行動，顯示日軍的訓練良好、士氣極佳，是一支現代化、強打擊力的部隊。

但是這也暴露出關東軍的局限性，只知戰術的運用，而妨礙了政略的佈局，因爲佔領中國東北這個關乎中日兩國關係的歷史性大事，竟然在沒有政府全盤主導、規劃下，就冒然的自行發動作戰，假如關東軍遭到蘇聯進行軍

事干預，或是受到中國軍隊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麼滿洲事變的軍事行動，由於兵力的嚴重不足，又沒有得到本土軍力的支持，很可能就會成爲一個歷史上重大軍事冒進的失利。更爲重要的是，關東軍不了解對中國發動無理的侵略（尤其在中華民族瀕臨危亡的時刻），會刺激中國長遠歷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發出團結抵抗的力量，雖然這個強韌的力量需要時間的發展與成長，但是這個中國的血肉長城最終拖垮了日本。

9.2 可以不宣戰，但是不能不抵抗

檢討九一八事變的歷史，我們要問的是，難道這個悲劇不能避免或是改變嗎？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變前夕，當時無論是日皇、政府或是軍部，都已警覺到關東軍的計劃與野心，也曾經企圖採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於決心的不夠強烈，以及行動的不夠果決而告失敗。

因爲假如當時的日本政府與軍部，真的決心要想阻止關東軍私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並且要維持日本是個體制正常的國家，那麼就不應該僅是派遣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到關東軍進行疏導與壓制，而是應由政府與軍部上奏日皇，直接下達軍令，將關東軍少壯派的主事軍官撤職或是調職回國，或是直接下令給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須負起一切控制關東軍行動的責任（沒有奉到敕令前絕對不能發動軍事攻擊——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軍事基本體制）。那麼單就九一八事變的事件本身而言，應是可以避免爆發的，但是日本政府雖然知道野心的軍人，已經佈下危機四伏的局勢，卻仍然以低調處理，以致釀成歷史大禍。

就中國方面而言，當時的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假如對於日本的野心以及結構的運作，有著歷史的洞見，以及能夠採取面對歷史危機的勇氣與決心，中國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變中，設法維護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兩國最終走上全面戰爭的危機之中。

雖然當時中國的確是一個弱國，在單純的軍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強權的對手，但是由於九一八事變只是關東軍單獨的軍事行動，因此當時的國民政府與東北軍領導人物，假如能夠摒棄消極的心態，充分的掌握與運用積極抵抗的戰略，仍然是有機會可以改變九一八事變的歷史結果。

由於蔣介石與張學良，在當時並無法充分了解到事變的關鍵所在，是日

本內部結構所面臨的歷史性危機，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徬徨的失控局面邊緣，最後竟然因為九一八事變，而走上任由少壯派軍官決定日本命運的危機深淵（當時連日本政府與軍部，甚至日皇在內，也都沒有料到這點）。蔣介石與張學良都認為，當時的日本政府還不至於完全的被關東軍「綁架」。關東軍雖然是有意在東北製造事端，但是若是沒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應該不至於公然的侵略中國東北，所以嚴令東北軍採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給日軍得到擴大衝突的藉口。

9.3 不抵抗主義擴大了歷史悲劇

但是事實的發展是，日本政府與軍部竟根本約束不了關東軍的行為，中國所採取的不抵抗主義，不但無法避免戰禍，反而引爆了日本軍國主義更為強烈的侵略凶性¹，同時中國「和平」的表現，也沒有辦法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歷史是一向如此的無情，國際社會雖然會「同情」弱國，但是不願「支持」無抵抗能力的弱國。

其實，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所採取的「不抵抗主義」，其原先真正的用意，應該只是約束東北軍，在面對關東軍的挑釁時，是儘量的採取迴避的態度，以避免給關東軍找到擴大事端的藉口。但是國民政府沒有想到的是，由於這個名詞不當的演繹與影響，而造成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完全沒有進行守土有責的軍事準備。而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的行動，根本不是軍事挑釁，而是軍事侵略與佔領，在這種情形下，若還是繼續的採取不抵抗主義，當然就會為中國帶來了日本後續的侵略災難，真是一念運作之差，造成無窮的後患。

因此假如在當時，蔣介石與張學良得知東北危機蘊釀與蔓延之前，就主動積極的採取各種預防措施，而不是一味的重申不抵抗，那麼九一八事變的結果，應該會有很不一樣的發展。當時蔣介石與張學良應該向政府相關部門，以及守土有責的東北軍，清楚的解釋不抵抗主義的用意以及適用的範圍，只是約束東北軍，不要輕易的與關東軍挑釁而爆發軍事衝突，但是國民政府與東北軍，仍然必須要應該有萬一面臨侵略時，各種軍事、政治與外交

¹日本是一個「崇拜」力量、鄙視弱者的民族，中國的不抵抗，被視為懦弱的表象，反而更讓日本得寸進尺。

的應變準備。

張學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經得到事變迫在眼前的情報，因此張學良可以搶先將東北政府重要的財政儲備與軍事物資，全都調離關東軍的南滿鐵路勢力範圍附近，運往黑龍江、遼西甚至是關內（在九一八事變中，東北所有的財政儲備與軍事建設物資，幾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時做好必要時的軍事反擊與游擊的作戰準備（包括詳細參謀作業的各種應戰計劃，以及游擊作戰基地的縱深佈署），並且動員與組織民眾，準備反制日本對於東北可能的侵略佔領行動。

而在九月，張學良更可考慮抽調部分的東北軍精銳，回防東北，這樣就不至於在關東軍發動攻擊之時，輕易的讓敵人大獲全勝。國民政府也可以事先與各國磋商，日本對中國東北可能的侵略問題，會嚴重的妨礙到各國在中國的利益，這樣各國政府會對日本施加壓力。國民政府也必須主動先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的連繫與交涉，這樣可以增加日本政府與軍部對於關東軍行動的約束能力。而在整編晉軍與西北軍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為由，調度一部分素質較優，民族主義較強的部隊出關支援東北軍對抗關東軍。這樣公開處理與應變，將會讓關東軍的陰謀行動完全曝光，也就會受到更多的壓力與牽制。

9.4 歷史的後見之明

假如當時的東北軍有了積極的預防措施與應變計畫，同時軍政主管不抱消極的失敗主義心理，而都能設法的克盡職守，一旦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東北軍民，無論上下，早已有了應變與迎戰的準備，一方面能夠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瀋陽，進行軍民一體合作的肉搏巷戰（有如一二八事變的上海作戰），同時動員整個東北的軍隊與民眾，依照事先的計劃，沿南滿鐵路進行全線的攻擊與破壞，造成兵力單薄的關東軍首尾無法兼顧，到處遇到有計畫的激烈反抗與破壞，根本無法一擊得手。在這種情形下，關東軍不但無法獲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戰果，反而到處受到圍攻而連連告急，由於日本政府與軍部根本沒有對中國作戰的計劃與準備，那麼九一八事變就有可能成為關東軍失敗的「蠢動」，而會遭到東京軍部以及政府的嚴厲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關東軍遭到強烈的抵抗，無法一擊成功的佔領東北，

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決定增兵支持關東軍，但由於東北的軍方與民眾，已有長期游擊戰的準備，所以日本軍隊，還是要面對有組織與計劃的全民作戰反制，這個代價之大，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尋求外交解決。而最糟的狀況是最後一切的作戰都失敗了，但是有計畫與有準備的反抗，會給日本帶來相當嚴重的元氣消耗，也給中國帶來更多的民族主義精神振奮，以及更多的團結與抵抗時間的準備。

雖然，以中國當時的國力與局勢而言，中國當然不能在九一八事變時，因為維護東北的領土與主權，就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但有規劃的局部抵抗，則是必須與應有的做為，由於蔣介石與張學良，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危機的整體性，因此採取了過度「不抵抗主義」的不當對策，而讓日本關東軍以最低的代價攻佔中國東北，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凶焰，最後造成中日兩國以及後來全球的軍事危機，實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遺憾的。

當然這種歷史的後見之明，對於當時的蔣介石與張學良（包括當時的黨國元老以及各個派系與地方領袖在內）而言，或許都是有些強人所難了。因為當時領導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事實上只是一個中國東南地區的領袖而已，國民政府又經常處在戰亂不息與自顧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難能夠深入思考東北的戰略佈局。而張學良則只是軍閥子弟出身，年紀又輕，當時他能夠為國家統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緣故，帶兵進入華北，就已經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讓張學良負起對抗世界一級強權軍力的責任，幾乎是太重的責任。當然假如張學良沒有率兵入關，協助國民政府完成統一中國，也許他就不得直接面對東北局勢，而有較佳的反制佈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實力為後盾

另外一個歷史的疑問是，假如當時的國民政府，不顧民意的反日情緒壓力，堅持直接與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東北的淪陷？當事變爆發之時的日本政府，的確是「不同意」關東軍武力的佔領中國東北，日本的軍部也想約束關東軍犯上的軍事行動，也許國民政府直接與日本政府交涉，在東北的一些利益上，對日本讓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牽制關東軍行動的籌碼，使得中國東北不至於淪陷。

這在蔣介石後來的重要文獻《敵乎？友乎？》當中，於某種程度上承認

了過失，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應該抗拒民氣反彈的壓力，勇於承擔決策責任，而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交涉，讓日本政府的溫和派有力量壓抑關東軍，或許能夠挽回東北之失地。由於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行動完全是訴之國聯，使得當時的日本外相幣原與後來的首相犬養毅，無法以外交來解決九一八事變的歷史危機。

但是就事實的發展而言，恐怕中日雙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機率仍然等於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國民政府根本無法抵擋國內激動民意的壓力，以及各種不同政治與軍事集團的挑戰，這些政治壓力的主張是，日本不撤軍，國民政府就不能與日本進行交涉（事實上後來的粵派國民政府，是企圖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交涉，但是還是失敗）。

同時，日本政府也無法與國民政府達成任何協議，而壓迫關東軍退出所佔領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關東軍在獲得大勝之後，日皇、軍部與民意，都已經轉向支持獲得大勝的關東軍，造成日本政府的運作危機。老實說，當時日本政府比南京國民政府還要岌岌可危。除非是關東軍在東北遭到軍事佔領的嚴重困難（有如一二八事變的日軍久戰無功），或是關東軍遭到重大的傷亡損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轉，日本政府還可能有機會出面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而這個可能性的前題是，國民政府與東北軍，都有抵抗的準備與反擊，以及蘇聯擺出強硬的軍事姿態，才能奏效。而只是單純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變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以及後續的處理方式，都超過當時日本與中國政府的預估與控制，日本政府無法控制軍部，軍部無法控制關東軍，關東軍無法控制少壯派軍官。中國政府與東北軍，則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範圍，在不抵抗、就地抵抗與全面戰爭之間，無法妥當地拿捏，因此當關東軍發起軍事行動時，沒有完整的軍事反擊與外交準備。這對於當時處在疲於奔命的蔣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卻重責難當的張學良而言，也許都超過他們當時的能力所及（我們可以充分瞭解這一點）。但是假如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我們是在此強調，其實當弱國面對強權侵略的時候，並非完全不能採取有利於國家的積極對策。

9.6 東北義勇軍吹響了民族復興的號角

馬占山率領的東北義勇軍，不僅於江橋力挫偽軍與關東軍的兵鋒，其自發性的抗敵英勇行動，更是打響了中國民族主義復興的發展心聲——雖然在東北風起雲湧的各種抗日作戰，最後還是暫時地失敗了，但是卻已經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力量，開始復甦，不再像清朝末年那樣，東北人民任由俄國與日本軍隊的鐵蹄，在這塊白山黑水的富饒大地上予取予求。雖然當時的中國，還是無法以國家整體的力量來對抗敵人的侵略，但是人民卻開始自動自發地進行浴血抗戰，廣大的中國人民則是自動地捐輸與參軍，展現出改變中國歷史分裂與衰亡的新動力。這些發展開始影響到中國各個階層，甚至使得中國內部割據的派系力量，能在六年之後，克服一切的困難，而凝成一致抗日的共識。

接著在一二八事變上，十九路軍的自動抗敵、中央軍立刻跟進支援，是可以發現國民政府反應的進步。在上海進行局部的浴血抗敵，是當時能夠進行的最佳策略，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一致的抗日共識與力量，與日本正式全面作戰。若率然與日本宣戰，只有亡國一途。但是絕對也不能再採取不抵抗主義，任由日本的毫無道理地侵略中國，這不僅會導至民心士氣的土崩瓦解，更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援。所以在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表現，當然永遠值得中國人紀念與尊重。但是後來十九路軍，卻不幸陷入一種「現在就跟日本拼了」的情結之中，而從此長遠地影響到中國的政治與民意——許多人不但瞭解當時蔣介石迴避立刻決戰、全力建軍備戰的努力，反把近乎十惡不赦的「親日」、「漢奸」等標籤貼在蔣的身上。所幸蔣介石仍然能夠把持得住中國必須進行全面準備抗戰的大政方針，他實在是比同一時期日本的軍政領袖，控制不住關東軍的冒進（反而被牽著鼻子走），更為高明的多。

9.7 蘇聯幕後的謀略與野心

九一八事變的發展，之所以最終會任由關東軍支配中日歷史衝突發展的方向，另外有一個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蘇聯的保持低調，放任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進行佔領的軍事行動（這是我們已經再三強調的重點）。因為當時的

中國與日本政府都認為，蘇聯絕對不會坐視日本危及到蘇聯在中國「北滿」的利益，與在西伯利亞東部的戰略安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就是為此原因爆發）。但是史達林卻有更為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他寧可暫時地犧牲蘇聯在北滿的利益給日本，而鼓勵日本放手侵略中國，使得中日爆發歷史決戰，這樣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間的兩敗俱傷，蘇聯就可以兩面撿便宜，一方面可以大舉侵略殘破的中國西北與東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戰力疲憊空虛之際給日軍一次痛擊，好報俄國曾敗在日本手下的歷史性恥辱。

蘇聯意外的不干預，造成日軍參謀本部的威信大失，關東軍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軍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國政府不抵抗主義的慘敗。假如當時蘇聯擺出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已經嚴重的威脅到蘇聯在遠東的利益，為此蘇聯甚至可能不惜一戰（日本參謀本部就是為了擔心關東軍進攻北滿，而引起蘇聯的軍事干預，因此才動用臨參命不准關東軍進攻黑龍江的）。

事實上，只要蘇聯擺出干預的姿態，那麼關東軍就不可能控制中國整個的東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東北，那麼關東軍在面對中國在東北不斷的反抗之下，最後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國政府以東北的某些利益給日本，以交換關東軍放棄對中國東北的全面佔領，因為當時關東軍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沒有進行戰爭的準備與能力。

9.8 九一八事變的內涵與影響

總之，從大歷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變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國進入復興的一個歷史分水嶺，關東軍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軍閥終於開始主導了日本的命運；而中國人民卻因此覺醒，導致各種分崩離析力量的開始整合，最後形成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從此走上對抗日本強權侵略的道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處於十八世紀形態、全方位落後的弱國，卻要對抗日本這個二十世紀的先進強國——但中國卻以絕不屈服、義無反顧的民族氣概，爲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與全人類的自由與民主，並做出了最大與最早的犧牲和奮鬥，與最不朽的歷史貢獻²，而這一切都從九一八事變開始！

²中國可以在世界歷史中昂首闊步，她爲人類在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是所有中國人要先清楚瞭解這段歷史的真相才行！

日本舉國上下，因為九一八事變所獲得的意外大勝，而開始陷入了軍國主義新的狂熱之中，日本的軍部，更是有如鯊魚聞到血腥一般進入失控狀態，這開始影響到日本政府的領導人，跟著少壯派軍方的政策前進，不顧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孤立，把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不惜以戰爭的代價，開始逐一加以實現。

日本是具有歷史性自卑情結的民族，幾千年來，它渴望著超越中國而成爲世界級的強權。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因爲幾場戰爭暫時勝利的刺激，而發展爲狂妄自大的集體偏激心態。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強者，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的順利成功後，就成爲日本人民崇拜的對象，最後造成關東軍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軍部、甚至日皇，去跟隨他們大膽的擴張與侵略，最終不能自拔的釀成歷史的大禍。

整個歷史的悲劇是，中國方面越是委屈求全、百般遷就，國際社會越是採取綏靖主義，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發不可收拾。日本就這樣貪得無厭地步步進逼，直到迫使中國最終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挺身與日本進行一場強弱懸殊的自衛抗戰。中國唯一的力量，是來自民族主義的意志，不畏失敗與犧牲，一直堅持抗戰到底，最後終於贏得了勝利！

熱河與長城之戰

第四軍團東北軍的萬福麟部，從熱河南部退到長城防線之後，奉命堅守喜峰口，以待西北軍宋哲元部的二十九軍增援接防。東北軍在日軍猛烈的攻擊下，傷亡極其嚴重，但給予了宋哲元部一個緩衝的時間。二十九軍在三月七日抵達喜峰口陣地，即刻遭到日軍的猛攻，於是宋哲元利用喜峰口複雜的地形，大膽抽調兵力，從側面夜襲日軍，這是剛攻佔喜峰口高地的日軍，根本沒有想到的華軍作戰方式——竟然敢從側面發動夜襲，而且是用短兵肉搏作戰。在近身的肉搏戰中，日軍優勢火力是無從發揮，反而是西北軍的大刀比日軍的刺刀管用，所以造成日軍震撼性的損失，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接著上陣的西北軍劉汝明部，也在喜峰口西邊的羅文峪防守戰中，對日軍發動成功的逆襲，造成日軍嚴重的傷亡。

日本的大陸政策，一直是把經營滿、蒙，視為一體的。因此關東軍在導演設立滿洲國之後，就把內蒙古東部、長城以北與東北連接的高原地區（當時為熱河省），當成控制東北的戰略必爭之地。由於當時的蘇聯已經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國的外蒙古，因此紅軍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脅到滿洲國的左翼戰略安全。因此關東軍認為，只有同時控制熱河高原，才能為滿

洲國，增加戰略腹地的安全空間：日軍一方面可以阻斷中國經熱河地帶，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通道，一方面日軍在此地區，居高臨下地威脅華北的戰略、政治與經濟重鎮北平與天津，以及為日本進一步製造「蒙古國」與「華北國」，建立發展的橋頭堡。

10.1 東北義勇軍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關東軍一手導演的滿洲國成立之時，日本就已經公開的把熱河地區劃入滿洲國的領土之中——這也等於日本公開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國的目標，必然就是熱河。

而剛好在當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熱河東部又爆發了「石本權四郎事件」，石本是替關東軍工作的雇員，帶有關東軍與熱河軍閥之間的聯絡任務，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熱河東部抗日民團的搜捕。此事件當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關東軍，立刻興師問罪，發動部隊攻擊熱河東部的朝陽，並且使用空軍飛機轟炸主要的熱河城鎮，關東軍大有立刻準備進軍熱河的姿態，整個華北局勢也隨之告急。

不過當時的日本關東軍，要想進一步的侵略熱河，還是遭到實際的困難考驗，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個東北的局勢。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的侵略激起了東北人民民族主義的反抗，自從馬占山率部反擊日軍後，東北人民不願作日本統治下的漢奸與奴才，開始自動自發的組織各種各式的義勇軍，運用自己能夠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滿洲國成立之時起，中國東北的抗日義勇軍，更是風起雲湧般的發展，在整個中國東北——從遼東半島到黑龍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戰。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發展到最為強大的時刻，當時接受指揮與支援的義勇軍團體就有四十九個之多，總人數約在三十多萬人左右。

雖然這些抗日義勇軍，多半互不統屬，更無現代化作戰的裝備與訓練，但是他們只是憑藉一腔愛國的熱血，抱持絕對不願接受異國統治的決心，就這樣自動自發的組織起來，反抗當時世界級的強權；他們不但在鄉間發動游擊作戰，更幾度圍攻瀋陽、長春、通化、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東北主要軍政中心，也經常切斷南滿以及其他的主要鐵路幹線，當時覺醒與憤怒的中國人民，沒有袖手旁觀而讓東北義勇軍孤軍奮戰，他們竭盡所能的慷慨

捐輸，也同時不斷利用機會傳播中國民族主義，使得中國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開始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之中發芽生長。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場比較親華的首相犬養毅，竟然被日軍的少壯派軍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殺，造成日本統治階層的震驚。從此以後的日本政府領袖，無人再敢設法與中國進行正常的外交關係運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國的不歸路。當時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態發展嚴重，因此在協商之後，決定奏請日皇，召日本海軍宿將齋藤實組閣，當時日本元老重臣的構想是，日本已經開始走上侵略中國的軍事發展，因此需要由軍方將領組閣，以對抗各種內外的壓力，而選擇海軍將領擔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軍與陸軍之間的矛盾，能夠牽制逐漸失控的陸軍力量。

雖然關東軍自己發動攻佔東北的軍事行動，令日本軍國主義大為振奮，但是由於關東軍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經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滿，以及軍部與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雖然統領了大量增援的日軍，但是卻無法迅速、有效的壓制東北抗日義勇軍之發展，而造成日軍在中國東北面臨陷入泥淖戰的危機。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與軍部協商，決定改組關東軍，一方面要控制關東軍那種目無軍令的強悍作風，以免政策稍有不合關東軍構想的地方，就會遭到關東軍斷然反抗——不是先斬後奏的準兵變行動，就是發動刺殺與政變的自殺式行動；一方面更是要增加與強化關東軍的作戰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反抗，並為可能的日俄軍事衝突，進行戰略準備。

10.2 關東軍改組後武藤信義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與軍方共同協商之後，由日本軍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組關東軍司令部，加強軍部對於關東軍行動的直接控制，同時把經略滿洲國的所有軍事、行政與經濟大權，都直接付與關東軍司令部掌控，並且撤換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而改派在日軍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賴的武藤信義大將，出任改組之後的關東軍司令官。這時關東軍所控制的部隊，已經多達五個師團與兩個旅團，加上各種特種部隊以及空軍，佔日本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軍事力量，這是日本自從日俄戰爭以來，最大的國外駐軍行動，自然也消耗日本極大的國力。

武滕信義不愧是日軍的王牌將領，他接任關東軍司令官之後，開始全力集中運用優勢兵力，以強勢的火力與新式的戰技，加上殘忍絕倫的屠殺手法，在滿洲國中，實施先南後北，有秩序與方略的掃蕩作戰，因而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產生非常沈重的打擊，由於義勇軍在沒有一致的指揮系統，沒有補給的後勤網路，更又沒有足以攻堅的火力，以及現代化的作戰技能（東北的義勇軍也不了解全民總體戰的運作方式），當然不是改組之後的關東軍對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在武器槍彈用完，人員死傷慘重的狀況下，逐一的被日軍擊敗，而有少部分退到蘇聯所控制的西伯利亞地區，然後輾轉的經由新疆等地回國，繼續的參與抗日。

然而武滕信義發現，關東軍要想完全肅清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就要封鎖中國關內經過熱河以及山海關支援東北義勇軍後勤的路線。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滕就下令關東軍，始把作戰目標鎖定熱河。

10.3 中國再度爆發內訌

反觀中國方面，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於正在進行統一工作的國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個超級的政治風暴衝擊，當時的國民政府，正苦於內戰的分裂，以及財政的耗竭，那裡能夠有力量迎戰日本這個世界第一等強權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給予各地割據力量一個反抗中央非常有力的藉口，就是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統一的作戰，而將力量轉用於抗日。

不過以事實而言，這個口號非常的動聽，但是根本不切實際——因為假如中國基本的分裂與山頭仍然存在，沒有一個共同與互信的國家共識，以及統一的軍政與軍令系統，她是不可能進行全面性作戰的，而只是一個混雜拼湊的「烏合之眾」而已，經不起現代化作戰的嚴厲考驗。因此，要想抗日的前提是加速統一，而非停止統一而接受各山頭的拼湊組合。

事實上，當時中國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夠領導四分五裂的中國，來對抗日本，粵派的國民政府，當家才不到一個半月，又得不到各個派系的支持，差點沒把整個國家給搞垮，在一二八事變的危機壓力之下，只有緊急把燙手山芋，再度的丟還給蔣介石。蔣介石一面設法勉強與日本達成上海停戰協議，一面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仍然有許多派系拒絕參加）以重新組成政府的領導階層。結果是邀請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由蔣、汪合作，共同設法面

對日本的侵略。

由於國際社會無力主持正義與和平，西方強權更是抱持著怯戰與畏戰的心理，因此根本無法牽制與約束日本對於中國一再的侵略，而連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東京軍部的臉色行事，所以國民政府企圖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來維持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當時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是處在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狀態，對日本的侵略，只有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無法阻止日本的擴大侵略，交涉也無法達到合理的解決，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長中日決戰的時間，能夠給予中國多一些抗日的準備機會。

10.4 張學良面對著危機四伏的處境

而當時直接面對日本侵略熱河壓力的，還是東北軍的負責人張學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會被關東軍控制，而直接佔領東北。因為張學良原先一直認為，只要中國能夠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中國在東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讓步，日本政府終於能夠約束關東軍，而把東北的主權還給中國，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設法與日本政府接觸，同時儘量的不要刺激關東軍，避免給關東軍有生事拖延的藉口，直到犬養毅首相被刺之後，張學良才清楚的認識到，關東軍實際上已經主導日本的大政方針，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是不可能改變的既成事實。

在張學良等待日本局勢澄清之時，政治現實的壓力，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湧到，東北軍失去了發展的根據地，立刻就陷入危機四伏的處境，少了東北的資源，張學良就沒有足夠的糧餉來支持他所統御的部隊，這就成為華北軍政局勢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而東北軍正處在晉軍與西北軍夾擊的危局之間，這兩支華北在地的部隊，不會忘記東北軍入關而結束了他們反抗國民政府的「歷史大業」，現在輪到他們等機會收拾東北軍了。因此張學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華北軍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個東北軍立刻就會粉身碎骨的葬身在華北。

而同時張學良又不能不增加開支，來照應流亡在華北的東北軍、政部屬以及青年學生，當時單是流亡在北平的東北大學青年，就多達數萬人（東北大學成為全國最大的一所臨時大學），這些經費的主要開支，全靠「少

帥」去設法張羅。張學良又幕後主持與支援在北平設立的「東北抗日救國總會」，以及「東北抗日義勇軍總部」，以支援、照顧在東北舊部的抗日活動（這些工作都必須由張設法撥出經費與人員來維持）。

這時候，與張學良有著新仇與舊恨的汪精衛，開始利用機會對張展開報復。因為汪精衛不會忘記少帥的派兵入關，打破了他一手策劃的「擴大會議派」反蔣的大計，汪更不會接納一個地方軍閥的兒子，竟然一夜之間，越過自己等黨國大老，而成爲國民政府的第二號領導人。汪精衛於是企圖安排自己的人馬，插手支援東北抗日救國組織的工作，當然被張學良識破而一口拒絕了，汪又設法要求國民政府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派遣東北軍進入熱河佈防，以對抗日軍的可能入侵，而張學良對於汪精衛是早有防範之心，當然認爲這是汪精衛的政治陷阱，更不滿汪精衛插手華北的軍事。

而當時的張學良，的確陷在難以自處的徬徨時刻，假如東北軍奮起抗日，即使全部犧牲也是不可能打敗日軍、收復失地，而只會造成國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機；假如只求自保，又無法面對輿情的壓力與歷史的責任，因此張學良越發的陷入依賴毒品來逃避現實，也更難打起精神，主動積極面對挑戰。當時張學良的體力衰弱，已經到了無法主持一次正規會議的狀況，而經常需要中斷會議，進行嗎啡的注射。此時東北軍的缺乏支援與補給，更突顯出改組後關東軍之精壯，就領導的層面而言，張學良當然更不是武藤信義的對手了。

10.5 汪精衛離職所引發的政治風暴

雖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時，張學良一度設法振作，準備調兵遣將，對抗日軍進逼熱河的軍事壓力。但是這些還沒有健全國家民族觀念的地方部隊，假如要想指揮得動他們，最爲重要的是，就是能否拿到足夠的糧餉，而當時張學良在財政方面，卻最是捉襟見肘，他想安撫東北軍都有困難（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一律減俸二〇%，表面上是紀念國恥的警惕，事實上，也是財政的困難），要想調動其他原本與他有仇的部隊，更是談何容易。因此華北部隊中各種不安與不穩的現象，就紛紛的出現了。

這時候，長期負責熱河軍政大權的是老牌軍閥湯玉麟，這個軍閥是當年與張作霖稱兄道弟的「綠林」人物，長於權力手腕的鬥爭，毫無國家民族觀

念，只知縱容其家族暴虐橫行，進行各種的搜刮聚斂，當地人民多有被「湯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熱河的軍政狀況，非常的複雜多變。

在軍閥的輩分關係上，張學良算是其後生晚輩，雖然張學良明知要保熱河，就必須除去湯玉麟，但是湯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險交易」，他與關東軍以及滿州國，明的、暗的都有掛勾。湯的一些部屬，也早就有投靠關東軍，做好內應準備的。因此國民政府與張學良都曾設法要調動湯玉麟，但是又十分顧忌萬一弄不好湯會投日，最後在老前輩的張作相的調解下，張學良接受了暫時拉攏湯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熱河的力量，來做為日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緩衝。

當時張學良還天真的認為，既然中央一再的表示，非常重視熱河的防務，會優先支援東北軍在熱河抗敵的各種需要。因此張學良就在利用調兵遣將的佈防之際，在七月底，向國民政府開了一張防守熱河，動員作戰所需的後勤帳單，希望政府能夠增加軍費，因為張學良失去東北的資源，要想維持現有的軍力，已經明顯的遭到困難，假如要想接下熱河防務，更是力不從心。

不料這正惹怒了汪精衛一肚子的怒火。汪原來就覺得他管不了張學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國民黨的兩廣系統，對於東北軍系統有著極大的成見與反感，認為張學良支持蔣介石，破壞了他們反蔣的計劃）。事實上，當時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根本也是一個責任極重的苦差事，外交與財政的問題可以說是最為嚴重，幾乎天天都要「拉警報」。當時汪正為了剿共的經費張羅不出，而與蔣介石發生磨擦，因此汪乾脆利用這個機會，借題發揮的先大鬧一番而求去。

同時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的輿論一度盛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賴¹」的風潮，許多學者文人，個個都成為軍事與政治的專家，每天報紙上都有這些人物的高調之論。當時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防守熱河，痛擊日軍，是國防上的唯一選擇。他們一直嚴詞批評國民政府與張學良的懦弱怯戰，不能像十九路軍一樣奮起「打敗」日軍（國民政府當然不敢明講十九路軍終於是被日軍「打敗」的事實）。因此張學良遲遲沒有出兵熱河，就成為貽誤戎機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殺的地步²。

¹賴當耍賴、賴皮講。

²事實上，當時不負責任之文人論政的風氣是，抗日是自己不必出錢，自己子弟不用當兵，但是天天指揮政府去抗日，罵自己人內行，打日本人不敢。好像出兵不要糧餉，作戰不要考慮

因此，汪精衛在八月六日，突然公開發表措辭強烈的電文，痛責張學良不知守土有責，只知藉機要錢要糧的聚斂無度，因此要求張學良辭職以謝國人，自己也同時去職，以表示非為權力鬥爭。這通政治鬥爭的電報，立刻得到大量輿論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責張學良的陣營，當然引爆了國民政府內部嚴重的政潮，汪精衛離職使得國民政府也跟著總辭。張學良雖然試圖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是只更為露出他調度的困難，以及不受諒解的窘境，因此張學良也跟著宣佈辭職，這樣在大敵當前之際，南京與北平，又陷入了嚴重的政治鬥爭之中，軍事運作當然形同癱瘓。

這時候，只有靠蔣介石出來收拾殘局，汪精衛原本就是幹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堅，蔣介石只有請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但張學良的辭職，立刻引起華北各個軍人派系的強烈反彈，他們既不滿汪精衛的干預華北軍事，更擔心張學良去職會使華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華北各軍的將領，由宋哲元領銜發出支持張學良的通電，蔣介石只有改組華北軍政組織，由蔣介石自己出任軍委會華北軍分會主任，但是蔣介石藉口無暇分身就任，仍請張學良代理。經過這番的政治波折，中國軍隊根本沒有辦法進行熱河的佈防，但是關東軍已經在東北，完成大部分的掃蕩義勇軍作戰任務，而開始把軍力南移熱河與遼西了。

10.6 實力懸殊的熱河之戰

就整個戰略與軍力的佈署而言，熱河之戰，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戰，就已經可以看出結局了。武滕信義大將所統領的關東軍精銳，兵精糧足，士氣高昂，對於熱河正進行有計劃與大膽果決的作戰準備，並且更積極進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漢奸軍閥做為內應，因此日軍清楚掌握了熱河軍、政局勢的情報。

而張學良雖然在形式上統領華北各軍應戰，但是這些部隊之間本有異心，更是還沒有建立真正的國家民族共識，加上餉彈不足，訓練不夠，後勤缺乏，號令不一，參戰各軍主要的關切焦點，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與利益，對於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場與打算，這種非現代化又非國家化的雜牌軍，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張學良所能調動自如的。不過在當時的華北，戰略佈署似的。

除了張學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統帥，而蔣介石以及中央軍仍然在陷在華中與華南的幾個戰場上，根本無法分身。

雖然在軍力對比上是如此的悲觀，不過在輿論與現實的壓力下，國民政府對於熱河的防守，仍然有著期待，由於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先前對於東北與日本的局勢發生誤判，而在東北採取了不抵抗主義，使得東北近乎沒有抵抗下就淪陷，因此造成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決策性錯誤，因此，國民政府必須要在熱河，有些奮戰的表現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變中，中國守軍英勇作戰的表現，又讓當時急切尋找好消息的輿論覺得，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進行正面作戰，並非完全不可能獲得理想的戰果。這些紙上的「軍事專家」，以及靠煽動民意為奧援的政客們，製造出一種錯覺，就是只要逼國民政府立刻在熱河與日軍作戰，中國就是不贏，大概也輸不到哪去。

因此雖然蔣介石了解，此時的中國仍然不能因為熱河的領土保衛戰，而與日本進行正式的決戰，但是在熱河，至少要打一場犧牲慘烈的抵抗戰，以減輕民意的壓力。所以當日軍開始有意佈署攻擊熱河之時，蔣介石就三番兩次的急電張學良，要張學良設法調兵遣將，積極的準備進行熱河之戰，必要時中央決定增援六個師的部隊，支援熱河保衛戰。蔣介石實在希望張學良能在熱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為。

由於張學良不戰而丟掉東北，不但軍政資源大部盡失，且東北軍的威望與軍心都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因此更增加張學良調動在華北的各個山頭部隊作戰的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張學良那裡敢再歡迎中央軍的加入，而破壞華北各個軍系之間的平衡。何況到時候中央軍會聽誰的命令，才是一個更大問題？假如張學良指揮不動中央軍，那麼東北軍在華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張學良就極力婉謝中央軍北調，卻希望中央給與熱河佈防充足的後勤與軍費的支持，但這是國民政府無力也不願辦到的。

張學良面對強敵壓境與後勤支援不足的困境，一種疑懼與保本的心理，就左右著他迎戰的決策。同時張學良對於熱河局勢未來的發展，也產生錯誤的判斷：由於關東軍並未藉著石本事件，擴大對熱河的進攻，同時關東軍也在私下加強遊說東北的部分將領，要求他們設法尋求中立或是靠攏，所以張學良認為，日軍仍忙於對付東北抗日義勇軍，進攻熱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顧忌國際社會的壓力，因此目前應有一段觀望與緩衝的時間；而且中國方面的部隊既沒有勝算的把握，日軍暫時又無力威脅熱河，那麼目前

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動的刺激關東軍，因此倒不如暫時留著兩面派的湯玉麟，正好可以做為東北軍與關東軍之間的緩衝。因為一旦中國的部隊進入熱河，不但會有嚴重的後勤問題，也會改變目前的戰略平衡，那麼關東軍就不可能坐視中國軍隊在熱河佈防，這樣必然會提早引爆雙方的直接衝突。因此張學良一直設法在拖延派兵進入熱河的時間。

不過關東軍對於奪取熱河，根本是有關佔領滿蒙成敗的戰略設計，因此這已經是日本政府、軍部以及關東軍共同的政策目標，只待適當時機來臨，就必然會動手。在關東軍開始調兵遣將、準備佈署進攻熱河之時，其駐紮在山海關外圍的部隊，卻搶先一步行動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間，日本榆關鐵路守備隊隊長落合甚太郎少佐，藉口關東軍受到中國軍隊的手榴彈攻擊，對中國守軍提出了無理的要求，在要求不遂的情況下，於一月二日對中國守軍發動軍事攻擊。

由於當時張學良擔心東北軍與關東軍會在山海關發生直接的衝突，因此只佈防極少的部隊在山海關陣地，名義上是一個團，實際是只有兩個營而已。而根據辛丑和約的規定，中國從山海關經天津到北平的鐵路沿線，是不准建築防線，與增加駐軍的。日軍的攻擊在遭到中國守軍的反擊之後，關東軍立刻就調動第八師團部隊，以及日本空軍與在渤海的軍艦，以強大的聯合火網，猛攻戍守山海關陣地的東北軍。在兵力與火力懸殊的情形下，東北軍慘烈地抵抗日軍的攻勢，但卻無法扭轉敵眾我寡的劣勢，山海關以及附近的戰略陣地，就都被日軍佔領了，這使得中國在熱河的防線，出現了側翼洞開的危急狀況。

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武藤信義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軍不能迅速的奪取熱河，而將中國軍隊逼到長城以南，那麼東北的義勇軍，就會繼續有後援而反抗滿洲國與關東軍；更為重要的是，當假想敵蘇聯發動攻擊在東北的日本部隊時，日軍需要有更為廣大的戰略縱深進行防衛反擊。不過在當時，東京的參謀本部仍然認為，關東軍進攻熱河的時間應該適當的延後，因此特別派遣總務長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東北，要求關東軍謹慎從事。但是武藤堅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膽的出敵不意，由於武藤在日軍中崇高的威望與地位，因此參謀本部也就不再反對武藤的用兵計劃，轉而支持關東軍在一九三三年年初進軍熱河作戰計劃。

這時的日皇裕仁，已經沈湎在日本帝國擴大版圖，以及皇軍神威無敵的

熱情之中，對於武滕的進軍熱河計劃，當然是非常的高興與贊成，因此立刻頒佈敕命，允許關東軍進兵熱河，成爲日本正式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作戰敕令³。武滕大將在奉命之後，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連發三道進軍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師團與第十四與三十三混成旅團，加上所招降的滿洲國的漢奸部隊，總計八萬多人，果斷的向熱河發動三路攻擊。不過當時武滕所奉的熱河作戰敕令，是只准關東軍在熱河地區之內進行作戰，敕令特別規定，關東軍不得越過長城防線，進入中國的關內，以免國際社會對於日本造成過多的壓力。但是武滕的熱河作戰計劃，卻把作戰重心，放在攻擊長城與威脅平、津。

武滕的熱河作戰計劃大體如下，他下令第六師團與滿洲國的漢奸部隊，一面招安，一面奔襲攻佔熱河北與東部，在得手之後，然後立刻向南旋轉直切中國軍隊的長城防線。而第八師團與兩個混成旅團，則是直接先進攻熱河南部的中國守軍，然後就地南攻長城防線。由於日軍的作戰訓練與裝備，都是爲了在西伯利亞與俄軍進行野戰所設定的，因此非常適合在冬季酷寒的關外作戰，同時日軍又首次使用空軍配合作戰，充分發揮了日軍火力與機動力的專長。而中國的守軍，卻只是由軍閥改編的地方部隊，根本沒有大戰線聯合作戰的能力、裝備或經驗，更是根本沒有見過飛機的火力攻擊了。加上後勤不足與政治鬥爭的問題，華軍沒有提早進入熱河進行陣地佈防，倉促之間進入熱河，當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這時關東軍在奉命進入熱河之後，卻未立刻發動攻勢，反而在進行周密的佈署，以及準備後勤的支援。這種「緩進急戰」的戰法，迷惑了中國守軍的判斷，以爲日軍兵力不足，不習慣在塞北高原冬季作戰，需要集結更多的兵力才能發動真正的攻勢⁴，因此國民政府也大張旗鼓的發表保衛熱河宣言。

當時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特別熱心支援熱河作戰，在二月十八日，與張學良等人親自前往熱河勞軍，聲明國民政府一定會在熱河與日軍打到底，而且慷慨的帶去一筆軍費，甚至派出自己的親軍稅警團前往熱河。國民政府擺出一副決心迎戰的氣勢，宣稱可以在熱河有效防守三個月以上，因此當時中

³這回連中國是否「挑釁」與「威脅」日本的藉口都免了！直到今天，只要中國人繼續對抗日戰爭歷史的全貌一知半解，日本就繼續教導它的下一代，日軍當時只是「進出」中國而已。

⁴當時南京軍委會估計，日軍需要在熱河投入六個師團，才能順利的進行作戰，如此勢必要再從本土增兵。

國的輿論大都認為，由一二八上海作戰以及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戰績來看，中日之間的戰力「其實」相差有限，所以對於熱河之戰，抱持了很樂觀的期待（殊不知中日兩軍的戰力，若在真正的野戰戰場上對決，還是差得太遠

這時在各方面壓力之下的張學良也打起精神，經過幾番的討價還價之後，他將華北的各軍，編組成八個軍團迎戰日軍。由於張學良認為熱河作戰只是一種苦肉計，以犧牲來換取同情與時間，根本就不認為華北的軍隊能夠守住熱河，因此張學良仍然將各軍的主力放在保衛平津：第一軍團于學忠與第二軍團商震鎮守灤東，第三軍團宋哲元防衛通州，第四軍團萬福麟才進入熱河南部佈防，第五軍團就是湯玉麟的部隊，第六軍團由與湯有關係的東北軍老前輩張作相，混編東北軍與支援的義勇軍，防守熱河中部，第七軍團傅作義在察哈爾待命，第八軍團則是由中央軍的楊杰在北平做為預備軍力。

整個華軍的人數雖多達二十萬人，但是戰力與火力都嚴重不足，更是沒有統一的指揮與足夠的後勤支援。張學良知道反正熱河是絕對守不住的，他的作戰安排重點是要華軍能夠打一場還算過得去的防守作戰，好對輿論有個交待，因此大軍不宜深入熱河佈防，以免受到日軍的切斷與圍殲，而以主力保住平津。就華軍的兵力佈局而言，是南重北輕，主力都在河北邊界而非熱河。

10.7 長城浴血抗戰

在這個時候，關東軍已經靜悄悄的在熱河完成作戰準備，兵力迅速的集中到攻擊位置，在完成了收買湯玉麟部屬的最後交易價碼之後，武滕信義下令在熱河與遼西的關東軍，在二月二十三日發動全面攻勢。由於熱河人民多年來，不堪湯玉麟的苛政剝削已久，因此在戰爭開始之後，熱河百姓不但不支持華軍進入熱河佈防，反而發動抗暴的民變，造成關內北調的中國部隊，受到民團的攻擊與破壞，難以在時限內完成佈防。而中日兩軍在剛一接戰時，北部戰線的湯玉麟部隊，就立刻變節投降，跟著東部戰線也同樣潰退，因此造成日軍順利地在三天之內，席捲熱河北部與東部，然後立刻分兵三路，直撲熱河省會承德與熱河南部的長城防線。

而指揮第五軍團的湯玉麟，在接到前線戰敗消息之後，立刻動員所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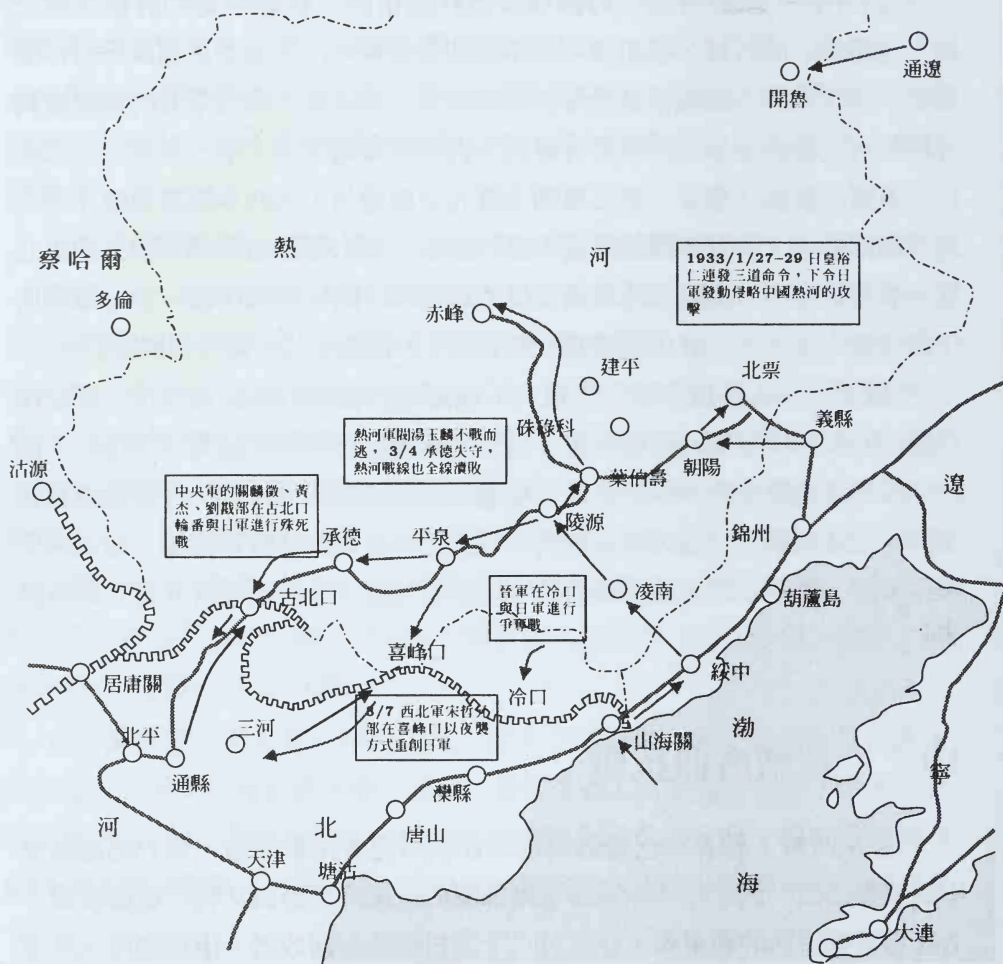


圖 10.1: 熱河長城作戰圖

輸車隊，載運自己的私產與大量的鴉片棄城而逃，造成熱河作戰中國軍隊的防線與士氣全線崩潰；三月四日，日軍僅以一百二十八名輕騎兵長驅直入，就輕取省會承德，至此熱河之戰已陷入全面的混亂之中，參戰各軍只有先求自保。建制比較完整的第四軍團的萬福麟部擔心受到包圍，接戰之後立刻倉惶的撤退到長城防線附近，而混雜編組的第六軍團張作相部，也在壓力之下潰散。在一片的混亂的局勢下，各個立場不同的部隊是否接受日本收買而嘩變的謠言，更是有如風聲鶴唳般的動搖了軍心。

這時候，整個華北已經進入面臨日軍席捲的危機時刻，華北各軍將領以及政治與社會民意領袖，立刻聯名急電蔣介石，要求蔣介石兼程前往北平坐鎮指揮，否則華北局勢勢將糜爛崩潰，北平與天津都可能不守了。

而這時蔣介石在南方也是自顧不暇，他在江西剿共的中央軍也正遭到敗績，根本無法抽調大軍北上，財政更是吃緊到與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鬧翻。但是在接到華北告急的情報之後，蔣介石只有急調二十五師關麟徵，第二師黃杰，第八十三師劉戡，由徐庭瑤指揮，組成第十七軍戰鬥序列，前往北平與長城防線，支撐面臨崩潰的地方山頭部隊。但是由於中國在熱河的雜牌軍守軍，根本不堪一擊的潰敗，激起了全國輿論一面倒的聲討，一股政治風暴已經衝擊到國民政府的整個軍政結構，要求張學良下台負責，成為輿情一致的「共識」。

蔣介石原沒有料到熱河的戰事，會出現如此快速變盤的局面，因此在接到大局出現崩潰的急電之後，於三月九日匆匆的北上抵達保定，他立刻會晤了張學良與華北其他軍政領袖。張學良自知自己無力指揮全局作戰，更無法對於熱河的潰敗做出交待，只有請辭本兼各職，準備轉到上海進行戒毒復健，然後出洋考察。蔣介石立刻接受張學良的辭職，並且指派何應欽負責指揮華北各軍，沿長城防線進行抗日作戰（這時東北軍各部都能識大體，沒有因為張學良的離職而搞出花樣，這以中國當時的地方軍割據狀況而言，是幾乎絕無僅有的表現）。

武藤信義靈活的運用兵力，十天內就輕取熱河之後，立刻決定依照計劃擴大戰果，以乘機為華北分裂，創造有利條件；他也想要痛擊北上增援的中央軍，以為日軍在上海作戰不利，挽回更多的面子。因此武藤規劃的作戰目標重點，不只在奪取熱河，更是要進襲長城防線，特別是要狠狠的教訓一下蔣介石的中央軍，以打散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所開始建立的威望與凝聚力。

蔣介石這時在張學良完全的配合下，果斷的改組華北守軍的戰鬥序列，由於援救熱河已是不可能了，於是想在長城防線，給予日軍攻勢有效的遏阻，而東北軍即成爲爭取佈防時間的前方「炮灰」了。何應欽下令增援的中央軍，與西北軍宋哲元部、晉軍商震部，跟在東北軍之後，進駐地形險要的長城關口，正式迎戰日軍的攻勢。

第四軍團東北軍的萬福麟部，從熱河南部退到長城防線之後，奉命堅守喜峰口，以待西北軍宋哲元部的二十九軍增援接防。東北軍在日軍猛烈的攻擊下，傷亡極其嚴重，但給予了宋哲元部一個緩衝的時間。二十九軍在三月七日抵達喜峰口陣地，即刻遭到日軍的猛攻，於是宋哲元利用喜峰口複雜的地形，大膽抽調兵力，從側面夜襲日軍，這是剛攻佔喜峰口高地的日軍，根本沒有想到的華軍作戰方式——竟然敢從側面發動夜襲，而且是用短兵肉搏作戰。在近身的肉搏戰中，日軍優勢火力是無從發揮，反而是西北軍的大刀比日軍的刺刀管用，所以造成日軍震撼性的損失，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接著上陣的西北軍劉汝明部，也在喜峰口西邊的羅文峪防守戰中，對日軍發動成功的逆襲，造成日軍嚴重的傷亡，因此西北軍一時聲名大噪（大刀隊也被喧染成爲中國抗日的無敵利器）。

另外一支東北軍王以哲部，則是奉命在古北口擋住日軍的攻擊，這是日軍攻擊的主力所在，目標是直撲北平，而與中央軍進行決戰。抵擋日軍前鋒的東北軍從來就沒有面對過如此正規作戰的場面，在日軍優勢的陸、空聯合炮火攻擊下，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但是仍支撐到讓關麟徵二十五師在三月十一日趕到古北口，佔領陣地，而與日本第八師團主力接戰。雙方血戰三晝夜，戰事之慘烈，前所未見，日軍使用陸空聯合攻勢，特別是其長程巨砲的火力，具有極大的殺傷力，造成華軍所有的防禦陣地幾乎完全毀壞，師長關麟徵負傷，全師的傷亡超過一半以上。

日軍幾度組織敢死隊進攻，才壓迫傷亡慘重的華軍二十五師，退到南天門佈防。這時由黃杰的第二師接替應戰，在南天門防線，與日軍展開浴血作戰，這場作戰維持了五天，由於全師傷亡極大，中央軍的防線再度被迫南移到新開嶺，由劉戡部接防，日軍繼續猛攻。就這樣中央軍輪番接戰，日軍也一再的增補兵力，雙方力拼到五月十三日，由於中央軍已經傷亡過重，而失去戰力，不得不全線撤退，日軍的兵鋒前緣，就直逼北平近郊的密雲附近了。

而正在此時，日軍突然在四月二十日主動的從所攻佔的灤東地區後撤，這是因爲日皇已經關切到關東軍「違命」，擅自越過長城進入關內作戰的情況。裕仁在十九日接見參謀次長真崎大將，詢問有關關東軍爲何會出現在關內之後，迫使軍部急電關東軍司令官武藤，命其撤軍。武藤當然不敢公然違抗敕令，所以立刻將關東軍從灤東調回關外。但是由於板垣征四郎企圖策反漢奸，製造華北自治的計劃正在進行到緊要關頭，因此急電關東軍不能撤回關外，否則整個策反計劃將會功敗垂成。最後武藤只有派遣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趕回東京，爭取軍部與日皇的同意與諒解，特准關東軍在長城「沿線」作戰，以達成收買華北軍閥，瓦解國民政府在華北主權的政略目標。

由於日皇裕仁對於關東軍在熱河作戰的「偉大」勝利，是萬分的高興與滿意，因而親自傳諭，嘉獎日軍在這次熱河作戰的英勇表現。裕仁完全忘記了，這是對中國的公然侵略，日本根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也沒有任何的事變藉口，就在中國境內大動干戈。同時他也批准了小磯國昭的長城「沿線」彈性用兵方案，因此關東軍很快又回到關內，再度對平、津形成包圍。

不過華軍在長城防線的浴血作戰，的確驚動了國際社會的注意，連一向袒護日本的英國，都已抗議日軍進入關內，已經影響到英國在灤東的煤礦利益；美國更是一再知會日本，日軍行動已經違背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軍部更爲擔心的是，假如戰火繼續向南延伸，關東軍將會受到蘇聯背後攻擊的危機，因此日本參謀本部在五月十八日，下達了「華北行動綱領」，要求關東軍要在六月底之前，必須結束在關內的軍事行動，以抽調足夠兵力，應付蘇聯的軍事壓力，並且繼續掃蕩東北義勇軍。

所以關東軍在確定板垣製造華北「自治」的工作，遲遲沒有具體的果效之後，也就同意與國民政府的代表黃郛協商，最後由交戰的前線軍隊指揮官，簽定撤軍的「塘沽協定」，日本取得控制灤東，與栽培漢奸政權的利益，中國則是勉強地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

熱河與長城之戰的檢討

當時中國四分五裂的部隊，包括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以及晉軍，在長城進行之對日作戰，是第一次各路軍系的聯合軍事行動。雖然參戰的中國軍隊，在日軍絕對優勢、現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勢之下，個別作戰的確是相當的英勇，同時也有很大的犧牲，但是卻難以產生理想的戰果。

因此，長城抗日作戰失敗之後，中國的各個階層，開始對於中日的歷史決戰，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中國必須要設法儘量的爭取時間，結束內部的分裂與消耗，以推動國家全面現代化的建設，這樣才能建立一支能夠保家衛國的軍隊，否則中國遲早會被日本所鯨吞與蠶食而滅亡的。

熱河與長城之戰，可以說是日本連藉口都懶得製造一個，就明目張膽的佔領中國的領土的公然侵略行爲，當時的國民政府明知無力在戰場上禦敵，但是必需展現抵抗的決心，以維繫民心士氣，同時希望要日本付出一些侵略的代價。雖然中日雙方在熱河的軍事較量，是不可避免的衝突，但是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無意與無力，就此展開全面的戰爭，所以熱河的作戰，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局部作戰。

11.1 中國軍隊首度聯合抗日

熱河與長城之戰，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繼甲午戰爭之後，一場比較接近正式的決戰，這場作戰清楚的證明，中日之間的國力與軍力的差距，比甲午戰爭之時還要更大。雖然中國軍隊的作戰表現，相當的英勇，但是卻不能改變中國戰力嚴重落後日軍的事實。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落後與分裂的國家，她正陷在危亡的歷史危機之中，根本沒有國家化與現代化的軍隊，可以對內統一國家——當然就更沒有力量對外可以抵禦外侮。造成中國軍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分裂、內戰不休、國民缺乏國家的認同，使得中國沒有辦法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政治、社會、經濟、工業體制，來支持一支可以捍衛領土與主權的軍隊，以對抗日本這種現代化國際級強權的侵略。這不是當時任何一個軍隊或是政治的領導人，單憑其個人的決斷與能力，就可以改變的情況。

當時中國四分五裂的部隊，包括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以及晉軍，在長城進行對日作戰，是第一次各路軍系的聯合軍事行動。而這些參戰的中國部隊，無論從作戰訓練、編制、裝備、指揮系統，都是各自為政的架構，加上彼此之間仍心存猜忌，更難發揮整體作戰的效果。雖然參戰的中國軍隊，在日軍絕對優勢、現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勢之下，個別作戰的確是相當的英勇，同時也有很大的犧牲，但是卻難以產生理想的戰果。

因此，長城抗日作戰失敗之後，中國的各個階層，開始對於中日的歷史決戰，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中國必須要設法儘量的爭取時間，結束內部的分裂與消耗，以推動國家全面現代化的建設，這樣才能建立一支能夠保家衛國的軍隊，否則中國遲早會被日本所鯨吞與蠶食而滅亡的。

11.2 中國全方位落後是作戰失敗的原因

若從戰爭的現場與過程而言，日軍表現的戰鬥能力是相當的傑出，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與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應該是居首功，因為他們指揮日軍的熱河攻擊作戰中，表現出決斷的膽識與充分謀略。關東軍只運用有限的兵力（兩個師團加兩旅團），卻能充分的發揮靈活與集中的戰術運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國軍閥部隊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飛機與強大炮火的

協同作戰，使得日軍能夠在十天之內，就閃電般地順利攻佔了熱河全境。雖然日軍在繼續攻擊長城防線的作戰中，遭受到華軍猛烈的抵抗，但是日軍仍然充分的掌握戰場的主動，並給予中國軍隊相當嚴重的打擊。

而中國方面，張學良之所以無法在事先調動各軍應戰，是由於當時他已失東北根據地與大量的軍政資源，國民政府裡的汪派又只給壓力，卻沒有實質的助力；他所統領的華北各軍，原本有著彼此對立的心結問題，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化解，因此對造成各部隊對張學良的指揮，處處制肘與防範，也就影響到張學良的戰略企圖心不足。張學良身體的狀況也因為毒癮的傷害，更無法應付作戰沈重的壓力。

然而就全盤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難完全怪罪給張學良的失策。因為這是中國自從清朝與外國軍隊作戰以來，第一次的各地地方部隊協同作戰¹，僅僅在兩年多前，這些部隊還是彼此相互廝殺的「敵人」。當時面臨日軍攻勢的張學良，既無足夠的威望與能力應敵（那時他只有三十二歲，只是一個地方軍閥的繼承人），更缺必需的後勤支援能力，因此他還能夠壓住華北各軍應戰，就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戰局大幅的逆轉之後，張學良竟然能夠因為一句話，就自動的卸下兵權，東北軍也沒有因此出現嘩變或是拒戰的情況，更是自從清朝末年以來，擁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現。

不過熱河與長城之戰事前的中國輿情反應，可以說是對於中國國力與軍力的情形了解過少，因此對於張學良以及東北軍的表現給與過於嚴苛的批評，輿論把東北軍罵成「不抵抗部隊」，「一戰就敗」，而把西北軍的喜峰口之戰，捧為國之干城。熱河抗日作戰的失敗，對於浮誇的輿論與不切實際的人心，是一個沈重的打擊，在北平的「學者專家們」，這才開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國力的差異，有著整個民族全方位的歷史問題。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強盛，中國不是因一人而落敗。

其實這是當時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問題，不敢真正面對失敗的原因，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羔羊（東北軍）洩憤，以減少每一個國民其實都應負起的歷史責任；而同時對西北軍的喜峰口逆襲戰果，做出過度的宣揚²，以證明是東北軍太差，而非中國軍力的不行。事實上，當時東北軍一樣的在明知無法戰勝的狀況下，對日軍攻勢進行浴血作戰，只是因為張學良下野，政府與輿論

¹甲午戰爭雖然在一個朝廷的指揮下，卻只有李鴻章的北洋系部隊參戰。

²例如「中國的興登堡」，或是「大刀隊滅盡東洋現代化部隊」等言論。

又要找東北軍當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報導，而其實西北軍一樣有其脆弱的一面³。

事實上，當時蔣介石無法親自率軍北上指揮壓陣的原因，是因為國民政府在江西剛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軍事行動。同時汪精衛在熱河作戰之前，曾經親訪廣州，當時廣州政府領導人鄒魯就明白表示，假如蔣介石調兵北防熱河，廣州方面不但不會協助或保持中立，而是會出兵攻擊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蘇區的部隊，更是從中牽制了國民政府軍隊的移動。當時的國民政府，無論是派晉軍、西北軍或是東北軍的其他將領，都更加難以指揮中國的部隊進行熱河保衛戰，甚至就連蔣介石親率中央軍與日本作戰，結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為實情是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將領與部隊，能夠抵擋武藤信義所指揮的關東軍的攻勢。

11.3 人心向背是戰爭的關鍵因素

為什麼中國軍隊在一二八事變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轟轟烈烈，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可以困擾無敵的關東軍，而華軍在熱河與長城之戰卻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呢？就歷史的角度而言，關鍵在於民心士氣的支持。因為當時無論是在上海還是東北，人民都是熱烈支持華軍抗敵作戰的，因此中國軍隊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戰越勇而有超水準的表現。但在熱河的狀況剛好相反，當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機會反抗軍閥「湯老虎」部隊的虐政，因此華軍在沒有得到人民主動支持的環境下，張學良無法派遣缺乏國家意識，以及沒有足夠後勤的地方軍隊，事先進駐熱河。在作戰時，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隊，其戰鬥表現，必然會在水準之下。

而日軍的訓練、編組以及武器裝備，在接近三十年來的重點配置，都是為了在西伯利亞與俄軍進行野戰準備，因此比較不知如何應付城鎮的攻堅與巷戰，也不知如何面對人民起義的游擊作戰。日軍在上海與東北地區的作戰，既有輕敵的問題，又需要時間調整適應，因此日軍的作戰表現也就在水準之下。但是日軍在熱河之戰，剛好得到日軍最為優秀的將領指揮，又可以充分發揮野戰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熱河民團又有響應日軍的軍事行動，所以關東軍在熱河的作戰，當然是得心應手、大有表現。

³在盧溝橋事變之後的平津作戰，就可以看出西北軍宋哲元部的問題，也是非常的嚴重。

在熱河保衛戰之前，當時中國的輿論界，一天到晚的把政客與「報紙軍事專家」的謬見，大量的加以渲染與散播——這些見解，把一二八事變的中國軍隊能夠暫時的守住陣地，當成日軍戰力其實不足為懼的證明，把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風起雲湧反擊，當成關東軍戰力不過爾爾的事實，輿情當然就會期待中國軍隊在熱河再有傑出的表現，事實上，這些輿論可以說是愛國熱情有餘，但是對於事實了解缺乏，只會影響到整個戰略的佈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庫。

11.4 日軍掌握作戰的優勢

當然從戰略對抗的角度而言，日軍進兵熱河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楚，攻佔熱河，痛擊華軍，以切斷關內對東北義勇軍的支援，並且擴大華北分裂的局勢。但是中國軍隊的戰略目標則並不清楚，張學良先是期望熱河能夠成為中日兩國的一個緩衝，以儘量的拖延雙方衝突的時間，減少東北軍的傷亡，蔣介石則是把熱河的保衛戰，當成一場維護政局安定的犧牲打，作戰目標不在保住熱河（因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進行中日全面的戰爭，而是要給國人一個抵抗的交待，以安撫民心，同時能讓日軍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價，而稍知收斂。

而關東軍在武勝信義指揮下，有如脫胎換骨般的發揮高超水準的戰力，一掃過去受困於東北義勇軍的形象，也是出乎蔣介石與張學良的意料之外。武勝信義只以兩個師團加兩個混成旅團的部隊，就敢大膽的發動熱河之戰，造成中國部隊幾乎措手不及的應戰。中國方面則是由於軍力的調度，特別是後勤支援，有著根本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對於進駐塞北寒荒的熱河作戰，本來就是有些應付輿論壓力的消極作戰。當時張學良真正的主力作戰佈署意圖，不在熱河而是在長城沿線抗敵，以確保河北平津，熱河反而成為陪襯的作戰，只要能抵抗的表現就好。不料熱河作戰的表現過於差勁，造成華北人心與軍心的全面浮動，蔣介石只有在匆促之間北上，張學良負責請辭，蔣臨時重新佈局，在長城沿線與日軍作戰。

雖然當時各軍在長城的作戰，特別是中央軍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門的血戰，幾乎是以全師犧牲為代價，西北軍在喜峰口與羅文峪甚至出現成功的逆襲，而東北軍王以哲部、何柱國部與晉軍商震部、傅作義部，在灤東也都有

相當英勇的抗敵犧牲，但是當時中國部隊，根本對於現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長城地區堅硬地形難以臨時構建有效的防禦工事，而日軍使用空軍與重炮的優勢火力，造成中國守軍陣地幾乎全毀，也就無法成功地對抗日軍的攻勢。不過這系列的戰鬥，證明了中國軍隊的確敢於犧牲，不再是一支望敵潰散的「太監軍」了⁴。

11.5 華軍作戰需要大幅改進

不過就作戰指揮而言，當時何應欽與楊杰的長城防禦作戰戰略，實在是過於的被動與呆板，只是強調各軍死守險要陣地，而與日軍進行浴血作戰，來展現中國軍隊流血與犧牲的精神，卻沒有在戰場上發揮協同作戰的功能，更沒有運用主動反擊的戰術，打擊日軍極其脆弱的後方與補給線，實在是相當的失算。

事實上，當時在長城防線的中國軍隊，應該採取更為靈活的機動防禦，一方面以部分軍隊，依據地形險要佈陣防守，但是應抽調更多的兵力，採取精銳編組，在長城沿線一些日軍兵力薄弱的地帶，主動的越過長城，利用複雜的地形，深入日軍的背側反擊敵軍，甚至可以遠征日軍補給集中的後方據點，進行大膽的敵後攻擊與破壞，與包圍日軍的後方據點，而造成日軍首尾受敵的壓力（因為當時日軍在熱河後方的兵力的確不足，軍力幾乎全都調到長城正面攻擊華軍了），而不是讓各軍完全以被動的防禦，等待日軍強烈火力來逐一擊破。

當然要實施這種機動防禦，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隊協調，以及更為寬裕、可資調動的兵力，同時也需要指揮官有足夠的企圖心、決策的膽識與能力。這不但是當時何應欽與楊杰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中國軍隊直到武漢會戰後期，才開始懂得運用這種戰術，在三次的長沙會戰中，中國軍隊才真正靈活的使用這種戰術。

11.6 長城作戰對日本侵華策略的影響

日軍在贏得熱河與長城之戰的勝利之後，當然成功的截斷了中國支援東

⁴蔣介石在當時的日記中，對於長城抗敵的失敗並無過度的意外與自責，反而說軍隊能夠在日軍強大火力攻擊下，死守力戰不退，可以告慰總理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

北義勇軍的聯結通路，使得義勇軍在熱河失守之後的短期間之內，因為進一步的失去支援，大部分的部隊被日軍消滅，一部分則是退到蘇聯的境內，不過仍然有少部分義勇軍在白山黑水之間，以游擊戰的方式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東北義勇軍自動自發的英勇作戰精神，是在中國的近代史中，一個喚醒了民族精神的歷史事蹟。東北義勇軍的精神所興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識，開始成為凝聚中國統一與新生的力量，終於成為中國走出幾世紀迷失的歷史動力。

日軍佔領熱河後，不但完成日本對於拱衛滿洲國的戰略，同時也為推動「蒙古國」，找到一個理想的橋頭堡，這時日本的侵略野心，簡直已經到達沸騰的地步。日軍既已穿過長城，兵臨平津，就進一步的積極製造事端，煽動軍閥與漢奸政客，以推動設立「華北國」。日本終極的戰略目標，就是分裂中國，然後加以宰割。

不過，中國軍隊在熱河與長城的作戰與犧牲，多少讓日軍覺得，要想再演出類似九一八事變那種近乎無抵抗的佔領中國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須設法策動與擴大中國內部的分裂，然後再加以介入與利用，它才能順利的「征服」中國。所以日本在熱河長城作戰後，暫時停止全面的武裝侵略，對華開始採用武力壓迫之下的政略行動，準備一塊塊的肢解中國。首先上場的就是「蒙古國」的建立，以及「華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動。槍聲未息，談判上的壓力就已上陣。

事實上，日本在談判桌上的強橫態度，絕對不減於在戰場上的殘忍手法，不過中國只有見招拆招，國民政府多數採取息事寧人的退讓政策，用盡一切力量與日本周旋，才勉強換到了四年的準備時間(1933-1937)。而當日本發現中國已經開始凝聚抗日的共識，以及有了一些建設與軍事的成果之後，就決定提前發動對中國全面的侵略。

兵臨城下的塘沽協定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與日本進行直接的談判與交涉。因為當時日本的政局，在少壯派軍人的主控之下，氣焰之狂妄，根本是無理可談，所謂的中日談判交涉，只不過是讓中國在會議桌上屈膝受辱而已。而當時中國的民氣又沸騰已極，任何對日本讓步的協議，都會被視為「賣國」的罪行，因此官員在議場中所受的內外壓力，甚至大於在戰場的指揮官。當時黃郛實在是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勉強同意蔣介石的請託而出面收拾華北殘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國民政府宣佈，由黃郛出任北平政務處理委員會主任，統領華北的軍政全局，負責與日本進行交涉。

由於日軍迅速的攻佔熱河，同時擊潰華軍的長城防線，日本的大軍就直接兵臨平、津重鎮，日軍的這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勝利，對於中國的華北與內蒙地區，造成了極大的戰略威脅。不過日本政府與日軍也開始明白，日軍任何進一步的軍事侵略，是必然會遭到中國的浴血反抗，中國不會像甲午戰爭的時代，打了敗仗就準備割地賠款。縱使中國軍民的血肉長城，一時之間仍然無法阻擋日軍的侵略，不過卻足以讓日軍付出可觀的代價，日本若是要想以繼續動武的方式，來侵略與佔領中國，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超過當時日

本所能負擔的。何況日本還要擔心蘇聯的立場，以及國際強權的反彈，所以日軍無意戀戰，反而希望先見好就收。

12.1 中、日在戰略對抗上的比較

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情緒雖然因為侵略中國而上揚，但是還不足以讓人民支持全國立刻成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別是擴大與中國的戰爭，日本需要大量的財政支持，更非當時經濟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極缺作戰的重要物資如石油、鋼鐵、橡膠等資源，所以日本政府認為，它需要時間來培養更為狂熱的軍國主義，日本也需要時間來消化已佔領的中國領土，轉化中國的資源成為日本的國力。加上國際社會對於日本不斷的侵略中國，準備獨佔中國的利益，出現相當的不滿與壓力，所以日本不願在長城作戰之後，全面的乘勝追擊，而是希望將最終征服中國的戰略，暫時的從戰場移到談判桌上。

當時日本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以和戰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蠶食中國，最終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讓一個分裂的中國，接受日本的操縱與支配，而使中國的資源，成為支持日帝國稱霸世界的基礎。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國，但它卻不希望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戰爭，認為只有步步進逼，逐漸分割與蠶食她，才是上策。

不過中國在熱河長城作戰之後，出現另外一波民族主義覺醒的意識——西北軍大刀隊的搏鬥（與十九路軍在上海的拼鬥），雖然能夠激發中國人的抵抗熱血，卻不能真正的打敗日軍的攻勢。同樣的，天險長城加血肉長城，也不能阻擋日本軍隊對於中國的侵略。但是中國人的這些鮮血與犧牲，並沒有白白的浪費，一個凝聚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國人抗日的血淚的灌溉之下，迅速的成長，曾是老大陳腐、分裂內訌的中國，開始在日本連串的侵略之下，出現了團結與轉變。

當時，中國無法戰敗日本的基本原因，還不只是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不足，也不是中國軍隊不夠勇敢拼鬥，而是更基本的關鍵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落後與分裂的國家。中國沒有現代化的社會、人民、政府、工業與軍隊，因此她在總體的國力上，根本就不足以擊敗日本的強大優勢，軍隊在戰場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國全盤落後、加上內戰、分裂的必然結果——中國人開始逐

漸知道危機的所在了。

中、日戰爭是一場歷史性的民族戰爭，其勝敗的關鍵在於總體國力的強弱，中國若繼續陷在分裂與落後的狀況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對抗日本的侵略，中國若是立刻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其結果很可能是亡國。但是當時的中國，與其他成爲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國不願接受亡國的欺凌，中國人不肯成爲亡國奴！因此中國就必須盡一切的力量爭取時間，以完成團結與建設。

任何國家要想現代化，絕對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國若要復興與現代化，當然也是如此：她幅員龐大、人口眾多，加上沈重的歷史包袱，因此中國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凝聚共識，她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發展。現代化的戰爭要有現代化的人民、社會、組織、經濟與工業，才能組成現代化的軍隊——惟有如此中國才能有實力來對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國要有這些現代化的社會與經濟基礎，至少要有幾十年的時間培養與發展，才能看到具體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瘋狂的進逼下，中國被迫即使沒有做好作戰的準備，也要開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決策者知道，絕對不能給中國足夠的時間來復興國家與救亡圖存，中、日兩大民族的歷史決戰勝負，就決定在時間的競爭上。

12.2 日本企圖建立漢奸政權的失敗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義率兵進軍熱河的重點並不只在征服熱河而已，而更是直指華北，目的是要給中國人民一個「無法對抗日本」的事實打擊¹。日本特別希望能夠擊潰國民政府之中央軍，以離間華北的各個地方部隊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認爲讓中國遭到前所未有之喪師辱國的慘敗、打垮中國的抵抗意志，這樣才可以屈服華北，同時進而造成華中與華南的分裂。

因此當武藤信義調動關東軍準備進軍熱河的同時，日本的「中國通」奉天特務機關長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轉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板垣的計畫是，利用中國部隊作戰失利所引起的社會與人心動亂的當頭，來利誘軍閥與政

¹日本的這個用兵政略，對於汪精衛等人產生了極大的觀念影響，汪從此由抗日派逐漸變成聯日派。

客，他曾經企圖利用段琪瑞、孫傳芳與吳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領。（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國人怎麼會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張敬堯與孫殿英等「三流」軍閥連繫，並且透過他們與東北軍將領張作相，西北軍將領宋哲元都有所接觸。板垣希望能夠離間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然後在華軍的戰線崩潰之時，由他們乘亂出兵反蔣，造成「華北獨立」政府，屆時再運動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來響應就更有可能了。但是這次任憑板垣用盡各種手段，都無法真正的策反這些原先與蔣介石有仇的軍隊，來公然反叛國民政府。而擔任居中連絡的漢奸張敬堯，又被愛國志士所刺殺，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計劃全都落空，使得關東軍在華北的軍事行動，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時國際社會已經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華北，破壞了各國在華利益的均衡，出現了相當強烈的反彈。日本既不能一口就併吞中國，政略離間以瓦解中國又沒有達成，因此只有設法與中國停戰，以集中力量消化所佔領的東北四省。日本軍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關東軍下達「華北應急方案」要求關東軍在六月底之前，要與中國方面達成停戰，然後撤軍回到長城以北地區。而在國民政府方面，汪精衛在張學良下野之後，重新復職，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因為熱河之戰輸得太慘，自己無法兌現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請假出國，進行廣泛的外交聯繫活動。蔣、汪二人對於當前的局勢，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可以有條件的暫時接受屈辱，而儘量設法保全華北，以圖國家的建設與抗戰的準備。

12.3 黃郛設法收拾殘局

不過問題是，國民政府方面當時並不知道日本政府與軍部，已經決定在華北停戰。國民政府眼見日軍突破了長城防線，兵臨平、津，而蔣介石卻正處在無兵可調與無財可用的窘境。蔣、汪只有設法請出與日本關係良好，也是同盟會時代的革命老同志黃郛，讓他設法與日本人談判折衝。由於黃郛是留日學人，精通日語與了解日本的文化與國情，曾在同盟會時代，熱心參與革命，後來在北洋政府任過要職，並且與蔣介石結為金蘭，是蔣介石對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顧問，而他與日本當時的軍政方面負責人，也有著不錯的人際關係。黃郛雖然已經退出政壇多年，但在國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際，蔣介石又

動之以金蘭情，懇請他念在蒼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華北的局勢。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與日本進行直接的談判與交涉。因為當時日本的政局，在少壯派軍人的主控之下，氣焰之狂妄，根本是無理可談，所謂的中日談判交涉，只不過是讓中國在會議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實連日本政府官員，也不敢惹這些少壯派軍人）。而當時中國的民氣又沸騰已極，任何對日本讓步的協議，都會被視為「賣國」的罪行，因此官員在議場中所受的內外壓力，甚至大於在戰場的指揮官。當時黃郛實在是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勉強同意蔣介石的請託而出面收拾華北殘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國民政府宣佈，由黃郛出任北平政務處理委員會主任，統領華北的軍政全局，負責與日本進行交涉。

日本策反華北軍閥運動失敗之後，如今由於黃郛的復出，日方又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給黃郛幾個交涉成功的機會，以鞏固他的地位與影響力，然後再以各種威脅利誘的方式，軟硬兼施的拉黃郛入伙，使他成為日本分裂華北的漢奸領袖。所以日本就主動透露歡迎與黃郛進行停戰交涉的意願。黃郛是先在上海與日軍代表根本博進行接觸，得知日軍有意在華北停戰，他才決定北上，收拾殘局。

事實上，國民政府的部隊在熱河與長城作戰的失敗，同時動搖了政府脆弱的財政基礎，由於銀行團擔心大局急轉直下的全面惡化，因此不肯購買政府債券，而在宋子文於四月中出國之後，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全靠黃郛利用他與銀行團的關係，先設法為國民政府先借到兩個月的周轉金，否則軍隊與公教人員又領不到糧餉了。銀行團是希望天津海關的關稅收入，做為政府還款的擔保²，因此黃郛的任務，不但是收拾華北殘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穩住國民政府的財政信用。

但是談判就要開始時，日軍卻決定利用機會，先給黃郛一個下馬威，以爭取到更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關東軍在長城沿線的作戰計劃，武勝信義立刻把握這個機會，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後撤的日軍，再度的越過長城的關口，猛攻在灤東的華軍。

華軍根本沒有料到日軍會退而復返，更沒有想到在談判即將開始時，日軍會加強攻擊，加上華軍已經力竭而不堪再戰，因此灤東陣地連續失守，日軍席捲灤東各個軍事重鎮。五月二十一日，日軍兵鋒前緣突破香河，直逼北

²當時天津海關收入，約占國家關稅收入的三成。

平外圍的通州，炮聲響徹北平全城，潰兵與難民接近失控狀態，而在北平坐鎮指揮軍事的何應欽，已經下令將指揮部撤離北平，準備南下良鄉與保定。一時之間，平津的淪陷，幾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實了。

12.4 極爲苛刻的停戰條件

黃郛在這種危機關頭，冒死匆匆的趕到北平（沿路還有「愛國志士」準備刺殺他），這時北平已經是處在人心惶惶、兵慌馬亂的危急狀況，黃郛在北平棄城前夕，設法再做最後的努力，與日本軍方代表永津佐比重進行私下的接觸。其實當時日皇的軍令是，不准關東軍攻佔北平與天津，因此日軍兵臨城下，只是談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黃郛與國民政府卻根本不知道這個狀況，只在日軍的包圍下，平津已經危在旦夕，爲了阻止日軍的攻城，必須設法立刻接受日軍極爲苛刻的停戰條件，否則華北即將淪陷，中國的政局也將面臨瓦解的危機。

而當時的日本駐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經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與中國代表達成停戰協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與黃郛進行接觸與談判，日本提出了停戰條件，要求黃郛立刻承諾，黃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況下，只有急電蔣介石，要求中央決斷是否接受。這時蔣介石與汪精衛等人，特別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會議中大家都認爲，只要能夠暫時保全平津，必須接受日本的條件，因此立刻致電黃郛，表示除了涉及東北四省的主權之外，其他全都可由黃郛全權做主決定，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蔣、汪二人絕對會爲協定的內容，共同負起歷史責任（這是黃郛最爲關切的重點之一，他不願意成爲所謂「外交賣國」的千古罪人）。

這樣黃郛設法與日本少壯派軍方代表周旋，用盡人際關係的運作，勉強與日軍達成了停戰協定綱要，而實際的條約內容，則是於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雙方軍隊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簽署生效，這就是所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這個協定要求，將中國領土灤東地區，劃爲中日停戰地區，允許日軍掌控長城各個戰略關口，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停戰區，但是允許日本實際遙控灤東戰略地區³，與取締所有的排日組織與行動。爲了減少中國輿論的

³這個地區的位置，就是相當於宋代「燕雲十六州」的東南部，日軍有效的控制此一地區，中國在黃河以北，幾乎就無險可守了。

反彈，中日雙方並未完全的公佈協議內容，以及進一步退讓的口頭承諾。日軍在談判桌上，既獲大勝，對平津的包圍與攻擊才告停止。

12.5 黃郛力撐大局的困境

在華北局勢的兵荒馬亂之際，黃郛運用個人關係的運作，與日方談判而穩住了瀕臨潰散的華北局勢。日本之所以會突然與黃郛達成停戰協定，其實是它的兩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軍全面的陷入中國戰場，一方面是設下圈套，先給黃郛交涉成功的機會，然後設法逼他逐漸的接受日本的政治計劃，而領導華北自治運動。但是黃郛堅決不肯就範，而是盡量與日本周旋，日本則是不斷的利用機會，製造事端，給黃郛帶來沒完沒了的壓力。

而華北的宋哲元、韓復榘、閻錫山等軍政實力人物，原本對於南京國民政府有著舊仇，對於未來也有自己的打算與立場，所以並不是完全的認同與支持國民政府。因此他們在日本的壓力與利誘之下，經常有遊走中、日之間的政治舉動，這對於無兵無財的黃郛，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特別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發了閩變，十九路軍宣佈獨立，建立「中華共和國」華北的局勢立刻受到了影響。

當時華北的日軍，認為閩變造成了蔣介石南北無法兼顧的窘境，所以日軍立刻藉機加強壓力，推動華北自治；韓復榘等人更是熱中「聯省自救」並且與廣州的分裂政府進行接觸與唱和，他們強力要求黃郛宣佈華北自治，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但是被黃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來，同時蔣介石以迅速的軍事手段，救平閩變，因此才沒有進一步的造成中國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黃郛以一個文人，本身沒有軍隊支持，又處在這種內外困難交錯的狀況之下，其個人的名譽與家人的安全，更是經常的受到所謂「愛國志士」的羞辱、威脅與攻擊。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因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壇。黃郛成功地靠著個人的外交手腕，先將華北政局穩定下來，再設法與日人周旋，完成淪陷的東北與中國的各種民間之交流協定，更為中國抗日的大戰略佈局，爭取到將近兩年寶貴的準備時間。

這裡節錄幾段當時黃郛與蔣介石之間的電報，從電文中就可以知道，當

時處理日本侵略華北局勢之艱難，而在談判桌上的折衝，甚至比戰場上的火拼，還要慘烈⁴。

五月二十二日，黃郛在北平準備棄守前夕，向蔣介石報告的電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已決定在白河線進行最後抵抗。但平津若動搖，則前在滬所商定之六百萬，事實上又成空話，（此為黃郛出面，與銀行團商借國民政府的緊急周轉金），財政如無新途徑，以資接濟，而維軍心，則全部華北情形，將不知紛亂至何程度，應請中央預為注意。郭等進止，尤須請示，北平既入戰區範圍，政整會自無工作餘地，現雖尚未成立，擬至必要時隨軍事機關轉達，或即南旋面陳經過。如何盼覆。」

五月二十三日，黃郛在最後關頭與日方代表進行私人接觸，經過徹夜的談判，終於日本達成停戰草案之後，向蔣介石報告的另一電文：

「時局至昨日極險，軍心不固，士氣不振，內幕尤不堪聞問。日方決定本晨拂曉大舉進攻。故一時不得已，預備軍政兩機關移駐平漢線，兄（黃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動搖，財政無辦法，糧餉之源絕。平漢、平綏、北寧、津浦各線之交通樞紐，盡落敵手，國土變色，地方糜爛，潰軍且將波及豫魯。種種不堪設想之後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衛電略稱：「只要不涉及承認偽國、割讓東四省問題，一切條件均可商訂」。故於臨出發移駐之前，思為最後之努力，事機迫切，間不容髮。未及事前電商，至為惶恐。好在交涉僅以停戰為範圍，條文加意審慎，當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黃郛）淚內流，兄膽如裂，想吾弟（蔣介石）亦必能想像也。」

就歷史而言，簽署塘沽協定，是暫時穩住了華北瀕於崩潰的局勢，使得中央政府有時間進行安內與全面抗日之佈署，但這個協定也給與日本公然侵略華北一個法理與地緣的根據。而有心反對蔣介石的各個割據政治勢力，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罪證」。塘沽協定固然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有哪

⁴作者每次讀到這些電文，都熱血沸騰，誓願中國不再受到如此的欺壓。

個批評者能夠站出來，告訴我們，在當時中國有什麼實力來拒絕簽約？而中國又憑什麼能與日本決戰？

由於汪精衛當時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更是直接負起與日本交涉退讓的責任，因此後來從閩變的爆發，到國民黨五全大會的刺殺汪精衛事件，都是塘沽協定的後遺症。然而處在當時的局勢，誰又能為國家爭取到更好的條件呢？真真是「恨」中國到了這個地步，許多的政客與軍閥還不知奮鬥與團結⁵。

⁵其實，當時的中國正設法在全面的改變之中，可惜黃郛來不及看到中國英勇與堅忍的抗日表現，與贏得最後歷史性的勝利，而在一九三六年，因心力交瘁而過世了。

13

談判桌上的折衝對抗

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成績」是，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分裂了內蒙大部分地區，與特殊化了部分的華北。在這些地方，分別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滿洲國、蒙古軍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個處於中、日之間，半自治狀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中日兩國還沒有正式開戰之前，中國總計有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五千萬人口，受到日本的佔領與控制。

由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必須要在這種危急的局面之下，設法與時間進行競賽，對內推動統一以加強建設，對外準備對抗日本的侵略行動。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當中日兩軍在長城沿線火拼之際，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展開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勢，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遊歐美各國，尋求列強的支持合作與諒解。這時候的歐美列強，對於日本近乎窮凶惡極的侵略中國，破壞各國在華的門戶開放利益，已有所不滿，加上中國的浴血抵抗日軍侵略，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一些驚訝與敬佩，因此對華開始願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實歐美各國已經擔心，假如繼續放任日本侵略中國，終有一天會使得日本獨霸東亞，而妨礙到列強的利益。因此對於宋子文的到訪，都給予相當

禮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國的棉、麥貸款五千萬美元，以及英國退回庚子賠款四百七十萬鎊，協助中國修建粵漢鐵路，以聯接華南與華中的交通。國聯也開始派遣一些經濟、科技與農業的專家來到中國，協助中國進行工業與農業現代化的建設。中國的復興與現代化，就此開始露出一線曙光。

13.1 日本天羽聲明的蠻橫立場

不但如此，就連德國、義大利也願意提供軍事顧問、出售飛機以及武器、裝備給中國，以協助中國提升戰力，甚至連蘇聯也開始與國民政府進行軍事互訪。一時之間，國際輿論對於日本對華的不斷侵略，都有相當的反感，對於中國的發展也開始有些認識——當時的中國，不再只是一個落後、封閉與瀕於瓦解的國家，而是一個極力掙扎奮鬥、追求進步與現代化的國家。同時各國對於中國軍隊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戰表現，也從口頭的同情，逐步發展到外交的支持與間接的軍、經協助。

中國的奮勵圖強，以及國際社會這種對她認同與友善的態度，使得她在國力與軍力上，開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感到緊張，它意識到這是中國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圖引進國際社會的力量，來抵消日本的獨霸中國企圖。因此日本立刻展現霸權的蠻橫嘴臉，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的情報部長天羽英二，承外相廣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發表干涉中國主權的「天羽聲明」

天羽聲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對中國有特殊的關係，同時維護東亞的秩序與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國與中國的來往，絕對不能影響日本在中國的支配性利益，否則日本政府有權加以抵制與反擊；各國若是給予中國軍、經援助與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對。日本政府的這個聲明，根本就是將中國當成其保護國看待。這種說法當然是沒有任何的法理基礎，純粹顯示出日本強橫霸道的野心，等於毫無法理原則的宣佈「中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公然要求國際社會同意，任由日本來宰割中國。

天羽聲明可以說是完全的違背國際的外交慣例與立場，展現出日本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強橫作風，根本就把中國當成它的保護國看待。國民政府當然對此事件發表嚴厲的反駁。中國國民政府理直氣壯的認為，中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擁有與世界任何國家平等互惠來往的權利，日本根本沒有任

何理由，干涉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蔣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線，對軍隊發表演說，採取更為有力的回應——蔣介石誓在十年之內，擊敗日本，不但收復東北，還要包括台灣。

日本的天羽聲明，同樣的激起國際社會更多的不滿與反彈，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既非日本的保護國，中國當然有權與任何一個國家進行交往，日本絕對無權獨佔中國的利益。面對天羽聲明，國民政府與國際社會對於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行為，開始採取更為明顯的對抗態度。

日本在發表天羽聲明之後，立刻對於華北的各個軍政勢力，進行威脅利誘的工作。無論是河北的于學忠，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察哈爾的宋哲元，都先後受到日本極大壓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華北大有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之危機。這時候，黃郛以華北最高政治領導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種議題之中，成功的與日本周旋，緩和日本種種的挑釁，並且疏導華北各個地方山頭的分離力量。由於黃郛手上並無一兵一卒的直接軍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與為中國爭取寶貴的時間。

13.2 最後關頭的抵抗心聲

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經過五次的動用兵力，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對於江西南部以及長江中游地帶共黨蘇區的攻佔，接著中央軍尾隨紅軍的「長征」，而正式進入西南地區的雲、貴、川三省，這是自從民初袁世凱時代以來，中央政府的軍力首次進入大西南的腹地，這也是蔣介石的抗日計劃中，最為重要的戰略基地所在。蔣既然在軍事與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當然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更為接近一個中央政府的規模，也就更有實力來控制地方割據勢力，以及對抗日本侵略的壓力了。

因此雖然日本在華北，積極的推動分離運動，但是此時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非吳下阿蒙的衰弱狀況了。因此蔣介石在十月中旬，親自飛往華北各省，主動與華北各個地方勢力的領袖會晤，並且特別派遣參謀次長熊斌，攜帶中央的抗日戰略計劃，告知華北各軍的領袖們，中央絕對有抗日的決心與計畫。幸而在此時，山西的閻錫山，立場表現得相當堅定，在他強力支持中央的立場下，配合國民政府的實力增加，終於穩住了華北的局勢。

接著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於南京召開國民黨的五全大會，

進一步邀請華北與華南的地方勢力領袖參加。國民政府展現了新的軍政團結勢力，大會相當成功統合了國民黨內部各個派系的抗日意見，蔣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會上，代表國民黨的中央，發表了「最後關頭」的對日政策演說。

蔣介石在演說中，擲地有聲的強調，假如中國真的被日本逼到退無可退的最後關頭，中國絕對會不惜代價抵抗到底。這是自從清朝以來，中國的領導人，最爲公開與最爲正式的表達了中國在必要時，會對日本毫無止境的侵略，進行作戰到底的堅定立場，使得中國動搖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開始出現了凝聚的力量。蔣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與欺凌，真的要逼中國忍無可忍，中國人會在最後關頭到臨之時，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與日本人進行歷史決戰。

事實上，日本獨佔中國利益的作風，在國際社會中已經面臨遭到孤立的危機，同時日本更加擔心的是，自己在中國步步的侵略，遲早會引起蘇聯和美國的軍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地先片面廢除華盛頓公約的海軍造艦限制，以及積極地在東北與內蒙建立戰略腹地，都是準備進行第二次日、俄戰爭的佈署。日本對於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華北分離運動，接近功敗垂成，感到萬分的惱火，於是決定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動採取懷柔的姿態，減少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反彈，一方面決定由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出面，以軍事力量的恫嚇，來推動華北自治方案，先將力量集中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與中央分離，再推動華北山頭的自治與獨立。

這時候，日本人確定黃郛無意接受日本的操縱，因此日本人決定與他攤牌，而黃郛則感到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同時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養病爲由，離開北平任所，之後就拒絕回任，只留下何應欽在北平，統協華北各個地方的力量，而與日軍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對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動進行一系列的和緩外交，使得中日之間，一時出現了罕見的對話與接觸，其實這是日本政府和戰的兩面手法運用而已。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國會發表中日親善的演說，廣田竟然公開的指出，日本今後將不會再以武力威脅中國了。二月一日，蔣介石則透過屬下的名義，發表了《敵乎？友乎？》的歷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檢討中日之間的問題、歧異，希望中日雙方都能在最後危機爆發之前，進行相互的諒解與合作，日方相當重視這篇

文章所代表的立場，外表的反應是相當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進一步的頒佈「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壓制中國境內各種民間的排日組織與活動。日本外相廣田更在三月一日，發表演說，願意與國民政府進行直接的談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間的關係。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決定提升雙方的外交來往等級，建立大使級的關係，並且進行改善中日關係的歷史談判任務。這些的外交活動，在表面上，給中日之間帶來和緩的氣氛，事實上，日本並未停止或是減緩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13.3 何梅承諾與秦土協定

正當中、日藉著外交管道，開始協商解決兩國間的問題與危機之時，日本政府同時通過了軍部在華北進行軍事恫嚇的政策，並決定同時在河北與察哈爾動手：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負責在河北尋釁，關東軍則負責在察哈爾製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日本駐天津武官高橋，利用兩名親日的華文報紙社長，於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殺事件，對北平軍分會負責人何應欽，發出嚴厲的通牒，日本稱這個事件為「河北事件」¹。日本駐屯軍竟然無理的指出，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在河北地區，進行各種反日的不友好行動，才發生這樣的暗殺行動。因此日軍提出了干涉國民政府在河北地區主權的無理要求，包括要撤換河北省長于學忠以及其他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長的職務、關閉國民黨在河北的黨部以及國民政府的情治機關，同時將中央軍調離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脫離國民政府的軍政管轄，而達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駐屯軍少壯派軍官的這項行動，當然得到日本政府與關東軍的支持，在交涉期間，不但天津的駐屯軍舉行軍事演習的示威，關東軍也動員了三軍的部隊，在渤海與山海關一帶進行演習，一時之間，大有不惜對華北動武的架勢，日本好像完全的忘記了日本政府不對中國實施武力威脅的「最新保證」。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後通牒，何應欽在面對如此重大壓力

¹在戰後的審判中，日本關東軍供認，這兩名親日份子其實是日軍刺殺的，目的是用來製造事端的藉口。

之下，既然了解中央無法在此時與日本進行決裂的作戰對抗，只有建議國民政府對日方壓力進行讓步。六月十日，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商討對策。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實在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授權何應欽在可能的範圍內，設法滿足日本的各項要求，何應欽在當天下午通知高橋，中國方面對於日本的要求，將完全的照辦。

不過蔣介石指示何應欽，不能以文字協定而留下記錄（這會產生國內更大的政爭），只能在口頭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應欽在六月十一日以簡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華北軍政當局同意日本的各項要求，不料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卻擅作主張，竟然自己擬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無理要求，稱之為「覺書」，由高橋帶給何應欽，要求何簽字蓋章。這個做法當然遭到何應欽的拒絕，何並電告南京，國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簽的立場。何應欽爲了避免受到日本繼續的施壓，於十三日離開北平南下，國民政府則動員部隊在河南與隴海線待命。

此時中日在華北的關係，一度陷入高度緊張的狀態，不過由於東京的軍部，以及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對於日本只以軍事威脅的姿態，就能迫使中國在河北做出如此的讓步，感到滿意，因此下令見好就收，不得再借題發揮。梅津於六月二十八日正式發佈聲明，宣稱「河北事件」結束。日方稱中國對日本要求的讓步爲「何梅協定」。不過事實上是沒有這個協定的文件，只有中國接受日本要求的口頭承諾²。

正當日本駐屯軍剛在河北「壓何」得逞之際，關東軍則在六月十一日，藉口在察哈爾張家口地區的中國守軍，檢查日軍人員證件而發生衝突，又採取軍事的高壓的恫嚇，要求駐紮在察哈爾地區的西北軍宋哲元部，向日軍謝罪道歉，同時要求中國軍隊退出察哈爾長城以北地區，日方將此事件稱爲「張北事件」。此時日本突然「又」決定，此一地區的大部分面積「應是」滿洲國的領土，同時日本準備支持蒙古人在這個地區搞獨立，所以急於佔領這個地區。在日本關東軍以軍事威脅的高壓下，國民政府最後也只有採取息事寧人的立場，將察哈爾省長宋哲元調到河北接替東北軍，並且由宋哲元的部屬秦德純出面，與關東軍旅團長的土肥原賢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簽下所謂的「秦土協定」：中國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爾大部分地區的西北軍，以及

²酒井隆擅自擴大事端，以自己製作的文件來欺壓中國的代表何應欽，在日本投降之後，酒井隆遭到中國軍事法庭判決死刑。

關閉國民政府在當地的黨政機構，也就是等於把察哈爾北部讓給日本來導演「蒙古國」的發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對華北發動軍事威脅，一舉的得到了「何梅（口頭承諾）協定」與「秦土協定」。這樣在何梅承諾中，日本強迫中央與東北軍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與國民政府分離。在秦土協定中，日本等於控制了長城以北內蒙地區，以利製造蒙古國的登場。這時南京的國民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把駐在察哈爾的西北軍調進河北接防東北軍，把晉軍的傅作義部，調往綏遠地區，在內蒙的軍政重鎮百靈廟，進行誘敵深入的戰略佈署。

接著日本岡田啓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與察哈爾對中國交涉的「成就」，通過了兩個歷史性的對華政策方針：

- 一、是由外、海、陸三省聯席擬訂的「對支政策」，內容包括了外相廣田的三個主要原則，一、中日親善，也就是中國停止排日，不得與其他國家結盟。二、中日滿經濟合作，要求中國給與日本在中國各種的經濟發展特權。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為干涉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重要藉口。這個「廣田三原則」，就成為日本對中國外交侵略的方針。
- 二、就是由陸相川島義一所提出的「鼓勵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駐華的關東軍與駐屯軍，充分利用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做為基礎，全力推動華北五省自治，以徹底消除華北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向心力。

這時日軍對於河北的分離，幾乎已經是志在必得，在中央軍領導人何應欽離北平南下，中央軍與東北軍也相繼的依照何梅承諾撤離河北，河北就出現力量真空狀態，日本當然設法抓住這個機會，對剛接任平津衛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壓力，希望宋哲元能夠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設計，宣佈河北脫離國民政府而獨立。宋哲元面對日方的強大壓力之下，實在是難以應付（當時土肥原幾乎每天幾次的找宋哲元施壓），宋只有一再急電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要求南京趕快派出軍政大員，北上處理日方的壓力，否則他與二十九軍將難以獨力承擔河北的局面。一時之間，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壓力下，宣佈河北獨立自治的謠言，已經成為日本每天預報的政治新聞。

13.4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緩衝組織

這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態非常的嚴重，國民政府在幾經商量之後，最後還是決定派遣何應欽再度北上，與日本方面周旋，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消軍委會北平軍分會的組織，以減低日本的壓力，同時授權何應欽全權處理與日本的交涉，並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軍政負責人。

何應欽實在是受夠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國民政府無人可派的狀況下，只有再度勉強上任。正當此時，日本方面又重施故技的動員關東軍與駐屯軍，在長城沿線進行擴大軍事演習，擺出一幅逼宮架勢，同時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再度出馬，對宋哲元等人，一再的進行遊說，並且擺出高壓，迫使宋哲元不得不發表華北自治的意見，使得華北再一次面臨分離的危機。

幸而此時何應欽趕到北平，宋哲元則以生病為由，把與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給了何，土肥原眼見暫時無法逼宋哲元就範，只有拉攏殷汝耕等漢奸政客，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劃為停戰地區的冀東地區，成立了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這是日本在關內地區所導演與掌控的第一個漢奸傀儡組織，並做為日本建立華北國的地區試點。

重返北平的何應欽面對這種狀況，在與西北軍將領和地方軍政領袖反覆協商之後，終於決定創設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特殊組織，來統領河北與察哈爾的軍政事務，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取法國民黨兩廣派與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名稱與架構，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離的壓力。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主權屬於中國，但是運作上，算是一個半獨立狀態的政治組織，由宋哲元出任委員長，政務委員會包括西北軍，以及地方軍政領導人，當然也有親日的漢奸。何、宋的這個政治妥協設計，於十二月十一日回報南京，得到國民政府勉強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於一方面沒有真正動員作戰的準備與決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國的外交強烈壓力，因此日政府雖然不滿意河北沒有正式的獨立自治，但是還算可以接受河北與察哈爾已經特殊化的發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從這個政務委員會下手，以推動華北的分離運動。總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與察哈爾從中國分

裂出來不可。

13.5 日本導演的蒙古國登場

日本在企圖製造河北、察哈爾與中國分裂的時候，也開始同步推動「蒙古國」的建立。因為根據日本的大陸政策，分裂滿蒙是侵略中國的基礎，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佔領了中國的東北，並且於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縱的傀儡滿洲國，對於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會積極的開始行動。

事實上，蘇聯已經早先幾步，在清朝末年就開始在外蒙古地區，大搞親俄的政治分離運動，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經一度宣佈從中國分離，隨後又在北京政府軟硬兼施的操作下，回歸中國。但是到了蘇聯共產黨掌權之後，藉口追擊白俄政權的軍隊，而進入外蒙古，接著在一九二一年，蘇聯乘著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內戰狀況之下，乾脆主導外蒙古傀儡政權宣佈獨立，當時中國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狀況，那裡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勢變化，只有採取拒絕面對事實的不承認立場。

從戰略對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擔心蘇聯會從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臨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滿洲國，所以日本軍部指定關東軍應該以滿洲國為基地，負責運作、控制內蒙古。而原來在所謂「滿洲國」的西部地區，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關東軍就將他們組織起來，向西發展，在關東軍攻佔熱河之後，更是擴大包羅了蒙古的其他各部族，更為日本將設立蒙古國傀儡政權而鋪路。

當時在內蒙地區，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的藩部領土，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國的號令，與漢人和平相處長達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國的衰弱與分裂，以及後來外蒙古的被俄國控制，都影響到他們的對於中原的向心力。當時在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發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獨立」，滿洲國的分離，處處都證明中國已經處在衰弱與分裂的狀態，所以他決定把握機會，來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與日本關東軍接觸，以取得奧援，一方面與國民政府談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實體，這時候的國民政府，只有設法安撫德王的要求，給予內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在內蒙的軍政中心百靈廟，設立了「內蒙自治政務委員會」的機構，由德王出任秘書長，這

個機構負責統率內蒙古各部族，並且實施相當程度的自主與自治。

國民政府的這種做法，滿足了相當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對於想要完全獨立為王的德王而言，還是不夠。他受到日本威脅利誘的影響，決定依賴日本的支持，來建立一個繼承成吉思汗豐功偉業的「蒙古大元帥國」。德王絕對沒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國，其實只是日本執行侵略中國之大陸政策的一個步驟（征服滿蒙），蒙古國如同滿洲國一樣，只是傀儡而已。

在關東軍攻佔熱河之後，它就經常的越過察哈爾的邊界，繼續擴張「滿洲國」的領土。察哈爾的多倫地區，是內蒙東部的重鎮，因此關東軍擅自決定在多倫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據點，好在內蒙積極進行各種的軍事與政治活動。不過由於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經與中國建立長達幾百年的深厚關係，對於日本的拉攏與脅迫，缺乏熱烈的反應，因此日本在推動蒙古分離運動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於是只有動用關東軍與滿洲國的軍事力量直接介入，並且拉攏有野心的德王，做為日本建立「蒙古國」的傀儡人選。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關東軍與滿洲國的蒙古相關官員導演下，夥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爾的嘉卜寺，成立了內蒙軍政府，由德王出任總裁，當然這個內蒙軍政府實際的軍政運作，則是由日本關東軍負責控制。但由於德王所控制的領土，侷限於內蒙的東部，而內蒙西部的各個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國，因此他們決定擺脫德王的內蒙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綏遠百靈廟另行建立自己的組織。這下可激怒了關東軍，因此德王決定派遣軍隊，在日軍的支持下，入侵綏遠，並且準備攻佔百靈廟，以建立包括了全內蒙的蒙古國。

這樣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成績」是，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分裂了內蒙大部分地區，與特殊化了部分的華北。在這些地方，分別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滿洲國、蒙古軍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個處於中、日之間，半自治狀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中日兩國還沒有正式開戰之前，中國總計有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五千萬人口，受到日本的佔領與控制。這樣的中國，還有希望與日本對抗下去嗎？

當時的中國仍然是處在一個分裂的狀態，外蒙古早已被蘇聯控制，新疆也在蘇聯支配的勢力範圍，西藏則是由英國在暗中經營。就是在中原地區，也分裂成三個不同政令的政治實體，國民政府、蘇維埃政府與西南政務委員會。另外還有大大小小十幾個半獨立狀態的省機構，形式上遙奉國民政府的

號令，事實上，所有的軍政運作，都是由其軍事首長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時代，各個擁有兵權的節度使，形式上擁有唐朝政府的名號，其實卻是獨立擁兵的「藩鎮」。內部四分五裂、外有強鄰侵略，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由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必須要在這種危急的局面之下，設法與時間進行競賽，對內推動統一以加強建設，對外準備對抗日本窮凶惡極的侵略行動。

中國在危機之中掙扎圖強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於一個非常遠大的政略目標，就是為中國爭取時間來統一內部、推動建設、建軍備戰，以準備抗日。當然國民政府知道，日本不會給中國這個時間，所以國民政府也隨時準備「最後關頭」時刻的到臨，一旦中國被逼到無路可退的時候，她就會不惜任何代價進行這場維護民族生存的戰爭。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睜睜看著日本持續不斷地對中國進行侵略，日本這種窮凶極惡的侵略做法，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早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那麼難道國民政府真的就這樣永無止境的退讓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國完全滅絕嗎？中國歷史上的宋朝，就是這樣的結局，從北宋到南宋，中國對於外敵的侵略，是幾次掙扎著變法圖強，幾次企圖出兵反擊，但是最終的結果還是一步步的挫敗退讓，一次次的割地賠款，最終完全的屈服與滅亡。

但是這次中國所面臨的侵略，其歷史處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時代還要險惡（至少宋朝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強敵又比當時遼、金還要強大太多（至少當時的敵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難道現在的中國還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現與結局嗎？中國以無比的決心，向這個歷史性的疑問發出了響徹大地

的回應——是的！中國不但在艱苦的環境下挺住了強敵的侵略，還與世界的自由國家，共同創造了世界正義的勝利。這要歸功於中華民族主義堅忍不拔的力量，讓中國人民願意付出無比犧牲的代價，堅持絕不屈服的奮戰，終於將中國由死中復生。

14.1 奮鬥圖強走出歷史的困境

當時中國的確沒有軍事力量，能與日本進行戰場的較量，因此中國政府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就是儘可能的以低姿態進行退讓，以爭取時間進行統一建設。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國的最後關頭，一旦來臨，中國無論是準備好了沒有，她都要與日本進行一場歷史的決戰，中國一旦與日本開戰，就是一場全面與長期的戰爭，中國將設法把日本捲進中國的戰略空間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戰資源。雖然日本可以設法在戰役中接二連三地擊敗中國，但是日本卻無法在整個的戰爭中，使中國屈服。

而當時日本政府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持續的對中國進行局部的蠶食性侵略，一步步的將中國分解控制，儘量避免與中國進行全面的與長期的戰爭，因為這是對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蠶食不成，中、日之間一旦爆發全面的戰爭，日本政府則是希望能夠速戰速決，打敗中國而結束對華的作戰。

所以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於一個非常遠大的政略目標，就是為中國爭取時間來統一內部、推動建設、建軍備戰，以準備抗日。當然國民政府知道，日本不會給中國這個時間，所以國民政府也隨時準備「最後關頭」時刻的到臨，一旦中國被逼到無路可退的時候，她就會不惜任何代價進行這場維護民族生存的戰爭。

當時中國的衰弱、分裂與落後，是一個數百年歷史危機困境的表現，中國無力戰勝國力強大、團結一致的日本，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歷史事實的問題，絕非是中國可以在三年五載就能解決的。這是因為整個中國民族，在長達兩百年來的歷史中，積弱不振，停留在一個封建、閉關與農業社會的衰弱狀態，所以她根本無法與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日本，進行正面的大戰。

中國必須要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工業架構，才能擁有一支

能夠帶有國家民族認同意識的現代化軍隊，來與日本軍國主義架構下的現代化武裝力量，進行生死的搏鬥。現代化的國家民族之戰，其實是一場國家總體力量的對決，從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結構、政治的制度、工業的生產到軍事的力量，都在進行競賽，最後才能決定出一場勝負。

翻開中國現代史，中國在清朝中葉以後，就走向衰弱、封閉、腐化與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國主義利用機會，以其現代化的軍力與工業技術，對中國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侵略與掠奪，更讓她陷在危亡的關頭。雖然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志士，以極大的犧牲，成功的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國之後，中國的政治權力，卻進一步陷入軍閥的手中。

這些軍閥只知道擁兵擴權，對內搜刮民脂民膏，以滿足自己無窮的私欲，對外卻卑躬屈膝，任由帝國主義為所欲為的剝削掠奪中國。因此在帝國主義的眼中，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完整與可以正常運作的國家，她只是一個奄奄待斃的民族而已。由於中國的領土廣大、人口又多，帝國主義國家暫時吃不下也擺不平如何瓜分中國的利益，因而改以「門戶開放」的方式，來共同壓榨中國的利益。但是日本因為擁有地緣與文化接近的優勢，企圖獨佔中國，進而推動其大陸政策，準備先將中國支解然後控制她一切的資源，做為日帝國稱霸東亞的本錢。

不過，中國這個民族，有著近乎不可思議的重生能力。在她幾千年的歷史之中，經過無數的歷史浩劫與災難，但是中國仍然能夠每次浴火重生，成為東亞的文明與戰略大國。雖然當中國面對工業革命之後的歷史變遷挑戰，出現了極大的彷徨與掙扎，同時在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下，更是瀕臨民族生死存亡的邊緣，但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沒有放棄抵抗的意志——她在內外交迫的危機之中，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之下，竟然挺身奮鬥，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東晉、南宋與清朝，那種越挫越餒終於亡國的歷史，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現出奇蹟般的光芒。

當時負起中國民族復興大任的，是南京的國民政府，而蔣介石所面臨的，是將整個中國處於滅亡危機之歷史性考驗，蔣介石所能設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達到整個中國的統一與團結，才能對內加快建設，也才能對外戰勝列強的侵略。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國一下子要克服的歷史重擔是如此的多，帝國主義對她的侵略與剝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別是日本滅亡全中國的計劃），這些挑戰與危機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湧到，幾

乎在與中國的統一與復興，進行時間的競賽。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的中國，能否採取遷就各個割據勢力的立場，要求國民政府停止統一的「戰爭」，而保留分裂的現況，以外表的方式聯合，推動建設與抗日？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這種看法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沒有一個有實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統一軍政運作，來推動國家建設，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達成統一的共識，最終的結果是，不但是誰也不服誰而不歡而散，而且往往會啓動另外一場新的內戰。別說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勢力，無法建立協商共識了，就連同一主義的國民黨，內部的分裂都無法擺平。

因此以武力進行國家的統一，就成爲中國復興必須付出的代價。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國家最高主權的保障與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實上，蔣介石儘量減少使用武力來進行統一，使得蔣介石在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軍政領袖，但實際上，還是無法以現代化制度來運作整個國家，或號令地方山頭完全接受中央指揮，進行抗日戰爭。在許多情況下，蔣介石必須要做出妥協與權謀的運作，才能維持統一抗日的格局。這些歷史事實，是很難以一個統一、現代化國家的政治與軍事之觀點來想像的。

14.2 設法結束分裂與內戰

在表面而言，國民黨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像中國就結束了自民國成立以來的分裂，而進入了統一。事實上，並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國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國的整個分裂與割據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繼續發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軍閥派系的衰亡與轉型，同時國民黨的勢力，在膨脹之後，立刻出現新的分裂與內鬥，也發展出新的割據力量。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長江中下游的幾省運作而已，其他地區對於中央命令，有參照辦理者，有陽奉陰違者，當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後，中國仍然每年都有內戰與衝突，規模與破壞力還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設法利用中國內戰的機會，擴大對中國的侵略。

因此蔣介石抱持著「先安內，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針，也是不得已的選擇。蔣介石儘量的設法以武力與政治手法，來統一國家。當時中國分裂

最大的力量，其一是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分裂，華北與西南對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兩個半獨立的勢力。其二是共產主義所組成的蘇維埃政府，完全不承認當時所有的中國政治現狀，要創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新國家。蔣介石把統一的主要目標，先放在圍剿共產主義的分裂政府。

蔣介石對於境內另外一個「中國」，前後發動五次的軍事作戰，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才終於擊破共黨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在共軍離開江西與長江中游根據地開始「長征」之後，在西南長期與中央分裂的國民黨勢力，也失去對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指揮。蔣介石更藉著追剿共軍的機會，首次將國民政府的軍政力量，帶入川、黔、滇，以及西北與華北的晉、陝、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變之後，更是促成了國共合作，結合力量全力對抗日本的侵略。但是這個統一，並不徹底與完全，仍然是形式大於實質，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較肯有合作的共識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國才終於勉強達成內部初步的統一，但是此時的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現代化、號令統一的國家，各地山頭（例如河北、山西、山東、四川、雲南、廣西、與中共）仍然僅是對外形式服從，對內實際做主的局面，與中央的關係，也是處於可以討價還價的狀況。因此，國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積極的建立現代化的國家社會制度，沒有這種制度做為基礎，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果，不會比甲午戰爭的結局為好。但是國民政府企圖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經濟、財稅以及政治、軍事制度的計畫，就在內戰持續，外患不斷的局勢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地開始運作。

14.3 財政、金融與貨幣的改革

拿破崙曾經說過：「決定戰爭成敗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沒有現代化穩健的財政基礎，要想進行現代化的戰爭，以抵禦外侮，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沒有糧餉的軍隊，不但不會保家衛國，甚至會造反劫掠。因此國民政府面對日本自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的挑釁，一直忍辱負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精神來理財練兵，國家才能達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這段時期的國民政府，在理財上，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建立了現代化

的財政制度。北洋政府時代的國家財政，可以說是一筆爛帳的無底洞，國民政府北伐之後，被迫接下這個財政的爛攤子。當時國民政府必須應付內戰不斷的軍費開支，債臺高築的外債，整軍經武軍隊現代化的經費，以及投資在教育、工業與農業上的費用，而負擔這項改革任務的主要領導人是宋子文與孔祥熙。

國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〇年才開始引進政府的預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國關稅自主的權力；在次年，又正式廢止清朝中葉以來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這一系列的大變革，都是在內有阻攔，外有壓力之下完成的。接著國民政府整理與廢除從清朝留下，經過各個軍閥「發明」的各種落伍與強加之稅捐項目（名目高達一千七百多種），這樣中國的財政才能進入一個利於工商投資，並讓人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

當時中國政府的預算支出，一九三〇年為四億三千萬元¹，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億六千萬元，而政府的歲入在一九三〇年為三億三千萬元，一九三七年為八億七千萬元，政府的歲入成長相當的穩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驚人（政府預算的赤字在七年裡，由一億多元，增加到三億多元）。政府預算的主要支出是軍費與償還債務，約占預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沈重的軍費負擔是因為中國的內戰不斷，以及準備抗日的建軍，而債務是加上必須償還自從清朝以來，中國所積欠的各種外債與內債，因此國民政府的預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狀況，幸而中國有極高的民間儲蓄率，才能長期挹注這個財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設法將多如牛毛的各種內外債務加以整理，製訂償債的計劃，因此大幅減輕了政府利息負擔，從而建立政府的債信。國民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政府總共所借的債務高達三十五億六千萬元，而償還的債務的總金額為三十一億元，這些龐大的預算赤字全靠國民儲蓄以及外資流入來挹注。由於宋子文的財政運作手法高明，國民政府的債信評等不斷的提升，不但銀行樂於借錢給政府購買公債，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外債評等，在國際市場中，竟然比日本的債券還要高。

在教育方面，國民政府仍然設法在不足的總預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設的經費，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預算金額為一千三百萬元，建設經費為七百萬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預算增為四千二百萬

¹本章所列金額數字的元，均為「銀元」（後與法幣等值），一元兌換0.3美元。

元，建設經費為五千四百萬元。另外公營事業資金，也從零提高為二千九百萬元，這些經費的支出，若是和軍費與償債支出相比，雖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經產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國民義務教育的入學比例，從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國開始大幅減少文盲的人數。另外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維持量與質的增加，特別是實用的理、工學系發展很快，從一九三二年起，國民政府對於教育經費，一直維持正常撥發，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對高等教育的研究，產生相當具體的獎勵作用。

民國建立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處在落後的農業時代，除了幾個對外通商的大都會，有些比較現代化的銀行之外，其餘全是錢莊與票號，很難發揮現代化工商社會的資金調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銀行，開始負責政府金融政策的運作，以及各種政府收支的金融調度。由於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軍事費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為國民政府北伐勝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後，當時中國境內的貨幣流通，仍然是以銀元為主、銀兩為輔的狀態。由於各省又有自己所發行的貨幣，而流通最廣的銀元，因為不同時期政府的發行，其含銀的成色不一，而貨幣幣值更是沒有合理的匯、兌標準，因此造成貨幣流通與兌換的困難，這對投資發展與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這種混亂與落後的金融環境下，發展現代化的工商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國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鑄造新的銀元，宣佈「廢銀兩改銀元」的政策，中國內部一切的財政稅收與經濟交易活動，都以政府新鑄的銀元標準。這樣貨幣有了統一的標準，不但稅收運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資與經貿活動可以便利的運作。

但是廢兩改元政策，隨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銀價波動的衝擊，在國際銀價高漲的吸引下，中國白銀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場貨幣流通不足的危機。因此宋子文決定推行以外匯準備為基礎的「法幣政策」，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的貨幣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國政府遊說，希望它們支持中國即將實施的法幣政策，因為中國實施現代化的法幣政策，會有利於這些國家在華的經貿與投資。不過日本則是強烈的反對，因為國民政府一旦擁有現代化國家調度財政的能力，就更能因應對抗日本的戰爭的財政需要；各地的割據勢力也拒絕合作，因為他們擔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國的發鈔權力，那麼中國在經濟上，就完成了統一，國民政府將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央政府。

不過宋子文仍然設法克服各種的困難，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宋又爭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銀行團支持，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萬難，在國民政府正式實施法幣政策。法幣的發行數量，是以中央銀行所掌握的外匯數額，做為發行的擔保，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印製的鈔票做為法幣（後來又增加農民銀行的發鈔權），以取代過去的銀元。法幣的發行，非常順利地受到整個社會的接受，因為工商業者早就期待中國應有現代化貨幣的流通與兌換，社會大眾也對國民政府穩定的權力基礎產生了信心，這是中國財政與經濟現代化革命性的成功。這代表中國國民開始認同國民政府的統治威信，也代表了國民政府有了足夠的國內外信用，來維持貨幣幣值的運作，這樣中國才能面對未來對日作戰的財政與金融運作。

中國法幣改革的順利，對日本而言是極大的震驚，因為這代表中國已經有了一個人民支持與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時中國有了自主的財政與發展現代化經濟的基礎，中國終於開始進入現代化的發展時代了²。

14.4 振興農業與發展工商

民國以來，中國的農業仍然處在傳統的架構之中。由於人口眾多，農民平均的耕地嚴重不足，農業生產根本不足以養活農家，因此農民收入有限，農村經濟凋敝。在沈重的農村借貸利息壓力之下，農業現代化的投資幾乎不存在，而農村過多的勞動力，成為軍閥部隊以及地方性叛亂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國民政府才能開始有能力針對農業問題，進行實際的投資與改革。

國民政府先後成立農業復興委員會以及農本局，以推廣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技術，協助建立產銷體系，並且鼓勵普遍設立減輕農民借貸負擔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的數目從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個，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個，相當改善了農民沈重的金融負擔，與增進了農業的生產。雖然中國主要的糧食與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進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後，進口數量已經明顯的減少，中國的農產品開始接近自給自足的

²許多傳統的觀念，一直認為宋、孔兩人，是利用與蔣介石的裙帶關係，搜刮聚斂人民的血汗錢財。這種先人為主的看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事實上，宋、孔兩人早就是中國金融界中的領袖，而也早就投身國民革命事業，成為國民黨中的不可多得的政治與財經要員，他們為中國建立了現代化的財政、金融制度，在預算調度、國際外交上，都對國家有極大的貢獻。特別是宋子文，經常與蔣介石進行預算與軍費支出的激烈抗爭。

目標。

清朝以來，中國的工業發展，只是局限於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內地幾個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國五億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勞工人口，只有一千多萬。當時中國工業結構的主體，主要是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就連多數的民生工業產品，都要依賴進口，連自給自足的條件都不存在，至於與國防有關的重工業，更是只有零星的發展而已。因為要發展現代化的工商業，主要條件是需要安定與統一的政治環境、幣值穩定的貨幣、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工，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這在當時的中國，不是剛剛開始具備條件，就是還在形成條件之中。缺乏工業化的生產力，中國就無法在與日本的正面作戰中，取得戰爭與後勤的供應。

國民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設，隨著國民政府的軍政力量，開始進入西南地區之後，中國主要的交通幹線以及通訊設備，才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國際列強也才開始願意在中國進行大量的投資。中國直到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才終於達成粗略的交通幹道，勉強地完成連接中國主要的戰略要地。國民政府基於未來戰略設計的需要，因此將交通建設的重點，放在拓展西南與西北的交通路線，以及連結華南與華東的鐵路運輸，並且打通中國與蘇聯以及緬甸的陸路交通，成為抗日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對外聯絡生命線。

總之，中國從一九三六年以後，才由國民政府解決了多年內戰的問題，中國有了較為穩定的中央政府之後，理財練兵與教育建設，才有全面的規劃及復甦的活力，這樣的國民政府才有了一個中央政府的架構，中國各地也才逐漸的在實質上與精神上，形成一個國家整體的連繫與運作。中國這時才能勉強拼湊出與日本進行民族戰爭的架勢。但是中國這個統一與現代化的發展，實際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關係就走到了最後關頭。

七七事變的爆發，使得中國根本在還沒有完成準備的狀況下，被迫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假如再給中國五到八年的時間發展，讓中國的農業能夠改造，工業能夠建立基礎，社會能夠產生更大的國家共識，現代化的軍隊能夠整編完成，那麼中日戰爭應該就會出現極大不同的發展。當然日本更為了解這一點，因此先發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戰爭，以摧毀中國剛剛開始的凝聚力，也就成為日本在戰略上的政策了。

對於國民政府的軍政領導人而言，抗日戰爭是一件相當逼不得已的選

擇，由於在滿清時代，一些日本軍政人員，都曾經支持國民黨（當時的同盟會）進行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而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重要領導人，都與日本有著相當深切的關係，因此他們極力希望日本能夠在中國的復興與發展上，給予助力而非阻力。他們也希望能夠給予日本和中國合作的特權，以東方民族的團結，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無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國主義還要凶殘的角色，決心滅亡中國，因此多數的國民黨領導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別無選擇了。

14.5 引進德國的軍事編組制度

革命軍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濟南時，日本立刻出兵山東，在濟南企圖製造中日戰爭的衝突並慘殺中國軍民。蔣介石爲了中國統一的大業而忍辱退讓，但這個極大的羞辱卻更促使蔣介石決心統一國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國如何建立一個可禦外侮的現代化軍事力量，就成爲他念茲在茲的目標。蔣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繼續地侵略中國，那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爆發，絕對無法避免，而中國要想在戰場上與日軍進行決戰，那麼自己那一套從日本學來的軍事本領，當然不夠用，因此決定採取學習當時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國軍事路線，希望藉著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魯士軍隊的組織與運作，來建設一支能夠抵禦外侮的部隊。當時德國正處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軍人被限制運作的時代，因此許多有志難伸的德軍將才，願意以顧問方式來華應聘，爲國民政府籌畫建立現代化的國防。

雖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就聘請德國的軍事人才，組成軍事顧問團，以供軍事上的諮商，但是由於當時應聘的德國軍方人員位階較低，蔣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與戰術上的諮詢而已，因此並未進行整體國防的規劃。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對於中國的侵略已經是明目張膽的在進行，加上中央軍幾次與中共的紅軍作戰，進展都並不順利，因此蔣介石決定提高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階級。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名將、前國防部長史特列特將軍 (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顧問團團長之後，德國軍事顧問團，才爲蔣介石進行中國全面國防的規劃，雖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後因健康問題回國，顧問之職由其副手福爾肯豪森 (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繼任，繼續協助蔣介石推動中國的國防建設，

福氏即成爲影響國民政府建軍以及作戰決策最深的外國人士。

德國軍事顧問團相當肯定中國軍人作戰的勇氣，以及克苦耐勞的能力，因此他們認爲，由於中國的生產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資源在大量國防人事方面，當時中國各地的陸軍總數，就有一百七十萬人，多達一百八十個師的編制，因此德國顧問建議，中國應該採取精兵制度，維持六十個常備師七十萬人，就足以應付日本三十八萬常備部隊的挑戰，中國應該把國防經費，重點擺在裝備與精訓陸軍，以及全力發展空軍，至於海軍，由於經費實在不足，只有暫時的維持沿岸防禦。

德國軍事顧問團爲中國所設計的抗日戰略是以防禦爲主的「戰線作戰」，基本上，中國在華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黃河以北的防線，而將河北與山東設爲戰區，如此可以牽制日本五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德國顧問也認爲，一旦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日軍必然會設法攻擊中國的長江三角洲，以佔領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與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國簽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議中國準備以上海爲戰爭依托的陣地戰，並且在上海—南京之間，構築兩條現代化的工事防線，利用江南複雜的水道與湖沼地形，阻止日軍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牽制日本三個師團以上的兵力。

德國顧問判斷，這樣日本除了守衛本土、朝鮮與台灣的必須部隊之外，所有的常備陸軍都已投入中國戰區。只要中國堅持下去，日本這個資源有限的國家，很難長期支持下去，到時美蘇都有可能與日本爆發利益的衝突，而捲入對日本的衝突，那麼中國就可以乘機動員更多的後備部隊，反擊日本。

德國軍事顧問建議，在南京成立仿德編制的「教導師」，在訓練成軍之後，分批的調訓其他各師軍士官，來學習教導師的編組運作，然後回去模仿成軍。蔣介石考慮中國當時的軍政環境，發現無法依照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裁撤大量的軍隊—因爲這涉及到中國所有軍政派系領導人的根本權力與利益，何況國民政府也無法處理裁軍之後的就業輔導。蔣介石認爲六十師的編制實在過於精簡理想化，因此仍然決定暫時維持龐大的軍隊編制，同時受限於財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只能進行有限的部隊改編，準備先後成立三十個整理師，三十個整編師，成爲中國對日作戰的軍隊骨幹。蔣對於德國顧問建議設立防線的工事投資，以及成立空軍則是給與全力的支持。

德國軍事顧問也認爲，中國軍隊應該利用國土的各種資源，建立自給自足的國防軍火工業，將現有的各種不同制式與規格的軍用武器，加以整理規

劃，並且引進歐美先進的兵工廠設備，改良與仿製外國部隊的各種常用武器彈藥，蔣介石委任俞大維等專家負責進行，中國逐步的開始建立自己部隊所需的基本軍火工業，不過當時中國陸軍裝備最為缺乏的是火炮支援，以及各種特殊技能的兵種裝備，例如砲兵、通訊、醫護、工兵與化學兵³。

基於長城作戰的結果檢討，蔣介石特別重視空軍的發展，因此給予空軍相當優先的支援，而空軍的投資最為需要人才與資金，在日本的壓力之下，列強都不願意幫忙中國建立空軍，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彈，當時全靠美國的退役空軍人才，幫忙國民政府草創中國空軍，在國際軍火市場中，設法引進一些零星的軍用飛機，成為飛機「大拼盤」。而義大利的獨裁者莫索里尼，突然表示願意幫中國建立空軍，免費派遣空軍顧問到中國。結果這批義國空軍顧問，卻胡亂的出主意，中國因而購買了許多根本缺乏戰力的飛機，又破壞了中國空軍訓練與發展的制度，不單浪費了中國非常有限的資源，也阻撓了中國建立起一支一流空軍的機會（義大利後來還在汪精衛的叛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穿針引線的角色）。

14.6 令日本憂慮的廬山軍官訓練班

當時中國軍隊作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高級將領人才的培訓。平均一位軍長需要二十年以上的軍旅生涯，不但要懂得戰術戰略，也要了解統兵御將，同時也要有政治、歷史、地理以及科學的修養。但當時位居這些職務的，都是前清遺老級的人物，對於德國的軍事制度與訓練，無法完全的了解吸收。因此蔣介石決定在一九三三年開辦「廬山軍官訓練班」，大量調訓各個部隊中的將校，以提高軍官素質，並建立現代化國家與國防的共識。

廬山軍官訓練班的主要目的，在讓調訓的高級軍官能夠對於現代化的戰術、戰略更為了解，對於國家民族的歷史與精神，也要有深刻的體認。蔣介石綜合日本、德國的現代化軍事進階教育，再引進戚繼光、曾國藩等人的古代軍事思想，為中國的高層軍事將領，講解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之道。這種中國與西方、古代與現代的思想與體系的結合，代表了當時國家發展的特殊

³所有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之中，只有日本不斷的在中國戰場，對華軍大量使用高殺傷力的毒氣（是日內瓦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所禁止使用的武器）——華軍不但根本沒有防護裝備，也無法以毒制毒地加以反擊，這就是為什麼日軍會肆無忌憚地用化學武器殘殺中國軍隊的原因。日本必須為它對華這種凶殘的罪行，主動負起更大賠償的責任。但是在多數的中國人都不知情的狀況下，想要日本對此賠償道歉根本不可能。

矛盾狀態——中國正處在一個過渡階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中國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設法融合這些矛盾，建立一套適合中國需要的體系。但是強敵日本，絕對不會允許中國有時間完成體系的改革與融合，蔣介石只有自己邊學邊教，摸索發展，一直在搶時間訓練中國的軍政領導人。因為中國即將以落後日本百年的體制架構，準備迎接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決戰。

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在剿共的軍事上，取得大幅的勝利，蔣介石立刻指示陳誠，在武昌成立「軍事整理委員會」，開始依照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分三年依序進行陸軍的整編與整理，預期每年先調訓、整編二十個師。這是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軍事整理計劃，不過由於內外的壓力仍在、國防經費不足，這計畫只能局部與有條件的實施，原訂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初步完成六十個師的整編計劃。但是實際上，只完成了二十個師的形式整編，裝備與訓練都還沒有真正的落實，中日之間的歷史大戰，就在一九三七年全面爆發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的威脅更是迫在眉睫下，蔣介石曾經斷然決定，不惜花費巨資，引進全套德式的陸軍師裝備，以組成三十萬精銳的教導師部隊，但是由於日本出全力阻撓，又加上義大利（德國的盟國）從中設法破壞這項重大的裝備交易，使得德國的軍事裝備，只有部分運達，總共僅裝備了八萬人。蔣介石又派遣宋子文、孔祥熙為特使，在列強之中進行友好訪問，不但洽商投資與經貿合作，同時也設法大量採購各種的軍事裝備⁴。由於廬山軍官訓練班以及德國軍事顧問團，對於中國的建軍備戰，產生了相當顯著的成效，原先中國的複雜不齊的軍隊，開始出現改變的現象，一支擁有現代化國家意識的部隊，開始在成形了。

14.7 新生活運動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又開始推動改造社會的「新生活運動」，開始以「禮義廉恥」的道德規範，為中國建立一個合乎現代化行為規律的社會。這個運動引起日本極度的警覺，日本元老政治家阿部信行，公開的發表意見，要求其朝野注意中國的轉變，特別是整編軍隊，整理財政以及「新生活運

⁴這些做法，都要設法編列隱藏預算，以躲過日本強力的破壞與杯葛，但是竟然成為反蔣派指責這是他「私用公款」的罪證之一。

動」之三項表現；連日皇裕仁都在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呈遞到任國書之時，特別詢問中國新生活運動的發展。最後日本人竟然施壓，要求蔣介石停辦廬山軍官訓練班，蔣介石只好轉往四川，改變形式，舉辦「峨嵋軍官訓練班」，調訓四川與西南的軍政領導人。

爲了因應中日未來難以避免的全面戰爭，充實兵源是一個重要的施政目標，自從清朝以來，中國實施了三百年以上的募兵制度。民國初年的軍隊，大多是農村無力營生的剩餘人力來充數，因此素質不佳，訓練不足與裝備落伍，社會上普遍輕視軍人。國民政府爲了充實兵源，希望能夠減少常備兵力，建立廣大的後備兵役制度，因此先後建立國籍法與戶政制度，然後在一九三三年公佈兵役法，規定在一九三六年正式開始實施徵兵制度，以提高兵員的質量與數量，在實施初期，就爆發了全面的抗戰，政府只有採取徵、募並行的方式，邊做邊改。結果這套粗糙的徵兵制度，雖然在制度與運作上，存在著許多的問題與副作用，但是在八年的抗戰中，還是徵召出一千五百萬的補充兵參加戰爭。

日本對於中國近乎貪得無厭的侵略，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中國當成日本稱霸東亞所必需的戰略空間與資源基地。國民政府所有建軍備戰的準備工作，都是在極度的壓力與困難下設法進行，至於國際強權，上焉者是膽小怕事，不敢也不願主持正義；下焉者像蘇聯、法國，甚至希望中、日提前爆發全面軍事衝突，以減少它自己與日本衝突的壓力與威脅。

14.8 以抗日爲由的內部紛爭

當然更爲不幸的是，中國內部竟然爲了如何抗日，而擴大紛爭，「抗日」成爲各股勢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旗號」，在中國越是需要團結抗日的情形下，中國越是出現了爲「如何抗日」而產生的紛歧：這包括了「何時抗日」、「如何抗日」、「與由誰領導抗日」？中國的各個軍政團體，不但無法達成團結，甚至爲此展開內戰——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中華蘇維埃政府則主張「抗日必先反蔣」，兩廣的分離政府，竟然一邊引進日本軍事援助，但一邊卻要求國民政府抗日。這樣五花八門的抗日大內鬥，反而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

由於落後的中國，需要長時間來完成這個攸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大計

（其實要是無任何準備，而立刻拼死抵抗日本，結果必然是失敗的），因此國民政府在面對日本的侵略與欺凌，必須採取近乎百般委屈的退讓。但是這種不能挺身抵抗的做法，又實在很難得到國人以及不同軍政派系的諒解與支持，然而這些強烈的反彈與來自內部的阻力，卻直接影響到整個建國備戰的工作，使得許多準備與計畫進行得走走停停。

這和日本推動明治維新的過程剛好相反，日本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決定以舉國之力，推動建設與改革之時，除了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曾遭到一些局部的叛亂與反對之外，日本可以說是全國上下的團結一致，來進行明治維新的改革大業，使得日本在三十年之內，改革就有了重大的成就。接著能夠一戰威震華夏，再戰擊敗強俄，日本迅速成為東亞的強國。而中國卻為如何團結、如何現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內鬥成一團糟。中日兩國的發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齊觀⁵。

14.9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後，國民政府終於可以勉強運作了，中央政府推動的各項重大財經改革與軍事整編都開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國為準備面臨與日本進行民族存亡的歷史大決戰是向前邁出了第一步。在國民政府的各種措施中，以國民政府的政令，終於可以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通行（當然在一些地方還是有條件的選擇性運作），特別是在西南地區的川、滇兩省，開始接受中央的影響力，乃最具抗日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因為蔣介石選擇未來抗戰的「大後方」，就準備設立在這兩省之中。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軍政領導人的共識是，假如中國在無法完成準備的狀況下，一旦和日本進行全面抗戰，她只能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因此中國一定要有足夠的戰略縱深，來實施這種戰略。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在面臨日本節節進逼的壓力下，國民政府的力量，遲遲無法進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戰所必需的戰略後方基地，常讓他半夜都無法入睡。在圍剿共軍成功，共軍被迫長征之後，國民政府第一次進入了西南，中國才有了所急需的戰略縱深，與對抗日本的戰略空間。

⁵直到今天，海、內外的華人，還是最喜歡結派鬥爭，特別是為了如何加強團結的議題，更要大鬥特鬥一番。

14.10 抗日準備的檢討

國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達成統一之外，在財稅改革以及推動法幣政策上，更是給予抗日作戰，建立了極為重要的財政基礎（打仗就是要花錢，而且是花大錢）。另外推動全國性的鐵路、公路以及電訊建設，使得內陸能夠與沿海地區連接，也提升了戰略支援的架構。而最後建立徵兵制度，以及整編現代化的軍隊，都是抗日作戰所不可少的基本準備。國民政府這股中興的氣勢，才剛剛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經被日本看到中國的發展有成，日本當然不能就此坐視中國完成統一與建設，因此，日本就決定加速的侵略中國，給予中國更為直接與致命的打擊。

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之前的戰略準備，發生許多重要的影響，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全面性的戰略規劃能力。不過由於這些德國軍事顧問，仍然受限於德國本位的軍事經驗，同時採用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壕防線作戰 (Trench Warfare) 的戰略，因而造成一些國防資源的錯置與浪費，也影響到後來的全面抗日戰爭的果效⁶。因此德國軍事顧問建議國民政府以極其有限的資源，在中國的華北的黃河兩岸與隴海鐵路，以及華東的京滬與江南一帶，進行大量的國防工事建設，結果這些耗資數千萬元的國防工事，在後來的抗日戰爭時期，絕大多數都沒有發揮真正的作戰效果。如果將這些可貴的經費，移在內地的兵工廠投資，以及增強部隊攻堅火炮的裝備與訓練，會發生更大作戰的效果⁷。

而中國直接購買德國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費，因為這些德式武器並不十分適合中國兵的體型與戰場環境，其實當時中國應該使用更多的經費，在更為深入的西南內陸地區，營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廠與相關的工業，提高部隊火炮的裝備與訓練，另外加強部隊通訊與醫療的投資，應該會對於抗戰實力，會更有實質與重大的幫助。

此外德國顧問也低估了日本一旦與中國作戰時，進行全國總動員的總兵力。日本的後備軍人，多達四百萬人，是常備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國顧問建議，中國維持六十個師的精兵數量，是不足以因應中日作戰之需要的。不過蔣介石編制的華軍部隊，數量又過於龐大，在抗戰開始時，中國的三軍已經

⁶德軍之攻勢作戰的戰略思考，也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才邊打邊琢磨出來的，當時歐洲國家的國防政策，都沈迷在建築防線的思考之中。

⁷抗日戰爭時，中國部隊最為缺乏的裝備，包括足夠攻堅的重炮、步兵使用的輕型火炮及通訊的裝備，這種裝備落伍的情況直接造成華軍部隊難以在戰場上取得攻擊的優勢。

達到二百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六百萬，兵員人數實在是過於偏高，因此造成軍隊質量的大幅下降、財力的嚴重消耗，以及徵兵過多的民怨⁸。

同時德國顧問建議中國部隊的作戰編組與方式，都過於德式正統化與正規化，當時中國的軍事文化尚未建立，軍官與士兵的素質與訓練仍然嚴重不足，裝備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設計一套軍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戰爭，以充分利用中國能夠進行消耗戰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戰之後，日軍在華北的戰線，大體是在德國顧問的預料之中，中國軍隊阻日軍於隴海線以北，只是日軍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區。但是在華中戰線上，日軍則是一直深入到湖北與四川的交界，同時日軍也佔領了華南沿海地區，幾乎完全阻絕了中國外援的通道。不過日軍所控制的地區，最多只有帶狀區域，其餘多數都只有據點與交通線而已。

⁸事實上，抗戰時中國大量擴張軍隊編制，造成政府無力負擔沈重軍費的支出，軍士官的待遇是淪為近乎無給職的狀況，士兵連吃飽都很勉強，武器與彈藥也不足，士兵的營養、體能與戰技都難以達到應用的標準，也使得幾乎每支部隊都有吃空名的行規，才能維持周轉。

中國的內憂與外患

整個抗日戰爭的歷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複雜的變化，主要原因是，中日戰爭並非僅是中國與日本兩國之間的交戰而已，而是涉及到中國追尋自己生存與命運的鬥爭，以及國際強權對世界利益分配策略的大決戰。中國內部的國共分裂與其導致的內戰，更是影響到整個抗日戰爭——從準備到結束——歷史發展的最重大事件。

在滿清末年，中國內外可以說是情勢洶湧：中國不斷受到外來的侵略，造成她一再簽下喪權辱國與割地賠款的條約；同時中國的內部，又在封建政權顛覆無能與腐敗的雙重打擊下，使得國家面臨了空前的歷史危機與變局。中國一方面出現救亡圖存的奮鬥，一方面也出現民族自信的掙扎。經過多次的革命運動，與歷史脫節的滿清政府，終於被推翻，但是中國人對於如何治國與建國，卻沒有達成共識。所以民國成立之後，中國只是形式上算是一個國家，事實上根本是個四分五裂的政府，最後權力落到軍方實力派系的手中，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當然國際強權也沒有放過欺凌中國的機會，在幕後支配各種軍政勢力，以大量的借款而取得剝削中國利益的機會。

15.1 民國初年中國嚴重分裂的危機

不過，在這些不同的軍政勢力之中，最有組織與潛力的團體，首推國民黨與共產黨。國民黨來自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團體的結合，企圖建設一個有中國歷史特色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則是來自蘇聯之「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簡稱 Comintern) 的推動，企圖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同時，在侵略中國的國際強權中，又以蘇聯與日本，對中國有著直接侵略與佔領的野心與計畫。這些國際強權不斷的利用機會，介入中國的內亂，以爭取重大的利益，當時蘇聯對於中國全面的赤化，有著特殊的急迫性，那就是要讓中國成為蘇聯支配下的抗日砲灰。日本則希望中國全面分裂而永遠受其宰割，它當然非常擔心蘇聯赤化中國，因為中蘇結合的赤色力量，將會導至日本的覆亡，所以日本更以防共為藉口，加速侵略中國。

若以歷史的事實而論，抗日戰爭在整體的作戰與外交上，是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負起主要的責任，但是在文宣、社運以及游擊戰方面，卻是由共產黨影響整個的潮流。由於國際社會，故意的要降低中國對於反法西斯作戰的歷史貢獻，所以當時許多的外國學者與政客，總是想盡辦法，污蔑中國沒有抗日、對盟國毫無貢獻，所以英、蘇、美等強權可以出賣中國的利益，以加速戰爭的結束。他們歡喜引用國民黨說的『共產黨沒有抗日』，以及共產黨說『國民黨沒有抗日』的矛盾，而得到一個簡潔的結論：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沒有抗日。這當然使得中國的抗日歷史事實，受到極大的扭曲。

15.2 國民黨力圖振興中國

國民黨是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領導政黨，但是民國成立之後，中國為軍閥割據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後，國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負起領導中國的政治責任。雖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國都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內部的割據勢力形成山頭與諸侯，外部強權的侵略佔領著中國廣大的領土，造成國民政府實際上，只是統領長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當時國民政府需要面對的歷史挑戰是不斷的內戰割據，以及所有的外債賠款，加上蘇聯、日本等強權的侵

略威脅。

面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侵略，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有著無限的無奈與困難。當時中國正處在「國不國」的分裂與落後的狀況，國民政府無法與日本進行全面作戰，因為一旦正式宣戰，日本可以輕而易舉的佔領全中國，所以國民政府只有設法忍辱負重的與日本的侵略周旋，以爭取國家的統一，與建設的推動。但是國民政府準備抗日作戰的佈署，卻被人民認為國民政府「不敢」對日作戰：於是什麼親日、漢奸的帽子，都戴在國民政府的頭上。

雖然國民政府許多領導人，都是留日的學人，也與日本政界有著一些個人的關係，但是國民黨並非是一個親日的政黨。就以蔣介石而言，他曾經在日本求學，接受軍事訓練，不過蔣介石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擁護者。假如說要論蔣介石對國際社會的態度與傾向，應該是比較「親美與崇德」，日本還沒有資格輪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國民黨的一些領導人，曾希望中、日兩國基於文化、種族的接近，能夠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對於日本的侵略，國民黨的領導人同樣感到不能接受。但實際的問題是：假如要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歷史的決戰，中國必須先要有準備。這就是蔣介石與國民黨多數領導人的立場。國民黨抗日的意志是經過事實驗證的，要不然就不會有後來中國孤軍堅忍抗日作戰的悲壯歷史事蹟，以及中國躋身成為全球四強歷史地位的光榮了。

15.3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而由蘇聯第三國際指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其根本的主張是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在本質上，是與日本右翼反共的軍國主義，站在不共戴天的地位。何況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要保衛蘇聯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問題上，採取與蘇聯絕對一致的立場。所以中國共產黨從頭到尾，都是「主張抗日」，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卻又有極大的差異——抗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生存與發展的最佳手段與工具。國共兩黨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國團結抗日的形象，但是國共兩黨仍然各自留有對付對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時，仍然有著相互鬥爭的地方，也分散了實力。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在共產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不是中國選擇共產

黨，而是共產黨選擇了中國。因為在蘇聯成爲共產主義國家之時，中國只是一個封閉與落後的農業國家——她根本就沒有工業化的社會結構，也沒有資本家與勞動階級的對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興趣，多數來自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產階級，人數極其的有限。

但是蘇聯共黨政權，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若要生存發展，最佳的戰略佈署，就是設法讓中國與印度赤化。以這兩國土廣民眾的國家，做爲顛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最佳橋頭堡，列寧的名言：『從莫斯科經北京、加爾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這個戰略的生動說明。何況蘇聯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繼承了帝俄侵略中國的大東北與大西北的基業，建立了西伯利亞的戰略空間，更想進一步的控制中國的蒙古、新疆與東北。蘇聯共黨當然不會忘記，它與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政府有著不共戴天的歷史仇恨，以及爲爭奪東北亞戰略地位的利益衝突。

所以蘇聯的共黨政權，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動的對中國示好，列寧居然慷慨的表示，要考慮歸還帝俄時代對中國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動撤消帝俄時代，對中國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條約¹。蘇聯一方面在當時中國分裂的勢力之中，尋找利益代理人，曾經支持過西北軍的馮玉祥，也設法與廣州的國民政府建立關係，更重要的是，蘇聯一方面也決定全力輔導成立中國共產黨，以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革命」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於上海（這一年正是蘇聯正式併吞外蒙古，準備建立傀儡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正式的黨員只有五十三人，參與開會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蘇聯的第三國際共黨代表馬林(Maring)主控會議，推舉陳獨秀爲總書記。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所主要關心的議題，是如何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與蘇聯共黨共創一個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之社會，而非從復興中華民族與其歷史之觀點，進行建設富強之中國的歷史大業。

15.4 國共的合作與分裂

不過由於中國當時並沒有工業化，也就沒有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階級的嚴

¹當然這全都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列寧一上台，蘇聯就設法佔領了中國的外蒙古(1921)，不但繼續控制了中國東北北部，它參加八國聯軍向中國壓榨的庚子賠款是一分都不還。另外，所有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蘇聯從來一條都沒有放棄過，同時它還繼續侵略中國的新疆省。

重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很難利用勞工的力量，進行發展。因此在蘇聯第三國際的直接指導之下，中共主動與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進行多次的接觸與協商，希望能夠達成國共合作，以加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而當時的國民黨，正處在致力消滅割據軍閥，對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剝削的時期，極需外來的援助，蘇聯以提供政黨組織、運動群眾、建立黨軍、提供經費與武器的條件，在一九二三年與國民黨達成國共合作的協議。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黨政軍組織與架構，充實了共產黨的黨政軍功能與力量，建立一個有全國性軍政力量的政黨。

也就是得到了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的黨政軍力量迅速的得到強化，聯俄容共之後的國民政府，組織力量大增，眼見軍閥割據的勢力，已經面臨人心厭倦，力量耗竭的崩潰地步，於是它決定在一九一六年發動統一中國的北伐。國民黨的軍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現了勢如破竹的凌厲戰果，打得軍閥勢力潰不成軍，但是國民黨內部，以及與共產黨之間，也立刻面臨如何共處，以及如何處理所獲得戰果的大問題。

到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剛攻下長江以南的地區，其內部就爆發了寧漢分裂的危機，同時也就引爆了國共間的重大歷史衝突，國民黨在南京的勢力，決定在當年的四月十二日採取清共的政策，接著在武漢的國民黨也決定與共產黨分裂，國共之間的武裝衝突也就無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員主控的一些國民黨部隊，以朱德、賀龍與葉挺為首的軍隊，在江西南昌發動兵變，與國民政府決裂，建立獨立的武裝部隊。

接著在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全面清算陳獨秀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領導人，宣佈全面脫離國民政府，而獨立進行革命路線。之後中共各股的力量，設法在廣東、湖南等地進行武裝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彭湃所領導之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的海豐與陸豐地區，正式建立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從此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內部，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與新的國家。

由毛澤東在湖南首創的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轉戰於湖南、江西後，與朱德的部隊在江西井崗山會師，建立了紅四軍團，井崗山很快就發展成為中共最大的軍事與政治中心。而中共其他地區的軍政力量，也開始在長江中游與華南一帶，紛紛成立工農紅軍的武裝力量，最高達到十二個紅軍組織。這些紅軍所到之處，都成立了以工農民武裝革命為主的蘇維埃政權，無論是

「紅軍」還是「蘇維埃」政府，當然都是模仿蘇聯軍政架構的舶來品。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運作，更是直接受到蘇聯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指揮。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成爲另外一個新的「國家」，在長江中游以及華南山區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一帶，非常迅速的發展，成爲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最大的威脅。

在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中，一切的資本主義與其所代表的帝國主義，都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消滅的頭號敵人。對於受到蘇聯直接支持與指揮的中國共產黨而言，當時的日本在日皇的封建主義、日本財閥的資本主義與軍人的軍國主義組合之下，它成爲一個極端反共的國家（同時日、俄還有歷史的仇恨與戰略上利益的衝突），日本的軍國主義既然是蘇聯最大的威脅，當然也就成爲中共的首號敵人了。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既然是第三國際中的成員，當然是要把「打倒日本」，「保衛蘇聯」，視爲政黨重要的政略目標。因此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其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以及與蘇聯共存共榮的關係等特性，必然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採取堅決對抗的立場。但是其出發點，主要不是站在保衛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而是站在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並且是爲了支持蘇聯與日本的歷史對決才採取抗日的政策。

15.5 中國共產黨抗日策略的變化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震驚了整個中國，當時控制蘇維埃區的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場。但是當時中共抗日的的基本論點是，爲了維護全球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捍衛蘇聯，因此要求中國人民起來抗日，而其具體的行動內容是，要求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這樣才能進行抗日。其後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中共更是號召軍人與群眾，進行反國民政府的鬥爭，只有推翻國民政府，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府，同時與蘇聯的力量結合，才能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這是中國共產黨獨力要推動抗日的時期。

當時多數的中國人民，對於國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負重，對日本的侵略退讓，已經失去了耐心，對於中國共產黨明確的抗日立場，也給與奇特的反應，因爲他們需要有人領導抗日，但是他們不懂爲什麼共產黨的抗日，不是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而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老實說，早期投入積極抗日運動的人士，多數是中產階級與學生，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工農大軍」，多數的中國人，對於所謂蘇維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義，所以真正響應中共抗日號召的，人數相當的有限，但是讓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的激進抗日立場，有著較為深刻的印象。

這時中國共產黨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針，在於「先反蔣，才能抗日」，目標在於保衛無產階級與蘇聯的利益。中共非常善於利用日本侵略中國北方的各個機會，只要蔣介石必須抽兵北調，紅軍絕對尾隨攻擊中央軍與擴大地盤，根本不給國民政府任何機會，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動員兵力，與日軍作戰。紅軍這種利用蔣介石抗日來打擊蔣介石的做法，當然使得國民政府認為，中共的紅軍是中國抗日最大的內憂，於是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內，才能攘外」。安內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肅清紅軍的力量，如此國民政府才能完成統一與推動建設，以培植中國的國力與日本作戰。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澤東與朱德聯名發表抗日宣言，開始有了立場的轉變，中共要求中國所有的政治與人民的力量（除了國民黨之外）與中共聯合，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堅決的抵抗，抗日不再是爲了全球無產階級以及蘇聯的利益爲前題。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當時中國正遭到日軍攻佔熱河，以及威脅平津的危機之時，中共更進一步的發表宣言，清楚的強調，中共希望中國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應團結起來（這時共產黨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於工農與無產階級了，也包括了國民黨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國民黨停止對蘇區的進攻），對抗日本的侵略。不過中共仍然沒有放棄抗日反蔣的基本立場。蔣介石也沒有鬆動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方針，在日軍侵略的壓力下，國共之間的戰爭，一直在激烈的進行著，除了政權與意識形態之爭外，對於如何抗日，雙方的立場也是完全對立的。

15.6 中共的長征

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最爲擔心的，正是中國的全面赤化，因爲中國的土廣民眾，一旦接受共產黨的統治，並與蘇聯聯合成爲共同反日的力量，那麼

日本絕對是無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說什麼也不能允許共產黨的勢力，在中國發展成功。蔣介石若是積極剿共，日本政府還可以給國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時間，假如蔣介石採取聯蘇容共的政策，那麼日本政府只有對中國提前採取斷然的行動。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國共戰爭中，蔣介石開始明顯的居於優勢，當年十月十四日，蔣介石的部隊迫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瑞金，於是中共中央決定依照計劃突圍撤退，而進行「長征」，紅軍從江西經過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最後到達陝西北部，蔣介石的部隊則一路的追擊圍堵，順帶對沿路的諸侯，進行招安的工作，紅軍的實力在長征途中，則是遭到了極大的損失。

這時長征的紅軍，常以抗日為名，不斷的發表聲明，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而對日本進行抗戰。同時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開始了解，要繼續「抗日必先反蔣」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事，蔣介石已經成為中國實力最大的軍政勢力領袖，假如中國要抗日，反而非要蔣介石領導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變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第三國際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抗日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國所有黨派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之後中共又多次發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國內部團結，組成抗日的政府與軍隊，同時對於國民黨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國社會發出的，中共並沒有直接與國民黨進行連繫。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國共產黨終於正式的對國民黨發出共同抗日的電函，正式稱國民黨為貴黨，承認蔣介石為國民政府的委員長，並且表示同意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與國防政策，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進行抗日合作的談判。這時中共的策略，已經由「反蔣抗日」，大幅的轉向，改成「聯蔣抗日」與「迫蔣抗日」了。

15.7 蔣介石的聯蘇的抗日策略

由於蔣介石的安內政策，在五次圍剿紅軍之後，終於獲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長江中游與華南發展的幾十萬紅軍，在經過長征到達西北只剩下

幾萬人而已，同時蔣介石的軍政力量也開始進入西南的戰略腹地，這時（一九三四年）蔣介石開始考慮到抗日的國際戰略局勢。因為中、日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更是全球列強利益發展的全面衝突之一，要想贏得戰爭，中國與日本都需要爭取國際社會對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別是需要掌握到戰爭資源的供應，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所在。

這時日本已經以「反共反蘇」的政策，獲得了德國與義大利的結盟支持，而國際社會雖然多數同情中國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滿自己在中國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當時沒有一個國家敢與日本正面對抗，也不敢積極支持中國的抗日建軍計劃。只有蘇聯因為與日本的矛盾，而會在某種程度之下，「支持」中國抗日，以及德國因為擔心中國全面偏向蘇聯，所以也有限度的支持中國建軍。

蔣介石知道，中國只有完成統一與現代化之後，才能推動工業化與社會改革，這個工程涉及到中國整個文化、社會結構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完成，因此中國若是與日本侵略者爆發全面的戰爭，中國一定要設法爭取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既然當時英、美的綏靖政策，不能協助中國抗日，那麼存在於蘇、日之間的重大歷史矛盾，應有中國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蔣介石開始運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夠與蘇聯當局溝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蘇聯當然是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才願意與國民政府談判結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國、共之間，終於開始了祕密的接觸，彼此商討有關團結抗日的條件。蔣介石也開始安排放棄必須完全的安內、才能抗日的政策，蘇聯則在等待國民政府容共之後，再談支援中國抗日的條件。所以反共的國民政府，最後也走上了「聯蘇、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明確的提出團結中國所有不同的軍政力量，共同對抗日本，這種基於民族主義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著當時多數的愛國青年，造成中共能夠迅速的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學運與工運的各種組織。許多愛國的青年，就是因為共產黨明確的抗日主張，而投效共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並非認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²。在當時中國的輿論，以及社會的認知，多數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堅決

²作者的先父就是其中的一位愛國青年，遠從廣東到延安參加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是林彪）

主張抗日的團體，而國民黨則在瞻前顧後推拖抗日的行動。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產黨。

當時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而沒有看到蘇聯對中國蒙古與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國民黨與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戰，而沒有看到共產黨對蘇聯侵略中國從來沒有反對的批判。由於日本侵略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成了中國必須對抗的強敵，可是蘇聯對中國領土與主權長期、一貫的侵略，卻沒有受到中國應有的覺醒與防備——國民政府聯蘇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國社會普遍的支持。這只能說明中國所遭到的歷史困境之險惡，中國無法顧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聯合次要敵人，對付主要敵人。

歷史的結果是，在中日爆發全面的大戰之後，國民黨爲了抗日是拚掉血本，共產黨則在抗日戰爭之中，發展成爲可以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壯大實力，蘇聯是白白撿到中國抗日的成果，並成功地使中國赤化，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是仍然受到美國特殊的照顧與待遇。這就是爲什麼抗日戰爭成爲中國近代史中，最爲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這場戰爭，也成爲關係中國命運發展最爲深遠的巨變。

最後關頭之前的最後努力

從一九三五年開始，南京的國民政府，開始與日本進行全面的外外交觸。國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發全面戰爭之前，盡可能地讓日本明白，中、日是處在「合則兩利」的歷史關鍵時刻，如果兩國一旦爆發全面的戰爭，無論是誰獲勝，最後都將會給西方帝國主義，以及蘇聯共產主義，佔到便宜。雖然中國這種看法非常具有歷史的眼光，卻仍很難讓日本軍方的強硬派真正的醒悟。當然中國政府也希望能夠利用外交談判，拖延中日兩國之間戰爭爆發的時間。

日本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以蠶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國。因此日本先強佔東北、再熱河、再內蒙，再河北，一步步擴大對中國的佔領。但是這個政策的前題是，中國內部要繼續不斷地分裂，她才會繼續對日本的侵略讓步。日本所擔心的是，假如中國開始團結與復興之後，終有一天會對日本的侵略拒絕低頭，而採取一場全面抗戰的反擊。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繼續執行其大陸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國的反撲，也就是它將以和戰互用的手法來侵略中國。

時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蠶食中國的政策，開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為這時候的中國，已經不是九一八事變前後，陷在分裂與落後的歷史危機中的國

家了——在這幾年當中，國民政府採取軍事與政治力量的交相運用，努力使得中國的政治結構，出現了逐步統一的局面，國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設與發展的初步力量。中國有了這樣的基礎，就開始與日本進行交涉與周旋，對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讓了。

爲了避免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決戰，日本開始推動對中國和、戰兩手並進的攻勢：在外交部門，是執行廣田三原則的政治謀略，企圖以外交手段與南京的國民政府進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國政府放棄對抗日本的政策，而淪爲日本獨特勢力範圍支配的保護國；而在軍事部門，則直接在華北對地方的軍政負責人施壓，企圖迫使他們放棄與南京的聯繫，而接受日本的華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圖將華北五省，從中國的主權脫離出來，而成爲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國民政府成功的實施法幣政策，並且推動國家的農業改革、工業發展與交通建設，以及有計劃的整編軍隊、大幅的改進教育、開始成立與運作各級的政府行政組織，這些都是中國開始現代化的表現。假如能夠再給中國五年的時間，那麼中日之間國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縮短；假如再給中國十年時間來建設與發展，那麼日本還能不能與中國在軍事上較量，恐怕都有問題了。這就是當時中國領導人與部分有識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爲中國爭取五到十年的時間，以完成更多的準備，這樣中國就可以有實力與日本進行爭回國權的交涉了。

16.1 兩廣的統一

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後擊破紅軍在華南與長江中游的根據地之後，接著需要著手解決的政治統一問題，就是兩廣與中央的分裂。雖然蔣介石在政治上，對於兩廣的分離政府，採取以和爲貴的低姿態，希望能夠和平解決兩廣與中央的歧見，在先後召開的國民黨四全與五全大會中，不斷的妥協，給足兩廣代表的面子，但是兩廣的軍政領袖，如胡漢民、鄒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對於蔣介石懷有極深的防範與敵意，兩廣政府仍然整軍經武，同時經常派人與華北的軍政勢力進行連絡，以隨時準備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進行軍事對抗。

日本對於介入兩廣與南京之間的分裂，一直抱著極大的興趣，希望能夠

再度引爆中國的分裂與內戰，以削弱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與兩廣高層軍政人士有過往的日本軍政領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人，前往兩廣進行反蔣遊說。此舉雖然沒有達成收買兩廣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牽制蔣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甚至聘請日本軍事顧問，接受日本的軍事武器援助，以強化桂軍對抗蔣介石德式裝備整編軍隊的能力。當然兩廣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做爲反蔣的理由。兩廣政府領袖痛批蔣介石的政策，從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塘沽協定，無一不是南京政府「喪權辱國」的賣國表現。雖然兩廣政府反蔣的情緒極其強烈，但是它還能守住中華的民族大義，不願成爲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廣東的政局有了很大的變化，五月，國民黨的元老胡漢民去世，鄒魯又被迫離開廣州，廣州方面由陳濟棠控制大局，而此時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肅清江西、湖南的紅軍，並且正在積極的修建粵漢鐵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經向南發展，而接近兩廣的勢力範圍，因此造成其軍政領袖的緊張。於是兩廣的領袖決定先發制人，以日軍在華北增兵、國民政府沒有決心與日本決戰爲理由，聯絡華北的山頭勢力，討伐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兩廣政府正式出兵北上，進入湖南與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對日宣戰，他們將會進攻南京，同時兩廣政府派員到華北進行遊說，希望再組反蔣的軍事同盟。

此時華北的軍政領袖，由於經常在日軍強大的壓力之下，深知對日宣戰是非同小可的歷史決定，他們雖然不見得完全願意支持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但是他們卻了解，目前中國若是要對抗日本，必須團結合作，爭取更多準備的時間，並且絕對不能再開內戰。所以宋哲元、閻錫山、傅作義、韓復榘都先後宣佈，不參加兩廣政府的抗日救國軍。華北的軍政領袖，既然不願支持兩廣的軍事討伐行動，兩廣的抗日救國軍也就更爲人單勢孤了。而此時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不但已經將軍政力量擴大到了西南，同時在各方面的建設與發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勢，單憑實力，兩廣實在很難挑戰蔣介石與國民政府。

由於兩廣軍政領袖師出無名，在廣東的空軍與陸軍先後投向國民政府之後，兩廣的反蔣勢力迅速瓦解。蔣介石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五全的二中全會，會議通過正式撤消兩廣的「西南政務委員會」組織，兩

廣直接歸併中央直接領導。廣東的陳濟棠在眾叛親離之下，只有離職到香港。九月中旬，蔣介石再親自到廣州與李宗仁會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終於同意出任國民政府委派的職務，從此與南京分裂長達六年的兩廣，終於重新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號令，中國更朝向統一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南京的國民政府，當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規模與實力，此時蔣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內政統一問題，就是與紅軍之間的較力了。

此時日本也了解中國的轉變：一個由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個統一的政治架構，中國不但在理財練兵上，開始理出頭緒，中國甚至在社會、教育、文化、工業與經貿等方面，都出現了真正的進步。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感到緊張，假如再讓中國繼續這樣發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時間，日本將難以招架中國復興的強大實力，因此其內部出現了檢討大陸政策發展的新爭議。

但是對於日本的少壯派軍人而言，侵略中國以及建立軍國主義的大政方針，是他們願不惜任何代價繼續推動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壯派軍人，對於政府部門瞻前顧後的做法，大感不滿，終於正式決定，發動流血的軍事政變，以建立軍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壯派軍人所主導的二二六政變，刺殺日本政府的內閣閣員，並且包圍日皇皇宮。雖然整個政變最後還是被效忠日皇的軍隊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權力，從此完全的落到了軍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敢違逆軍人的意志。因此日本從此正式的步上軍國主義的方向，至於何時與如何全面侵略中國，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交互動接觸

在這個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開始與日本進行全面的外交接觸。國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發全面戰爭之前，盡可能地讓日本明白，中、日是處在「合則兩利」的歷史關鍵時刻，如果兩國一旦爆發全面的戰爭，無論是誰獲勝，最後都將會給西方帝國主義，以及蘇聯共產主義，佔到便宜。雖然中國這種看法非常具有歷史的眼光，卻仍很難讓日本軍方的強硬派真正的醒悟。當然中國政府也希望，能夠利用外交談判，拖延中日兩國之間戰爭爆發的時間。

因此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中國政府就與日本的駐華大使，以及中國駐日大使與日本政府，進行雙向雙線的一系列接觸與談判，特別是中國駐日大使董作賓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以及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之間的會談，最為深入與全面性，中、日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圍繞著所謂的廣田三原則，千方百計想要在談判桌上，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控制中國的條件，根本就沒有任何平等與尊重的立場可言。因此儘管中國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夠了解，中、日相爭最後的結果，絕對是兩敗俱傷，而讓美國與蘇聯取得支配亞洲的機會，但日本方面絲毫不為中國的遠見所動。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觸，只成爲了日本壓迫中國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對於國民政府與中共紅軍和蘇聯之間的關係發展，是非常的重視，因爲日本與蘇聯以及共產主義，最終必然要有一場決戰，這是日本無法逃避的歷史命運，而當初日本急於侵略中國東北、內蒙與華北的戰略目的之一，就是爲了爭取抗蘇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日本最大的戰略惡夢，就是中國全面的赤化，而成爲蘇聯所支配的附庸國，那麼日本在華將會陷入被南北夾擊的危機之中。

因此當中國共產黨的紅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幟，從中國的西南折向西北運動之後，日本對於國民政府的壓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軍部，包括關東軍與駐屯軍，都一再的發表聲明，假如國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殲滅北上的紅軍，那麼日本只有自己動手來攻擊紅軍了。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華北日軍壓迫國民政府的最主要藉口，而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現，就是日本要針對中國共產黨力量北上的先制防禦行動之一。之後，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改編，以及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人宋哲元沒完沒了的壓迫，也都是著重在「防共」的戰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一度表示爲了抗日，由陝西進入山西與內蒙古邊界，引起了日軍極大的警戒，日軍藉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過擴編其華北駐屯軍的議案，以準備迎擊共軍北上的挑戰。日本在華北駐屯軍的司令官職級，提升爲日皇親自任命的中將軍官，並且擅自違反了辛丑和約所規定駐屯軍的數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華北的日本駐軍。日軍公然表示，爲了防止中國共產黨的部隊進入華北，日軍隨時準備在華北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出任改組之後的駐屯軍司令官，並且增派第五師團中（日本的「鋼軍」）的

一個旅團，駐進天津與北平之間的日軍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衝斡旋

日本在華北採取政治與經濟的兩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宋哲元，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威脅利誘，並且直接與華北其他的軍政領袖進行接觸，希望華北能夠正式的脫離南京的國民政府，而以所謂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與滿洲國的政治與軍事合作體系之中。宋哲元的確受到日本極大的壓力，華北是否脫離國民政府而自主，幾度都在危機邊緣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後通牒的方式，企圖脅迫宋哲元接受華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這時候的宋哲元，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將領，而是擁有冀察兩省軍政經權力的地方大員，二十九軍也從最初的兩萬多人，擴充到二十多萬人的地方性大軍實力（包括各種保安隊等武力），而日本對於策劃華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試想連黃郛與何應欽兩位國民政府的重量級人物，都不堪日本軍方在華北的壓力，如何讓政軍實力有限、與國民政府關係較淺的宋哲元能夠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底線，卻仍有不可動搖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雖然幾次在日本的壓力下，走向與國民政府分裂的邊緣，但是每次在最後關頭都能出現轉機，而讓日本人要華北分裂自治的計劃落空。宋哲元有時利用南京的立場作為擋箭牌（這時的南京政府，已經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構與氣勢，講話自然有影響力了），否則乾脆以養病請假，讓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對象。當然二十九軍部屬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團結堅定認同國家，都增加宋哲元應付日本壓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則上，能夠守住底線，不作日本的傀儡，卻不得不在經濟與行政上，經常要對日本的勒索與壓力讓步。日本在河北，透過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種走私的活動，以破壞華北最為重要的海關稅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組織的販毒活動，以此增加顛覆中國的經費，與控制漢奸活動的手段。日軍在河北平津一帶，更是肆無忌憚地經常舉行軍事演習，公然挑釁二十九軍。

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軍在華北就爆發了兩次武裝衝突——豐台事件以

及大沽事件——對中國在華北的主權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宋哲元採取息事寧人的退讓態度，拱手將戰略要地豐台，讓給日本駐屯軍¹。宋哲元在日本的壓力下，也聘請日本顧問參與行政決策，招納了惡名昭彰的漢奸政客，成為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官員，一時之間，河北已經有著日本橫行的危機了。

宋哲元對於這些侵害中國主權的活動，只有閉半隻眼、避重就輕加以處理，事實上與當初張學良在東北的對日政策，也所差無幾。日本除了對華北進行軍事與政治的佈署與侵略之外，更是著重經濟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對於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內進行各種鐵路、港口的建設，以及礦產工業的開發，也做出許多的讓步，日本多家「株式會社」開始出現在華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與察哈爾的行政組織與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協。日方因而認為，雖然一時之間還不能讓華北完全的脫離中國，但是日本的影響力，已經從各個方向，大幅的提升，華北已經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之東北的形勢了：日軍可以公然的演習、漢奸可以隨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職、日商擁有各種剝削劫掠的特權。此時華北在政治上雖然沒有易手，但整個運作已經由日本在幕後遙控了。

從東京與南京之間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雙方在華北為主權問題的直接交手看來，中、日局勢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兩國距離最後關頭的全面攤牌，事實上已經不遠。一九三六年底的百靈廟之戰，以及緊接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更清楚地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分裂、內戰不息的烏合之眾了，中國開始有了勵精圖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還要對她步步進逼，那麼中、日雙方最後必然要走上決裂的地步。而之後的七七事變所以會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只是反應了日本決定要與中國提前攤牌的一個藉口而已。

16.4 百靈廟之戰

日本的華北自主方案，是準備把長城以北的地方，劃給日本操縱的蒙古國，這個計劃是由關東軍負責推動。自從蒙古部族的德王，甘願成為日本所操縱的傀儡之後，關東軍當然是全力支援與裝備德王的部屬，幫忙他擴大偽

¹在辛丑和約中，外國在平津的駐軍地點，並不包括豐台，日軍強行在豐台駐軍，是根本無法無據的。

蒙的版圖，並計劃由察哈爾入侵綏遠。德王在得到日本的軍事援助之後，開始動用兵力，侵入綏遠，目標是先截斷平綏鐵路，然後指向國民政府在百靈廟所設的內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隊開始進入綏遠境內，眼看中國的領土又要進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與佔領了。

由於關東軍對於自己所訓練的德王部隊，信心十足，因此以為只需提供日本空軍與後勤支援，德王的部隊應該可以非常順利的攻佔綏遠。關東軍對於德王率部入侵綏遠的軍事行動，還特別發表日本對於內蒙戰事不干涉的立場。

這時候，綏遠省政府主席是由晉軍的傅作義擔任。德王在關東軍以飛機、重砲的支援下，進攻綏遠地區，引起了支持國民政府的其他蒙古部族之不滿，而南京的國民政府，也已經將中央軍調進了山西與綏遠一帶，因此蔣介石下令傅作義，對於入侵的德王部隊，主動給予軍事反擊，中央軍將會支援晉軍作戰。這是中、日之間，中國第一次敢率先對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動，採取主動的出擊。

傅作義的晉軍與支持國民政府的內蒙部隊，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對於德王的入侵部隊，進入大膽的攻擊作戰，傅作義以兵分三路、遠程襲擊的戰術，包抄德王深入綏遠的部隊，雖然日本出動空軍支援，對華軍進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隊仍然在百靈廟附近慘敗。蔣介石下令陳誠指揮中央軍的湯恩伯部，與傅作義的部隊配合，乘勝追擊，決心要直搗德王在察哈爾的商都以及張北之根據地。

華軍在綏遠百靈廟的大勝與反守為攻，使得日本關東軍大感震驚，關東軍認為假如中國的部隊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隊，那麼日本想要經營的蒙古傀儡政權，也就要煙消雲散了，這甚至會影響到滿洲國政權的穩定。因此關東軍發出嚴重的警告，假如中國軍隊威脅到滿洲國的安全，日本將絕對不會坐視。

正當中日雙方有可能為了內蒙問題，面臨軍事衝突之時，西安事變卻突然爆發，改變了整個中國局勢的發展。

歷史的轉折點 —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東北軍領袖張學良突然動用「兵諫」的方式，以武力挾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戰爭，以聯合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準備對日抗戰）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雖然西安事變最後以戲劇化、和平的方式收場，張學良親自護送了蔣介石返回南京後，蔣介石也終於停止追剿紅軍的安內政策，國共開始進行合作抗日的協商，接著蘇聯與國民政府也進行接觸，商討聯合抗日的計畫。但日本政府卻因此認為，國民政府開始了聯蘇容共抗日的策略，這是日方所絕對不能接受的變化，它必須考慮要盡快對中國發動決定性的打擊，這就伏下了中日提前爆發全面戰爭的因子。

在表面上看來，「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挾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戰爭，以全力準備對日抗戰的事件），似乎是一個突發的軍事政變行動，它改變了蔣介石多年苦心推動的「先安內再抗日」的大政方針，也使得中共紅軍在最接近危亡的時刻，獲得停戰整編的機會。國共團結準備抗日的行動，卻也刺激了日本決心提前對華展開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紅軍自此東山再起，利用抗戰的機會全力發展壯大，最終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國共戰爭中，獲得大勝而統治了中國大陸。而發動事變的主角

張學良與東北軍，卻從此淡出中國近代的歷史。

但是根據事實的分析整理，西安事變的爆發確是非常的戲劇化，但是卻有其相當明顯的前兆。促成蔣、張攤牌的直接主因，則是蔣介石不當的戰略佈署，有意要藉著剿共作戰，同時削弱東北軍與共軍的實力。這點剛好又被張學良識破，造成張學良與東北軍，不甘心成爲在內戰中被利用與犧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機會。因此張學良決定採取斷然的行動，反抗這種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變之前的局勢

而影響張學良最終採取兵諫行動的構想，不是中國共產黨背後的策劃，而是另外一個要角，西北軍楊虎城的點醒。事實上，在整個西安事變從頭到尾，張學良就沒有要對蔣的個人安全，採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決本來是必然的結果，而蔣介石在面對挾持時，也沒有簽下任何政治協議文件。最後促成張學良開釋蔣介石的，一方面是張學良個人的決斷，一方面是國內強烈的壓力，當然史達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護蔣介石的安全，也發生一些作用。然而從史料看來，縱使沒有西安事變的爆發，蔣介石採取聯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進行之中，只是條件與時機也許會有些不同而已。

我們深入分析西安事變的三大要角，在歷史中的微妙互動關係，可以發現，張學良的東北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以及毛澤東的紅軍，在當時是處在一個非常矛盾與複雜的立場。基本上，三方面都是決心準備抗日的¹，但是三方面卻爲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擔任的角色，有著極大衝突，因而產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抗日可以說是絕對的前題，因爲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有著直接的國仇家恨，而在現實的環境下，他們又不能立刻與日進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因此他們承擔了來自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壓力，也幾乎每天都要背負「不抵抗將軍」與「誤國軍」等來自輿論的羞辱。當時蔣介石根本自顧不暇，那裡能夠與願意爲東北軍承擔與洗刷這些冤屈。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早些進行抗日戰爭，讓他們能夠以行動證明自己誓死抗日的愛國熱血，就算是身死疆場，也並無所憾。（抗日戰爭期間，

¹但是中共紅軍抗日的出發點，與東北軍及中央軍抗日的出發點，卻有著非常重要不同。

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編後的東北軍中任職，因此非常了解東北軍官兵真正的心聲。)

但是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基於戰略準備因素的考量，對於日本的一再侵略與欺凌，採取的是忍辱負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國需要時間進行生聚教訓的準備，一方面也難免有一絲僥倖的心理，認為日本可能會在最後一刻懸崖勒馬覺醒過來，或是日、俄與日、美間的衝突提早爆發，這樣中日之戰的威脅就可以完全改觀。因此基於戰略準備與國際情勢的觀點，蔣介石被迫對於日本不斷的侵略，採取了一讓再讓的策略，使得抗日遲遲無法成為行動，國內的民意因而沸騰，這種抗日時間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張學良與東北軍在心理上無法承受的壓力。

在參與剿共的內戰之中，東北軍一直無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糧餉只有八折，其他的後勤補給更是七折八扣；到後來，更是到陣亡的戰士沒有撫恤，建制單位被消滅後又不得補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卻要他們在剿共的前線上，付出相當重大的犧牲。這些情況導至張學良與東北軍擔心，自己只是成為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者，最終無法有機會在歷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記錄。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都希望停止內戰的犧牲，全國共同抗日一就成為他們決定採取兵諫的共識。

蔣介石曾經留學日本學習軍事，他本人是沒有強烈的反日情結，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來自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意識，就是希望中、日兩國應該可以合作、互助來促進發展，這樣兩國就可以聯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共同創以亞細亞為中心的歷史光榮。但是日本卻不能了解這種歷史的眼光，反而對中國展開比西方國家還要兇狠的侵略，非置中國於亡國之境而不罷手，這是深具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蔣介石，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開始，蔣介石就決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大政方針，誓要統一中國，然後與日本進行決戰，以掃除國恥，這一點是毫無可疑之處。

但是蔣介石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他必須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準備，才能有機會統一國家，建設中國，而終能培養出能與日本決戰的國力。中國抗日戰爭的困難，絕對不只是武器裝備落後而已——中國的國民缺乏國家認同的意識，幾乎是一盤散沙的混亂狀態，農業無法自給自足，工業才在剛開始起步，國家沒有現代化的組織與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會缺乏動

員的活力——要想以這樣的國家架構與已經現代化的日本進行全面性總體戰爭，當然是必輸無疑的。蔣介石必須要先將國家統一起來，然後再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工業與國防武力，如此才能與日本一戰。但是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已經極其高漲，根本很難接受蔣介石「生聚教訓」策略，使得蔣介石在領導中國抗日的大政方針上，可以說是受盡了歷史上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難堪與批評。

不過，以日本之精明，豈有不知蔣介石的理財練兵策略，志在復興國家，然後再與日本進行決戰？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會給蔣介石完成統一與建設的機會，日本當然要在中國完成國力凝聚之前，就要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因此蔣介石必須要有提前應戰的準備，中國也就必須設法在國際社會中，建立起支持中國（以保護國際社會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國之長，補中國現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雖然蔣介石一直公開以剿共做為安內與抗日的前題，但是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肅清共軍及消滅其領導人，卻是一個必須妥協的戰略現實問題。因為以蔣介石本人的意識形態而言，根本不能接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另外成立政府與軍隊，進行武裝叛亂與奪權。但是蔣更清楚的知道，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危機，其實是日本與美國、蘇聯矛盾與決戰的一環，以中國當時之弱，當然根本不可能單獨完成對日本的戰爭，最終必須要有美、蘇的外援與介入；正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與美蘇的對抗，也要有德、義等法西斯勢力的支持，這是一場全人類歷史上不同陣營與理念的戰爭，中國只是首當其衝而已。

17.2 安內攘外與聯蘇容共的矛盾

當時美國採取孤立主義，因此一直迴避對中國應有的支持，甚至還有輿論建議，不妨以中國的利益餵飽日本，以避免美日爆發決戰。所以在國際社會的綏靖主義之下，中國若是真的被迫進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中國將無法得到西方國家直接的支持。總體戰的對抗就是比國力，因此落後的中國是根本沒有單獨打敗先進之日本之機會。由於蘇聯與日本的衝突一直在蘊釀之中，所以聯合蘇俄成為蔣介石必須認真考慮的抗日戰略，然而聯蘇又與容共是一體的，所以蔣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聯蘇

抗日戰略考慮的難處。

對於領導共軍的毛澤東，抗日是必然的選擇，因為在蘇聯共黨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為了參與全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大業。由當時的國際情勢看來，日本的軍國主義結合了財閥主義與日皇的封建主義，已形成對共產主義威脅最大的反動勢力。更為重要的是，日、俄在歷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與戰略對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軍國主義與共產國際主義之間，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敵對。而日本侵華的戰略考慮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國赤化，同時要利用中國成為抗俄的戰略腹地。當時受到蘇聯指揮與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是會把日本當成必須消滅的仇敵。

由於這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絕對要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政黨，也是一個階級利益重於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團體。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是為了要執行無產階級全球革命的使命，這遠比為了中華民族對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為重要。同時共產黨專政的特性是，當它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是整個國家永遠與唯一的執政黨，共產黨不可能接受其他政黨領導，或是與其他政黨一齊並存、進行輪流執政的和平競爭（這與西方民主制度的多黨體制有著根本的不同）。當時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若共產黨不是唯一的執政黨，它就是地下的革命黨，沒有第三種可能。

所以一般的輿論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於內鬥、怯於衛國的藉口，這在歷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於事實）的看法。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與紅軍，也是一樣要先內鬥奪權、再對日作戰。中共早就揭櫫其抗日基本策略前題是「抗日必先反蔣」，也就是說中共要先消滅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這些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之後，才能領導中國，參與全球無產階級共同抗日的行列。

這樣，中國共產黨同樣的要先進行國內武裝革命，以消滅中國國內的階級敵人，然後再對外消滅全球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勢力。所以國共兩黨都是決定要抗日，但是前題並不一致，彼此也都將消滅對方當成抗日的先決條件。國、共先內戰後抗日，並非是蔣介石單方面的堅持，也是毛澤東的立場與看法²。

因此在中國面對日本大敵當前的侵略時刻，國共之間爆發內戰，並非單

²當然後來毛澤東在延安面臨極端不利的戰況下，沒有辦法，才接受來自國際共黨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指示。

方面來自於蔣介石近乎頑固的安內政策，也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質上「專政」的特性，它非要先消滅國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並非在中國境內的一個「政黨」而已，它根本就否定中華民國，而另外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因此每當日本三番幾次的侵略中國東北、內蒙與華北之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紅軍卻從來沒有停止利用國民政府軍隊抽調部隊北上抗日的機會，立即尾隨調離的中央軍，進行攻擊，以擴大地盤，中共紅軍因此成了國民政府抗日最嚴重的後顧之憂，國民政府的部隊因而不敢與日本堅持對抗，就要立刻回師與紅軍作戰。

而中國共產黨開始把抗日當成中華民族各黨派共同的歷史責任，以及願意接納其他的政治勢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後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蘇聯國際共黨的指令下，中國共產黨接受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之後，才表明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中國其他所有的軍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後在共產國際強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強地願意放棄先消滅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題，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場的政治力量，共同團結合作的抗日。

此時，而蔣介石雖然已經在國共戰爭中，居於勝算的優勢，但是蔣介石卻沒有因此決定完全採取軍事手段，來殲滅中共的紅軍。在中共與第三國際的主動與國民黨接觸之下，蔣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國民黨的陳立夫與張沖，負責與中共與國際共黨的代表周恩來及潘漢年，進行國、共合作抗日的接觸與談判³，只是蔣介石在公開的場合，仍然不肯鬆口，並且在軍事的追剿上，也不肯放鬆壓力。當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樣不對外承認，它正在與蔣介石進行合作的談判。因此讓外界一直以爲，蔣介石是個冥頑不靈的人物，非要完全消滅中共，獨攬大權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

在陳立夫、周恩來、潘漢年的國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協商中，蔣介石既然擁有絕對的優勢，他當然開出強硬的條件，那就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三民主義的立國政綱，服從蔣介石的軍委會領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

³其實當時蔣介石的政策重點，不在容共，而在聯蘇，只有蘇聯有實力支持國民政府抗日，當時國際上也只有蘇聯可能參與對日本的歷史性決戰。

行爲，取消蘇維埃政府的國中之國的政治組織，改變紅軍的編制，加入國民革命軍的陣營，這種條件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當然是非常的難以接受的。

因爲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推翻國民政府及所有的階級敵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導的專政體制，因此雙方談判的進展，相當的緩慢。不過隨著蔣介石在軍事上的節節進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在渡河進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陝西之後，兵力只剩三萬多人而已，並完全困在陝西的北部。紅軍糧彈不濟的情形非常的嚴重，迫使中共最後只有準備接受蔣介石的和談立場，國共在南京的合作談判，其實在當年十二月大體完成，由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陝北紅軍基地進行最後的確認。正在此時，卻突然爆發了由東北軍主導的西安事變。

17.3 東北軍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當時的中國境內，除了蔣介石自己親手訓練栽培的中央軍之外，對於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忠誠度最高的，應該就是張學良所領導的東北軍，張學良有著一種強烈愛國的理想主義思想，以及對日本侵略與壓迫的反彈精神，因此才使他在東北易幟、中原大戰的歷史決定上，完全放棄軍閥勢力的利益考量，而選擇支持蔣介石，因而減少了中國內戰的代價。

而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爲蔣介石（其實是爲全中國）背上「不抵抗」的歷史罪名，而在熱河之戰中，張學良一句話就放棄全國第二大軍政勢力的領導位子，以減輕蔣介石的政治責任，更是說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忠誠與對大局的顧全。當然蔣介石也爲張學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價，也就是加深國民黨中兩廣軍政勢力的誤解，反蔣倒張成爲一體的兩面。

由於東北軍的團結力量歷久不衰，日本視東北軍爲威脅滿洲國的眼中釘，因此在塘沽協定中，壓迫國民政府將東北軍調離華北，蔣介石決定調東北軍擔任追剿紅軍的任務，在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召張學良回國，出任華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隨後又任命張學良出任武昌行營主任，與陳誠合作，負責進行中國軍隊的整編工作，這是蔣介石接受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積極的準備抗日軍力，而東北軍與中央軍成爲第一批接受整編的部隊，因爲東北軍擁有全國第一流的騎兵與炮兵部隊。

這時候是張學良最爲認真擁護蔣介石的時期，他以遊歐的見聞，倡言中

國在政治過渡時間，需要採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領袖制度，才能統一國家加強建設，以準備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張學良特別設立了「四維學會」的組織，奉蔣介石為領導人，鼓吹中國需要蔣介石成為法西斯的領袖，中國才能迅速的完成現代化，凝聚力量，準備抗日。

這種蔣張之間的密切關係，卻好景不長的發生激變，由於國民黨中最大勢力的「CC派」（陳果夫、立夫兄弟分別掌控黨務與教育系統，建立國民黨內最大派系），擔心張學良既擁有自己的軍隊，又組織支持蔣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會影響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對於張學良進行全面的打擊與抵制，而蔣介石中央軍的黃埔子弟兵，以及軍統等特務系統的領導人，也擔心張少帥真的會成為蔣的接班人，因此對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設法加以離間。加上一向反張學良的兩廣派與中央的恢復合作，也讓蔣介石必須對張學良疏遠一些，以維持勢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蔣介石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決定調派東北軍進入西北追剿紅軍，接著又免除張學良在武昌行營的職務，調張學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與西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負責對在陝北的紅軍，進行追剿的任務。

蔣介石更為錯誤的做法是，將中央派在東北軍中，人和關係極佳的參謀長錢大鈞私下調走（甚至沒有禮貌的先知會張學良），當時錢大鈞與張學良及東北軍關係融洽，下情上達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與誤會。錢大鈞離開之後，中央派出晏道剛出任參謀長，不管晏的做法是對或錯，至少他那種盛氣凌人的「監軍」態度，就讓東北軍上下都無法接受，東北軍與中央政策起了嚴重的磨擦，也就逐漸形成難以解開的誤會了。於是蔣介石在他自己與東北軍之間，築起了危機的雷區，蔣所聽到的都是對東北軍負面的報導，東北軍所得知的，也全是蔣介石義斷情疏的消息。陳立夫更是在這個危機發展上，出盡了所有的手段與力量。

蔣介石的這一系列措施，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變化，東北軍不能長期忍受「誤國軍」的污衊，因此全心希望能夠與日本一決死戰。當時蔣介石對於各個地方部隊，都是因地制宜的運用，而只有中央軍是隨任務而進行全國性的派遣。東北軍既非中央軍，而且決心抗日，因此將東北軍派到其他地方軍的地盤，不但受到排擠，也會造成士氣低落的嚴重問題。因此假如蔣介石此時真的有領袖的眼光與心胸，就應該好好的培訓

東北軍，以其戍守黃河防線，成爲支持華北戰場的總預備隊，東北軍必然可以在抗日戰爭的北部戰線上，發揮極大的戰略阻嚇效用。這樣中央軍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長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盤。

17.4 蔣介石一連串政策上的錯誤安排

但是蔣介石卻調東北軍進入西北追剿紅軍，對希望與日軍死戰的東北軍，士氣上當然產生了極大的危機。而且蔣介石應當知道，西北軍的楊虎城，早年在馮玉祥手下，就已經接受蘇聯的影響，是個左傾的軍政人物，他對於蔣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別是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差別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滿，因此當時的西安各界經常與上海的左派團體呼應，成爲包容極多左傾團體活動與人士的大本營之一。蔣介石要叫明顯左傾的楊虎城，監督張學良進行剿共，是一個政治上極其失算的安排。

由於東北軍在西北的剿共任務，遭到士氣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視的困難，東北軍先後與紅軍主力遭遇，雖然順利的攻下延安，但是東北軍的一〇九師，在勞山遭到紅軍圍殲，其後一一〇師在直羅鎮，又遭到紅軍反擊的圍殲，兩位師長何立中與牛元峰不屈戰死，造成東北軍士氣的震動。上下都一致認爲，要東北軍死於內戰而非抗日，這將是全軍的悲劇與恥辱。

而更糟的是，蔣介石竟然批駁張學良爲陣亡將士的特別撫恤申請，同時不准張學良保持被圍殲兩師的番號，重新招募部隊。蔣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犯了領袖的大忌，不但讓東北軍覺得自己在內戰上的犧牲，根本毫無價值，同時更認爲蔣介石在借刀殺人，以安內爲名來消滅異己的內戰。

這時候的共軍雖然在軍事上的處境，極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號召，卻大得人心，由於中共的文宣與組織，本來就是「高人一等」（來自共產國際的真傳），現在中共要求團結抗日的立場，更是滿足社會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與支持的左傾團體熱情活躍，許多不滿國民政府對日本要求節節退讓的社會領袖，也都紛紛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場，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立刻準備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當日本企圖迫使華北脫離中央而獨立的危機時刻，北京的學生在中共的影響與策劃之下（這是劉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傑作），於十二月九日發動了陣容壯大的愛國抗日運動，風潮所及，全國披

靡。接著整個中國各大城市的學生與工人團體，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行全國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對於中共的抗日主張，給予熱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謂名流愛國會，由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負責，不斷發出動人心弦的愛國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識與情緒，在社會各個階層迅速的發展蔓延，中國共產黨立刻成為當時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鋒」

在這種抗日風潮之下，東北軍的感受最深，因此東北軍的將校，紛紛的組成各種團體，以團結抗日的志節。中國共產黨也就利用這些抗日團體，開始滲入東北軍之中，中共中央特別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負責在東北軍內吸收同志，傳播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文宣。這種思想在東北軍內取得壓倒性的支持，連張學良都無法壓制這種寧願與日本同歸於盡、絕對不願死於內戰的真心要求。因此東北軍對於追剿紅軍的任務，開始採取敷衍的態度，紅軍也對東北軍，採取懷柔的立場，雙方的陣前對峙，逐漸成為「西線無戰事」的情況了。

而由於張學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與過去的東北抗日義勇軍部屬李杜連繫，看看能否派遣軍事人員，設法借道蘇聯的西伯利亞，進入東北，發展抗日的敵後工作，因此經由李杜而與共產國際進行接觸。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張學良利用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的機會，在上海與第三國際的代表潘漢年會面，這時張學良才駭然的知道，原來蔣介石已經秘密與中共進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麼要東北軍拼命去追剿紅軍，這不是叫東北軍與紅軍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讓蔣介石的中央軍坐大，最後抗日成為蔣介石中央軍的功勞？

由於這個發現，張學良更加同情部屬內不願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緒，為了更為深入的了解紅軍的立場，因此乾脆透過自己的部屬王以哲，與紅軍進行直接的連繫，先與李克農會談，最後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秘密會面，張學良提出國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內容，其實與國共之間談判的原則，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銷紅軍番號，廢除各地的蘇維埃政府，接受蔣介石領導，戰後共產黨成為一個政黨，不再擁有軍隊，來參與政黨競爭。

周恩來表示，假如能夠達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這些條件，因此張學良表示，他願意向蔣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國共之間的正式停

戰，張學良還提供私人帳戶的資金，協助紅軍補給周轉⁴。

張學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國民政府準備採取聯蘇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夠早日付諸實現，以減少東北軍的損失與壓力，這就是他與周恩來延安之約的目的。從此紅軍、東北軍加上晉軍，都有了「聯蘇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個西北地區的基本政策方針，與南京的安內剿共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衝突。

但是當時蔣介石，雖然已經與蘇聯與中共進行相當時日的接觸，大家對於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識，蔣介石本人還在莫干山接見過周恩來，但是蔣至少在表面上，對於國共合作的見解，採取近乎絕對排斥的態度。根本讓張學良無法向他進言，雙方甚至多次爆發言詞之上的衝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張學良又多次的與閻錫山，討論過停止內戰與抗日的問題。當時的閻錫山，事實上也與紅軍有所往還，因此他表示支持張學良的立場，更幫著張學良見機遊說蔣介石，但是都遭到蔣介石憤怒的拒絕。

這時蔣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總部的參謀長晏道剛，總是擺出一副監軍的高姿態，而經常與東北軍將校之間發生摩擦，彼此的關係極其惡劣，也就造成中央與東北軍之間更大的誤會，在對楊虎城發泄心中抱怨的時候，張學良得到楊必要時大膽實施「兵諫」的建議，張學良當時並未置可否。

17.5 張學良的斷然行動

這時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傾，可以說是非常的明顯，東北軍與紅軍之間的對峙，不但已經形同休戰，東北軍更撥給紅軍一些補給，因此各種的情報都已顯示，張學良與紅軍之間的關係，非常的複雜，因此使得蔣介石大為不滿。張學良不能明白的是，為什麼在國共合作談判，基本上已經要完成協議的同時，蔣介石卻仍然決定，要東北軍對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合圍攻擊。

由於此時的蔣介石，平定了兩廣的分離，軍政力量深入到四川、雲南，中央的力量已經接近可以號令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地位，蔣介石的權力與威望，更是如日中天，無人敢挑戰他的決定。因此蔣介石在當年十月，決定親

⁴千萬不要以為張學良本人同情共產黨的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他不但是從來就反共（中東路事件就是張學良獨斷反蘇反共的行動），而且在遊歐之後，更是醉心法西斯的立場，他竟然還與周恩來談到，共黨是否能支持由蔣介石擔任軍政的領袖——雖然張學良曾經衝動地提出加入共黨，大家一起抗日的講法，但並不代表張學良認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只代表了張學良急著要結盟抗日的心情。

自前往西安視察軍情，蔣介石對東北軍將校，施加極大的壓力與警告，蔣介石暗示假如張學良與楊虎城仍然不願出力死戰，那麼蔣介石將要撤換張楊二人，整個西北的剿共行動，將由中央軍的蔣鼎文接替，東北軍將會遭到進一步收編的命運。

正當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關係，接近攤牌的發展之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發了親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隊，進攻綏遠的戰事。這時中國的民意，可以說是激昂已極，因此蔣介石下令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守土有責，率軍出擊，在百靈廟擊潰德王部隊，蔣介石並且要求陳誠與湯恩伯的中央軍，從山西出擊。結果傅作義的晉軍，傳出了大勝的消息，整個中國爲之振奮。

而在陝西的東北軍，更是人心激動，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寧可到綏遠去與日軍死戰，也不願在陝西與紅軍作戰。張學良基本上是同情與同意東北軍的這種想法的，但是蔣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擔心這樣會直接刺激日本關東軍，因爲關東軍把東北軍視爲最大的敵手，一方面當然是不能讓東北軍侵犯到晉軍的地盤。

張學良眼見蔣介石不肯停止內戰，又不肯派東北軍與日軍作戰，反而準備進一步的整頓東北軍，在軍心不穩的局勢之下，張學良一度想要辭職他去，但是部屬不肯，擔心張學良離職之後，沒有了孚眾望的領導者，東北軍更會成爲任人宰割的犧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介石又到洛陽與西安一帶視察剿共作戰，他更爲清楚的表明，假如張、楊再不能全力作戰，就準備將張學良與楊虎城調職與整編其部隊，所以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已經開始在蘊釀之中。

雖然蔣介石對於張學良與紅軍之間的交往，早有情報，東北軍的士氣低落與軍心不穩，蔣也有所了解，但是蔣介石卻認爲張學良還不至於有膽量對他個人採取行動。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威震華夏，沒有一個地方的軍政勢力再敢與蔣挑戰了，何況蔣認爲楊虎城會替他看著張學良。當時在西安一帶的部隊，是由楊虎城的西北軍駐守，東北軍都在遠方的前線地區，因此張學良應該沒有足夠的兵力進行出人意外的行動。但是蔣介石完全錯估了局勢，也看錯了人，其實是楊虎城首先提出捉蔣的點子，而張學良的個性是一旦在必須採取決斷行動時，他是可以完全不顧後果的⁵。

⁵張學良在決定歸順中央之前，曾經斷然格殺東北軍中實力與權位極高的楊宇霆與常蔭懷。

17.6 發動兵諫、擁蔣抗日

這時張學良已經清楚的知道，縱使抓破臉都無法說服蔣介石調整政策，反而使得東北軍面臨即將受到調編的危機，於是張學良斷然決定，對蔣介石發動兵諫。整個冒險行動中，張學良始終不變的立場仍是「擁蔣抗日」，張的這個決定，事前既沒有全盤周密的商量與安排，更沒有告知中共的領導人，只有在行動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後，才與東北軍的將校及楊虎城進行決定兵諫的討論，東北軍的將校，全部支持張學良的決定。

張學良在受到學生請願抗日，以及國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愛國團體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諫蔣介石停止內戰，全面準備抗日失敗之後，終於斷然決定，採用楊虎城的兵諫建議。在十一日夜間，張學良與東北軍的將校，對於兵諫行動做最後一次的確認，大家仍然支持張學良的決定。張學良當天特別臨時將一〇五師第二旅的旅長唐君堯，從甘肅接到西安，負責整個兵諫行動的指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時半，唐君堯指揮張學良的警衛部隊，對蔣介石進行武力挾持的兵諫行動，造成蔣介石衛隊的嚴重死傷，但是卻平安的將蔣介石軟禁。而楊虎城的部隊，同步出動，逮捕所有在西安與蘭州的中央軍政要員，張學良的這個大膽行動，立刻震驚了整個中國以及國際社會。

張學良與楊虎城聯手發動兵諫，成功挾持蔣介石之後，立刻成立抗日聯軍，並且公開發表了八項主張，這八項的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個黨派人士。二、停止內戰。三、立即釋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領袖。四、釋放一切的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七、確實遵守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張學良並且致電南京，保證絕無加害蔣介石的意圖。

南京國民政府接到張學良兵變消息之後，立刻亂成一團，主張立刻派兵圍殲張學良的強硬派，竟然是以蔣介石的莫逆知交、當時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蔣緯國即是他託蔣介石收養的兒子）及蔣介石最爲親信的何應欽爲首，主張以交談談判解決的溫和派，以蔣介石的姻親孔祥熙、宋子文爲主。由於張學良既然保證對蔣介石的安全，又主張擁蔣抗日，要與南京舉行會商，戴、何等人實在不必急著以武力討伐張學良，因爲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有逼

張學良在情急之時，對蔣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齡的介入之下，中央軍雖然展開對關中「叛軍」的包圍，但是暫時採取等待攻擊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蔣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後，簡直是高興得不敢置信，毛澤東力主要將蔣介石加以公審處決，以報復這些年來，紅軍與蔣介石的血海深仇，紅軍將領葉劍英等人，更是認為這是報仇的天賜良機，絕無放過蔣介石的道理。不過周恩來、張聞天卻認為，假如蔣介石一旦死亡，中國必定重新陷入內戰之中，日本更可以輕易的滅亡中國，而紅軍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也就不可能實現了，因此兩派爭議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傳來史達林對中共親自下達之最為明確的指示，嚴厲的批判張學良西安事變的錯誤行動，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絕對要設法盡一切的力量，協助釋放蔣介石，否則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會崩潰，而蔣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違抗這個指令，莫斯科將會斷絕與中共一切的關係。

這就是史達林過人的謀略，因為蘇聯知道，在當時，只有蔣介石能夠領導中國對抗日本⁶，假如蔣介石一旦被處死，中國必然出現內戰的大亂局面，中共的紅軍也許會有發展的機會，但是在相當的時間之內，絕對沒有人能夠取代蔣介石與日本對抗的能耐，這樣日本可能順利的征服中國，一旦日本征服中國，蘇聯就要面臨日本更大的挑戰。

所以史達林固然恨死蔣介石清共與圍剿紅軍，他也希望毛澤東能夠獲得勝利，但是史達林更清楚的知道，在抗日的歷史選擇上，蘇聯現在最需要的是蔣介石，在必要時，蘇聯寧可犧牲毛澤東。因為史達林已經明瞭蔣介石抗日的決心，以及了解蔣在中國已成為無人可代之的領袖，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蘇聯就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來對付日本。所以史達林對中共中央，發出最為嚴厲的指令，務必全力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史達林隨後還釋放了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在權衡利害之後，中共中央終於決定接受史達林的指令，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

而日本的反應，則是顯得過度的自信，日本政府與軍部，嚴令日本不可

⁶非常諷刺的是，當時中國所有的左派與左傾團體，都嚴厲的批判蔣介石不肯抗日，但是左派的最高領導人史達林卻清楚的知道，只有蔣介石能夠領導中國抗日。

介入西安事變，因為日本相信，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劣根性即將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會造成中國內部的警惕而團結對外。日本人相信，無論從南京到各個地方的勢力，絕大多數是會贊成張學良殺掉蔣介石，以造成中國天下大亂，而能重新逐鹿中原，這樣日本就更有機會混水摸魚、扶植漢奸傀儡，要滅亡一個分崩離析的中國，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據勢力，在得知西安事變之後，多數都是採取觀望的兩面立場，例如兩廣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四川的劉湘、山東的韓復榘，都出現兩面表態的立場，一方面表態支持南京政府慎重處理，一方面也「暗示」張學良，不妨採取「斷然」的行動，他們也會響應，因為只要蔣介石死亡，中央與東北軍開打，那麼他們逐鹿中原的機會又將出現了。

當時最令張學良注意的，是閻錫山非常曖昧的態度，因為原先張學良認為閻錫山是站在鼓勵他採取行動這邊的，何況老謀深算的閻錫山對於華北的各個山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是這時閻卻擺出更為高明的逆向操作招數，他知道張學良根本無意殺蔣，蔣若一死，中國必然大亂，那麼日本必然可以輕易的併吞華北，不如自己做個現成的無本買賣，成為南京與西安的調停人，平白的撿到好處。閻錫山的態度，讓張學良有如醍醐灌頂般的清醒過來，張已發現，大家都在企圖利用他手上的人質，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 釋放蔣介石以進行抗日準備

不過當時一般的輿情與民意，則是一面倒地反對張學良對蔣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這些輿情非常擔心若是蔣介石發生任何的不測，那麼中國不但沒有可以對抗日本侵略的領導人，中國可能會重新進入新的內戰狀況——這是民國成立以來，一次最為明顯的民意共識：支持蔣介石繼續成為中國的領導人，以完成國家的統一與領導對日本的抗戰。

中共中央幾經激辯之後，終於接受史達林的指令，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周恩來奉命在十七日趕到西安，與張學良與楊虎城進行會議，張學良進一步的發現，中共準備利用這個機會，直接與南京進行交涉，以提高國共合作的交易籌碼，根本沒把東北軍當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這時張學良終於看透了所有的幕後，他原本希望利用這次的行動，能夠

讓東北軍扮演一個主導聯合抗日的角色，現在因為他手上控制蔣介石的安危，反而成爲大家爭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張決定，絕對不能讓事態惡化下去，自己必須要確保蔣的安全，以及設法迅速釋放他，否則中國抗日的準備，就要功虧一簣了。而周恩來在西安，除了與張學良商量大計之外，還必須設法壓抑在東北軍內的共黨組織，以及說服楊虎城，要確保蔣介石的生命安全。至於何時釋放人質，周、楊都認爲需要多點時間來進行更多的佈置。

在宋美齡與宋子文趕到西安之後，張學良更清楚的發現，假如蔣介石的生命或是權威受到傷害，那麼必然會使抗日的準備工作，更爲的困難，因爲在南京，只有蔣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領袖，而親日派已經開始進行奪權佈置了（汪精衛正由歐洲兼程回國），所以他決定平安釋放蔣介石的決心更爲堅定。

所剩下的問題是，張學良必須要讓蔣介石的抗日政策，有所允諾，才能對東北軍支持他兵諫行動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與張學良密集的會談中，開始同情張學良的用心與處境，在宋美齡的調解下，蔣介石同意在改組南京政府議題上，進行會商，以及允許與周恩來加入會談，最後達成了一些的共識。問題是，蔣介石堅持不肯在共識的文件上簽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蔣介石，接受了改組政府、停止內戰、以及不處分參與兵諫者等共識。蔣介石不肯簽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楊等人的不滿。但是張學良認爲硬要蔣簽署文件並無實質的意義，他相信蔣介石會履行他的承諾。

這時張學良對於西安內外環境，隨時都會有瞬息萬變的高度警覺，因爲他不能掌握東北軍內有多少中共組織的細胞，也難防範楊虎城的部隊發生意外。由於西安的各個派系領導人，對於如何釋放蔣介石，仍然有著時間與方式的意見，而中央軍已經開始與東北軍爆發戰火的衝突了，一旦東北軍產生重大死傷，那麼難保軍隊發動嘩變，而會影響到蔣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憲到達西安，以宣達共產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指示，因爲當時中共的東北軍工委中，多數的人仍然拒絕這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指示，在秦邦憲軟硬兼施，以及周恩來的設法疏通之下，中共的東北軍工委書記甯古石，終於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決的決定。周恩來再與張學良一起說服楊虎城，應該釋放蔣介石。不過當時仍然有不少的將領，持反對的意見，因此一般的共識是，多扣留蔣介石一段時間，以取得更爲充分的保證，再將他釋放。

不過張學良個人認為，這樣會夜長夢多，因此斷然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只要蔣介石平安離開西安，那麼抗日大計必然能夠實現。因此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張學良在沒有知會任何人的情況下，匆匆的親自護送蔣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專機，飛離西安抵達洛陽。蔣介石平安獲釋的消息，可以說是讓整個中國都鬆了一口氣，中國不會再陷入一場新的勢力爭奪的內戰之中，張學良則是敢作敢當的承擔了一切的責任。

17.8 蔣介石聲望達到頂點

蔣介石平安的回到南京，親日派與各地方山頭當然失望萬分，可是中國各地民眾自動自發對於蔣介石，給予國家英雄的盛大歡迎，更使他擁有全國軍政最高領導人的威望與民意支持。這時蔣介石當然知道，有心與他角逐權力的各路人馬，仍然存有異志，這在他被拘禁期間，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張學良能夠將他「做掉」的態度，已經顯露無疑。但是由於大敵當前，蔣介石也無可奈何的必須容納他們，於是蔣只好把所有的不滿，全都發洩在張學良的身上。

蔣介石在閻錫山等人的慫恿下，不顧在西安所達成的放張協議，取消給張戴罪立功的機會，而將張學良給予終生軟禁的「法外」處分（這樣閻錫山等人終於報了中原大戰之仇）。依照當時的軍法審判結果，張學良只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蔣介石還表示寬大，要求特赦張學良並獲准，從法律的觀點，張學良已經無罪罰的存在了，但是實際上卻由軍統局負責將張學良無限期的軟禁。

原本蔣介石有意考慮讓張學良戴罪立功，但是後來又打消這個安排，從此張學良得以脫離中國複雜的政治鬥爭，但是一直成為受看管的無期徒刑囚犯。最令張學良與多數東北家鄉父老感到難過的是，蔣介石就連抗戰勝利的大赦，以及全國團結的政治協商，都不能讓張學良回家鄉探視。

而記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領導人，也暫時多次「忘記」了張學良的「千古功勞」，而沒有適時伸出援手，在抗日勝利之後的政治協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場合，應景式的提到張學良的問題之外，根本沒有鄭重提出恢復張學良自由的要求——蔣介石答不答應是一回事，連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現中共的立場了。由於蔣介石對於張學良強烈的個人報復，使得蔣介石失去一個

因勢利導，創造全新歷史的機會。

而張學良擁蔣抗日的立場始終如一，這是歷史可以證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國民政府決定調動東北軍，進行移防之時，因為擔心軍心不服而生叛變，因此還派東北軍的將領，晉見少帥。張學良特別交代昔日部屬，東北軍務必服從領導，聽候蔣介石調動的命令。以一個被看管人犯的意見，竟然對於處在生死邊緣、幾十萬東北軍的選擇，仍然有著「命令」般的影響力，真是叫蔣介石以及其他的軍政領導人，感到震驚⁷。

蔣介石違背諾言、對張學良的長期報復，甚至連宋家兄妹都認為這種做法實在過分了。宋子文終生都為此結果感到遺憾。在大陸易幟之後，宋子文赴美長期定居，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代，設法與蔣介石接觸，希望蔣能夠讓張學良赴美；宋美齡也曾公開對於外界表示過「我們對不起漢卿⁸！」

張學良在蔣介石死後，才獲得真正的自由。由於不滿李登輝以台獨為名目，而實際上出賣台灣的賣國行為，張學良先生終於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於一九九五年決定移居夏威夷，並且將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所有相關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全都委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收藏，約定在其死後再公諸於世。張學良為了抗日，成為兩岸都不能接納，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為了抗日，犧牲自己一生的事業與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獻，最後結果是落得兩岸排斥、終生無法貢獻國家與社會的淒涼晚景。當然有這種遭遇的愛國人士，又豈只作者的先父而已？）

楊虎城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他還得到一個出國考察的遊歷機會，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之後，他回國參加抗日。不過，當楊虎城回到國內之後，立刻就遭到軍統局的長期監禁，待遇要比張學良差。在抗戰勝利之後，他也沒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總統，才下令釋放張學良與楊虎城，但是保密局（前軍統）拒絕執行命令，最後在國民政府撤出大陸之前，楊虎城以及部屬全家大小，在重慶遭到保密局滅門式的槍決。

⁷就拿馮玉祥而言，西北軍幾乎是他親手訓練栽培的，但是在他失勢之後，絕大多數的西北軍都背他而去，而且不肯再接受他的調度。

⁸漢卿是張學良先生的字。照理而言，張漢卿在西安事變，給予蔣介石如此的威脅與傷害，做為曾經冒死營救蔣介石的妻子與舅子，應該是最不能原諒張學良之魯莽與冒險行為的人了。由此可見張學良的兵諫，與後來保護蔣介石平安脫險，的確是一心為了抗日，他也從未改變其一生擁護蔣介石的立場。而聯蘇容共，原本就是蔣正在秘密進行的政策。

17.9 國民政府「聯蘇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現

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權力之後，知道自己雖然已經得到全國人心支持的國家領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瞭各方勢力在他受制之時的表現，顯示出了一個清楚的政治訊號：各路諸侯不願再接受他將權力繼續地集中，以及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讓步了。

因此蔣介石決定大體依照西安事變時，大家所達成的諒解，停止追剿紅軍。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消「西北剿匪總部」，派顧祝同負責調遣東北軍與西北軍的善後工作，並進一步的與紅軍接洽補給的安排，國民政府從當年二月起，就正式的發給紅軍糧餉補給（每個月約達二十萬到三十萬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願意接受蔣介石的指揮，重新加入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電國民黨，提出團結抗日的四大保證：一、停止武裝攻擊國民政府。二、撤消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改為特區政府與國民革命軍。三、在特區內實施民主選舉。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國民黨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根絕赤禍案」，中共中央回電表示接受，於是國民政府與中共開始正式進行合作的談判，中共的領導人周恩來、秦邦憲、林祖涵、葉劍英等人，多次到達南京、廬山與杭州等地，與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層進行協商改編紅軍的問題，國、共合作進入了執行階段。中、蘇聯的關係也開始有了轉機，中國修建了由蘭州經新疆到蘇聯的現代化公路，以準備接受俄援。

國民政府的聯蘇容共政策公開化之後，日本開始感到焦慮與極大的壓力，日軍方面非常擔心國民政府會成為蘇聯的政治與軍事盟國，而聯手對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內部，又開始為了是否要展開進一步侵略中國行動，而起極大的爭辯。日本的海外駐軍，更是積極展現武力攻伐中國的準備，在他們串連日本軍部擴大派勢力的運作之下，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終於因為一次在盧溝橋衝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發了。假如中國沒有公開聯蘇容共的政策，日本當局是否會為了盧溝橋事變，就決定對華進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許是有些疑問的。

一場震驚中外、戲劇化的西安事變，就此落幕，中國內部「攘外需先安內」、「抗日必先反蔣」的國共鋒相對鬥爭的時代，暫時告一個段落，國民

政府開始「聯蘇容共」以準備全面抗日，那麼日本是坐視中國集結所有的力量，而進行抗日的發展呢？還是要先發制人，給中國致命的一擊？這個政策的選擇，就成了中日之間和、戰歷史演變的關鍵，與其考量的前題了。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似乎所沒有弄清楚的一點，就是蔣介石不但成爲全中國所支持的軍政領袖，但是蔣也絕對不能再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做出任何的退讓了。日本任何局部「蠶食」中國、迫使中國讓步的舉動，都會引爆中國全面抗日的自衛行動。

歷史轉折的檢討

檢討這場驚心動魄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的衝動與犯上，的確是一件嚴重的違法與抗命事件（不過在當時的中國，誰又不是反覆再三，動輒使用武力來維護自己的主張與利益？），但是我們也不能不遺憾的認為，假如蔣介石稍為注意到東北軍的特殊狀況，與張學良的困難處境，而蔣本人又能夠有足夠歷史的眼光與心胸，來妥善處理抗日與剿共的大政方針，那麼整個事件本來是可以不必發生的。就算是在事變之後，仍然可以因勢利導將危機化為更大的轉機，但是這兩點蔣介石都沒有做到，因此使得他個人與中國的近代歷史，為此都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18.1 事變突然、政策不突然

當然傳統上傾向國民黨的歷史觀點，是強烈批判西安事變所導致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使蔣介石多年企圖圍殲中共的軍事努力，功虧一簣，結果讓中共的勢力，能夠死灰復燃，終於赤化了整個中國。不過，事實是，蔣介石在面對日本一波緊過一波的亡華行動，中國缺乏實力與之對抗、國際社會又坐視不理的情形下，爲了中國能夠有更多的籌碼以抗日，國民政府已經有

採取聯蘇容共的政治構想與行動。

因此，蔣介石絕對不是因為西安事變的突然發生之後，才被迫接受聯蘇容共的政策¹，張學良遽然發動西安事變，只是為了穩住東北軍的軍心，減少自己子弟兵在內戰中不必要的傷亡，而將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稍為提前搬上歷史的檯面而已。

因為早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多次透過親信，與中共領導人及國際共產黨人士，進行合作抗日的協商，而且雙方已接近達成協議的階段。假如當時蔣介石真的沒有聯蘇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變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後，仍然放手的動用中央軍，繼續追剿紅軍到底。因為在事變之後，蔣介石在全中國內部的聲望與權力，都已經達到歷史的高峰，而中央軍並沒有因為西安事變造成任何的損失，當時中央軍已經對困在陝北的紅軍，完成多路進兵的合圍陣式。

同時紅軍也沒有因西安事變而得到有效與實質的擴充，依然處在人員不足、糧彈不濟的危險狀況之下，因此假如蔣介石若是要決心繼續追剿紅軍，以六十萬以上擁有不錯戰力的中央軍，圍攻三萬多人戰力殘破的紅軍，絕對是沒有任何實行上之問題的，最多在時間上延後幾個月而已²。

甚至蔣介石若真的繼續追剿紅軍，也不會有人能夠質疑，蔣沒有「遵守」在西安事變受到監控時，口頭所答應停止內戰的立場。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理由要求蔣「必須」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做的任何間接承諾。何況在當時中國整體的環境之下，又有那個政治人物真正遵守過所謂的約定、協議或保證？

而蔣介石之所以會在脫困之後，就此停止追剿紅軍，其主要的的原因，絕對不是單純的為了履行承諾，或是已經錯失圍殲紅軍主力與機會——而是蔣介石決定，不如藉此機會，開始實施其「聯蘇容共」以準備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蔣介石為什麼又推翻在西安的協議，而囚禁張學良呢？

至於有人指出，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透露出蔣介石在日記裡的抗日決心，因此造成日本決定提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說法，也是不盡正確，因為蔣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會場合中，不但經常公開表明國民政府堅忍建

¹當然這是蔣介石是在考慮抗日的全盤政略的前題下，實在不得已的選擇，假如要說中共最後能夠重振聲勢，終於取得全中國大陸的最大原因，不如說是日本的侵華戰爭，以及蘇聯為首的居中作梗，才促成的。

²事實上，毛澤東在張學良斷然護送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後，就曾非常擔心蔣介石會老羞成怒，而發狠圍殲紅軍。

國，建軍備戰的抗日策略，同時也在設法優先實施理財練兵的抗日準備。一個正在推動現代化國防與工業的中國，逐漸開始嶄露頭角，日本當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對於中國抗日國情的判斷，是以中國全面現代化、統一的发展作為指標。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已經越來越不肯向日本的壓力屈服，中國的軍力與國力也在快速增強當中，所以日本算得出來，中國準備抗日的決心與實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變來透露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心事，才讓日本決心提早對中國下毒手。當然，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國各個階層的支持，倒是影響到日本是否要採先下手為強的政策。

在西安事變的前、後演變，已經顯露出蔣介石缺乏歷史上真正偉大領袖那種洞察全局的能耐（當然這是指那種千年罕見的傑出才能），蔣介石受到國民黨內部各個派系權力鬥爭的影響，突然疏遠了真心擁蔣的張學良，派遣抗日心切的東北軍進行內戰，又長期讓東北軍的補給受到差別待遇，對於因剿共犧牲的東北部隊，更是採取令人無法了解的「戰死不撫恤，消滅不補充」政策³。這些對於東北軍處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領袖人物的大忌，何況是處在那種風雲急變，互信根本不足的時代。

當時東北軍處在軍心動搖與士氣低落的危機中，加上有冤無處訴的壓力，蔣介石卻想玩一石二鳥的計策，用東北軍與紅軍互鬥來同時削弱對方戰力的手法。不料張學良卻已經知道，國、共之間正在進行合作的談判，迫使張認為，蔣介石既然準備聯蘇容共，為什麼還要拿東北人的生命，做為交易的籌碼？所以張學良一再的向蔣介石陳述東北軍的立場：何不就此保存實力，共商抗日大計？但是張學良的立場，反遭蔣介石一再強烈的呵責，蔣並且準備將東北軍全數調防整編，至少使得東北軍因而感到了孤軍末路的壓力與絕望。

在這種情形下，張學良除了選擇兵諫之外，可以說是沒有其他可行得通的辦法。假如蔣介石真的能夠洞察軍心與大局，那麼蔣應該對於東北軍採取寬厚的政策。張學良曾在蔣介石的關鍵時刻，不顧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蔣，又為了國民政府忍辱負重的政策，而背負歷史上「不抵抗」的黑鍋——根據這些事實，張學良與東北軍對蔣、對國的貢獻與忠誠，實在是無可質疑的。

³當時蔣介石的政府，已經略具規模，而且財力也比較寬裕了，不應這樣長期的歧視東北軍。因為當時當兵不是國民的短期義務，而是需要養家活口的職業，軍人長期的錢糧缺乏，又在精神與心理上充滿苦悶與挫折，連妻兒的基本溫飽都有問題的話，是會出現很危險狀況的。

現在這支已幾乎被迫成爲歷史孤軍的東北軍，唯一剩下的是與日寇決一死戰的心願，而蔣介石卻要設法藉內戰而消耗這支「抗日忠誠部隊」，難怪東北軍會支持張學良的犯上行動。

18.2 蔣介石錯失歷史復興良機

因此假如蔣介石讓東北軍集結調訓，給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愛國的訓示，那麼對這支重情義、無退路的東北軍而言，豈有不全軍對日死戰、誓死支持蔣介石的道理？蔣介石真錯過了一張天賜的抗日王牌，而當時以中央軍與紅軍的軍力對比看來，也根本不必需東北軍參加剿共作戰。因此說蔣介石在某種程度上，逼反了東北軍，也許並不完全爲過。

即使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仍然有創造歷史全新格局的機會，蔣可以清楚知道，張學良絕對的忠誠，與他抗日的鋼鐵意志⁴，假如蔣介石能夠寬赦張學良，讓他繼續的統率東北軍，進駐隴海線以南，給予精訓，單純的託以抗日重責大任，這樣張學良與東北軍，絕對會成爲抗日戰爭的決死部隊。一旦華北爆發戰爭，日軍必然會遭到東北軍拼死命的打擊，也必能爲中國抗日史留下更爲輝煌的一頁。

蔣介石與東北軍之間的關係，更可延續到抗日勝利後，在蘇聯侵佔東北、引進八路軍的歷史變局上，產生重大的關鍵影響力。因爲蔣介石若是以張少帥領頭對東北進行政治號召，更可以讓中共無法在東北取得發展的先機了⁵。當然這一線歷史的發展，是在當時是難以預見的。

另外的說法是，張學良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此遵照中共的設計，大膽的實施兵諫與扣蔣行動，這是絕對錯誤的說法。事實上，張學良早在東北當權之時，就是激烈反對共產主義的地方領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東鐵路事件中，張學良與蘇聯紅軍與早期的共軍劉伯承、葉劍英等人，在東北進行過激戰，張學良曾經對於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聯蘇容共，也有極大的反感與猜疑。

張學良在第一次下野遊歐返國後，更醉心德、義兩國的右翼法西斯救國方略，所謂「加入共產黨一起抗日」，只是口頭上對於國民政府犧牲東北

⁴張學良絕對要比李宗仁、何應欽、汪精衛等都還都更可靠多了。

⁵作者家慈常言，東北百姓對於少帥與東北子弟軍，思念不已，抗戰勝利之後，他們無法榮歸故鄉，更讓東北人民失望異常。

軍，一再的延後抗日不滿的表達而已，張學良此語的重點是在團結抗日，而不是成為共產黨黨員。而張學良個人獨斷決定，發動西安事變與扣押蔣介石，中共方面絕對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蘇聯更是對於張學良魯莽的行動，給予非常強烈的批判（蘇聯共產黨自始至終對於張學良都給予極低的評價，因為張學良是率先反蘇的中國政治人物）。

雖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認為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對於中共轉危為安的發展，有功同再造的歷史功勞。其實中共自己應該非常的明白，共軍之所以能夠絕處逢生的根本關鍵，在於日軍的侵華，加上蘇聯支持的戰略佈局。蔣介石決心要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也只有採取「聯蘇容共」的政策，張學良的西安事變行動，只是戲劇化地提前落實這個歷史變化而已。事實上，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共協商，與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對「恩人」張學良的長期遭扣押沒有具體的行動。目前張學良寧可旅居異國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鄉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了。

而對比之下，毛澤東就比蔣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採取要叫共產黨採取「擁蔣抗日」的政策，等於否定共產黨過去十年的犧牲奮鬥，對國民黨提出四大保證，更是等於向國民政府投降，接受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決議，更是讓中國共產黨的尊嚴無存。但是毛澤東清楚的知道，中共只有這樣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紅軍從長征之中，已經學到更多絕處逢生的本領，只要能夠得到喘息的機會，共黨與紅軍絕對可以發展壯大。蔣介石只以為不殺張學良是已經夠寬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勢利導、從此重用東北軍，他會有更大的歷史空間可以發展，甚至不至最後失去大陸而於台灣結束一生了。

18.3 容共在於引進蘇聯的支援而非中共的力量

蔣介石之所以會採取聯蘇容共的政策，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準備抗日。本質上，蔣介石既無接納共產主義的想法，也沒有對蘇聯有任何的好感⁶，西安事變並沒有改變國民政府追剿紅軍的實力，事實上蔣也不會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時，所做的任何直接、間接的承諾。所以事實已經非常清楚：蔣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變之後，放棄追剿紅軍的策略，進一步的

⁶可以參考蔣介石的名著：《蘇俄在中國》與《中國之命運》兩書即見一斑。

與蘇聯聯合修好，完全都是爲了準備抗日。

因爲蔣介石清楚的知道，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弱國，若是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中國根本無法在短期之內，完成國家復興的建設。若中國在沒有準備下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這可能就是她的亡國之戰了。既然蘇聯有意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須支持中國對抗日本，那麼蔣爲了中國能夠抗日，也別無選擇，只好「聯蘇」了。當時中國在面對日本那種窮凶極惡的侵略之下，又四顧無援，爲了抗日，何止是採取聯蘇容共的政策，恐怕連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國民政府採取聯蘇容共的政策之後，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一個可以借力使力的機會。不過至少從西安事變後，到七七事變之間，中共可以參加抗日的力量，幾乎是微乎其微的，在當時兩百萬的中國軍隊中，紅軍不過三萬人而已。蔣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於引進蘇聯參與抗日，單以作戰兵力而言，當時共軍能夠在抗日所發揮的作用極少。但是由於中共的文宣、組織與戰力，都有國際共產黨所支持的完整體系在運作，因此中國共產黨一旦有機會發展，其階級鬥爭、土改運動到人民戰爭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發展的潛力。在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之後，中共早已全力發展成爲可以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的軍事、政治團體了。

18.4 歷史轉折的深思

總之，西安事變可以說是非常戲劇化的歷史事件，它爲中國暫時停止內戰的歷史，寫下了一個明確的時間，它成爲蔣介石到達歷史巔峰的開始，也成爲毛澤東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張學良從此走出歷史，中國也從此進入準備全面抗日的倒數計時。從此蔣介石更可以將心力放在如何準備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這個全面準備的時間才剛剛經過半年，就正式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但是就深一層的分析，西安事變的本身，好像又不具備如此重大巨變的歷史意義，因爲無論有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都將採取聯蘇容共的抗日戰略，日本也會繼續侵略中國，這樣中共也有重新出發的機會，只是張學良少帥與東北軍的命運會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處，張學良究竟是不是改變中共歷史命運的「千古功臣」，實在是難以下達定論了。中共能夠通過劫難與失敗的考驗，成爲歷史鬥爭的勝利者，主要還是來自日軍的侵略與劫掠中

國，及蘇聯的背後協助的關係吧！好像張學良只不過順勢觸發這個歷史轉捩點的改變而已。

對於日本而言，中國若是持續其分裂、內戰頻仍的狀況，日本當然可以逐步蠶食、繼續侵略中國。但是當中國開始統一與團結之時，日本就必須要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因為中國一旦統一之後，可以集中全力，理財練兵與建設圖強，很快的中國就會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戰的優勢了。

其實中日戰爭只要晚三年爆發，整個戰爭就會有極大不同的發展，至少中國會擁有八十萬的德式裝備部隊、一支有戰力的空軍已經成軍，及在西南有更為穩定的國防建設基礎⁷。

所以當時的歷史處在非常矛盾的狀況，中國若是處於分裂，日本會繼續地侵略她；中國若是邁向統一，日本也會加速地侵略她，看來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如何選擇，到頭來還是必須面對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變的半年之後，在盧溝橋事變點燃的星星之火，就成為中日歷史大決戰的起點——其真正的起因在於日本不能坐視中國的團結與復興，以及國民政府與蘇聯發展合作的關係。

⁷在中、日全面戰爭開始時，中國只有八萬德式裝備的陸軍，空軍還在組訓階段。七七事變之後，當時學人胡適就曾經設法努力，希望國民政府無論如何都能設法忍辱負重，再給中國十年建設的時間，到時候日本恐怕就連與中國作戰的勇氣都沒有了。

19

事出意外的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件發展的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此事件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裡發表的抗日心聲

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戰鬥正式爆發的時間，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之後，開始算起，因此七七事變的成因與發展，就成為中日戰爭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

不過如同歷史上許多重大的事件，盧溝橋事變在開始的時後，本來並不是一個事前經過設計的衝突事件，但是由於蘊釀一場歷史巨變的各種主客觀因素，早已存在與滋生之中，一旦出現了這個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響下，就成為可以引爆全局的導火線。

19.1 中、日、蘇之間的三角戰略關係

根據當時英國外交官對盧溝橋事變的描述，整個中日全面戰爭的歷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華北永定河上，一座歷史悠久的橋上發生的小事件而已。

若僅以歷史事件本身而論，這種說法不完全不對，但卻忽略了在整個「微小事件」的背後，長達六年以上戰爭危機蘊釀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國對於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經到了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當時的中國朝野，絕對沒有狂熱與固執到，只爲了小小的盧溝橋衝突，就要擴大事端與日本進行一場民族之間的歷史決戰。

而更正確的看法應是，盧溝橋事變的本身，雖然只是中日之間多次衝突的一個小火花而已，但最後卻點燃了中日全面歷史決戰的燎原大火，這其中一定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實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間衝突的危機，早已經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地步了。在中國方面，經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綏遠百靈廟之戰，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變之後，全國所有政治勢力所達成的共識是，不能再對日方任何的侵略，進行有損國格的退讓。因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靈廟之戰，華軍重創了由日軍背後支持的偽蒙古軍隊，等於間接打了幕後的主子一記耳光，使得全中國的民氣、輿論，及長時期在日本欺壓下所積蓄的怒火，又因此沸騰，認爲中國的軍力已經足以對抗日本¹，因此民意強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對日本退讓了。

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在形式上終於停止內戰，所有的軍政派系都開始團結起來，準備共同合作以對抗日本，因此國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內做爲準備抗日的藉口。蔣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擺出不能退讓的抗日姿態，才能成爲全國上下所擁護的最高領袖。雖然蔣知道，在當時，抗日的結構，在中國內部才剛剛開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夠有實力與日本進行全面作戰，至少還要有三到五年的準備時間，但是蔣介石卻無法違逆不肯再對日本做出任何退讓的民意了。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日本與蘇聯才是註定非要一戰不可的世仇，雙方從日俄戰爭的歷史上衝突，到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誓不兩立，都是導至日蘇必然決戰的因素，這都是蔣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實上，當時日本所有的國防與戰略政策，都是把防俄當成日本國家安全規劃的重點，就連侵略中國的東北與內蒙，都是爲了爭取防俄之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的構想。蘇聯更是把消滅日本的軍閥與財閥的共同體，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歷史任

¹當時中國百姓就是這樣的激動，大家實在受夠了日本人的侵略，只要能夠出一口氣，中國人就想要和日本人拼命，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有「生聚教訓」的深謀遠慮。

務，因此日蘇大戰的危機，一直在蘊釀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棄侵略中國，中、日之間並沒有一定要決戰的理由，假如中日爆發全面性的戰爭，從歷史的觀點而言，無論是誰贏誰輸，最大的獲利者必然是蘇聯。蘇聯可以用最低的代價，同時侵略中國兼制伏日本。所以蔣介石原本希望，中國能夠儘量的對日本採取克制政策，讓日本與蘇聯的衝突能夠提前爆發，這樣日蘇的第二次戰爭，絕對是世紀性大戰，到日蘇兩敗俱傷的時候，中國就可以擁有足夠的籌碼，同時向蘇聯與日本討回中國應有的公道——要知道蘇聯對中國侵略的程度，絕對不下於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對於是否要繼續侵略中國，而造成中國的反抗，也有著極大的爭論。日本一些政壇元老，都對中國的歷史有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們主張對中國的壓力，一定要適可而止。這種意見，在日本的軍部中，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則是居於少數²。石原認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敵是蘇聯，而中國在西安事變之後，已真正停止了內戰，國家開始有了全面的進步，同時抗日的民族共識已經形成，日本實在不宜再刺激中國，而引爆中日的歷史全面戰爭，最後讓蘇聯坐享現成的利益。而當前日本應該好好的利用所佔領的東北與內蒙，開發資源，建立對蘇作戰的準備。假如日本真的還不能「知足」，見好就收，一定要繼續擴大侵華，終於會引起中國全面的反抗。那麼中、日之戰將成爲一個無法脫身的戰略泥淖，會使得日本的國力耗竭，蘇聯剛好可以撿到個大便宜，而日本幾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於白費了。

但是在軍部中，居多數的是主張再給中國致命一擊的「擴大派」，首腦爲杉山元大將³，特別獲得日本海外駐軍將、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觀點也是站在防俄的前題之下。擴大派認爲，當時蘇聯紅軍受到史達林全面的整肅之後，在相當一段的時間之內並無對日作戰的能力，而中國才剛剛開始團結建設，實力還沒有凝聚好，因此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先給中國強烈的一擊，完全控制中國的華北，然後再回過頭來，以更大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來對付蘇聯。這派觀點最爲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國反抗日本的決心，是遠遠超過她在形式上作戰之實力。在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對於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絕對不會再做任何讓步了。而且中國一旦開始抵抗，就不會輕

²石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總設計師，可以說是日本當時最有遠見的戰略家。

³最得日皇寵信的陸軍大臣，揚言三月亡華，最後卻無法解決中國事變，導至日本戰敗，他因爲擔心受到戰後審判，日本投降後畏罪自殺。

易停戰，因此日本要想再多佔領個華北，以增加抗蘇籌碼的策略，就成爲日本陷入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的錯誤所在了。

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夕，日本軍政的領導人，面對這兩派的爭論，一直無法達成政策的共識，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確是暫時減緩了對中國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過對華北分離自治繼續施加壓力的政策，但也仍是舊調重彈而已。但是駐在朝鮮半島、中國東北以及華北的日軍將校，則是覺得假如再不對中國動手，將會失去立功與發展的機會，因此開始鼓譟不安地出現了「求戰」情緒。

而由於日本的經濟，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民生不安，特別是中國人民對於日貨的抵制（中國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也束手無策。因此當時日本輿論的傾向是，再增加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擴大對於華北資源的掠奪，一方面強迫中國政府取締民間對於日本經貿的抵制。

而蘇聯的史達林，則是非常穩健掌握住中、日、蘇之間的矛盾關係，在西安事變中，史達林對於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幾乎施盡全力；接著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議，將提供國民政府五千萬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應中國所需的軍火，這種直接把軍火交給反共的蔣介石，以增加其中央軍作戰能力的做法，也只有史達林才會做得出來。中國與蘇聯也在加緊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中蘇的結盟與親近，是蔣介石爲了抗日而做出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爲當時的中國，無力單獨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國際社會中，又沒有國家敢過問中日之間的戰爭危機。蔣介石認爲，既然日蘇的矛盾已經接近戰爭邊緣，那麼中國可以冒險的接受蘇聯「魔鬼」（應是當之無愧）的援助，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拉蘇聯下水。

19.2 劍拔弩張的華北局勢

在日本而言，中蘇之間的關係改善，已經開始威脅到日本「反共抗蘇」的基本對外國策了。於是日本少壯派的軍官團體，開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與明確地釐清對華政策，必要時動用武力來取得中國的華北，軍人出身的首相林銑十郎，既無法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又不能協調軍方對中國政策的爭辯，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請辭，由充滿忠君愛國思想的近衛文麿公爵出任首相，但近衛對於軍人的駕馭能力極低。

正當日本政府的高層在爭論，如何對付出現團結與聯蘇的中國政府之時，日本的關東軍、朝鮮軍與華北駐屯軍的將校們，卻早已經等待不耐煩了，他們乾脆決定，由自己先進行各種軍事演習的準備，必要時自己動手。關東軍將機械化的部隊調往長城關口，並且經常進行以鐵路緊急運送部隊與重裝備的演習，日本的朝鮮軍也在進行調動日軍部隊，進行如何能夠越過鴨綠江與渤海，以進入中國作戰的演習。

而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自從調升其地位與台灣軍平等地位之後，增加了一個混成旅團的部隊，駐軍總人數比辛丑和約所允許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豐台事件中，日軍硬強佔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戰略要地豐台，設立軍營（這些都是違反辛丑和約的做法）。這樣日軍在華北，早已完成了對北平的三面包圍，北平對外的聯絡交通線，只剩下西南的宛平與盧溝橋一線了，就這樣，日本在豐台的駐軍，還不斷的演習如何發動攻擊，以一舉截斷北平對外最後的交通線。

早在兩年多前，蔣介石就把華北的冀、察兩省，交給二十九軍將領宋哲元等人，全權的運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設立緩衝區而與以日本周旋；而逐漸地，宋哲元對於南京是採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場。宋哲元在冀、察的運作，一方面設法敷衍日本人的壓力，對日本做出不少的讓步，讓日軍隨時可以在河北公然演習，日本商社開始到處投資發展，漢奸團體也就日益增加地發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為二十九軍的自己人擴大勢力，到了最後，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長職務，已經完全地落在二十九軍的手裡，這種軍政不分的結果，是二十九軍的作戰能力開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節節進逼的做法，至少在華北雙方最後難免一戰，但是他卻沒有利用充裕的時間與資源，充實與精訓軍隊，反而讓二十九軍的上層領導人分心，花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去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最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沒有預先擬訂與日軍決戰的全面戰略佈署計畫。

到了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已經成為中國一致接受的領導人，南京準備抗日的決心與行動，是越來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擔任中日之間「白手套」的時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進一步施壓時，宋哲元乾脆發表聲明，宣佈支持國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種壓力，全部推給南京來負責，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決定回到山東老家休養，而把應

付日本人的責任交給副手秦德純擔綱。

這時候，雖然東京方面還在考慮如何對中國採取下一步的行動，但是駐在東北、朝鮮與華北的日軍，早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們覺得搞華北特殊化，竟然耗費如此多的時日，最後也只弄到一個若即若離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而南京國民政府又搞聯蘇容共的政策，中國軍力與國力正在迅速的發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給中國狠狠一擊，那麼蔣介石可能真的會建立起可以對抗日軍的力量，那麼日本就要錯過控制華北的機會了。

何況目前宋哲元長期不在河北，正是日軍一個可以生事的機會，因此關東軍、朝鮮軍與駐屯軍的將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援的軍事行動默契。日本駐屯軍在河北的演習，就更為的活躍了，特別是在豐台的日軍，更是針對攻擊宛平與盧溝橋，進行實戰演習。並且還要求二十九軍，同意日軍的演習，可以穿過宛平城。宋哲元不在，秦德純也只有接受了，這時的平津一帶，究竟是日本的領土，還是中國境內，已經是分不清楚，人民每天看到的是，日本兵舉著日本旗、用著日本的槍、砲在那兒認真地操練著。

而此時，蔣介石則在廬山進行暑期的國事講習，以團結整個中國的社會力量，同時也與中共的代表進行團結合作計劃的細節協商。蔣介石最為關心的是，抗日的國防腹地大西南軍政力量整合的問題，因此他特派何應欽前往四川，與當地各路軍政領袖，進行軍事整編的會議。因為四川才在年初，一度為了軍事整編，鬧出很嚴重的動亂，全靠南京強力的介入，才能勉強穩住了局勢。蔣介石曾經準備與德國進行可以裝備三十萬軍隊的整批武器交易，但是受到日本與義大利的干預，沒有成功。

原本局勢最為緊張的河北，在七月初，意外出現了和緩的跡象，因為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日本正在考慮更換指揮官；而中國方面，因為宋哲元長期的請假離職，副手不便有所堅持與擔當。因此中日之間的歷史衝突大事，好像不至於在雙方前線主帥都不能作主之時爆發，但是卻因一個意外而引爆了中日全面的歷史決戰。

19.3 小意外演成全面的衝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平津一帶的天候不佳，間歇的陣雨下個不停，這天是河北省舉行國大代表選舉的投票日，選民相當地踴躍，這象徵著河北仍

然與南京保持著主權的關係。而日軍從六月開始，就在在北平到山海關一帶，不分晝夜的進行軍事演習。七月初，日本駐屯軍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由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代理職務，使得駐屯軍的各級指揮官擁有了更大的決定權。

當時駐屯軍中，握有最大部隊指揮權的，是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在七月七日的當天，他趕往山海關附近，督導駐屯軍與關東軍的協同演習。因此當天日軍的演習重點，是放在離北平、天津較遠的山海關地區，所以日本駐屯軍並無立刻要在北平近郊進行挑釁的預謀。

不過，在北平南方交通樞紐的豐台，日軍當天也舉行一個配合性的小部隊演習，當時豐台日軍最高指揮官是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擔任，他在七日黃昏時，回到北平接洽公務，演習只由清水節郎中隊長率領一中隊（一個連的兵力）的日軍，在宛平城外進行夜間實彈演習。演習的假想目標，就是攻佔盧溝橋，其實這種操演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當天的確只是一個小型的訓練演習，而沒有事先設計的預謀。

而在城內的守軍是華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吉星文團的金振中營⁴，營中官兵對於日軍這種耀武揚威，在中國領土上，任意地演習開槍，早已是恨之入骨。從六月中旬，日軍開始在豐台進行密集的實彈演習起，南京軍委會已傳達給二十九軍「加強戒備」的命令，因為整個北平的對外通路，就只剩下這座橋還掌握在中國軍隊的手中了。

日軍在宛平城外的演習，一直持續到晚間十時半，這時候其所派遣的「假想敵」，在黑夜中射擊誘敵的空包彈，而據當時的日軍報導，突然聽到間歇性的實彈射擊槍聲⁵，日軍指揮官清水中隊長立刻宣佈，保持警戒與停止演習，清點全隊人數，搜尋「敵方」開槍地點。

不料在清點人數時，突然發現少了一位負責傳令的新兵志村菊次郎，因此清水決定擺出作戰陣式，並且向上級大隊長一木清直中佐報告，一木清直則向在北平東交民巷的聯隊長牟田口大佐報告。當時牟田口要求現場的日軍，務必進行強硬的交涉，並要求大隊長一木清直立刻調派部隊增援現場，他則與日軍駐屯軍的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立刻趕往宛平的現場。日軍當時交涉目標是，要找到失蹤的士兵，同時當然也要抓到敢在「中國」的領土

⁴ 吉星文團的建制乃屬何基禮旅，二十九軍三十七師的師長是馮治安。

⁵ 並沒有日軍遭到擊傷或是受到實彈射擊，只是好像「聽到」實彈的槍聲而已！

（不是日本的領土！）「非法」向皇軍（日本豐台駐軍是依法無據的）演習開槍的「大膽之徒」（其實有無真的射擊槍聲，也無法證實）。

不料中日雙方正在進行交涉之時，日本所謂失蹤的士兵已經找到了，但是日軍仍然堅持，非要連夜進入宛平城搜查不可。而中國的守軍認為夜深雨大，雙方軍隊的情緒又緊張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實在不便讓日軍進城，以免爆發意外，何況失蹤士兵已經歸隊，槍聲問題又查不出個所以然，不如等到天明之後再加以處理。但是這時日軍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已在山海關得到消息，立刻下令聯隊長牟田口，要給中國軍隊一些「教訓」，要叫中國軍隊知道，不能在中國的領土，對演習的日軍「開槍」（只有日軍可以在中國的領土開槍、砲轟任何他們要想攻擊的目標）。既然一木清直的部隊已經調出，牟田口大佐就有教訓中國部隊的打算。

中日雙方交涉到七月八日凌晨四時左右，日本人實在也吵不出個結果，眼看天亮後大家就可以平靜的解決歧見，但是日軍部隊已經在野外淋雨受凍了等候了半夜，假如就這樣回到兵營，實在「下不了台」，因此日軍的聯隊長牟田口就藉口日軍又遭到華軍射擊，下令一木清直的部隊，向宛平城的中國駐軍所在地進行射擊洩憤，中國守軍當然加以還擊，雖然這只是雙方沒有作戰目標的交火，但是卻是在盧溝橋事變中，真正的互相射擊「事件」，雙方正確的槍戰時間，是發生在七月八日的清晨五時左右。這時華軍沒有被嚇倒，沉著地還擊，日軍的射擊更完全沒有討到任何的便宜。

由於局勢早已高度的緊繃，因此在盧溝橋附近的軍事衝突一發，雙方立刻都以加急電報分別向東京、南京報告請示。日本軍部接到電報之後，立刻下令駐屯軍司令部指揮豐台駐軍，要日軍在下列的基礎下，就地解決此次的中、日軍事衝突，一、日軍務必控制永定河左岸陣地，二、設法解除中國軍隊在永定河左岸的武裝。三、駐屯軍可以調派部隊增援盧溝橋前線。而這個指令正好和旅團長河邊的意見相同，於是他立刻調動軍隊，趕往豐台支援牟田口聯隊，準備奪下盧溝橋、「踏平」宛平城，以教訓中國人的無理。而日本的媒體，則把這個新聞，炒得火藥味十足，認為事關日軍威望與國體尊嚴，非要追究到底，給中國軍隊一個教訓不可。

但是日軍的確低估了守軍的戰鬥意志，牟田口大佐以為只要日軍全面動手，華軍必敗無疑，結果他沒有等駐屯軍的援兵到達，就在八日下午，率領豐台日軍再攻宛平與附近陣地，但是遭到華軍強烈抵抗，華軍甚至出兵迂迴

攻擊，造成日軍傷亡慘重。日本根本沒有辦法拿下盧溝橋，當然也沒有辦法踏平宛平城。事情演變至此，當然造成旅團長河邊的震怒，日本方面只有先和中國方面進行談判，在七月八日的晚上，由張自忠與松井太久郎簽定停火協議：一、中國軍隊撤出宛平。二、日本軍隊退回豐台。三、宛平改由中國的保安隊（石友三部）接防。既然達成協議，整個事件看起來應該可以告一段落。

雖然交火的第一線已達成和解的協定，但是日本的軍方卻出現了強烈的求戰期待，特別是關東軍與朝鮮軍的少壯派軍官，已經演習入關支援作戰很多次了，因此早就有意要展現自己的兵力，他們立刻自行發表公開聲明，表明日本軍隊必須要好好的教訓華軍，並且誓為華北駐屯軍的後盾，同時將請戰與求戰的強烈主張，回報東京。東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同樣也是興奮異常，自動停止休假下班，晝夜進行草擬日軍在華北軍事行動的計劃。

而早已期待日本應該以果斷的力量，打開華北僵局的日本輿論，在報導盧溝橋事變時，都以極其誇張的手法，報導中國軍隊竟然敢在「中國」的領土，騷擾日本皇軍的「非法」演習，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必須要給中國狠狠的教訓一番，叫中國懂得尊重日本。日本內閣立刻煞有介事的對這個事件，進行討論，不過由於政府與軍部內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意見仍然無法妥協，接著又傳出駐屯軍與二十九軍達成解決協議，因此只有暫時作罷。日本內閣在九日宣佈「不擴大」方針，只要求華軍必須從盧溝橋撤退，不過參謀本部卻開始研擬日軍對華北的作戰計劃，以備軍情變化的需要。

盧溝橋軍事衝突的消息傳到廬山，蔣介石對於盧溝橋交火的衝突，倒是相當嚴肅看待。雖然以目前的各種情報判斷，這只是日軍演習所產生的意外事件而已，背後應該沒有特別的策劃與預謀，但是他仍然認為，要特別小心局勢的發展，因為他絕對不能再因判斷錯誤，讓北平重演九一八事變瀋陽淪陷的悲劇了。

19.4 中國全體軍民決心絕不退讓

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已經留下中日雙方可能就此爆發全面軍事衝突的不祥預感。隔天，雖然傳來中日雙方已在前線達成和解的協議，但是蔣介石卻更為不放心，八日蔣拍發電報給在四川的何應欽，叫他立刻設法完成

川軍整編工作，兼程趕回南京，準備調兵遣將的事宜。接著蔣介石又下令在廬山開會的西北軍將領孫連仲，立刻下山，率領四個師的部隊，進駐河北保定，以做宋哲元的後應。

蔣介石親自拍電報給宋哲元指出：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日方將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央已決心用全力抗日，寧為玉碎，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以免遭敵各個擊破，兄可將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軍的包圍。』

不過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蔣介石的指示，當成一回事辦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之後，也立刻發出電報，支持南京要對日本採取強硬的立場，並且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計。這時中國各地的輿論，也是一片不能退讓的抗日情緒。七月十日，蔣介石更進一步地對軍令部下達指令，進行各種可能發展的參謀作業準備，以備局勢急轉直下，迎戰日軍。蔣介石同時也對各路的軍政領袖們，發出「中央決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準備共商抗日大計」的電文。而這個電文所得到「各路諸侯」的反應，是出奇的熱烈。兩百年來，中國第一次這樣展現團結一致的對外作戰立場。

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接到東京不擴大的交涉方針指示，雙方最大的困難是，華軍不能同意從盧溝橋撤退。七月九日，河邊旅團的部隊在盧溝橋附近集結完畢，完全不顧剛剛達成的停火協議，立刻對盧溝橋等陣地發動攻擊，日軍原希望能夠展現一下皇軍無敵的軍威，但卻仍然一樣地遭到華軍強力的反擊，盧溝橋還是沒有攻下，日軍反而遭到華軍的包抄攻擊，損失了不少人馬。

日本駐屯軍只有改用談判的方式，於七月十一日，中日雙方又在會商解決辦法，結果中國同意：一、對於事件表示遺憾，並且約束部下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盧溝橋附近陣地改由保安隊接防。三、徹底取締抗日團體。在中日達成協議之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田代中將已經進入彌留，日本軍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將接任駐屯軍司令官，當天啓程赴任。同時在山東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屬十萬火急的電報催促之後，也才在同一天，離開山東老家，準備回北平處理對日本的交涉。

19.5 日本決定出兵華北

但是在東京，事情卻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七月十日午夜，東京參謀本部接到日本駐南京副武官大城戶的最新情報，指出蔣介石已經開始調動部隊北上，支援宋哲元，這個情報造成日本參謀本部擔心駐屯軍缺乏主帥控制大局，兵力可能不足，而會吃國民政府援軍的大虧；而在此時關東軍與朝鮮軍更是不斷發出「請戰」的電報，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甚至派遣少壯派軍官返回東京，陳述作戰要求，並且表示，關東軍已經主動開始集結部隊待命，準備隨時支援華北的駐屯軍。

因此日本的參謀本部在面對海外駐軍重大的壓力，以及對於敵情調軍必須有防衛的動作下，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終於被迫同意，在內閣會議中提出華北增兵方案。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先舉行五相會議，在陸相杉山元的保證，以及參謀本部的局部防衛前題下，正式決定出兵中國華北，並且下令日本進入動員，以支持日本在中國華北進行有限的軍事行動，日內閣接著在下午三時，行禮如儀的通過「華北增兵方案」

日本的內閣會議結束之後，緊接著在十一日下午四時，參謀本部與陸軍省長官正式晉見日皇，請旨出兵華北。日皇裕仁在得到陸相杉山元的「保證」，假如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本最多只要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解決中國任何的反抗。同時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戴仁也保證，蘇聯絕對不會利用中日衝突的機會與襲擊日本。這樣裕仁就正式批准日本對華北進兵的聖旨，中日之間的歷史決戰，就這樣無法回頭而要開始了。

在日皇批准對華北增兵命令的新聞發佈之後，原本飽受經濟低迷與政治混亂打擊的舉國上下，全都進入瘋狂亢奮的狀態，他們認為日本再現帝國神威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日本全國都出現熱烈募款支持軍費的活動，各個徵兵站都是大排長龍，各種勞軍團體與軍眷後援會紛紛組織起來。日本人民普遍的認為，只要日軍出擊，中國必定屈膝，接下來將是日本可以任意宰割中國所有市場與資源的黃金時代了！

日本參謀本部接到御旨批准出兵的同日，立刻向關東軍與朝鮮軍下達臨參命五七號、五八號，調動日本關東軍的第一旅團，第十旅團，朝鮮軍第二十師團，以及相關的戰車、砲兵與飛行團，立刻多頭齊發，進軍中國華北，接受日本「支那駐屯軍」的指揮，準備參與教訓中國的作戰。

日本參謀本部同時對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頒佈了日軍在華北作戰計劃，「以打擊中國第二十九軍為目的，戰事局限於平津地區」、「軍事行動開始之時，速以武力膺懲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一期應先將北平郊外之敵掃蕩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以及其屬下的少壯派軍官，更是直接與主動地對香月發出訊息，要求他能夠把握機會，不負眾望地給華軍致命的一擊，以實現華北分離的計劃。他們保證會在戰場與軍部，全力支持駐屯軍的任何強硬行動。因此香月在熱烈的請戰情緒影響之下，又剛走馬上任，自然無法讓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決定，要給華軍強烈的教訓，以加速推動「華北自治」。

19.6 宋哲元處置失當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遲遲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會蔣介石多封指示機宜的電報，更沒有將司令部移防的準備（更為離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報告所有情況，也不請示任何的機宜，完全獨斷專行，害得南京國民政府，無法掌握最新狀況，所有消息要靠軍統局電台的報告）。宋哲元當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與香月直接接觸。

香月在日本的援軍尚未抵達之前，先與宋哲元進行緩兵之計的交涉，提出嚴厲的七條件，內容是要宋將任何「反日」的黨政軍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應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認為只要二十九軍讓步，日本也就會伸手不打笑臉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開發表聲明，表示盧溝橋問題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經得到合理解決，並婉謝中國境內各方的支持二十九軍備戰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來順受，卻引動日軍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參謀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協議，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參加前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的喪禮，與香月見面，正式向日軍道歉，並且下令張自忠與日本代表簽訂接受日方要求的協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終於雙方達成撤軍協議，約定雙方軍隊將於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離軍事衝突的交戰前線，以緩和華北衝突的局面，二十九軍並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為此再一次發表聲明，認為整個事件已經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希望大家不要聽信謠言，中日雙方應該互

信互諒、和平相處。

宋哲元回任之後，一再示弱的表現，的確令國民政府與中國人民大吃一驚。蔣介石特別感到不安，因為所有宋哲元的行動與交涉，一直沒有片紙隻字地回報南京；對於蔣介石之指示：『對於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輕易的讓步，同時應將司令部遷移到保定，集結軍隊以備不測，』也根本不加理會。因為蔣介石已認為，在日本壓力之下，任何表現善意的讓步，任何沒有實力備戰為後盾的交涉，都會讓日本覺得可以得寸進尺，終於會誘使日軍採取武力行動。

無奈宋哲元擔心蔣介石會以抗日為名，將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發展，因此寧願向日本低頭，以求自己能夠繼續成為南京與東京之間的緩衝。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強者、輕視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讓與低頭的表現，正好給香月一個錯誤的印象，認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過爾爾，因此香月已經決定，要在援軍趕到之後，在河北給二十九軍一個狠狠的教訓，以報日軍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這時候，事情的發展逐漸接近失控的狀態，宋哲元這一系列的表現，不但讓全國人民感到失望與困惑，就連蔣介石也感到事態不妙。全國人心開始浮動不安，日軍的行動更為大膽，因此蔣介石在廬山連日與政府軍政首長以及社會的名流會商之後，於七月十七日，正式發表廬山談話，宣佈中央政府堅定的立場。

在廬山談話裡，蔣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國人，發表了決心迎戰的心聲：

『盧溝橋事件發展的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此事件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蔣介石在談話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軍強行佔領盧溝橋，必然會進一步進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著當然會進犯南京，因此若是盧溝橋事變不能得到妥善解決，那麼中國將會面臨最後關頭的選擇。但在和平尚未絕望前的一秒鐘，中國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雙方能夠以外交方式解決盧溝橋事變。蔣介石進而提出中央政府對於盧溝橋事變解決的最低四點原則：一、不能侵犯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政務委員會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變。三、政府任命的官員不得撤換。四、二十九軍的防區不得變更。蔣

介石指出，這是一個弱國最低條件的外交立場，希望日本能夠設身處地的考慮，不要逼迫兩國關係達到最後關頭，不要造成中日兩國的世代仇恨，應該能夠適可而止。

蔣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發表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的立場聲明，並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還要進一步地侵略中國，那麼這就是迫使中國面臨全面抗日的最後關頭了。蔣介石仍然進一步地電告宋哲元，在進行談判時，千萬不要輕易的相信日本的緩兵之計，同時蔣介石已經在南京開始與日本使館進行直接的外外交接觸，但是日本使館卻明白表示，盧溝橋事變是地方事務，將由華北駐屯軍與宋哲元進行直接的談判，日本政府只是藉著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國民政府，不要煽動仇日的「愛國活動」。

不過在北平的宋哲元，對於蔣介石維護主權的廬山談話，根本充耳不聞，還是完全地接受日本無理的要求，宋哲元還以為盧溝橋問題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軍依照協議撤軍，並且拆除在北平備戰的防禦工事，此時宋哲元才將七月十一日的中日舊協議（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協議），電告南京，並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孫連仲等部隊北上，同時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備戰軍火。

蔣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趕回南京，接到宋哲元過時的報告，爲了避免在大敵當前，出現中央與華北當局的不和，只有勉強同意宋的協議報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協議上，爲中國爭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權。蔣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與宋哲元熟識的戈定遠、熊斌北上，親自向宋解釋中央抗日的決心與立場，希望他能夠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壓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豐台的皇軍，不但不按照協議撤軍，反而對宛平的中國守軍，發動軍事突擊，以密集的重炮，猛轟盧溝橋與長辛店的中國守軍陣地，華軍團長吉星文受傷。同時日本的內閣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勵，以及認爲這是南京與華北之間的立場對立，因此計劃從日本國內出兵，增派三個師團部隊，直接增援華北，以對宋哲元的部隊，進行猛烈的打擊，並且乘機完成華北自治的計劃。

雖然來自南京與東京的消息，都對宋哲元的做法，產生了極大的否定訊息，但是宋哲元仍然堅持自己對日本讓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軍各部，仍然要依照協議撤軍，但是日軍卻根本無毫移防的跡象，反而是大軍源源不絕的從關外以及朝鮮等地，進入平津地區。局勢已經

非常的明顯，日軍在平津一帶開始形成合圍的優勢兵力。對香月而言，這是一個全面重擊二十九軍，徹底解決華北自治問題的最佳時機，但是宋哲元卻拒絕面對事實與危機，仍然相信日本人會遵守協議，和平解決盧溝橋事變。

19.7 日軍決定攻佔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鮮軍增援的先遣部隊，已經到達北平南郊的廊房，這是平津之間的交通要地，日軍不顧一切的進犯廊房車站，引起守軍的反擊，雙方的部隊在此爆發新的戰鬥，中國守軍不敵，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這才發現大勢不好，緊急下令二十九軍備戰（又是倉皇應戰，事前根本沒有完整與全套的作戰參謀作業）。而當天夜間，日軍準備派遣部隊混入北平城內，做為接戰時的內應，但是被守軍發現，於是設下圈套，先讓日軍進城，然後在半途加以圍殲，這就是令日軍顏面無光的「廣安門事件」

香月聞訊之後大怒，此時東京軍部電報指示，日本援軍已到，駐屯軍可以掌握戰機動用武力。香月於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對宋哲元發出限兩天內自動撤離北平駐軍的「最後通牒」，宋哲元接到日軍最後通牒之後，這時才如夢初醒的發現，華軍已經陷入戰爭的危機當中。於是宋一方面嚴拒日本的要求，發出自衛抗日的通電，一方面加速調兵佈防，並且要求中央緊急軍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參謀本部下達臨參命第六十五號，正式調動日本第五、六、十等三個師團，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華北。於是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經重兵在握，當然把握機會，下令日軍開始對北平與天津，發動正式攻擊。

這時候宋哲元的兵馬調動，可以說是已經太遲了。七月二十八日，準備馳援防衛北平的二十九軍部隊，於行軍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軍陸空夾擊，二十九軍在來不及散開佈防之下，死傷慘重，副軍長佟麟閣，以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同日陣亡。宋哲元才發現，二十九軍這些年來，沒有積極地提升總體的戰力，只坐享割據一方的利益，而日軍戰力已經更有進步，因此二十九軍在與日軍正面作戰之時，已經無復當年之勇，因此軍心大亂。

雖然南京電令宋哲元應在平津重鎮，力戰卻敵，但是宋哲元發現，自己的部隊已經遭到日軍多面包圍，戰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勸宋退出北平，以

免古都遭到兵災的電報之後，宋哲元只有匆促地進行安排，由張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務委員會職責，於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軍連夜奔逃。但撤離北平如此重大的決定，宋哲元事前事後，連一封電報都沒有報告南京。日軍當晚進入北平，蔣介石是收聽日本廣播，才知道北平淪陷，宋哲元已經不戰、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當天，駐天津的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聯合天津的警衛部隊，對天津的日本租界與機場車站，發動攻擊，進展相當順利，攻克多處陣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時部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偽軍，也槍殺日本的警衛隊，以及俘虜偽政府漢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軍起義投誠。不料宋哲元已經倉皇逃走，起義的部隊找不到接應的華軍，結果被日軍追擊而潰散，殷汝耕才得以脫逃。

而在天津戰場，華軍居於優勢，因此遭到日軍空軍猛烈的轟炸，南開大學等地因此被毀，而此時日本從本土調動的增援部隊，剛好開始到達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華軍發動攻勢。由於天津守軍聽說宋哲元已經逃跑，北平也同時淪陷，當然也就從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軍就佔領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軍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軍，與經營多年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也就從此正式地走入歷史。日軍新集結之重兵，對宛平與盧溝橋發動全面攻擊，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這個造成中日雙方大戰的歷史地點。至此日軍已經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戰目標，並且攻佔了中國最爲重要的北平、天津兩大城市，日本當然是舉國同歡。日軍根本在沒用多少力氣的狀況下，就有此戰果，也發覺二十九軍的戰力不過如此而已，「三月亡華」的說法恐怕還是太高估華軍的實力了。因此不擴大派的論點，立刻被壓制，日本認為在華北的軍事勝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勝追擊，多強迫中國讓步，反正華軍是不堪一擊，日本仍然會有足夠的能力來對付蘇聯可能的威脅。

19.8 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戰爭

就歷史事件的順序性而言，盧溝橋事變的確是中日之間全面大戰的開始時刻，但是檢討盧溝橋事變，卻發現這不是日軍計劃中的一個戰略攻擊行

動，而是一個軍事意外，由於中日雙方已經在歷史決戰關頭徘徊多時，最終因為前方軍事負責人，沒有完全掌握狀況（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盧溝橋事變由小變大，最終失去控制。

而形成這場歷史大決戰的起因，當然是日軍在華北的野心與企圖，已經形成一個隨時可以引爆的火藥庫。但是假如當時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蔣介石的指示，一味的對日低頭示弱，讓日本低估中國的抵抗決心，以及認為中央與華北之間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擴大派的主張佔到上風，那麼盧溝橋事變是否會演變成爲中日全面大戰的起點，還是一個可能的疑問。

假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不是正在權力交接的空檔，而讓部屬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多次的企圖攻下盧溝橋，好展現自己統帥日軍的武力與軍威，但是卻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駐屯軍與關東軍的求戰聲浪升高，那麼整個的大局，也許可以不至於因爲盧溝橋事變的「小小衝突」，而立刻的急轉直下成爲華北全面戰爭。事實上，過去中日雙方在平津一帶，已經發生過幾次比盧溝橋事變還要嚴重的衝突（兩次豐台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沒有引爆中日雙方的決戰，但是這次的「微小事件」卻造成中日的歷史決戰，這也許就是歷史所安排的命運？

事實上，蔣介石對於盧溝橋事變之後，下令立刻馳援與備戰，原是為了展現華軍的實力與決心，而能讓日本有所自我約束的警覺，了解中國不可能再退讓，並非決定就爲此事變派兵，而與日本進行決戰。因爲當時國共合作的談判，還沒有達成結論，整編六十師部隊計劃，才完成二十師而已，空軍也沒有達成作戰的編組，西南戰略基地的整理與建設才剛剛開始進行規畫。

因此按照蔣介石的戰略設計是，中日之間儘量維持不正面決裂，而讓日蘇之間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間的決戰真的無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〇年之後再展開。但是蔣介石派軍北上的動作，卻讓宋哲元大大的誤會了，（這當然是張學良事件的後遺症之一，蔣介石擔心宋哲元誤會中央乘機派兵收權，還特別派同是西北軍的孫連仲、龐炳勛部隊進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斷，冀察政務委員與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膽的對平津動手。

蔣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別要求英國大使許閣森與倫敦聯絡，希望英國能夠調停中日之間的衝突，同時電令正在英訪問的特使孔祥熙，進行外交試探，但是英國卻在綏靖主義的影響下，有心無力。接著蔣介石又分別向美

國、德國、法國大使表白中國希望和平的立場，但是這些國家也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的緊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國家還希望中日之間爆發戰爭，可以減緩他們在東南亞與太平洋所受到的日軍壓力。因此，國際社會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發展，完全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看看中國究竟能夠抵抗日本多久。日本當然是有機會充分了解國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戰」的立場，但是日本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動手解決華北的時機。

平津既然淪陷，舉國震動，蔣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發表全軍將士的抗戰聲明，並且在內部高層會議之中，蔣介石極力為宋哲元違背中央指示，擅自撤離北平的做法辯護，認為目前是團結抗日的時刻，只要宋哲元繼續擁護中央抗日，沒有必要再追究責任，當天蔣介石下令財政部立刻撥款給二十九軍的後勤所需（當時地方軍的財務是獨立的，宋哲元不戰而丟掉平津，財源盡失，軍隊衣食立刻發生問題），並且在隨後發表的華北戰鬥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為第二集團軍司令，負責津浦線的防務，並將二十九軍擴充為三個軍的編制。

事實上，日本方面的不擴大派，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也曾試圖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在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剛開始傳回國內之時，首相近衛文麿、海相米內光政大將，外相廣田都認為，這可能是陸軍所蓄意製造的事端（這次倒是冤枉了日本陸軍），但是日本政府在發現宋哲元一味退讓，以及日本海外駐軍一再的請戰之後，才認為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從中國身上多撈一些利益，以轉移國內的經濟與政治的壓力。

但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卻清楚的看出，中國很可能已經退無可退了，日本若要再進逼一步，中國必然會決死抵抗，而把日本陷入戰爭泥淖之中，蘇聯將會漁翁得利，更容易擊敗日本。因此石原曾經要求廣田外相，甚至是近衛首相，親自前往中國，進行和平訪問，此舉曾經得到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的同意，但是遭到軍部強烈的反對。石原甚至直接用無線電與駐屯軍的聯隊長牟田口大佐通話，要求駐屯軍撤離豐台，避免與華軍在盧溝橋繼續產生衝突，當然石原的這個要求，引起駐屯軍少壯派軍官強烈的抗議。石原把動員國內部隊前往華北的命令也擱置了將近十天，但是最後日本受到宋哲元一再退讓的刺激，於是舉國狂熱，民氣沸騰，認為中國既然示弱，實在是的大好時機（那有現成的便宜都不撿的道理？），因而終於進行攻佔平、津的軍事行動，石原接著就被調職了。

其實日軍攻佔平、津後，日本內閣曾經要想就此逼中國簽下城下之盟，將永定河與海河與長城之間的地區，劃為中立地區（按照日本的解釋，中立者，就是中國不得干預，日本可以操縱）、要求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國民政府撤出在冀察的所有機關、禁止全中國所有反日的活動、中日簽訂防共協定、對日本開放中國市場。這些條件，在八月十日由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向中國外交部亞洲司長的高宗武提出，但是這種喪權辱國的條件，當然是不可能被國民政府所接受的。

蔣介石終於決定，這是國民政府決心抗日的最後關頭，因此下令華軍，積極準備在華北與日軍決戰。但是在上海爆發中日虹橋機場的軍事衝突之後，日本海軍開始大量在上海集結，因此蔣介石決定將全面抗日戰爭的主力戰，移轉到上海。八月十三日，日軍在上海發動攻勢，十四日蔣介石發表抗戰自衛聲明，十五日，日本宣佈全國動員，成立作戰最高司令部大本營，並且下令成立華北方面軍與上海派遣軍的戰鬥序列，中日的歷史決戰，就此全面地展開。

19.9 七七事變的檢討

我們了解盧溝橋事變所引爆的中日歷史決戰，與當夜第一槍的歷史真相，以及志村菊次郎的失蹤復返，並無真正或必然的關連。整個盧溝橋事件的真相是，事前既非日軍故意設計，而在事後也沒有立刻引爆全面的衝突。中日雙方最高階層對於這個事件一開始的反應，其實是比較傾向「不擴大」的立場。這個小小的事變之所以會擴大，主要原因是日軍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與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硬要藉這個題目，擴大事變以拉高自己的威望，而當時駐屯軍的代理長官參謀長橋本群又壓不住現場狀況，造成中日雖然達成解決的協議，很快的又被推翻，衝突越來越多，事情越鬧越大，日本的輿情更是出現狂熱的求戰情緒。

這時候，不但是關東軍與朝鮮軍的將校們，全部主張強硬對付中國，連日本的輿情，也是高喊日本必須拿出行動，懲罰中國的「無禮」，駐屯軍的部屬更是已經殺機已露，難以約束，人人都想利用這個機會立功，所以新任的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強烈的行動期盼壓力下，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要藉機立威。而唯恐天下不亂的日本海外駐軍將校們，更是拉幫結派的對東京

進行請戰的壓力，日本的輿論同樣的推波助瀾求戰，整個問題才急轉直下的擴大成爲無法控制的戰爭。

雖然在事件剛剛開始之時，日本的不擴大派還是佔到上風，但是在派遣駐屯軍司令官新人選時，竟然讓在「二二六事變」中，扮演要角的香月清司出任。香月本人原是傾向不擴大派的正統日軍將領，但是他又想利用這個復出的機會，大幹一場，才能更有前途，這和關東軍與朝鮮軍將校想要惹事生非才能建立功業的立場是一致的。香月清司在眼看宋哲元一再地示弱求和，中央軍的支援無法投入河北，於是決定動手。而宋哲元的猶疑態度與示弱的表現，加上與南京不同步的立場，都使得日軍認爲，這是打擊中國華北的良機。

總之，七七事變之所以最後發展成爲中日歷史大決戰的第一槍，真正的關鍵時刻，不是七月七日當天晚上的事故，而是在七月十一日所發生的一連串變化。因爲在十一日的當天，日皇正式下令派遣大批日軍進入河北增援，香月清司也在同日接任駐屯軍司令官。也在這一天，中方的宋哲元，抱著一種不完全信任南京，亦不打算與蔣介石指示合作的態度，銷假上班，宋並且擅作決定，以逆來順受的態度向日本壓力低頭。這三個同在七月十一日所發生的事件，決定了盧溝橋事變最終發展成爲華北事變，然後進一步發展成爲中日之間的歷史大決戰。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就不可能懸崖勒馬、就地化解中日之間的衝突了。

從盧溝橋事變的小意外事件，而逐步擴大成爲平津陷落的華北事變，這些年來，身爲華北軍政最高領袖的宋哲元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爲他沒有進行全面與周詳的作戰準備，在日軍的攻擊下，就讓平津重鎮輕易地淪陷。有了九一八事變與熱河、內蒙淪陷的教訓，以及長達三年的準備時間，宋哲元居然沒有一套完整的建軍備戰之抗日方略，也沒有周延的防衛平津之參謀作業，以及全面抗日的作戰計畫，真是令人感到不解。

而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宋哲元擅自違背南京之「要抵抗」命令，以及阻擋支援的軍力，最後更是擅自決定不戰不告而退，其實在歷史的意義上，他才是真正的奉命抵抗，卻自行退卻的「不抵抗」將軍。不過這時中國需要抗日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就沒有人追究宋哲元不抵抗的責任了。比起張學良因奉命不抵抗，而讓他爲之遺憾終生，宋哲元實在是幸運太多了。不過從此宋哲元也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可觀的重大戰功，兩年後就因病去世。幸而其他

的二十九軍將領，很快就恢復戰力，像張自忠的以身殉國，劉汝明的奮戰不懈，還有馮治安也是一位很出力作戰的將領。

七七事變既演變為華北事變，蔣介石已是退無可退，只有率領中國走上抗戰之路。這時的局勢是，國際社會袖手旁觀，日軍侵略凶性大發，中國各路諸侯積極請戰，沸騰的民意更是要求抗日，蔣介石於是斷然決定，中國已經無法再對日本退讓，假如日軍一定要繼續地侵略中國，她就只有提前與日本決戰。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真的沒有準備好而能與日本決戰，但是歷史的命運已經逼得她沒有其他的選擇。盧溝橋不確定的槍聲，以及誤以為失蹤的日本士兵，就成為引導中、日兩國進入了歷史大決戰的藉口。

雖然中日戰爭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全面的展開，但是中國對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才正式宣戰。整個中日戰爭的政治決定流程如下：國民政府是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最高國防會議上，才決定全面對日作戰，蔣介石於八月十四日宣佈中國自衛抗戰聲明。日本政府是到了八月十五日，決定設立大本營、進行全國動員、正式組織進攻中國華北與華東的戰鬥序列，這樣中日兩國才算是全面的開打。

當時，中日雙方都沒有正式進行法定的宣戰程序，這時雙方均認為，若是中日正式宣戰，會影響到國際社會出售作戰物資的法律運作的問題，同時一旦停戰，還要簽定正式的和約。中國沒有打勝的把握，不能簽下任何割地賠款的和約，日本也不敢公然的獨佔中國利益，而引起國際的反彈，所以中日的正式法定交戰狀態，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四年又五個月，經歷過了幾千場的戰鬥之後，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國政府以法定的程序，正式向日本宣戰。

但是歷史沒有忘記，中日全面戰爭正式的引爆點是盧溝橋。雖然在七月七日的當天，中日雙方既無正式的交火，也沒有人員的死傷，但是整個中日戰爭，仍然是從七七延伸而來，中國人世世代代都應記得為什麼這是中國全面抗日開始的紀念日！

中日全面戰爭的戰力解析

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中日戰爭可以說是是一場典型「跨越時代」的遭遇戰，其主要的關鍵，不僅在於雙方武器裝備上的巨大差異，更在於總體國力，舉凡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上的差別。當時的日本，已是一個工業化的軍事強國，無論是社會組織與國民觀念，都已能適應現代化的總體作戰。但是當時的中國，卻仍在落後與農業化生產的社會結構之下，因此難以發揮總體作戰的能力。同時日本對外的作戰力量是團結一致的，中國則有著國、共對立以及各地山頭的分裂問題。

所以，在討論中日雙方的有形戰力對比，雖然可以作出數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結構的不同，很難單憑數量化的對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各國的軍事專家，對於中國抗日戰爭能力的評估，與事實的表現，會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過中國軍民所付出的血、淚、犧牲，才能發現真正事實的層面。

20.1 中日雙方總體國力的比較

當時，日本已是二十世紀的軍事強國，有著健全的工業化生產基礎，陸海空軍隊所使用的先進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設計與生產的，日軍又有先進以及完整的軍事組織體系與半世紀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軍力，無論是裝備還是人員，都是現代化的作戰結構。而中國還是處在十九世紀的落後國家，主要的軍事觀念還是來自一批前清遺老的領導人物，仍然以複雜的個人關係做為運作的基礎，率領一支近乎文盲的軍隊，剛剛開始知道運用買來的一些二手軍火，國家既沒有工業化的經濟結構來支持戰爭的後勤需要，就連徵兵制度以及全民動員的總體戰，還是完全在摸索的階段。

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入侵中國東北的領土起，中日雙方就處在不斷的對立與危機之中，其中也經過幾次局部與激烈的戰火衝突，但是中日雙方一直沒有正式的宣戰，中國在近五年又十個月的折衝與忍讓下，被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一半的內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萬的中國人成為亡國奴。日本在中國的境內，事實上取得全部帝國主義宗主國為所欲為的特權，但是日本對於自己能否取得對抗蘇聯及與美國決戰的戰略優勢，仍然充滿著不確定，因此對華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終於在盧溝橋事變的衝突中失控，迫使中國選擇了最後關頭的全面抗日作戰。

中日雙方這場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總共進行了八年一個月又三天，兩軍雙方總共進行過二十二次的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一千一百七十七次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以及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一次的小型接戰，中國軍方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日軍傷亡了一百一十萬，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萬人，接近六千億美元的財產以及無數的文物遭到日軍的摧毀與劫掠。

以戰爭規模而言，這場決戰的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與最為慘烈的戰爭，雖然最後中國終於與盟國一起戰勝了日本，可是結局卻是最為奇怪的悲劇：日本這個侵略者、戰敗國不但能夠全身而退，不負責一文錢的賠償責任，甚至能夠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島¹。為世界的正義、和平犧牲最大的中國，除了得到了一個戰勝國的頭銜外，只有無數軍民的死傷，及社會與家族累積

¹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又實際控制了根本是中國領土的釣魚臺。

數世紀的基礎完全被侵略者的戰火消耗殆盡；雖在名義上成爲創立聯合國的四強，但是卻丟掉了外蒙古二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加上將東北的交通動脈、港口無償給蘇聯使用²。

在中日兩國正式全面開戰時，日本全面現代化已經有半世紀以上的基礎，日本帝國在當時是全球最強的陸軍與海軍國之一，它又擁有堪稱世界一流水準的工業基礎，能夠大量生產及自己研發最爲先進的陸海空軍武器。當然最爲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總體戰爭體制，日本全國最爲優秀的年輕人，都以參軍爲榮，軍隊體制完整，軍官與士兵的訓練與素質都有很高的水準，因此日軍的戰鬥力，單以陸軍野戰師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國陸軍（當然是與整編後的中央軍）與日軍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實上，就連中央軍完成整編的二十個師的陸軍部隊中，大部分的德式裝備也沒有運到，若是以中國地方諸侯軍隊的兵力與火力做爲比較，華軍對日軍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達到戰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軍、戰車與毒氣的聯合作戰，日軍更是佔到絕對的優勢³。

而反觀中國，就算在開戰之時，全國還不能算是達到真正的統一，將近一半地區，還是維持半獨立的狀態，現代化的工業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現，國內連主要地區的道路交通，都沒有完成，除了陸軍使用的輕兵器與彈藥可以自行生產（其實數量不足，質量也很差），陸軍重武器與海、空軍的主要作戰裝備，還是全靠進口，不但經常是有錢買不到貨，而且最多也只能買到別國淘汰的二手貨而已。

軍隊戰力低落的最爲主要問題，還不在火力裝備的不足。當時的中國飽經軍閥割據的戰亂，中國人民普遍看輕軍人地位，當兵是走投無路的暫時選擇，一有另外的機會，還是離開部隊，軍官的素質也是一樣的低落，根本沒有現代化科技的常識，不會運用現代化的作戰方式（當然有少數的例外，中央軍校即是一例，後來的知識青年從軍又是一例），而中國部隊之間的所有無線電通訊，從戰爭開始到結束，日軍都能監聽與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戰爭中，華軍在戰場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動口又動手」的，不過自己卻少有參軍的，造成愛國青年與文人，打中國政府內行，

²蘇聯對中國的侵略，還是經由兩個自詡爲世界上最民主、最先進的國家秘密同意與授權的。

³日本軍方的對華作戰計劃，就是採取八比一的中、日軍隊數量比率，進行規劃的。

打日本兵罕見的局面。直到知識青年從軍的運動興起之後，中國的抗日精神，才真正衝破了這個扭曲的結構。在軍事專家的眼中，中國的部隊有如拿著破舊武器的「苦力」，是自衛隊與民團的型態，根本還不懂得現代化正規作戰的戰術。中國軍隊最大的問題是，將、校缺乏戰略與戰術的兵學修養，軍隊缺乏強大攻堅的火力，更沒有高效率的後勤系統支援。當然中國也沒有工業化的經濟基礎，與現代化的社會動員結構，可以支持全面的戰爭。這些就是國際戰略專家，根本不看好中國作戰的原因了。

20.2 雙方軍力的對比

就雙方軍力的比較而言，日本的陸軍常備兵力為十七個師團，三個航空司令部，以及砲兵、騎兵、戰車、化學兵等特種部隊，總兵力三十八萬，但是擁有四百萬服過兵役，可以直接動員參戰的後備部隊。當時日軍的師團，兵力編組上，相當於我國的軍，最高指揮官是中將；日本的旅團，相當我國的師，最高指揮官是少將編階；日本的聯隊，相當我國的旅，最高指揮官是上校編階。日本「軍」的編組，彈性極大，兵力比中國的集團軍還要大。

當時中國的陸軍部隊共有一百八十三個師，以及砲兵、騎兵等特種部隊，總兵力為一百八十萬人，但是這些部隊的編組、裝備、訓練，可以說是比「八國聯軍」還要複雜與混亂。真正經過整編的部隊，只有二十個師（同時多數的進口武器還沒有到手），同時華軍根本沒有受過軍訓的後備部隊，徵兵制度也才剛剛開始在部分地區試辦，因此當時中國的人口雖多，但是能夠徵用的兵源卻相當的缺乏，素質更低（單是體檢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隊的實際人數，比編制上的規定要少許多，當時叫做「空名」

在陸軍戰力中，日軍擁有訓練嚴格有素的軍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戰車、靈活的通訊設備以及大殺傷力的化學武器，並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援，更為重要的是，日軍對於中國的情報搜集，可以說是非常的深入與完整，後勤與兵力補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軍甚至擁有中國內地詳細與精確的地圖，但是華軍卻有時連粗劣的地圖都沒有）。反觀中國陸軍部隊在戰場作戰時，最為缺乏的是攻堅的重炮、反戰車（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輕重支援火力，此外中國軍隊的通訊與保密均差，後勤、醫療（幾乎完全沒有醫療可言）與兵力補充系統，可以說是亂無章法。

在海軍而言，日本擁有完全自行設計與生產的世界一流的海軍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完整的艦隊，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軍艦，海軍總噸位為一千四百萬噸。而中國只有能夠在內河與沿岸活動、小型、陳舊的艦艇五七艘，五萬九千噸。因此以海軍的戰力而言，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是連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備，只能進行偷襲、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戰。

就空軍而言，日本擁有自己設計與生產的各式空軍飛機，其中屬於陸軍的航空部隊有三十個聯隊，一二八個中隊，一四四三架戰機。屬於海軍的飛機共有七三〇架，佈署在航空母艦上。而中國只有購買二手與拼裝的各國不同型的飛機三〇五架，分成三十二個中隊，更不要提中國的訓練與後勤支援，在系統、經費與訓練上的複雜與落後了。

因此根據當時協助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估計，假如中日雙方一旦進行全面戰爭，中國的海軍在一星期之內就失去戰力，中國的空軍可以支持一個多月，中國的陸軍最多可以維持六個月，而中國的軍火後勤生產量，也最多能夠支持六個月的戰爭耗損⁴。最糟的是，中國主要的工業與軍火生產中心，只有點的分佈，而且大都在日軍第一波攻擊距離之內。所以西方軍事專家的觀點看來，日軍只要在會戰的戰場上，殲滅中國幾個精銳的集團軍，再佔領以及摧毀中國的軍火工業生產地，中國實在就無法再打下去了。

從當時的國際局勢來說，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簽訂了軸心協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歐洲強國的呼應。雖然蘇聯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潛在敵人，日、美的關係也存在著矛盾，但是在當時，國際社會是以綏靖主義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無視國聯的呼籲與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國，而不至於擔心自己受到外交與經濟的孤立。而在當時，除了蘇聯要利用國民政府來消耗日本戰力，因此決定給予中國一些實質的戰爭後勤支援之外（還是在國民政府容共之後才開始），德國是考慮到蔣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蔣介石倒向蘇聯，因此是中國最大武器供應國（但是關鍵的三十個整編師、全德式武器的交易，並未成功），並且允許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幫助蔣介石訓練軍隊，擬定戰略，而美國、英國都只願意和中國進行一些武器的交易，並不願意直接捲入中日之間的衝突。

⁴在決定全面抗戰之前，蔣介石曾經實在地告訴胡適，中國若全面抗戰，後勤生產最多可以支撐六個月的作戰消耗。

除了這些國家不願與日本爆發戰爭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據國際戰略專家的分析，中日之戰，日本將居於絕對的優勢，中日戰爭的時間單位將是以月來計算，因此任何對華的實質軍事援助，在時間上都來不及發揮功效，而只會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⁵。當時西方國家的評估是，中日全面戰爭一旦爆發，最快一個月，最慢六個月，中國就會失去一切的作戰能力，而向日本無條件投降。因此「三月亡華」論，並非日本強硬派軍方一廂情願的誇大說法而已，而是有科學分析、實際數據來支持的專家共識。

20.3 中國民族主義所激發的潛能

不過，這些「科學」與「數量」的作戰能力對比，是沒有辦法了解中國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那種死裏求生的犧牲精神——中國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與侵略已經夠多了，中國人有著寧願戰死，也不願屈服的共識與決心，雖然中國軍隊在訓練、裝備與後勤方面，的確不是日軍的對手。但是中國軍民在維護國家民族生存與尊嚴的自衛作戰中，所表現出來優秀的潛能，的確改變了許多戰前的預估，中國能夠在日軍絕對優勢火力與戰力下，遭受到近乎無法計算的死傷與打擊，卻竟然能夠堅忍不拔、支撐下去，甚至能多次反擊而讓日軍遭到重創，因的確一而再、再而三的改變日軍大本營對於侵華戰爭預估，以及讓西方軍事專家感到震驚甚至是尊敬。中國能夠孤軍與日進行長達四年又五個月的全面戰爭，讓日本無法解決中國事變，這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勝利，當然也是中國人民數不盡的犧牲所換來的成果。

事實上，日本將盧溝橋事件擴大為華北事變之時，是絕對沒有想到，這會是中日之間歷史大決戰的開始。當時日本的參謀本部堅決認為，日本的世仇大敵絕對是蘇聯，而日蘇之間的歷史決戰隨時可能展開；其次是日、美之間的矛盾，也開始升高到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因此日本應該盡量減少在華的軍事行動，但是為了擴大與蘇聯決戰的戰略縱深，日軍最多可以考慮攻佔中國的內蒙與華北。就可立刻設法結束中國事變，而全力為與美、蘇的決戰準備。但是來自陸軍省的看法是，日軍在華北，最多只要經過一場或是幾場主力決戰，它就可以迫使中國放棄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當時日

⁵持這種論點的「專家」之一，當然包括當時美國使館駐華武官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上校，後來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本政府的如意算盤如下：最好的情況是在日軍攻佔平津之後，中國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讓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順勢攻佔內蒙，控制華北。不然日軍可在黃河以北，捕捉並殲滅華軍的主力兵團，順帶攻佔內蒙古，中國也必然屈服。最壞的打算是，主力仍在華北決戰，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擊長江三角洲，拿下中國的工業、金融與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麼中國絕對會投降的。但是日本絕對沒有想到，它就是封鎖了中國所有的海岸線，又深入攻佔通往四川的外圍，中國仍然不放棄作戰的意志。

20.4 戰略上由中國主導全局

而在中國方面，若是從戰略準備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願因為盧溝橋事變的衝突，而提前展開與日本的歷史決戰，但是在政治與民心而言，盧溝橋事變一旦被日本擴大為華北事變之後，就已經突破了中國抗日最後關頭的底線，迫使中國不得不就此進行全面抗戰了。

蔣介石深知中日之戰，原本是全球大戰的一部分，中國此時與日本作戰，成為日蘇與日美之間的戰爭的序戰，所以擬定了非常悲壯的長期抗戰方針，準備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這個空間就是中國人的領土與生命，這個時間就是世界大戰的來臨。中國在做出重大犧牲之後，將會成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戰而洗雪百年國恥，解除所有的不平等等條約，成為對全球最有貢獻的國家之一。

但是這種戰而不決，與敗而不降的戰略運用，必然是經歷屢戰屢敗的重大的損失，以及嚴重的失敗與挫折。中國既不能在戰鬥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又不能以完全犧牲的悲壯方式，在戰場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應付不斷的失敗，仍設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繼續在一連串失敗中苦撐下去。要想堅持去執行這種屢敗屢戰的戰略，可以說是對中國領袖之領導能力，以及民族決心最大的考驗了。

當時在中國的各路諸侯與人民，尚未對蔣介石領導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蔣必須先硬碰硬地與日決戰，以重大的犧牲，打出民心士氣的支持，然後再不斷地迴避決戰，讓日軍逐漸陷入中國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等到國際社會的大環境發生變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後目標，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世界，那麼中國就可以與全球反法西斯的國家聯合，對日本進行反攻了。

中日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中，在戰場上，日本幾乎是佔到戰術的絕對優勢，在大多數的戰鬥之中，日軍都能以寡擊眾、發揮凌厲的攻勢，因為日軍不但擁有素質佳與火力強的陸軍部隊，並且有海空軍絕對優勢武器的支援（這是人類戰爭史上，首次大規模協同多軍種與武器的立體作戰），日軍還隨時會使用國際社會禁止的化學武器攻擊華軍。同時以戰場作戰的表現而言，日軍是相當的勇敢與殘忍，不過相對的也呆板與缺乏變化，日軍在居於優勢與陷入絕望的玉碎表現，經常有超水準的演出。

雖然日本擁有戰術的絕對優勢，但是在戰略的層面，卻是中國在主導全局，日本只是不斷在被迫跟進。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抗日的民族主義精神，華軍可以做到雖然不斷失敗，但是仍然不屈不撓的抵抗下去。結果造成日本欲進卻無法最終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與意志，欲退又無法從中國戰場的空間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與面臨國力耗竭的危機，因此最終被迫孤注一擲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導致它最後戰敗亡國的下場。

20.5 中、日領導層面的評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帥」的日本最高軍政領導人，但是實際上，政府的大政方針，卻是由有如「走馬燈式」的不同軍政勢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擁有近乎神格的地位與權威，皇軍所有一切的作戰意志，都是以效忠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為中心的。

不過裕仁並沒有真正指導國家與指揮軍隊雄才大略的天賦與能力（這和希特勒、史達林直接指揮與掌控戰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動的處理來自軍部、政府與元老、皇族之間的妥協意見，雖然裕仁對於軍部，特別是少壯派軍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為，也感到震驚與不滿，但是基本上，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裕仁曾經是相當熱心支持日軍侵略與擴張的政策。

裕仁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對於日軍不斷侵略中國的輝煌戰績，表現出相當的興奮與關心，他對於日本整個侵略決策的過程，並非是處在不知情或是無可奈何的狀態，而是相當積極主動參與決策，偶爾也會有作戰的重點提示。只是做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動提出政策方針，多半是

接納屬下的共同意見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戰略演變，基本上是操縱在擴大派的軍官手中，他們的侵略，煽動了日本的民氣，可是他們始終被自己的短視眼光（「見木不見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國所設計之戰略格局發展所左右。這是日本三千年歷史中唯一次的對外大擴張，竟然沒有真正的遠大方略，也沒有真正的強勢領導核心，所有涉及和、戰的根本大政方針，都在激進與猶豫交替的狀況下，做出無遠略、無持續性的抉擇，最後當然只有落得慘敗的下場了。

而在中國方面，當時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落後狀態，並無一套支持現代化戰爭運作的制度存在，來完成這個全民族歷史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國從大本營的指揮系統，到補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剛在草創與適應的階段，更別提支持戰爭最為重要的工業與軍需生產力的落後了。

不過在領導的運作上，中國卻有蔣介石做為抗日的領導中心與權威。因為縱使到了全面抗戰的時刻，中國所有的軍政力量，仍然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也沒有妥善劃一的制度，只有蔣介石成為團結抗日運作的中心，協調一切內外的勢力，製訂各種應對的策略，可以說他也是邊學邊用邊調整。因此在分析中國抗戰史之時，就很難以一般的方法來看這場跨越時代的中日歷史決戰，本質上，日本是站在已經現代化社會的階段，但是中國才剛剛準備開始現代化而已，兩個對決的國家，完全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之下。

從領導的層面分析，假如當時沒有蔣介石的領導，中國幾乎就沒有辦法進行有組織的長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淪為游擊與流亡政府，這樣中國就不可能爭取到領土全面的光復，以及聯合國四強的地位（當時國際強權曾計畫，將東北四省以及台灣列為「國際託管地」）。在沒有完整制度的運作之下，蔣介石個人的優缺點，以及中國當時的實際國情，都造成抗日戰爭歷史的複雜性。蔣介石做為抗日戰爭的關鍵領導人物，其主要的歷史地位，並非單純指揮前線的軍事作戰（有如大戰時的英、美、蘇以及德、日等國的將領們一樣），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要設法領導這個國家認同尚未完全建立、現代化生產與社會結構尚未奠定基礎的中國，單獨地對抗已整軍經武，蓄意侵略中國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日本強權。

根據歷史的事實顯示，蔣介石至少在個人方面，是一位相當有膽量的軍人，他曾經多次親身前往戰事非常激烈的戰場視察，幾度遭到近乎喪失生命

的近身攻擊，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曾對於個人生命的安危，而顯露出任何猶疑與畏怯。在掌握整個戰爭的最高戰略原則上，蔣介石也能大體的不失原則。至於在一些重要戰場的指揮上，蔣並非傑出的指揮官，他最大的問題就是經常「直接」干預前線戰場部隊調動的問題，蔣介石也缺乏歷史上名將所擁有的特殊軍事直覺與指揮的天分，所以少有驚人的戰場軍事才華表現。當然有些軍事佈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於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以及全盤戰略的考慮，因此不能做出純粹在軍事上最佳的選擇（尤其在中國抗日戰爭更是如此）。

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戰，是要面臨比軍事戰鬥還要複雜的各種歷史與制度問題，雖然蔣介石的最為重要職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職責，並非是軍事上的指揮工作，而是總合一切的力量，進行對日的抗戰，蔣介石一度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農民銀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學校長。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事制度，蔣介石所統帥的是一支還在發展與適應中的拼裝部隊，這支在觀念上，屬於幾個世代混雜的部隊，沒有共同的後勤系統與互通的訓練基礎，各個部隊的領導人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與不同的動機，他們還無法建立真正互信與一致的指揮系統，而後勤補給又是如此的不足與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運作。從蔣介石對前線部隊所下達「命令」的形式與內容來看，除了是對中央軍（因為都是他的軍校學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議」與「情商」的內容與語氣，而命令的結果，對於雄霸一方的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參考辦理」而已。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與日軍對抗時，一些指揮與戰略佈局的錯誤，他最大的失誤，應該是來自無法應付盟國的壓力——而非敵人日本的攻擊。從盟國要求組織中國戰區開始，蔣介石就陷在一連串決策錯誤的危機之中，「盟國」蘇聯硬是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英國又一再的延後打通緬甸的通路，造成中國根本無法得到盟國的援助，而面對戰力全面耗竭的危機。

加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力的破壞，簡直比任何對華作戰的日軍指揮官還要嚴重。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惡意中傷，造成盟國低估中國的戰略地位，減少對中國戰區急需之戰力的援助，史氏又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後來更造成中日最後決戰時（日軍的「一號

作戰計劃」) 作戰資源之嚴重誤置，結果是中國幾乎全面的慘敗，盟國也就順理成章地陰謀出賣了中國應有的權益。

在這場歷史決戰之中，日本的戰略指導原則，從速戰速決，演變為以戰養戰，最後企圖以擊敗中國做為決戰的籌碼，當然都有其設想的觀點，但是日本自始至終所犯的錯誤是，過度的低估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項戰略實施之時，都沒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時還要留一手以防美蘇的插手，結果日軍每次的戰略行動，也就都沒有達成其原先的設想。反觀中國方面的戰略佈局，從血戰犧牲以建立抗日決心，從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忍，從委屈求全爭取盟國的合作，前兩個掌握得相當適當，只有最後一項是錯估了盟國的立場，因此使得中國對日抗戰，最後落得一個被盟國出賣的「慘勝」下場。

平心而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在正面的戰場作戰中，除了少數幾場的防禦作戰的勝利之外（但是有幾場勝利對整個中日戰爭卻產生了戰略關鍵性的影響），中國幾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說是屢敗屢戰（當然也是屢戰屢敗），但是中國能夠在經歷近乎全敗的挫折之下，仍然堅持的打下去，這種民族的毅力，可以說是曠古罕見的；而日軍雖然多數都能取得戰場的勝利，但是卻一直拿不出全力結束中國作戰的決斷，在和、戰之間，徘徊掙扎，最終將戰力消耗殆盡，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沒有成為決定歷史的大國格局。而就戰略的層次而論，則是中國的持久戰略取得全盤的優勢，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一直被中國拖著而成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歷史上戰爭勝敗的主導關鍵，是在於政略與戰略的高下。只有在戰略上，能夠主動與支配整個戰局，才會導至最終的戰爭勝利，而在戰場上的一些勝負表現，實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沒有出現決戰的北方戰線

原本日軍預期極高的華北之戰，由於華軍主力東調上海而落空，日軍對此狀況的整個應變不但遲緩，而且對於華軍所發動的攻擊，也一直沒有發揮優勢包圍殲滅對方主力的效果。日軍更沒有沿著平漢鐵路疾進，越過黃淮平原兼程南下，而對華中的重鎮武漢造成戰略威脅，反而誤打誤撞的先仰攻山西高原，而將作戰兵力量分散，使得日軍在華北平原最後只落得一個防禦的態勢，根本就不符合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原則了。

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以極低的代價，就順利的攻佔了華北的平津重鎮，同時日本也發現曾經被視為抗日王牌的華軍第二十九軍，其戰力也不過爾爾，當然更加低估了中國部隊抗日的的能力，所以日軍在攻佔平津之後，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國發出了簽訂城下之盟的外交訊息。當時，日本政府的策略考慮是，假如中國就此低頭認輸，接受停戰條件，日本當然就可以順利進一步宰制華北。否則日軍最多在華北再打幾場硬仗，殲滅華軍的主力部隊之後，中國也必然服輸。因此日軍攻佔平津之後，並未立刻進行乘勝追擊與擴大戰果的行動，而是在等待國民政府對於簽訂停戰條約的反應。另一方面，日軍也在華北集結兵力，準備與反攻平津的華軍，打一場決戰。因此日軍攻佔盧溝橋之後，一時並無重大的後續軍事行動。

21.1 華軍佈陣的零亂

促成日本將盧溝橋事變擴大成爲華北事變，這中間出力最大的，就是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由於關東軍對於半年多前，由自己所支持與培養的偽蒙德王軍隊，在綏遠百靈廟慘敗一事，感到梗梗於懷。因此一直希望能夠找到機會，親自出手，擊敗中國部隊以扳回顏面，並且完成對內蒙的控制，這樣才能達成關東軍的戰略任務，就是爭取與蘇聯決戰的有利戰略佈置。

因此在華北駐屯軍順利攻佔平津之後，關東軍就一再的要求軍部批准出兵內蒙，攻佔平綏鐵路沿線。日軍部也認爲，無論華北事變如何解決，日本最終都要控制內蒙，如果乘中國軍隊尚未大舉增援華北之前，先行出兵攻佔內蒙古，也可以增加防蘇的戰略空間。因此在關東軍的不斷請戰之下，參謀本部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正式批准日軍可以沿平綏鐵路進攻內蒙的軍事行動。

而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擴大之後，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電令在內蒙平地泉的十三軍湯恩伯部，迅速趕往北平西北的戰略要地——南口與居庸關一帶佈防，以牽制日軍沿平漢線南下，並且形成對北平的側後方包圍。因爲原先蔣介石的作戰計劃是準備指揮主力兵團，在河北與日軍進行決戰，因此特別在河北石家莊成立行營，準備調集大部隊北上，並且要出動剛剛成軍的空軍參戰。

華軍在河北與日軍進行大兵團作戰的計劃是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擬定。中國以超過一百個師的主力作戰部隊調往河北地區（當時華軍共有一百八十個師），同時還準備出動空軍轟炸平津兩地，此戰若是勝利則收復平津，若是不利，則退守太行山與黃河所形成的防線。國民政府在這條防線上，建築了不少防禦工事，希望能夠與日軍進行僵持性的戰略對抗，以消耗日軍的戰力。而日本軍方也同樣的認爲，盧溝橋所引起華北事變，主要戰場將不脫華北地區，只要日軍在華北的決戰取得重大勝利，擊潰華軍的野戰軍主力，中國勢將屈服。因此，從日本國內調來的增援部隊，全都在平津一帶進行集結，準備迎戰，一場中日的大兵團作戰，眼看即將在河北中、北部展開。而平綏鐵路沿線之戰，將是這場決戰開始之前的序戰。

不過，趕往南口的湯恩伯部在經過張家口時，卻遭到二十九軍劉汝明部

阻擋，劉汝明當時兼任察哈爾省主席，他認為察省境內多年都沒有中央軍進入，假如湯恩伯部隊過境，必然會給日軍帶來入侵察哈爾的藉口。當然劉汝明並不知道，日本參謀本部已經批准關東軍組織察哈爾派遣兵團，準備進攻平綏鐵路沿線的計劃。結果還是靠西北軍老長官鹿鍾麟的出面解釋，劉汝明才放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河北的石家莊，二十九軍馮治安部同樣的阻攔中央軍北上佈陣，要由石家莊行營進行調解。這裡就看出二十九軍的格局，不但沒有利用這兩年多主政的時間，厚植準備抗日的戰力，反而在中日的矛盾之間坐大，把察哈爾與河北當成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二十九軍戰力沒有增長，中央軍與支援部隊又無法立刻進入陣地，負責在石家莊行營指揮的徐永昌，已經擔心若是要在河北進行決戰，中國中央與地方混雜的部隊，恐怕根本無法協同作戰。

21.2 南口之戰

在日本駐屯軍等待與中國軍隊進行華北決戰之際，關東軍已經奉命開始進攻內蒙境內、長城以南地區，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也決定，先對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帶戰略腹背，發動反擊。一方面固然是先解決受到夾擊的威脅，其實一方面也是要阻止關東軍擴大戰區的搶功行動。因此，日本第十一混成旅團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奉命進攻在居庸關與南口的湯恩伯部，這是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雙方第一場規模最大的硬仗。關東軍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參謀長東條英機組成了察哈爾派遣兵團，在八月二十日由內蒙的多倫，入侵平綏鐵路沿線，一方面準備截斷湯部的補給線，一方面則是準備控制整個內蒙，因此華北戰線的中日之戰，首先就在平綏鐵路一帶展開了。

湯恩伯部是蔣介石中央軍中，一支能夠打硬仗的部隊，又已學到了一些對付空中掩護攻擊的戰場技巧，此時由於搶先控制了地形險峻的南口一帶要地，因此把握了戰場優勢，並發揮主動靈活的逆襲作戰，竟然將日軍第十一混成旅團的攻勢打成守勢，日軍不但無法攻下華軍陣地，反而成爲受困待援的局面。香月接到戰報當然大吃一驚，皇軍剛剛建立擊敗二十九軍的無敵形象，那裡經得起戰場不利的挫折，因此立刻下令日本戰鬥能力最強的第五師團，由板垣征四郎中將率領，於八月十六日馳援第十一混成旅團，準備剋日擊敗湯恩伯部，攻下南口，以與東條英機的察哈爾兵團在平綏線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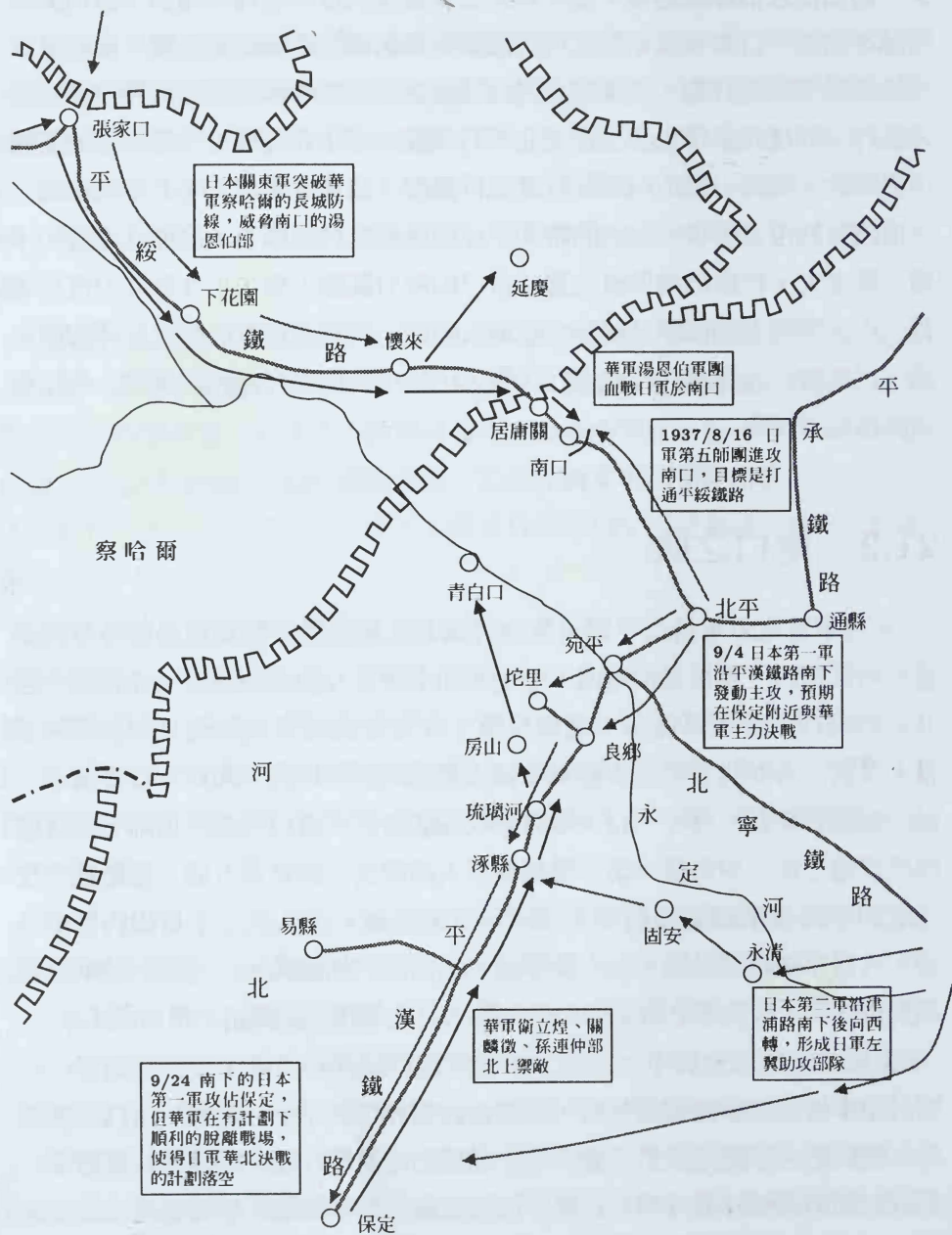


圖 21.1: 華北作戰圖

不料湯恩伯部越戰越勇，日軍第五師團雖然在火力與戰技上，都擁有明顯的優勢，同時擁有重砲與空軍的支援，但是湯恩伯的部隊，可以說是將士用命，力戰不退，造成日軍第五師團的攻勢進展得非常緩慢，板垣征四郎甘脆下毒手，施放毒氣攻擊華軍，香月同時又調派日軍第二混成旅團支援第五師團，於是中日兩軍在南口一帶，可以說是寸土必爭地浴血奮戰，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更調動了飛機、重砲以及坦克等攻堅重兵支援。兩軍血戰八晝夜，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湯恩伯的部隊傷亡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守住居庸關到八達嶺等地的戰略高地不退。

不過這時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卻順利突破了察哈爾的長城防線，攻佔了平綏鐵路的重要站張家口等地，而威脅到湯恩伯部補給線的安全。蔣介石立刻電令在河北中部佈防的中央軍衛立煌部，設法繞道晉、察邊界，馳援湯恩伯部，但是援軍卻進展緩慢，無法如期趕到。在察哈爾與山西邊境，沿平綏鐵路佈防的傅作義與劉汝明部隊防線，已經被關東軍的東條部所突破而崩潰，於是湯恩伯部在損失過重與避免被包圍的情況下，八月二十七日，才奉命從南口一帶的戰略要地撤退。這樣日本駐屯軍才打通了平綏鐵路，而與關東軍會師。日軍在消除平津的側翼威脅之後，立刻向河北中部，集結大軍，準備與中國進行決戰。

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所有地方勢力，包括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廣東的余漢謀、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西的閻錫山、西北軍的精神領袖馮玉祥、中共的朱德等，都一致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與行動。在八月七日蔣介石主持的最高國防會議中，通過了對日抗戰的最高決策。依照原先華北決戰的戰略設計，軍政部長何應欽正設法將中國的作戰部隊源源北調之時，原本已經緊張的上海局勢，突然在八月九日發生了虹橋機場之衝突事件，日本的海軍兵力，開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結，並且對中國提出威脅，因此南京與上海頓時陷入了軍事衝突前的危機狀態。

21.3 蔣介石決定改變決戰地點

上海的軍事緊張關係，剛好刺激蔣介石對於準備在華北決戰的作戰計劃，開始產生了疑慮。而此時蔣介石受到中央軍年輕部屬陳誠、張治中等人建議的影響，即與其在華北與日軍決戰，不如將地點改在上海更有利。因此

蔣介石決定進行戰略大轉向，華軍決定在上海開闢華東戰線，也就是由中國來主導戰略的決戰地點。

原本中日雙方都預期兩軍會在河北進行一場重要的會戰，但是在蔣介石的個人決心改變之下，戰略決戰的地點就由華北改為華東了。這個考量的主要優點是由中國方面來直接、主動控制戰場決戰地點，避免日軍由華北沿平漢線直撲武漢，而造成中國面臨西南與東南被截斷的戰略劣勢，一方面也是減少後勤支援線過長，以及地方部隊協調不易的困難。當然德國軍事顧問也認為，在長江三角洲與日軍進行決戰，華軍擁有水鄉澤國的防禦地利，中央更為容易就近統籌戰機，與靈活指揮作戰。

其實蔣介石決定在華東決戰的最大考慮，應該還是國際戰略的運用，因為上海是國際的大都會與金融中心，上海一旦開戰，必然直接影響到各國的利益，同時也能夠爭取到更多國際媒體的報導，中國越早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就能越早取得將戰爭國際化的致勝機會。當然一二八事變華軍在上海的表現，也讓蔣介石認為，在上海決戰對中國軍隊是比較有利的。

由於日本發現，蔣介石的德式裝備師，開始調往上海停戰區集結，部分的中央軍也開始由華北轉向華東運動，因此中國在華東的軍力增加到開始威脅日本在上海的利益與安全了。這時候，日本海軍早已按捺不住動手的衝動，因為海軍認為，絕對不能讓日本陸軍主導所有的對華侵略成果，否則海軍將很難爭取到更多的資源，以發展可以與美國競爭的海上實力（美國國會剛在兩年前，通過十年的造艦計劃，以因應日本退出華盛頓會議所約定海軍軍力比例的挑戰）。

因此，當八月十二日午後，蔣介石的中央軍在上海集結的情報傳回東京之後，日本海軍異常的激動，迫使其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夜間，召開四相（首相、外相、陸相、海相）特別協商會議，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強烈要求政府支持海軍有權保障日本在上海僑民的安全與利益，並且要求派遣陸軍到上海，以對中國的政治、金融與工業中心，給予致命的一擊。

事實上，當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消息傳出之時，正在台灣海峽演習的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就立刻回師上海，並且密電日本海軍部，要求增加在上海的陸戰隊兵力，準備護僑，同時進一步的建議，日本應該在上海與南京一帶，對中國戰略心臟進行攻擊，這樣可以同時破壞中國的工業、金融與政治中心，才能迅速迫使中國屈膝，而達成速戰速決最高戰略目標。

當時日本陸軍省估計，在長江三角洲最多只要使用三個師團的兵力，就可以讓國民政府遭到慘敗。但是日本參謀本部仍然認為，日本應在華北進行決戰，堅持不願向華東派遣大量的陸軍部隊，不過由於陸相杉山元過於低估中國的作戰能力，認為若在華東同時發動攻擊，日軍正好雙管齊下，迫使中國快速的屈服，所以支持海軍的建議，在首相近衛的調解下，終於迫使參謀本部同意，以最低數量的陸軍，支持海軍在上海的軍事行動。

日本海軍在得到參謀本部同意陸軍出兵之後，立刻在上海採取強硬的立場，大批日本的海軍陸戰隊與海軍艦艇湧向上海，此時蔣介石已經將中央軍中，最為精銳的八七與八八兩個德式裝備師，由張治中指揮，調往上海備戰。中日兩國同時在上海增兵的舉動，當然把上海的衝突氣氛提高到臨界點，大家都想先發制人。

結果中日兩國的軍隊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在上海的八字橋正式引爆了軍事衝突，日本駐上海的陸戰隊司令官大川內少將，在接到衝突消息之後，立刻下令在上海的日軍，對華軍發動全線攻擊，於是中日雙方在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戰爭。由於蔣介石已經決定了在華東決戰的佈署，因而把中國的軍隊主力由華北調往華東，因此八一三上海事變，立刻後來居上的發展為中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決戰，雙方的準備都很倉促，但戰事卻打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慘烈。

接著在八月十四日蔣介石正式發表抗戰自衛聲明書，當天中日兩國的空軍，也全面交戰，中國空軍竟然旗開得勝大敗日本空軍，使得日本政府震驚且羞怒，因此決定在上海大動干戈。日本政府在八月十五日的御前會議中，決定宣佈總動員令，以及成立了戰時最高的軍事機構大本營，負責與政府聯繫以指揮總體戰，大本營奉敕令決定，開始準備組織華北方面軍以及上海派遣軍。

21.4 日軍組成華北方面軍與上海派遣軍

日皇於是下令，改組華北駐屯軍，增調四個師團以及加入各種特種部隊，組成華北方面軍，總兵力達到二十八萬人，由寺內壽一大將出任司令官。同時指派松井石根大將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統帥包括多艘航空母艦與主力艦的海軍部隊，加上二個師團的陸軍以及特種部隊，前往上海。日本

決定準備在兩條戰線上，同時給予中國致命、快速的打擊。不過此時的日本參謀本部，仍然認為中日兩國主力的決戰地點是在華北，可是蔣介石卻已經決定，將決戰地點改在華東。

八月三十一日，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寺內壽一）正式組成，下轄第一軍（香月清司），統帥第六師團（谷壽夫）、第十四師團（土肥原賢二）、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與重炮兵第一、第二旅團，及其他特種部隊。第二軍（西尾壽造中將），統帥第十師團（磯谷廉介）、第十六師團（中島今朝吾）、第一〇八師團（下元熊彌）與重炮兵第六旅團及特種部隊。並且以第五師團、一〇九師團、原華北駐屯軍旅團，加上特種部隊以及臨時航空兵團，做為方面軍的直屬部隊。而原屬關東軍支援的第一、二與十一旅團，則視作戰地區的運用，亦配屬華北方面軍。這是日本自從日俄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支海外作戰部隊戰鬥序列，非常顯然的是日本準備在華北對華軍，進行一場迅速能讓中國屈膝的歷史性決戰。不過日本對於蔣介石，已決定把華東戰線轉為主力決戰的戰略，並未充分的加以掌握，此時上海方面的作戰，已經開始演變成爲空前的大兵團作戰，最後造成日本大本營不斷被迫增加對上海的兵力支援，最後甚至要從華北方面軍抽調部隊趕往上海，因而造成華北作戰戰機的延誤。

由於日軍是將決戰的主力擺在華北，但是中國方面卻開始明顯的抽調主力東調，並且對於華北的日軍，採取守勢作戰，因此日本所準備與預期的華北決戰並未發生。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於是被迫決定，由日軍主動出擊，捕捉華軍的主力。九月四日，由日本第一軍沿平漢鐵路南下發動主攻，第二軍則沿津浦路南下，然後向西攻擊，形成左翼的助攻¹，而方面軍的直屬部隊第五師團，則由山西迂迴，進行右翼的圍攻，日軍的作戰目標是兵分三路，企圖在河北保定附近進行合圍，以殲滅華軍主力。不過，一九三七年中國華北天氣反常多大雨，造成日本部隊運動困難。

但是華軍的主力此時已經轉向東線，當時華軍在河北中部的佈防是，第一戰區的中央軍衛立煌部與西北軍孫連仲的部隊，共同防守平漢線，而由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防守津浦路；蔣介石一度派馮玉祥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指揮其舊部西北軍，但是遭到其舊部石友三、韓復榘的強烈反對，

¹左翼、右翼是從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指揮角度來看，例如左翼的第二軍，在作戰地圖上是靠東線。

很快的就被迫撤銷，可見當時中國指揮系統的複雜性，特別在華北地區，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還是各有自己的山頭，中央在戰略指揮上，經常是鞭長莫及而不能完全貫徹軍令，這也是河北的決戰不能如計劃進行之原因。

21.5 意外提前引爆太原會戰

日本的華北方面軍，雖然擁有絕對優勢的火力，但是在平漢線與津浦線的進展相當的謹慎與緩慢，不過華軍也面臨協同作戰的困難，程潛與徐永昌解決不了中央軍與西北軍之間指揮與後勤的問題，蔣介石又將上海作戰當成絕對的優先，因此中國在華北的各軍，並未建立協同作戰的能力，多數都只能各自為戰而已。但是二十六路軍的孫連仲部隊，以及中央軍五十二軍的關麟徵部，在保定作戰中，表現優異，給予日軍相當猛烈的抵抗，但是在津浦路二十九軍，卻再也沒有打出士氣與水準。日軍在河北緩慢地向南推進，顯然是在等待與華軍的主力接觸，不過日軍的戰略預期是完全落空了，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日本的第一軍才攻佔保定，華軍順利脫離戰場，日軍並未獲得殲滅華軍主力的機會，於是迫使寺內壽一決定，日軍繼續深入，沿平漢線南下進攻交通與軍事重鎮石家莊。

這時蔣介石既已將決戰的主力東調，於是下令平漢線的中央軍主力部隊，沿正太鐵路向山西高原的戰略高地集中，以協助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防守山西，因此讓出了戰線側翼。日軍雖然順利攻佔石家莊，但是仍然沒有捕捉到華軍。不過這時由於日軍第五師團與獨立旅團，在山西北部作戰不力，被阻在忻口，因而誘發華北方面軍為了支持第五師團作戰，提早發動攻佔山西的作戰²。

因為日本的華北方面軍，既然無法在河北的作戰行動之中照原計劃，圍殲中國的主力部隊，於是關東軍蒙疆兵團（原先的察哈爾派遣兵團改名）在山西北方的右翼，全力搶攻山西北部平綏線的重鎮大同，以進逼山西內長城防線。而在山西戰略要地大同作戰的華軍，竟然在部隊沒有及時進入陣地，就被日軍快速進軍的蒙疆兵團打得七零八落，陣地全線潰散。閻錫山因而無法有效掌控內長城以北防線的狀況，氣得槍斃了軍長李服膺，華軍只有不戰

²這是日軍經常在戰略上所犯下的錯誤——原計劃一旦出了情況的變化，日軍很難迅速應變，但是在次要的戰場上，往往為了挽回「日軍無敵」的形象，日軍又會冒然的發動大規模的非計劃性作戰。

而退撤離大同，退守內長城防線。（這時只有過內戰經驗的華軍，根本不能了解一支現代化、一流水準的日軍之武器、戰術運用與其作戰速度，因此在剛開始的作戰上經常是無法招架日軍的攻勢。）

這引起在大同東南方作戰的日軍第五師團，躍躍待試地向山西深入，因為第五師團在南口的平綏鐵路作戰中，就比不過察哈爾派遣兵團的表現，如今又怎能眼看著察哈爾兵團手到擒來的攻佔大同？（事實上，日本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一直在為內長城防線，進行「地盤」的爭執，關東軍總是想控制察哈爾南部與山西北部，造成華北方面軍極其不滿）。

21.6 平型關大捷的歷史真相

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本來就是個野心極強的軍人，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就是他「蓋世」的功業，如今他那肯低頭讓人，所以板垣決意深入山西，以搶回被關東軍奪去的面子。於是日本第五師團朝向靈邱、平型關以及忻口一線進兵，與蒙疆兵團由大同南下，對太原形成鉗形攻勢³。

同時日本大本營發現華東作戰，已經轉為新的主力決戰地區，日軍在上海已經感到兵力分配不足的問題了，因此決定從華北方面軍抽調兩個半師團（第六師團與第十六師團，以及國崎支隊），投入上海作戰，這樣一來華北方面軍就根本不可能在華北發動重大攻勢，只有將剩下的部隊，改投入山西作戰，於是整個華北作戰的重心，就「意外」地轉向山西。而中國方面最為擔心的狀況，即日軍會以大軍越過黃淮平原南下，直撲武漢的作戰，日大本營不單是根本就沒有認真的設想過，此時也不再軍力加以實施了。

由於蔣介石將固守山西高原，當成華北作戰的戰略重心，因此調派大量的部隊支援第二戰區的閻錫山，山西更是閻錫山所經營的「獨立王國」，長達二十年以上，當然不容日軍輕易得逞。大同既失，華軍決心全力在內長城防線，進行固守決戰。平型關是這個戰線的一個防禦重點，剛好日軍第五師團，由靈邱向平型關進軍，於是閻錫山與傅作義、楊愛源商議，指揮包括中央軍、晉軍以及八路軍，在「平型關⁴」一帶進行口袋戰術佈陣，準備包圍

³但是板垣的運氣實在太差，他攻擊的路線，剛好碰到華軍的主力，先在平型關，後在忻口，都受到不小的損失，因此造成華北方面軍不得不將大量部隊投入山西，以支援第五師團的作戰，這樣就造成日軍整個戰略重心的失控。

⁴其實真正的地名應是「瓶形關」，因為被這場作戰的宣傳誤報，竟改名成爲了「平型關」。

與反擊日軍長趨直入的攻勢，以鞏固太原的外圍防線。

而所謂八路軍的林彪一一五師所創下的平型關「大捷」，只是這場作戰中的一個小型伏擊戰而已（單獨地伏擊到日軍一支補給車隊）。當時真正防衛平型關的是劉奉濱師，屬於孫楚指揮，在他的右翼是劉茂恩軍團，高桂滋軍，左翼則是傅作義軍、陳長捷軍，日軍的第五師團與第二混成旅團，猛攻平型關陣地，展開血戰，日軍部隊於九月二十一日發動側翼攻擊，越過平型關戰線，而深入華軍所佈置的戰線口袋之中，兩軍陷入激戰。

因此當時第六集團軍司令官楊愛源，下令所指揮的華軍，分成五支部隊，開始滲入日軍後方，進行攪亂日軍在平型關後方的戰線，對於日軍補給線進行游擊戰。而其中林彪師共有一萬多人，奉命在平型關的東南方，屬於右翼助攻部隊，進行敵後游擊。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林彪師以秘密靈活的游擊運動方式，在小寨附近的土溝，逼進日軍一支營級（大隊）的運輸補給部隊，然後發動近距離的突擊，在半天的戰鬥中，全殲了這支總數在五百人以內，以後勤支援為主的日軍部隊，僅抓到俘虜一人（後來還是讓他逃脫了），擄獲步槍兩百枝而已。只是當時八路軍的戰報誇張戰果，說成林彪一一五師與日軍萬餘人作戰，擊斃日軍四千餘人，是與實情有極大的出入。整個平型關作戰，是一場硬仗，日軍傷亡了四千多人，可是林彪部隊並未參與正面的作戰，只是在平型關戰役中，奉命負責敵後游擊任務而打了一場勝仗，但是稱之為「大捷」，就太過誇張了，同時也扭曲了平型關作戰的整個情勢真相。

由於日軍第五師團的前鋒部隊，在平型關附近，竟遭到華軍口袋戰術的合圍，而陷入苦戰之中，當然引起日本華北方面軍的震動，因此方面軍要求由山西正北方南下的蒙疆兵團，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參與平型關作戰，以解日軍第五師團前鋒之圍，一路則是繞道越茹口，抄包華軍平型關陣地的側背。在日軍支援火力以及生力軍的趕到之下，華軍為了避免受到日軍的包抄，奉命後撤到忻口陣地佈防。林彪的部隊就此脫離戰場與指揮，轉進太行山北部，開始建立游擊基地，去全力發展共軍的實力了。

21.7 激戰空前的忻口作戰

忻口與雁門關是太原北方的門戶險要所在，華軍既然從平型關退到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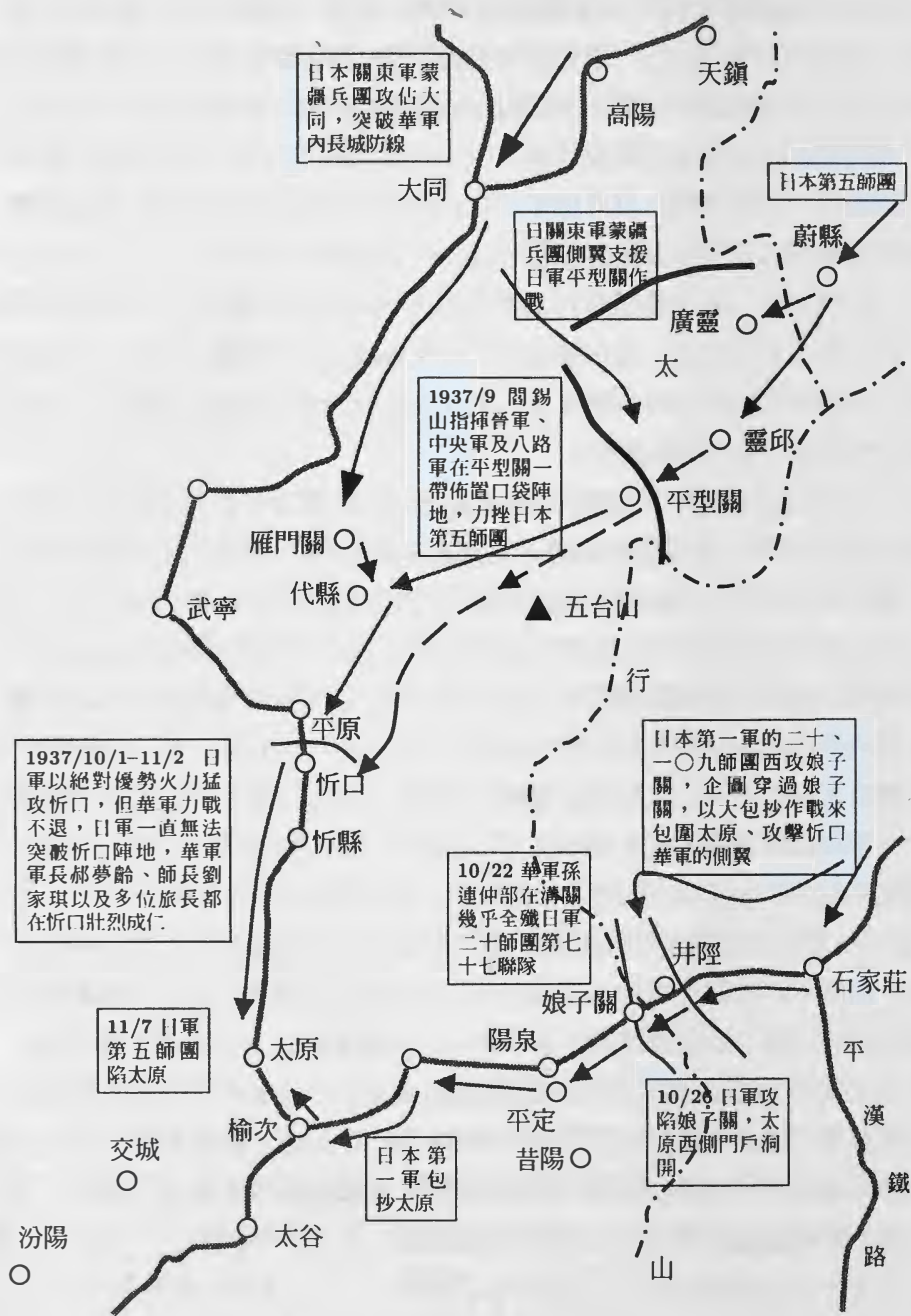


圖 21.2: 太原會戰圖

口，閻錫山就決定在忻口進行保衛太原的決戰，他的佈署如下，以中央軍的衛立煌爲主組成中央集團軍，以中共的朱德部隊爲主組成左翼集團軍，以楊愛源指揮右翼集團軍，以傅作義部隊爲主組成預備集團軍。日軍則由板垣率領第五師團以及第二、第十一旅團，直撲忻口。

閻錫山仍然在忻口佈署口袋戰術，日本第五師團板垣，負責主攻忻口華軍陣地，板垣是準備以日軍優勢的火力與機動力，在空軍的支援下，採取中央突破的攻擊方式，直撲華軍中央集團軍的陣地。十月一日起，中日兩軍在忻口陣地，展開了非常激烈的遭遇戰，華軍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琪以及多位旅長，都在忻口陣地壯烈成仁，多處陣地是反覆易手；而華軍在戰力懸殊之下，仍然力戰不退，繼續據險守住陣地的防線，一直苦戰到十一月二日。而進攻忻口的日軍第五師團，雖然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但是仍然無法越雷池一步。

此時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又接到日軍在忻口作戰，再度受阻的情報之後，寺內壽一大將，只有立刻命沿平漢路南下的日本第一軍，派遣部隊由石家莊西進，越過娘子關，包圍太原，以攻擊忻口華軍的側翼，這是日軍一個大包抄作戰。日本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決定，第十四師團沿平漢路繼續南進，但是第二十師團則由石家莊西轉，仰攻山西高原，準備穿過娘子關而直接攻擊太原，以包抄忻口華軍的側後防線。

而這時華軍的孫連仲部，已經轉守正太路與娘子關一帶防線，因此與日軍第二十師團發生激戰。孫連仲部在十月二十二日，成功地包圍在溝關的日軍第七十七聯隊，造成幾乎全殲日軍的輝煌戰果，日軍第二十師團也受阻於娘子關一帶。於是香月清司只有再下令，抽調日軍第一〇九師團的部隊，由北方的側翼攻擊華軍陣地，以支援第二十師團，這使得華軍在娘子關的作戰，受到日軍兩路的包圍，陣地接著被突破，由正太鐵路西進的日本第一軍部隊，終於在十月二十六日攻陷娘子關，華軍在太原的西方門戶因而洞開，日軍準備跟著攻下太原，以包抄在忻口防線的華軍。

這時閻錫山知道情勢險惡，因此在十一月二日，下令在忻口防禦的華軍，向南轉進，以進行太原城的保衛戰，並下令傅作義出任太原衛戍司令。但由於華軍從忻口陣地撤退得太遲，通往太原的交通路線又是狹長的山谷地形，在日機猛烈的炸射之下，華軍的撤退亂成了一團，完全失去部隊建制的完整控制。華軍部隊在倉皇與混亂中退向太原，日軍第五師團卯足全力一路

追擊，同時日軍的第二十師團與一〇九師團，已在太原東方形成攔腰截擊的攻勢，華軍根本無法按照命令退入防守太原的預定陣地，使得傅作義成爲無兵可調的光桿衛戍司令。幸好日華北方面軍，爲了讓第五師團保留攻佔太原的顏面，因此下令第二十與第一〇九師團，暫時勒兵不動，而使得華軍有機會越過包圍而繼續南退，傅作義在空城計下，只防守太原一天，就只有突圍而去。十一月七日，日軍攻佔太原。

這時日軍雖然攻佔太原，但是仍然沒有達成殲滅華軍主力的作戰任務，因此香月清司下令第二十師團與第一〇九師團，繼續沿著汾河與同蒲鐵路，向南追擊華軍，日軍最後一路攻到山西、河南與陝西交界，黃河邊的風陵渡。日軍經過長距離的戰場追擊，並沒有消滅到華軍主力，而此時日軍的補給線已經拉得太長，兵力不足的問題也十分嚴重，而一度四散的華軍，開始在日軍補給線後方出沒攻擊，迫使在山西南部的日軍收縮戰線，以保持戰果。

而在平漢路的日軍第十四師團，此時也深入到河南北部的漳河，同樣的受到補給困難與兵力不足的問題，無法再往南進攻，而華軍同樣地開始滲入日軍陣地的後方，對日軍的補給線進行游擊戰。這正是八路軍的作戰特長與發展的機會，八路軍就在開始山西高原、太行山山麓以及河北、河南丘陵地，迅速的擴大勢力，對日軍構成游擊戰的威脅；共軍也開始在黃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控制了獨立的根據地。

而在內蒙的日軍，則由新成立的二十六師團（這是因爲華北方面軍與關東軍，強烈爭執對於山西北部與長城以南戰區主權的爭奪，最後迫使東京軍部裁示，直接由參謀本部控制二十六師團）以及關東軍第一獨立旅團，由大同沿平綏鐵路西進，由於華軍部隊多數已經調往山西進行太原會戰，因此日軍沒有受到強烈的抵抗，在十月十七日，一路順利攻佔了平綏鐵路的終點包頭，日軍終於完成對於內蒙大體的控制。

21.8 華北作戰的檢討

雖然日軍在華北作戰的行動中，除了在山西作戰的局部地區之外，一直保持主動攻擊的優勢，迫使華軍一再退出防守的陣地與城市，但是日軍卻沒有辦法在黃河以北，殲滅華軍的主力，一方面華軍主力根本不在華北，剩下

的華軍，不但抵抗意志出奇的堅強，而且部隊敗而不散，都能有效脫離日軍的包圍，再度地集結作戰。

之後，日本華北方面軍接近三分之一的部隊，被抽調支援華東戰場決戰，以及日本大本營要求，華北方面軍在中國東北的冬季冰封期間，必須減少作戰任務，保持兵力運用的彈性，做為關東軍防蘇作戰的預備兵力⁵，因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只能就地整補，以等待新的作戰命令。

華軍在華北採取敗而不降的戰術，同時顛倒戰線作戰，在日軍控制戰線的後方，發展游擊戰，威脅日軍戰線的補給線，使得日軍在深入華北之後，派在維持後方補給線的兵力，還要多於前線作戰的部隊。這種作戰方式，已經使得日軍陷入大量消耗戰略資源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兵力不能用在繼續的戰略攻擊，反而用在維持補給線上。

就戰略上而言，日軍的攻佔山西，是有著控制華北平原戰略側翼的作用，但原先日軍之所以進攻山西高原，則是為了挽回擔任側翼掩護的第五師團作戰失利的面子，同時為了追擊華軍轉向山西高原集結的部隊，華北方面軍將作戰部隊主力，轉向山西調動，沒有沿鐵路快速的南侵。最後日軍雖然攻佔山西，不但沒有殲滅到華軍主力，反而是困守在山西各個戰略重鎮之中，必須用大量的兵力來維持日軍的補給線。

21.9 日軍大本營缺乏戰略遠見

其實日軍攻佔山西、陝西與河南交界的風陵渡，實在是取得極大的地緣戰略優勢，假如當時日本政府能夠全面地動員兵力，以達到真正亡華的戰略目標，那麼日軍可以在攻佔山西之後，運用征服整個中國的大戰略眼光，大量增兵投入中國戰場，以十個師團的兵力，由山西渡河，其中三個師團，進攻陝西的關中與延安，然後西進截斷甘肅與蘇聯的交通路線，另外一路則由五個師團越過秦嶺，直搗四川，深入雲南，兩個師團沿漢水進逼河南、湖北與陝西的邊界，對武漢形成側背牽制的戰略包圍。

這時日本同時以海軍支援機動兵力優勢，封鎖東南沿海，隨時準備對東南的重鎮發動攻勢，這樣中國就根本沒有力量分兵向西南大後方增援，以抵

⁵因為蘇聯在中日全面戰爭之後，成為國際上唯一公開「支持」南京的政府，雙方締結條約，蘇聯提供軍備與空軍到中國作戰，甚至有情報指出，蘇聯可能正在考慮，在必要時對日本宣戰。

抗日軍這樣深入的攻勢，而蔣介石的大西南抗日基地的戰略佈局，也就發揮不了作用。此時日軍再各以五個師團分兵兩路，一路沿平漢線南下，一路沿長江西進，會師武漢之後，再攻華南；日本的陸海軍再在華南沿岸以三個師團登陸夾擊，那麼中國很可能就會在盧溝橋事變之後的一到兩年之內戰敗投降。若是日本依照這個戰略的進行佈署，日軍用在中國的陸軍部隊，最多只要三十到三十五個師團，加上海空軍的支援投入，總數八十萬日軍，真的就有機會在兩年內滅亡中國。

但是日本從開始就一直低估中國的抵抗意志，多數的日本軍方人士都普遍的認為⁶，日本只要動用局部與有限武力的打擊，給中國幾次致命的打擊，中國就會屈膝投降，但是當中國總是敗而不降，反而不斷地凝聚再生戰力，迫使日本一再增兵，最後日本在華的總兵力，已經提高到百萬以上，仍然無法擊敗中國，這就是日本缺乏戰略遠見，與其歷史眼光錯誤的結果。

從各種作戰的形式條件而言，分析中日之戰，日本是應該贏卻沒有贏，中國是應該輸而沒有輸。原本日軍預期極高的華北之戰，由於華軍主力東調上海而落空，日軍對此狀況的整個應變不但遲緩，而且對於華軍所發動的攻擊，也一直沒有發揮優勢包圍殲滅對方主力的效果。日軍更沒有沿著平漢鐵路疾進，越過黃淮平原兼程南下，而對華中的重鎮武漢造成戰略威脅，反而誤打誤撞的先仰攻山西高原，而將作戰兵力量分散，使得日軍在華北平原最後只落得一個防禦的態勢，根本就不符合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原則了。

⁶其實不只是日本，世界其他各國的軍事專家，多半也持接近的觀點，甚至包括協助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在內。反而只有蘇聯真正的了解中國的抵抗意志，要比外界知道的強勁。

驚天動地的淞滬大會戰

「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

在中日的歷史決戰之中，再也沒有一場的會戰，能像淞滬會戰這樣打得驚天動地與扣人心弦，中日雙方所動員的部隊總數，最後超過了一百萬人，所有現代的武器，如空軍飛機、海軍艦砲、坦克、毒氣都大量的出籠。但是同時，以最為原始的作戰方式，面對面的以刺刀格鬥、甚至石塊投擲，也有或是最為壯烈的人肉炸彈，也全都派上了戰場。而且戰場就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都會區的租界邊緣進行，新聞記者可以一方面在大飯店的陽台上喝咖啡，一方面遠眺中日兩軍的浴血作戰，這種大會戰的規模與型態，恐怕是人類戰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¹。

¹若以戰爭規模、作戰時間、戰爭激烈程度、作戰傷亡數目、以及作戰使用的手段等項目，綜合比較而言，淞滬會戰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大戰」，比起史達林格勒、列寧格勒、庫克斯坦、諾曼地、瓜達康納爾、硫磺島、沖繩島等著名戰役，淞滬會戰之重要性更大，對歷史的影響也更為深遠。純以規模來看，大概只有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德的凡爾登戰役 (Battle of Verdun, 1916)，可以相比。

當時參加淞滬會戰的絕大多數中國的軍人，根本就想都沒有想過他們將面對一場最現代的三軍聯合立體作戰，以及在毒氣與八英吋砲彈攻擊下的可怖景象。但是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中國絕對不能再讓日軍為所欲為地蹂躪下去，華軍決定，假如沒有武器可以抵擋日軍的攻勢，他們的身體就是拒敵的唯一長城。

在盧溝橋事變開始惡化，迅速地擴大成為華北事變的時候，中日雙方的領袖們，都在計畫一場歷史的大決戰。但是，中日兩國的軍政決策者，在剛開始考慮決戰的地點與方式之時，都沒有要把上海當成中日兩軍大決戰的地點。

事實上，當時中日雙方的軍政領袖，都已經準備選擇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的華北地區，就地進行軍事決戰的較量。但是，中國方面，在進一步考慮戰略上的主動與地緣政略的因素下，斷然決定改在華東決戰；日本方面則是有著皇軍輸不起的心理，所以被動地放棄了華北決戰的計畫而轉往上海。於是中日之間的戰局，原先預期的華北決戰沒有打熱，反而是由上海的一個小型的衝突事件，迅速擴大成為中日戰爭歷史中，最大規模的會戰，從此中日戰爭的戰略發展，也轉為由中國方面主導的局面。

22.1 中國決定在上海應戰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變之後，中日雙方在上海的軍事衝突，受到國際社會強烈地干預，要求中日兩國不要在上海地區進行戰鬥，以免影響到國際社會的重大利益。因為上海不單是中國的金融與經貿中心，也是一個國際經貿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國在上海有著極大的商業利益，上海的精華商業區，是屬於國際強權擁有主權的租界地，因此在一二八事變之後，上海劃出非武裝的中立地區，以減少中日之間的軍事摩擦。依照規定，中國正規軍不能在上海市區附近佈防，但是日軍卻可以在其租界地內，建築防禦工事，日本精銳的海軍陸戰隊處在這裡設立司令部，日本海軍的第三艦隊，則在附近的水域巡弋²。

但是在盧溝橋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擴大之後，上海的緊張情勢也跟著快速地升高，因為日本在上海擁有虹口租界，負責經營日本在中

² 列強與日本的海軍船隻，依照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可以自由進出中國的內河水道。

國的經貿利益（當時中國是日本最大的經貿國家），同時派駐了海軍的重兵防守，而中國抗日風潮民氣最盛的地方，也在上海。華北的中日衝突，立刻引爆上海強烈的反日民氣，上海人民自動自發地抵制日本人所有的活動，甚至開始威脅日本人的生活安全（連米都拒絕賣給日本人）。

由於日本的海軍，一直想在大陸政策上，強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增加爭奪建軍資源的籌碼，因此日本海軍不甘心由日本陸軍一再的主導侵略中國的政策。根據日本海軍的觀點來看，假如中日兩國在河北與內蒙進行決戰，那麼日本海軍仍然只是一個支援的角色而已，何況在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海軍對於上海的攻防，就有著極大的軍事興趣，因此日本在上海的日租界中，秘密的建設了有如要塞般的防禦工事。

當中國人民因為盧溝橋事變，而在上海出現強烈的反日風潮之時，上海的日本僑民與工商業活動，都立刻受到極大的影響，日本海軍當然要立刻展現強勢的做為，增加部隊，進行護僑的工作。同時日本的海軍也積極建議參謀本部，應該在上海展現軍力，以打擊中國的政治與金融中心，牽制華軍北調，以增加速戰速決戰略的威力。

不過，日本參謀本部的戰略佈署，一直是以防蘇做為國防的重點，實在不希望再將軍力分散到華中，所以並不同意海軍的要求，在上海增兵。但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上海也發生了中日之間的衝突事件，八月九日，中國的保安隊在虹橋機場，因為穿著便衣的日軍大山勇夫中尉，開車闖越機場封鎖線，連同駕駛被中國的保安隊射殺，這立刻成為中日雙方在上海最為嚴重的交涉事件。

依照過去中日衝突的慣例，這種日軍有人死亡的事件，是可以擴大成為正式的戰爭衝突（盧溝橋事件，既無人死傷，也無實物破壞，尚且都能擴大為攻佔北平、天津的華北事變，何況虹橋機場日本死了軍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與經貿中心，更是十分接近首都南京，虹橋機場事件爆發，給日本海軍要求在上海增兵，找到了藉口，日海軍陸戰隊，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大量的增援上海。日本駐上海的軍政首長，則立刻向上海地方當局，提出強硬無理的要求，於是上海局勢的發展，立刻出現了爆炸性危機的因子。

面對上海出現了極度爆炸性的發展，迫使蔣介石在衡量各種因素之後，決定將精銳的中央軍，開始調往上海佈防，以防局勢急轉直下，而危及到首都的安全。當然蔣介石同時已經有改變決戰地點的大戰略考慮。而日本方面

同樣地重視上海的緊張局勢，在海軍強烈的主導之下，派遣了陸戰隊增兵支援上海，於是中日雙方的軍隊，開始迅速在上海市內與近郊集結。

面對上海這個局勢的變化，中國方面開始全面考慮戰略的佈局，決定兵力應該移往華東，以爭取戰略的主動。京滬警備區司令張治中積極請戰，在八月十一日晚上，蔣介石同意派遣負責中央警衛部隊的八十七、八十八師前往上海，同時開始調集更多的部隊向上海外圍地區移動，也有化裝的保安隊與便衣隊參與，在八月十二日清晨，大量的華軍開始駐進上海市區，中國試圖掌握華東決戰的主動權。

中央軍的在上海市區出現，立刻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上海市民更是民氣高昂的歡迎中央軍的保家衛國行動，但是對於日本在上海的軍隊，就造成極大的壓力，因為中日雙方的指揮官，都在設法爭取在上海先發制人的作戰機會。日本海軍將蔣介石調派大軍駐進上海的情報，回報東京之後，日本海軍大為震動，在海軍強烈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當天晚上就舉行四相會議，最後決定派遣日本陸軍增兵上海，以保護皇軍與僑民在上海的利益。這個消息立刻由日本海軍軍令部長博恭王，先傳給日本在上海的陸戰隊指揮官大川內。

日本在上海的駐軍，在接到日本決定要在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後，當然有恃無恐，挑釁的動作更爲加大，於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起，上海已是接近風雲急變之前的緊繃狀態，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引爆不可測的衝突。華軍與日軍都在爭取搶先佈防戰鬥據點的時機，雙方的便衣部隊更是夾雜在人群之中，互相的刺探軍情與尋找有利的地形。一時之間，中日雙方出現大軍雲集，以及設陣佈防的動作，上海局勢緊張到隨時可以爆發衝突。

22.2 八一三上海事變

究竟是誰先在上海開出第一槍，現在已經無法清楚的查證，但是可以比較清楚知道的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過後不久，於上海的北站與寶山路一帶，爆發了日軍便衣隊與中國保安隊射擊事件，接著事件持續擴大，上海各處都開始傳出槍聲與衝突。十三日下午，在八字橋的持志大學附近，中日雙方爆發了更爲直接的射擊事件，中日兩軍當然立刻進入陣地待命；在當天的下午四時左右，日本陸戰隊司令部，掛出了日軍作戰的戰旗指令，於是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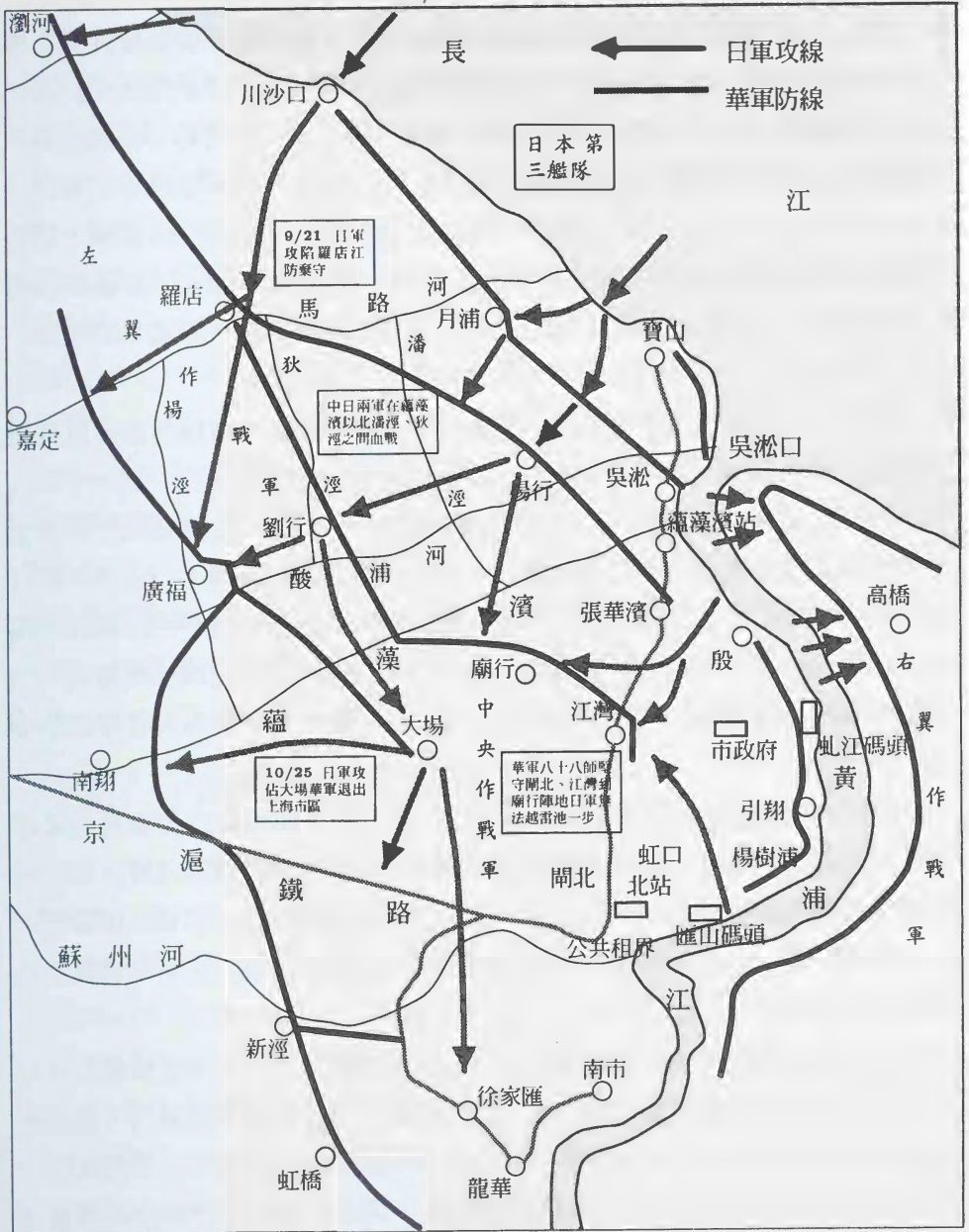


圖 22.1: 淞滬會戰圖

在黃埔江與長江水域的日本艦隊，立刻萬砲齊發地射擊中國軍隊陣地與上海市區，於是中日在上海的衝突，就於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市街頭正式開戰。

雖然上海之戰，原是在盧溝橋事件牽引之下，藉著虹橋機場意外而引爆的。但是在中國方面，蔣介石已有將戰略重心，從華北轉移到華東的計劃，在虹橋機場事件之後，蔣介石更開始下令進行戰略方向大轉彎，抽調大軍由華北趕赴上海，準備改變與日本的決戰地點與戰略方向。不過日本參謀本部，仍然希望中日能在華北決戰，所以設法控制上海軍事衝突的規模，但是日軍也絕對不能讓華軍佔到上風，因此日軍在上海的軍事反應，是屬於戰略上的被動式。因此在上海戰事擴大之時，日本的參謀本部，還盡量想控制上海的戰事規模，以避免華東戰局的擴大與惡化。

對於在上海的中日雙方的前線指揮官，都記得一二八事變的前車之鑑與歷史的教訓，因此，誰都想先發制人的搶先發動攻勢，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日本海軍希望能夠立刻擴大攻佔據點，以利援軍部隊登陸；而華軍的指揮官與參戰部隊，正是當年參加一二八事變的原班人馬主力之一。中日雙方都在誓報當年之仇的心態下決定針鋒相對，設法搶奪有利的作戰時機與位置。雙方的戰線主軸，是在黃埔江的東西向作戰，華軍由西往東進攻，企圖將日軍趕下黃埔江，日軍是由東往西打，企圖擴大日本援軍登陸的橋頭堡。

不過，提早爆發上海的戰事，對華軍比較不利，因為當時華軍兵力集結佈署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日軍的增援速度³，八一三爆發戰事之時，在上海的華軍，並未完成優勢的部隊集結，但是指揮官張治中復仇心切，中日雙方的部隊又不斷爆發軍事佈署的摩擦交火，因此中國方面就決定，不惜犧牲地冒然全面開打。

雖然上海的日本租界與軍事基地，在中國的領土之內，但是華軍顯然的缺乏正確的情報，並不知這些年來，日本軍隊早已在上海的租界內，秘密興建了比要塞還要堅固的軍事據點。因此日軍在剛開始衝突時，雖然在人數上居於劣勢，但是日軍一方面可以據險頑抗，一方面則有日本優勢的海空軍火力支援，所以中國的部隊作戰雖然勇猛，幾度的近距離攻入日軍陣地，但是卻無法攻克其要塞據點。華軍缺乏事前情報掌握，以及沒有攻堅火力支援的

³日軍從本土的海岸出發，只要五到十天，就可趕到上海，華軍則要三到五星期，才能由華中、華南到達上海。

嚴重缺點，在此次功敗垂成的戰鬥中暴露無遺。

華軍能夠在上海爭取到主動與猛烈攻擊，的確是讓日軍大吃一驚，假如日軍沒有在上海的租界內，秘密建設了比要塞還要更為堅固的軍事據點，以及若是沒有絕對優勢的海空軍火力掩護，中日雙方真的憑戰場上實力，在上海進行較量，日軍還真有可能被華軍趕下黃埔江，這就是蔣介石最為精心培養的全德式裝備的八七師（師長王敬久）與八八師（師長孫元良）的勇猛表現。但是華軍的兵力與火力仍然無法取得優勢，特別是沒有足以攻堅的重型武器，單靠部隊英勇的攻擊，仍然無法攻破日軍在上海堅固的據點，不過仍然打得部分的不在要塞內的日軍，狼狽奔逃。這些逃命的日軍，最後不得不退到上海的外國租界，受到繳械的命運。

當中日兩軍在上海正式開火之後，國際強權此時才感覺到，他們在上海的利益受到重大影響，這才裝模作樣的提出停戰調停的要求。蔣介石基於中國的戰略原則，就是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不得不對國際強權的要求，有所敷衍，日本則是利用機會喘息，以困守待援，因此增加了華軍在早期攻勢的國際困擾因素。上海之戰一開始，華軍雖然取得攻擊的先機，而且表現勇猛，但是卻終於沒有達成趕日軍下黃埔江的目的。

22.3 中國空軍英勇禦敵

而日軍在開戰之初，就企圖以優勢的空軍兵力，先對中國的空軍，進行殲滅的打擊作戰，因為日本對於中國加強的佈署空軍戰力，早就覺得如芒在背，所以作戰的優先目標，就是要殲滅中國剛剛在培訓養成的空軍，日本空軍根本就不相信「年幼的」中國空軍能夠有任何真正的戰力。日軍飛機也同時對中國的軍事與平民目標，也進行大量的炸射，造成上海百姓大量的傷亡，以製造中國人民懼戰的恐慌心理。但是中國空軍卻展現了超水準的反擊，使得日軍的空軍，傷亡慘重。

按照中國原先的作戰計畫，是準備在華北與日軍進行決戰，因此中國新編的空軍也奉命北調，預備轟炸平津。但是在蔣介石決定將中日決戰，改在淞滬之後，中國空軍奉命緊急南飛，剛駐進基地，就爆發八一三上海作戰。由於日本的第三艦隊以絕對優勢的火力，猛轟中國守軍的陣地，造成華軍極大的傷亡。因此中國空軍決定在八月十四日清晨，主動對日本海軍艦艇發動

攻擊，第一波的攻擊目標，就是停在長江水面上的日本艦隊，中國空軍對日本艦隊成功的突擊，立刻激怒了日軍，因此日軍立刻下令，動員日本空軍，優先殲滅中國的空軍部隊。

日軍立刻調動從台灣新竹機場為基地的日軍木更津聯隊與鹿屋聯隊戰機，企圖一舉攻擊京滬地區的所有中國空軍的基地，以消滅中國空軍挑釁日軍的潛在威脅。不料當天入侵的日本空軍機群，遭到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隊長所率領的戰機反擊，結果是首開中日空戰全勝記錄，中國空軍以六比零的戰績大勝，日本空軍簡直「不肯」相信這個結果，而全體中國人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可以說是欣喜若狂，國民政府立刻宣佈八月十四日為中國的空軍節，以記念中國空軍這種超乎水準戰績的歷史表現。

日軍當然無法接受這個「皇軍無敵」之神話竟遭到打擊的事實，所以日本空軍立刻在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全面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中國空軍，進行殲滅性的攻擊，以討回日本空軍失去的軍威——結果是日軍損失更多的飛機。在連續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戰之中，日本空軍竟然被擊落四十六架之多，台灣皇民心目中的「飛天戰神」木更津與鹿屋聯隊，更可以說是被中國空軍打得潰不成軍。而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興奮的中國人民，竟然不畏日本飛機到來的空襲警報，紛紛的跑到屋外與制高點，觀看中、日軍機的空戰纏鬥，為中國空軍納喊助威，在夜間，中國各地紛紛舉行火炬遊行，以表達他們對於中國空軍英勇表現的支持。

日本空軍之「慘敗」可以說是造成日本舉國震驚，也許日本至今仍然不能了解，為什麼它優勢的空軍，竟然會被中國弱小的空軍，打成這種難看的敗相。當然中國空軍才剛剛勉強成軍，因此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都不能與日本空軍相比，但是由於日機的輕敵與華軍奮不顧身的力戰，確實發揮了令日本空軍受到重創的效果。

其中以沈崇誨烈士以人機一體的方式，撞上日本軍艦，閻海文烈士跳傘，但是拒絕向日軍投降而舉槍自盡，不但贏得中國人民的熱淚與尊敬，就連日本都覺得可以拿這些中國空軍烈士的英勇表現，做為激厲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榜樣。「支那空軍勇士」的勇氣讓日本軍民真正感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熱血精神，日本要想打敗中國，恐怕要付出比三個月還要長許多倍的時間。當然歷史最後的結果是，日本不但沒有打敗中國，還向中國無條件投降！

為解日軍在上海困守待援的情勢，日本大本營在八月十五日決議，立刻

派出增援上海的部隊，由松井石根大將組成上海派遣軍，以日本的第十一師團與第三師團的部隊為先鋒，加派航空母艦戰鬥群，支援第三艦隊，前往上海地區作戰。八月二十二日，日本上海派遣軍的援軍抵達上海，立刻分兵在黃埔江碼頭登陸，以馳援被困的日軍，主力並從華軍陣地的側背，長江沿岸的瀏河、川沙口到吳淞口登陸，企圖包圍攻擊上海日軍基地的華軍。

22.4 中日在上海形成主力決戰

於是中日雙方的上海之戰主軸，開始由東西向，轉為南北向，日軍從長江沿岸登陸，作戰軸線由北向南延伸，企圖切斷華軍與南京方向的補給線。因此中日之間淞滬會戰的主戰場，就在上海西北的郊區展開，整個戰場的方圓半徑，不過幾十公里左右，但是中日兩軍在此血戰長達兩個多月，死傷的人數超過五十萬人以上，幾乎是達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地步，而戰鬥最為激烈的羅店與大場，由於中日兩軍爭奪激烈，更是成為名符其實的「血肉磨坊」

華軍先發制人的攻擊，沒有擊潰日軍的防禦陣地據點，反而引來日軍援軍的側翼包圍，這時蔣介石已經決定將主力決戰的地點，放在上海地區了。於是立刻重新佈署在上海作戰的兵力，成立第三戰區，派出張發奎的第八集團軍，防守浦東到杭州灣陣地，張治中的第九集團軍防守上海市區，而陳誠的第十五集團軍負責上海市郊到長江的防線。而此時日軍攻擊的重點，正是上海西北方的市郊地帶，日軍希望能夠切斷華軍與南京相連的補給線，以包圍在上海參戰的華軍。這時候，日軍還沒有看出，蔣介石已經決定將華軍的主力部隊，在上海孤注一擲的與日軍決戰，由於華軍主力源源湧到，造成日本一再被迫增兵，日軍初步只是希望能夠解上海之圍。這次日軍記住一二八事變的教訓，在上海派遣軍中，大量抽調各個師團的工兵單位，特別增加各種搭築橋樑的設施裝備，以增加日軍在河道之間的運動能力，並且避免在上海的市區作戰。松井石根先將主力放在攻佔上海西北郊區的寶山到羅店一線，以擴大日軍登陸的灘頭陣地。陳誠第十五集團軍的主要作戰任務，則是「反登陸作戰」，於是中日兩軍的主力，就在這個地區進行非常慘烈的陣地爭奪戰。

由於日軍擁有絕對的海空軍優勢，特別是日軍的海軍砲艦的火力，更是

全球第一的，對於華軍陣地，進行近乎摧毀性的密集射擊，彈幕的威力可以說是打得天搖地動，華軍是血肉橫飛。華軍僅有的輕砲兵，根本沒有還手的力道，於是在長江沿岸陣地，華軍可以說是死傷無數，其中以守寶山的姚子菁營，血戰七晝夜是全營戰死無一生還，最為壯烈。其實在羅店爭奪戰中，華軍犧牲的程度，幾乎也是到了全部隊犧牲的有死無回的程度，羅店成為名符其實的血肉磨坊。陳誠的第十五集團軍，才打不到半個月，就已經少了一半以上的兵員，到了九月十日，華軍才放棄反登陸的灘頭決戰，退到河道密佈的內陸，防守馬路河到蘊藻濱，以及潘涇到楊涇的地區。

此時松井石根雖然攻佔羅店，但是無法有足夠的兵力，繼續的向南攻擊，以切斷華軍的上海到南京交通線，而完成對上海華軍的大包圍。因為在上海市區以及東區的華軍，仍然在對受到圍困的日軍陣地，進行猛烈地攻擊，松井石根必須要抽調兵力，支援這些地區的戰鬥。

上海之戰，這時已經成為全球新聞關注的焦點，沒有一個國際軍事專家敢相信眼前的事實，華軍竟然能在上海力戰日軍，以為最多防守一個星期的戰鬥，竟然打了一個月以上，華軍猛攻張華濱車站，攻勢之猛烈，令中外記者看得目瞪口呆，日軍只有全力投入部隊穩住戰線；在黃埔江中的日本艦隊，更是不斷進行彈幕射擊的火力掩護，整個上海租界可以說是全被砲聲與火光所籠罩，日軍拚死反擊的結果，也只能勉強守住陣地而已，北站、八字橋等陣地，仍然不動如山的守在華軍第九集團軍的手中。

22.5 中日兩軍在上海全力拼鬥

這時日本的大本營才意識到上海戰事，正在發展成為一場超級大會戰，日軍原先規劃的上海派遣軍兵力，根本不足以擊敗華軍，於是日本參謀本部在九月十一日決定，對上海派遣軍進行大量的增兵，而正式組成上海派遣軍戰鬥序列，調動日本第九、十三、一〇一師團，台灣旅團、砲兵第五旅團，以及抽調大量的工兵特種作戰部隊，與海空軍支援作戰部隊，增援松井石根和上海派遣軍。這樣，日本上海派遣軍的兵力已經是五個師團，兩個旅團，以及陸海空的特種與支援部隊，總人數超過十六萬人。日本決心要在上海地區的會戰中，與華軍一爭高下，但是日軍仍然沒有想到，華北決戰已經不可能發展，華東會戰才是中日之間的真正決戰。

蔣介石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令改組第三戰區，自己親自兼任戰區司令長官，將上海的作戰部隊分成左翼作戰軍（陳誠），中央作戰軍（朱紹良），右翼作戰軍（張發奎），同時將所掌控的中央軍，幾乎全數的投入戰場。而此時從華南、華中，甚至西南的各路諸侯部隊，也毫無保留的陸續趕往上海戰場增援，中國幾百年沒有出現這樣的勤王之師（擁護中央）四集，而共同抵禦外侮的作戰情景。上海的戰事，已經融合了中國所有軍民的血淚、力量與注意力。

松井石根得到增援之後，還是將主力放在上海西北部的郊區，以進行對華軍的側翼包圍作戰，不過此時日軍深入內陸，已經沒有威力強大之海軍艦砲為火力支援了。日軍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日的四十天之內，在這個地區的作戰進展，只是從潘涇打到楊涇而已，東西的距離是五公里，因此多處陣地的爭奪，可以說是幾度相互易手，華軍的每個據點大都是拚到彈盡援絕，血流成河，才不能不退。松井石根用盡各種作戰的王牌，最後才終於在十月七日，突破蘊藻濱河道的華軍防線，攻到上海西方郊區的交通樞紐大場。日軍只要攻陷大場，華軍在上海市區以及浦東的部隊，也只有退出陣地，以免受到日軍的包圍。

為了守住大場，奪回蘊藻濱防線，蔣介石也把手邊可以調動的兵力，全都耗盡了，而軍政部長何應欽表示，在上海戰事最為激烈的時間中，一個師的部隊調到火線，只能維持半天，就已經報銷了。迫使蔣介石最後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以及其舅子宋子文所掌握的稅警團，都調出應戰，以防堵蘊藻濱戰線的崩潰⁴，其中留學美國軍校的稅警團第四團團長孫立人，在防線爭奪戰中，可以說是奮不顧身地反覆衝殺，幾度奪回陣地，自己也身負重傷，因而使得稅警團的聲名大噪，孫立人也就成為華軍將領的新星。

雖然中國空軍一再的以寡擊眾，但是究竟是實力有限，在兩個月內，中國的空軍終於消耗殆盡了，日軍從此幾乎掌握了長江下游地區的絕對空優。華軍要想前往戰線已經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許多華軍部隊還沒有到達前線，就已經一路遭到日機攻擊而受到損失，後勤支援與傷患後送更是非常困難，經常是處在時斷時續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宋美齡竟然還冒險親自前往上海慰問傷患官兵，結果在

⁴稅警團是以總隊的編制（黃杰當時任總隊長）組成，下轄兩個支隊共有六個團，總兵力接近一個軍，由於上海的財政經費充裕，以及規避日本的壓力，蔣介石允許稅警團擁有德式正規軍的裝備。

路上遭到日機炸射，車毀人傷，被迫出國治療，這在現代戰史而言，是幾乎絕無僅有的實例（各國的第一夫人、都是在後方醫院慰問傷兵而已，絕對不會到交戰前線的）。而蔣介石以最高統帥之尊，更是四度親身冒險，前往上海前線指揮，而其中一次，更在蘇州附近遭到日機追擊炸射，個人生命幾乎遭到不測。這種上自最高統帥夫婦，下到非正規軍的武裝力量，全都義無反顧的投入戰線決戰，表現出中國是要把這半世紀所遭到日本欺凌的屈辱與憤怒，全都化爲與日軍決一死戰的行動，全中國上下的目標只有一個，要打出中國作戰的士氣與信心，要叫國際社會肯定中國的表現。

而在十月十七日，李宗仁的桂軍王牌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增援到前線，蔣介石認爲中日兩軍在上海的戰鬥，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因此決定將第二十一集團軍，當成決戰的預備隊，立刻的投入戰場，企圖反擊日軍攻勢，以爭回蘊藻濱防線。但是由於這次的出擊，時間上過於倉促，計劃的配合又不夠周延，而在戰線上配合攻擊的部隊，根本已經沒有戰力可以配合運用，因此造成攻勢受挫。

日軍立刻運用這個華軍攻勢受挫時機，發動反擊，華軍的陣地陷入支離破碎的狀態，日軍終於在十月二十五日攻陷戰略重鎮的大場，直逼蘇州河，因此華軍在上海作戰防線，有被日軍切斷的危機，第十八師師長朱耀華因爲大場的戰線被突破，全師陣地潰散而拔槍自殺。因此在大場陣地被日軍攻克之後，蔣介石只有下令華軍的部隊，全都後撤過蘇州河，重新佈防。事實上，在奉命撤退之時，華軍還一直堅守閘北、江灣到廟行的市區陣地，兩個半月的激戰，日軍根本無法越雷池一步，因而日軍把堅守閘北陣地，血戰三個月，不曾後退半步的八十八師，稱做「可恨之師」。

爲了營造國際輿論的報導與支持，蔣介石本人親自下令，八八師留下一個營的兵力，據守四行倉庫，與日軍周旋到底，這就是被人傳頌一時的「八百壯士」事蹟，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日夜守在蘇州河邊的租界地區，爲華軍作戰呼喊助陣，日軍當然是氣極敗壞組織敢死隊，不計犧牲地猛攻華軍陣地，經過三天三夜的血戰，中國守軍的陣地，仍然飄揚著國旗。最後在租界各國的請求之下，這支力戰不屈的孤軍，才退奉命到租界之內。雖然這種作戰無補於全局，但是卻有極強的宣傳效果。讓中國人民興奮，國際輿論驚訝，令日軍臉上無光。

22.6 日軍決定從金山衛登陸

此時，日本的大本營，對於日軍在上海一直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可以說是已經陷入困惑與激怒的狀態，國際社會開始懷疑日軍的戰力，日本人民也開始從狂熱中體會到挫敗與死亡的憂慮。日軍大本營再度權衡整個中日戰事的發展，認為既然華軍已將主力放在上海，因此日本要想速戰速決，也只有在上海擊潰蔣介石的主力，而松井石根經過三度增兵，還是無法取得決戰的勝利，日本大本營除了再度增兵之外，也別無其他的選擇。直到這時日軍才真正的知道，中日主力決戰的地點是華東，日本在華北方面過多待命決戰的部隊，根本是戰略佈署的浪費。

於是日本大本營在十月二十六日，以臨參命一二〇號，做出最新戰鬥序列的調整，下令由華北方面軍抽調第十六師團，加入上海派遣軍戰鬥序列，給松井石根增加決戰的預備隊兵力。同時另外以第六師團、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師團，以及國崎支隊等特戰與支援部隊，組成第十軍的戰鬥序列，由柳川平助中將率領，前往上海地區參戰。這樣日本上海派遣軍與第十軍的部隊，總計為九個師團、兩個旅團以及大量的海空軍支援部隊，日軍總數達到二十七萬人。

蔣介石眼看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會員國，將在十一月三日於比利時召開會議，主題是討論中日之戰，所以他希望華軍能夠在上海地區繼續作戰，以利於中國求諸國際仲裁，因此沒有將已經面臨作戰力量衰竭的華軍部隊，向京滬線後方的縱深預定陣地調動，反而要求華軍繼續設法固守已經殘破的陣地，而松井石根的部隊，在得到大本營的支持與壓力之下，只有拼命的設法強渡蘇州河，繼續的攻擊華軍陣地，於是中日兩軍又在蘇州河南岸，陷入浴血的苦戰之中。

正在此時，日本增援的第十軍，突然在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的金山衛登陸，包抄華軍防線南方的背後。雖然蔣介石在上海作戰初期，曾經設想過日軍從金山衛登陸抄包華軍戰線的背後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簡單的防禦工事，以及留有部隊監視。但是由於華軍在上海的決戰過於激烈，因此將防守杭州灣的部隊抽調，蔣介石與德國軍事顧問都認為，日軍也已經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戰，不會有兵力再投入登陸杭州灣。

蔣介石沒有想到，日本大本營也是把所有的賭本，都投進了上海決戰，

竟然由華北方面軍抽調兵力，組成第十軍戰鬥序列，而由杭州灣登陸，迂迴進攻華軍防線的背後。蔣介石聞訊之後，立刻火速的調兵阻擋，但是華軍事實上也沒有兵力可調了，六十二師回防陣地已經太遲，第六十七軍剛從河南趕到，根本還沒有完成集結，立刻就被日本第十軍的主力所擊潰。事實上，就算是華軍在杭州灣陣地待命，也根本沒有可以阻擋日軍第十軍三個半師團登陸的軍力。

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的戰略企圖，非常的明顯，就是要從背後包抄在上海決戰的華軍，準備圍殲華軍主力。但是非常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蔣介石此時已經亂了方寸，沒有對於這個情勢的變化，做出即時與果斷的退兵決定。蔣介石雖然設法抽調一切可能的部隊去杭州灣沿岸，企圖阻擋日本第十軍的登陸與推進，但是卻遲遲沒有下令在上海地區參戰的華軍，立刻進行有計劃的撤退。因此造成在杭州灣登陸的日軍，有如勢如破竹地直撲松江，準備切斷滬杭路的交通，而對在上海的華軍，展開全面包圍的態勢。

日本第十軍在杭州灣的金山衛登陸成功，加入上海外圍戰鬥之後，日本大本營爲了統一日軍在上海地區的作戰指揮，在十一月七日下午，組成華中方面軍戰鬥序列，由松井石根大將出任方面軍司令官，統帥上海派遣軍以及第十軍的部隊，對上海方面的華軍，進行最後的合圍。因此在華軍方面，可以說是陷入全面受到包圍的危機與混亂之中。

而直到十一月八日，華軍在上海的戰線，已經面臨全線崩潰的動搖，蔣介石才下令在上海作戰的華軍部隊，進行全面的撤退，這樣撤退的時機，遲了將近三天，造成華軍幾乎是以潰散的方式，脫離戰場。一路上，華軍各個單位，完全亂了章法，各自尋求突圍與逃命的方式，先前退卻的部隊，擔心日軍的追擊，因此大量的破壞橋樑與道路，使得後續撤退的華軍，根本無路與橋可走，所有的重裝備，幾乎完全損失殆盡。

十一月十三日，日軍完成對上海地區陣地的合圍，南京國民政府正式發表退出上海的聲明。淞滬會戰進行長達三個月，華軍寸土必爭的浴血抵抗，的確造成全世界媒體的注意與震驚，使得日本企圖三月亡華的作戰目標，根本無法實現。但是由於華軍在上海的作戰，缺乏彈性的運用，因此發生軍力超額透支的危機，幾乎將蔣介石所累積的一些抗日戰力的儲備，完全消耗殆盡。中國總共調集七十八個師投入戰場，後續仍有十幾個師沒有趕上作戰。所幸是，日軍雖然擊潰華軍，但是仍然沒有辦法殲滅華軍，更無法屈服華軍

繼續作戰的意志。所以日軍在攻佔上海之後，立刻就面臨下一步將如何結束戰爭的戰略爭論，至於是否需要攻佔中國的首都南京，就先在日本的參謀本部中，掀起一場論戰。

22.7 改變中日戰略軸線的會戰

中日的淞滬大會戰，可以說是規模空前，同時也改變了中日決戰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後的戰爭發展方向。在這裡就產生了一個戰略歷史上的大問題，當時蔣介石決定將主力東調，尋求上海決戰的策略，是否適當？因為一般的解釋，特別是陳誠等將領的意見是，若是中國軍隊在華北決戰不利，日軍精銳的機械化部隊，在華北平原會以其戰場優勢，沿著平漢線大舉南下，直攻武漢，那麼中國就會無險可守而迅速被日軍分成東西兩塊；中國的軍政中心既無法西遷四川，日本又可以運用海空軍支援的絕對優勢，將華軍主力在東南殲滅，歷史上中國南方政府，都是遭到這樣戰略所擊敗的。

這種戰略分析，當然有其極強的說服力，雖然事實上，日本參謀本部卻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這樣的作戰計劃（但是中國方面卻不知道），但是中國方面卻不能沒有禦敵的準備，由於日本認為若要這樣深入的攻擊中國，必然是曠日持久，並且動員太大，日本認為只要攻擊中國剛剛建立的工業地帶與軍政中心，最多再封鎖中國的海岸線，中國就絕對會屈服的，中國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後地區，還能與日本對抗。所以中國最為擔心的日軍由北而南之攻勢，卻是日本沒有認真考慮過的，但是中國卻不能不加以防範⁵。

不過假如就此認為，蔣介石決定移轉決戰地區的構想，是戰略上的重大錯誤，又不全然有理，因為中國部隊的機動性極差，假如完全採取守勢作戰，將會無法取得戰略的主動，日軍若是可以掌握全面戰略上的主動，一旦它在華北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遲早會對長江三角洲的政治、金融重心，發動攻擊的，這時蔣介石將根本無法兩面兼顧。因此不如由中國主動地在上海發動攻勢，強迫日軍改變戰略決戰的地點，對於中國更為有利。

當然蔣介石在選擇上海的考慮重點之一，恐怕還是希望在上海決戰，容易引動國際社會的干預，中國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其真正的意義就是在此。只有設法將中日之戰，引動國際社會的支持，最終

⁵日軍遲遲在六年之後，才在其一號作戰計劃中，選擇這個方向的攻勢。

能提早擴大為全球的為自由之戰，中國才能有機會死中求生。

所以中國放棄在華北的決戰，以及在華東果斷地形成決戰，是掌握戰略主動的正當決策，一旦由日軍控制戰略主動，華軍將更會首尾難以兼顧。從日軍華北方面軍戰鬥序列的組成，即可顯示日本對於在華北決戰的準備，是多麼迅速與完整，假如華軍真的以主力反攻華北，蔣介石更是鞭長莫及無法有效指揮，而漫長的補給線，也將會發生無法支持一百個師作戰的嚴重後勤問題，因此日軍將會在華北更為輕易地大獲全勝。此外，日軍仍是可以以海空優勢，隨時威脅上海地區，中國無法將有限的兵力，分散佈防。

而以當時中國的國情，也不可能允許蔣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動，看著日軍在上海部署而進進出出，否則輿論與諸侯們，會真的懷疑蔣介石與日本有默契，或是認為蔣介石的抗日決定，是別有用心的借刀殺人，不敢也不願在自己的地盤與日本作戰，專門挑諸侯們的地盤與軍隊抗日，這在宋哲元與韓復榘的身上都可以看出來，因此他們不肯施出全力與日軍拚搏。而在蔣介石表達中央決心抗日，要求各路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計之時，西南的龍雲、劉湘等人，也曾經擔心這是蔣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蔣介石必須要在自己的地盤，用自己的中央軍，與日本進行殊死戰，才能清楚地證明，抗日並非消耗諸侯部隊的藉口。

22.8 淞滬會戰的檢討

由上海決戰所展開的淞滬會戰，是整個中日戰爭，甚至是人類戰爭史上少有的城市大會戰格局，雖然日軍在得到海空軍優勢支援下，造成了中國軍隊過度慘烈的犧牲，但是這是戰場戰術指揮上的問題，而非戰略決策的問題。假如蔣介石能夠控制住軍力，不要全部的投入在上海近郊，而能適時全力拉長防線的縱深，把淞滬會戰打成長江三角洲會戰，不只在上海四周進行決戰，及早讓部隊進入預先設好的防線，靈活運用輕裝部隊在水鄉澤國之中進行逆襲，那麼中國軍隊在戰場的犧牲並不會如此之大。這場會戰幾乎把蔣介石中央軍的大部分主力，給全部地消耗掉，當然也造成多數的諸侯近乎毫無保留地派兵支援抗日作戰，這是中國兩百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整體團結作戰。

當然蔣介石在上海指揮的這場決戰，可以說是超越過他的能力與經驗範

圍之外，也超過了華軍的武器、訓練與能力之上的。但是中日之戰，本來就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中國無論在那裡決戰，都得要面對日軍絕對的優勢，中國不可能不戰而棄守上海，因為這不但是中國稅收、工業與國防的重鎮，更是民心士氣與國際形象的象徵所在，蔣介石要先不惜代價地打出幾場硬仗，才能穩住民情軍心，爭取到國際的同情與支援，否則中日抗戰根本就支持不了八年！

不過華軍在相對弱勢條件下，假如能夠進行一些調整，仍然可以在上海打得更好，那就是事先的情報若是做得更為正確，在爭取先制攻擊時，就能集結更為優勢的兵力，特別是集中使用可以攻堅的火力，應該可以取勝日本的守軍。而在發現日軍據點防禦過於堅固之時，能夠靈活的轉攻日軍較為脆弱的防線，而分割日軍的防線，也可以獲得更佳的戰果。雖然當時中國的海軍實力，連與日本海軍正面接戰的能力都沒有，但是若能大幅加強水雷的運用，可以發揮高度阻敵效果，這比華軍在江防浴血的反登陸作戰，還要更能夠有效果。

華軍在上海郊區的主力決戰，過於著重維持戰線與爭奪一些據點，造成過於重大的傷亡，也屬於不智，華軍應該更加拉長防禦的縱深，留下更為充足與彈性的預備隊，而與日軍進行對抗，會比一再死守戰線據點，也許會更為有表現。當然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華軍在全盤的戰局中，太過於集中上海市附近的決戰，事實上，應該把縱深拉到長江三角洲，才能充分疏散日軍的優勢火力，發揮河道水鄉的阻敵效果，以及運用預設的國防工事防線。

蔣介石指揮華軍在上海作戰的重大疏失，在於上海作戰長達三個月之久的期間，蔣介石竟然沒有派少量部隊，或是參謀督導人員，認真實際地檢視長江三角洲的國防工事，進行作戰之前必要的整理與準備，以及整體防禦的規劃。結果等到中國軍隊，從上海地區潰退到防線之後，才發現無法順利地進入陣地應戰，也沒有任何的支援與接應，華軍根本無法使用這些國防線作戰，結果幾百萬元投資的防線，就在幾乎沒有發生效果的狀態下，被日軍輕易地突破了。

假如蔣介石能夠在十月中旬，開始有計劃的將參戰部隊，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區，把陣地的縱深拉開到蘇州河南岸，並且將增援的桂軍主力部隊，負責接應前線有計畫退出戰線的部隊，這樣中國的部隊能夠帶著完好的裝備，開始佈署在事先建好的國防線上，並且動員地方政府與民眾，開始打掃整理

防禦工事、補充糧食、飲水以及燃料，後續增援的部隊也儘量留在京滬與京杭地區，成爲防禦作戰的預備隊，這樣將淞滬會戰拉開成爲京滬會戰，那麼日軍的進攻恐怕就會遭到更大的麻煩與更多的損失了。

當然，基本上中國是一個全方位落後的國家，連軍隊的指揮與後勤系統，都存在極多的矛盾與不相容的問題，全靠蔣介石個人居中協調指揮，而前往上海作戰的部隊，根本不能有準確的事前規劃與掌握，各路諸侯是在討價還價之後，才派出部隊投入戰場，部隊運輸工具更是落伍與不足，因此蔣介石經常處在無法確實掌控部隊的狀況下應戰。許多中國的軍隊不能適應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作戰，對於日本的海空軍，以及坦克、重砲與毒氣等殺傷力極大的武器攻擊，更是連見都沒有見過⁶。華軍長期作戰最大的問題是，一旦接戰之後，部隊出現人員的死傷與裝備的損壞，就無法迅速的得到補充而恢復戰力，因爲中國沒有完整與統一的後勤系統，更沒有受過軍訓的後備軍人，徵兵制才在試辦階段，因此勉強由各地強徵而來的補充兵員，根本就是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平民，各軍的武器系統又分爲十幾種，要補充的武器不是缺貨，就是補充上了，部隊還不一定會用。

而日軍最大的優點就是完備的兵力補充系統，以及高效率的後勤支援系統，作戰部隊本身就有後備兵的建制，而受過軍事訓練的後備軍人，更是很容易在部隊中發揮戰力。因此中日兩軍在接戰一回合之後，中國部隊後續的戰力會大幅減低，但是日軍卻得以在迅速整補之後，仍可以於第二回合中保持相當的水準。

而日軍雖然最後取得淞滬會戰的勝利，但是日軍一直遲至兩個月以後，才真正掌握到蔣介石華東決戰的作戰意圖。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狀況下，根本無法速戰速決的在上海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假如日軍能夠早些掌握華東決戰的戰機，在上海迅速地集結重兵，而能提早以大軍指向太倉以西的戰略據點登陸，然後大膽地向南深入，直接切斷華軍在上海與南京之間的交通線，那麼華軍在上海的陣地早就被日軍所包圍，會更早失去纏鬥的力量。同時日軍也不應過於自恃火力與兵力的優勢，專門攻擊華軍陣地，採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應該設法進行機動迂迴的攻擊，才能增加獲勝的機會。

日軍能夠將第十軍用在金山衛的登陸作戰，可以算是戰術上的傑作，這樣日軍從華軍陣地的後方，進行大迂迴包圍的作戰，的確是瓦解華軍在上海

⁶不知在歷史上有哪個將領，指揮過一個這樣的大會戰？

作戰的高招，造成了華軍出現失控地退出戰場，因而損失了更多的裝備與人員。不過日軍竟然無法包抄與圍殲到中國的主力部隊，這也顯示出日軍在作戰規劃上的疏失。

22.9 粉碎國際公認的「日本三月亡華」論

日軍在上海浴血纏鬥三個月，才勉強攻下華軍的陣地，已經使得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的抗日實力與決心，產生刮目相看的態度，而日軍久戰未勝，日本的民心士氣，則出現了懷疑與困惑。日本幾乎已經可以確定，無法在短期內結束與中國的戰爭，那麼日本就將面臨其戰略最大的致命弱點，就是日本缺乏戰爭與民生的資源，根本經不起長期的消耗，一旦它無法在中國戰場上達成速戰速決，那麼最後的潰敗，也就成爲日本無法避免的命運了。

而淞滬會戰改變了中日作戰發展的態勢，中國以弱勢與守勢竟然掌握了戰略的主動，日軍擁有優勢與攻勢，卻無法決定戰略發展的方向與決戰的地點。此外這場血戰真正打出了中國人民的信心與熱血，推翻了國際社會公認之「日本三月亡華」的看法，雖然無法「感動」國際社會對日立刻進行制裁，卻也讓國際社會開始更爲同情與支持中國的抗日作戰。

總之，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只要中國不屈服，中日兩軍的東線作戰絕對是不可能避免的，與其讓日本掌握主動，不如讓其陷入被動。雖然日軍並沒有沿平漢線長趨武漢的作戰計劃，但是中國卻不可不防這步。蔣介石主動將東線變成爲主力戰場，有著後勤與指揮的實際需要。因爲華軍的主力與補給，多數來自長江以南地區，當時的陸路運輸能力，在日本空軍的壓力下，無法支持大軍在北部的作戰。但是若在上海作戰，不但地理較近而且長江即是運輸的動脈，這裡也是蔣介石的地盤所在，就近指揮，比較靈活方便⁷。

在淞滬會戰驚心動魄的三個月當中，全中國上下凝聚出了一個共識，就是爲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亦絕不終止抗戰。」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爲悲壯的決定——整個民族決心以全面的犧牲來面對歷史危機的挑戰。

當時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的聲明，可以說是對於這場會戰的過程與

⁷在華北戰線就會出現嚴重鞭長莫及的指揮問題，石家莊行營就是任各軍協調困難，指揮失當的情形下，在混戰中淪陷的。

意義，做出最好的歷史見證與結論：

「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蔣介石與全體軍民的共同結論是，雖然上海作戰失敗了，但是中國決心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陰錯陽差的南京保衛戰

日軍攻佔了南京，並且以無法想像的殘忍手法來對付中國的軍民，但這種歷史上空前的暴行，不僅無法屈服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為激起整個中國民族的悲憤。中國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國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流光最後一滴鮮血，也絕對不會對日本侵略者屈服與投降。對於蔣介石而言，抗日的戰略已非常地明顯，中國可以丟掉首都，但是中國不會停止抗日，中國將繼續引誘日軍深入其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即使這代表著更多的中國軍民要犧牲，更多的領土遭到摧殘與佔領，但是中國決心抗日到底。

在松滬會戰尚未完全結束之時，有關是否要進行南京攻防戰，就已分別在中日雙方統帥部之內，掀起了重大爭論的「意見戰爭」。日本大本營方面是考慮是否有必要進攻南京，中國軍委會方面則是考慮是否有必要防禦南

這種奇怪的爭論，看起來是有些荒謬，因為中日兩國既已全面交戰，日本理所當然要攻下中國的首都南京，以達到政治與戰略上「屈服」中國的目標。而中國當然要防衛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國政治與戰略的中心，指揮全國繼續地對抗日本。但是，當時之交戰雙方，卻有著非常特別的狀況，造成

日本猶疑著是否要進攻南京，而中國則是考慮是否要防衛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雙方尙未經過正式宣戰的法定程序，日本當時對中國用兵的最高戰略目標，是希望保持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儘量以局部性的「事變」方式，採取分割的原則，來處理與中國的各種戰爭衝突，日本並不希望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戰爭，以免陷入中國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蠶食中國。

七七事變之後所引發的華北作戰與淞滬會戰，其實都已超過日本的預期了。所謂日本可以在「三個月」內亡華的構想，並非日本軍部單純、輕率與狂妄的設想，而是有著相當科學、實際數據支持的估計。在盧溝橋事變擴大，日本決定派兵進攻中國之時，日政府並無完全佔領中國的策略。日本確信中國在遭到幾場嚴重作戰的失利後，就會向日本屈服，接受讓日本控制華北與內蒙古的條件。同時日本可以進一步操縱中國的市場與資源，以支持與配合日本準備與蘇聯和美國之「終極作戰」

23.1 日軍爲應否進攻南京而激烈爭論

日本與中國進行的全面作戰，主因只是由於日本政府對七七事變處理失控，將局部戰事演變成爲全面大戰，使它覺得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在華北給予中國重擊，然後迫使中國讓步，使得日本可以進一步的掌控中國的內蒙與華北地區，而不是日本預先設計與謀劃的結果。

日本沒想到因爲海軍在上海的介入，給了蔣介石一個借勢轉換決戰地點的機會，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變。日本軍部基於國家顏面以及軍方的形象，不肯也不願在上海這個國際都會做出任何讓步，因此才在上海與中國開闢第二戰場。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戰目標，也不過想要在上海痛擊中國軍隊，攻佔中國的金融、工業與經貿中心，造成對長江三角洲精華地區，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脅，以增加其迫使中國簽下城下之盟的籌碼而已，因此日本的戰略規畫，還是進行華北決戰。

日本當然知道中國的持久作戰戰略，是企圖「誘敵深入」、「以空間換取時間」，所以日本政府與軍部中，有不少負責的官員，包括首相近衛，外相廣田，大本營的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都認爲對華的戰爭，必須要能夠適可而止，只要能夠在局部的衝突上取得勝利，並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停

戰條件，日軍就沒有必要繼續在中國深入地作戰，因爲日本的資源有限，同時擴大與中國的戰爭，會影響到對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的最後決戰。所以在淞滬會戰中，日本大本營早就劃下日軍在上海作戰範圍的「制令線」，所有部隊不得越過蘇州、嘉興以西的地區作戰，日本大本營就是擔心日軍會在中國的戰場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認爲，它已佔領中國華北的政治、經濟中心北平與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戰略高原與黃河以北地區，加上在淞滬會戰中，幾乎擊潰了中國的主力作戰部隊（特別是蔣介石培訓之德式裝備的中央軍），因此日本政府與軍部都曾考慮，是否無需在淞滬會戰結束之後，進一步地對中國首都南京發動攻擊；中國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戰損失之後，「應該」會接受日本的和談要求。而日本若是進一步進攻中國首都南京，將會使得中國政府陷入決心抗戰到底的心理反彈之中。

而日本大本營也同時認爲，在華北作戰與淞滬會戰中，日軍付出的代價，已經超過了在日俄戰爭中傷亡的總數，日本人民開始會對戰爭感到恐懼與厭倦。同時日本政府也根據情報判斷，蔣介石正與蘇進行軍事聯繫，蘇聯有可能會投入戰場，以對日軍造成背後的攻擊。所以日軍最好能夠及時見好就收，集中足夠的實力，來防範蘇聯的偷襲。何況日本一直認爲能以分期的方式，蠶食中國，比較有利。

當時，蘇聯是唯一以武器公開支持中國作戰的國家（當然還是要中國出錢買），而蘇聯準備隨時對日本作戰的傳聞又很多，爲此，日本大本營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緊急電令關東軍進行戒備，同時下令華北方面軍停止沿津浦路南下渡過黃河的攻擊行動，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時支援關東軍與蘇聯軍隊作戰。所以日軍並不希望與中國繼續戰下去。這時候日本眼見上海的戰事，日軍已獲得勝利，九國公約的會議又正在召開，各國有意介入調停，因此日本主動進行外交出擊，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十一月二日，展轉向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Dr. Trautmann)，提出中日議和的七點條件，條件內容出奇的「寬鬆」：一、內蒙古自治。二、華北中立區擴大過平津鐵路以南，華北地方的主權仍屬中國。三、上海停戰區擴大，由國際共管。四、中國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在華權利。日本外務省請求德國居間調停，所以大本營起初並不同意華中方面軍向南京追擊的要求。

不過爲了加強外交運作的壓力，日本大本營在十一月七日，宣佈成立「華中方面軍」戰鬥序列，任命松井石根大將統領上海派遣軍、第十軍，與所有海空支援作戰部隊，以九個師團，超過二十五萬的兵力，展示日本有可能乘勝追擊，而會進一步地將戰爭推向整個華中地區，以迫使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同日，日本參謀本部在政府的請求與參謀次長多田駿的同意下，發出第六百號的臨參命，明確地限制華中方面軍，不得越過蘇嘉鐵路以西的制令線，進行任何的軍事行動，以等待國民政府對於和談的答覆。

23.2 日軍前線部隊抗命決定進攻南京

但是來自淞滬會戰前線的日本軍隊，卻力主必須立刻乘勝追擊，直到攻陷中國首都南京，才能進一步殲滅中國陷入潰散的作戰主力、屈服中國政府的作戰意志、爭取更有利於日本的和談條件。特別是來自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意見最強烈。此時日本第十軍形成華中方面軍的左翼，在太湖以南，沿著杭州通往南京的方向，進行戰場掃蕩，追擊潰退的華軍。由於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以大迂迴作戰的方式，從背側攻擊中國在淞滬地區的守軍，造成已疲憊不堪的中國在上海作戰的部隊，出現潰敗，一路曳甲棄兵、倉皇逃命，日本第十軍並未遭到猛烈的抵抗。

因此，第十軍根本不了解在淞滬會戰中，中日雙方激戰的代價，因而認爲他們才投入戰場，根本還沒有真正展露身手的機會，就已攻到大本營的制令線了，所以第十軍軍長柳川根本就漠視大本營的規定，而獨斷地直接下令第十軍的部隊，以強行軍的方式，從太湖以南地區，沿著京杭公路，盡一切可能的力量，朝向南京方向，深入追擊撤退的華軍。

同時上海派遣軍也同樣力主乘勝追擊，因爲他們在上海激戰三個月，才能勉強擊退中國守軍，「皇軍無敵」的神話因而爲之動搖，所以他們急欲進一步攻擊中國首都南京，以挽回他們的聲譽，更不能讓第十軍撿到戰果。所以上海派遣軍也同樣的以追擊華軍以及掃蕩戰場爲名，在太湖以北，沿著京滬路朝向南京追擊。華中方面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同意上海派遣軍與第十軍的進攻南京立場，因此設法動員一切的關係與方法，向東京進行遊說，要求大本營立刻發佈進攻南京的作戰命令。

日本華中方面軍下轄的第十軍與上海派遣軍，以獨斷的軍事行動，越過

制令線，在太湖的南北兩岸形成鉗形攻勢，朝向中國首都南京方向進軍，造成了日軍大本營極大的震驚與困惑，因此參謀本部特派作戰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前往華中方面軍視察，以實際了解日軍作戰狀況，並且控制日軍不得超越制令線作戰。日本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前線的軍隊與大本營中的少壯派軍人，事實上已經互通聲氣。許多作戰行動，都是由前線部隊發動，再由軍部內的少壯派響應追認，最後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實，而這次的進攻中國首都南京作戰行動，整個過程也是同出一轍。果然河邊大佐在前線被第十軍的將校所說服，帶著支持日軍立刻攻擊南京的立場，回到東京進行遊說。

日本大本營在前線部隊的壓力及內部少壯派軍官響應之下，日參謀本部的最高部門，開始改變立場，最後連日皇都被說服。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御前會議中，先追認事實，撤消對華中方面軍作戰地區的制令線，同意日軍已經越過蘇嘉線作戰的現狀。日本軍部認為，如此可以增加對國民政府和談的壓力。但是隨後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經過軍方帷幄上奏，大本營終於發出允許日軍進攻南京的正式作戰命令，而日本政府方面當時竟然不知道這個命令，首相近衛是看到報紙之後，才知道日軍已經開始擴大戰爭，進攻南京了¹。

日軍認為進攻南京是志在必得的「完勝」出擊，一戰功成之後，中國必定會屈膝投降。日軍為了鄭重其事，特別由日皇發佈正式進攻南京的作戰詔書，由大本營參謀次官多田駿親自攜帶命令，到達上海的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宣達進攻南京的詔書。攻擊南京正式的作戰日期，訂為十二月一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將統帥上海派遣軍與第十軍，指揮六個半師團的軍隊，沿著太湖的南北兩岸，以左右包抄的方式，直撲中國首都南京；並且派遣部隊渡過長江，對南京進行遠程的包圍攻擊。

23.3 蔣介石力主防守南京

在中國方面，淞滬會戰的規模與進展，根本超出了軍委會的掌控，蔣介石幾乎是動用所有可以開到前線的作戰力量，投入淞滬會戰，雖然在戰場

¹當時日本是採取軍令系統獨立運作，所謂的「帷幄上奏」，是軍方單獨與日皇的會議，首相以及政府首長，甚至不得出席。

上，中國軍隊憑藉熱血與犧牲，創造出奇蹟般的持久作戰成果，但是由於過度地投入這場大戰，而不可能有多餘的力量，做好縱深防禦的準備。十一月五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華軍已無法阻擋更多的敵軍增援部隊，日軍登陸之後以秋風掃落葉的速度，快速地合圍在上海作戰的中國部隊。

蔣介石沒有果斷做出立刻撤退的決定，反而要求在上海作戰的中國軍隊，設法繼續堅守幾天，是由於九國公約會議已於十一月三日在布魯塞爾正式召開，中國期望會議的結論，能讓國際強權介入仲裁日本與中國的戰爭。但是各國在會議中先進行各種外交折衝，要到十日才發表結論。爲了等待九國公約會議在十一月十日的結論，華軍繼續苦撐到了十一月八日，此時後方退卻路線已經面臨將被日軍截斷的危機，蔣介石才下令華軍撤退。但是這三天的延誤，造成中國上海的守軍，幾乎要遭到日軍全面包抄的鉗形攻勢圍殲，而有全軍覆沒的可能，幸好中國軍隊發揮絕地求生的本領，在千鈞一髮中，以化整爲零的方式，倉皇地撤出了部分的部隊，右翼軍沿滬杭線撤向蘇嘉線，然後再轉吳興與杭州地區整編；而中央與左翼集團軍，則沿京滬線，先退向蘇州與無錫。華軍主力雖然幸而沒有被日軍圍殲，但是已經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重要的軍事裝備，幾乎都損失殆盡了，軍心與士氣更是全面地潰散。

當日軍在進行是否要進攻南京的戰略爭論之時，蔣介石這才開始考慮南京保衛戰的規劃與準備。雖然蔣介石接受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曾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在南京與上海之間，秘密的設立了兩條防線，其一是吳福線，其二是錫澄線，以做爲日軍從上海進攻南京的國防屏障。德國軍事顧問認爲上海與南京之間，是江南特殊的湖澤河叉地形，日軍的現代化機械與重裝備，難以在此一地區發揮運動的優勢，因此中國部隊可以在這個地區，以堅強的防禦工事，有效地防禦日軍的攻勢，而讓日軍付出高昂的作戰代價。

但是淞滬會戰的變化，完全改變了這個準備多年的作戰計劃。因爲蔣介石將所有的作戰力量全都投入了上海，以求重挫日軍的氣焰，提高中國的民心士氣以及增加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支持與同情，所以造成蔣介石根本沒有時間與力量，去顧到原有的南京保衛戰計劃。等到淞滬會戰中國部隊以近乎潰散的方式結束，所有參戰部隊幾乎只有逃命的選擇，大部分的軍隊都失去了作戰的能力，蔣介石才開始考慮南京保衛戰的問題。

從上海後退的中國軍隊，在失去重武器裝備及部隊建制連繫之下，日本

空軍一路猛烈炸射，日軍又尾隨追擊，部份華軍雖然是退到吳福國防線，但是根本沒有防線接應的守軍，又沒有後勤裝備支援，甚至沒有防線的配置地圖，因此無法進入防線陣地佈防，就遭到尾隨的日軍攻擊，只有再度潰散後退。十一月十七日吳福防線就被日軍突破，接著錫澄防線也幾乎是遭到同樣的狀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日軍攻佔，這兩條耗資幾百萬元的中國「興登堡」防線，就在混亂中，完全失去了阻擋日軍攻擊的能力。日軍既已順利突破這兩條防線，在進攻南京的道路上，就不再有主要的防線需要面對了。而當時在理論上來說，日本大本營還沒有同意華中方面軍進攻南京呢。

而蔣介石在下令軍隊退出上海的同一天，他在南京會見了四川省主席劉湘，商議將首都遷往重慶的事宜，接著在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的宣佈，將重慶定為陪都，準備將中央政府遷到重慶，做為中國繼續抗戰的政治中心。所有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機關，從二十日開始進行全面的撤退工作，軍委會則先遷到武漢辦公，中國在面對日軍的威脅，是決心放棄南京，但是卻決心要在中國的每一寸領土上，繼續地作戰下去。

也就在十一月十六日，蔣介石才正式與部屬討論南京防衛戰的問題。事實上，當時多數的將領，在淞滬會戰潰退之後，對於南京的防守，就已經失去信心與把握了。當時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就公開的反對守衛南京，白崇禧的主要論點是，在淞滬會戰之後，第三戰區所有的華軍，幾乎已經失去戰力，因此根本無法在南京進行有效的防守，與其在南京進行無效與不可能的作戰，不如公開宣佈南京不設防，或是對於南京只進行象徵性的防衛，以減少南京受到炮火的破壞，也避免需要整編的華軍遭到進一步的攻擊。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福爾肯豪森，以及多數將領，包括陳誠、李宗仁等人，也都認為，中國在上海作戰新敗之餘，華軍實在已無防衛南京的兵力，假如國民政府認為不能完全將南京拱手讓給日軍，最多只能做有限性的抵抗，進行所謂「短期固守」的作戰。

這點結論蔣介石大體接受，只是蔣介石認為南京的防衛，有著重大的心理與政治意義，假如南京不戰而退地拱手讓敵，會被誤解為中央已經無心抗戰，百姓會對於整個抗戰更加失去信心，同時也很難要求各地山頭的部隊堅守陣地。所以蔣介石決定在南京進行一場不可能、卻是必須要的保衛戰。但要知道當時的蔣介石，只是各路諸侯的領袖而已，並不是可以直接發號施令的指揮官，蔣介石需要表現自己是不惜代價用自己嫡系的部隊，進行抗戰，

才能得到各路諸侯衷心與全力地支持。特別是中國在與日軍作戰，在戰場上，必然是屢戰屢敗，只有全國上下都相信蔣介石是真心地抗戰，中國才能進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因此南京不能不守就拱手資敵，而且要付出一些代價，才能讓大家心服口服地支持繼續抗戰。

當然蔣介石的南京保衛戰，也考慮著時間的因素，因為德國大使已經傳來日本和談的條件，內容還算合理，因此蔣介石認為，假如能夠先守著南京，中日之間的交涉會比較容易進行。另外他也等待著蘇聯是否對日參戰的答覆，因為在八一三淞滬會戰開打之後，蘇聯知道這將是中日之間的大決戰，因此立刻同意在八月二十一日，迅速簽定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正式開始以三億五千萬美元貸款來軍援中國，並且組織「正義之劍」援華空軍自願軍，以及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在中蘇簽約之時，史達林也在口頭上允諾蔣介石，蘇聯準備在三到六個月內，對日宣戰。蔣介石希望能夠防守南京，苦撐到蘇聯參戰，那麼中國就可以移轉壓力，從容反擊了。

23.4 唐生智臨危受命

蔣介石在淞滬會戰之後，發現自己編練的中央軍，幾乎已經完全打光了，部屬的意志也出現了疲憊，因此他在南京保衛戰的決策過程中，採取非常低的姿態，他沒有直接調兵遣將，下令部屬防守南京，只有在軍事會議中，提出自己的願望，希望有人能夠自告奮勇地守衛南京，在將領們觀望的反應之下，蔣介石甚至表示，假如沒有人負責防衛南京，他將自己兼任南京的衛戍司令。這時候，體弱多病的唐生智，突然大義凜然地表示，他願意擔下防衛南京的重責大任，必要時他將與南京共存亡。就這樣，蔣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委派唐生智出任南京衛戍司令。當時南京保衛戰的戰略共識是，進行短期的固守，而非是死守南京。

過去，唐生智雖然曾經有過公開兵變反蔣的記錄，而且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統軍作戰，當時身體健康的狀況又不佳，但是此時的唐生智，已是蔣介石身邊多年的重要部屬，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的南京保衛戰演習中，唐生智是這場演習的參謀長，因此他對於南京的防務，應是最為熟悉的將領了。由於在決定保衛南京之時，蔣介石已經是無兵可遣無將可派了，唐生智既然願意自告奮勇，就委派他出任衛戍司令了。蔣介石能夠派出防衛南京的

軍隊，也只有從上海退下的等待整編的十三個師軍隊，加上軍校的教導總隊，甚至連憲兵部隊都算上，在編制上約有十五萬人，實際上的兵力也許略為少些²。

此時，從上海退出戰場的主力部隊，改變撤退方向，而從宜興轉向南下，經過廣德地區，進入浙江與安徽，而沒有向西方的南京集結。在白崇禧的影響下，廣西新的增援部隊也開始減緩原先向南京集結的運動。顯然是大家都已認為，南京背對大江，決戰非常的不利，大家要對自己的部隊留一手，以免在南京被殲滅。只有由四川剛剛趕到的第二十三集團軍（原先是準備參加淞滬會戰的），由南京調往廣德，扼守京杭公路，與日軍第十軍發生激戰，才掩護華軍主力安全的退到浙皖地區。而川軍的師長饒國華則在戰線被日軍突破時，自殺成仁。

這支由唐生智統帥，臨時編成的南京衛戍部隊，原本的作戰任務，只是進行短期固守的防禦作戰，並非要進行全軍犧牲，死守不退的決戰。但是唐生智在自願接任衛戍司令之後，卻一再的對外與對內表示，他決心與南京共存亡，要求部屬也要準備如此地犧牲。事實上，當時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中國部隊，是臨時編組的待整編部隊，兵、將相互缺乏了解，裝備與人員嚴重不足（補充的新兵太多，大部分連基本軍訓都沒有受過的平民，因為當時中國沒有後備軍人，新兵都是臨時徵集的平民），又沒有堅固的陣地防線可守。

不過口口聲聲決定要殉城的唐生智，其南京的防衛計劃，真是過於草率，只有簡單地將兵力分成外圍與城牆的守備作戰，完全沒有防守作戰的陣地縱深編組，也沒有預備隊可以運用，更別提後勤支援與主動出擊了。

面對日軍勢如猛虎出柙的攻擊，唐生智一再發表「悲壯」的共存亡演說，他的表現，不像是衛戍司令，反而像是要慷慨就義的烈士。唐生智根本不去設法解決守軍所面對的各種作戰問題，只想反正大家一起死，造成守軍只有抱著與陣地共存亡的烈士信念，進行呆板死守的作戰任務，而沒有戰士迎敵的準備與應變措施。而最為危險的，就是唐生智與衛戍司令部，根本沒有進行在必要時，任何有關撤退的參謀作業，部隊指揮官與所有參戰的軍人，也沒有進行萬一奉命撤退之時，必要的安排與準備。

²很奇怪的是，當年南京防衛演習，是以南京外圍的國防線做為戰鬥重點，但是在淞滬會戰之時，竟然沒有人想到去視察一下這些防線，也沒有進行軍事作戰佈署的準備，以致造成原先的南京外圍作戰構想，完全的落空。

23.5 日軍對南京進行全面攻勢

當時日本的華中方面軍，除了派一〇一師團在上海警戒，抽調第十一師團與台灣旅團到台灣集結，準備攻打廣州，其餘的部隊，全都參與對南京的作戰，松井石根進攻南京的作戰計劃是，在正面是採取三路進攻，另外在南北進行大迂迴包抄的作戰，由上海派遣軍的第九師團、第十六師團，擔任對南京東北與正東的攻擊，第三、十一師團擔任助攻的預備隊；而第十軍的一一四師團與第六師團，擔任對南京的南面攻擊。這兩支日軍從太湖的南北兩岸，同步對南京發動攻擊，空軍與海軍加入助攻，日軍的十八師團與國崎支隊，更先期進行迂迴攻擊。日軍部隊沿著長江北岸包抄浦口，以及直撲安徽的蕪湖，先對南京外圍，已經形成包圍的態勢。

正當華中方面軍完成對南京的攻擊佈陣之時，日本大本營突然發表人事命令，免除松井石根大將兼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職務，而由朝香宮親王鳩彥王中將出任，這樣就架空了松井石根直接控制軍隊行動的權力，鳩彥王匆促地走馬上任，對於部隊更是缺乏管制的的能力，爲了表現出十足的「親王官威」，他對於日軍下達相當放縱的作戰命令。

松井石根此時又因爲肺病復發，是在病床上指揮作戰的，更增加了日軍的將校，各自爲政彼此競爭而不受約束的態勢。而奉命攻擊南京的日本軍隊，早已繞過太湖兩岸，逼進到南京城外圍的攻擊發起線了。這些擁有絕對優勢戰力的日軍，在五天之內，就勢如破竹地攻到南京城外圍，南京已經開始遭到三面包圍攻擊之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日軍進一步的由南京外圍防線，攻到南京城邊，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守軍已無戰力，因此他決定給與南京守軍一個投降的機會，要求唐生智在十日與日軍接洽棄城的投降計劃，表面上是不希望南京受到炮火的摧毀，其實是希望公開展示中國軍隊在南京不戰而降的恥辱，以動搖中國繼續抗戰的意志。但是唐生智既然決心準備死守，當然拒絕日軍的招降，爲了表現自己的決心，唐生智下令守軍集中控制所有的渡江船隻，準備進行全軍殉城的背水一戰。於是松井石根下令日軍，以最猛烈的炮火，進行全面攻擊，務必在最短時間之內攻下南京。

23.6 南京守衛佈置失當

勉強拼湊而成的南京衛戍部隊，既缺後勤支援，又沒有充裕的作戰兵力，面對日軍的絕對優勢攻擊，仍然盡全力死守反擊，在紫金山、雨花台、湯山與中山陵一帶的奮勇作戰，使得日軍遭到相當程度的傷亡。不過這種武器與工事都不足的死守作戰，只能激怒志在必得的日軍、遲滯日軍攻擊得手的時間而已。唐生智既不准守軍主動出擊，又沒有縱深陣地的佈署，更沒有掌握預備隊以進行逆襲作戰，只讓部隊死守陣地，而尋求壯烈地的犧牲。激烈的戰事進行到十二日，劣勢的守軍陣地就多處遭日軍突破，由於沒有預備隊的逆襲支援，陣地出現了混亂殘破的現象，大量的傷患根本無人後送醫療，通訊與後勤系統更是亂成一團。

這時候蔣介石也知道南京的防衛作戰已經非常的危急，於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先通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以電話命令唐生智從南京撤退，接著蔣介石還不放心，親自連下兩道手令，要求唐生智相機率軍撤出南京，以免守軍全遭覆滅。但是原本表態要決心死守的唐生智，在接到事關部隊生死存亡的重大撤退命令之後，卻沒有即時地進行撤軍參謀作業，一直拖到十二日下午五時，才匆促召開衛戍軍事會議，軍情被延誤了超過二十四小時。這個重大的錯誤，是造成南京的撤退行動出現嚴重混亂的主因之一。

在這場臨時的衛戍軍事首長會議中，有些部隊的指揮官，未能出席會議，唐生智突然宣佈奉命撤退，真是令大部分的將領都感到事出突然，在倉促的狀況之下，根本難以掌握局面與行動的變化。唐生智還要求所有與會將領共同副署撤退命令，以分擔責任。而撤退令原本規劃只有司令部直屬部隊與三十六師直接渡江撤退，其他負責城防的部隊，則各自掌握突圍的方式後撤；至於撤退之前，如何破壞重要軍政設施，更是缺乏完整的計畫。

但是在會議最後下達結論時，唐生智突然又做出表示，假如突圍撤退有困難的部隊，也可以設法渡江撤退，但他完全沒有計算過渡江船隻的運輸能力。其實撤退的參謀作業要比進攻更為精細，才能順利完成任務，因此唐生智如此拖延與草率地下令撤軍，自己又率先倉皇地離開司令部，無法掌握與各個部隊繼續的通訊，結果造成了南京守軍陷入撤退的混亂之中。

在宣佈撤退命令之後，司令部的守軍匆促與草率地破壞南京城內主要的建築物，但是由於根本缺乏完整的計畫，像全國最大的金陵兵工廠，中央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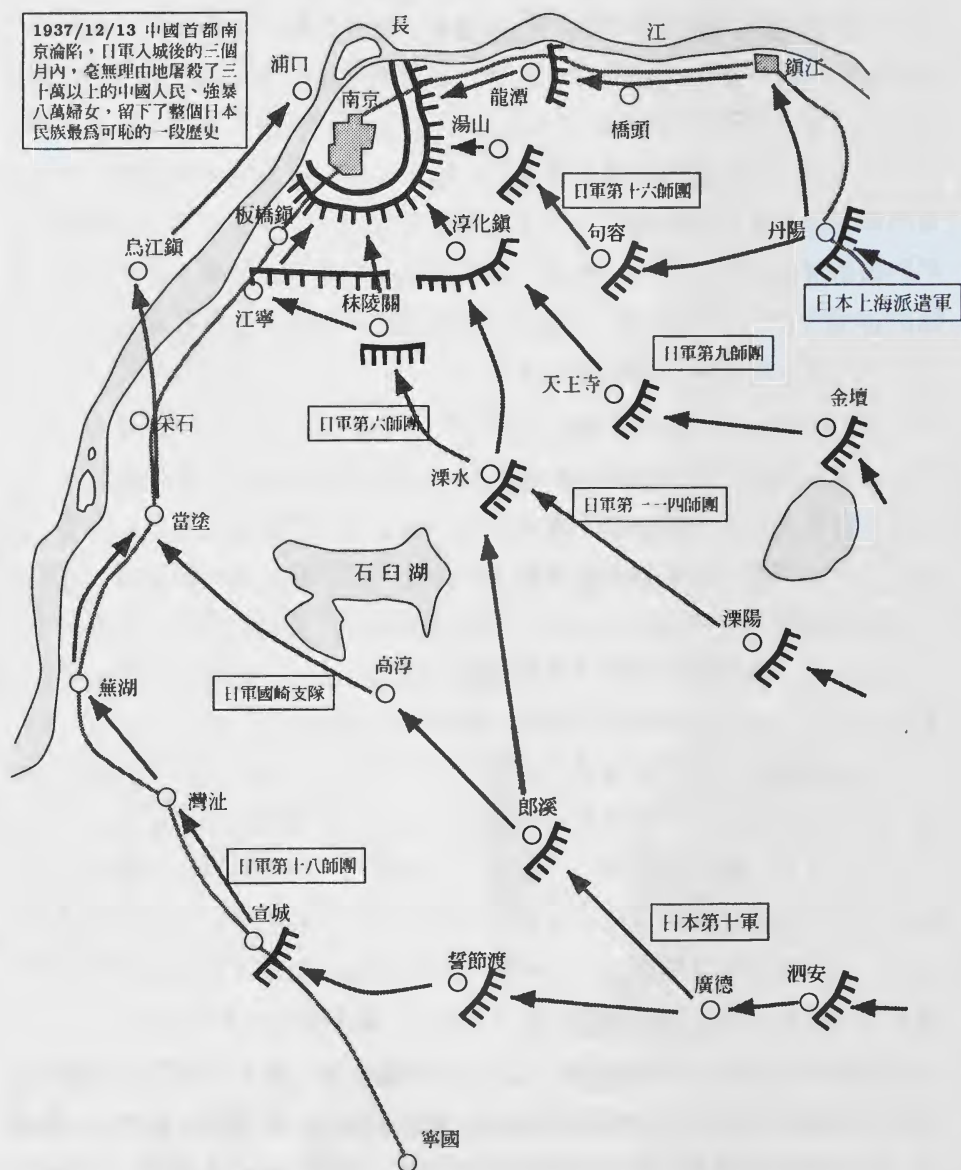


圖 23.1: 南京保衛戰要圖

府的各個部會建築，就完整地留給日軍接收。十二日入夜之後，南京城內火光衝天、濃煙密佈，這時候已經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經出現撤退前人心渙散的亂象。此時唐生智的意志已經動搖，並沒有監督設備的破壞與管制部隊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關渡江。

守衛南京的部隊在主帥提前失去連繫的狀況下，只有各自為政，有些部隊還不知道已經下令撤退，有些部隊則出現潰散的情況，這是撤退時最大的禁忌，沒有統一、完整的計畫與步驟，會造成部隊退卻的全面失控。因此除了六六軍（軍長葉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圍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軍與逃難的人民，開始大量盲目的湧向下關。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隻已被集中管理，唐生智「忘了」解除這道命令，而且在對岸的中國守軍，還奉命對於渡江的船隻是「格殺勿論」，唐生智撤退時又沒有下令解禁。因此江邊湧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隊，渡江的船隻當然嚴重不足，造成現場是一團混亂，在日軍的追擊炸射之下，中國部隊自相踐踏而死傷狼藉。

23.7 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

十二日夜間，日軍已經發現華軍的陣地動搖，南京城內起火，以及抵抗力量的渙散，因此知道中國軍隊已經決定棄城撤退。日軍一方面準備大軍進城的攻擊，一方面則是飛報東京日皇，表示華中方面軍隨時將會攻佔南京。這消息傳出之後，日本舉國歡騰，台灣的皇民更是被迫徹夜不眠，要為皇軍攻佔「支那」首都的歷史時刻，舉行提燈遊行發表忘我的效忠。

從十三日凌晨開始，日軍就正式攻入南京城的街道，一面掃蕩「殘敗軍」，一面就開始不分對象地燒殺擄掠，其景象之殘忍恐怖，有如世界末日的臨到。但是在日本東京的皇宮之前，卻出現了八十萬日本人聚集的慶祝大會，日本人民載歌載舞地熱烈慶祝日軍攻佔了中國首都，這是日本國兩千六百年來，想都不敢想的「偉大」時刻，日本政府認為，既然攻佔南京，這回中國除了投降屈服之外，已經不可能再有作戰與抵抗的意志了。

事實上，在日軍正式進入南京之前，中國軍隊已經奉命撤退，而停止有組織的軍事抵抗，更沒有展開全面浴血的巷戰，照理說南京應該不會遭到戰火嚴重地破壞，軍民的死傷也應該有限。但是日軍進入南京城時，所展現的空前殘暴行爲，幾乎是到了完全沒有人性、匪夷所思地步，許多外國外交與

慈善機構，都震驚於日軍可怕的暴行，留下了大量的歷史現場記錄。

當時華中方面軍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竟然無力管束部屬；上海派遣軍的司令官鳩王彥中將，根本就故意放手讓部屬「大幹一番」；第十軍的柳川平助中將，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日軍在南京的十幾萬部隊，竟然只配屬一百多人負責軍紀的憲兵部隊。因此從指揮官，師團長，一直到所有的士官兵，或是以命令指示，或是放縱的方式，讓日軍盡情表達他們對於南京中國人民的殘忍與踐踏，好像只有表現這種禽獸般的超級暴虐行徑，才能展現日本軍力的優越性，與能夠震懾住中國人的反抗意志，發洩與扭轉日本二千多年來對於中國的自卑心理。

審視日軍對於整個南京燒殺擄掠的事實記錄，就清楚知道，並非只在剛剛入城之時的那幾天，因為軍隊交戰而出現失控與誤殺的局面。事實上，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華中方面軍招待記者，舉行日軍正式征服南京的盛大儀式之後，日軍照理已經完全控制了南京，軍紀與秩序應該可以恢復了。但是日軍在南京這種對於平民毫無人性與軍紀的燒殺，仍有如瘟疫繼續地蔓延，並主要由擔任南京警備部隊的日軍十六師團進行。十六師團對於南京平民繼續地殘殺施暴，竟然一直延長了三個月左右！直到松井石根等將領被調回日本，日軍大本營乾脆撤消華中方面軍、上海派遣軍以及第十軍的戰鬥序列之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才稍為有所收斂。

因此，日軍在南京的屠殺暴行，既非是浴血巷戰所產生的傷亡（因為根本沒有組織性的巷戰），也不是少數軍紀失控日本軍人的個別放縱行為（是遍及整個南京城內外，以及延長達三個月），根本就是日軍從上到下、絕對是故意放縱的禽獸行為，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殺」，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日軍的這些禽獸行為進行辯護。面對日軍在南京軍紀完全失控的危機，日軍大本營最後被迫徹底撤除整個華中方面軍所有的戰鬥序列之後，才得以控制住³。

根據事後的統計，總共超過三十萬以上的中國軍民（這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在南京被屠殺，八萬婦女遭到強暴，所有南京的文物與財產，完全被日軍劫掠一空，其中以日本第十軍的第六師團（谷壽夫）、上海派遣軍的第十六師團（中島今朝吾），在師團長的鼓勵與縱容之下，在南京留下人類

³這是日軍大本營最為離奇的做法，竟然將這支擁有攻佔南京之特殊歷史光榮的日軍戰鬥序列部隊，完全加以撤除。這一點就充分地暗示，日軍大本營其實清楚知道，這支部隊，犯下了無可饒恕的歷史罪行。

歷史上，最為恐怖以及無法原諒的屠殺記錄。雖然日軍這些將領，都在戰後的東京與南京戰犯審判中，遭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壽夫全都被判死刑），但是當時負有重大指揮責任的鳩彥王卻被美國因政治理由，故意地被放過。

因此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上千真萬確的恐怖歷史事件，有無數的人證與事證，經過國際社會的「東京大審」與中國政府的「南京審判」所確定，絕對是鐵證如山，也絕對沒有任何可以原諒與辯護的藉口。它是日本對於中國侵略暴行的一個巔峰的濃縮記錄，也是人類歷史中，不能忘記的暴行記錄。在中國的首都南京，日本軍人曾經從上到下地犯下集體屠殺、強暴與劫掠的暴行，日本至今不願面對這個歷史，日本就沒有資格成爲人類社會中的一員，因爲否認這種歷史上千真萬確的暴行，就是否定了對人性最基本的尊重，是絕對毫無人性認同的做法。

23.8 日軍戰術成功但政略徹底失敗

在南京保衛戰之中，日軍進攻戰術的運用可以說是相當地成功，前線作戰部隊不待繼續進軍的命令，就已經掌握戰場的先機，以獨斷的方式，搶先尾隨追擊中國部隊，空軍飛機更是不斷炸射，讓中國的部隊無法進入防禦陣地，也無法整編與恢復有組織的作戰。接著在發動全面攻擊時，更是多路齊進，海空進行協同作戰，日軍以強大的軍力進行中央突破，同時派遣快速部隊對南京外圍進行迂迴地包抄。日軍攻擊南京的前線部隊，無論是戰場反應，以及戰術的應用，都可說是達到一流的水準，也就造成在日軍正式發動攻擊的十三天之內，就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

但是在政略的層面而言，日本進攻南京，卻犯下了重大的錯誤。這場作戰是由前線的部隊引導整個戰爭的發展，大本營只能跟著追認而已。事實上，原先日本的戰略設計，是希望能夠藉著戰爭的打擊，來逼中國讓步與屈服，成爲支援日本大東亞戰爭的「保護國」，而非要全面佔領與滅亡中國。因爲日本真正要準備決戰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蘇聯，所以日軍大本營原來並無進攻南京的作戰計畫。但是在前線軍隊的請戰壓力之下，大本營卻被迫放棄原則，支持進攻南京的行動。而在日軍攻佔南京之後，統帥更無法阻止部隊縱兵大掠南京，這種不給中國留下和談餘地，硬要攻陷中國首都南京，

並且展開空前殘酷的屠殺與擄掠的做法，當然是讓國民政府，絕對不可能與日本以和談來解決兩國的戰爭了。日本進攻南京之「失控作戰」，犯了日本想要迅速結束戰爭的政略與戰略的大忌。

原本日本政府所提的和談條件，在十二月二日由蔣介石所召開的高級軍事首長會議之中，幾乎得到與會所有人的同意，認為可以一試，以紓解中國所受到的戰場挫敗。因為中國當時急需進口武器、訓練新兵，與重新佈陣的時間，因此國民政府轉告負責和談調停的德國大使陶德曼，中國願意在這個原則下，與日本進行和談。但是由於日軍快速地攻佔南京之後，日本軍部的立場出現了極大的變化，軍部認為中國首都已被攻克，中國已無和談的籌碼，因此立刻推翻了原先和談的條件，增加了中國無法接受的條款。而日軍在南京的空前暴行，更是造成中國政府方面，無法與日本進行談判的壓力。如此一來，中國政府根本不能與日軍停戰，中國人民也不可能支持和談。

所以日本攻佔中國首都，以及對中國人民所施行的殘暴行爲，不但不能達成速戰速決的目的，反而使得中日戰爭無限地延長，這是日本侵略中國之整個戰略的危機所在。日本開始不知如何結束中日戰爭，只有將有限的戰力逐漸地消耗在中國的戰略空間之中，因而它就越發感到自己在對美、蘇大決戰之準備上的不足，最後日本只能以先發制人的方式突擊美國，鋌而走險地掀起太平洋戰爭，而最終戰敗亡國。這種由前線部隊主導整個戰爭決策的方式，終於成爲日本整個戰略佈局的致命傷了。

23.9 中國決心繼續作戰到底

而蔣介石堅持防守南京的主張，原來也是政略的考慮優於作戰的考量。唐生智已在蔣介石身邊多年，參與諸多重要的軍政決策，而臨危出任沒有人願意接的重任，當然是有其個人的勇氣與決心。但是唐生智過度強調「犧牲殉國」的作戰指導原則，根本就不符合國家之持久抗日的戰略指導原則，也不符合當時戰場作戰的需要。當時抗日作戰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設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戰力，以達到維持長期作戰的目標。唐生智叫疲弱的華軍，在臨時的防禦工事內，採取極爲僵化與呆板的死守，既不准主動出擊以擾亂日軍的攻勢佈署，又沒有掌控預備隊進行防禦決戰，兵力原本已經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廣，當然容易讓日軍攻破防線。

唐生智這種沒有戰略考量的戰場佈署，實在是軍事才能極差的表現。而部隊撤退沒有事先詳細的安排，全城撤退與破壞重要設施的規劃又不周密，更顯出他軍事指揮能力不足的問題。而唐生智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後，還猶豫觀望，坐失安排撤退的良機，等到局勢已亂，自己卻草率慌亂地先行逃走，完全與部隊失去連繫的管道，這些都是造成南京撤退混亂的原因。至於唐生智本人狼狽地丟棄部隊而離去的責任，蔣介石在事後並沒有特別追究。

南京的背水陣式，並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糧足，是可以一戰的，當年太平天國就苦守南京達五年之久。而在淞滬會戰之後，殘破的華軍極待整補，因此很難再打出精彩的保衛戰。唐生智肯臨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與體力都不足以擔當這個責任，雖然這場戰爭，無論如何都是要以失敗收場的，不過唐生智過於偏重「殉城」的戰法，沒有想到適當保持全軍的戰力才是中國抗日戰略的根本指導原則。

當時南京的防衛計劃，應該先有靈活的佈署，提前以小部隊出擊，讓日軍過早展開攻擊陣式，以減輕攻擊集中的力道，然後佈署縱深防衛的部隊，更要有足夠的預備隊可以進行逆襲。特別是對於撤退的方式與路線，以及必須破壞的重要建築與裝備，都要事先詳細規劃，這樣南京保衛戰就不至於落到最後慌亂失控的地步。

日軍攻佔了南京，並且以無法想像的殘忍手法來對付中國的軍民，但這種歷史上空前的暴行，不僅無法屈服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爲激起整個中國民族的悲憤。中國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國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流光最後一滴鮮血，也絕對不會對侵略者屈服與投降。雖然首都被日軍攻佔了，但是中國仍然決定繼續作戰下去，日軍內部則必須立刻面對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實，最後日本還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國的戰略陷阱之中。

對於蔣介石而言，抗日的戰略已非常地明顯，中國可以丟掉首都，但是中國不會停止抗日，中國將繼續引誘日軍深入其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即使這代表著更多的中國軍民要犧牲，更多的領土遭到摧殘與佔領，但是中國決心抗日到底。

千鈞一髮的台兒莊大捷

從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軍第十師團進攻到台兒莊陣地，進行到四月七日，日軍整個潰敗退出台兒莊為止，總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戰。中、日兩軍在台兒莊及附近的陣地之中，進行多重包圍與反包圍的廝殺，在台兒莊內，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門、逐窗的戰鬥，日軍幾度增援，曾經控制了台兒莊四分之三的地區，並且一度準備渡過運河，衝向徐州，但是華軍拼死不退，孫連仲將軍親自下令守城的部隊，即使全員戰死，也絕對不能撤退。同時他也將司令部移往前線，表示必要時自己與司令部也將投入戰場作戰。

徐州，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地緣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兵家必爭之地，它位於華北與華中之間的交通樞紐，也是從黃海進入中原地區的孔道。當時的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在此交會，大運河也在附近穿過。戰前，蔣介石在德國顧問建議之下，曾在徐州附近構築國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大戰開始後，日本卻猶豫著，是否要進攻徐州。因為日軍在攻佔中國首都南京，以及華北的各個重鎮之後，在戰場上失利的中國政府，不但沒有屈服或是發生內訌，反而決心繼續抗戰到底。日本經過半年的征戰，付出重大傷亡的代價，但仍然不能結束中國事變，因此日政府本身已面臨嚴重的政治動盪，根本無法做

出重大之軍政決策。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軍部並沒有進攻徐州的具體計畫，並不是日本認為徐州的戰略地位不夠重要，而是日軍大本營當時還不想陷入中國寬闊戰略空間的泥淖中。可是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卻有進一步深入作戰的強烈企圖心，希望軍部能夠批准它全力出擊的願望。華北方面軍希望大本營能增加其兵力，讓它出動大軍，沿平漢線從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漢，以切斷中國東西兩部的聯繫。否則至少要攻佔徐州，打通津浦線，以聯絡華北與華中的日軍佔領區。因此華北方面軍，對於中日全面大戰之後的戰局發展，曾經有著極強的企圖心與極大的失落感。

原先華北方面軍以為，中日的決戰，將在河北爆發，方面軍有充足的準備，可以徹底地圍殲華軍，一舉迫使中國屈服。但是蔣介石卻把決戰地點，移到華東，讓華中方面軍揀到決戰的機會，並且攻佔中國首都南京。而華北方面軍不但連助攻的機會都沒有，還要抽調兩個半師團去支援華中方面軍作戰。本來華北方面軍還想有些戰場的表現，不料一個防蘇作戰的待命指令，更讓華北方面軍毫無發揮的餘地。寺內壽一大將眼睜睜看著華中方面軍，獲得重大勝利與榮譽，因此是越發按捺不住，於是向大本營力陳華北方面軍準備深入中國的作戰構想。

24.1 會戰前日本軍方的戰略構想

但是當時在日本的大本營中，仍然有著中日戰爭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不擴大派認為，日本已經攻佔了中國的內蒙與華北大部分地區，同時控制了中國的長江三角洲，中國最為精華的地區與戰略重鎮，都在日軍的手中。但是日軍規模已經擴大了三倍，同時將九〇%以上的軍力，都投入了中國戰場（包括關東軍在內），若要繼續深入中國，開闢新的作戰目標，那麼日本真的已經有些難以為繼的壓力。

假如日本還要保持軍力對付美蘇的話，日本在中國的作戰，必須要適可而止，至少要暫時按兵不動，等待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然後再設法解決與中國的戰爭問題，因此是絕對不宜再攻徐州。此外不擴大派認為，就算是日軍能夠攻佔徐州，打通津浦鐵路以連接北平與南京，不但在控制中國的力量上，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駐守鐵路沿線，造成日軍戰力進一步陷入中

國的泥淖之中。日軍若是真要在中國進行南北相連，還不如使用海運，既安全又低廉。

但是日軍擴大派的意見是，經過華東與華北一系列的戰爭，中國的軍力與工業能力均已殘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幾個聯隊」的兵力，追擊掃蕩戰場上潰退的華軍，中國就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佔徐州，打通津浦鐵路，是必要的戰場鞏固與掃蕩。更何況攻佔徐州，也有利於日軍沿隴海鐵路與淮河流域，深入威脅中國的戰略中心武漢。當然照例的是，兩派的爭論仍沒有結論。

由於日本華中方面軍的上海之戰，的確打得傷痕纍纍，而攻佔南京，又發生狂暴失控大屠殺的嚴重軍紀問題，因此華中方面軍，對於進一步的進攻中國，暫時已經有些氣餒。何況日本大本營正在秘密調查華中方面軍，在南京屠殺的軍紀責任與問題，所以華中方面軍對於進攻徐州，甚至是武漢等目標，暫時都缺乏積極的興趣。

軍部中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以及華北方面軍與華中方面軍對於繼續深入中國作戰，各持不同的立場與看法，使得日本大本營感到問題嚴重與無所適從。於是在一月十一日特別召開御前會議，會中決定在軍事上，暫時停止擴大在中國的作戰規模，日軍大本營指示華北方面軍攻克濟南、青島之後，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線即可；華中方面軍則攻克南京、蕪湖之後，只能擴大江北的防衛圈；日軍在中國戰場，沒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戰線的擴張。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國內部因為戰力與國力的受創，會導至中國的內鬥，甚至會將蔣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最好暫時等待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

24.2 中國決定誘敵深入

在中國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第一個最為低迷的危機時刻。因為在華北與華東雙線的戰場上，中國是以血戰力拼的方式，勉強得到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中國在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的五個月之後，仍然堅決地抵抗下去，並沒有在三個月內向日本屈膝，的確是叫國際社會為之驚訝，同時日本付出了十幾萬兵員傷亡的代價，以及幾十億元戰費的支出。中日之戰對於日本的人員與財物的耗損，已經超過了日俄戰爭。

但是同樣的是，在中國方面更付出了極其沈重的代價，中國北起內蒙的包頭，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濟南、青島，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鎮，都被日軍所佔領了。而中國政府主要的工業基地與對外經貿的口岸，都被日軍攻佔，影響到中國主要的財政收入關稅與鹽稅，都失去了主要的來源。在軍事方面，大部分擁有較為現代化裝備的中央軍以及地方精銳部隊，也都受到非常嚴重的耗損，需要進行大量的整補。

因此，根據熟悉中國軍事最高機密與內情的德國軍事顧問福爾肯豪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國軍隊裝備能夠得到補充，那麼他認為中國勉強可以再支持六個月，他建議蔣介石應該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而陶德曼大使對中國戰力的估計，比福爾肯豪森還要悲觀。美國的情報估計，認為中國的後勤支援，最多只有四個月而已。當時外國駐華的情報與軍事人員，也都預期，國民政府即將承認失敗事實，而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

但日本沒有想到，蔣介石居然會回絕日本的和談條件，因此日方在盛怒之餘，乾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了不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進行任何交涉的正式聲明。日本政府的意思是非常明顯，就是假如中國要想與日本談和，那麼中國內部必須先將蔣介石推翻。日本爲了坐待這個時機的蘊釀與來到，因此舉行大本營的御前會議，會中決定暫時按兵不動，看中國方面將由誰出來收拾殘局¹。

但是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可沈不住氣了，特別是西尾壽造所統帥的第二軍，更是覺得不滿，因爲原先華北方面軍認爲與華軍決戰的重點，應該是在第一軍主攻的平漢鐵路沿線，因此在津浦鐵路作戰的日本第二軍，是負責右翼的助攻與合圍。不過由於華軍主力沒有在平漢鐵路集結，日本第二軍就沒有機會展現戰力，而更爲意外的是，由於山西的戰局擴大發展，造成日本第一軍的主力進入山西，協助第五師團作戰，第二軍就成爲方面軍的掌控的預備隊兵力，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地攻擊華軍，只能停留在黃河以北地區待命戰備，防範蘇聯可能會對日軍的進攻。

直到華中方面軍順利地攻佔南京，冬季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亞的交通，蘇聯軍隊並未出現集結的威脅，這樣日本的第二軍才解除預備隊的待命狀態，因此西尾壽造要求華北方面軍允許第二軍，進攻山東半島。而在日本原先的

¹事實上，國民政府穩如泰山的指揮抗戰，反而是日本政府政潮洶湧。

對華作戰計劃中，攻占山東半島，也是一個主要的戰略目標，因為山東半島離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又與滿州國的遼東半島遙遙相望，是防蘇的戰略縱深要地。事實上，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國在山東半島所有的利益，這次日本絕對不能放過對山東的佔領。

24.3 韓復榘不戰而棄守山東

所以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寺內壽一，要求大本營准許華北方面軍，渡過黃河，進攻山東半島。大本營看到華中作戰目標已經接近達成，蘇聯軍隊又沒有集結的活動，於是准許寺內壽一派遣華北方面軍，渡過黃河進攻山東半島。於是寺內壽一下令第二軍西尾壽造，指揮日本的兩支鋼軍——第五、與十師團越過黃河，進攻山東。當時指揮第五師團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揮第十師團的是磯谷廉介，兩人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交情深厚，又愛互爭鋒芒。這兩支日軍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過黃河，順利地進入山東。

當時中國方面在山東最高的軍政長官，是前西北軍中首席戰將韓復榘，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戰爆發之前，背叛西北軍而投效中央，由於韓擁有強大的兵力，因此國民政府就地招安，讓韓出任山東的最高軍政首長。韓復榘擁兵自重，日本又把山東視為國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預的地區，所以山東可以說是處在半獨立的狀態，政策立場經常遊走在日本與國民政府之間。經過多年的經營，韓復榘已經累積了可觀的實力，這時他出任中國第五戰區的副司令長官，以及第三集團軍的總司令，統率三個軍的兵力，待命防守山東。

本來韓復榘對於國民政府的號令，就是經常採取應付與利用的立場，他一直不脫軍閥割據的心態，他認為無論中日之戰的結果如何、是由誰當政，自己擁有實力才是最為重要，因此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他盡量地設法保持實力，以坐山觀虎鬥的心態，避免捲入戰端，只在河北山東交界的地區，對日軍進行過側擊，得手之後立刻又退兵。

在韓看來，蔣介石在華北失去了河北與山西，在華中失去京滬地區，中央軍的精銳部隊幾乎耗盡，這正是自己保存實力，在關鍵的變局，發揮權力制衡的重要時刻，因此韓並不積極地在山東進行佈防備戰，反而是在山東進行大量地搜括，將可以帶走的各種資產，全都先運往河南的南陽，然後自己

指揮部隊，一路退卻並待機而動。

日軍在十二月中旬開始對山東發動攻勢，韓復榘未經抵抗就下令部隊後撤，使得日軍如入無人之地而順利地渡過黃河，由於韓復榘自動不戰而退，日軍在無抵抗狀態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順利佔領濟南。西尾下令日軍第五師團沿膠濟鐵路，急攻煙台與青島，日本的海軍陸戰隊也在青島登陸夾擊，而第十師團沿津浦鐵路南下，追擊韓復榘撤退的主力部隊，因而指向魯南，左右形成一個鉗形攻勢，逐漸逼進徐州以北。

雖然韓復榘一再接到第五戰區李宗仁的軍令，甚至軍委會蔣介石的急電，要求韓務必在津浦路沿線的戰略要地，進行防禦作戰，絕對不可不戰而退。但是韓復榘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地不戰而退，讓日軍喜出望外而一路追趕，因此在山東作戰的日軍都認為，中國軍隊的戰鬥意志已經崩潰，蔣介石失去了號令部隊作戰的權威。

韓復榘公然地違抗軍令，大搖大擺地率軍大撤退，造成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震怒與恐慌。因為韓抗命完全不予抵抗，就讓日軍輕易地就穿過山東全境，直逼第五戰區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韓復榘這種公開抗命的行爲，李宗仁如何還能指揮第五戰區的其他部隊作戰？

而蔣介石也看到韓復榘的這種作法，會造成整個中國軍隊的抗日意志瓦解，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開封召開緊急的戰區軍事首長會議，決定以軍法審判韓復榘，由軍統局幹員在會場逮捕韓復榘，送到武昌進行軍事審判，結果以抗命與率軍逃亡罪槍決韓復榘。這個果決的行動，重振了低迷的軍心與士氣。（韓復榘在法庭上大膽抗辯，丟掉濟南有什麼罪？蔣介石不也丟掉南京，幸好蔣介石在極端不利的狀況下，仍然在南京佈陣迎敵，否則假如蔣不戰而棄守南京，別說韓不服，其他各路諸侯都有樣學樣，蔣介石何以號召軍民，繼續抗日？）

雖然韓復榘連續不戰而退，使得日軍順利地深入魯南，兵鋒直接威脅徐州，日軍的大本營卻嚴令華北方面軍，不得越過臨城、棗莊與臨沂的制令線（剛好在台兒莊北面）。但是一路勢如破竹、深入魯南的第五與第十師團，卻恨不得一舉直搗徐州，攻佔第五戰區指揮部。日軍根本就不相信華軍會認真地反抗，更別提是否會發生孤軍深入，而受到華軍包圍的問題。不過他們一時也不敢公然地違背日軍大本營的軍令，只有在魯南暫時勒兵觀望。

24.4 第五戰區的戰略佈署

這時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確有其膽識過人之處，因為華軍在南京撤守之後，戰力與士氣都處於低潮時刻，戰區內受李宗仁指揮的，只是一些裝備與戰力都低的地方部隊而已。不過在蔣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將領的建議，以軍法處決韓復榘，將山東的部隊交給孫桐萱指揮之後，李決定運用戰區內的軍隊，採取主動反擊、南守北打的戰略指導方針，這樣才能誘使日軍陷入戰略被動的狀態，而讓中國部隊能夠恢復作戰意志。

特別是中國再生戰力恢復之快，也超乎所有軍事專家的估計。孔祥熙在歐洲的活動，大有成效，他成功地爭取到歐美民生用品與軍火供應合約，並且在國際軍火市場中，也買到大量的裝備，令千方百計要想切斷中國外援的日本政府，為之氣結。加上蘇聯適時地賣給了中國軍火與空軍飛機，這些支持作戰與民生的物資，設法運到香港、湛江、河內、新疆，然後集中到武漢，再轉運到中國的各個戰區，開始補充中國部隊作戰所需的裝備。而中國內部也開始搬遷一部分的軍火與民生用品工廠等設備，到大西南的抗戰基地，進行生產，此時購自歐洲以及來自蘇聯的作戰飛機，也很快的成軍作戰。只是當時中國的財力有限，各種作戰所需的裝備與補給，在數量上仍然難以滿足實際的需要。

而從京滬戰場退到安徽與江西的華軍部隊，雖然重裝備全失，人員死傷的數目也很大，但是這些部隊仍然保持著極強的民族主義精神，並且誓為戰死的戰友復仇，因此以極其克難的精神，開始重新地設法恢復戰力。蔣介石與德國軍事顧問對於華軍的作戰方式，提出改進的措施，要求華軍的作戰，必須盡量地機動與靈活，減少與日軍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國寬闊的戰略空間，進行後退包圍的作戰方式，並且為了增加日軍維護補給線的沈重負擔，各種的敵後游擊戰，更是開始有系統地展開。

這時蔣介石不願日軍就此盤據華北與華東的精華區，而要準備繼續誘敵深入，以進一步消耗與分散日軍的戰力。蔣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將日軍的主力，朝向津浦鐵路方向吸引移動，是可分散日軍的兵力，並且增加武漢地區部隊的防衛與整編時間，因此蔣介石下令第五戰區部隊，對於在山東的日軍，進行一系列的反擊戰，同時設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線，以南守北攻的戰略，來因應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戰局。

由於日本華中派遣軍在京滬會戰中的戰力消耗極大，同時又因軍紀問題，正在面臨改組的命運，因此對於繼續深入攻擊中國軍隊的意願不高，不過在攻佔南京之後，基於守江必須先守淮的戰略觀點，派出第十三師團，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掃蕩淮河以南的華軍。北上的日軍在渡過明光河之後，就遭到李宗仁指揮的廣西與東北軍隊的逐次伏擊，與後退包圍的作戰。日軍第十三師團一路上遭到相當嚴重的損失，雖然最後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佔蚌埠，但是已經無力渡過淮河而繼續地北上。但是日軍十三師團遭到華軍頑強抵抗以及靈活反擊的情報，竟然沒有受到日軍指揮系統的重視，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指標，代表華軍的作戰意志仍然旺盛，同時作戰方法也大有改進。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營下令撤銷華中方面軍所有的戰鬥序列，包括上海派遣軍以及第十軍的組織，另外改設華中派遣軍，由畑俊六大將出任司令官。這代表大本營對於松井石根無法控制部隊的燒殺擄掠，嚴重敗壞日本軍紀的集體嚴懲，松井石根雖然立下擊潰上海華軍，以及攻克中國首都的大戰功，但是不但並未獲得高升與重用，反而從此退出現役，顯見日軍對於南京大屠殺是相當的知情的，甚至參與連戰鬥序列的番號，都予以撤銷，但是日軍大本營對於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將領，也無可奈何。

蔣介石眼看日本的華中部隊，正在遭到改組與整肅，因此判斷華中方面軍在短期內不可能會有重大的作戰任務，因此下令李宗仁，放膽地在北線的魯南地區，對日軍進行各種的反擊戰，以誘使華北方面軍大膽地輕進南下。這時在魯南的日本的第二軍，對於自己在華北戰場一直沒有機會充分地發揮戰功，加上它在進攻山東之後，華軍根本就不戰而退，因此日本第二軍顯出相當地焦躁與輕敵。

由於在山東的日軍部隊，一等地受到華軍反擊之下，遭到了不少的損失，自然怒不可遏，想要對華軍進行報復。因此第二軍旗下的第五與第十師團，要求華北方面軍允許他們向南攻擊華軍在魯南的基地。華北方面軍同意第二軍進攻掃蕩的建議，也認為日軍不能畫地自限而遭到華軍一再的反擊，因此向大本營爭取到給予第五與第十師團攻擊魯南的許可。不過大本營仍然劃出日軍南下的制令線，不得超過臨城到臨沂的前線，因此第五與第十師團在奉命出擊之後，立刻朝向徐州以北地區，形成左右兩翼的鉗形攻勢。

特別是日本第五師團在中國的戰場，可以說是悶了一肚子的惱火，從在

華北的南口之戰開始，經過平型關、忻口作戰，不但非常不順利，而且損失很大。就連進攻青島的任務，也落在海軍陸戰隊之後，造成日本的海、陸兩軍，差點沒有在青島爆發槍口相向的衝突，最後還是驚動了大本營，才擺平這場自家人的海、陸鬭牆之爭。加上第五師團還不斷地受到華軍的反擊而遭損失，因此在接到可以南進還擊的命令之後，立刻率軍往南猛攻，完全沒有考慮可能孤軍深入的危險。

24.5 臨沂序戰

李宗仁抓到日軍南攻的戰爭時機之後，立即派遣龐炳勳部在臨沂建立防禦陣地，以誘敵深入，先擋住日軍第五師團的正面攻擊，然後迅速調派張自忠將軍的第五十九軍，兼程馳援臨沂。張自忠治軍一向剛烈嚴明，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職期間，與日本人進行各種的周旋，曾受到不少的懷疑、批評與委屈，因此張自忠在從北平脫困，重新掌握兵權之後，對日作戰就特別地勇猛。

張自忠的援軍，以急行軍的速度趕到，有如從天而降般地猛攻日軍第五師團背側，龐部更是將士用命地從陣地反擊，日軍絕對沒有想到華軍竟然會進行這種內外夾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臨沂決戰中，日軍第五師團遭到極其慘重的損失（師團長板垣僅以身免，其私人物件都被華軍擄獲），造成日軍部隊已經無法繼續支撐作戰²，只有先撤退回莒縣以困守待援。

正當日軍第五師團因為大膽輕進，而在臨沂遭到華軍圍攻之時，日本的第十師團，也同時在左翼沿著津浦鐵路南下，形成對徐州的左翼攻勢，並牽制攻擊第五師團右翼的華軍。三月十四日，日軍第十師團先進攻滕縣。面對日軍左右呼應的鉗形攻勢，李宗仁所指揮的兵力有限，他優先將部隊東調救援臨沂，左翼西線只有急調川軍一二二師王銘章部在滕縣進行抵抗。李宗仁一方面急電蔣介石，請求派出駐在河南東部的中央軍湯恩伯第二十軍團，馳援華軍左翼，蔣介石立刻答應。

但是由於華軍的運動速度太慢，又被日軍阻擋在臨城，使得救援滕縣的

²當時多達一百多輛的日軍卡車，滿載陣亡的日軍屍首匆促地奔逃，但戰場上仍然遺留了不少的死屍。日軍一向非常重視同胞屍首的處理，不是危急到沒有辦法，通常都會設法帶回焚化，將骨灰帶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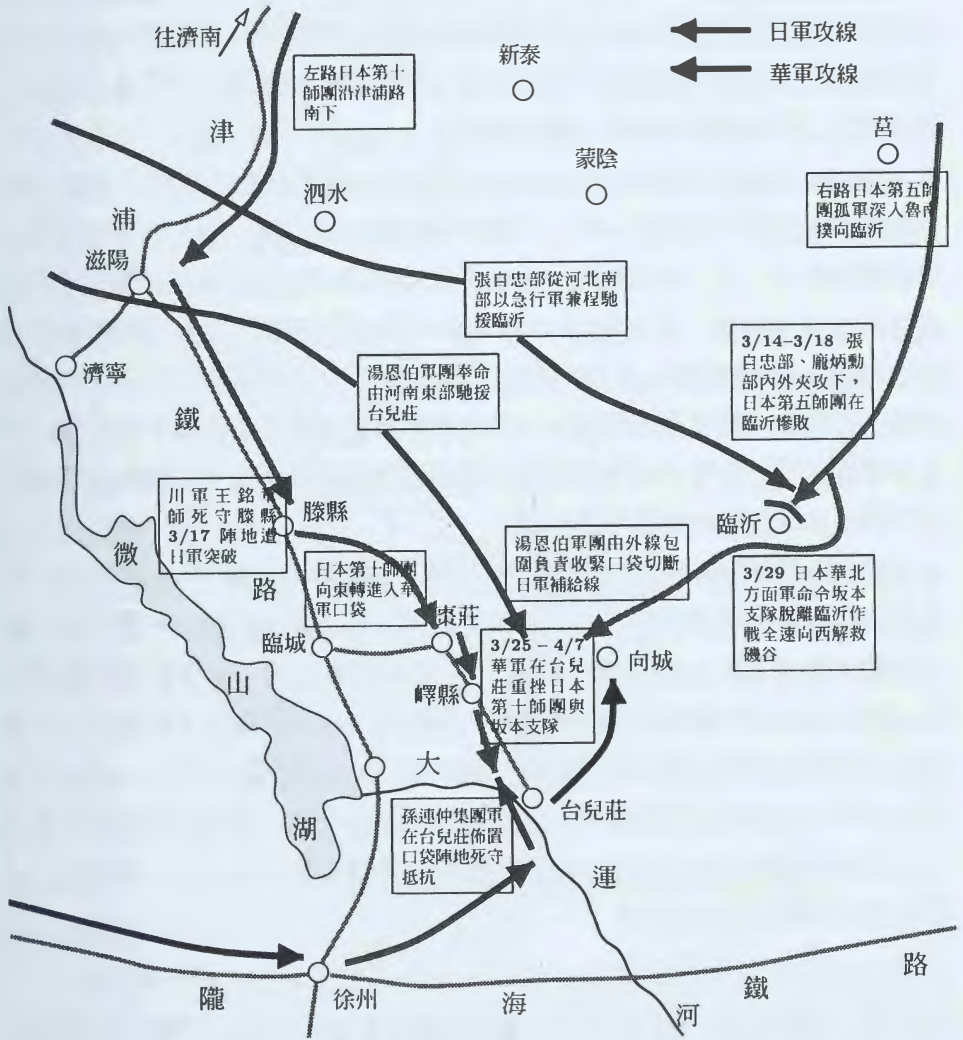


圖 24.1: 台兒莊會戰圖

時間還是遲了，王銘章部的川軍，無論在人數、裝備與火力，都與日軍相差過於懸殊，在遭到日本第十師團強大火力猛攻，以及空軍的協同攻擊之下，川軍奮勇血戰，但是被日軍優勢砲火猛轟，整個陣地化爲灰燼。三月十七日，陣地被日軍突破，師長王銘章力戰身亡。但是滕縣之戰，爲李宗仁的調兵遣將，爭取到寶貴的時間。這時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已經趕到徐州，立刻在徐州北部的台兒莊陣地，進行佈防，而湯恩伯的部隊，也渡過大運河，開始與南下的日本第十師團，進行接戰。

日軍第十師團的指揮官磯谷廉介中將，根本就不把華軍的兵力放在眼裡，他所率領的第十師團，是一支重裝備的機械化部隊，又擁有空軍協同支援作戰的能力，他在攻佔滕縣之後，又攻克臨城，這是日軍大本營給華北方面軍的南下禁制線。但是磯谷判斷李宗仁手邊的部隊不足，可以調動的部隊，已經先在右翼與板垣的第五師團纏上了，所以他決心大膽深入，越過臨城與棗莊前線，準備直搗徐州，一舉攻佔華軍第五戰區司令部，好爲自己建立一個顯赫無敵的戰功。所以他命令第十師團繼續全速南下，根本不接受大本營設給日軍在魯南作戰的制令線。

這時候，魯南戰局的重心，移到左翼³的津浦鐵路，磯谷的部隊原本可以沿著津浦鐵路，由濟寧南下，直接衝向徐州，但是磯谷在得知右翼的板垣部受到圍攻與重創，以及孫連仲部又在東邊的鐵路支線，向日軍發動誘敵攻擊，因此磯谷決定將部隊先向東旋轉，再順勢向南沿著鐵路支線攻擊，一方面可以減輕左翼第五師團的壓力，同時也可以繼續攻擊徐州。三月二十五日，日軍第十師團已經進攻到台兒莊的華軍陣地前緣。磯谷認爲日軍只要攻佔台兒莊，渡過運河，就可以直指中國的第五戰區司令部徐州，此時徐州已經可以聽到來自前線的砲聲了。

24.6 台兒莊血戰十三天重挫日軍

但是磯谷低估了孫連仲部作戰的韌性。第二集團軍從盧溝橋事變之後奉命馳援華北戰場，在與日軍幾次的大型接戰之中，都表現得可圈可點，在攻擊上，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是一支戰力旺盛的隊伍，在陣地防守上，更是會進行決死抵抗的部隊。因此李宗仁要求孫連仲部在台兒莊附近佈下袋形的防

³這裡的左、右翼都是對徐州中國守軍而言的。

禦陣地，以吸引日軍的攻勢，然後下令裝備與火力較佳的湯恩伯第二十軍團，在外圍進行運動戰，當日軍的攻勢在台兒莊受到阻擋之後，立即設法由外線進行包圍，攻擊日軍的背側，形成以內外夾攻的方式圍殲日軍。

當時孫連仲在台兒莊的口袋陣地的佈署，是以三十一師池峰城部，防守台兒莊主陣地，三十師與一一〇師在台兒莊以西、二七師與獨立四十四旅在台兒莊以東，分別建立陣地。這樣日軍一旦攻入台兒莊，就會陷入華軍的口袋陣地之中。此時，蔣介石也充分地掌握到這場作戰的重要性，於三月二十七日，親自率領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與高級參謀林蔚等將領，前往徐州視察戰局，並且設法調動所有能夠動用的中國部隊，前往徐州的第五戰區增援，準備給予孤軍深入魯南的日軍，一個重大的打擊。

由於白崇禧素以軍事謀略著稱，與李宗仁義結金蘭，李宗仁對他是言聽計從，白崇禧更曾是蔣介石北伐時的參謀長，幾次的指揮作戰，都建有奇功，因此有「小諸葛」的美譽，此時蔣介石看到戰場的需要，因此特別留白崇禧在第五戰區，襄助李宗仁指揮作戰，這使得李宗仁更是如虎添翼，士氣與信心大振。

這時過度自信的日軍，卻對於華軍在台兒莊的佈陣，缺乏真正的情報掌握，還以為只要日軍運用優勢火力狠打，華軍就會潰敗。蔣介石特別將剛剛到手的一五五公釐巨砲以及反坦克砲，運到台兒莊前線作戰，甚至出動空軍，炸射日軍——數量當然極其有限，巨砲只有九門而已，飛機也只出動了幾個架次——但是這對於華軍而言，幫助實在極大，因為華軍面對日軍優勢的火力與坦克的打擊，幾乎是束手無策的挨打，現在華軍有了可以讓日軍遭到壓制的火力，士氣大振，華軍先後擊毀日軍幾十輛攻堅的坦克，因此得以守住台兒莊的陣地。

台兒莊的血戰，從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軍第十師團進攻到台兒莊陣地，進行到四月七日，日軍整個潰敗退出台兒莊，總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戰。中、日兩軍在台兒莊及附近的陣地之中，進行多重包圍與反包圍的廝殺，在台兒莊內，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門、逐窗的戰鬥，日軍幾度增援，曾經控制了台兒莊四分之三的地區，並且一度準備渡過運河，衝向徐州，但是華軍拼死不退，孫連仲將軍親自下令守城的部隊，即使全員戰死，也絕對不能撤退。同時他也將司令部移往前線，表示必要時自己與司令部也將投入戰場作戰。

正當中日兩軍在台兒莊進行陣地爭奪的殊死戰之時，在台兒莊北部外圍的戰線上，就是湯恩伯部伺機而動的機會了，他眼見磯谷把日軍一波波地投入台兒莊戰場，剛好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戰術運作。湯恩伯的部隊就是負責收緊口袋，切斷日軍補給線的主力，只要日軍補給線一旦遭到切斷，所有在台兒莊作戰的華軍，立刻就會蜂湧而出地進行裡外合擊，準備把日軍予以圍殲。三月二十八日，湯恩伯下令部隊開始對深入台兒莊的日軍，進行合圍。

直到這時候，磯谷廉介才大驚失色地發現，自己的部隊，已經深陷華軍的包圍之中，在台兒莊附近的陣地，華軍攻勢異常地勇猛，日軍部隊已遭華軍的分割攻擊，情況對於日方非常的不妙。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下，磯谷只有向華北方面軍發出求救的電文，華北方面軍是絕對沒有想到南攻的日軍，在大膽越過禁線之後，無論是左右兩翼的部隊，竟然雙雙地都遭到敗仗的打擊。而日軍大本營更是對於華北方面軍不聽號令，深入華軍陣地，遭到包圍而感到震怒，但是卻不得不追認事實，要設法支持深入華軍陣地的日軍。

先前在右翼板垣的第五師團部隊，敗退到莒縣，在得到酒井旅團的支援後，正準備向臨沂進行反攻，同時由於李宗仁低估了日軍在右翼的威脅，突在三月二十日，抽調張自忠部向西支援台兒莊戰鬥。當張自忠部隊剛剛調走，日軍的板垣就立刻反撲臨沂，差點將華軍陣地擊潰，張自忠只有發揮指揮官在戰場的獨斷指揮判斷，直接向軍委會請示，而又將部隊緊急回防臨沂。中日雙方的軍隊正在臨沂打成難解難分之際，另外一支日本的援軍坂本支隊由青島趕到，板垣認為這是報仇良機，準備在臨沂大破張自忠部。

但是這時在左翼磯谷第十師團已經面臨被圍殲的危機，因此日本華北方面軍越級直接指揮坂本支隊，命其不得投入臨沂作戰，立刻要以全速向西轉進，以解救磯谷的部隊，板垣力爭無效，三月二十九日，坂本支隊奉令以急行軍方式脫離臨沂陣地而向西轉，經向城朝台兒莊陣地急攻，日軍一下子就衝到湯恩伯部的側背，這下子差點把湯恩伯部給反包圍起來。因此湯恩伯當機立斷地重新打開口袋，命令五十二軍向東移動，讓坂本支隊進入台兒莊戰場。由於坂本支隊奉十萬火急的軍命救援磯谷，沒有注意到湯恩伯部的移動，以為自己已經解除了磯谷部受困的危機。受困的日軍在得到支援之後，立刻發動逆襲，台兒莊各處陣地都遭到日軍強烈的反攻，孫連仲部陷入苦戰之中。

這時候李宗仁也大感意外，不知湯恩伯爲什麼沒有頂住日軍的增援部隊，而讓在台兒莊的華軍受到極大的打擊，因此他急得親自找蔣介石，要湯恩伯部立刻再投入戰鬥。蔣介石也了解戰局變化的嚴重性，假如孫連仲部的陣地被日軍擊潰，使得日軍攻克台兒莊，那麼第五戰區的整個局勢將會一敗塗地。因此他立刻親自以電話找到湯恩伯，叫湯部立刻投入戰鬥。這時候湯恩伯的部隊，已經在日軍的後側方，掌握到攻擊的優勢，在蔣介石親自的嚴令之下，湯立刻下令部隊分成三路，開始猛攻日軍，這時候支援台兒莊的日軍才發現，原來自己又落入華軍的再包圍之中。

四月六日，坂本支隊發現情勢對自己極端的不利，爲了避免自己的部隊遭到華軍的圍殲，因此立刻決斷地獨自向北撤退，而在台兒莊指揮作戰的日軍旅團長瀨谷啓少將⁴眼見日本援軍突然後撤，而華軍又再度合圍，知道假如日軍再戀戰下去，恐怕會全軍覆沒，因此只有當機立斷，燒毀日軍所有的重裝備與補給，然後全力突圍而逃。而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午下令所有參戰的華軍，掌握日軍潰退的戰機，全力反擊掃蕩。一時之間在整個魯南地區，華軍是四面合擊，日軍是拼命地奔逃，日軍死亡的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是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成軍以來，在戰場上最大的一場敗仗。

24.7 失去的機會 — 徐州會戰

日軍在台兒莊與臨沂所遭到的挫敗，不但震動了華北方面軍，更讓東京大本營感到震驚萬分。日軍大本營根本沒有料到，華軍竟然能在戰局最爲低迷的時刻，會如此快速地凝聚戰力，對日軍展開誘敵深入的包圍作戰，而且居然獲得如此優異的戰果。毫無疑問的，日本皇軍終於遭到建軍以來的第一場重大的敗仗。

這時候，日本大本營已經無法再考慮戰略上深入與戰力分散的問題了，日軍必須立刻設法擊敗華軍，以挽回「皇軍無敵」的聲譽。同時日軍大本營掌握到中國正在將超過六十個師的部隊，源源投入徐州戰場的情報。這是蔣介石希望李宗仁能夠掌握勝利的戰機，擴大戰果。因此日軍大本營匆促地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決定，下令所有在中國的日軍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發動徐州會戰，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華軍主力，予以圍殲。

⁴磯谷本人擔心自己重演板垣在臨沂的挫敗，已經退到後方指揮待援。

日大本營以八十四號大陸命，緊急發出徐州會戰的作戰命令，動員華北方面軍、華中派遣軍的主力，投入這場戰鬥。同時還下令關東軍派軍支援，由於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與華中派遣軍畑俊六大將的位階平行，誰也不會接受對方的指揮，因此只有緊急派遣大本營的作戰部長橋本群少將，率領參謀本部的參謀軍官，在濟南成立大本營派遣班，組織包括華北與華中日軍的參謀軍官，進行徐州會戰的作戰協調工作。

當然負責徐州會戰的日軍，是由華北方面軍擔任主力攻擊，由於蔣介石同時在山西南部發動華軍的牽制作戰，使得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山西的部隊一再地告急，無法抽調更多的部隊參戰，因此日軍大本營下令，由關東軍抽調的部隊，直接支援華北方面軍進行徐州會戰。華北方面軍立即整補第五與第十師團部隊，在台兒莊北方附近的陣地，進行誘敵的作戰，以吸引華軍的繼續攻擊。

然後日軍以主力第十八師團，配合關東軍的第三、十三兩個混成旅團的精銳，沿津浦路的濟寧南下，進攻徐州西部；並以第一軍的第十四師團，由荷澤渡過黃河，準備在遠方截斷隴海鐵路向西的交通；在一一四師團抵達戰場之後，立刻接防第十師團，由第十師團參加第十八師團圍堵華軍西方撤退的通路。日軍大本營認為徐州是華北方面軍的戰區，因此規劃由華北方面軍的部隊攻佔徐州。

而華中派遣軍則負責由南向北進攻，第十三與第九師團強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是指向經由宿縣，而撲向徐州西方的隴海鐵路要站碭山，準備和華北方面軍的主力在此會師，以達成切斷華軍西撤通路、在徐州附近圍殲大量華軍的戰略目標，而華中派遣軍爲了爭功，特別又增派第三師團以及兩個支隊北上，直逼徐州，此外，日軍又出動陸戰隊在登陸連雲港，而對於徐州，進行了三面包圍，並且急攻徐州的西部。日軍的作戰計劃非常的明顯，就是要以南北夾擊的作戰方式，將作戰重點放在截斷華軍與西方連絡的交通補給線，然後在徐州西方，成功的圍殲蔣介石剛剛完成整補的華軍。

蔣介石對於華軍在徐州的作戰，幾乎是動員一切支援的力量，放手給李宗仁運作指揮。在華軍不負眾望地取得台兒莊作戰勝利之時，蔣介石認為這正是掌握戰機，擴大痛擊日軍的機會，因此將手邊能夠用上的部隊，都調到徐州戰場，在最高峰時總兵力超過五十五萬人。蔣介石並且一再去電要求李宗仁，要大膽用兵，徹底掃蕩戰場，並且攻擊受困待援的日軍，打擊前來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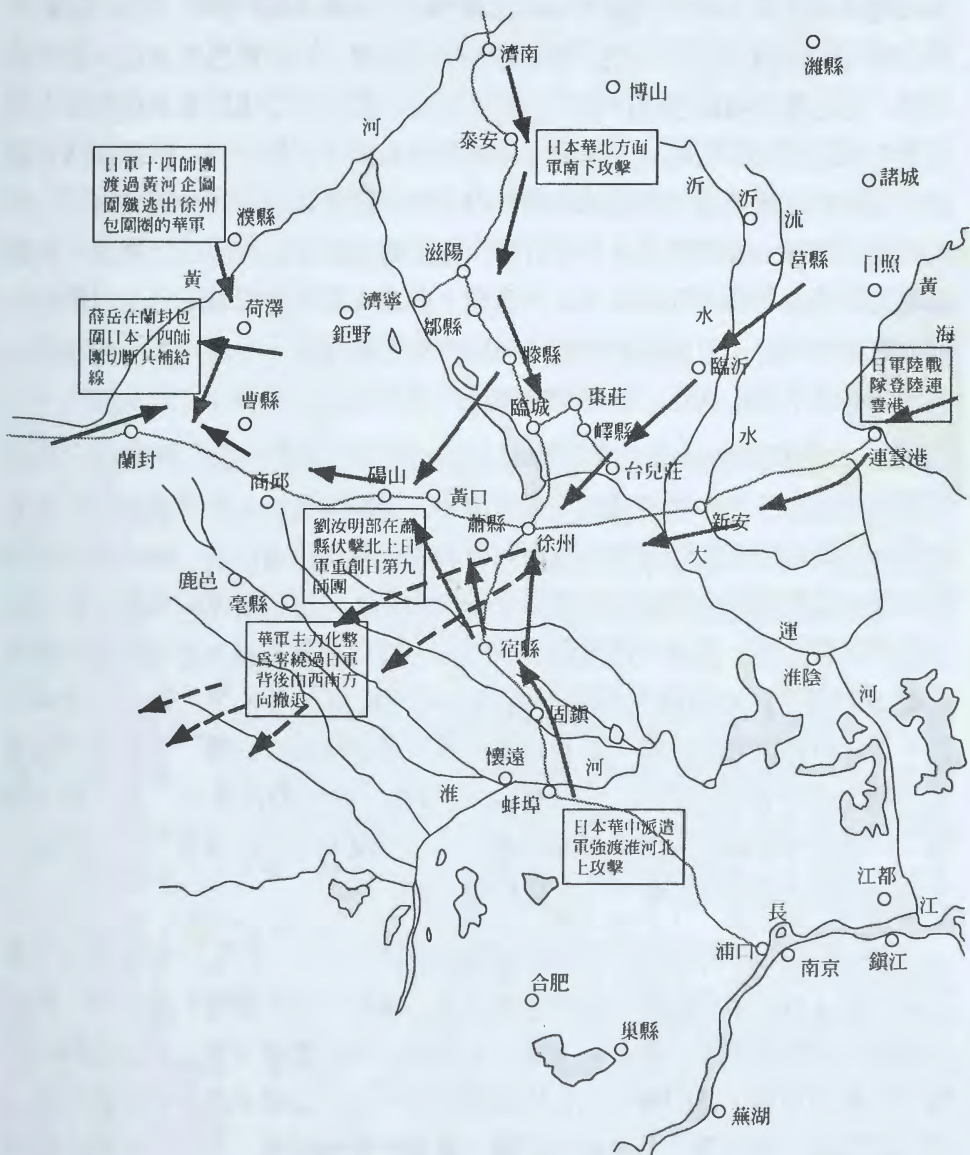


圖 24.2: 徐州會戰圖

救的日軍先頭部隊。

但是此時李宗仁卻一味地敷衍蔣介石，將五十萬大軍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頓起來，既無強烈攻擊的企圖，也無認真掃蕩的動作。李宗仁此時缺乏旺盛的企圖心⁵，不敢利用稍縱即逝的戰機，運用優勢的兵力，對日軍殘部，進行加強與猛烈地打擊。一直等到日本的大軍源源到達徐州外圍，對華軍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聲令下，將整個司令部與所有華軍全部西撤。此時掩護撤退的是由張自忠與劉汝明部擔負重任，劉汝明部在蕭縣一帶伏擊到北上的日軍第九師團，造成日軍重大的傷亡。由於華軍掩護得法，撤退的決斷又十分清楚，所以大軍能夠順利地退出日軍的包圍。五月十九日，日軍的華中派遣軍的十三師團部隊，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爭功的華北方面軍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獨斷地決意由徐州撤退之後，才告了知蔣介石這個決定，而此時蔣介石仍與李宗仁「情商」（毫無命令口吻的請求），希望李宗仁至少能夠率軍從徐州由東向西攻擊，蔣則親自到河南鄭州指揮部隊，由河南向東攻擊日軍。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會蔣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軍。日軍雖然佈下天羅地網，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華軍主力，但日軍判斷華軍的撤退路線，只能經隴海鐵路向西退卻，因此日軍南北進兵的主力會師計劃，都是以截斷隴海鐵路，防止華軍向西方撤退為首要目標。但是當時的華軍多數是由徐州西南方向，繞過日軍的背後，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退出戰場。日軍雖然攻擊到一些分散的隊伍，但是卻沒有包圍到華軍的主力部隊，日軍整個徐州會戰的攻擊，可以說是撲了個空。

雖然日軍沒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圍到華軍的主力，但是日軍卻沒有放棄這個企圖，日第十四師團渡過黃河的目的，就是在隴海鐵路的更西段，對逃出徐州包圍圈的華軍，再進行攻擊。但是蔣介石在接應李宗仁部隊西撤的作戰中，也有準備，當時蔣介石特別把中國唯一的一支德式裝甲機械化部隊，第二〇〇師，以及第二七軍桂永清部，都調到開封以東，交給在戰場上指揮的新星——第一兵團指揮官薛岳掌控。蔣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夠動用充裕的兵力，由東向西，攻擊日軍包圍圈的側後方，而由薛岳指揮大軍由西往東攻擊，兩軍能夠成功地會師。

⁵李宗仁的坐失良機，據說令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福爾肯豪森急的幾乎要「扯斷了頭髮」。

24.8 圍攻土肥原師團

但是李宗仁不能配合，就倉皇地放棄徐州。五月二十日，薛岳東進的部隊，剛好碰上了渡河南下，由土肥原賢二指揮的第十四師團，因此薛岳立刻就進行圍殲土肥原的部隊準備，下令華軍的六四軍、七四軍為東路軍，七一軍與二七軍為西路軍，預備採取東西夾擊的打法，圍殲日軍十四師團。但要想吃掉土肥原的部隊並不那麼簡單，因為第十四師團是一支日軍機械化甲種師團，擁有裝甲坦克以及機動的巨砲，是日本第一軍馳騁華北的先鋒部隊。不過薛岳決心要拿下土肥原的部隊，在蘭封與儀封之間，華軍包圍了孤軍深入的土肥原部，爆發了兩軍爭奪陣地的激戰，華軍切斷了土肥原的後方補給線。土肥原不得不向華北方面軍發出求救的電訊。

日本華北方面軍聞訊也是大驚失色，擔心第十四師團會出現「第二個台兒莊」的敗績，因此先以空軍全力支援第十四師團作戰，並且進行大量的空投補給。土肥原是作夢都沒有想到，自己原來是要來包圍華軍的，竟然反被華軍所包圍，由於補給線已經遭到切斷，十四師團陷在華軍的攻擊圈中，因此整個戰鬥面臨失控的危機。

但「中國通」土肥原究竟是一個厲害的角色，臨危不亂，竟然大膽地把主力向西突擊，猛攻蘭封（當時多支日軍部隊都在東方的徐州追擊撤退的華軍）。以最佳裝備的華軍部隊防守蘭封的桂永清部，根本沒有料到受到包圍的土肥原部會向西攻擊。因為按照常理推斷，土肥原部應該向東突圍，以與在徐州外圍作戰的日軍會師，在面對日軍逆勢的反撲下，桂永清一時竟然慌了手腳，將自己的主力南移，改以龍慕韓八八師守蘭封。土肥原部是發動死裡求生的反擊，攻勢極猛，八八師眼看桂永清都不願接戰，他的部隊更不是對手，因此在遭到日軍猛攻之後，沒有死守蘭封就撤退。這樣一來，土肥原突破了華軍的包圍。

薛岳大怒，要求蔣介石立刻查辦作戰不力的將領，結果八八師長龍慕韓被槍決，桂永清被撤職，薛岳重新佈署華軍，繼續圍攻土肥原部，七十一軍於五月二十七日再度攻克蘭封，而將土肥原部再次的圍困。但是整個戰局已經有了改觀，日軍的主力在掃蕩徐州之後，開始往西攻擊，一方面是解土肥原部的包圍，一方面是要追擊更多的華軍部隊。奉命據守歸德的第八軍黃

杰，卻在日軍的攻擊下，很快地丟掉了陣地⁶，造成日軍向西急進的態勢。這時候華軍不但不能圍殲土肥原部，反而要擔心自己被日軍所包圍了。

日軍對於徐州會戰沒有捕捉到華軍主力，可以說是萬分的惱火，加上土肥原部兩次被華軍圍攻而告急，更是讓皇軍臉上無光。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一怒之下，免除了老有意見的第一軍長香月清司的職務，改由方面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接任。這時候華北方面軍的第二軍可以說更是無地自容，因此當日軍發現華軍在隴海鐵路上，又有撤退混亂的現象時，西尾壽造於是決定，無論如何日軍都要全力追擊突圍的華軍，以挽回一些日軍的顏面。

24.9 華軍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日軍追擊

於是西尾下令日軍沿隴海鐵路向西追擊撤退的華軍，而沒有遵守大本營的作戰命令指示，在隴海鐵路北方保持警戒，結果日軍沿隴海線追擊華軍，大有直撲鄭州，席捲中原的態勢。因此在華軍將領多方的建議下，蔣介石同意在鄭州附近的花園口，由華軍破壞黃河大堤。六月八日，大堤被炸決口，黃河大水淹到追擊華軍的日本第十八與第十四師團（不過當時中國方面是把責任推給日軍，說因為日軍的轟炸，造成大堤的崩裂）。在黃淮平原上，泛濫的大水到處浸泡，又造成日軍佈陣的一團混亂，補給也發生困難，迫使日軍只好放棄追擊。結果日大本營不得不整頓軍紀，撤換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以及參謀長鈴木率道。

當然一直有人質疑或批評，蔣介石決定決堤的作法，是否過當？但要知道，抗日戰爭是一個全民族的戰爭，不是單純軍方的決戰而已。若是單純的軍事決戰，中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必然早被日本所擊敗。中國必須要動用全民一切的力量，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民族，免遭到侵略者滅亡之命運。爲了挽救幾十萬華軍的安全、阻止日軍順勢攻入中原，中國必須犧牲軍隊或是人民，或是使用砲火，或是河水，只要能達成拖延日軍進攻的任務。這就是中日戰爭特別悲壯的本質——中國人寧可死，但是不投降，寧願家園被河水淹沒，也不願被日軍擄掠。

在中日戰爭中，絕對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置身事外。決堤之災比起華軍游擊戰所激起日軍全面清剿平民的損失，僅是一個小事件而已。在當時中國

⁶薛岳亦要求蔣介石懲處失職將領，黃杰遭到撤職處分。

的軍隊，面對日軍的全面優勢攻擊，只要能夠打擊到日軍，中國將會採取任何一種手段，不管是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只要能保存戰力與死裡求生，任何代價中國的軍民都會付出。黃河決堤固然令無辜的中國百姓受害，但日本人對中國毫無道理的侵略與全面燒殺擄掠的破壞，遠比黃河決堤還要可怕！中國人既然不肯投降，就會毫不猶豫地動用一切的力量，來抵抗日本的侵略。這就是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真相，不僅是中國軍隊的奮勇作戰，也是全民毫無保留地投入與犧牲。（其實華軍在山東與湖北的作戰裡，也都有幾次用決堤來打擊日軍的做法，只是規模較小，也就比較不為人知了。）

24.10 徐州會戰的檢討

台兒莊大捷，其實包括了中日兩軍在山東南部東西兩翼的作戰，華軍先後在臨沂與台兒莊獲勝，所以更為確實的說法應是魯南大捷，中國讓日本皇軍遭到成軍以來第一次戰場作戰的失敗。檢討日軍的這場大敗仗，從戰鬥的觀點來看，可以說日方是輸得相當輕敵與大意。最初是因為日軍貪功冒進，從魯南進逼徐州外圍作戰，根本是日軍大本營所不同意的作戰行爲。日軍大本營特別下達華北方面軍南下的禁制線，是在台兒莊以北，可是華北方面軍不服軍令約束，以輕敵的心態，孤軍深入，結果在台兒莊遭到慘敗，迫使日軍大本營別無選擇地動員所有的軍力，倉促發動了徐州會戰⁷，所以徐州會戰是一個被華軍掌握戰機，所誘發的一個意外軍事作戰，這個會戰徹底改變了日本對華作戰的戰略構想。

因此，從徐州會戰之後，日軍在戰略上的主導能力上，開始完全失控，速戰速決的戰略成爲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國的戰略空間陷阱之中，日軍只有繼續發動武漢會戰以及華南攻略作戰，將日本絕大部分的部隊，都投入了中國的戰場。這時日本既不能擊敗中國，又不能退出中國，它一再地掙扎，卻都無法結束在中國的作戰。最後日本眼看其作戰資源即將枯竭，只有鋌而走險，發動太平洋戰爭。

華軍很快就能從華北與華東戰場的挫敗之中，恢復作戰的士氣與部分的戰力，的確是出乎日軍以及所有軍事專家的意料之外的。在剛開始的時候，

⁷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軍全力投入它所能調度的兵力，但仍然沒有在徐州附近捕捉到華軍部隊的主力。

第五戰區只有少數中國地方部隊活動，根本沒有引起日軍的重視，但是蔣介石卻能靈活掌握戰機，了解華中的日軍正在面臨軍紀調查與士氣低迷的狀況，無法從南方有力地支援華北方面軍作戰；而入侵山東的日軍，又犯了輕敵的大忌，因此蔣介石指示華軍，運用少數的兵力，在山東南部主動攻擊日軍。日軍因而產生強烈的反應，終於不顧大本營的約束，孤軍擅自深入魯南。

而李宗仁能夠大膽的在魯南佈署部隊，迎擊日軍的鉗形攻勢，並在台兒莊設下口袋陣地，是相當傑出的指揮佈局，當然蔣介石全力支援李宗仁的作戰，把軍隊迅速地調進戰場，並且還親自前往前線督戰，更是將帥密切配合之戰場傑作。在徐州作戰的華軍，無論是地方部隊還是中央軍，都展現出合作無間的精神，更是中國軍隊自從滿清中葉以來極其傑出的表現，其中以孫連仲、龐炳勳、張自忠、湯恩伯、劉汝明等部隊，戰術運用靈活，作戰表現勇敢，因此戰績最為輝煌。事實上，華軍在此戰線是同時在台兒莊與臨沂兩處，獲得兩場勝利。華軍是左右開弓，先後擊敗了日軍左右兩翼的鉗形攻勢，使得日軍遭到前所未有的敗績。

當然整個作戰中，華軍贏得也相當辛苦與艱險，特別是在四月五日，日軍幾乎突破孫連仲部在台兒莊的防線。假如日軍真地突破這個防線，那麼華軍在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部，就將會不保，華軍必然將以慘敗收場。幸好孫連仲將軍親自上陣督戰，華軍硬是以血肉之軀守住了陣地，這時湯恩伯軍團又合圍成功，結果反而是日軍遭到了重大的挫敗。

不過李宗仁在處理後半段的作戰上，就顯得缺乏作戰的企圖心。當時蔣介石把更多的部隊調給李宗仁指揮，希望李能夠掌握戰機，充分擴大與發揮戰果，但是李宗仁卻突然出現消極保守的心態。如此一來，局勢很快的就逆轉，集結如此龐大的部隊，又沒有積極的攻勢作為，當然反而成為日軍獵殺圍殲的目標。幸而李宗仁一旦發現局勢惡化，立刻果斷地下令撤退，決心既強，計劃又有足夠的彈性，因此多數華軍能夠安然撤出，避免遭到日軍的包圍。但是這種倉皇的撤退，對於華軍部隊而言，仍造成很大的疲勞與損失。

雖然在台兒莊大捷中，西北軍與川軍出力很大，但是絕對不能認為中央軍袖手旁觀。事實上，蔣介石在掌握到作戰時機之後，立刻調動自己王牌的中央軍全力參戰，自己也親自到前線督戰，而沒有任何的保留（蔣介石的中央軍，早已在淞滬會戰與華北戰場上，力拼到損失慘重的地步）。此外，認

爲黃河決堤是阻止日軍由北而南直撲武漢的重要做法，也與事實不符，因爲黃河在黃泛區內，多半時間水流量不是很大，渡河並非困難之事。日軍若是沿平漢鐵路運動，根本是可以繞過黃泛區的西方而南下。日軍之所以沒有直攻武漢，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根本沒有這個戰略決策的膽識與遠見，日軍一直想能夠以最低成本，最短時間，就可以讓中國屈服，並沒有席捲中原，直撲武漢的戰略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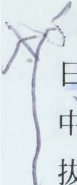
而日軍在台兒莊—徐州會戰的重大挫敗，實在是源於日軍結構上的老問題，前線帶兵長官的位階與權力，都要大於參謀本部的參謀，因此日軍部隊在戰場上的獨斷做爲，往往根本推翻或是危及了日軍整體的作戰計劃。華北方面軍縱容其部隊越過禁制線攻擊，日軍大本營根本既不知情，也無法控制，等到日軍遭到嚴重的挫敗，大本營只有跟著設法收拾殘局。就像日軍大本營在濟南臨時設立的指揮作戰中心，負責人只是少將軍階，別說要指揮華北與華中日軍的司令官了，就連師團長的地位都比他高，這樣作戰命令如何能夠確實的執行？

24.11 日軍從此陷入了中國的戰略陷阱

原來日本企圖圍殲徐州的華軍，是一個相當有企圖心的戰略攻擊計劃，但是日軍仍然犯了低估華軍作戰能力的錯誤。在徐州寬廣的地區，投入了二十五萬的日軍部隊，仍然出現了兵力不足以構成包圍圈的現象，對於當時的日軍而言，這已是其動員部隊的極限。同時日軍過於自信的判斷，認爲華軍只能利用隴海鐵路西退，因此將攔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斷這條鐵路的交通線上，而大部分的華軍卻從日軍的背後，向西南方向撤走，而使日軍在徐州企圖圍殲華軍主力的計劃再次落空。日軍大本營又在匆促之中，決定全面深入中國，進行漢口攻略的作戰計畫。

由台兒莊大捷所意外引發的徐州會戰，完全地改變了日軍大本營對中國的戰略指導能力，從此日軍失去了在中國戰區的戰略主導方向，一步步陷入了中國的戰略空間。日本最大的問題是，日軍根本沒有全面佔領中國的實力與決心，只能盲目地希冀中國會因爲連續的挫敗而喪失抵抗意志。但從中國被迫決黃河大堤以打擊日軍的侵略一事來看，就可以充分明了中國人寧可被「母親之河」的水淹沒，也不願被日軍蹂躪的悲壯意志，以及中國人抵抗日

本到底的決心了。



徐州會戰之後，日本在中國戰場中，完全失去了戰略的自主性，而使得日本最終走上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絕路。對於日軍而言，徐州會戰是日軍陷入中國戰略泥淖的「不迴歸點」，日軍明知這是一個戰略泥淖，但是卻無力自拔，自投羅網了。

戰略泥淖的武漢會戰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軍終於攻佔了中國的地緣與戰略的心臟武漢三鎮。此時日本的全國上下，對於日軍能夠攻克武漢，可以說是再次陷入舉國同歡的境界，日本人民連續幾天幾夜地狂歡，來祝賀皇軍無敵與中國落敗，因為他們誤以為，日軍在攻克武漢之後，中國即將向大和民族完全地屈服。

但是日本人錯了，中國沒有因為武漢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國戰略空間的泥淖之中，從此日軍必須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兩千多公里的補給線，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中國從此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與優勢的地位，雖然她的工業地帶與對外聯絡通道都遭到切斷或摧毀，使得中國即將面對更為艱苦的生活，但是中國軍民卻決心以無此堅忍的力量，熔成鋼鐵的意志，來繼續面對這場歷史的大決戰。中國人是決不屈服的。

日軍在攻佔徐州之後，已經面臨一個嚴酷的事實，就是中國的戰略空間太大，中國抗日作戰的意志極強，中國雖遭到嚴重的戰場挫敗，但是蔣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指導原則，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在國策上面臨了非常重大的選擇：一則以極大的決心，

與中國進行談和，以撤出在中國的日軍，減少戰爭實力的消耗；要不然麼就要全面的動員，繼續深入中國的內地，以攻佔中國更多的領土、截斷中國對外的交通補給線，以及摧毀中國所有的抵抗意志與作戰力量。

25.1 日軍和戰舉棋不定

但是在此關乎國家民族安危興衰的選擇時刻，日本卻犯下了致命的重大決策錯誤，其政府既沒有謀取「和平解決」中國問題的決心，又不能採取孤注一擲、全面擊潰中國的作戰動員。日本政府在攻佔南京之後，對於如何解決中國事變的問題，在軍部與政府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磨擦，最後日本國內，幾乎要鬧出兵變與政潮衝突。日軍於台兒莊作戰受挫，更是擦槍走火地引爆了徐州會戰，日政府根本無法控制軍方的擴大作戰行動。前線日軍主動擴大作戰的行動，不但沒有打垮蔣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衛文麿的內閣。

最後在元老重臣與軍方將帥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進行改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陸相。由於宇垣對於壓抑軍部擴張，有著極強手腕的記錄（大正日皇時代，日本的裁軍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時他與國民政府的首長，包括蔣介石、張群等人在內，都有彼此相識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夠藉著宇垣入閣，而以談判方式解決中國事變。

宇垣認為，中國不可能會在武力的攻擊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兩國不妨以和談來代替作戰，才能解決日本面臨的戰爭泥淖危機。宇垣是得到近衛首相內閣支持其和談以解決戰爭的想法後，才答應出任外相的職務。因此他就職之後，立刻透過外交的管道¹，與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張群接觸，準備積極推動與中國的和談。

但是出任陸相的板垣，擁有中國戰場作戰的實際經驗，又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少壯派首謀。雖然他個人曾經支持石原莞爾的見解，不要在盧溝橋事變之後，與中國爆發全面的戰爭，但是此時他卻充滿著在中國作戰不利的挫折感，同時反映著前線軍方將校求勝與報仇的意志。板垣剛由前線（作戰不

¹事實上，到此時中日之間不但沒有正式的宣戰，也沒有正式的斷絕邦交，中國駐日本大使也還在東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後，中國駐日大使才回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國才對日本絕交宣戰。

利)的師團長，高升陸相的職務，可以說是相當的位高勢孤，所以他必須要討好軍方，以爭取軍部與前線高級將校的支持，因此必須讓日軍在中國戰場，能夠有更多作戰建功的機會，就成為他的政策基調。板垣出任陸相之後，立刻就與軍方的主戰派，結成一股新的擴大中國戰爭的軍方力量，而將參謀本部中，傳統是側重防蘇，並不希望日軍深入中國作戰的勢力就被壓制了。

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談方式化解中日戰爭危機的構想，很快就遭到日本軍方主戰派多數人的反對。這些主戰的日本軍官們，在侵略中國的作戰中，可以說是已經騎虎難下，也殺紅了眼，因為他們一直相信，也一直地教導日本人民，中國沒有真正抵抗的能力與意志，「皇軍無敵」更是他們要繼續維持下去的神話。雖然，目前在中國戰場所有的事實，已經在否定他們的看法，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人敢面對現實。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日軍的主戰派，竟然也沒有完全孤注一擲地勇氣，不敢不惜一切代價、全面動員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戰場上徹底地擊敗中國；反而想在擴大佔領中國之後，進行「以戰養戰」的政略。在軍方全力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下，宇垣在和談建議還沒有付諸實施前，就被迫辭職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談方式，結束中國事變的想法，也很快地隨著消失了。

25.2 中國決心保衛武漢

徐州會戰結束之後，蔣介石隨即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發出華軍保衛武漢的指令。自從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之後，指揮華軍作戰的神經中樞——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就是設在武漢，支持國防與軍火工業生產的設備，也設在此地。由外地輸入，中國所急需的軍火與民生物資，則是來從廣東與新疆運送到武漢進行分配。武漢已經成為中國之戰略與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過當時蔣介石卻只剩下極其有限的資源，來進行武漢會戰。因為中國的稅收與工業精華地區，都已落在日軍的手中，華軍的精銳也在多場戰爭中，傷亡極大。補充徵募的新兵，不但人數不足，體能與素質更差，也缺乏任何的軍事訓練，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軍隊急需之重武器裝備更是只能選擇性的補充而已（正規軍若是沒有這些武器，與民團的戰鬥能力，也就相差不遠了）。新敗的華軍部隊，經過七拼八湊的克難方

式，勉強凝聚的一些戰力，又在徐州會戰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對著武漢會戰，華軍真得全靠民族主義的作戰意識來撐住局面了。這時在國民政府的決策層面，一些首長已經有了希望與日本和談的想法，但是蔣介石卻抗拒這些壓力，決心繼續地誘敵深入，進行武漢會戰。

日軍大本營在徐州會戰中撲空，沒有達到圍殲華軍主力的目標之後，很快地就做出兩項深入中國作戰的戰略決定，一是漢口攻略，一是廣東攻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營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發動這兩個作戰。這代表日軍終於要陷入中國的戰略泥淖，當然也就代表著中國有更多的地方與更多的人民，要承受這場戰爭浩劫的殺傷與破壞。不過當時日軍大本營卻「盲目」地認為，只要日軍攻佔武漢與廣東，中國「應該」就會向日本投降了。

事實上，不只是日軍，就連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對於華軍能否有能力繼續作戰，也產生了疑問。因為在日本政府強大的壓力之下，德國的希特勒政府終於決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並且要求所有的德國軍事顧問在當年七月離華，這對於華軍正面對武漢會戰之重大關頭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過去華軍作戰的重裝備，以及作戰的佈陣，都得到德國的協助，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軍因而樂觀地估計，中國繼續作戰的能力，隨時都有枯竭的可能。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在進行武漢會戰的規劃與參謀作業時，則立刻要面對戰士缺乏、後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斷絕的嚴厲挑戰。華軍真能夠自己面對指揮百萬部隊，在長達幾千公里的戰線上，與日軍進行這場大會戰的考驗嗎？

不過，日軍大本營的漢口攻略作戰計劃中，對於攻克武漢，以結束與中國的戰爭，仍然抱著很高的期望²。同時日軍仍希望在漢口攻略的作戰中，進行一次大戰略的包抄與圍殲，徹底殲滅掉蔣介石的野戰軍，以增加日軍逼和的籌碼。

雖然日本大本營對於漢口攻略，可以說是志在必得，但此時日本對於整個戰略演變的控制能力，在徐州會戰之後，已經接近崩潰了。日軍能夠很確定它一定能夠攻克武漢，但是日本根本無法知道，在攻克武漢之後，華軍的主力能否被殲滅，以及中國會不會就此停止抵抗。日本當然更沒有想清楚，

²其實中國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深入追擊，就已經展現出中國抵抗到底的決心，中國寧可讓黃河氾濫自己的領土，也不要接受日軍的佔領與屠殺。

日本一旦深入武漢，它從此就要面臨全面的戰略被動了。

日軍攻略武漢的作戰行動，早就是中國統帥部最爲注意的戰情發展，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最爲擔心的日軍戰略佈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戰爭開始後，集結主力由河北沿平漢鐵路直衝武漢，以破壞、阻止中國軍政中心遷往大西南，進行長期抗戰的戰略。還好日軍在開戰將近一年之後，才開始計劃進攻武漢。但是日軍仍然沒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斷中國東西聯繫的戰略。

當時對於如何進攻武漢，日軍大本營與前線的部隊，也有著不同的爭論，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建議由華北方面軍主控作戰，以主力部隊，大體上沿平漢鐵路，由北向南地進攻武漢。這個方案的戰略構想，將以九十度的方向，顛倒中國戰線的正面，又能迂迴包抄中國防線的佈置，應該是一個較佳的作戰方案，但是作戰的路途較遠，所需兵力較大，同時後勤補給運輸的困難更爲複雜。

而日本的華中派遣軍要求，由華中派遣軍負責主攻，作戰路線是沿長江由東向西進逼武漢。這個方案的戰略構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國的精華地區，同時後勤支援作業可以利用長江水道，日軍可以「節省」不少兵力投入與物力支援。

這時日軍大本營照例無法做出果斷的裁決，不但因爲日軍大本營沒有一個擁有遠見威望與魄力的最高指揮官，同時大本營的參謀軍官們，對於前線擁兵將帥們的意見，也不敢太唱反調³。因此參謀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進攻武漢的日軍部隊，先沿淮河由東向西進攻平漢鐵路的武勝關之後，然後再沿平漢鐵路向南旋轉，攻略武漢。

這樣讓華北與華中的日軍指揮官們都可以滿意，同時日軍因爲剛發動了不成功的徐州會戰，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帶，可以就近集結與整補。但是這個方案，卻受到淮河嚴重氾濫的影響，日軍無法順利沿淮河進行攻擊的行動，加上日軍對於這支遠征軍的後勤支援，發生交通、運輸不足之困難。更令大本營頭痛的，是由誰指揮這支部隊作戰。這時在東北中蘇交界的圖門江附近，突然爆發了日蘇間的「張鼓峰事件」，雖然沒有擴大成爲日俄之間全面的戰爭，但是卻給日本極大的壓力。日本大本營幾經考慮之後，決定向蘇聯

³試想當時日本政府的陸相板垣征四郎，只有師團長經歷而已，如何敢壓制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或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的建議？

讓步，仍然發動武漢攻略，但是調整了作戰序列，進攻武漢的作戰，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負責指揮，華北方面軍則留控一些部隊，做為防蘇作戰的左翼戰略預備隊。

25.3 日軍對武漢發動鉗形攻勢

日本大本營修改作戰計劃後，在七月四日發佈日軍攻略中國武漢的戰鬥序列，日軍共分兵兩路，準備以鉗形攻勢進攻武漢。南路由華中派遣軍的第十一軍岡村寧次中將負責，統帥日軍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師團，以及四個支隊和特種作戰部隊，總兵力十五萬人，在九江集結，然後沿長江南北兩岸進攻武漢，北岸的軍隊直攻武漢，南岸軍隊負責包抄粵漢鐵路的賀勝橋與咸寧，以截斷武漢華軍的南下退路，最後再合圍在武漢的中國野戰軍。

北路軍由原華北方面軍的第二軍東久邇宮親王稔彥王中將負責，第二軍改由華中派遣軍統一指揮，統帥日軍第三、十、十三、十六師團，以及特種作戰部隊，總兵力十二萬人，在合肥集結。由於淮河氾濫，不方便軍事作戰，因此進攻路線向南修正，沿著大別山由東向西進攻，在攻克平漢鐵路之後，再向南旋轉切入武漢，與南路日軍會師，以對武漢的華軍進行合圍⁴。

另外華中派遣軍控制四個師團做為預備隊，以及三個飛行團的支援兵力、一個海軍艦隊，兵力為十四萬人。兩支日軍以南北平行運動的鉗形攻勢，直撲武漢，但是以兵力與支援而言，日軍進攻的重點是放在南路的長江作戰上。

這時蔣介石為了在武漢迎擊日軍，特別設立了武漢衛戍司令部，由陳誠出任司令，在長江南岸再設立第九戰區，司令官也由陳誠出任，統帥了薛岳的第一兵團，張發奎的第二兵團，主力集結在鄱陽湖以西地區的長江南岸，在側翼迎擊日本第十一軍的攻勢，而對抗沿大別山與長江北岸進攻的日軍之責任，蔣介石仍然交給第五戰區的李宗仁負責（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揮）統帥孫連仲的第三兵團負責在大別山禦敵，李品仙統帥的第四兵團則在長江北岸抵抗日軍的攻勢。

⁴岡村寧次指揮之「南路」日軍（沿長江而上）又分為南岸、北岸兩股，宜稍注意而不要與「北路」（沿大別山攻擊）的日軍混為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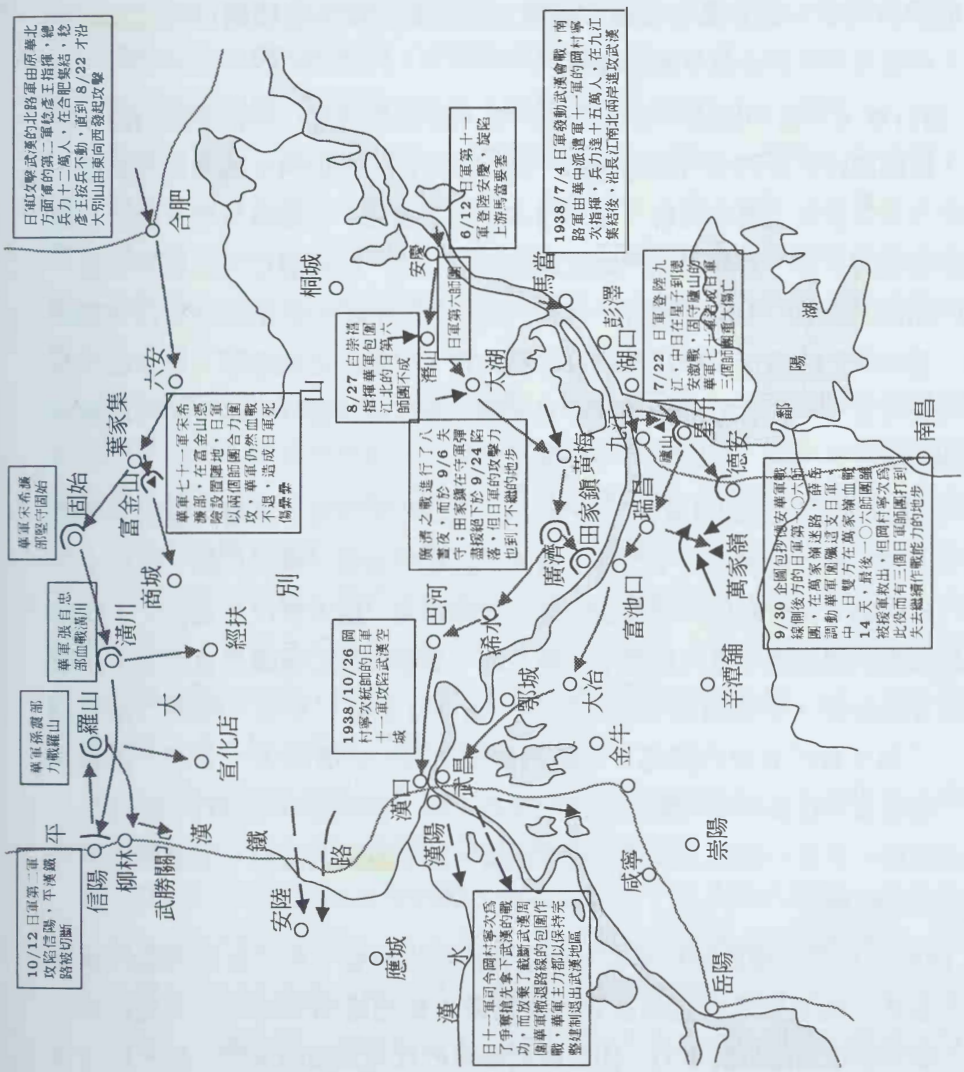


圖 25.1: 武漢會戰圖

蔣介石這次的作戰指導方針，更爲明確地接近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想，就是設法在日軍進攻的沿途，不斷地進行抵抗，並且進行後退包圍以及側翼的伏擊，但是不到必要時，不進行主力、正面的決戰。因此武漢會戰的主戰場不在武漢城市的保衛戰，而在武漢外圍的消耗戰，華軍作戰的目的在爭取消耗日軍，而非擊敗日軍或是真正地保衛武漢。就戰略指導的層次而言，中國方面的表現真是進步神速。

而日軍大本營知道這次深入武漢作戰，主要是擴大日軍在中國的控制空間，將國民政府逼到地方邊陲地區，同時摧毀蔣介石的再生戰力補充路線，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漢奸政府，達成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目標。由於負責南路進攻的日軍，需要從徐州附近調回作戰部隊，同時要在九江集結之後，才開始進攻武漢，因此需要在一個月以前，先在長江南北兩岸進行序戰準備。至於在北路擔任攻擊武漢的日本第二軍，參戰的各個部隊，本來就在淮河與黃河之間，在合肥集結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進行整訓，等待攻擊發起的時機。

負責在南路進攻的日本第十一軍，在大本營還沒有下達漢口攻略的作戰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搶先登陸安慶發動了序戰攻勢，然後十一軍兵分兩路，具有兩棲作戰裝備的波田支隊領軍，沿著長江水道西上，在華軍部隊換防與接應不當的情形下，輕易地一舉擊破江防重鎮馬當要塞，接著迅速穿過彭澤，準備直逼九江；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軍第六師團（稻葉四郎），則在長江北岸的陸路，不斷的向東突進，沿著潛山、太湖、直攻黃梅。由於日軍在漢口攻略開始的江南序戰之時，作戰意外地順利，因此日方甚至認爲，只要一個月，就可以攻下武漢。這個輕敵的想法，又要讓日軍付出極大的代價。

南路的日軍指揮官岡村寧次，知道指揮這場會戰，對於自己前途的關係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夠首先攻克武漢，更想能夠漂亮地在攻克武漢之時，殲滅華軍大部分的主力。因此岡村寧次把攻克武漢的決戰目標，放在長江南岸，因爲他知道華軍第九戰區的主力兵團，就在九江與南昌之間佈防。假如自己能夠在此殲滅華軍部隊，就可以大膽地迂迴攻擊粵漢鐵路上的賀勝橋一帶，截斷華軍從武漢南撤的通路，從側後方包抄武漢。事實上，岡村寧次也是有些擔心，假如自己的部隊沿著長江一路地深入武漢，會給留在江西的華軍部隊，有機會側擊自己的補給線。這正是陳誠與薛岳的作戰計劃，逼

日軍必須分散兵力，防範在江西集結之華軍的企圖。

25.4 廬山的死亡陣地

七月二十二日，岡村寧次的部隊，突擊登陸長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據點姑塘，與華軍爆發激烈的戰鬥，華軍的第四軍、五十二軍、六十四軍、六十六軍早有反擊的準備，中日雙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區爆發空前的激戰。日軍第一〇六師團，被釘在金官橋陣地，日軍無論如何的猛攻，都無法突破華軍陣地。華軍在造成日軍大量的傷亡之後，仍然堅守不退，這時岡村寧次大感震驚，於是甘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軍，毫無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氣進攻華軍，但是縱然如此，日軍仍然無法攻克德安，也無法順利沿著長江南岸，朝向武昌進攻⁵。

岡村寧次因此再調日軍一〇一師團，在星子登陸，企圖側擊華軍陣地，但是華軍的七十軍軍長李覺，率部固守廬山的險峻地形，發揮血戰不退的作戰意志，在長達四十一天的作戰中，不管日軍用盡一切的手段，當然包括毒氣、飛機轟炸與炮艦的火力支援，就是無法突破華軍陣地，反而造成進攻日軍近乎殲滅性的損傷。岡村被迫再調第九師團支援作戰，但是仍然無法打開戰事的僵局。日軍在江西北部的長江沿岸，已經陷入死亡陣地的僵持局面：日軍三個參戰的師團，都打到近乎失去繼續作戰能力的狀態，這三個師團需要補充的兵員，甚至超過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兩軍對陣之時，長江地區正好發生嚴重的瘟疫，不但日軍受到感染，華軍更是因為普遍的缺乏醫藥，病死的戰士極多⁶。

不過南路日軍在長江北岸的戰事卻進展較大，日軍第六師團一路進攻，終於在八月三日攻克黃梅。這時白崇禧眼見長江北岸的日軍過於深入，於是出動華軍攻擊日軍的後方補給線，準備包抄第六師團。白崇禧指揮華軍第七軍（張淦）、第十軍（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軍後方的潛山與太

⁵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當時中國軍隊，十之八九的作戰裝備只有步槍與手榴彈等輕武器，根本沒有任何對付化學戰的防護裝備。面對毒氣攻擊，唯一的辦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這種做法當然不能抵擋日軍的化武攻擊，因此每當日軍以毒氣攻擊華軍之時，戰場狀況是極其悲慘的，常常整個陣地就成為了屍骨堆積場。

⁶當時中國所有的本錢，都已放在購置軍火上，槍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強有飯吃而已，根本談不上營養，在野戰部隊中，醫藥幾乎等於沒有（除了「紅藥水」以外），在這種幾乎無法想像之艱苦狀況下，中國的守軍，生病、發燒、呻吟，卻又沒有醫藥的照顧，但他們仍然在每場戰鬥中，盡力地保衛自己的國土。

湖，然後下令江北的華軍，圍攻在黃梅集結的日軍第六師團，準備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兒莊大捷。

這次白崇禧的戰略佈局雖然高明，但是華軍兵力的運用，卻沒有充裕與足夠的籌碼（當初李宗仁得到了蔣介石傾全國軍力的支援，現在白崇禧卻面對華軍在全線激戰，已經沒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況）；更爲不利的是，長江對於華軍是障礙，對於擁有絕對優勢海軍的日本而言，卻是救命的動脈。白崇禧雖然成功地切斷日軍第六師團的後路，但是日軍卻由長江支援、補給第六師團。岡村寧次更非等閒之輩，他立刻調動三個支隊，加入第六師團，以進行反擊戰，因此華軍被迫後撤。

日軍於是乘勝追擊，對於江北的戰略要地廣濟發動攻擊。廣濟之戰進行了八天八夜，整個陣地在中日兩軍之間，也是幾度易手，最後才在九月六日，被日軍攻佔。這時攻佔廣濟的日軍與沿江西上的日軍，開始兩面合圍田家鎮。華軍在此設有江防的要塞陣地，但是這個要塞在設計的時候，發生嚴重的錯誤——只考慮到迎擊由長江一面的作戰需要，而在側後的防禦上，幾乎沒有任何堅固的防禦設計。華軍在江防要塞上，對於正面進攻的日軍，產生極大的殺傷力，但是當日軍從廣濟迂迴攻擊田家鎮之時，整個要塞就無法發揮應有的防禦功能。日軍第二十七師團，此時又先攻克了田家鎮南岸的對應陣地，因此田家鎮終於在九月二十九日，中國守軍在彈盡援絕之下，被日軍所攻陷，於是沿長江進攻武漢的南路日軍已經打開了通往武漢的大門，不過日軍的攻擊力量，也到了暫時無法繼續作戰的地步。

25.5 萬家嶺大捷

由於岡村寧次對於在鄱陽湖口的作戰，一直無法擊敗薛岳與張發奎的部隊，仍然感到不安，於是決定要在江西北部捕捉與殲滅華軍薛岳的主力。岡村寧次一面繼續對德安戰線，施加正面的壓力，一面出動軍隊，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後向南旋轉，迂迴深入地突進，企圖包抄華軍德安戰線的後方，以圍殲在此力戰不退的守軍。但是負責迂迴攻堅任務的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卻在九月三十日，在瑞昌西南方的萬家嶺迷路，因而立刻受到薛岳部隊主力的包圍。

這次薛岳決心完殲這支單獨深入的日軍，因此立刻調動華軍部隊，由吳

奇偉指揮第四軍（歐震）、二九軍（李漢魂）、六十六軍（葉肇）、七十四軍（俞濟時）發動聯合攻勢，設法圍殲第一〇六師團。中日雙方在萬家嶺血戰十四日，其中以七十四軍（俞濟時）擔綱，犧牲最大，特別是五十八師（馮聖法），更是打到全員上陣的地步，最後連軍長俞濟時都親率警衛營支援作戰，而受困的日軍一〇六師團，一直無法打開戰線缺口；外圍的日本援軍受阻，也無法打破包圍圈馳援。因此日軍一〇六師團逐漸感到彈盡援絕地威脅，被華軍圍在幾公里方圓的陣地之中，幾乎已經遭到華軍的圍殲了。

萬家嶺戰局的發展，不但受到中外媒體的廣泛注意，甚至引起日皇裕仁直接地關切，因為日本自從建軍以來，還沒有遭到整個師團被圍殲的敗績。在日皇、軍部以及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高度關切之下，岡村寧次當然更是想盡一切的辦法，來設法救援一〇六師團，但是仍然無法達成任務。這時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只有親自介入指揮，他不但把所有能出動的空軍，都派到萬家嶺上空，支援與掩護受困的一〇六師團，並且緊急出動所有華中派遣軍所控制的預備隊，組成三個支隊，不惜一切代價地投入戰場，以救援被困的日軍。

事實上，被華軍包圍的日軍一〇六師團長淞浦淳六郎 中將，幾度已經到了準備焚燒軍旗，並且要切腹自殺的最後關頭。中日兩軍在萬家嶺決戰的最後兩天當中，都分別組織了上百組的敢死隊，進行最後的短兵相接的戰鬥。日軍華中派遣軍甚至組織了兩百人的軍官團，空降到日軍一〇六師團的陣地給予支援。

最後一方面是淞浦個人命大，幾次華軍突擊隊都在其陣地前擦身而過，一方面是華軍已經沒有更多的預備隊兵力來投入作戰，因此他才在最後的千鈞一髮之際，被日本的援軍救出。總計岡村寧次爲了要消滅在江西集結的華軍部隊，讓日軍的第九、一〇一、一〇六師團，都打到了失去作戰能力的地步，必須進行全師團的整補。華軍的抵抗意志竟是如此堅強，更是讓日軍爲之震驚與困惑。

25.6 富金山的惡戰

而負責從北路進攻武漢的日本第二軍，在日軍攻略漢口的戰略規劃中，原先只是助攻的任務，但是司令官稔彥王中將卻有過人的企圖心，他準備採

取後發先至與攻難於易的高明戰略。北路日軍按兵不動，就有更充足的時間進行集結與準備。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南路日軍已經打得昏天黑地之時，日本第二軍才開始沿大別山向西進攻。雖然這裡的地形險阻，並不適合大兵團的運動與作戰，但也正是因為如此，華軍在此的兵力，也就最為薄弱，這點是被日軍料中了。

由於第五戰區代理長官白崇禧認為日軍進攻武漢的主力，是沿長江兩岸發動攻擊，同時他又想圍殲深入的日軍第六師團，因此華軍的重兵南調長江北岸，在大別山的孫連仲，實在沒有多少部隊佈防。一旦日軍發動攻勢，白崇禧才發現日軍之大膽企圖心，竟然要走地形複雜的地區進攻，於是急調大軍支援孫連仲。幸而鎮守前線的七十一軍宋希濂部，在富金山憑險設置陣地，面對裝備極其精良的日軍第十三師團的進攻，仍然血戰不退。

尤其是七十一軍第三十六師的陳瑞河部，根本就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戰之中，幾乎打光了所有的彈藥，造成進攻的日軍第十三師團，死傷高達一萬多人。日本第二軍司令官實在無法想像華軍是如此地頑強，只有急派第十師團加入戰鬥，但是仍然無法突破華軍的富金山陣地。連日本的報紙都奇怪，究竟鎮守這個陣地的華軍是何方神聖，日軍兩個師團合力圍攻，都無法打開戰局。日軍死傷纍纍，造成全軍需要大量的補充兵員，才能繼續地發動作戰。

最後華軍終於退出陣地，因為華軍仍是血肉之軀，在日軍持續猛攻下，彈藥槍炮也都有用完的時刻。但是華軍富金山陣地之戰，卻給孫連仲調度兵馬迎戰，爭取到準備的時間，日軍在攻佔華軍富金山陣地之後，同樣的分兵兩路，北路進攻固始、潢川、羅山，南路進攻商城與沙窩。日軍仍是沒有想到華軍的作戰是如此英勇，日軍每攻一處陣地，都要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其中以宋希濂部堅守固始、張自忠部血戰潢川，孫震部力戰羅山，都令日軍受到很大的損失。不過由於華軍在此區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時作戰的戰線也最短，因此日軍第二軍，終於朝切斷平漢鐵路的作戰目標接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空軍，又在此一階段的戰役中，有著不少傑出的表現，這主要是因為蘇聯支援的飛機與志願隊到達，雖然在數量與質量上，中國空軍仍然處於極大的劣勢（當時蘇聯的E型戰機功能，遠低於日軍的零式戰機），但是由於華軍的戰志極高，因此還能屢次對日軍發動攻擊，沿長江炸毀幾十艘以上的軍艦，擊落數百架的日本飛機，其中單是在一九三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當天，武漢上空爆發空前激烈的空戰，中國空軍一舉擊落日機二十九架，自己只損失了五架。因此武漢地區的居民，經常可以看到中日空軍在上空決戰的鏡頭，全球的新聞媒體，也為中國空軍以寡擊眾的表現而喝彩。

蘇聯援華的「正義之劍」飛行志願軍，在中國的領空上，總共也有近百人的犧牲，這算是蘇聯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最大的貢獻。另外蘇聯也先後賣給中國價值兩億五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可以說是蘇聯利用中國軍民的生命，拖住日軍的「回報」。至於蘇聯原本有意出兵與日軍作戰的口頭承諾，在立法院長孫科兩次親訪莫斯科之後，仍然是毫無下文。史達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國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援中國以擊敗日本。史達林要日本戰力弱化到無法與蘇聯一戰，他更要利用中國因戰爭而殘破不堪的時機，繼續地侵略中國⁷。

25.7 日軍攻陷武漢空城

不過居於優勢的日軍，終於步步進逼到武漢決戰的外圍陣地，原本陳誠在武漢四周，投入相當的兵力，一直在趕工，準備建築相當複雜的防禦工事，若是有足夠的兵力與戰力投入，應該可以進行一場激烈的都市保衛戰。但是由於華軍已在武漢外圍的戰鬥被過度地消耗，因此沒有有效的力量防衛武漢（否則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補的殘兵防衛南京的故事）。蔣介石這次並不堅持要力守武漢。加上日軍在幾天前，在廣東登陸，切斷了中國主要的戰略物資進口基地，武漢無法繼續成為戰略物資進口的轉運中心，戰略地位也就不再那麼重要了。

由於在北路的日軍，在十月十二日順利的進佔信陽，而守軍胡宗南部潰敗，向西退向南陽，而沒有向南的武漢方向退守，造成武漢北方的防線出現兵力的空虛，這時日本第二軍既然切斷了平漢鐵路，日軍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轉，可以沿著平漢鐵路南下發動攻擊，對武漢華軍的北方防線，形成了明顯的側後威脅⁸。

這時，在武漢坐鎮指揮的蔣介石，也感到武漢面臨日軍攻佔與包圍的危

⁷以侵略中國之「成果」與野心而論，蘇聯（繼承帝俄）是最在行了，尚無能出其右者。

⁸胡宗南所留下的戰線缺口，造成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憤怒與震驚，因為這樣會立刻危及武漢的安全，但是胡宗南有蔣介石做為「後台」，李宗仁也拿他無可奈何。

機，在陳誠等人的極力建議之下，蔣介石同意，在華軍兵力已經面臨耗竭的狀況下，不宜在武漢本身進行決戰，以避免防守武漢的華軍遭到日軍的圍殲攻擊。

而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對於日本第二軍已經攻到武漢北方的消息，簡直比李宗仁還要震驚，因為岡村寧次一直將主力放在圍殲長江南岸的華軍，而與華軍發生激烈的纏鬥，死傷慘重，所以進軍武漢的攻勢受阻，現在在眼見北路的第二軍，已經攻佔信陽，可以快速沿著鐵路南下漢口，很可能會比第十一軍先攻佔武漢。

此時，岡村寧次爲了自己能夠贏得首先攻佔武漢的歷史威名，就顧不得從南方包抄武漢的作戰計畫了，他立刻調整第十一軍的作戰方針，不再以主力對武漢南部進行迂迴攻擊，以截斷華軍退卻的路線，而直接由長江北岸直撲武漢。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隊攻佔武漢，因此岡村命令在長江北岸的日軍第六師團，立刻兼程急進、進攻武漢空城。這次畑俊六當然是嚴令第六師團，必須完全遵守軍紀，不能在武漢重演南京的燒殺擄掠。

爲了要爭功，岡村寧次要自己統帥第十一軍部隊，搶先拿下武漢，而沒有對華軍，進行分進合擊的長距離包圍作戰，結果使得防守武漢周圍陣地的華軍，得以順利地由平漢、粵漢鐵路以東地區撤出。在十月二十六日，日軍第六師團進入長江北岸的漢口，同日，台灣旅團攻入長江南岸的武昌，日軍終於攻佔了中國的地緣與戰略心臟武漢三鎮。但是日軍並未照原計劃形成包圍作戰、切斷華軍的撤退路線，因此華軍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漢地區，並沒有出現大規模潰散的局面。同時這次華軍撤退之時，對於武漢的重工業與軍火工廠，都做了較有系統的破壞，才不至於將在武漢的建設大量地「資敵」。

此時由於日本自己認爲，只要日軍攻佔武漢，中國勢將屈服，因爲日軍估計，日本攻佔武漢與廣東之後，中國百分之九十的國防工業生產、百分之八十的關稅與鹽稅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糧食生產，都被日軍接收，無論怎樣計算，國民政府都不會再有力量，能夠繼續抵抗日軍了。

就是在這個「合理」的推測之下，日本的全國上下，都一致認爲，日軍一旦攻克武漢，中國的最後抵抗力量，勢將瓦解，「支那」失敗與投降，將是必然的結論，日本終於可以等待中國屈辱地投降。所以日本政府與人民，

在攻佔武漢後，可以說是再次陷入舉國同歡的境界，日本下令台灣全島鳴放汽笛慶祝，許多台灣人民更是傷心地認為，中國在武漢會戰的失敗，將使他們永無脫離日本統治的一天。

因此日軍攻克武漢之後，在日本各個地區，人民出現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輸與踴躍從軍之熱潮，連慰安婦的組織，都名額爆滿；單是寄往戰爭英雄岡村寧次的情書，就多達十幾萬份，因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認為，日軍既然攻克武漢，同時封鎖了中國對外主要的交通路線，國民政府被迫遷到西南邊陲地區，已經不復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圖與實力了，加上中國沒有工業生產、又無法輸入武器與軍火，如何還能夠與日軍繼續地對抗下去呢？所以中國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無其他的選擇。

為此，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指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已經成爲一個邊區地方政權，日本將與有意求和的中國政治勢力，完成中、日、滿親善的和平條約。日本政府與人民，就等著中國的使節，再度屈辱地出現在日本境內，誠惶誠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這種發自日本千年對中國自卑情結的內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興奮的歷史高峰。這是二千六百年以來，日本歷史上無法想像的偉大時刻。

但是日本人錯了，中國並沒有因爲武漢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國戰略空間的泥淖之中，從此日軍必須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二千多公里補給線，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中國從此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與優勢的地位，雖然她的工業地帶與對外聯絡通道都遭到摧毀與切斷，使得中國將要面對更爲艱苦的生活，但是中國軍民卻決心以無此堅忍的力量，熔成鋼鐵的意志，來繼續面對這場歷史的大決戰。中國人是決不屈服的。

華軍自從武漢撤退之後，有計畫地將大量軍隊，留在武漢以東地帶，繼續進行游擊作戰，這就造成在武漢日軍的後方極大之戰略威脅。日軍在武漢成爲孤軍深入的態勢，要佈署大量的兵力，來維護日軍漫長的補給線，從此中日之間的作戰，日軍只能控制主要據點與交通聯絡線，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帶狀地區而已。

在日本上下熱烈慶祝日軍攻佔武漢之時，大本營卻陷入了完全無力感的狀態，因爲到了這時候，日軍大本營才開始明白，自己已經掉入了中國的戰略陷阱之中。日本難以片面與迅速地結束中國事變，日本所有的國力與戰

力，就要這樣逐漸消耗在中國戰場之中，進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還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這個錯誤，所以日本爲了尋求支持戰爭的資源，終於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付出了亡國的代價。

25.8 武漢會戰的檢討

日軍發動武漢會戰，雖然在戰場的作戰上，大體仍然表現優異，但是日軍在戰略上，卻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日軍始終低估華軍的作戰意志，因此沒有集結更爲優勢的兵力，以圍殲華軍的野戰軍作爲日本作戰的主要目標。事實上，若是日軍能夠將原先準備攻略廣東的二十三軍，也調到武漢會戰中，這支部隊或是沿大別山快速進攻華軍陣地，提早切斷平漢線，由北向南包抄武漢；或是先進攻南昌，再穿過萍鄉進攻湖南長沙，包圍武漢南方，都會對華軍造成更爲震撼性的打擊，並達成圍殲華軍野戰軍的作戰目標。

當然陳誠若是能夠把鎮守武漢，一直在拼命趕做防禦工事的四個軍兵力（這些工事，最後根本就一點功用都沒有發揮），大膽調出交給薛岳靈活運用，也許華軍能夠在江西北部成功圍殲日軍的整個師團；或是給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給日軍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師團更大之打擊。當然若是第三戰區能夠發揮更爲旺盛的攻擊企圖，多威脅長江的航運，日軍在武漢會戰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日軍的作戰優勢，來自現代化的工業與社會的結構，無論在兵員補充與裝備更新上，都有非常先進的運作系統，因此日軍的戰力不但能在幾次戰役後，繼續保持、甚至能提高。華軍最大的困難，則是中國落後的工業與社會體系，別說作戰裝備壞一件、就少一件，就連兵員的補充，也因役政系統的落後，根本無法跟上軍隊的需要，補充的人員數量既不足，質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沒有經驗與訓練，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隊，去抵抗擁有現代化組織與強大火力的日軍？

在武漢會戰中，華軍在戰略的運用上，卻充分地掌握了主導的上風⁹，但是在戰場的層次，仍是敗多勝少的局面。以戰力與國力而言，中國落後日本兩個世紀之久，但是以謀略而言，日本卻無法運用戰力與國力的優勢，擊

⁹此時已經沒有德國軍事顧問的協助，而是中國的軍方領袖，首次單獨指揮與調派大軍，在如此寬廣的戰線上作戰。

敗中國。中國所憑藉的，全是中國人民不屈的民族主義精神，以血肉之軀去抵擋侵略者的現代化武器（在大別山與廬山的山麓，留下了無數的英雄血跡），這種悲壯的犧牲，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動人的光榮。

25.9 中國決定犧牲到底也不屈服

日軍雖然攻佔了武漢，但是日本沒有辦法迫使中國放棄繼續作戰的意志，這時的華軍，已經是更為獨立地作戰。德國的軍事顧問撤離了，外國購買的軍火減少了，主要國防工業的基礎全遭到摧毀，中國遷移到西南的工廠，由於缺乏系統的規劃，總數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強可以維持西南軍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戰爭的消耗。當時中國所能生產的步槍子彈，每個月為一千五百萬發，平均每個士兵只有四發子彈，更別說其他的重武器裝備與支援，更是少之又少了；土官兵們的軍服破爛、缺乏醫藥與保健照顧，甚至嚴重的營養不良等問題。中國的部隊拖著瘦弱的病體，拿著有限與落後的武器，在外援幾乎斷絕的情況下，中國還能、還要打下去嗎？

日本人不相信中國還能堅持下去，歐美國家不相信中國還能打下去，中國人卻以血汗與犧牲，堅忍的寫下了歷史光輝記錄。中國人決定犧牲到底打下去的鋼鐵意志¹⁰，讓日軍是完全不知所措。在日本人民慶祝完武漢攻略之後，才發現高興得太早了，中國的政府與軍民，仍然繼續抗日戰爭，反而變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個戰爭了。

日軍攻佔了武漢，不但沒有讓中國屈服，自己反而陷入了中國的戰略空間之中，日軍為了維持從東京到華中之間漫長的補給線，所必須耗費的資源，就已經是非常沉重的負擔，武漢會戰之後，日軍已經無力再深入中國發動更重大攻勢了。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戰略延伸，因此大體就維持著到武漢會戰為止的戰線。這個兩軍戰略僵持的局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發動一號作戰的攻勢，才被打破。在這段時間之內，日軍比較具有重大的戰略攻勢成就，只有攻克南昌與宜昌而已。

同時，在武漢會戰之後，中國原有的各路諸侯部隊，也因為原有的兵員消耗過劇，必須接受由國民政府統一的徵兵補充，同時大量擴充的軍校學生

¹⁰當時世界各國若是領土與軍力已經損失至此，照例都是投降，而到海外再組織流亡政府，只有中國是打到底。

畢業之後，也開始在各個部隊任職。因此中國大部分的軍隊，從此都開始國家化（除了中共的部隊以外），雖然在部隊的最高層，也許還看到這些地方諸侯擔任領導職務，但是部隊的結構與人員，都已經不再是傳統地方派系所主導的了。

中國對外通路的爭奪

整個中日戰爭中，一個勝負關鍵所在，就是中國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國蘇聯切斷的國際通路。由於同盟國反攻緬甸、打通西南對外通路的計畫，一再遭到英國反覆地拖延，中國就始終無法得到應有的援助，以裝備華軍成為可以在戰場上主動攻擊日軍的勁旅。即使如此，中國仍選擇苦撐到底、犧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繼續抗戰，可是在得到最後勝利的同時，也耗盡了國家一切的元氣。中國在戰後沒有足夠的實力爭取到戰勝國應有的權利與光榮，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賣，都與她在戰時無法得到應有的援助，有著直接而且重要的關係。

在武漢會戰之後，中日兩國的作戰，陷進了戰略僵持的局勢，雙方既然無法在戰場上分出輸贏，那麼兩國最後決定性勝負的關鍵，就轉移到戰略資源運輸通路的爭奪上了。誰要是能先截斷對方供應戰略資源的通路，誰就是戰爭最後的贏家。因此日本決定要盡一切的力量，來切斷中國的對外通路，只有如此，中國才有可能失去繼續作戰的能力。因此日本的戰略目標，一是深入中南半島與印度洋，切斷中國西南方的對外通路；二是與蘇俄（日本原來的世仇）完成了一個利益交換的協定，讓史達林（所謂反法西斯同盟國中的一員）自動配合日本切斷中國經新疆通中亞的西北通路。

26.1 對外通路決定戰爭的勝負關鍵

在抗日戰爭的時期，中國仍是一個全方位落後的弱國，特別是在中國西南的抗戰後方基地，根本沒有作戰所必需的工業結構與能源供應。因此，中國需要從外國輸入維持作戰的必要資源——最主要的是石油、軍火原料與各種零件的進口，這是支撐中國繼續武力抗日的的基本條件。若這個供應線一旦被完全地切斷，中國就無法繼續抵抗日本了。

同樣的，日本本國的戰爭資源也非常有限，其作戰成敗關鍵，亦在於維持物資供應路線的通暢，以輸送石油、鋼鐵、橡膠，與各種金屬等戰略物資回到本土。根據史料的分析，當西方國家終於在一九四一年，決定停止對日出售這些原料之後，日本除了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外，已別無選擇。後來以中國為基地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開始有效地威脅到日本從南洋到本土間戰略資源的海上通路之後，日本只有再孤注一擲地發動「一號作戰計劃」(Operation Ichi-Go)，企圖消滅中國華南的空軍基地，以確保日本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¹。

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豈只中、日如此，德國、英國、蘇聯，也全都一樣：作戰國若無法維持戰爭資源進口路線的暢通，戰爭就不可能持續下去了，當德國被迫放棄所佔領的東歐油田之後，納粹武力的失敗，就是必然之結果。英國與蘇聯全是靠美國提供的作戰資源才能打下去，因此盟國維護大西洋與北冰洋航運暢通的防潛作戰，實際上是同盟國在歐洲作戰勝負的關鍵所在。

26.2 日本進攻廣東

日軍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間的徐州會戰撲空之後，日本大本營在驚怒交加，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就匆促決定改變日軍對華之速戰速決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一反過去日本對華戰爭中，盡可能將事變控制為局部性作戰之戰略佈局。在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營會議斷然決定，發動日軍的漢口攻略計劃，準備深入中國的武漢地區作戰。

¹以戰爭的觀點而言，假如英、美等西方國家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就立刻終止向日本大量出售石油、鋼鐵、橡膠等戰爭原料，日軍很快地就會在中國戰場失去了戰力。日軍不但在中國必須付出更大的傷亡代價，恐怕也無法攻佔武漢及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區域，它更是沒有力量發動太平洋戰爭。

日軍漢口攻略的主要戰略目的，是要攻佔中國在武漢的作戰指揮中心（當時國民政府的軍事指揮中心——軍委會設在武漢，而當時舉國一致的口號是發揮武漢抗日精神），並大量殲滅中國的野戰軍，以迫使國民政府最後退守西部邊區，因而退化成為一個失去戰力的地方性政權。日方估計，武漢作戰完成之後，一方面國民政府很可能向日本政府乞和，二方面就是日本可以更方便在中國的精華區，另外扶植與操縱傀儡政府，達成日本「以戰養戰」的新戰略。

日本政府亦認為，要想迫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至少還要實際上切斷中國所有外援輸入的通道，特別是截斷來自西方國家的軍備進口才行。因此日本大本營在決定日軍進攻武漢的同時，也計劃在適當的時機，攻略華南的廣東，以切斷中國當時最急需的國外軍火與民生必需品之進口。因為在上海淪陷之後，中國最為重要的軍火與民生必需品，多數是從香港與廣州的港口轉運到內地與前線。日軍在徐州會戰之時，已經發現，中國軍隊戰力復原的速度超過日方預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在國際軍火市場中，買進了大量的裝備。

事實上，日軍大本營早在一九三七年年底決定進攻南京之時，就有進攻廣東、切斷中國華南海港對外聯絡的作戰計劃。當時日軍大本營已經抽調了三個師團的兵力，組成第五軍的戰鬥序列，在台灣集結，準備進攻廣東的對外口岸。但是日本也知道，一旦正式進攻廣東，切斷廣東與香港的交通，將會嚴重影響到英法兩國的利益，而會遭到它們強烈的反對，因此日本也有在可能的範圍內仍以低姿態來減少國際強權的反彈的考慮。不料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軍飛機誤襲美國與英國在長江巡航護僑的船艦，因而造成美國與英國政府的聯合強烈抗議。日本政府不願引爆英美集團更為強烈的反對，因此臨時撤銷第五軍戰鬥序列之廣東攻略計劃，因而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從香港與廣東，源源運進了幾千萬元的軍事裝備。

因此，日軍大本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會議中，由裕仁日皇親自裁示大本營，在攻略武漢的同時，應該策劃攻略廣東。這對於兵力有限的日軍而言，造成了另外一次戰略佈局的錯誤。日軍爲了同時準備進攻廣東的兵力，特別設立第二十一軍的戰鬥序列，抽調日軍第五、十八、一〇四師團，參加廣東作戰。因此日軍在武漢會戰中，少掉了多達三個師團的兵力，使得日軍在武漢會戰中的幾個主要戰場上，缺乏更為優勢的兵力，而無法進

行包圍或是殲滅華軍的決戰。日軍最後只是攻克了一座武漢的空城，賠上的卻是整個日軍在中國戰場戰略主動的地位。

在日軍開始集結準備進行廣東攻略的時候，蔣介石卻低估了日軍進軍華南的決心，因此當相關的情報顯示，日軍可能在華南發動攻勢的集結之時（這時美英法等國才有些緊張，將日軍在華南海域的活動情報，主動的告知國民政府），蔣介石仍誤認為，日軍當時正在全力進行武漢作戰，因此不可能分兵進攻廣東。由於華軍在武漢會戰需要更多的支援部隊，蔣甚至還進一步從廣東抽調部隊，以支援武漢，因此國民政府在廣東的防務，只剩下了三個軍，可以說是兵力已經不充足；而廣東的軍政最高負責人余漢謀，也沒有設法運用有限的兵力，設計對抗日軍入侵的作戰策略，所以廣東的防務可以說是處於一個混亂的狀態。

日本第二十一軍戰鬥序列，由大本營調台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中將出任指揮官，統帥第五師團（安藤利吉）、十八師團（久納誠一）、一〇四師團（三老俊雄），以及第四飛行團及海軍艦隊，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從香港附近的大亞灣登陸。日軍登陸後幾乎沒有遭到華軍堅強的抵抗，就一路直逼省會廣州，余漢謀除了向蔣介石發出告急的電報之外，並沒有充分靈活地運用其有限的兵力來禦敵。

由於余漢謀本人並沒有經過真正的大陣仗，作戰計劃上缺乏了主動的精神，加上粵軍的主力，早已多數北調支援華中戰場，余漢謀卻還將手邊有限的兵力做分散與被動的防禦佈署，使得華軍在廣東的防線被拉得既長又薄弱，根本無法形成有力的防禦態勢。可是當時廣東民眾在抗日的問題上，一向自視極高，粵軍在華東與華中的作戰也非常出色，因此百姓民氣高揚，認為假如日軍膽敢進犯，廣東人絕對要使日軍「死得最為難看」，當年十月在廣州舉行的保衛廣東之十萬群眾火炬遊行，氣象真是豪氣干雲。

但情緒激昂的民意必須有慎密的計劃配合方能成事，否則只能集結一群烏合之眾。不幸余漢謀根本沒有把這些抗日心切的百姓，組成有效的軍事力量，反而白費心力去應付各種民眾的集會，到處高呼口號，在真正能夠發揮抗日力量的重要作戰組織上，卻是缺兵、缺糧，也沒有結實地設立好防禦陣地，甚至連與日軍進行游擊戰的規劃都沒有。廣東的防務既是這樣地不切實際，如何能在抗日作戰中真正有所表現²？

²此時作者的先父正在廣東，眼見這種「打高空」的抗日表現，非常之著急與失望，最後斷

因此，在廣東登陸的日軍，以集中的兵力對華軍的陣地，進行快速的進攻後，很輕易地就突穿與割裂了華軍的防線，幾天之內，日軍就攻到了廣州附近，對它形成了戰略的包圍。余漢謀眼看大勢已不可為，只有不戰而退出廣州（後來余漢謀為此敗筆而受革職留任的處分）。日軍於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輕鬆地攻克了廣州，也一併切斷了華南主要對外口岸的交通。

日軍陷廣州之後，就等於切斷了中國最後一條主要對外的交通聯絡動脈，因此造成了國際社會相當的震驚。各國普遍地認為，廣東一失守，中國已經失去進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來很難得到其所需的作戰資源了，又因為中國大後方西南地區的工業非常落後，根本無法生產足夠的作戰資源來支持對日作戰，因此中國將會很快地對日屈服。

廣東的失陷，對於中國抗日的社會人心，以及國際社會的觀點影響也很大，甚至影響到美國考慮暫停協商對華的桐油貸款。這時候，德國與義大利因為與日本結盟反共的關係，已經先後停止出售軍事裝備給中國，並且承認了滿洲國、撤回軍事顧問與終止外交關係。因此中國只能從國際軍火市場中，設法弄到一些武器與作戰、民生必需的醫葯產品，從越南的河內或是緬甸的仰光，經雲南進口到大西南。

日本眼見攻佔廣東之後，中國還能從海南島、越南等地，以分散作業方式，進口支援其作戰的必要物資，因此日決心攻佔海南島，甚至威脅越南。於是日軍頻仍出現在南中國海，而開始直接威脅到美國在菲律賓、法國在中南半島及英國在馬來西亞的利益了。此時這些國家才開始認真考慮，日本侵華戰爭的擴散已經嚴重破壞了亞洲的戰略結構，以及影響各國在亞洲之利益，所以這些國家開始考慮是否要停止出售戰略物資給日本³。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軍完成武漢攻略與廣東攻略之後，中日的全面戰爭的態勢，就從中國採取戰略防禦的初期，演變成爲中、日戰略僵持的局面。大體上雙方的戰線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沒有重大的變動，這種對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計劃時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國共有三十四個師團，其中只有近衛師團留守日本本土，一個師團駐守朝鮮半島，其餘的部隊，全都在中國戰場，其中有

然決定北上延安，報名中共的「抗日軍政大學」，參加有組織、訓練的抗日作戰。

³一九四〇年，日軍利用法國在歐戰的慘敗，乘機進軍越南，切斷了中國經越南北部的對外通路，這就成爲後來美、日兩國交涉的重點所在。

八個師團屬於關東軍，戰略任務是防蘇，其餘的二十四個師團，則在中國的關內進行作戰任務，這種兵力極端不平衡的配置，嚴重消耗了日本的國力與戰力。日本將自己陷在泥沼之中，遲遲無法結束中國事變，但又要面對美、蘇的壓力，這自然迫使日本遲早會設法做出更大的軍事冒險。

日本動員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國進行武漢作戰，僅勉強地達到了下列的結果：日本封鎖了中國的海岸線，同時也控制了中國主要的大都會與工業地帶，但是日軍在廣大的中國領土之中，只能控制點與線，以及少數的帶狀地區，日軍在補給路沿線必須配置之部隊（以維持運輸線之安全）的總數，甚至接近日軍在前線作戰兵力的數目。

華軍最為特別的戰略，是在中、日的戰線之後，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對日軍的補給線以及漢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脅。在日軍戰線後方的游擊戰，中國共產黨部隊的發展，比國民政府更為靈活且有彈性，日軍為了清剿這些華軍游擊隊的活動，經常是勞師動眾、頗有傷亡，但是收效卻非常地有限。

由於中國的海岸線此時已被日本完全封鎖，於是打開後方國際通路的努力，就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後期的成敗關鍵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設法全力切斷中國的對外通路，以逼迫中國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蘇兩個盟國一刻也沒有放過中國，在打通中國對外通路的計劃上，大玩其政略陰謀，使得援助中國的通路，遲遲不通，中國根本無法獲得足夠的作戰資源，最後甚至連保護自己國家利益的實力都不存在了。

26.3 英、蘇兩國的戰略陰謀

雖然，在中日戰爭初期，國際社會中曾經比較公開支持中國抗日的是蘇聯，它甚至多次傳出將與中國并肩作戰的訊息，而在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蘇聯在前後三年內，總共提供中國兩億五千萬美元的軍火信用貸款（當然是中國要連本金帶利息來償還的）、售予中國可以裝備三十個陸軍師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戰機，都是從新疆經甘肅進口；另外蘇聯派有軍事顧問與飛機志願大隊，到達中國參戰，目的是收集日軍作戰的戰術與裝備的情報。而當時中國最為希望的，是蘇聯能夠與日本正式作戰，以減輕中國所受到的壓力，但是蘇俄則設法不斷拖延與欺哄中國，所謂俄國將對日作戰的計劃，從頭到

尾都是空話。

因爲史達林支持中國抗日的戰略目標，是絕對不希望全力武裝中國以致於打敗日本的侵略，蘇聯只是希望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讓中、日的國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這樣蘇聯才能輕易的從中日戰爭中，獲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戰力被中國嚴重的消耗，而無力威脅蘇聯，一方面中國受到日軍嚴重的打擊，使得中國民窮財盡、再起內戰，蘇聯可以輕易地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要知道幾百年來，對中國最有侵略野心與佈署的就是俄國，繼承帝俄的蘇聯怎會讓中國發展強大，又怎能放過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史達林先利用中國抗日以消耗日軍的戰略，然後再回手介入分裂與弱化中國的手法，真可以算是集歷史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策略精華之大成，更是標準的一石二鳥的謀略。

精明強悍的丘吉爾，他認爲自己對英國的歷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要全力使不列顛仍維持一個「日不落帝國」的規模，特別是必須保留它在亞洲的殖民地，並且要繼續操控英方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基於這個大策略的前提，實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國，不單要設法阻止中國在戰後的復興與強大，更要加速中國內部的政治分裂與內戰，以防止中國將來成爲亞洲各民族國家抗拒西方殖民主義的領袖。丘吉爾當然非常注意蘇聯對中國的一舉一動，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學到了史達林侵略中國的絕竅，並以青出於藍的手法，加以翻新應用。英國在戰爭期間一再對美國的羅斯福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美國只能給予中國戰區最低限度的支持與援助，目標就是讓中國還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將日軍陷在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但卻絕對不能給予中國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國能擊敗日本的主力而於戰後得到復興；在美援華的同時，還要設法製造中國內部的矛盾，並培養中國內部的分裂勢力，這樣縱使中國可以戰勝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國仍然無法成爲亞洲的強國。

一九四二年初，英國先是輕率地放棄了對其緬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國的西南對外通道因而被切斷。隨後這個中國的「盟友」，又想盡所有千奇百怪、反覆無常的藉口，在盟國反攻緬甸、打通滇緬公路的行動計劃中一再地玩弄策略，以離間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英國的亞洲戰略，就是設法讓中國在精疲力竭的邊緣中掙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幫助中國（但卻要求中國盡力幫助它來防守緬甸），早日打通滇緬公路。因而中國在抗戰最艱苦的關鍵時段裡，一直無法從對外通路中，獲得充裕的作戰資源供應，中國的國力因而

加倍地消耗殆盡，自然就「確定」了戰後的中國不可能強大復興起來，於是英國就可以放心，繼續在亞洲維持其殖民主義的利益。

因此蘇俄與英國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立場，一直是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戰略手法，當中國面臨危機的時候，他們會給中國一點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國放棄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國要有所振作，他們就會立刻卡住中國的命脈。故此中國當時真正要面對的歷史挑戰，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時在背後，還要面對英蘇這兩個各懷鬼胎、繼續進行侵略中國的「盟友」

美國的立場則是處在「夾縫」之中，一方面美國是希望每個受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略的國家，都能在國際社會正義的支援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過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極看重其在亞洲的商業與戰略利益。在中國艱苦抗戰的初期，美國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條約，大量地供應日本生產軍備與彈藥的原料，以及提供日軍飛機、坦克在中國戰場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與石油。結果使得日本的戰爭機器，能夠在中國領土全速運作——當然日本的軍國主義最後也把美國當成其攻擊的目標。

26.4 蘇聯切斷中國的作戰生命線

中國抗日戰爭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就是以中國人民與國土的損失，換取等待國際社會加入並肩對日作戰的時間。這個戰略的著眼點，是中國一旦獲得世界其他國家參與共同對抗法西斯的戰爭之後，她就可以結束孤軍抗日的不利狀況，並可獲得盟國的作戰資源協助，而將華軍戰力徹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擊日軍，成為盟國當中的主力部隊。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由於中國對外的通路，被日本與蘇聯所分別切斷，盟國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國際通路的策略，遲遲沒有將作戰資源，運到華軍的手上，結果雖然是中國與盟國共同參加反法西斯作戰，但是她一直沒有辦法得到盟國所應許要供應的援助，因此中國軍隊也就無法展現應有的作戰能力。

日本雖然切斷了中國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蘇聯經中國西北進入關中與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輸入中國抗日所需的物資，但是此時史達林已經看出中國民族的堅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國絕對會不屈不撓地與日本奮

戰到底。一九四〇年德國在歐洲發動閃電作戰成功之後，史達林估計納粹德國隨時可能會對蘇發動攻擊，所以開始擔心日本是否會利用機會，與德國合作，聯手東西夾攻蘇聯。史達林於是與日本進行交涉，願意以停止援助中國抗日為條件，換取日本與蘇聯簽定中立友好條約。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蘇兩國就以一紙「日蘇中立條約」，完全切斷了中國西北經蘇的外援通路。於是中國能夠獲得外來石油與軍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雲南通緬甸的公路而已了。

當然站在蘇聯自己的國家利益而言，它爲了避免遭到德國與日本的兩面夾攻，以停止援助中國來換取減輕日本的軍事威脅，是可以勉強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日軍事實已經沒有多餘的戰力可以對蘇聯進行作戰。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緬甸北部，完全切斷了中國對外的通路，中國戰區可以說是面臨了彈盡援絕的生死關頭。此時的蘇聯，實際已經沒有日本威脅的後顧之憂，但是這個「盟國」，卻坐視中國面臨作戰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機，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國，更不准盟國借道蘇聯援華，造成中國最後只能靠極其有限的駝峰 (the Hump) 空運，來支持六百萬抗日部隊的需要，蘇聯存心要置中國於死地的企圖就非常明顯了⁴。史達林的作法很簡單，只要中國失去力量，那麼就非常方便蘇聯對華的繼續侵略。日本有了蘇聯這個紅色帝國主義的侵略幫凶，當然就可以說是助益太大了。

蘇聯切斷盟國援助中國的主要交通路線，對於中國整個作戰能力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日軍對華軍在所有會戰中之打擊。因爲就算是中國遭到原子彈的轟炸，其歷史的結局，也不會比蘇聯切斷中國對外交通路線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更爲深遠。蘇聯切斷了中國的對外通路，使得中國必須完全依賴盟國反攻緬甸的計劃，丘吉爾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國，也引爆了中國與英國甚至美國的摩擦與衝突，因而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戰後的歷史命運。而多達六百萬的中國軍隊，就在近乎彈盡援絕的情況下，不但沒有足夠的作戰裝備、沒有醫療後勤，甚至連基本的衣食供應都常有問題（中國的處境雖

⁴共同對抗法西斯軸心國的責任，就是同盟國在作戰上相互支援與共同進退，中國在極端的劣勢下爲整個盟國擋住了日軍的兵鋒，尤其蘇聯因此不必雙線作戰，而蒙受了極大的利益（如果國民政府決定與日和談或向日屈服，讓日本能及早結束中國事變，日軍早就會進一步攻擊與威脅蘇聯在西伯利亞東線的戰略要地了）。製造戰爭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專長，若不是日軍被中國的戰略泥淖陷住而無力分身，一紙日蘇中立條約只不過是張廢紙罷了！

是這樣惡劣，但她仍然繼續苦撐了四年，堅決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後贏得了勝利)。

整個中日戰爭中，一個勝負關鍵所在，就是中國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國蘇聯切斷的國際通路。由於盟國反攻緬甸、打通西南對外通路的計畫，一再遭到英國反覆地拖延，中國始終無法得到應有的援助，以裝備華軍成爲可以在戰場上主動攻擊日軍的勁旅。即使如此，中國仍選擇苦撐到底、犧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繼續抗戰⁵，可是在得到最後勝利的同時，中國也耗盡了國家一切的元氣。中國在戰後沒有足夠的實力爭取到戰勝國應有的權利與光榮，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賣，都與她在戰時無法得到應有的援助，有著直接而且重要的關係。

雖然中國處在這種極其惡劣的危機狀況之中，但是國民政府仍然以團結共抗法西斯的戰略爲重，中國不但在山窮水盡的情形下堅忍到底，拖住了日軍百萬以上軍力，而且還設法冒著自己後方基地遭到日軍攻擊的危險，將從駝峰空運所得到物資的百分之八十，都用來支援在華的盟國空軍，以空中轟炸來重創日本的運輸船隊，形同截斷了日本通南洋的戰略物資航路，造成日本總體戰力瀕臨崩潰，但卻也爲中國惹來了日軍最後孤注一擲反撲的沈重打擊。中國爲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戰，用盡了超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國卻幾乎沒有實質地幫助中國建立起反攻日軍的軍力，也絲毫沒有放過對中國的暗算——這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如何殘酷對待中國的歷史真相。

⁵ 蔣介石並且完全不接受日本屢次向中國提出的停戰條件，尤其到了後期，日本事實上給中國之條件是越來越有利。但蔣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國之間的協定，從來沒有單獨與日本進行停戰的談判，可是英、蘇、美在出賣中國的陰謀上卻表現的非常理所當然，事後連一絲的懊悔都沒有。

從和平運動到叛國結局的 汪精衛

也許我們不能完全否定汪精衛在剛開始，所謂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或許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別是汪本人在開始與日本接觸時，也無意自願成為漢奸。但是汪精衛最大的錯誤，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強者與「鄙視」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賴日方的力量來建立政權，那麼日本人就會完全把他當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衛最終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了。在持守國家民族的大義上，歷史的考驗是非常嚴酷的，所謂曲線救國的做法，最終斷送了汪精衛在中國所有的歷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見無法以速戰速決的戰略，迫使中國屈服投降，只有改變戰略方針，使用「以戰養戰」的策略，也就是要設法將中國人當成日軍作戰的砲灰，同時搜刮中國所有的資源，來維持日本侵略的開支。爲了達成以戰養戰的策略，日本就必須設法培養以華制華的漢奸政權。

27.1 皇民與漢奸

事實上，日本對於侵略中國，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認知前題，那就是日本有一種非常自以為是的「確信」，就是當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缺乏團結與共識之待斃的民族，中國人最多的心力，都會擺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訌之中，內鬥裡非要拼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時日本人也認為，當時的中國貧窮又落後，定會有許多的人，禁不起威脅利誘，而會成為與日本進行合作、出賣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軍政領袖均認為，只要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中國在遭到幾場嚴重的敗仗之後，中國人就會放棄團結一致長期抗日的暫時共識，而會爭相地投靠日本；中國人最多會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絕對沒有長期抗戰的能耐。

這就是日本人認為中國的民族劣根性——「一盤散沙」與「五分鐘熱度」，所以並不擔心中國會以長期抗戰，讓日本陷入戰略泥淖的原因。因為當時日本的「中國通」，的確已找到不少忘卻國家民族大義，設法投靠日本權勢與利益的漢奸，這些漢奸們在日本的武力、壓力與利益的引誘之下，爭先恐後的出現，甘心為日本效力並奴役中國。

而滿洲國、蒙古國與冀東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與漢奸們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國已經是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國家了。這個全面落後的中國，又失去了民族主義的共識，那裡還能與先進的日本國，進行歷史的決戰呢？日本已經建立將中國大分八塊的「構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個分裂的中國，正是日本能夠強盛的歷史機遇。

的確，由於當時的中國，既缺乏自我認同的國家共識，也更無對抗日本侵略的國力，在尚未做好準備之前，中國就要孤獨地面對世界級強權的全力打擊，其中的困難與考驗，實為人類史上一個民族國家所面臨之最為嚴重的難關與考驗了。因此這不是每一個的中國人，都能熬過這種比地獄還要艱難的過程，有人撐不下去，有人半路變節，也有人承受不了榮華富貴的引誘，而出賣自己的良知與民族。因此在無數中國人以鮮血與淚水支持的抗日史實中，也有部分人背棄了國家民族的大義，成為投靠日本的漢奸。

但是日本人還是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低估了中國的民族性。因為一旦中國退到忍無可忍的階段，那麼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就會發出無可想象的歷史能量，支持全體的中國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價，來面對歷史的危機。這

個力量之巨大，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無法抗衡的力量。丘吉爾曾說過：『日本永無止境的侵略中國，終於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這是當時中國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國的甦醒，將會改變人類的歷史。』

27.2 汪精衛的背景

在所有變節的中國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驚與可惜的，就是國民政府中高層領導人汪精衛的叛國。汪精衛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曾經參與刺殺清朝執政官員的行動，被捕下獄¹，之後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成為孫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孫中山先生簡潔流暢的政治遺囑，即是汪所代擬的。後來汪精衛在國民政府之中，幾度進出，都是領導級的人物，但是汪精衛卻逐漸地表現出極強的權力慾望，以及採取遠離原則的政治取向，因此同為粵派領袖的胡漢民，甚至恥於與汪精衛談話。而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分合，更是當時國民政府運作中，最為主要的政治權力鬥爭。當然蔣、汪之爭，也涉及到國民黨寧派與粵派勢力的傾軋。

汪精衛留學日本，鼓吹中國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衛在早期，是主張採取較為強硬的立場來對付日本的欺壓。從九一八事變到長城口的對日軍作戰，汪精衛一直以蔣介石、張學良不抗日，做為主要政治鬥爭的藉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政策，以軍事反擊的準備，面對日本的步步蠶食中國。

但是華軍在長城之戰中，遭到日本全面現代化武力與戰技的打擊，犧牲極為慘烈，汪精衛才真正了解到，中日兩國在現代化作戰能力的差距太大，從此他轉而認為，中國絕對不能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在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援下，中日之戰的結果，絕對是中國亡國一途。

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汪精衛眼見中國軍隊傷亡慘重、外援不濟、國家財政枯竭，加上工業地帶遭到日軍的佔領與摧毀，這都使人懷疑『這仗怎麼打下去？』（汪精衛本人當時經常使用的評語）。同時汪也認為，中日之戰會給蘇聯帶來最高的漁利，中國必然遭到蘇聯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裡並不贊成抗戰到底的政策主張。

¹當時汪精衛的絕命詩：『慷慨赴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真是豪俠之言。

27.3 堅守立場的和談是鬥爭而非投降

事實上，中日之間，所以會因七七事變爆發全面的戰爭，原先並非是中日最高決策當局，有計劃的要打全面戰爭，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對各種衝突與意外時，沒有作出正確的決斷，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間歷史決戰的災難。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無法戰勝日本，日本亦無法打敗中國；中日都同時有個共同的最大敵人——蘇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因有蘇聯在等著揀便宜，所以戰爭最後根本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因此在中日雙方，各有不同的派系與政治人物，分別希望能夠「化解」這場戰爭——假如雙方能夠在一些彼此還能接受的條件下，達成結束全面戰爭的協議，對於中日兩國，都會有很大的利益。

由於國民政府知道，當時自己沒有能力打敗日本，日本政府也有設法結束作戰的意圖，同時在國際社會，雖然少有人真心幫助中國抗戰，但是世界各國都不希望中日戰爭影響到它們的利益，所以它們也會有目的的介入調停。由於中國政府迫切地需要外援，當然不能一概拒絕外國的調停²。

所以國民政府爲了國家最高利益，必須同時保有作戰與談判的兩手策略，只要和談結果不會損及國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談的接觸並非錯誤。日本曾經多次向中國提出和談條件，但是蔣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則是非常地清楚，就是任何和談條件的底線，都不能讓中國從七七事變當時之狀況，再做任何的退讓。但是日政府卻無法做到這點，所以中日雙方時常有著接觸的管道，但是卻始終沒有進行任何真正的談判。

27.4 高宗武的穿針引線

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就是長期在中日之間，設法進行和平談判的接觸者，蔣介石並不完全反對他的穿梭活動，也經常的從他那裡，設法了解日本政府對於結束中日戰爭的立場與態度。因爲當時日本政府人事變化之快，有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確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結束中日戰爭，以利日本抽身，來面對更大強權的挑戰。但是日軍方面的強硬派，眼看中日戰爭根本無法速戰速決，因此決定不妨利用高宗武這個管

²在這裡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對敵和談的接觸，因爲能夠堅持中國國家民族立場的談判，也等於是一場爲中國爭取最高利益的鬥爭（只有放棄國家利益的和談，才是賣國的可恥行爲）。

道，利誘國民政府內部的領導人，建立以華制華戰略的傀儡政府。

事實上，日本從戰爭一開始，就對於建立漢奸政權，有著非常明確的系統計劃，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與廣泛的名單，掌握了這些人士的背景與弱點，每當日本在中國攻佔一處地方，就會設法建立各種協助日本鎮壓華人反抗的漢奸政權，雖然在日本的威脅利誘之下，有一些缺乏國家意識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舊官僚，或是失去權力與地盤的軍閥），出來與日本合作，謀取一官半職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鴻志與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卻無法真正找到他們所要的人選——即是有全國性知名度及影響力的人士，出來為日本服務，以取代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在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取代了速戰速決的戰略之後，尋求能夠協助日本控制佔領區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為急迫。日本先後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紹儀（出任過北洋政府的內閣總理）與吳佩孚（曾經是戰功顯赫的軍事強人），雖然唐有合作的意願，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愛國志士刺殺身亡；吳佩孚則是一直不願成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結果死因離奇。

這時候，汪精衛身為國民政府的第二號領導人物，也是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國民參政會議議長，同時與粵系和西南的軍政人物，交情頗深³。汪精衛雖然沒有直接領導的實權，但是仍然預聞軍政之大政方針，並且可以左右一些決策，也有些黨政派系的人物追隨他。由於汪精衛長期負責外交決策的指導，因此高宗武與汪精衛關係也就相當的密切。

27.5 對日和談的幻想

高宗武眼見華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家失地日廣，但另一方面，日軍深入中國卻也無法獲勝，日本政府又在軍方的壓力之下，發表不與國民政府交涉的聲明。可是高宗武認為，日本政府內部是有尋求和解的打算，但是這些人為了要找個台階好下、讓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夠在蔣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層政治人士出面，來與日本進行和談。這樣中日雙方都有一個以談判

³當時蔣介石只是長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領袖，至於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為抗日的關係，推認蔣為領導人而已，蔣介石暫時借用四川、雲、貴、湘、桂等地做為抗戰的基地。

解決衝突的轉圜，而汪精衛應是一個可以出面的人物，這樣一旦進行中日的和談，蔣介石可以將部分責任推給汪精衛，日本政府也可以有藉口對日本軍方做個交待。

因此高宗武積極地與部分的日本軍政領袖，進行各種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協商，而汪精衛眼看華軍一系列的作戰失利，國民政府已經退到中國的內陸，軍事與經濟狀況都極其不利，外國的援助又逐漸中斷，長久下來，中國軍隊的後勤不濟，國家經濟運作發生困難，都會影響到繼續作戰的意志。因此汪精衛逐漸認為，中國要想繼續再戰的希望，已經非常的渺茫；加上幾個國際強權，也爲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夠在中國政府之中，找到蔣介石之外的政治領袖，這樣可以藉著談判，結束中日戰爭。所以汪精衛覺得這是他的一個機會，與其坐看中國抗日戰爭走上最後全面的失敗，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殘局。

事實上，華軍從武漢撤退前，德國與義大利已中止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同時拒絕再將軍火賣給中國。雖然蘇聯此時對中國仍提供有限的軍售，但已經幾乎可以確定蘇聯不會與日本宣戰了，而英美等國也只僅止於道義支持而已，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多少已經接近彈盡援絕的地步了。當時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國最多只能再支撐六個月」的報告。國民政府的高層決策人士，對於繼續作戰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著相當悲觀的看

續抗戰的立場，以待國際環境的變化（這時候就可以看出誰是真正的抗日了）

27.6 第三勢力斡旋的構想

此時義大利政府進行巧妙的穿針引線工作，接觸汪精衛以及主和派裡「低調俱樂部」成員陳公博、周佛海等人，表達了軸心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儘快與日本達成和談，以建立聯合反共的國際同盟。他們擔保日本政府會接受一個既非親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勢力」出現，這樣日本政府會有和談的台階可以下，中國也能有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機會。

而日本政府與軍部已經了解，日本無法擊敗中國的抵抗意志，因此無論是採取以戰養戰的戰略（陸軍省的看法），還是設法退出中國的戰略消耗泥

淖（參謀本部的主張），它都要找到可以與中國進行協商的對手。在唐紹儀遇刺、吳佩孚不肯就範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間進行遊說，他推荐汪精衛不失為一適當的人選。

當時高宗武的計劃是，由汪精衛設法運動粵系的將領與西南地方（雲南與四川）的山頭，在日本軍方的掩護支援之下，在西南成立一個不同於蔣介石的第三政治勢力，然後由這個政治勢力設法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在中日雙方達成共同合作與反共的協議之後，再由這個第三勢力，來與蔣介石的反日勢力進行內部的協商，最終結束中日的全面戰爭，建立一個中日合作反共的東亞政治結構。這樣中國可以免除戰禍，而獲得重新發展建設的機會，日本也可以留下實力面對蘇聯挑戰的壓力。

雖然高宗武的設計，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軍方非主流將領的支持，但是日本陸軍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國作戰的日軍將領，卻只想利用這個所謂和平的方法，設法建立起傀儡政權，以方便以華制華，而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與日本軍政領袖代表影佐禎昭達成了秘密協定，日本應允將支持汪精衛籌組第三勢力的發展，以促進中日之間和平解決戰爭。梅思平將這個協定通知汪精衛以及其他低調俱樂部的成員。

由於汪精衛了解，蔣介石此時的抗日意志極強，除非日本同意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局勢，否則蔣不可能接受任何與日本的和平協議，因此汪精衛決定與其部屬，分別離開西南地區。汪精衛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設法借道雲南到達越南的河內，準備開始發表響應日本和平提議的言論。以汪在國民政府內的地位，當然會造成對國民政府抗日立場的嚴重衝擊。因此蔣介石爲了設法減輕汪精衛的影響，一方面透過各種管道，希望汪既然脫離了重慶，最好是先到歐美遊歷，以免他的言行影響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則是與西南的地方山頭，進行軟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們響應汪精衛的行動。汪精衛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與疏通，反而進一步地與日本政府加強接觸。

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則依照事先的約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發表有關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場，而汪精衛則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內發表「豔電」，公然響應日本政府的立場，汪並且表示，他代表國民政府高層多數首長，發表希望能夠停止抗戰的意見，只是因爲蔣介石握有兵權，大家無法公開地反抗蔣的決定。蔣介石既以個人的意志，迫使重慶國民

政府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而繼續與日本作戰，他只有離開重慶，才能推展和平運動。

重慶的國民政府領袖，對於汪精衛發表的「豔電」，產生非常強烈的反彈，並且立刻召開特別會議，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決定免除汪精衛黨內外一切的職務。國民政府特別地聲明，汪精衛響應日本的立場，純粹只是汪個人賣國的言行，國民政府仍然要繼續抗戰到底。此時汪精衛已經有些騎虎難下了，不過大家仍然保留了討價還價的空間。

汪精衛不斷在河內發表各種打擊抗日的聲明，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影響到抗日的人心士氣，同時他也在設法影響西南的軍政領袖，必要時響應他的立場，推翻蔣介石的領導，組成第三勢力。但是事實上，日本在戰爭期間，對於中國人民所造成的殘酷傷害，已經讓中國人根本無法相信，日本會給予中國一個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條件。中國人當時的選擇，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爲日本的漢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會有所謂第三勢力的存在空間。最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蔣介石派遣軍統的特務，前往河內刺殺汪精衛，結果失手，造成汪精衛秘書曾仲鳴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經受到威脅，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設法離開河內，結果汪精衛就離開了河內，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27.7 汪精衛逐步成爲漢奸傀儡

於是汪精衛先後到了上海以及日本，進行各種的拜訪活動，同時發表各種附和日本政府立場的談話。表面上，汪精衛好像是爲了和平而犧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實上，他根本就是爲了權位，而逐漸地成爲被日本操控的漢奸。日本人逐漸開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們不是要與汪精衛的第三勢力達成和平協定，而是要汪成爲他們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動以華制華的政策。

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直無法動搖國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與汪關係不錯的西南軍政領袖，以及粵系的軍事將領，也沒有響應這個和平運動，因此汪精衛所希望籌組的第三勢力宣告失敗。此時汪精衛只有兩個選擇：不是成爲日本人所支配的漢奸，就是要斷然地中止政治活動，出國另謀發展⁴。對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沒有實力就沒有尊嚴與價值，汪精衛既然

⁴從汪精衛無法煽動粵系將領以及西南的地方勢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脫離蔣介石的國民

無法建立第三勢力，只能淪爲日本所支配的漢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衛了。

原先推動汪精衛領導中國第三勢力的高宗武與陶希聖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對外稱做梅機關），這時候開始進行和平談判與第三勢力政府的組成，他們在協商中，經常與日本人發生立場的爭執，而逐漸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軍方所謂支持汪精衛從事和平運動，只不過是尋找漢奸，以籌建日本操縱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後，當他們發現日本人真正的目的與野心之後，曾經力勸汪精衛中止與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與梅思平等，則醉心於權力的誘惑，他們認爲，不妨與日本人合作，組成聽命於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獲得個人的權位，也可以減少日本人直接對中國人民統治所造成的傷害。

汪精衛本人夾在這兩種爭論之中，幾次的搖擺，最後汪卻在其夫人陳璧君的影響下（汪一向懼內，他非常聽從夫人的意見），終於向日本的壓力低頭，決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見，簽定各種賣國的協議，組織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與陶希聖等人，則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後，決定不能成爲國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斷然地退出汪精衛陣營，潛逃到香港，公開汪精衛假和平運動爲名，實際上已經甘爲漢奸的賣國真相。不過汪精衛等人則爲自己的立場辯護，否認成立的政府是個漢奸政權，反而名之爲「曲線救國」的策略，爲不少附從其下的漢奸們，找到一個出賣國家的響亮藉口。

汪精衛就從推動和平運動開始，而最終成爲了漢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簽署「日支新關係調整綱領」的賣國協定，等於允許日本實際上控制整個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蔣介石曾經企圖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設法阻止這個政府的產生。日本政府內部也有人認爲，一旦日本支持汪精衛組成政府，那麼日本要想與重慶政府達成結束中日戰爭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別是日本軍部的領導階層，曾經熱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結束大部分在中國戰區的戰鬥，以大幅撤回在華的日軍。所以由日本參謀本部與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間的交涉，這就是日本政府所謂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負責與重慶的代表接觸。

政府，和自己結合成爲第三勢力的事件來看，可以明白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力量，已經成爲主導中國人的主流力量。

而重慶方面則煞有介事的派出所謂「宋子良」（偽稱是宋子文之弟）為代表，與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夠放棄支持汪精衛政府的組成，結果拖延了近半年。這個接觸，曾經一度設計由蔣介石、板垣征四郎與汪精衛三人，在中國第九戰區的長沙，舉行中日高峰會議，其實這是重慶方面誘捕汪精衛的計劃，最後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細。而在當年，由於德國席捲歐陸，日本判斷歐、美將無暇他顧，因此日軍將可以輕易地南進，而完全截斷中國與外國最後的一條通路。於是這個情報判斷促使日本政府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政府，而與蔣介石打到底。

汪精衛以其政治手腕，能夠讓日本人將維新政府與臨時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統統加入他的政府統轄，的確是費了不少的工夫（華北是名義歸南京控制，其實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操縱），汪還真會在政治上玩偷天換日的手腕，竟然宣佈這個由日本控制的偽政府，是由重慶還都的國民政府，林森還是這個政府的主席（當時林森是重慶國民政府的主席），只不過「一時」不能到南京上班，其他政府機構所有的名稱，都與重慶的國民政府一模一樣。

27.8 「和平反共」的偽政府

汪精衛所主導的國民政府「還都記」，就這樣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衛表示，因為林森受到蔣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暫代國民政府主席的職務，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保證實現和平憲政，日本還裝模作樣的率先宣佈，將放棄所有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特殊地位與權力。這個實質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縱的傀儡政府，同樣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三民主義的國歌。這樣中國就有了兩國國民政府，使用同樣的國旗、國歌與國號，只是漢奸政權的旗號加註「和平反共」四個字，以示區別⁵。

汪精衛所領導的「國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個以日本意志為依歸的傀儡政權，幫著日本推動剝削與殘害中國人民，以供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所需，根本沒有真正獨立的國格與主權可言，許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國同胞，都受到汪精衛政府殘酷的迫害。在汪精衛的政權中，最令反日志士

⁵從此，日本稱呼汪精衛政權為國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國民政府改稱重慶政府。

感到髮指的，便是由李士群與丁默邨所領導的特務組織，總部設在上海極司費德路七十六號，一般對外的代號就是「七十六號」，其對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殘，簡直是比活地獄更恐怖，令人聞之色變。

此外汪精衛政府，形式上，還擁有一支由日軍訓練控制，人數超過六十萬人以上的偽軍。主要任務是保障偽政府的運作，以及協助日本追剿抗日游擊隊，後來在日軍對華的重大攻擊作戰中，也曾直接參與對華軍的重要作戰，在宜昌、常德與長沙會戰中，扮演了相當程度的作戰支援角色，但是偽軍始終無法離開日軍，在戰場上獨當一面的作戰。

由汪精衛領導的這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總共維持了五年又五個月（汪精衛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於日本，遺缺由陳公博代理），雖然偽政府自稱是「中華民國政府」，使用同樣的政府結構體制，同樣的國旗、國歌，但是在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心目中，他們就是一個投靠日本人的漢奸偽政府組織，這個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還經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廣播，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日，這個政府雖然擁有六十萬的偽軍，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構，但是並未準備進行任何的頑抗，就在當天自動宣佈解散，但偽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後來仍然接受重慶政府依法問罪與審判。

當然平心而論，汪精衛政權的運作，在某些狀況與地方，的確是發揮了一些減少日軍直接荼毒、殘酷鎮壓與迫害佔領區內中國人民的作用，同時在汪精衛的偽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慶抗日的事實。當時重慶方面的各個情治系統，特別是軍統局，設法利用各種的關係，滲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內部一些軍政要員的合作，進行掩護抗日的任務。在抗日戰爭的後期，在汪精衛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壓，也有人是為了兩邊買保險（特別是周佛海與戴笠之間的互通關係），因此在後期南京偽政府內部，有相當多的管道，將不少機密暗通重慶方面，並且設法掩護部分的抗日地下組織，成為日本控制中國最大的間諜鬥智對抗。當時軍統局曾經允了不少的偽軍，可以戴罪立功。

不過，在抗戰勝利之後，為了如何處理這些偽政府的軍政組織與領導人，在國民政府的內部，發生了嚴重的歧見。最後主張依法懲處者，壓倒以政治解決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偽軍認為，重慶方面失信於「戴罪立功」的承諾，所以有相當數量的偽軍，乾脆接受中共八路軍的收編，成為反國民

政府的軍事力量。在形式上，雖然國民黨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肅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卻成爲八路軍的生力軍了。

也許我們不能完全否定汪精衛在剛開始，所謂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或許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別是汪本人在開始與日本接觸時，也無意自願成爲漢奸。但是汪精衛最大的錯誤，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強者與「鄙視」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賴日方的力量來建立政權，那麼日本人就會完全把他當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衛最終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了。在持守國家民族的大義上，歷史的考驗是非常嚴酷的，所謂曲線救國的做法，最終斷送了汪精衛在中國所有的歷史地位。

勇挫日本皇軍鋒焰的三次長沙大捷

中國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獲得大勝，的確是珍珠港事變以來，盟國在亞洲戰區中唯一的勝利，這時候日本的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橫掃盟國在亞洲所有的據點與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在香港向日軍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國馬來亞最高司令珀西瓦爾，率領十萬部隊，在新加坡向日軍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蘭在印尼守軍司令載帕爾，向日軍今村均中將投降；五月七日美軍司令官溫立特中將（麥克阿瑟僅以身免）在菲律賓向日軍的本間雅晴中將投降。整個亞洲戰局中，只有中國在長沙，痛擊日軍，造成日軍成軍以來，另外一次大規模會戰的慘敗記錄。

在中日全面作戰之後，日軍的攻勢作戰的力量逐步地衰退，華軍抵抗的力量漸漸地在增強，最後中日雙方，以爭奪湖南省會長沙及附近的要地，做爲中日兩國軍事對抗的平衡焦點所在。從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間，日軍總共四次出兵企圖攻略長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國的軍隊擊敗，這就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之中，最爲值得紀念的三次長沙大捷。當然長沙與湖南的

軍民，以完全的犧牲與無數的血淚，與守軍配合，寫下這三個可歌可泣的歷史大戰役記錄。

日軍自從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佔武漢之後，就把兵力沿著長江水道向前推進到岳陽一帶，與中國軍隊隨著新墻河對峙。日本駐武漢的第十一軍，擁有七個師團與數個獨立旅團的兵力，扮演著插入華中心臟地區的戰略機動部隊的角色，中國則以第五、六、九等三個戰區包圍日本的第十一軍，雙方形成一種戰略平衡的對峙狀態。

這時候日軍大本營，已經深為陷入中國戰場的戰略泥淖所苦，日軍已經無法再增加兵力，繼續深入中國進行攻擊，也就是說，日本很難在戰場上擊敗中國。因此，日本的兩個選擇，其一是採取以戰養戰的策略，設法長期搜刮佔領區內的資源，以維持日軍在中國境內的開支，其二就是設法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減少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數量。結果日本兩者都同時進行，但是兩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營原先是有意從一九三九年，逐年減少在中國的駐軍，希望能夠將在華日軍的總兵力，從八十萬人，調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萬人，以減少日本在中國戰場的戰略損耗。日軍大本營甚至決定，縱使日本無法與中國完成和議，日軍也要撤退到長江三角洲與華北地區，大幅減少在中國戰區的消耗，以保持日軍應付蘇聯的戰力。

但是在華的日軍，強烈反對大本營的減縮計畫，特別是第十一軍的中將司令官岡村寧次，曾經多次的以進攻四川的作戰計畫，上報日軍大本營，要求不但不能減少，反而應該設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國的駐軍。只要日軍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國作戰、擊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於蘇聯所支持的外蒙古「獨立」政府部隊，在與日本支持的另外一個傀儡政府滿洲國部隊，在諾蒙罕發生衝突，日本關東軍與蘇聯紅軍，也就「當仁不讓」地由幕後支持走到台前開火，雙方的部隊在諾蒙罕地區進行了一次規模相當激烈的局部戰爭。蘇聯紅軍相當成功地擊敗了日本關東軍的第二十三師團，以及支援作戰的關東軍第七師團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國的震動。日軍大本營最怕的就是，這場戰爭會擴大成爲日蘇的全面衝突，因爲日本超過三分之二的部隊，已經陷在中國戰區，假如此時日本與蘇聯爆發戰事，那麼日本實在難以雙線作戰。

這就是史達林厲害的地方，他想要在保持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但

是又不想與日本爆發軍事衝突，既然日本與中國已經打得難解難分，那麼史達林只要等機會，露幾手給日本知道，蘇聯的實力是不好惹的，日本就會知難而退了。因為日本特別是一個吃硬不吃軟的民族，蘇俄越是偶爾給日本一些「教訓」，日本就越「尊敬」史達林，更不敢對蘇聯有任何的輕舉妄動。

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蒙古諾蒙罕之戰，漂亮地展現其國防建設的成果，果然讓關東軍服氣了。日軍大本營立刻撤換整個關東軍的指揮階層：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都遭到免職的嚴重處分。這時納粹德國爲了進攻波蘭，竟然不顧日本這個「反共」的伙伴，而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日政府因而覺得，軸心國的「反共綱約」根本不可靠；由於日本的中國事變一直無法解決，日軍主力全都陷在中國戰場，因此現在不是日蘇發生衝突的時機。因此日本設法以低姿態的方式，與蘇聯達成了停戰協議。日本關東軍這種丟人現眼的醜像，造成日軍更不敢在中國戰區進行裁軍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國軍隊開刀，以繼續支撐皇軍無敵的神話¹。

28.1 第一次長沙會戰

於是駐武漢的日本第十一軍，立刻呈報了一個進攻江南的作戰計劃，準備將關東軍在東北所受到的氣，在華軍的身上發洩一下。日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對於第九戰區的華軍，一直懷恨在心，因為薛岳過去在武漢會戰的第九戰區作戰，讓日本十一軍吃了不少的虧。所以岡村寧次一有機會，就想找薛岳的部隊比劃幾下，希望能夠痛擊薛岳的部隊，好能嚥下這口氣。

所以岡村寧次這次進攻的作戰計劃，是擺明了要找薛岳的麻煩，希望能夠吃掉薛岳第九戰區的幾個主力部隊（此時陳誠仍是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卻由薛岳全權代理），因此日軍這個江南作戰，並沒有一定的攻略目標，只是希望打擊與消滅第九戰區的華軍部隊，給中國一次嚴重的教訓。但是第十一軍在報給華中派遣軍的作戰計劃中，居然是用「消滅華軍作戰企圖」的大題目作文章。

當時日本的華中派遣軍司令官西尾壽造大將，知道自己準備晉升爲（即將組成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職務，因此也希望能夠有個戰功襯托一下自己的高升，所以就批准了岡村寧次的作戰計劃。由於這個作戰計劃，只是以

¹這裡又可以看到日本民族欺負弱小以示強大的個性，誰叫當時中國的軍力比不上日本呢？

打擊薛岳指揮的部隊為目標，所以選擇了江西與湖南北部的第九戰區戰線重點地區，發動攻擊，希望能夠摸到薛岳的主力，然後打出一些成績。

岡村寧次的作戰計劃是將日軍分兵三路，進攻鄱陽湖到洞庭湖之間（江西與湖南）的中國第九戰區部隊。東路日軍在在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帶，發動側攻，然後轉向向西南方向切入湖南東北部；中路軍則是由湖北南部發動攻勢，與江西的日軍會師，在湖南東北部佔領戰略位置，以等待圍殲華軍的機會；西路軍則是日軍主攻的作戰部隊，由岳陽南下，對華軍的主力造成壓迫，迫使中國第九戰區的主力部隊，退向湖南的東北角，這樣日軍就可以能夠在湖南平江，或是江西修水一帶的地區，圍殲到華軍主力。原先日軍的這個作戰計畫，並未將攻佔長沙設定為作戰的主要攻擊目標。

而蔣介石對於日軍的這次攻擊，反應相當地謹慎，在剛開始之時，他不清楚日軍的作戰企圖與投入的兵力，因此在白崇禧的建議下，決定給薛岳非常具有彈性的作戰空間指令，以保全華軍的作戰主力為最高的原則，甚至必要時可以放棄長沙，在衡陽進行決戰，以求華軍主力避免被日軍盯牢，而遭到嚴重的打擊。但是薛岳卻看出日軍軍力不足，決心確保長沙，給日軍一個重大的打擊。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日軍的一〇一師團的一〇二旅團，與一〇六師團主力，組成東路軍開始出兵攻擊在江西北部的華軍陣地。華軍第九戰區代理司令官薛岳下令，第十九集團軍司令官羅卓英指揮華軍，進行逐步抵抗、相機轉進，因此日軍在剛開始進攻的時候，並未遭到華軍強烈的抵抗，所以日軍就越發大膽深入進兵。日軍沒有料到華軍是以有計劃的轉進方式後退，就等日軍深入與兵力分散之後，再設法進行決戰。在表面上，日軍在江西北部一帶的進展相當順利，但就是沒有捕捉到華軍的主力，日軍只有依照原先的作戰計劃，朝西南方向切入湖南，準備與在湖南北部作戰的日軍會師，合圍中國的野戰部隊。

不過，江西、湖南在這一帶的地形結構非常複雜，幕阜山的山岳綿延，日軍的重裝備在這種複雜地形運動遲緩，主要道路又遭到了華軍有計劃的破壞，因此日軍後續的進展並不順利，同時華軍雖然一路後退，但是並未遭到日軍嚴重的打擊。所以當日軍深入複雜的山地之後，羅卓英即指揮華軍，開始將抵抗開始逐步地增強，甚至開始進行猛烈的反擊，企圖截斷日軍的補給線，日軍這時才發現，自己在複雜的山區中，很難順利的進軍，更難以越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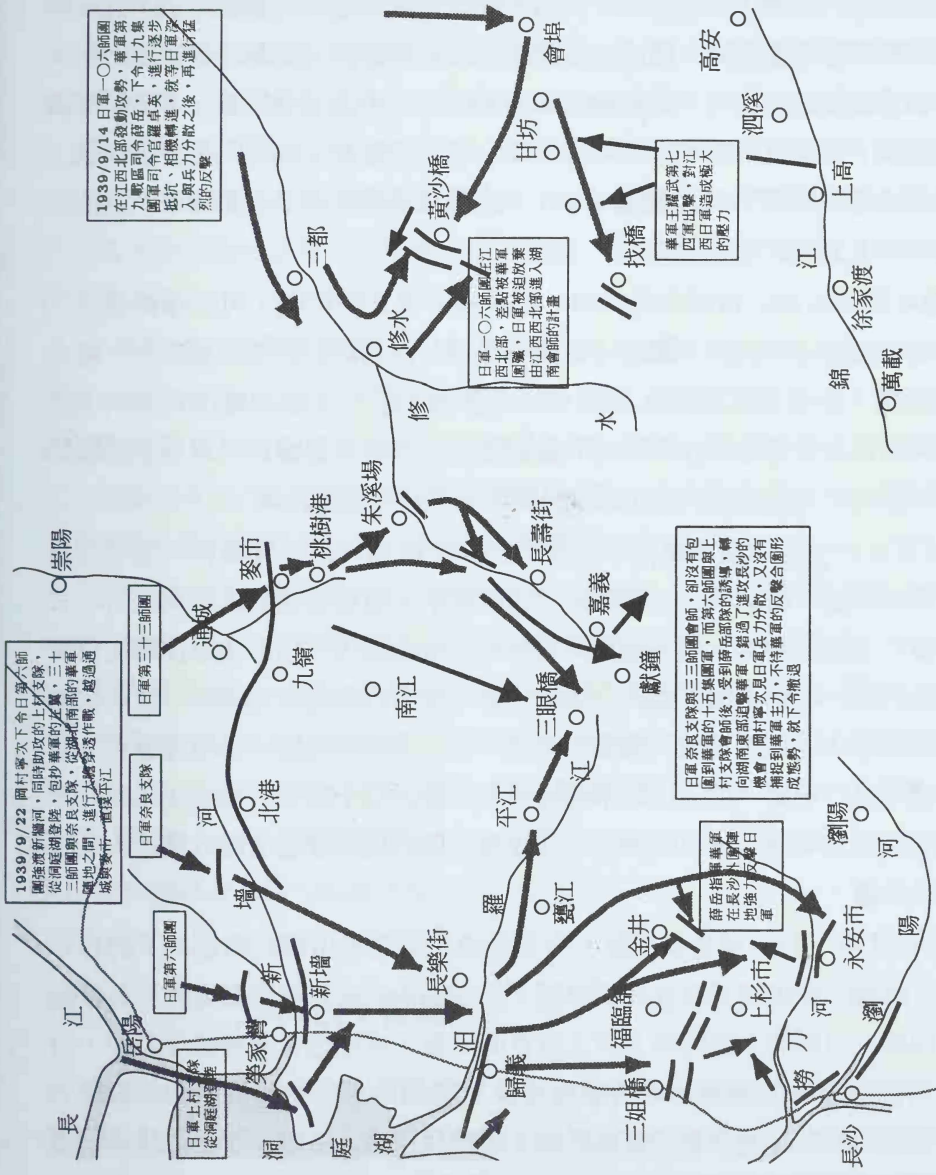


圖 28.1: 第一次長沙會戰圖

江西西北的山岳地帶，進入湖南而與南下的日軍會師。

由於在開始的時候，岡村寧次看到在江西發動攻勢的東路日軍，進展順利，同時發現重慶方面，有意放棄防守長沙的佈陣，於是大膽下令在湖南北部的日軍第六師團，在九月二十二日，開始強渡新墻河，對華軍第十五集團軍的關麟徵部發動攻擊，同時也出動助攻的上村支隊，從洞庭湖登陸，組成包抄華軍左翼的西路軍，以壓迫華軍向東撤退；並且下令日軍三十三師團與奈良支隊，從湖北南部的華軍陣地之間，組成中路軍，進行大膽穿透作戰，一舉越過通城與麥市，直趨湖南平江，企圖包圍華軍第十五集團軍，迫使後退的華軍主力與日軍進行決戰。

原本蔣介石擔心日軍來勢洶洶，因此指令華軍的作戰，可以保持彈性，若是日軍主力強攻長沙，華軍可以向東撤退，而保持對日軍側翼壓力，避免進行決戰。但是第九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岳，卻已正確地看出日軍兵力分散，岡村寧次又低估了作戰地區的複雜地形，而嚴重影響到日軍分進合擊的計劃，因此大膽地決定，將在長沙外圍陣地與日軍進行決戰。

日軍在湖南沿粵漢鐵路南下主攻的部隊，雖然一路進展順利，但是卻在華軍機動迎戰，靈活與迅速脫離戰場的戰術下，並沒有捕捉到華軍主力，日軍分散在各路的部隊又無法順利的對華軍進行合圍。在江西北部作戰的日軍一〇六師團，在幕阜山複雜的山地遭到華軍有力的抵抗與包圍下，日軍補給線竟遭切斷，差點就要受到圍殲的打擊²，只好全力突圍，那裡還會有力量趕到湖南進行會師。加上這時精銳的華軍王耀武七十四軍，開始在江西北部出擊，使得日軍遭到極大的壓力，在江西北部的日軍被迫全面放棄進入湖南會師的計畫。

從湖北南下的日軍奈良支隊，向東旋轉，雖然與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軍三十三師團，在湖南東北部完成會師，但卻根本沒有包圍到華軍的十五集團軍。同時，日軍第六師團與上村支隊會師之後，原先也有機會強攻長沙，但卻受到薛岳部隊的誘導，轉向湖南東部追擊華軍，並企圖與江西的日軍會師。不過由於在江西作戰的東路日軍，因為耗損過大，為了安全起見，已經開始退回原先的陣地，因此日軍也失去了在湖南東北部合圍華軍的機會。

這時日軍既會師不成，在湖南的兵力就越發顯得單薄，再遭到薛岳指揮

²一〇六師團真是「福星高照」，無法擺脫被中國軍隊一再修理的命運，詳情請參看武漢會戰的江西北部萬家嶺之戰。

之華軍的強力反擊，使得日軍已經開始有些孤軍深入的危機感了。由於岡村已錯過進攻長沙的機會，於是不待華軍之反擊合圍形成態勢，就下令在湖南的日軍，分頭撤軍，並沿途對經過的地區大肆進行破壞。最後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參戰的日軍，都撤回原來的戰線。

這回日軍的大規模三路進兵的迂迴作戰，既沒有攻到長沙，也沒有對華軍的野戰軍，造成嚴重的打擊，岡村寧次在發現兵力分散，沒有捕捉到華軍主力，以及華軍開始反擊之時，立刻就在長沙外圍調軍回頭進行有秩序的撤軍，由於日軍進行密接支援的撤軍行動，華軍也無法進行有力的追擊無論是在江西還是湖南的日軍，都撤回原來的戰線，而日軍的這次作戰，可以說是白忙了一場。

當然要說這場作戰是長沙大捷，是稍為有些勉強，因為日軍原始的作戰方案，的確沒有以攻略長沙做為作戰目標，但是日軍卻錯過了攻下長沙的機會。當時蔣介石下令薛岳可以在長沙進行機動防衛，假如日軍在開始的時候，就要強攻長沙，恐怕應該可以如願，但是它卻分散兵力，企圖捕捉華軍主力不成，長沙也沒有拿下，結果可以說是兩頭落空。

而薛岳能夠識破戰機，決心堅守長沙外圍陣地，而在江西的羅卓英部，也善用地形，成功地狙擊日軍的運動，造成岡村認為日軍會師無望，反而將要遭到華軍的圍攻，因此才立刻下令日軍迅速的抽身撤退。中日兩軍這回算是打個平手，但是日軍的作戰目標可以說是完全的落空，既沒有吃掉薛岳的主力，也沒有打下主要的戰略目標，在江西還差點被華軍吃掉一個師團。這還是日軍第一次打這種無厘頭的仗。當然岡村寧次也不可能料到，後來日軍又兩度企圖進攻長沙，但竟然兩次都敗下陣來。

28.2 第二次長沙會戰

日本人一向吃硬不吃軟，岡村寧次在第九戰區碰到鐵板，使得日本十一軍不敢再動第九戰區的主意。接任的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於一九四〇年轉向攻擊第五戰區，造成華軍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在漢水沿岸的南瓜店壯烈成仁。日軍接著攻佔了第六戰區的戰略要地宜昌之後，才逐漸地恢復了信心，日本十一軍又再想試探性攻擊華軍第九戰區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十一軍在江西發動上高會戰，因為縱兵輕進，日

軍三十四師團遭到華軍巧妙的戰術合擊，損失慘重；日本十一軍司令官園部，急調三十三師團救援，但是同樣遭到重創，特別是王耀武的七十四軍，更是一戰成名。日軍檢討作戰失利原因，認為十一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中將，應該負起主要的指揮責任，因此加以撤換。日軍大本營改派阿南惟畿中將出任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是一名狂熱效忠天皇的年輕將領，特別受到日皇以及宮內女眷的欣賞，因此他帶兵打仗特別凶狠賣力，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戰功，以贏得皇室特別的看待。阿南上任之後，立刻研究武漢四周的戰略情勢，他決定要在長沙，打出一場勝仗，以挫中國第九戰區薛岳的銳氣。

阿南因此不動聲色的開始調兵遣將，將十一軍的六成以上的部隊，都秘密地抽調到湖南北部，他想仗恃著日軍強大的火力與攻堅的兵力，決定採取中央突破的強攻戰術，準備一路攻下長沙，並且狠狠地修理薛岳的部隊。阿南調集了四個師團與四個支隊，在新墻河以北地區秘密集結，並且將司令部移到岳陽，以就近指揮作戰。

當時華軍方面，對於日本十一軍的秘密集結，可以說是缺乏預警的情報，因此在第九戰區的部隊，佈防得相當分散，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開始先攻擊大雲山的華軍部隊，接著就強渡新墻河，開始以強大的兵力，結成銳不可當的攻擊正面，一路撲向長沙。阿南特別徵調了偽軍與民伕，以保持日軍補給線道路的暢通。

薛岳對於阿南大軍的突然攻擊，可以說是相當意外，但是薛岳臨危不亂，他一面緊急將部隊調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華軍採取靈活的遲滯作戰，減少與日軍正面衝突，而將日軍儘量朝向湖南東部的山地誘開。日軍採取中央突破的正面打法，當然是來勢洶洶，但華軍四兩撥千斤的戰術，卻讓日軍感到非常不快，因為這樣日軍便無法造成圍殲對方主力的戰果。而這些被日軍追趕的華軍，並未出現潰散，反而一有機會，就尾隨日軍的後方，進行擾亂的攻擊。

這時華軍陸續向長沙外圍集結，日軍也對華軍部隊一個接一個地狠命猛打，其中以中國第十軍遭到最為嚴重的打擊。由於日軍急於追逐並重創華軍，因此在長沙的外圍，花了較多的時間，攻擊華軍部隊。特別是當阿南發現中國的七十四軍趕到湘東，更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決定要為日軍在江西上高之戰報仇，所以立刻決定調整作戰方向，調日軍主力調頭去捕捉七十四軍，但是華軍七十四軍保持靈活的應戰方式，迅速地脫離日軍包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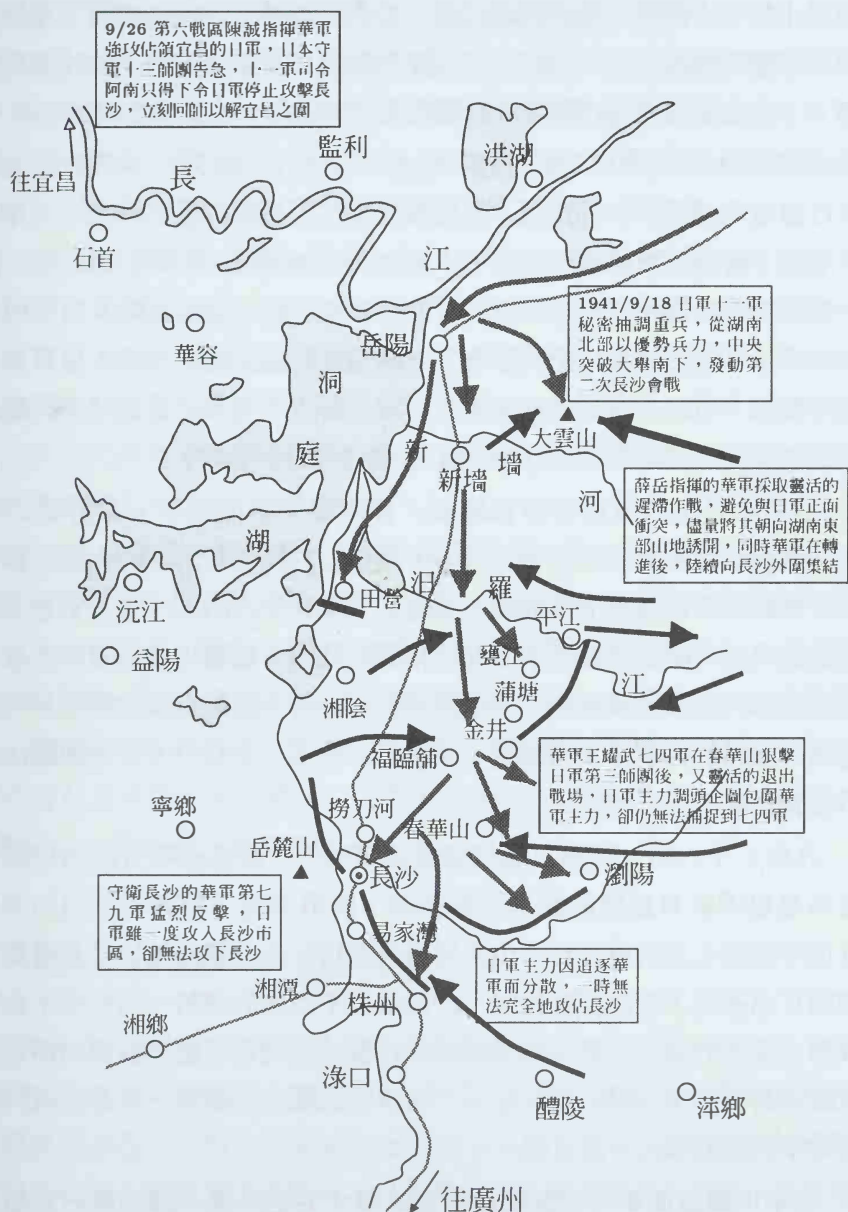


圖 28.2: 第二次長沙會戰圖

阿南於是決定將日軍主力，分成兩組，第六與四十師團，向左翼迂迴，進攻長沙外圍的華軍二十六軍，第三與第四師團向右牽制華軍三十七軍，而華軍王牌七十四軍，趕到戰場之後，立刻發揮猛烈的作戰攻勢，在春華山狠擊日軍第三師團，阿南只有立刻調派六師團以及重炮旅團，前往圍攻七十四軍，不過七十四軍巧妙地吸引日軍的兵力東移後，又順利地退出戰場。

薛岳以七十九軍防守長沙市，由於日軍的主力部隊，一直分散在外圍，進行追逐與圍殲華軍的作戰，因此沒有集結更足夠的優勢兵力，一舉攻下長沙省城。雖然日軍的第四師團，一度攻入長沙市區，同時日軍的第三師團，更衝到南方的株州，但是守衛長沙的華軍第七九軍猛烈反擊，日軍因為兵力不夠集中，無法完全地把長沙攻下。阿南此時還認為，先擴大日軍在長沙外圍的戰線，可以多捉到一些華軍的援軍，而攻下長沙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這時已經面臨可能丟掉長沙的威脅了。

但是華軍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卻改變了整個戰局。當薛岳的第九戰區，遭到日軍優勢兵力打擊的時候，蔣介石判斷這是阿南的大膽之作，日本十一軍的兵力已被過度地抽調，因此十一軍其他的防區，就一定會出現兵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蔣介石下令其他相關的戰區，儘量地發動牽制性攻擊，以找到日軍的弱點，來牽制十一軍對長沙的攻勢。陳誠很快地就發現阿南竟然把鎮守宜昌的日軍第十三師團，抽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於是陳誠決定在宜昌發動強攻。

九月二十六日，陳誠以最快速度調集兵力，乘虛進攻宜昌的日軍。當時宜昌是日軍威脅重慶的前進戰略重鎮，同時切斷了兩湖與四川的水運連絡（使得兩湖生產的糧食無法由長江輸入四川），其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陳誠對宜昌發動大兵團反攻作戰，的確是出乎阿南的意料。由於華軍在宜昌的攻勢，異常的猛烈，絕非尋常的牽制作戰，這時在宜昌的日軍指揮官，第十三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陷入了華軍四面圍攻的險境，只有急電阿南以及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求援。

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知道消息之後，大吃一驚。因為攻佔宜昌是日皇裕仁親自下的作戰指示，假如宜昌有失、十三師團被殲滅，那麼日軍的士氣將會受到極大的打擊，所以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都下令阿南，無論如何也要設法保住宜昌。阿南當然知道宜昌地位的重要，更不能讓十三師團被圍殲，否則自己這個十一軍司令官也就做不下去了，雖然長沙已是快要到手的目

標，但若拿長沙換宜昌，恐怕還是失算。於是阿南只有下令，停止攻擊長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優先轉往投入解圍宜昌的作戰。薛岳當然不會放過這個修理日軍的機會，倉皇撤退的日軍在湖南吃足了苦頭。

陳誠在宜昌的反擊戰，可以說是打得非常地漂亮，日本十三師團的防線，逐一被華軍突破，最後日軍司令部已在華軍直接的攻擊範圍之內，日軍十三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親自督戰，最後連司令部的參謀都拿槍參加保衛戰，在最危險的時刻，內山下令準備焚燒軍旗，以及切腹自殺。

在十月十日宜昌決戰的最後關頭，內山事實上已簽署十三師團向日皇與大本營告別的電報，開始準備在司令部內率領參謀集體自殺，卻在最後一刻，出現空前大雨，遲滯了華軍的攻勢，由阿南指揮回防的日軍，終於趕到，才迫使陳誠退兵，讓日十三師團在最後一刻守住了宜昌。但是日軍不但失去攻佔長沙的機會，反而因為緊急撤退，遭到華軍追擊而頗有損失。長沙第二次大捷的聲威，可以說是舉國知名。

這回長沙造成華軍大捷，多少要歸功陳誠在第六戰區指揮的牽制攻擊，日軍的指揮官阿南惟畿則是過於大膽與冒險，因而沒有掌握到全局戰略均衡的要訣，也沒有盯緊作戰的目標，一味的以日軍優勢戰力強渡關山，而且不斷追逐新出現的作戰目標，因此造成日軍戰力的分散，而錯過攻佔長沙的作戰時機。從這次作戰的經驗，華軍開始了解日軍對於攻佔長沙的心結，所以薛岳特別檢討日軍的攻勢作戰，而設計出一套可以誘敵深入，加以圍殲的「天爐戰法」，就等著日軍的來犯。

28.3 第三次長沙會戰的起因

第三次長沙大捷，乃是華軍最為貨真價實的一場大勝仗，日軍在此役再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敗與損失。這次長沙會戰，與第二次長沙會戰僅隔兩個月，主要原因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威夷時間的十二月七日³，日軍成功地偷襲了美軍的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日本華南方面軍的第二十三軍，負責進攻香港，但是擔心華軍會支援駐港的英軍，從側背打擊日軍的後路，所以要求日第十一軍，在湖南北部，發動牽制性的攻擊作戰。主要的目的，是牽制

³在中國歷史上正式的記載是日本在十二月八日（中國時間）發動太平洋戰爭，當然這與夏威夷時間的十二月七日是同一個時間，只是因為不同時區與國際換日線的關係，才有此記錄上的差別。

中國第九戰區的兵力，以防華軍南調打擊日本二十三軍的香港作戰。

但是第十一軍的司令官阿南惟幾，不肯輕易放過這個進攻第九戰區的機會，他至少要為上次進攻長沙作戰的失利，討回一些顏面。因此雖然原先在作戰計劃上，這只是一場牽制作戰，但是他卻有著旺盛的企圖心，希望能夠有更為傑出的戰果表現。阿南以日軍第三、六、四十師團以及第九混成旅團組成戰鬥序列，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再度在湖南北部發動攻勢。

但日軍這次在湖南出兵，可以說是在天時上，就極端不利，因為當年的冬季，湖南出現了罕見的大雨與低溫，造成所有的江河水量大增，必須要有渡河的裝備、在適當的渡河地點，才能越過河流；同時農田積水泥濘又深，造成軍隊重裝備運動不易，天候的嚴寒更是增加日軍部隊補給與攻擊上的困難。不過根據日軍的情報顯示，第九戰區的華軍部隊，的確有大量南下調動的佈防行動，因此阿南判斷，這給日軍一個乘虛而入的大好機會。既然第十一軍，早有準備深入湖南，進攻長沙的腹案，只要等待作戰時機的來到，現在日軍不妨來個先斬後奏，從牽制作戰，轉換成為攻佔長沙的會戰。

日本十一軍在不到三個月，就再度興兵進攻長沙，是給薛岳抓到一個有利的反擊機會，因為日軍是採取攻勢作戰，軍隊的疲勞較大，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無法完成整補，有著疲兵再戰的不利。而薛岳已經檢討了兩次日軍進攻長沙的得失，研擬出一套專門對付日軍深入攻擊的「天爐戰法」，將在長沙附近，對深入的日軍加以圍堵與殲滅的打擊。

最為重要的是，日軍的牽制攻擊發起時間，實在太遲，這也是因為日軍才剛剛打完上一場的長沙會戰，兵力尚未完全恢復過來，同時在華南的日軍，也高估英軍的作戰能力，因此認為攻佔香港的時間，應該在一個月以上，所以參與牽制作戰的日軍，不必太早的出動。結果日軍攻擊的部隊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渡過新墟河進攻，但是防守香港的英軍，卻根本沒有打出水準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向日本二十三軍投降，因此原本奉命南下支援香港的華軍部隊，這時已經沒有作戰任務在身，因此當蔣介石聽到日軍企圖乘虛進襲長沙的情報，立刻就下令調離湖南的華軍，迅速地回防第九戰

⁴英軍在亞洲各處，無論是香港、新加坡、緬甸，每次都是才剛開始與日軍交手，就全面潰散。英軍無論在裝備、訓練或經費上都超過華軍太多，但這種毫無鬥志、輕率投降的表現，身為盟國部隊一員的英國軍人自己應該感到羞恥，外人看了只能搖頭。對比之下，中國軍隊的作戰表現，真是不同凡響。因此可以看得出來，假如能讓華軍獲得較佳的裝備與訓練，那中國必然可以擊敗日本（中國得到美式裝備與訓練的遠征軍就是很好的證明），這難怪造成盟國對中國的猜忌與出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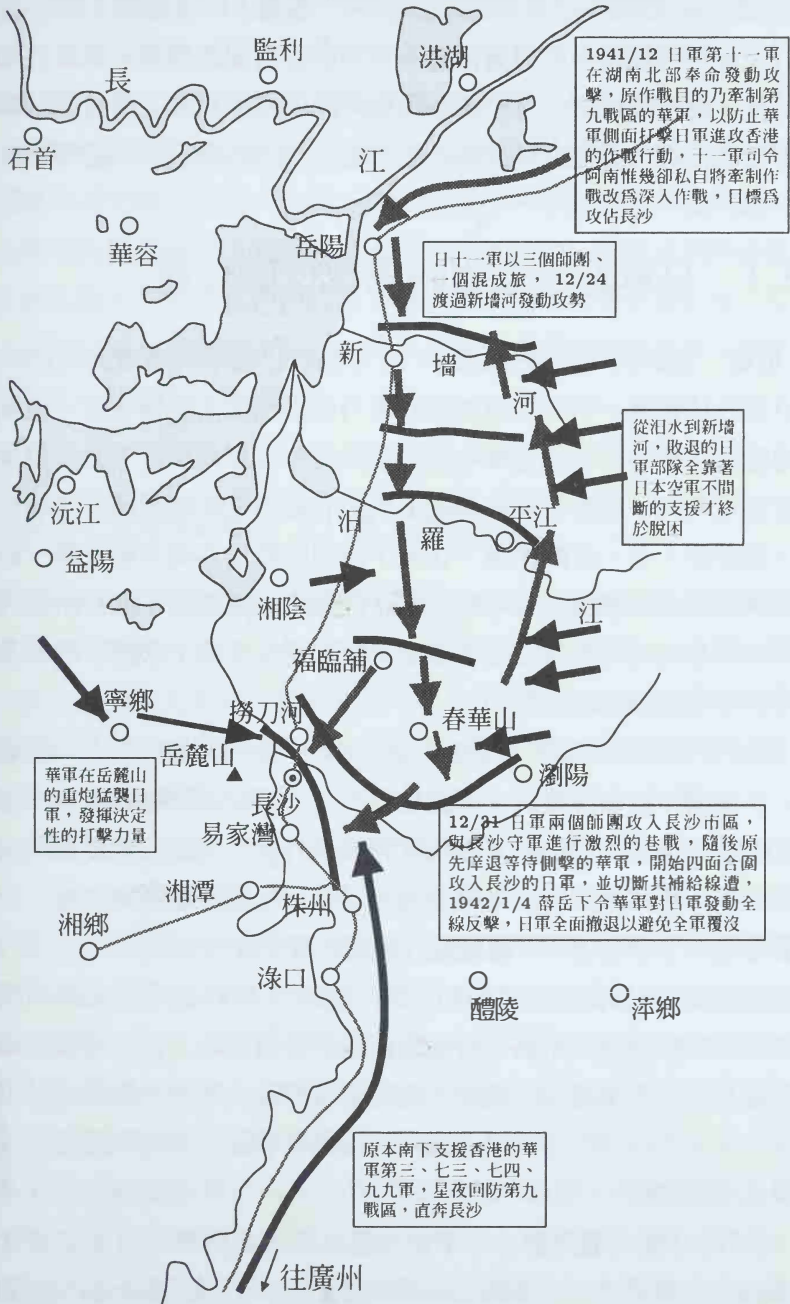


圖 28.3: 第三次長沙會戰圖

區，以圍攻深入的日軍。

在薛岳的指揮下，華軍在面對日十一軍南下的攻擊中，只是誘敵深入、進行象徵性的抵抗，就轉進後撤，等待側擊合圍的機會。日軍在順利渡過汨水之後，就已經接到香港英國軍隊投降的消息，基本上而言，日本十一軍的牽制作戰任務，已經沒有必要再繼續進行，日軍應該可以返回陣地了。

28.4 日軍貪功而臨時更改作戰任務

但是，這時阿南惟畿卻認為，日軍既然已經順利地攻到長沙的半途，只要日軍堅持挺進，第九戰區華軍的戰力已被抽調而顯得空虛，南調的部隊回防速度比較慢（華軍的運動在抗戰期間幾乎全靠徒步行軍），華軍是擋不住日軍之攻勢的，那麼日軍如果攻下長沙，當然是中國戰區的大功一件。事實上，由於英、美、荷的部隊，在太平洋各區被日本南方軍打得一路敗逃，相當地刺激到在中國戰區日軍的心理。假如中國派遣軍不能有所表現，那麼所有的光彩都要被日本南方軍拿走了。何況阿南對於上次沒有順利攻佔長沙，更有著強烈要報仇的心理。

剛好日軍第三師團長豐島房三郎中將，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剛剛接到命令，準備調任近衛師團長，因此也想要立下個可以吹噓的戰功，他眼見華軍抵抗的戰力不強，自己的軍隊已攻到長沙外圍，因此特別要求阿南允許日軍繼續南下，攻佔長沙。於是阿南決定以戰場指揮官獨斷的命令，改變日軍的作戰任務，下令第十一軍繼續深入湖南，直下長沙。

這時薛岳對於長沙會戰所有的軍力部署，早已是了若指掌，因此下令第十軍李玉堂堅守長沙市區，特別在市區的東南高地，佈下巷戰的陣勢，並且將重砲兵旅放在岳麓山，設立了俯視全城的砲兵陣地。蔣介石已下令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軍，兼程回防第九戰區，交由薛岳指揮，準備迎頭痛擊日軍的攻勢。

此時剛好湖南遭到數十年罕見的酷寒氣溫與雨雪，日軍必須冒著空前的嚴寒氣溫強襲長沙。日本第三與第六師團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攻到了長沙市區，中日兩軍在市區爆發激烈的巷戰，這時華軍在岳麓山的重砲發生了決定性的打擊力量。進入長沙的日軍遭到非常猛烈砲火的壓制，中國守軍又拼命抵抗，原先日軍認為自己乘虛強襲長沙，已是十拿九穩的戰局；阿南惟畿眼

見先鋒部隊已經進入到長沙城內，所以就搶先回報日軍總部，宣佈第十一軍已經攻克長沙，這是日本中國派遣軍做爲對日本國的新年獻禮，這個消息對於兩次沒有攻下長沙的日本而言，當然是喜上加喜，立刻發佈新聞號外，日本上下立刻組織慶祝，以歌頌皇軍終於攻克長沙的神威。

不料中國軍隊奮勇抵抗，日軍在長沙陷在巷戰與肉搏戰之中，由於日軍所攜帶的補給並不充足，攻勢一旦陷入纏鬥的階段，日軍的戰力就迅速地下降，岳麓山華軍的砲兵陣地，更是發揮極大的殺傷效果，這時攻到長沙的日軍，補給線被切斷，只有靠空投補給品支持。日本新聞發佈日軍已經攻陷長沙的快報，竟然成爲全球的最大笑話，爲日本皇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無敵的完勝新聞中，留下一個刺眼的負面消息。

28.5 華軍四面合圍、日軍全面敗逃

這時候，蔣介石下令回防與支援第九戰區的各軍，星夜趕到長沙外圍。薛岳立即讓七十三軍的一個師，先渡江進入長沙市區增援守軍，以提高第十軍的士氣，然後下令進入包圍位置的華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對日軍發動全線的反擊。這下日十一軍既無法攻下長沙，腹背又同時受到華軍的打擊，一時之間，日軍的陣勢大亂。

但是阿南惟畿沒有立刻下令日軍撤出戰線，反而要求日軍再進行猛攻，以佔領長沙，突破華軍的包圍。這時十一軍的參謀長木下勇少將，以及全體的參謀，都發現日軍在長沙的局勢已經十分危急了，日軍若是再不迅速地脫離戰場，恐怕就要遭到無法收拾的下場。木下勇率領日本第十一軍的全體參謀，向阿南提出反對意見，才迫使阿南在最後一刻，同意參謀長的要求，下令日軍設法儘速退出陣地。這時華軍已經從各個戰線合攏過來，日軍的補給不足，又沒有足夠的第二線預備隊兵力的支援，於是日軍一路退，一路被打，跌跌撞撞地到處找渡河口，卻到處遭到華軍的攻擊，情形既危急又狼狽。

不過由於趕到參與圍殲日軍的中國部隊，並沒有完全到齊，也沒有整備完成，就直接投入戰場，因此兵力運用不夠完整集中，同時華軍對於渡河據點的掌握不夠確實，以致在殲滅日軍補給據點上，沒有發揮決定性的攻擊力，使得日軍仍然可以找到渡河口，以及接上補給。一路往北奪命而逃的日

軍部隊之中，日本的第六師團，一度被華軍圍住，幾乎彈盡援絕，阿南下令日空軍動員一切力量支援，加上第九混成旅團的捨命奔襲，才救出了第六師團。

從汨水到新墻河，只有短短的八十公里，敗退的日軍在遭到華軍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下，全靠著日本空軍不斷的緊急支援，足足走了八天才得脫困，這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中，遭到比在台兒莊還要悽慘的敗仗。假如不是華軍爲了要策應緬甸作戰，調走了更多的精銳部隊，或是木下勇沒有發動參謀強迫阿南及時下達撤退命令，只要日軍的撤退晚上四十八小時，那麼日軍絕對會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發生全師團被完殲的慘敗下場。

當然，假如薛岳能夠沈得住氣，將增援長沙的部隊，在長沙外圍做縱深佈防，同時通知李玉堂的第十軍從長沙部分地區，有計畫地進行誘敵的撤退，同時加強岳麓山陣地兵力，讓圍攻長沙的日軍認爲，中國部隊的戰線動搖，這樣日軍必然更不肯放棄即將到手的長沙，而延後撤退的時間，此時薛岳再督促趕到參加合圍日軍的中國部隊，多二十四小時的準備時間，改在元月五日發動全面圍攻，這樣日軍恐怕會在長沙，遭到更爲慘重的挫敗，日本十一軍根本就會潰不成軍了。

28.6 中國躋身爲主要盟國

中國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獲得大勝，的確是珍珠港事變以來，盟國在亞洲戰區中唯一的勝利，這時候日本的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橫掃盟國在亞洲所有的據點與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在香港向日軍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國馬來亞最高司令珀西瓦爾，率領十萬部隊，在新加坡向日軍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蘭在印尼守軍司令載帕爾，向日軍今村均中將投降；五月七日美軍司令官溫立特中將（麥克阿瑟僅以身免）在菲律賓向日軍的本間雅晴中將投降。整個亞洲戰局中，只有中國在長沙，痛擊日軍，造成日軍成軍以來，另外一次大規模會戰的慘敗記錄。

第三次長沙大捷，立刻成爲全球新聞的焦點，華軍的表現確實不凡！現在西方國家的軍隊，在被日軍擊敗之後，才真正知道中國軍隊的作戰實力，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落後的中國能夠單獨地對抗日本如此之久，實在是有著過人的能耐。因此美國政府以最快速度，通過法案撥給中國五億美元的信

用貸款，英國政府也立刻通過給中國五千萬英鎊，作為法幣的平準基金。中國堅苦抗戰多年後，總算是真正得到國際上的援助了，中國也立即躋身成為抵抗法西斯軸心的主要盟國。

就歷次中日戰爭中的戰場成果與記錄而論，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績應是最為輝煌的，無論就兵力動員的規模以及日軍死傷來看，華軍在長沙大捷的表現，比在台兒莊、萬家嶺、崑崙關、上高會戰所得的勝利，還更為出色。而薛岳將軍更是因此得到日軍的「長沙之虎」的封號，日本的十一軍在幾年之內，都不敢再對長沙，進行任何重大的攻擊。

百團大戰與共產黨的游擊戰

若是以作戰的觀點來看，百團大戰對於抗日戰爭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戰爭經驗，因為充分利用了游擊戰的優點，打擊與消耗日軍的實力，但是卻違背了共軍「優先發展」的最高戰略原則，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絕對「下不為例」。後來雖然共軍進一步發展到可以同時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的實力，但是八路軍再也沒有進行大規模主動抗日的作戰了。

在研究抗日戰爭歷史之中，究竟中國共產黨扮演怎樣的一個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爭議的問題，因為在歷史的層面而言，中國共產黨最先旗幟鮮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學生、工人的熱情支持，成功地打響了抗日的文宣戰，喚起了抗日的民氣。但是也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雖然能夠主動以宣傳出擊，並且在國際社會中，成功地製造了大量抗日的文宣，配合國際社會削弱、扭曲中國抗日真相的立場，塑造成為一個印象，喧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國的抗日戰爭，歸納為不過是打了就跑的游擊戰，所以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貢獻，也僅能是無足輕重的游擊騷擾作戰（即「麻雀戰爭」）。

29.1 拋開政治的包袱、面對抗日歷史的真相

這個錯誤的印象，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中國抗日戰爭是全面的作戰，中國的軍隊仍然守住超過三分之二的領土，中國軍隊甚至可以在大型會戰之中，與日軍的主力進行硬碰硬的作戰，多次使得日軍主力的進攻遭到嚴重的挫敗。

無論中國共產黨如何宣傳，八路軍在抗日時的表現是多麼英勇（當然有不少的戰鬥是真實而且慘烈的），但是中共所無法改變的事實是，當時中共的軍力實在有限，在全力「發展」的最高政策指導之下，對於日軍只是採取最低限度的游擊戰打法。雖然我們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殺共軍當中一些個別的抗日行動（寫作本書的動機就是要完全忠於歷史的事實），共軍游擊戰的犧牲也是一樣的慘烈，同時在整個中日戰爭中，游擊戰也有戰略牽制作用存在，不過究竟與正規的、硬碰硬的大兵團作戰相比起來，還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國戰區從頭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蔣介石所指揮的國軍所負責，盟國是與國民政府組成四強為首的聯合國，日軍是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投降。

問題是，在後來的國共戰爭中，中共取得勝利，爲了消除人民對於國民黨與蔣介石的「記憶」，當然要在抗日戰爭的史實上，有些「調整」，而不願讓中國人民記得，蔣介石是如何艱苦卓絕的領導抗日，與國民政府是如何以實力成爲全球的四強，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奮鬥中，如何把列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一律撤銷。這樣強調共產黨爲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戰歷史」，就使得許多的中國人民對於抗日戰爭，失去了史實的焦點，中國人民英勇的歷史貢獻便淪爲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最大的問題，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裝備以及軍隊訓練素質落後日本很多之外，中國總體國力與財力，更是無法與已經現代化的日本比較。此外，中國對內無法團結一致，對外難以爭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特別嚴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斷進逼，非要徹底滅亡中國的壓力之下，國際社會可以說是表現出一幅愛莫能助、隔岸觀火的態度，這時只有與日本有世仇與利害直接衝突的蘇聯，還能對中國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蔣介石明知蘇聯侵略中國的野心，其實超過於日本，但是除了採取聯蘇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別無他法。當時中國的處境是如此的危機四伏，唯一能夠暫時幫忙中國的，

竟然是另外一個企圖侵略中國的「敵人」。爲了準備抗日竟需要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可見中國面對的國際社會是多麼地現實與冷酷。

29.2 共軍抗日獨樹一幟

但聯蘇的條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戰的前夕，中國共產黨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全中國人民與所有的團體，不分黨派共同抗日。中共的這個口號與政策，獲得廣大人民與輿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蔣介石對於中國共產黨再有不同的意見，也不得不在尋求蘇聯援助的壓力，以及廣大民意的要求下，將中共納入抗日的陣營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發全面的戰爭之後，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與蘇聯終於達成軍援中國的協議；兩天後，國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隊八路軍（後來又增加了新四軍）的抗日部隊番號。中國共產黨與共軍在過去多年來，一直在設法鼓動抗日風潮，發起各種的抗日運動，成爲中國要求抗日的輿論領導者，但是卻沒有機會真正的與日軍作戰，直到接受收編之後，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戰鬥序列之中，和日軍真正地進行作戰。

當時八路軍的戰鬥序列番號是十八集團軍，配屬在閻錫山指揮的第二戰區，進行抗日作戰。八路軍的一一五師，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參加過平型關作戰，負責在戰線後的游擊戰，伏擊到日軍的一支運輸中隊，獲得了奇襲的戰果。但是之後中共的部隊，就自行獨立發展與運作，對於國民政府軍委會或是第二戰區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採取參考的立場，並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國民政府其他部隊一起協同作戰，而是自己獨立作戰，當然更多的時間是在發展與壯大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

八路軍之所以會獨樹一幟，進行自己的抗日戰爭，主要原因是，國、共兩黨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產黨列寧專政教條的影響。共產黨絕不會與其他政治團體平起平坐地進行政治競爭，以爭取民意支持而交替執政。共產黨進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所以當時共產黨只有兩種可能的政治地位：一個是在未執政時的「地下黨」（目標是以武力打倒執政的政府），一個是能夠獨掌大權時的「執政黨」。抗日戰爭是一個重要建黨與建軍的革命過程，當時共產黨抗日終極的意義，並非保衛中華民族利益，而是反擊無產階級革命的所有敵人，中國共產黨只是藉著抗日統一民

族戰線為手段，來達成最終之無產階級專政目標。

從抗日戰爭的歷史來看，八路軍幾乎沒有在抗日戰爭重大的戰役中出現過，更別說擔任主要作戰的角色了。這當然不能代表中共的軍隊，完全沒有參與抗日的戰爭，但這卻代表中共的部隊，沒有主動參與對抗日軍的「戰略性作戰」。八路軍的組織力強、運動能力高，擅長控制與發展的策略，有著絕處逢生、無孔不入的超強本領，到處都可以建立游擊基地與收編部隊。

八路軍前身是從井岡山起家的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磨鍊，打游擊已成了八路軍的專長絕技，共軍的游擊戰可以說是發展到「超微化」，甚至一個班、一個排的兵力，都可以進行游擊與破壞戰。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軍隊的掃蕩攻擊，八路軍很少對日進行營級以上部隊的攻堅作戰，共軍以發展與擴張實力，做為抗日戰爭期間的優先策略，而不是針對日軍主動進行猛攻猛打的作戰，在國民政府對日軍正面攻擊的會戰中，共軍幾乎是採取置身事外的態度。

因為八路軍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其歷史使命是要推動無產階級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之一，所以八路軍會與日軍作戰；但是打擊日軍並非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目標，如何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以完成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共軍的歷史任務，所以共軍的抗日方針，是以發展為優先的。

當時八路軍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編其他的武力，當然在必要時，也會消滅其他國民政府的抗日隊伍，因為「他們」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當然國民政府的部隊，也對八路軍採取反擊，後來在許多地區，造成國共部隊之間的對立，比對日軍還要嚴重¹。

要論八路軍在八年抗戰中，唯一能夠稱得上戰略性攻擊的作戰，應該就是相當有爭議的「百團大戰」了，這是發生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到十二月間，八路軍在沒有得到延安總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動地在山西與河北鐵路沿線一帶，對日軍進行主動、多點多線的攻擊作戰。

基本上，以「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來形容共軍在正式參加抗日作戰的八年表現，頗有深刻的見解，因為在整個全面抗日戰爭的八年期間，共軍從一九三七年的兩萬八千人，發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萬人；從

¹作者先父就是因為發現共產黨的這種發展遠重於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產黨組織的抗日隊伍，轉投國民黨的抗日部隊。

只在陝北的一點基地，擴張到華北、內蒙與東北，甚至在江南與廣東，都有共軍的據點，在抗日戰爭嚴重的消耗中，可以說是成長驚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結論就是，在抗日戰爭中，共軍必然是全力發展而非全力作戰，才能有此驚人的成長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戰爭歷史中，總共進行二十二次的會戰中（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的作戰），共軍根本沒有在一次的會戰中，扮演過擔綱的角色；在一千一百七次的重要戰役中（雙方參戰兵力在一萬人以上的作戰），共軍也很難拿出平型關作戰之外的實例，可以列入對日重要戰役的歷史之中——當然共軍在平型關作戰中，也只是參與其中一次助攻性質的伏擊戰而已，並非擔任作戰的主力²。

29.3 日軍的「治安肅正」及「三光政策」

那麼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共軍真正在那裡？根據歷史事實所提供的答案是，共軍在抗日的游擊戰中，是扮演了一個相當份量的角色，八路軍的游擊戰給予日本華北方面軍，帶來相當嚴重的牽制與耗損，造成日本華北方面軍，進行了多次的「治安肅正」作戰，最後甚至採用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來對付以八路軍為主的華北抗日游擊隊。但是在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上，共軍多半只進行小規模的游擊戰，或是屬於被動的「被掃蕩」反擊，而非主動的戰略出擊。只有共軍的百團大戰，可以說是唯一例外。

日軍在攻佔武漢之後，發現蔣介石雖然敗退到中國西南邊區，但是仍然拒絕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決定扶植漢奸政權，進行以戰養戰以及以華制華的戰略。問題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脅利誘的方式，找到一些願意出賣國家民族的敗類，但是這些漢奸所組成的政府，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因此效率極低。更大的問題是，由於各種游擊隊與敵人地下組織的興起，有效牽制了漢奸政權的運作，這些漢奸政權一旦離開日軍的火力支援範圍，幾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擊隊與敵後的地下組織，對於漢奸政權人員與家屬的威脅，也是造成偽政權無法展開運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華制華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順利，也就影響到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目標，所以日軍決定要針對中國的抗日游擊隊，進行徹底的掃蕩，而

²關於平型關作戰的歷史真相，請參考第二十一章。

中國敵後地區的游擊隊，又以中共的組織，發展得最爲快速，中共游擊隊的作戰能力與生存韌性也最爲強勁。所以日軍大本營要求華北方面軍，在游擊隊活動最多的地區，特別制定了「治安肅正」作戰方案，以徹底掃蕩中國游擊隊的活動，以爲日本所扶植的漢奸政權，設立一個可以運作的環境。

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治安肅正作戰方案，總共分爲三期進行，先後由三個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駿、岡村寧次來執行。日本整個華北方面軍的部隊，幾乎全體動員，北起內蒙的長城線，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總共包括了內蒙、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對於游擊隊進行全面掃蕩。

這時，日軍才真正領教到八路軍游擊隊的作戰能力——靈活變化、出沒無常、攻勢凌厲、韌性極強。日軍追擊時，還會隨時遭到游擊隊的反包圍與反突擊，造成治安肅正作戰的成果相當有限，日軍的傷亡與損失，則是相對的增加。特別是在岡村寧次出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對於如何掃蕩八路軍的游擊隊，有著極其凶狠與殘酷的手法，以殺光、燒光與搶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讓華北八路軍游擊隊活躍地區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傷與損失，遠遠超過日軍與游擊隊總和的幾千倍。

29.4 游擊戰付出的人民成本極大

日軍與共軍在華北地區的作戰，多是游擊與掃蕩戰，雙方主力對陣的機會很少，但是長途跋涉的運動戰，卻造成了頗多的傷亡，特別是老百姓的損失更大。因爲游擊戰的一個特徵，是「軍民一體」的分進合擊作戰，所以日軍反擊起來，也就軍民不分的「一體消滅」。這就是說中國人民爲了支持中共的游擊戰，所付出生命與財產的代價，遠遠超過支持國民黨的正規作戰。游擊戰能夠以小博大，除了它靈活的戰鬥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爲作戰的主要貢獻者與犧牲者。

日軍在與八路軍的作戰中，陣亡的最高軍階軍官，是日軍的第二混成旅團長阿部規秀少將（階級相當於中國的師長）。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該部日軍奉華北方面軍的命令，執行治安肅正的作戰計畫，在晉、察邊區一帶，追擊八路軍游擊隊。十月中，旅團長阿部親率部隊，深入山區追擊。結果日軍第二混成旅團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隊，被八路軍楊成武部，在雁宿崖設下埋伏

而殲滅。

阿部規秀在接到日軍遭到圍殲的慘敗報告之後，急於報仇以挽回軍威，於是不顧一切地孤軍繼續追擊共軍；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領的日軍，在黃土嶺再度遭到八路軍楊成武的包圍，阿部在混亂中下令突圍，在七日下午，阿部規秀中彈陣亡。阿部規秀少將（被追贈中將軍階）的戰死，曾經造成日本華北方面軍的震動。這是八路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所擊斃的最高軍階日軍將領。國民政府軍隊所擊斃的日軍最高將領，是十一軍軍長冢田攻中將（日軍追贈大將軍階）。

共軍在抗日作戰中，陣亡的最高將領是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左權。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動員三個師團的兵力，由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親自指揮，進攻山西東南太行山的八路軍總部，日軍經過一系列的激戰之後，攻佔了八路軍的總部郭家峪，八路軍下令全面撤退轉進；六月二日，日軍在後續的追擊戰中，造成八路軍的參謀長左權，在麻田被日軍射殺。這是共軍在抗日戰爭中，戰死的最高將領。國民政府抗日作戰犧牲的最高軍階將領是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上將，與三十六集團軍司令官李家鈺上將。

29.5 共軍發動百團大戰

一九四〇年年中，在日軍大舉掃蕩游擊隊的作戰之下，屬於八路軍游擊部隊的活動區域，也遭到日軍嚴重的壓迫，因此八路軍決定適時反擊，以突破日軍的擴大封鎖線。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運作的共軍第十八集團軍司令部，由軍長朱德、副軍長彭德懷、參謀長左權等人，在面對日軍不斷的掃蕩與收縮游擊隊戰線的壓力之下，決定運用實力已經發展多時的共軍，主動在正太鐵路沿線，發動一次反擊攻勢，以突破日軍的包圍，並且檢驗共軍擴編的戰力。

這個主動攻擊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一二〇師師長賀龍、晉察冀軍區聶榮臻率軍參戰。這次大規模的出擊作戰，事先沒有正式呈報中共的中央軍委會核准，但是毛澤東等軍委會負責人也知道這個作戰行動，不過並未加以阻止或是進入審查，當然也就沒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澤東的意

見是同意對日軍進行反擊，但是兵力儘量壓縮在十五個團左右³。

這個命令指示如下：

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動、我西南國際交通被截斷、國內困難增加，敵有于八月進攻西安，截斷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軍應積極的行動，在華北戰場上開展較大勝利的戰鬥，破壞敵人進攻西北的計劃，創立顯著的戰績。』『為打破敵之囚籠政策，決定乘目前青紗帳和雨季時節，利於隱閉及不利於日軍機械化作戰，爭取晉冀察、晉西北、晉東南掃蕩比較緩和，正太路較為空虛的有利時機，大舉破襲正太路』

因此這次戰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準備調動共軍一二九、一二〇師與晉察冀軍區的部隊，破壞正太鐵路，截斷交通線，打破日軍封鎖所做的主動攻擊行動。當時八路軍的各個部隊，在接到命令之後，一二九師出動八個團，一二〇師出動四個團，晉察冀軍區出動十個團，總計二十二個團，參與破壞正太鐵路的作戰。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八路軍的二十二個團，秘密地集結，在毫無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對日軍所控制的正太鐵路，發動了全線與同步的攻擊。而其他的八路軍部隊，也紛紛加入請戰抗日的行列，最後所有參與作戰的八路軍，番號高達一百零五個團，共計十五萬的兵力。

由於日軍事前低估八路軍的作戰實力，也沒有掌握到任何預警的情報，正太鐵路線日軍的兵力相當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軍的突擊之後，可以說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軍初步攻擊進行的相當順利，整條正太鐵路的交通，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之內，多達十幾處地方，都遭到了八路軍的攻擊、破壞而中斷。八路軍在正太路初期攻勢的順利，引起更多的共軍要求加入作戰，因此動員的兵力，就遠超過原先的計畫。

八路軍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軍委會的電報表示：

『正太戰役我使用兵力約百團，于二十日晚已經開始戰鬥，序戰勝利已經取得，這次戰役定名為百團大戰，這是華北抗戰以來，積極主動大規模向敵進攻之空前戰役，應加緊擴大宣傳』

百團大戰就這樣成為八路軍一次空前絕後的抗日文宣戰題材。當時國民政府

³在文革期間，百團大戰以沒有奉到正式命令就發動作戰，而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日軍的反擊，與暴露共軍實力等原因，成為整肅彭德懷的罪證之一。

正在節節敗退之時，面對困坐愁城的低迷壓力，對於任何有利於人心士氣的戰報，都會加以擴大的宣傳，所以八路軍發生百團大戰的消息，當然成爲全國性的宣傳重點。

29.6 共軍突擊成功與日軍的反擊

而戰事一旦展開，在華北的日軍，突然遭到八路軍的多處伏擊，受到不少的損失與死傷。在驚魂甫定之後，日軍的反應當然是驚怒交加，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立刻下令，方面軍的所有部隊，就地展開強烈的反擊，而受到共軍攻擊的日軍的第一軍，以及統籌全局的華北方面軍也立刻設法穩住戰局與調動兵力，對八路軍進行反撲。分散在此一地區的八路軍各個部隊，也就開始主動或是被動地參加全線的戰鬥。作戰時間從一九四〇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時開始，分成三個階段展開，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軍設法化整爲零、退出戰線爲止。共軍陸續參與這場作戰的部隊總數，前後加起來，達到了一百零五個團。

百團大戰的第一階段是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戰地點是正太鐵路沿線。由聶榮臻所領導的晉察冀軍區，前後總共出動四十六個團的兵力參戰，分成三路縱隊，破壞正太鐵路東段。另外出動三十一個團，分頭破壞北平與冀北所有的鐵路交通路線，包括北寧鐵路、平綏鐵路、平漢鐵路及津浦鐵路，以牽制日軍的部隊調動，擾亂敵方對於戰局的情報判斷。在聶榮臻的指揮之下，日軍在石家莊以北地區的全線鐵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壞與騷擾，而聶榮臻部的攻擊重心，則是放在正太鐵路的娘子關與井陘煤礦。

當時聶榮臻的戰報指出，八路軍曾經在八月二十一日佔領娘子關與井陘煤礦，與日軍的第四與八獨立混成旅團作戰，並且先後攻克或是包圍日軍的大小據點數十個。當然八路軍主要的目的是運動戰與破壞戰，因此攻克之據點多半在破壞之後，將可以運用的器材物資帶走，在幾個小時、最多一兩天後，立刻加以放棄。事實上，八路軍並未完全地攻克娘子關，只是攻進娘子關，佔領部分地區，由於與日軍休假的部隊遭遇，因此高估了日軍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軍也優先趕往支援，造成八路軍迅速退卻。

而由劉伯承指揮的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總共出動四十七個團，主要目

標是正太鐵路中段，陽泉到榆次的交通線，另外同步攻擊平漢鐵路、同蒲鐵路與德石鐵路，在主攻作戰中，劉伯承主力攻佔正太鐵路獅腦山的制高點，居高臨下以攻擊陽泉；日軍則是奉命全力反擊，結果八路軍與日軍在此爆發了九晝夜的激戰，日軍動用飛機轟炸以及砲兵支援攻擊，八路軍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勢，襲擊陽泉附近的日軍交通據點。由陳再道率領的八路軍部隊，成功地摧毀了德彰機場的日本飛機三架，由陳賡指揮的部隊在山西的雙峰伏擊日軍，造成日軍三十六師團的永野支隊的支隊長永野中佐陣亡。這是百團大戰中，八路軍與日軍作戰最為激烈的幾場戰鬥事件。

由賀龍指揮的共軍晉綏軍區部隊，其出動二十二個團兵力，在山西境內，攻擊與破壞同蒲鐵路以及牽制太原日軍。這些軍事行動，多是屬於破壞作戰與牽制作戰，八路軍打了就跑，與日軍並無直接激烈的攻堅作戰。

日軍在遭到八路軍的突如其來的攻擊之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立刻組成反擊兵力，一方面設法收復所有遭到八路軍攻佔的據點，修復被破壞的鐵路、公路、橋樑與電話線，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軍的主力，給予反制與打擊。但是日軍發現，八路軍的地區控制極其成功，人民與軍隊配合程度極高，日軍根本難以得到情報與後勤支援，因此參與掃蕩作戰的日軍，多半是撲空而返。同時八路軍的運動與組織，都非常的靈活與具有彈性，所以日軍無法在短期內，對八路軍進行有力的打擊。

當日軍的掃蕩作戰才剛剛的結束，八路軍的第二階段攻勢，又在九月二十日展開，這回八路軍減少攻堅作戰，增加運動戰與破壞戰，並且將作戰地區擴散。其中爆發激戰的主要作戰地區，在山西東南的榆社縣、遼縣一帶，以及在山西到察哈爾的蔚縣與涿鹿一帶。日軍陣地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特別是八路軍楊成武部，在插箭嶺的攻擊，與日軍作戰七晝夜，日軍遭到相當程度的傷亡。

於是日軍只有再度組成掃蕩作戰的兵力，對山西、河北一帶的八路軍控制的地區，進行追擊與掃蕩作戰，這次日軍的攻勢，雖然沒有捕捉到八路軍的主力部隊，但是對於八路軍的根據地，進行了相當徹底的破壞。

而後在日軍結束掃蕩作戰之後，八路軍再度對回防的日軍進行破壞與騷擾作戰，由於這次的作戰，屬於尾聲的攻勢，因此八路軍並無主要的攻擊目標，而只要是給予日軍更多的牽制與騷擾而已。不過從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就開始詳細研究八路軍的組織與戰術，進行長期、主動的掃蕩作戰，加

強日軍的「治安肅正」方案；日軍也把八路軍的游擊戰，當成一個相當困擾與具有威脅的敵對目標看待。

29.7 百團作戰的檢討

綜觀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整個八路軍的百團作戰，前後歷時三個半月，總共動員了十五萬人的兵力，參戰部隊的番號，最高達一百零五個團，在華北的四個省區，進行同步攻擊的游擊戰、破壞戰與攻堅戰，由於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襲的效果，日軍的反擊也遭到牽制，一度使日軍陷入了困惑與被動的狀態，算是八路軍相當成功的一次主動出擊作戰，不過作戰的性質，仍然是多場的游擊戰所串連而成的作戰。

若是以作戰的觀點來看，百團大戰對於抗日戰爭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戰爭經驗，因為充分利用了游擊戰的優點，打擊與消耗日軍的實力，但是卻違背了共軍優先發展的最高戰略原則，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絕對「下不為例」。後來雖然共軍進一步發展到可以同時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的實力，但是八路軍再也沒有進行大規模主動抗日的作戰了。

特別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後，中共的「老大哥」蘇聯主動與日本簽下互不侵犯的日蘇中立條約，共軍就更缺少主動抗日的動機了。既然老大哥都決定與階級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閥「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國蒙古與東北的利益，那麼中共更沒有必要主動地抗日，而破壞老大哥與日本的蜜月。此時日軍正需要大量抽調在華的部隊前往南洋作戰，在共軍停止主動出擊的態勢之下，日軍自然從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中抽調走作戰部隊，共軍也樂得壓力減少，而且發展更方便，但這樣共同抗日的陣線就出現了更大的缺口。

29.8 國共之間的衝突

在整個國共合作抗日的歷史中，國共之間，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進行協同的抗日作戰，反而坐視日軍消滅友軍，甚至雙方進行「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地盤爭奪戰。蔣介石最多曾經將二十師的部隊，交給胡宗南，負責監視與包圍陝北的共軍延安總部，當然也在防止日軍由山西渡黃河

進攻陝西⁴。在黃河以北地區，八路軍的發展更是迅速，不但與日軍發生衝突，也利用機會消滅國民政府的部隊，逐漸成為控制華北地區的主要武裝力量之一；這類國共的軍事衝突，也蔓延到共軍新四軍在長江南北活動的地區。

根據重慶軍委會所接到的報告顯示，國民政府的部隊曾經遭到共軍近千次的攻擊，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軍在河北大破張蔭梧、喬明禮部，造成在河北敵後國民政府的游擊隊與民軍力量，完全被共軍收編與壓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東地區的國民政府敵後作戰部隊，也遭到共軍大規模的收編與圍剿，造成國民政府在山東的軍政力量完全癱瘓。一九四〇年三月，共軍的活動力量大增，迫使國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完全失去河北的運作空間，而退到山西。一九四〇年共軍再度圍攻山東的孫良誠、高樹勛部。一九四〇年十月，共軍又在江蘇北部攻擊國民政府部隊，造成黃橋事件，國民政府江蘇省副主席韓德勤受到共軍圍攻，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殉職。

29.9 新四軍事件

在國共之間衝突日趨激烈之後，共軍的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兵力，逐漸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發展會合，由於每次的國共部隊發生衝突，雙方都自認有理，重慶很難做出讓衝突兩邊都能接受的判斷，因此經過多次交涉之後，重慶方面，乾脆準備把黃河以北的敵後游擊區，全部交給共軍經營，以避免國、共部隊繼續發生衝突。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十月，重慶下令在江南地區活動的新四軍，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軍一再抗命與拖延。同時由於新四軍與其他國民政府的抗日部隊，早已發生多次的嚴重衝突，彼此結下了極大的新仇舊恨，使得這個調動的安排，結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軍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軍（屬於軍直屬部隊）在皖南準備渡江之時，突然與國民政府的第三戰區其他部隊，發生全面的軍事衝突，延安方面認為，新四軍是遭到國民政府部隊設下圈套的伏擊，新四軍軍長葉挺與五

⁴此時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揮下的部隊任職，頗能了解國共之間擁兵對峙的過程，以及彼此之間玩弄的手段。

千人被俘，國民政府以新四軍經常不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與其他國民政府的抗日部隊爆發過衝突為理由，決定就此解散新四軍。但是延安激烈反對，於是自己重新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繼續在長江兩岸發展運作，國共之間的軍事衝突因而更加嚴重。

我們很難去判斷國共之間許多衝突真正的是與非，不過國共在本質上的差異與對立，是造成在抗日戰爭期間，爆發國共相互衝突的主要原因。國民黨不希望共軍藉著抗日而發展壯大，共軍當然也不能接受國民黨限制它發展的約束，所以雙方衝突不斷。

就多數衝突事件而論，應該是共軍採取主動的成分居多：因為國民政府的部隊，一樣是共軍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與日軍沒有什麼重大的分別。共軍要發展，當然就要擴張地盤與收編軍力，故不會放過實力落單的重慶部隊；另一方面，與共軍衝突的國民政府部隊，大多數並非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之嫡系部隊，它們並沒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就算蔣介石下命令要它們消滅異己，這些部隊也不太會忠實地執行這種命令，因此多數的衝突應該是共軍主動動手。當然也會有國民政府部隊反擊共軍的個案，這也是因為彼此利害衝突之宿怨所累積造成的互相殘殺。

事實上，國共之間的衝突，是從敵後游擊區，擴大到中國外交的戰線上，蘇聯當然是共軍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國際共產黨的支持與同情者，在中國戰區成立後，進一步地滲入中國戰區，在中國與盟國的政治、軍事合作中，製造與擴大彼此間矛盾的文宣、報導。尤其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身邊的政治顧問，都是與延安來往密切，思想左傾的美國外交人員。在他們大力的影響下，造成美國政府經常以國共之間的各種問題，來脅迫蔣介石退讓，使得國際強權延後援助中國，有了更多的藉口。

甚至連日軍也很快地發現到，國、共的抗日陣線，已經出現了可以利用的強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發動「一號作戰計畫」的攻勢中，日軍就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的對立與矛盾，放膽猛攻國民政府的戰線，造成了中國戰區幾乎崩潰的危機，也就使得盟國共謀出賣中國的雅爾達密約，成為無法避免的歷史命運。

共軍之所以能夠在抗日戰爭中，通過挑戰與壓力而發展壯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軍同時在佔領區推動土改與黨政建設，從社會與經濟的基本架構著手，建立一個可以徹底動員與運作的總體作戰體系（或叫做「人民戰

爭體系」)。這個軍民一體的架構，能將所有力量都發揮到作戰上面。這種總體作戰的結構使得共軍儲備了極強的戰爭潛力。但同一時期，國民政府的部隊一直負擔抵抗日軍的正面打擊，在國內政治分解、經濟枯竭、社會動搖以及軍力再遭到日軍最後孤注一擲打擊的耗損之下，出現了搖搖欲墜的危機，也就給國際強權一個合作出賣中國的機會。

29.10 蘇聯紅軍全力支援共軍在東北發展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八路軍更是利用接收與復員的機會，全面地擴張，迅速將不少偽軍部隊與武器裝備也納入擴張的部隊之中；此外，八路軍更利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的機會，迅速尾隨紅軍，大舉進入了內蒙與東北，搶先建立起共軍在東北的武力；蘇聯紅軍也陸續移交大批關東軍的武器裝備給八路軍（並且斷然拒絕中國政府使用旅順、大連的港口，使得國軍無法及時運送部隊進入東北與進行接收工作），於是八路軍很快地擁有了東北、華北與內蒙的廣大地盤，以及經由收編偽軍、游擊隊來擴張的軍力，在抗戰勝利之後，就有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的武裝實力了。

本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歷史，初步的歸納是，在準備抗日時期，中共以靈活的文宣與組織，深入中國的群眾基層，加速凝聚中華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識，是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力，但是也促使中國無法在盧溝橋事件上退讓，而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況下，提前與日軍進行全面作戰。而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把握了歷史的機遇，極力地擴張武力，雖然在過程中，的確是與日軍進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戰，也有著牽制與消耗日軍的真實貢獻，但是中共與日軍爆發的各種游擊戰爭，主要是因為共軍擴張與求生存而引發的衝突，其目的並非在戰略上主動打擊與消滅日軍；僅有的例外是發

也許這樣的歷史事實陳述，恐怕會令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中國人難以接受。但是根據歷史的事實，就只能得到這樣的結論。面對所有為抗日而犧牲的中國軍民，歷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滇緬作戰

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滇緬作戰是華軍唯一在中國領土之外，所打的主要會戰。滇緬作戰主要的戰略任務，是要維持與打通中國西南的對外通路，使中國能夠輸入作戰的資源，繼續進行反法西斯的聖戰。

而為了打通這條維持中國戰力的國際通路，中國冒著極大的危險，付出極高的代價。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實這個作戰並不是絕對必要的，只是因為「盟國」蘇聯主動切斷了中國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國付出了超過其國力所及的代價，在緬甸的熱帶叢林對日軍作戰。由於英國一再地設下戰略圈套，美國又經常搞錯作戰目標，因此滇緬作戰，不但幾乎耗竭了中國本來就不足的戰力，甚至還造成中國差點亡在侵略者鐵蹄下的歷史悲劇。

中國軍隊在滇緬地區的作戰行動，依時間可以分成兩次作戰，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當時日本大軍開始橫掃南洋，中國派軍企圖協助英軍防守緬甸。由於盟國之間的猜忌以及政治的鬥爭運作，華軍成爲第一次滇緬作戰的最大犧牲品。第二次是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開始，英、美盟國更是違反協議，強迫中國將最精銳的美援裝備的部隊，投入緬甸北部作戰，完全消耗浪費在緬北的野人山區，造成中國自身缺乏兵力，無法在中國戰區迎擊日軍發

動的全面攻擊。在緬甸的華軍雖然大勝，但在中國自己的戰場，華軍卻遭到日軍最猛烈的打擊，戰線一度幾乎全面崩潰。

自從全球對抗法西斯的作戰合流以來，中國與盟國之間，爲了「如何」與「何時」在緬甸作戰，雙方發生了極大的歧見與戰略的爭論，這些摩擦嚴重破壞了中國與盟國間的合作關係，更影響到華軍對中國戰區本身的防衛。綜觀兩次滇緬作戰所得之歷史結論，就是國際強權從頭到尾，都理所當然地把中國當成一個犧牲品，任意出賣以遂其政治的陰謀與野心。

30.1 英國事前不願中國出兵協防緬甸

日本在封鎖了中國所有的海岸線之後，中國對外的國際聯絡通路，只剩下了由雲南經緬甸出印度洋的滇緬路，以及經由新疆進入蘇聯中亞的西北通路。這兩條公路可以說是維繫中國抗戰所需資源與人心士氣的「生命線」。但是當時身爲中國抗日「盟國」的蘇聯，於一九四一年六月與日本簽下「中立條約」，以及公然承認滿洲國；蘇聯不但停止了對中國的一切軍售，同時還切斷新疆對外的交通路線，禁止中國借道通過蘇聯與國際關係。

因此中國就只剩下滇緬公路來維繫中國取得抗日戰爭需要物資的唯一生命線，這條生命線提供中國抗日戰爭中，最爲重要的石油與軍火原料、零件等的供應。蔣介石在日軍一九四一年年底開始橫掃南洋之時，就已經主動關切這條國際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盟國軍事會議，向英軍提出華軍進入緬甸協防的建議，但是遭到英軍冷淡地拒絕。

當時英國仍然擺出一個「日不落帝國」自恃的姿態，認爲自己在南洋的軍力，多少可以與遠道出擊的日軍對抗；何況緬甸已經是在印度洋地區，就算日軍有意進攻緬甸，至少要等到先攻佔東南亞之後，才能對緬造成威脅。同時英國對於中國要派兵進入緬甸協防，更有著政治上很大的顧慮。因爲當時英國統治緬甸的政策相當失敗，造成緬甸人民經常反抗英國政府，甚至進行武裝獨立的對抗。

而當時的日本，已提出驅逐歐洲人離開亞洲，以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口號，更讓英國政府擔心，假如允許中國部隊進入緬甸，那麼很可能會影響到

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¹，所以英國對於蔣介石主動的提議，讓中國軍隊進入緬甸協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絕。

但是英軍統帥魏菲爾 (Archibald Wavell)，知道英國在緬甸幾乎沒有空軍，卻竟然要求蔣介石，將在緬甸受訓成軍的美國空軍志願軍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的戰機，全部撥給英軍調度使用。但這對於中國戰區急需空軍支援作戰的華軍而言，簡直是無法接受的要求²，因此雙方在協商之後，中國只有設法同意調撥部分的美國空軍志願軍，在緬甸協助英軍作戰。這支志願軍在緬甸發揮極其優異的空中戰力，創造一比十四的空戰戰績，使得美國空軍志願軍「飛虎隊」的威名，立刻揚聲國際。

30.2 最後一刻才向中國求援

不料盟國在南洋的戰局，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就出現急轉直下的惡化。英、美、荷三國的軍隊，在南洋對日作戰的表現，根本不堪一擊（比起中國軍隊在戰場的作戰表現，可以說是差得太遠了），這些殖民大國面對日軍的進攻，可以說是毫無招架之力。僅僅在三個月內，就讓日軍就以席捲之勢，攻下整個南洋地區，日軍的兵鋒前緣，就直接指向緬甸，這時英國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於英國駐緬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國要想在緬甸抵抗日軍的攻勢，只有求助於中國軍隊的協防。因此英國在日軍開始進攻緬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國部隊，分批南下，進入緬甸協防。

當時中國自身的軍力，只能勉強維持在中國戰區的戰略均勢，要想分兵參加緬甸的防衛戰，實在已經超過中國能力負擔之外。但是蔣介石知道，滇緬交通不能中斷，同時中國也必須負起盟國相互協防的責任，這樣才能爭取到盟國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國的援助。所以，蔣介石決定派遣中國僅有的兩個戰略預備隊，最為精銳的第五軍（杜聿明）、第六軍（甘麗初），由史迪威指揮，進入緬甸與英緬軍共同防禦日本的進攻。

當然這個作戰的戰略前提是，英國能夠控制東印度洋的航運，中國戰區

¹特別是緬甸曾經長時期是中國的藩屬國，中國軍力在緬甸出現，可能更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影響。

²事實上，在盟國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調動與作戰資源分配，從來就沒對有中國戰區的安危作優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國家的利益為基準。這個極其偏頗的情況，一直到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後（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矯正過來。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國政、軍領袖只為自己一時利益設想，完全不顧盟友死活的心態（不僅中國受害至深，美國也屢次被英國牽著走而無法作最有效的戰略決策）

所需的補給，能夠繼續流入緬甸的港口，以轉運雲南及大後方。這樣中國防守緬甸，才有戰略上的意義。問題是，當時中、英的聯合兵力還是不足以防守緬甸全境，特別是英國的海、空軍由於完全敵不過日軍，在一九四二年初就退出了東印度洋，因此日軍已經可以切斷盟國經由印度洋進入緬甸港口的海上補給線。在此情況下，還要求中國軍隊深入緬甸南部作戰，事實上已經沒有戰略的意義，何況中國本身已長期面臨兵力不足與補給困難的危險。但是英國仍然希望華軍進入緬甸南部作戰，以為印度的防衛，提供一些時間。最讓人納悶的是史迪威的心態，他自己從來沒有統兵作戰的經驗與能力，這時候卻展現一種強烈的個人企圖心，認為若是由他指揮盟軍，就可以擊敗入侵緬甸的日軍。

但是當時英國在整個南亞的戰略，根本已有放棄緬甸，保全印度的構想，因為英國在緬甸只有三個師的英緬混合部隊，也沒有空軍掩護，更缺乏當地人民的支持（這點非常的致命）。中國軍隊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都極端不利的情况下，進入複雜的熱帶雨林地區作戰，早已有著未戰先敗的隱憂了。

但事實上，就全盤的戰略格局而言，英國保衛東印度洋與緬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價，也是值得與必要的。因為如此可以讓中國得到維持作戰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裝備支援的中國軍隊，不但可以成功地牽制、甚至可以主動打擊日軍，這在整個反軸心國的戰爭上，是非常重要的戰略佈局。但是英國卻始終認為，盟國絕對不能給中國多一點的援助，以防中國軍隊強大到可以打擊日軍；因為中國一旦得到復興，歐洲的帝國殖民主義就不能在戰後的亞洲東山再起了。

因此英國在緬甸的作戰計畫，根本就是準備敷衍一下，並且存心拖中國下水，以牽制日軍進攻印度，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必須力拼保全的對外交通生命線，所以中、英雙方在戰略認知上，差異極大。同時究竟如何在緬甸建立整體作戰的架構，以及後勤支援的分配，中英之間也有爭議：中國方面認為，自己進入緬甸作戰的部隊是英軍的四倍，因此不適合由英國將領指揮，英國則認為自己是地主國，盟軍應該由英國統一指揮作戰，但問題是英國在緬甸根本沒有全盤作戰的戰略佈局。因此這場作戰指揮與佈署，就顯得既混亂，又權責不明。同時華軍進入緬甸佈署的時間太晚，當地人民不願和盟軍合作，因此不但當地的熱帶環境難以適應，所有的交通運輸

更是困難重重；英國甚至連清楚的地圖都沒有交給中國軍隊，造成華軍在緬甸作戰極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原是日軍在中國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因此對於日軍由南洋攻佔緬甸，以切斷支持中國抗日力量之生命線的大戰略，有著極高的企圖心。所以當日軍在攻克南洋之後，立刻轉向緬甸作戰。寺內壽一把日軍精銳的兵力，編成第十五軍戰鬥序列，由飯田祥二郎中將統帥，下轄一八、三三、五五與五六等四個師團的兵力，及配屬戰車與機械化部隊支援³，進攻緬甸、進窺印度，並且切斷中國西南的對外通路。

30.3 中國軍隊力擋日軍攻勢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軍在優勢空軍的支援下，大舉進攻緬甸，同時日軍設法與緬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擊團體連絡，進行內外夾擊。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軍優勢的兵力，非常順利的攻佔緬甸首府仰光，切斷了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港口。當時緬甸的英軍在事前根本就沒有應戰的準備計畫與能力，到了英國在南洋慘敗，緬甸局勢陷入危機之後，才又催促中國派兵挽救危局。

但這時盟國已經錯過了在緬甸南部佈防的時機了，日軍可以說是來勢洶洶，英軍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羅美（Prome），而將普羅美以東，從同古（Toungoo）直到景東（Kentung）的長達一千公里的地區，交給華軍接防。華軍又在英國錯誤的情報之下，將第六軍分散與虛擲在泰、緬邊界的防線上，佈置陣地以防範日軍與泰國軍隊的進攻（英軍在緬甸的情報工作，可以說是亂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鎮同古地區，則由華軍第五軍佈防。緬甸的鐵路系統在日軍鼓動緬甸人民游擊隊的破壞下，已經陷入癱瘓，在運輸困難的狀況下，當第五軍先遣的二百師剛到達防線，就遭到日軍猛烈的攻擊。

當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原先防守緬甸的戰略是，華軍應在同古以北的平滿納（Pyinmana）地區，設置陣地，與日軍進行決戰，若是決戰失敗之後，將轉進到緬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對日發動會戰，最後則是防守

³日本陸軍是世界上首先在熱帶叢林使用戰車與機械化部隊作戰的部隊，因此日軍在南洋作戰中，獲得空前的成功。

緬甸北部的戰略重鎮密支那（Myitkyina），做為控制經由印度進入中國最後通路的防線。但蔣介石這時候發現華軍在緬甸的防線已拉得太長，兵力明顯不足，因此又抽調六六軍，進入緬甸，在曼德勒與臘戍佈防。蔣介石特別告訴史迪威，華軍最快要到當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結，同時華軍的兵力與火力不足以與日軍正面爭鋒，要巧妙地運用地形依托來靈活應戰。

但是一向嚴格批評華軍不堪一戰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揮華軍，反攻仰光的攻勢作戰——這真是勇氣可嘉的「自殺」作戰計畫。試想四個日軍精銳的師團（日軍的一個師團相當中國一個軍的建制，擁有戰車與機械化部隊）又在優勢空軍的掩護之下，而中英聯軍的兵力只有兩個軍與兩個師（還尚未集結完成），以這樣懸殊的兵力，事實上連據險防守都還力有未逮，遑論如何能進攻日軍。但是史迪威卻一意孤行，強迫居於劣勢的華軍，準備反攻仰光。華軍將領當然急電蔣介石，告知重慶這種執行就等於自殺的命令。蔣介石也了解，史迪威這樣不能知己知彼來指揮作戰，中國軍隊將會遭到致命的打擊，因此設法另外成立參謀團來對付於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緬甸的戰場，可以說是出現分裂的指揮系統了。

事實上，以當時的兵力而言，華軍在緬甸的作戰，只能據險防守，進行後退包圍作戰，才能做到消耗與打擊日軍；最為關鍵的是，能守住滇緬路的戰略據點臘戍（Lashio），一旦臘戍失守，在緬甸的華軍就與中國戰區失去了連繫的通路，華軍就成爲一支孤軍而面臨全面潰敗。但是史迪威在整個滇緬作戰計畫之中，卻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個勝負的關鍵所在，他不但沒放置重兵把守臘戍，反而語出驚人、一再地要求兵力與火力不足的華軍，要直接攻擊日軍的主力。華軍將領不肯冒險出戰，史迪威就大怒請辭。蔣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羅卓英成爲副指揮官，來指揮華軍，這時日軍已經展開了攻勢。

而日軍攻陷仰光之後，立刻分兵兩路揮師北上，東路沿緬甸縱貫鐵路直攻華軍守備的重鎮同古，與二百師爆發激烈的戰鬥，西路則沿著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進攻英軍在普羅美的陣地。二百師在同古的防守作戰，可以說是表現得可圈可點。日軍以優勢的火力，以及戰車的掩護，猛攻同古，二百師在戴安瀾師長的指揮下，一直進行沉著的防禦，從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軍以優勢兵力，由側翼對同古進行包圍之後，二百師才奉命向平滿納決戰陣地作有秩序的轉進。接著第五軍的二十二師（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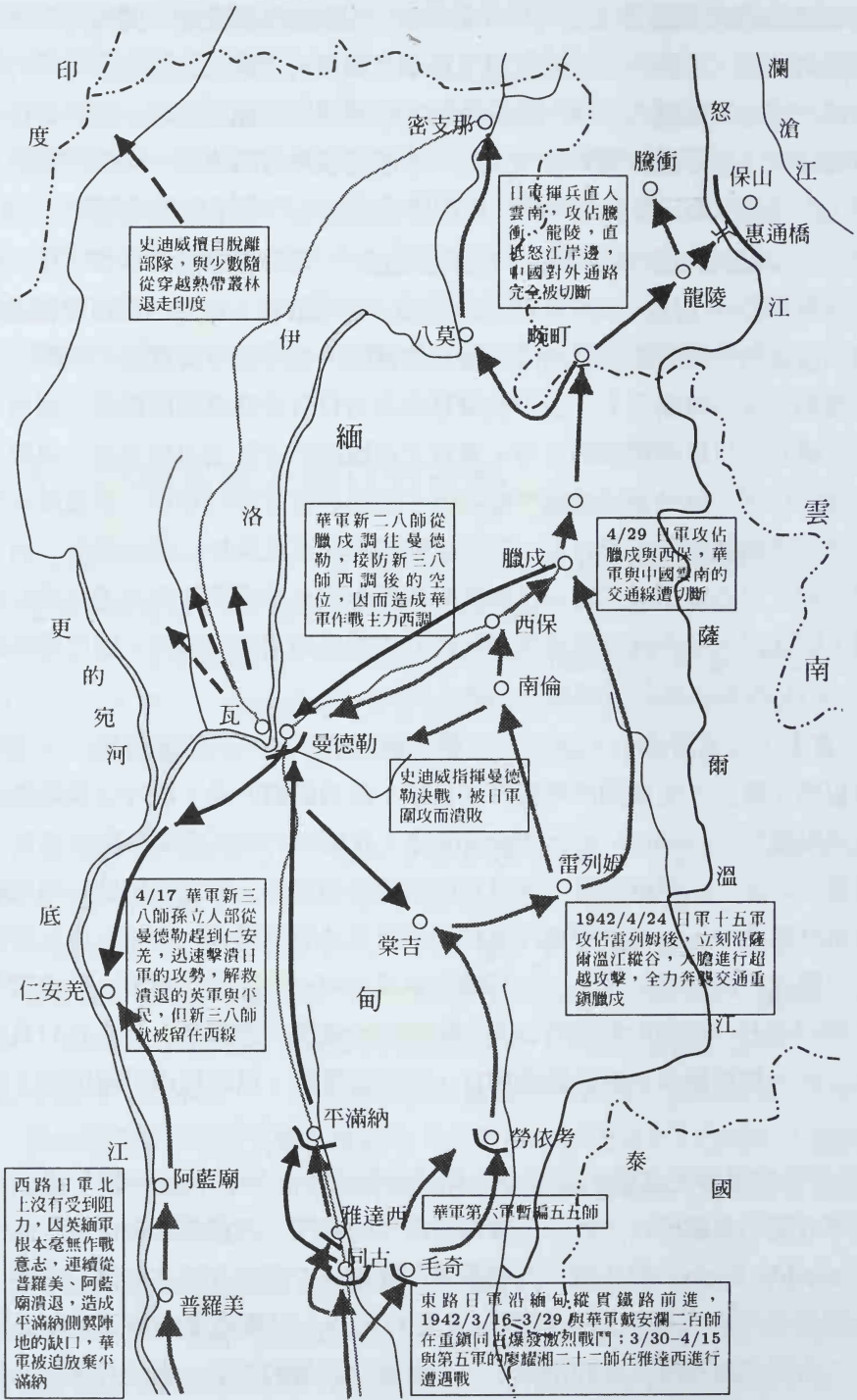


圖 30.1: 第一次滇緬作戰圖

耀湘），又在雅達西（Yedashe）與日軍進行遭遇戰，同樣展現了堅強的戰力，從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計畫退到平滿納準備決戰。這是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四個多月以來，在太平洋戰區中，盟軍打得最有表現的作戰（其它英、美、荷的部隊都是還沒進入激戰階段，就以潰散的方式被日軍擊敗）。

日軍發現中國機械化的第五軍戰力極高，因此預期繼續沿鐵路北上，進攻平滿納的華軍預定陣地，日軍將會產生重大的傷亡，因此日軍改成由兩個側翼突破的戰法。左翼的日軍進攻英緬軍防守的普羅美，由於英緬軍隊根本無心作戰，在日軍的攻擊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陣地，向阿藍廟（Allamyo）後退，這就造成了平滿納陣地西側翼的突出；蔣介石希望英軍至少能夠堅守阿藍廟，但是英軍的戰志已經動搖，在日軍三十三師團的壓迫之下，繼續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卻。因此史迪威所佈署的平滿納決戰之構想，就因為英軍的後撤，突出了平滿納側翼陣地的危險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棄。於是中國第五軍主力退向曼德勒，日軍於四月二十日攻佔平滿納。

30.4 史迪威錯誤的作戰佈署

而日軍在左翼的攻勢，仍然保持極銳利的打擊力，沿著伊洛瓦底江向北猛進，繼續全速追擊英軍後退的部隊。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師團，在仁安羌追上後撤的英軍，以及大批的外僑平民。英軍被困在日軍圍攻的危急狀況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揮的華軍求救，這時華軍指揮官羅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佈防的六十六軍新三八師孫立人部，馳援被困的英軍，孫立人三八師展現出快速與勇敢的戰技，率領華軍趕到仁安羌，立即擊潰日軍的攻勢，救出已經準備投降的英軍。

這個華軍英雄的表現，立刻成為英美新聞報導的焦點，當然也讓史迪威大感滿意，而將新三八師留在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線；羅卓英而為了填補新三八師西移而產生的空位，下令六六軍調遣新二八師從臘戍到曼德勒接防，這就造成華軍作戰主力西調，與東部戰線空虛的危機。而東部戰線卻是華軍與中國雲南連接的生命線，若日軍一旦發現華軍這個致命的戰略缺口，而全力發動東線右翼的側襲，切斷華軍東部戰線與中國雲南的連繫，那麼華軍在

緬甸就只有潰敗的結局。

這時最莫明其妙的是，英軍指揮官斯立姆（W.J. Slim）竟然因為華軍的表現出色，在仁安羌擊敗追擊的日軍，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調出一支中國部隊給他，以教訓不斷尾隨攻擊後撤之英軍的日本三三師團。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應了英軍的要求，在沒有知會第五軍軍長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調動二百師西進，準備再「露一手」，表演給英軍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當時關係緬甸作戰勝敗的關鍵是守住東部戰線與雲南的防線。此時東線已經出現的十萬火急的軍情，當時兵力分散與不足的華軍，在東部戰線上遭到日軍兩個師團的圍攻，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了，因此史迪威正確的戰略佈署應該是急調第五軍與第六軍東進馳援華軍防線，而不是將部隊大舉西調去掩護不戰而逃走的英國敗兵的撤退。

這時日軍知道，中國的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到曼德勒佈防，戰力充沛的準備迎戰日軍，因此日軍不願以主力直接進攻這個決戰陣地，而是掌握華軍東線空虛的戰機，全力從右翼的東線突進，打擊華軍兵力最為脆弱的東部防線。這裡是屬於甘麗初第六軍暫編五五師所防守的陣地。由於第六軍的兵力分配在緬甸東邊漫長的防線，一直延長到泰國邊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軍右翼攻擊華軍東線的部隊，是由機械化的重裝備五六師團與十八師團負責，這兩個師團在日本空軍的支援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暫編五五師防守的毛奇與勞依考（Loikaw）陣地，由於中國守軍的戰力不足，又沒有得到足夠的兵力支援，因此華軍東部防線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 中國軍隊在緬甸慘遭重創

這時日軍已經看出決定緬甸戰局的勝負關鍵所在，就是華軍的主力西調，東線的戰力空虛，所以日軍決定捕捉這個決定勝負的戰機，以長趨直入的奔襲作戰方式，由東線的缺口沿著薩爾溫江（Salween River）縱谷直接強攻臘戍。這是日軍在戰場上表現最佳的一次長距離戰術攻擊，有如德軍在歐洲所採用的閃電作戰——就是在戰線側翼上突破一個脆弱的裂口，然後大膽深入，直接攻佔敵軍背後的戰略中樞。

此時日軍在緬甸東線作戰，發揮了極強作戰企圖心與野戰攻擊能量，日軍在突破華軍的左翼陣地之後，二十四日攻佔雷列姆（Loilem），第十五軍

司令官飯田祥二郎中將立刻下令東線日軍，全力沿薩爾溫江的縱谷，進行超越攻擊，戰略目標直指臘戍。日軍對臘戍的搶攻強襲，甚至不顧華軍在背後追擊的行動，因為日軍情報已經發現華軍在緬甸作戰的致命弱點——臘戍竟然沒有重兵防守，日軍只要乘虛攻克臘戍，切斷華軍與中國後方的連結，那麼緬甸之戰就不必再進行任何的決戰了。

這其間，史迪威與羅卓英，竟然完全沒有看出日軍東線攻擊的企圖，以及華軍若是不能堅守東線後方的戰略據點臘戍，就會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雖然在日軍攻佔棠吉（Taunggyi）與雷列姆時之後，史迪威下令二百師回防，與第五軍的直屬部隊，由平滿納出擊，在四月二十四日，華軍二百師成功的收復棠吉，威脅到日軍右翼的戰線突進作戰，史迪威當然又是美國媒體報導下的戰勝英雄。

事實上，這時正是中日兩軍在緬甸勝負的決勝關鍵所在，日軍東線主力五六師團，已經開始掉頭北上，沿薩爾溫江河谷，直攻華軍的戰略命脈臘戍，而華軍第五軍也同時已經開始威脅到東線日軍的側背補給線，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這個戰機，將第五軍主力全部放在對日軍側背的打擊，由雷列姆對日軍進行全面的追擊；同時一方面設法調派在曼德勒的部隊與偏向西線的六六軍（張軫）所有部隊，全力回防臘戍，這樣華軍就可以在薩爾溫江河谷，南北包抄孤軍深入的日軍，而贏得緬甸作戰的大勝。

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瞭戰局發展的關鍵所在（他從來沒有任何統兵作戰的經驗與能力），做出了完全錯誤與致命的判斷：不但沒有採取任何挽救在東線戰局的決定，反而下令第五軍直屬的機動部隊回防曼德勒，準備與日軍進行曼德勒決戰。這樣雖然留下二百師繼續沿薩爾溫江河谷追擊日軍第五十六機械化師團，但卻因速度不足以致攻擊衝力大減，在日軍擁有空優的狀況下，二百師既尾隨不上日軍，還要付出很高的運動代價。

這樣日軍在東線突破之後，採取遠途強襲的作戰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順利的攻佔近乎不設防的臘戍與西保，切斷了華軍與雲南的交通，從側後方包圍了在緬甸的華軍，然後兵力立刻西進，從側後方進攻曼德勒。

這時史迪威竟然還不知已經大禍臨頭，仍在曼德勒調動華軍主力，準備佈置決戰陣地。負責臘戍防務的六六軍軍長張軫，才晚一步發現臘戍告急，而緊急派遣新二八師的一部，從曼德勒回防臘戍，同時也下令留在雲南的新二九師馳援，但是都已為時太晚。零星回防臘戍的華軍，被先到的日軍據險

迎擊，打得潰不成軍。日軍攻佔華軍的戰略中樞臘戍之後，整個在緬甸作戰的華軍部隊，補給線就被切斷，立刻陷入了崩潰的狀態。

直到這個時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個緬甸的戰局已經慘敗到無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緬甸的華軍，可以說是退路已斷。本來他還有一個最後絕處逢生的機會，就是將所有的部隊，以最快速度，撤向緬北重鎮密支那與八莫（Bhamo），還可以在此區設法據險設防，保住華軍在緬北的最後據點，以掩護雲南的安全，及駝峰航線的終點。

但是，此時史迪威的信心已經完全地崩潰，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華軍向印度退卻而不回中國，這是個重大的戰略與外交決定，史迪威卻連向蔣介石通知一聲的打算都沒有。此時在曼德勒集結的華軍主力部隊，根本就陷入混亂的狀態，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臘戍，又不能果斷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隊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隊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設法翻山越嶺回到中國。而在東線追擊日軍的二百師，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軍的圍攻，被迫回轉雲南，師長戴安瀾戰死殉國。

當盟軍在緬甸出現潰敗之時，緬甸人民與游擊隊蜂湧而出，到處趁火打劫、進行破壞，整個緬甸陷入一幅被戰火蹂躪的悲慘景象。華軍當然是四面受敵，一路且戰且走。日軍乘勝追擊，由緬甸進入雲南，攻佔騰衝等地，直到怒江（薩爾溫江上游）岸邊，從此日軍盤據這些地形險要的地區，切斷了美國對中國援助的通路。

30.6 史迪威棄軍逃命

最為不可思議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軍的半途，擅自個別的離開部隊主力，連一個電報也沒有告知蔣介石，自己帶著身邊極其少數的隨從人員，以三個星期的時間，單獨穿越罕見人跡熱帶叢林，與極其惡劣不可測的大自然環境搏鬥，然後奇蹟式進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歲的高齡，做出這樣的「冒險」，可見其個人的毅力與固執⁴。

⁴我們可以推測史迪威這個明顯違背軍法的個人冒險行動，不但是想縮小被追擊的目標、利於保命，也是有計劃地為挽回自己前途的賭博行爲。史迪威一向最擅長利用美國的新聞媒體為其造勢，所以一旦這個單獨穿越緬北熱帶原始叢林之舉能夠成功，以他對記者的關係與瞭解（即搶新聞遠勝過報導完整實況），這個超級頭條新聞必然會掩蓋他在指揮滇緬作戰上所犯的大錯。軍方很難去懲處一個美國報章雜誌所歌頌的英雄人物（這趟叢林冒險使得他的體重下降了二十磅）

蔣介石還是經過其他的管道，最後才輾轉知道中國遠征軍與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國新聞媒體的報導中，竟然把史迪威的這種戰場慘敗、主帥甩掉大軍，獨自逃命的行爲，當成「作戰傳奇」的英雄來報導，竟然「忘了」他是緬甸華軍的最高統帥，不但因爲戰略決斷嚴重錯誤，導致了作戰空前的慘敗，遺棄十萬華軍於緬甸的殺戮戰場（簡單說，就是一個指揮失誤與丟掉大軍的統帥），也拒絕與中國戰區的統帥蔣介石報告部隊的撤軍決定與行蹤，這種行徑，像極了表演個人歷險傳奇的探險者，而非十萬大軍的指揮官。軍人講究的是絕對服從，因爲一個大軍統帥的任何判斷與決定，都事關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個戰局的演變！（假如史迪威是個步兵連長，率領殘兵退到印度，應可以得到獎章，但是做爲不顧大軍安危的統帥，沒有得到上級的命令許可，就任意讓所屬部隊自生自滅的一連串行爲，應該受到軍法審判。）

而在事後，由於中國極需美國援助（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又與史迪威的私交非常地深厚），所以蔣介石不願與美國發生重大的爭論，以出乎意料與極其寬厚的態度對待史迪威，蔣沒有檢討史迪威在緬甸作戰指揮嚴重失誤的責任，更沒有追究他單獨離棄軍隊於不顧的私逃行爲。這是蔣介石爲日後「史迪威事件」的歷史悲劇，所種下大錯的禍根。因爲至少這是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要求盟國撤換史迪威的職務。從此之後，史迪威留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就成爲中國抗日戰爭中，一連串的危機根源之所在。

史迪威一行毫無愧色地從印度回到重慶之後，受到美國新聞媒體的熱烈歌頌，竟然成爲了英雄。而史迪威見到蔣介石，完全不談自己指揮的致命失誤，反而先列出一大張的華軍將領的名單，要求「從嚴懲處」。他並且提出個人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從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兩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緬甸擊敗日軍，以扳回他失敗的顏面。其二就是設法從蔣介石手上，奪到中國戰區軍隊的指揮權，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順眼的中國軍官。

30.7 第一次滇緬作戰的檢討

日軍在緬甸以側翼突破，遠程深入切斷華軍補給線，造成華軍整個戰線的崩潰，而大獲全勝。原先史迪威所預訂的決戰地點，根本沒有重大的戰鬥，就因爲華軍後方補給線被截斷而出現潰敗。假如華軍不是爲了搶救在仁

安羌的英軍，而調空了後方的戰略預備隊，或是搶救英軍之後，所有軍隊立刻回防，那麼緬甸戰局還不至於這樣快速地惡化到難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讓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沒有覺察到日軍突破雷列姆之後，就已經可以由東線河谷突進，而威脅到華軍的戰略據點臘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沒有快速機動能力的二百師尾隨追擊，而將華軍主力部隊屯聚在曼德勒等待「會戰」，也沒有全力增援後方的臘戍防務，結果造成華軍無法挽回的慘敗。

華軍出征緬甸的三個軍的部隊，都是當時中國裝備與兵員最佳的戰略機動部隊，在緬甸遭到這樣不明不白的損失，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值得與令人可惜，入緬的華軍總數達到十萬人，能夠歸國與進入印度的，只剩八萬多人，重裝備盡失，大多數的華軍是死於疾病、饑餓、迷路，而非戰死。從此中國戰區的戰略預備隊不足，就成為中國難以在迎擊日軍攻勢時，展開有力的反擊作戰。

中國在緬甸的慘敗，不但對於中國的人心士氣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同時也讓日軍打到雲南的西南部，攻下龍陵、騰衝，威脅到中國大後方雲南的安危，這時中國援軍及時趕到，進行猛烈的反擊，拆毀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橋樑，這才阻擋住日軍的攻勢。日軍隔著怒江與中國部隊對峙，霎時之間，雲南從大後方的基地，成為西南方的前線，嚴重影響到盟國對於中國的補給支援。這時盟國只能利用飛航極其困難的駝峰航線，帶給中國杯水車薪的援助，因此中國嚴重缺乏作戰資源的問題，更是有如雪上加霜了。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中國的民族主義能夠支撐下去，換成其他的國家，早就向日本人了談判投降了。

平心而論，在南緬甸作戰的失敗，就整個戰略的觀點而言，應屬必然的。因為英國在東印度洋的陸海空三軍軍力佈局，都無力招架日軍的攻勢，中國派兵支援，也只是能做有限度的協助而已，無法改變日軍軍力、士氣上的絕對優勢。但是戰局會敗成這個樣子的難看，以及造成中國部隊如此重大的損失，的確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緬甸作戰的失敗，首先是指揮系統的混亂，英軍與華軍之間的缺乏合作與連繫，史迪威與華軍部隊長之間，嚴重的缺乏了解、互信與尊重，都是造成作戰失敗的基本因素。

華軍指揮官史迪威個人的戰略佈局的缺失與指揮才能的低劣，的確是令人感到無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華軍，在緬甸面臨日軍攻擊的最後時刻，又沒有空軍的掩護之下，倉促的行軍千里深入南緬甸佈防，就是一個基

本的錯誤。事實上，以當時日軍的戰力而言，其在緬甸的四個師團兵力，足可以擊敗中國十個軍的部隊。而華軍只有三個軍佈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緬甸的北部，據險防守反擊，引誘日軍長途深入，也許還可能有類似長沙大捷的機會。

緬甸中部作戰的關鍵，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華軍二百師攻克棠吉，這時日軍正在不顧一切地遠程奔襲臘戍，整個後方近乎完全不設防。假如這時候史迪威能夠把華軍主力分成兩支，第五軍的一部支援二百師沿河谷追襲日軍，另外將六六軍的新三八師、新二八師以及第五軍的二二師等部隊，以最快速度調回臘戍，同時設法要求蔣介石動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軍與陸軍支援，以圍殲日軍於薩爾溫江河谷，那麼滇緬作戰可能是日軍在臘戍的慘敗。

在中日戰爭中，滇緬作戰可以說是打得最「烏龍」，犧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戰。幾萬最為精銳的中華子弟兵，就在無能、更無恥的將軍 — 史迪威的瞎指揮之下，不明不白地成為孤軍，更有上萬華軍為此在異域斷送了生命。中國戰區失去了最精銳的戰略預備隊與其重裝備，使得抗戰後期的作戰更難有效抵抗日軍的攻勢了。

30.8 反攻緬甸計畫 — 盟國打擊中國的陰謀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緬作戰失敗的噩夢，這還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從此中國爲了「如何」與「何時」反攻緬甸，與英美盟國展開了一場接一場的會議桌上的折衝戰，中國是一次又一次的遭到盟國的暗算；蔣介石與史迪威更是在這個作戰計畫上，明爭暗鬥，造成了中國戰區一次接一次的危機，迫使美國總統羅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國調解爭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質作爲誘餌與武器，引發了暗潮洶湧的中國內部權力鬥爭，影響到中國整個抗日的戰局。

基本上，蔣介石認爲，緬甸作戰只是亞洲大陸戰場的一個環節，因此反攻緬甸的重要性是在於打通滇緬路，這將是美國大量軍援中國的唯一通路，也是決定中國能否繼續作戰的生命線所在⁵。此外，任何中國派軍往緬甸作戰的前題，絕對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國戰區的安危，因爲中國戰區是決定亞

⁵其實還有可以經過中亞、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經被「盟國」蘇聯所關閉了。

洲反軸心國作戰成敗的關鍵所在——這點羅斯福與丘吉爾其實知道得非常清楚，雖然表面上，由於當時中國軍隊無力在亞洲大陸主動地反攻日軍，而讓一般的評估都貶低了中國在這場歷史大戰的戰略關鍵價值。設想假如中國放棄與日本的對抗，而讓日軍能夠抽調出將近百萬軍隊，執行日軍的戰略作戰計畫，那麼英國根本休想守住印度與中東，美國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軍的抵抗⁶。

所以蔣介石認為，反攻緬甸必須要盟國全力參與，並且要海陸兩面夾擊在緬甸的日軍，以擊潰日本在此地區的部隊，開放東印度洋的航線，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國的命脈。中國一旦得到足夠的支援，就可以成為擊敗日本最為重要的盟國作戰力量。但史達林、丘吉爾與馬歇爾最懼怕的「惡夢」，就是中國得到援助而軍力壯大。他們需要中國在牽制日軍作戰的同時，耗竭一切國力，卻絕對要防止中國壯大的軍力參與對日反攻。

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緬甸的作戰當成事關他「個人榮譽」的戰爭了。史迪威要求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支持他在緬甸進行反攻日軍的作戰，至於是否會因為大量抽調中國戰區的兵力，而造成中國戰區本身的危機，並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假如華軍在中國被日本擊潰、中國戰區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國也就不必擔心反攻緬甸與打通滇緬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國戰區參謀長）？。

對於英國而言，反攻緬甸的戰略安排，最多只限於在緬北的局部作戰，其作用是在於牽制日軍的側背，阻止其順利地向西進攻印度，丘吉爾是絕對沒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歐戰取得決定性戰勝之前，派兵光復亞洲戰場的失地（光復亞洲戰場失地，那自然是美國和中國的任務），當然更不願意打通援助中國的生命線，而讓她得到足夠的援助，這樣華軍就能夠在亞洲戰場上縱橫馳騁，中國在戰後自然擁有真正強國的地位，到時候，英國就很難找到漂亮的藉口來繼續控制香港，連要保有其它亞洲的殖民地也必會有更多的麻煩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從印度休養完畢，毫無愧色地回到重慶，這時華軍退到印度的兩個師，已經成為史迪威「個人」掌控的部隊。史氏向蔣介石提出他反攻緬甸的作戰方案，這個方案規畫中、美、英三國在一九四

⁶魏德邁在其《魏德邁報告！》一書中對中國為盟國勝利而付出的犧牲與關鍵性的貢獻有很中肯的評論。

二年年底，出動陸海空三軍，反攻緬甸。中國由雲南出動二十個師，向緬甸北部出擊；英國出動三師部隊，美國出動一個師部隊，配合中國兩個駐印師由印度向緬甸西部進攻，兩路會師曼德勒，再南下進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觀的西南太平洋總反攻計畫，規畫中美英三國，各自出動陸海空大軍，分成五路，分別進攻緬甸、越南與新幾內亞，然後擊毀日本在菲律賓與台灣的海軍。在華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裝華軍進行全面反攻。

史迪威這兩個近乎天馬行空的作戰計畫，可以說是根本不符合當時戰場的現狀，因為當時美軍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最後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還在未知之數。美軍部隊還在徵召訓練之中，全部力量趕赴歐洲應戰與防守太平洋都還不足。英軍更是自身難保，印度的獨立運動又風起雲湧，英軍那裡有力量出兵作戰。而中國的軍隊亦缺乏優勢火力的武器裝備，以及現代化的訓練，所以要想從中國戰區出動大兵團作戰，實在也有困難。

因此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對於史迪威的反攻緬甸計畫的評語就是「完全不切實際」。美駐華大使館建議，美國應該而且做得到的，是對中國戰區提供作戰飛機，以及空運兵工生產器材、軍火原料與汽油，以維持中國戰區的作戰自衛能力。但是史迪威顯然是把自己的緬甸之戰，當成唯一與優先的戰略佈局，要設法把盟國所有的作戰力量，都優先拿到緬甸來，讓他能在緬甸擊敗日軍。但這樣的構想，那裡能夠得到盟國真正地支持？

果然史迪威的計畫拿到英國駐印度司令官魏菲爾那裡，立刻就遭到被拒絕的命運。英國提出自己的緬甸作戰方案，是由中英兩國的軍隊，進攻緬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後沿著更的宛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復緬甸，英國的這個進攻緬甸的作戰計畫，其目的只在緬甸北形成戰略牽制，以防止日軍發動進攻印度，而與德國在中東會師的計畫而已。

不過在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壓力下（史迪威是馬歇爾用來壓制中國戰區的紅人），英國最後與史迪威達成一個折衷協議，盟國的反攻緬甸計畫，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軍出動七個師由西面進攻緬甸，中國出動大軍由雲南進攻臘戍與曼德勒，另外中國駐印軍則由緬甸北加入作戰，最後盟國的大軍會師仰光。史迪威將這個計畫，回報蔣介石，要求中國方面準備配

蔣介石對於盟國反攻緬甸的計畫，一直給與優先的支持，因為這是中國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國作戰力量復甦的唯一機會。但是蔣介石卻堅持一個

非常重要的前題，就是盟國必須要在緬甸發動全面的攻擊作戰，以優勢的兵力，一舉擊潰在緬甸的日軍。蔣介石認為，假如盟國不能出動海空軍，切斷東印度洋的日軍補給線、掌握緬甸戰場的制空權，那麼中國與盟國的陸軍部隊，絕對沒有能力在緬甸北部的作戰之中，擊敗頑強的日軍，只會徒然對中國有限的作戰能力，造成更為慘重的傷害。

由於史迪威無法取得英國出動海空軍在緬甸作戰的保證，但是英國反過來叫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進攻緬甸北部，以牽制日軍對印度的威脅。這時史迪威急於復仇，因此任何在緬甸與日軍作戰的行動，他都熱心支持。而此時日軍已經加強在緬甸的軍力，設立了緬甸方面軍，軍力擴充為三個軍。日軍特別在緬北與雲南西南部，地形複雜的地帶，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與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堅固的防禦陣地，企圖長期駐守，以切斷中國對外的交通，並威脅與擾亂駝峰航線的運補能力。

30.9 丘吉爾決心出賣中國

由於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緬甸計畫，有著極大的紛歧，因此蔣介石直接要求羅斯福出面統合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⁷。羅斯福認為蔣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決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與丘吉爾在北非法屬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加（簡稱卡港）會面時，再制定盟國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

會中美國太平洋海軍作戰計劃首長金恩（Ernest J. King）上將指出，美國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與亞洲戰區所需的軍力，尤其必須挪出更多的資源給蔣介石的中國部隊，以防止中國抗日力量的崩潰，反攻緬甸的目的正是爲了要加強提供中國援助物資輸送路線的保障，事關中國戰區作戰能力之維繫，中國獲得足夠與必要的支持，華軍才能牽制與打擊日軍，這樣盟國才可以從容地在歐洲進行對德作戰因此英、美必須確定投入反攻緬甸作戰，更要提供海空軍的強力支援。

狡猾的丘吉爾對這個看法並無反對的表示，同意英國會考慮提供海軍攻擊東印度洋的安德曼島；不過，盟國的當務之急是必須延伸盟軍在北非的戰果，把握德國非洲兵團敗北的戰況，乘勝追擊，所以目前的優先戰略是繼續

⁷此後中國戰區的問題，每次都要驚動羅斯福本人，由他親自下令加以處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決。由於中國戰區的統帥與參謀長一再地不和與衝突，更讓羅斯福覺得，中國戰區是一個麻煩最大，貢獻最小的戰區。

在地中海區作戰，等地中海航線的安全確保之後，英軍就可以方便經由蘇伊士運河調兵進入印度洋作戰。丘吉爾及英軍高層代表當然不斷提醒美國，不要忘了盟國對「歐洲第一」（“Europe First”）的共識。於是，反攻緬甸的日期調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緬甸的雨季之後）

卡港會議竟然沒有邀請中國的代表參加，就討論與中國命運關係最大的議案——反攻緬甸計畫。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丘吉爾與馬歇爾陰謀忽略中國戰區的心態了⁸。卡港會議所決定盟國反攻緬甸的戰略，實際上是一種對付中國的戰略。因為這純粹是紙上談兵，而無實際幫助的煙幕彈而已，目的在欺瞞羅斯福的判斷，以及吊住中國戰區的希望而已。因為整個反攻戰略決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國擔任，中國卻連參加開會的代表都沒有。同時當時中國急需的，是盟國實質作戰資源的援助，特別是空軍飛機與作戰物資的運送，但是在盟國的援助的優先順序之中，中國戰區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後考慮，這個安排不變，中國就沒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戰能力與士氣，只靠盟國會全力反攻緬甸的空頭支票，來繼續苦撐下去。

卡港會議之後，美國的陸軍航空隊司令（Chief of Army Air Force）安諾德（Henry Arnold）與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特別前往重慶，報告盟國的反攻緬甸計畫，在路經印度之時，與魏菲爾、史迪威先見面，討論反攻緬甸的作戰大綱，大家會商決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國對緬甸採三面夾攻，華軍主力由雲南攻臘戍，英軍由印度進入緬北，中國駐印軍由雷多出兵；盟軍則提供空軍支援，海軍攻佔安得曼島後，封鎖東印度洋，最後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軍登陸仰光。反攻緬甸完成之後，大量的盟國援助與軍事裝備就可到達中國，華軍就可以主動反攻在中國戰區的日軍。假如這個計畫得以實現，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歷史，勢將完全改寫。

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諾德向蔣介石報告這種最新的反攻緬甸計畫。蔣介石當然對反攻的時間感到失望，中國還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時蔣介石已經發現，假如要叫中國的部隊擔任反攻的主力，美國就要能夠設法提供更多的戰機，以支持中國部隊的作戰，防止日軍在中國戰區的牽制攻擊，同時駝峰空運噸位應增加到每月一萬噸，以供應中國陸軍組成遠征所需的裝

⁸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國的立場，但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卻非常樂意配合丘吉爾來暗中打擊中國，從馬歇爾重用史迪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即可見馬氏對中國的成見與陰謀了。在二次大戰期間，馬歇爾的權力可以說到達權傾一時的地步。

備。但是負責駝峰空運的美軍駐印空軍第十航空隊指揮官畢賽爾⁹（Clayton Bissell）卻表示，假如每月空運五千噸的物資，就需要機場二十五處，以及三百架運輸機，因此除非大量興建機場與增加飛機數量，美國無法提高駝峰運送的噸位。（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大謊言，因為在陳納德接手之後，僅以十五處的機場，一百二十架的飛機，每個月就可以運輸一萬噸的物資。）

中國當然對於卡港會議的結論，仍有很深的期望，專程派出宋子文、何應欽到印度的加爾各答，與美英的軍事將領，包括安諾德、史迪威與英方的魏菲爾、狄爾（John Dill）等人，進行作戰計畫的細節磋商，以便得到更為清楚與具體的作戰計畫。在加爾各答的會議中，中美英的軍事將領，對於如何以水陸合擊的方式，全面反攻緬甸，以為中國戰區打開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戰計畫的共識。所以一時之間，全面反攻緬甸以打開援助中國的戰爭規畫，似乎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地步，中國開始抽調部隊，準備進行這場重要的決戰。

但這原來是英美將領的緩兵之計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撫中國，使她繼續堅定地抗日，以牽制日軍、減輕日本對美英的壓力。英美的軍事領袖，隨後已經開始「逐漸」縮減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改為依照英國原來的方案：只以陸軍作戰為主，反攻地區限於緬甸北部，目的只在牽制日軍進攻印度的戰略側翼。這種作戰目標的變化，當然令蔣介石覺得中國遭到出賣，何況美國所答應的空運援助，數量上一再地被縮減，中國方面作戰力量受到嚴重削弱。

由於史迪威與陳納德在中國戰區經常發生水火不相容的重大爭議，讓羅斯福覺得，有必要召見他們當面談清楚問題的真相，及順便要他們參加英、美軍事領袖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舉行的「三叉會議」（Trident Conference），會中準備對於進攻緬甸的軍事方案，進行全面的檢討。

30.10 史迪威的窩裡反

由於蔣介石已經感到事態不妙，因此先後特別派宋子文與宋美齡前往華盛頓，對美國進行遊說，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參加美國的參謀首長會議（這是中國唯一的一次機會），為中國反攻緬甸的立場

⁹畢賽爾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軍顧問），負責全力壓制陳納德。

辯解。宋子文表示，中國抗日已經到了精疲力竭的階段，目前急需盟國有力的支援，中國所需的五百架戰機與每月五千噸的空運物資，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國每年可以生產一萬八千架戰機，每月的作戰物資高達四百萬噸，中國的要求實在少得可憐）但是仍然遲遲沒有得到，而反攻緬甸，事關中國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脈，而由中國擔負更多對日的作戰責任。反攻緬甸是盟國在卡港以及加爾各答會議的具體結論，盟國實在不能再對中國失信。

但是在三叉會議之中，「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開始公開唱反調，猛烈地批評蔣介石指揮的中國部隊「毫無作戰意願」，因此擴大援助中國並無必要；蔣介石只會把援助加以屯積，做為打中國內戰的本錢。有這樣一個窩裡反，專門提供相反情報與立場的戰區參謀長，當然是令與會人員「大開眼界」，於是支持中國者的立場，也就更為紛歧。英國代表是大嘆苦水，表示英國缺乏兩棲登陸艦艇，在緬甸作戰的當地部隊又未必肯用心參戰，何況全力先擊敗德國是盟國的優先共識，因此很難將作戰資源分配給反攻緬甸的作戰，目前英國的立場是，不是不反攻緬甸，而是減縮反攻的範圍。

這時史迪威又提出一個表面上有助於援助中國的計畫，他要在印度、緬甸北部無人地帶的崇山峻嶺，修築一條雷多公路，連接雲南與印度的雷多，這樣盟軍可以利用這條公路援助中國，不必要英國出兵從印度洋攻克仰光。這個說法乍聽下覺得不錯，事實上卻完全低估了當地高山縱谷近乎無法通行的複雜地形，以及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國不但缺少運輸的車隊與汽油，而就算是能夠排除萬難成功修成這條路，其最大的運輸量，也不過只能每月五千噸而已，而要養護這條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過所有的運輸效益。結果史迪威把美國援助中國極其有限的資金，拿去修築一條毫無實用價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誤了發展空運與援助中國的機會。

對於這些爭論，羅斯福最為關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爾的意見減縮緬甸作戰的規模，那麼盟國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後，美國才能開始大量援助中國，他不知道這樣遲遲讓中國得不到援助，中國是否能夠撐得下去。所以羅斯福主動決定，先設法增加駝峰的空運，達到每月一萬噸，以及提供中國戰區所需的五百戰機，希望能夠讓中國戰區能夠維持下去，至於全面反攻緬甸，羅斯福仍然保留實施的意圖。當然羅斯福的決定，到了馬歇爾的手中，又以執行困難的理由，七折八扣的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強達到羅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國的戰力，幾乎已經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狀態了。

（在當時有哪一個戰區能夠靠每月才幾千噸的物資支撐下去的？）

三叉會議在丘吉爾與史迪威的裡應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國最後無法達成全面反攻緬甸的戰略協議，所以卡港會議中關於反攻緬甸的結論，就等於作廢了。中國只爭取到美國增加空運噸位與空軍戰機的數量（都只是維持中國作戰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雖然羅斯福原先的亞洲戰略構想，一直是希望設法大量武裝華軍，由中國進行反擊日軍、最後切斷日軍在亞洲大陸的戰略佈署。所以羅斯福考慮動員美軍進入印度洋，以攻佔緬甸，打開援助中國的通路。但是這時退到澳洲的麥克阿瑟將軍，卻急著要為其菲律賓作戰的慘敗復仇，因此強力要求參謀首長會議，優先將美軍調往南太平洋，以對日軍進行反攻作戰。因此對於美軍準備進駐印度洋的緬甸作戰，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

盟國遲遲不能決定打通滇緬路的這種局勢，對於戰力即將枯竭的中國戰區極其不利，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開羅會議中，為優先反攻緬甸的戰略，進行全力的爭取。雖然丘吉爾用盡一切的手段阻撓，但是蔣介石仍然成功地爭取到羅斯福的支持。盟國開羅會議的正式結論是，決定採用中國建議之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但是丘吉爾很快地又在接下來的德黑蘭會議中，得到史達林的支持，將羅斯福說服，放棄了支持蔣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緬甸計畫，改由蘇聯答應出兵攻擊日軍（當然軍火、裝備是美援供應）。中國終於在丘吉爾的運作、馬歇爾與史迪威的聯手、史達林求之不得的情況之下，被盟國出賣了，反攻緬甸的戰略計畫換成了蘇聯對中國百姓與領土最為粗暴的蹂躪與侵略。而無論是史達林、丘吉爾、馬歇爾或史迪威，不論通俗歷史怎麼為他們掩飾或狡辯，在最後都無法塗改他們對中國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還有良知與正義，不論其種族、國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無法否認他們對中國不義的陰謀與殘忍的手段，在程度上遠超過猛獸與洪水¹⁰。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指出由於盟國準備在歐洲發動全面攻擊，英國無法調派海空軍到印度洋作戰，因此建議將開羅會議所決議之全面反攻緬甸的計畫延後。這個事後「毀約」的通知，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造成了無可彌補的戰略打擊，中國被迫在極少量作戰資源的支持下，

¹⁰盟國出賣中國的最大保障，卻竟然是中國軍民不屈不撓的抗日決心、說到就作到的無畏犧牲，以及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盡全力配合盟國一切戰略決定。

苦撐到底。此時蔣介石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個出爾反爾的決定。由於日軍此時已開始在中國戰區大量集結部隊，蔣介石預測到日軍很可能會大舉發動新的攻勢，中國的戰局必定會更為吃緊，因此他把在雲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國遠征軍，當成未來這場決戰中決定勝負的戰略預備隊。

30.11 致命錯誤的反攻作戰

不料此時，突然發生一個離奇的「陰謀」，造成了羅斯福與蔣介石出現近乎全面決裂的危機。由於當時英國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統治，已經面臨甘地（Gandhi）領導之不合作運動的挑戰。所以英國在東南亞最高統帥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特別擔心，如果日軍對印度發動攻勢，由於英國的主力部隊都在歐洲戰場，根本不可能同時掌控印度與抵抗日軍的進攻，那麼英國必然在印度遭到慘敗的命運。

但蒙巴頓知道史迪威的「復仇心切」，如今盟國中止了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史迪威必定受挫極深，因此蒙巴頓想利用史迪威來指揮華軍，在緬北發動攻擊，以發揮牽制作用，減輕日軍進攻印度的壓力。雖然這個調動中國軍力的方案，不但會影響到中國戰區的安危，更沒有得到盟國戰略會議的批准，但是蒙巴頓與史迪威決定，自己獨斷實施作戰，再拉中國下水（幾乎和關東軍九一八當年的行動一個樣，自己先幹，再拖統帥部追認）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蔣介石任命史迪威為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官，直接指揮在印度接受訓練與美國裝備的華軍新二十二師（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開始在胡康河谷進行佈防，以掩護修築雷多公路。這時蒙巴頓要求史迪威率領中國駐印軍，與英軍配合，在緬甸北部逕自發動攻勢。事實上，蒙巴頓的這個作戰計畫，並未呈交盟國統帥部進行討論，更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復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應蒙巴頓的要求，同時回報馬歇爾。要求馬歇爾設法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要中國抽調在雲南集結的遠征軍，也進入緬甸作戰。

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這支得到盟國（美國）援助的遠征軍，原本是從中國各個戰區之中，抽調精銳所組成的「戰略預備隊」。蔣介石認為，除非盟國齊心協力發動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他是不能冒險動用這支部隊的。因為蔣介石能夠堵住日軍在中國的主要攻勢，就全靠這支王牌部隊了。既然羅

斯福建議中國，延緩進攻緬甸，蔣介石也就放心讓這支部隊保持戰略機動。所以當史迪威轉來蒙巴頓要局部反攻緬北部的作戰計畫時，蔣介石當然加以否決！但是此事件卻突然遭到羅斯福總統的親自介入（當然是馬歇爾、史迪威的功勞），堅持要蔣介石調派中國的遠征軍，執行蒙巴頓自己的作戰計畫。

羅斯福的急電與馬歇爾的催促，把蔣介石打入五里霧中，因為蒙巴頓的緬北局部作戰方案，根本沒有得到盟軍的批准，怎麼會變成中國必須派出大軍支援的戰略規畫呢¹¹？當然蔣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緬甸，但他知道，中國戰區的狀況，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後掙扎之階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個中國的遠征軍，是蔣在中國戰區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戰略預備隊。蔣介石已預期日軍在中國戰區，將會發動一次孤注一擲的攻擊，以徹底解決對華作戰的僵局，所以蔣介石不願將這支可以決定中國戰區勝敗安危的戰略預備隊，投在沒有決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緬北作戰上。

假如盟國要海陸聯手全面反攻緬甸，中國爲了打通對外交通的生命線，與基於盟國責任，當然願意冒險搏命一試；但是假如盟國只是爲了減少印度承受日軍「可能」攻擊的壓力，就要中國不顧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戰，實在是逾越常理。當時中國處在日軍即將發動決戰攻勢的壓力之下，當然就無法答應出兵。

最奇怪的是，羅斯福與馬歇爾竟然親自將這個蒙巴頓擅自作主的作戰計畫，當成盟國已經達成共識的聯合戰略行動來處理，美國一再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叫中國必須立刻動用遠征軍參戰，完全不理會蔣介石的申辯。羅斯福每天看著緬甸的作戰地圖，聽幕僚憤怒地批評蔣介石拿了美援、卻「擁兵不戰」。羅斯福已經分不清事實的來龍去脈，也開始認爲既然蔣介石曾經如此熱衷地爭取反攻緬甸，如今爲何又不願支持英軍的計畫¹²？此時史迪威與馬歇爾更不斷地醜化蔣介石，指出中國軍隊「拿了美國的裝備」，竟然不願出力在緬北與日軍作戰，顯然是另有圖謀！所以羅斯福、馬歇爾與史迪威，對蔣介石輪番施加壓力，要求蔣介石下令出兵。羅斯福似乎忘記了華軍主要的

¹¹ 蔣介石全面反攻緬甸作戰計畫，原是在開羅會議中，得到盟國正式的批准，最後竟然就被一紙電報所取消了。盟國對中國的態度簡直不可理喻——這個沒有被批准的作戰計畫必須加以執行，而經過規畫與批准的作戰計畫卻被取消。

¹² 這兩個計劃事實上差別太大，但羅斯福已被馬歇爾完全攪昏了，忘記了其實是他自己失信於蔣介石與中國。

作戰目標，是在中國戰區，而不是緬甸戰區¹³。也忘記了中國戰區正在面臨與日軍攤牌的最後決戰。美國到後來竟然採取威脅中斷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蔣介石屈服。

日軍爲了結束中國戰區的戰事，大本營決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亞洲大陸發動最後決戰的攻勢：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與在緬甸發動對印度的攻擊（目的是徹底搗毀在印度的援華運輸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上將）出動三個師團，在十五軍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揮下發動了進攻印度戰略要地英發爾（Imphal）的攻勢，蒙巴頓當然是手忙腳亂的調軍應戰，同時毫不客氣地就把美國援助中國的裝備，就地扣留使用，並且更急著要求中國軍隊出戰，以牽制日軍。英發爾之戰是英國在亞洲地區打得最爲漂亮的一場血戰，也是在亞洲大陸動用盟國最多支援的一場作戰。日軍僅以三個師團攻擊（兵力比在中國戰區的一場會戰使用五到七個師團，少得太多），就讓英軍幾乎崩潰。

蔣介石考慮到日軍在中國戰區的集結，不敢將遠征軍輕易調出，因此提議空運更多的中國部隊到印度，協助英軍防衛日軍的攻擊。中國駐印軍，從兩個師，擴大爲兩個軍，即是新一軍（孫立人部）和新六軍（廖耀湘部）。其實只要這支華軍部隊參與協助英國防守英發爾，盟軍是可以有擊敗日軍的餘力的。中國軍隊由雲南出擊，沿途地形險阻、天然障礙太多、距離又遠，在作戰上實在是緩不濟急的。

30.12 得不償失的勝利

在緬北的原始森林與崇山峻嶺作戰，實在是一個特別的困難的冒險，「人與天爭」甚至比「人與人爭」還要可怕。日軍在地形與自然環境極其複雜的胡康河谷據險佈防，這個地區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帶」，大軍的運動極其困難。所以史迪威指揮中國駐印軍在這個地區作戰，純粹是一場放著當務之急不幹（迎擊日在中國本土的攻勢），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戰力的運動。中國駐印軍都是從華軍之中挑選過的精銳，又得到美國的裝備，因此作戰能力極強——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蠻荒地區作戰，實在是一種可怕的浪

¹³如果丟掉了中國戰區，盟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幾乎是無立足之地，美軍至少要加好幾倍的軍力才有可能反攻，盟軍有沒有控制緬甸都變成毫無意義的問題了。

費。可是史迪威卻急於復仇¹⁴，竟然全力在這個地區督戰，單論其個人的勇氣與毅力，固然值得欽佩，但整個中國戰區正面臨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刻：日軍正開始對中國發動決定勝負的一號作戰計畫，中國戰區卻將最爲優秀的部隊，放在最爲艱苦的地區，進行不必要的耗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國駐印軍一方面開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與環境的困難，與據險作戰的日軍進行艱困的正面遭遇戰，另一方面爲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軍事障礙。雖然中國駐印軍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進展，但是速度非常遲緩，特別是熱帶的雨季，使得軍隊的運動與作戰，在原本就複雜艱險的山地叢林中變得難上加難，大自然的力量對造成了軍隊無法想像的負擔。中國的精銳部隊，就這樣被強迫進行無謂的浪費，而留下員額、裝備均不足的華軍，在中國戰區遭到日軍一號作戰計畫的全面攻擊。

雖然中國駐印軍已經投入緬北的局部反攻作戰，但是馬歇爾仍然不肯放鬆對中國的壓力。在羅斯福五度施壓與馬歇爾三次威脅之下，最後馬歇爾由「自己」給蔣介石最後通牒，假如中國再不出兵緬甸，美國將中止對中國的援助。在這種壓力之下，蔣介石最後只有被迫同意，將美援改裝的六個中國軍，組成第十一與二十集團軍，由衛立煌指揮，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過怒江，從東北部攻入緬甸，進攻緬甸北部的日軍據點，以期與中國駐印軍會師。此時正是日軍在中國戰區發動規模空前的一號作戰計畫，對河南進行全面攻勢的時刻，但華軍的戰略預備隊，不能優先防衛自己的國家，卻必須參加蒙巴頓與史迪威的「私人」作戰，在無法迅速取得勝利的次要戰場上打一場無關大局的惡仗。結果當然是史迪威所指揮的緬北戰場一再傳出捷報，但是中國的主戰場，卻一再出現全面崩潰的戰況。這樣史迪威成爲對日作戰的「勝利英雄」，蔣介石成爲失利的敗軍之將。

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親自」組織一支叢林遠征突擊隊，在胡康河谷人跡罕見的熱帶叢林中，長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現在緬北重鎮密支那的外圍，一舉攻佔了密支那機場，當然這個突擊作戰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個人的英雄傳奇故事的另一章¹⁵。

但是，佔領密支那機場的史迪威英雄突擊部隊，接下來不但無法真正攻

¹⁴ 其實難道中國軍隊就不想報仇嗎？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乃關係千千萬萬生靈安危，以及正義自由對抗強權暴力的殊死拼鬥，豈有置個人的特殊境遇需要於全盤計畫之上的道理？

¹⁵ 難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個「最優秀的四星上將步兵營營長」（“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雖然有些刻薄，不過倒很傳神。

克密支那市區，反而受到日軍四面的包圍；盟國爲了支援史迪威這個傳奇英雄，造成盟軍在緬甸地區整個作戰規畫的全盤大亂，迫使蒙巴頓必須抽調與動員一切的軍力與後勤（包括屬於援助中國戰區的後勤資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擊密支那機場的「夢幻隊伍」突然變成惡夢裡的一群落湯雞。

在密支那外圍的盟國部隊雖擁有幾倍於日本守軍的優勢兵力與火力，卻由於史迪威差勁的指揮能力，無法順利的攻下密支那。當然這裡必須承認，日本的三十三軍（本多政材）與五十六師團（松山佑三），無論是指揮官在內線作戰上的優異指揮能力，以及日本守軍血戰至死都不輕易退卻的精神，更讓史迪威無法順利的攻下密支那。

而爲了攻克密支那這個據點，史迪威總共耗盡四萬噸的軍援物資（足夠全中國戰區四個月的使用數量），先後撤換了四名不同國籍的戰場指揮官，前後鏖戰接近三個月，仍然無法攻下密支那。最後還是等到中國軍隊打通胡康河谷之後，在密支那會師，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國部隊負責，攻克了密支那市，日軍五十六師團旗下的五六旅團長水上源藏少將自殺。史迪威當然成爲打敗日軍的傳奇英雄。其實整個緬甸乃至中國的戰局，都因爲密支那突擊戰所惹出來的問題，而產生了極嚴重與不利的影響，而最後還是要靠中國軍隊才攻下了密支那。

這時候，正是中國戰區的衡陽會戰進行到最後的關鍵時刻，但是蔣介石手邊已經調不出任何精銳的戰略預備隊與生力軍去解衡陽之圍，同時史迪威也將美國對中國的一點點補給，全數浪費在緬甸戰場。因此日軍終於攻克衡陽。中國戰區在衡陽會戰失敗之後，整個戰力與士氣受到最慘重的打擊，中國抗日的力量幾乎可以說是接近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這時在怒江河谷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共有六個軍，由衛立煌指揮，分成十一集團軍（宋希濂）與第二十集團軍（霍揆彰）。遠征軍發揮了優勢裝備與訓練的作戰能力，沿著怒江河谷，交叉掩護，逐一攻克日軍所控制的險峻據點。但是由於當地地形的特別困難，都是崇山峻嶺、懸崖密林與無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軍隊都無法在這個地區，得到迅速與重大的戰果。當然日本的守軍（第二、十八、與五六等三個師團），深知在這個地區的防守作戰，事關控制中國對外通路的關鍵所在，日軍上下可以說是發揮最高的決死抵抗之決心，不戰到最後一刻，絕對不停止反抗。所以中國軍隊兩個裝備最爲充足的集團軍，在怒江河谷戰場雖然發揮極其優異的攻勢作戰能力，但是

仍然受制於地形與日軍戰到最後一刻的決心，必須不斷地消耗人力與時間，逐一殲滅頑敵，結果中國的遠征軍足足花了八個月的時間，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終於的打通怒江河谷，與駐印的中國部隊，於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會師。同時雷多公路（蔣介石將它定名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這時日軍在緬甸的戰力，才趨於瓦解，但是中國戰區，卻因為不當的軍力抽調與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軍全面的蹂躪。

雖然說中國部隊緬北作戰，攻克日軍的障地，是有助於空運的加強與陸運的聯繫，但是若是與中國戰區的全面慘敗相比，實在是一個完全得不償失的選擇，特別是所謂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個成本與效益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作戰，從雷多到雲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費了一億四千萬美元，與四萬三千中國民工修建，但是這一段公路，經過了人類不適生存的蠻荒地區，地形之險峻複雜，以及氣候、環境對於正常運輸的影響，困難簡直是難以想像，其維護費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無法發揮運輸的功能。車隊單程行駛的時間是十二天，運輸數量實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狀況下，平均每月的公路運輸量只有五千噸而已；在雨季時間，整條公路則近乎完全停擺。但是同時間的空運每月已經高達五萬噸，所以這條公路的宣傳效益遠遠大於實際作用，假如建築費用可以用來增購飛機與空運設備，盟國早就可以解決援助中國戰力不足的重大問題了。

第二次滇緬作戰，可以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消耗與得不償失的作戰，事實上是中國戰區遭到出賣的策略。盟國先在反攻緬甸的作戰上，一再地失信於中國，其實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協助中國，進行全面反攻緬甸之戰、打通援助中國的公路。盟國雖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難，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國不允許中國提早打開通路而拿到足夠的援助，否則中國會建立強大的戰力，英國就沒有機會恢復其殖民大國的「偉大計劃」了。

盟國的軍政領袖，竟然在中國戰區面臨最為危急的時刻，還要強迫中國將最精銳的部隊，不顧中國戰區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緬北的原始叢林之戰，實在是對中國人最殘忍的壓迫手段——好像在亞洲大陸的作戰，只有白種人參戰的緬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戰場，至於是否會牽動中國戰區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國考慮的範圍之內。

馬歇爾一直拿著一點還沒送出手的盟國援助作為恐嚇的工具，一再威脅中國必須出兵緬甸，中國戰區兵力被抽一空，最後面臨近乎全面崩潰的危

機。當時整個中國，北起河南，南到貴州，全面遭到日軍的蹂躪，河山殘破，人民九死流離，中國人的血淚染紅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國在戰場上的失利，也導至元氣盡失的中國在雅爾達密約中，遭到英、蘇、美聯手的出賣，而這些歷史的悲劇，全只爲了滿足史迪威在緬甸原始森林的一點小小的勝利。這就是滇緬之戰對於整個中國在抗日戰爭後期，遭到日軍空前之蹂躪與挫敗，以及受到盟國聯手出賣的真正「貢獻」。

打通滇緬的國際通路，固然是事關中國能否得到抗日戰爭資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蘇聯這個盟國能夠對中國「網開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許中國的西北通路運作，情況就會大大的不同了，事實上，當時蘇聯早已無對日本安全與戰略的顧慮，更應負起盟國的基本責任，蘇聯無需自己援助中國，只需要允許美援路過蘇聯而已，這種蘇聯斷絕援助中國通路，欲陷中國於死地的立場與做法，還配成爲反法西斯的盟國嗎？假如西北通路能夠正常運作，中國與盟國根本就不會發生由滇緬作戰引發的眾多問題與危機，中國早就能夠獲得援助、武裝而壯大。

只要中國軍隊得到足夠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國戰場之中，扮演主動反攻日軍的角色，及早收復華南沿海，迫使日軍遭到更重大損失。這樣也許美國根本無需對日本投擲原子彈，更不要雇用蘇聯當「傭兵」來劫掠亞洲，就可以結束亞洲的戰事了。一個有實力與軍力的中國，更不會被迫放棄外蒙古的領土，甚至可以對琉球等戰略要地，做出更爲有利的歷史選擇。中國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爲被世界尊重的大國，她也會給予亞洲各新興國家適當的幫助¹⁶，不但華夏兒女無需遭到如此眾多的苦難，亞洲與人類的二十世紀歷史，也勢將全面地改寫。

¹⁶請參看第三十三章開羅會議中有關中國對戰後亞洲民族國家奠定了發展方向的貢獻。

中國戰區與史迪威事件

中國抗日戰爭的光榮勝利，最後會演變成爲一個悲劇，「史迪威事件」具有歷史性的關鍵影響。日皇裕仁實在應該頒發一枚「大和」獎章給史迪威，表彰他在中國戰區進行的全面分化，使得日軍能在最後的決戰中，展現銳不可當的攻勢。而沒有能夠及時撤換史迪威，更是成爲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一個最爲嚴重的錯誤決定。

在同盟國與中國並肩抗日的戰爭歷史中，也許最大的錯誤，就是成立中國戰區，並由美軍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出任第一任戰區參謀長。基本上，中國戰區一直無法參與盟國決定戰略的重要會議，也被拒在制定後勤分配優先順序的軍火分配委員會（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門外；更加上史迪威與蔣介石完全的對立與衝突，不但在中國戰區內部形成嚴重的將帥失和、引爆中國內部派系的鬥爭，甚至使得中國與盟國之間的關係，進入了全面交惡的困境。

在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中國戰區所有的作戰需要，在盟國歐洲優先的決策之下（受英國強烈的影響），總是被排在最後，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待遇¹，連答應給中國的援助，還都要被七折八扣地減量供應；中國戰區

¹中國雖然得到的幫助最少，但是她的軍民卻以最大犧牲，使得盟國在亞洲、太平洋戰場贏

同時還要應付來自盟國「歧視性意見」的重大壓力、各種挑撥離間的分化手法，鬧得戰區的內鬥愈趨激烈，中國反而失去了原來一致團結抗日的決心與共識，因此戰力大受影響。特別是在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與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製造出「中國戰區麻煩最多，貢獻最少」的刻板與錯誤的印象。最後，這個「麻煩多、貢獻少」的中國，也就成爲被盟國聯手犧牲與出賣的對象，造成中國至今還要爲這個歷史的扭曲付上代價。爲了要隱瞞與掩蓋盟國出賣中國的劣跡惡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認知」與一般先入爲主的通俗歷史觀裡，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貢獻，仍被有意地扭曲與淡化。

而這個歷史悲劇的核心，都與史迪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然在史迪威的背後，藏著史達林、馬歇爾、丘吉爾，與他們想支配歷史局勢的大謀略。但是假如當時盟國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不是史迪威，而是陳納德或魏德邁，那麼中日戰爭的歷史絕對會出現極大的改觀，中國在戰後也絕對不會遭到如此嚴重的歷史傷害。

31.1 日軍在太平洋橫掃美、英、荷的部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基地，美國於是對日宣戰，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終於凝成一個世界性的盟國結構。對於中國而言，這才正式結束了對日本長達四年半的孤軍奮戰。等待國際社會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死裡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所期待之決定性時刻的來臨。

但是誰也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國陣營，仍然不能擺脫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本色，不但在所謂並肩作戰的期間，強權玩盡各種犧牲中國，成全自己的手法，對於戰後的國際發展，更是完全基於強權的私利的盤算，盟國甚至決定出賣在整個戰爭中，付出最大、獲得支援最少的中國。

在日本剛開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國在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殖民地與得勝利，這個貢獻和中國得到的幫助完全不成比例。從另一邊來看，英國與蘇聯所得到美國大量的援助，實際上遠超過維持戰力之所需，所以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並不是因爲「不夠分」的結果，而是英、蘇有計劃地要用機會在背後壓制與打擊中國，以防止中國在戰後興起。這個觀點也可以從《魏德邁報告！》書中看到。由於魏氏對二次大戰時美國總體戰略資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視。

軍事基地時，這些國家全無招架之力，以致於接連慘敗。日本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攻克了東南亞與西太平洋所有的戰略目標，造成西方盟國內部的震動。

這時西方盟國才深刻了解到，日軍作戰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響。而國力落後的中國，竟然能夠獨力抗日四年半的表現，實在是戰爭史上的奇蹟。當時盟國最爲擔心的就是，如果中國真因爲國力完全地耗竭，而停止對日本作戰，那麼整個亞太戰區就會完全改觀。德、日兩軸心國一旦在中東會師成功，控制了豐富的能源與天然資源，盟國所面臨的戰爭危機將是不敢想像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軍在攻佔南洋與西太平洋的目標之後，想要進一步爲軸心國取得全面的勝利，所以日軍大本營擬定了規模更大的戰略，企圖將日軍兵分三路：一路向東突進，準備攻佔中途島、進窺夏威夷，將美軍的力量阻在東太平洋；另一路準備朝向東南，攻佔澳洲，以穩固日軍對東南亞戰略資源地區的控制；第三路則是向西方攻入緬甸，策動印度來反抗英國，這樣同時可以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國際通路，迫使中國屈服或是求和，然後日軍就可以深入中東石油產地與德國會師。

可是日本若要執行這大戰略，最大的問題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經超過了日本國力與軍力所能負擔的極限。因爲在一九四二年，日軍的陸軍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個師團，擴增到五十八個師團，兵力雖然擴張了三倍以上，但是日本仍然連最初的「中國事變」都無法解決。一半以上的日軍都陷在中國戰場之中，這便是日軍無法有足夠的兵力，進行其全面戰略的主要原因。

由於中國不計犧牲地抗日到底，使得日軍無法結束中國事變，造成了日本作戰資源逐漸面臨枯竭（主要是石油與鐵），因而促使日本鋌而走險、發動太平洋戰爭。這原來是日本一個高戰略風險的選擇，如今日軍既然在西太平洋獲得了空前的勝利，日本應該能夠利用盟國無力集結反攻的空檔，全力解決中國問題，而不再盲目地擴大戰線，以致超過日本國力的負擔。但是當時日本的上下已經被輕易而得的太平洋戰爭勝利所膨脹了；事實上，日本軍部已經發現，打中國所耗費的力量，遠遠超過了擊敗西方國家所需的總和。於是日本政府在民氣可用的狂熱之中，採用了好高騖遠的戰略計劃，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熱的支持，因此日本繼續延伸南方的戰線，而逐漸超過了其國力

能負擔的限度。

31.2 西方為挽救亞洲戰局而成立中國戰區

日本一直希望能夠設法結束中國事變，以便抽出三十個師團（總兵力八十萬）以上的部隊，來執行軸心國的全面致勝戰略，但這正是西方盟國所不敢想像的夢魘。因此支持中國繼續抗戰，是盟國唯一能夠阻止日軍席捲攻勢的王牌。所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電蔣介石，在重慶立刻召開盟國的亞洲大陸戰略會議，設法擬訂共同作戰的計劃。雖然當時盟國在東亞的戰局，已經出現一面倒的慘敗，自顧不暇，並無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與反擊的戰略，但是這個會議的舉行，已經證明中國在亞洲反法西斯戰略中的關鍵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國的羅斯福建議，盟國應成立聯合作戰的戰區，以統籌盟國作戰的力量與策略，但是史達林非常技巧地婉拒，因為蘇聯只要西方國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國的干預。而蔣介石則是非常坦蕩地接受羅斯福的建議，成立中國戰區，下轄中國、與中南半島及泰國的對日作戰，蔣介石並建議由美國派遣將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以便利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

但是蔣介石萬萬也沒有想到，馬歇爾巧妙利用這個參謀長的人選，執行他一心打擊、壓制中國的策略，從此中國戰區的人事安排與戰略擬定所造成的風風雨雨，竟然成為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大危機的根源。一個充滿明爭暗鬥，無法團結禦敵的中國戰區統帥部，嚴重地削弱了中國抗日的力量，更是讓中國在最後關頭，差點輸掉抗日戰爭，與亡國的命運幾乎是擦身而過。中國戰區的問題，最終更成了中國被盟國出賣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國戰區無望論

綜觀自從盟軍成立中國戰區之後的歷史資料，中國戰區所面對最為危險的敵人，並非是正面戰線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也不是側背戰線的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而是美國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以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在中國戰區成立之後的三年六個月艱苦作戰中，馬歇

爾自始至終都是設法壓制中國戰區作戰戰力的頭號大敵，而史迪威則是誤導中國戰區作戰資源運作的最佳執行者²。

所有的史料都明顯地指出，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馬歇爾幾乎從來沒有把中國戰區真實的情報與狀況，告訴羅斯福總統。馬歇爾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報告，做為中國戰區戰略決策的情報依據。而史迪威的報告，多半是引述日軍的戰報、「東京玫瑰」的廣播內容、蘇聯與共黨國際組織的宣傳，攙進史迪威個人主觀的「辱華」成見，加以調整潤色而作成（甚至經常與眼前的戰況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報告，全是堅持蔣介石既不肯、又不敢作戰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評估，中國戰區隨時都會崩潰；假如中國戰區的存在還有一點意義的話，就是中國所剩的作戰力量，都要幫英國守住印度，以及為史迪威完成反攻緬甸的任務。這種睜眼睛說的報告是根本不能反應中國一直苦戰待援的實情。

假如中國抗日歷史的真相，真如馬歇爾的中國戰區情報所說的，是進行「假戰」，日本皇軍既然能在中國戰區，如入無人之地，能讓蔣介石部隊望風潰散，為什麼日軍不能迅速打垮蔣介石，而結束中國事變，以抽出八十萬的日軍，與盟國進行決戰？日本小磯國昭內閣為什麼還要千方百計地與蔣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種「退讓」的和談條件，希望能夠優先解決中國事變？原因就是日本無法在戰場上，解決中國事變，因為中國縱使在山窮水盡之時，仍然拼命抵抗日軍。

所有史迪威提供給馬歇爾的中國戰區戰報，只有一個內容格式，就是中國與日軍沒有打，「假如有」的話，也是共產黨的部隊在打。更為離奇的是，當美國與國際的新聞記者前往重要的中、日會戰地區，如宜昌、常德、長沙、衡陽，實地採訪中日部隊作戰的情形，報導了華軍不怕犧牲、拼到全城或整條戰線成為廢墟焦土的慘況，都影響不了史迪威與馬歇爾在同一時候、對同一會戰的報告內容（只能想像他們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國），他們報告的說法永遠是一樣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蔣介石的重慶部隊沒有對日作戰」的文字繼續被「填入空格」，就好像低年級小學生寫填空的練習題一樣地工整。

²馬歇爾與史迪威之間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兩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無間。

31.4 盟國設法陰謀壓制、打擊中國的策略

因此「中國戰區無望論」，以及「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抗日論」，就是馬歇爾所有中國戰區報告的基本內容，這些來自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經年累月的「第一手報告」，最終瓦解了羅斯福對於中國抗日的支持與信心。馬歇爾更爲厲害的一招，就是在執行對中國戰區支援的政策上，儘量誇大困難、阻礙而設法打折，同時在時間上儘量拖延。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二年，親自下令指示馬歇爾，在中國的空軍戰機應該到達五百架，駝峰空運的噸位應該超過每月五千噸（當時美軍一個師的消耗物資數量，就已經每月超過三萬噸），但馬歇爾設法以執行困難做爲推拖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設法拖延一年以上才執行，令中國戰區根本無法依照計畫的時間表進行作戰的配合。

由於羅斯福認爲蔣介石身爲國家元首，兼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軍聯合參謀團會議指揮，馬歇爾就以這個「尊重」蔣介石做爲口實，否決了中國戰區派代表參加聯合參謀團的建議。（因爲一般的盟國戰區，理論上是要接受聯合參謀團的節制與指揮的，既然蔣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揮，那麼中國戰區就不能參與聯合參謀團的會議。）

這樣在表面上，蔣介石的地位好像高過其他的盟國戰區司令官，事實上，中國戰區就根本不能預聞盟國的戰略決定，自己的作戰角色的變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戰所需的後勤。許多需要中國參加的戰略計畫決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決定之後才知會中國戰區。馬歇爾自己更是經常使用威脅中斷對中國援助的方式，對蔣介石下達「命令」般的最後通牒——這就是馬歇爾「尊重」蔣介石的方式。

馬歇爾同樣的不讓中國代表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這樣中國戰區所有需要的裝備與後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請與爭取，有時軍火分配委員會勉強把剩餘的軍火撥給中國，還不一定有運輸工具。由於馬歇爾堅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華」與「亂華」政策，讓史氏全權掌控美國援華物資的分配，做爲控制中國戰區的手段，並且介入中國權力鬥爭的分化工程。馬歇爾在反攻緬甸的作戰上，毫無理由地配合英國的立場，一再反覆變化，以徹底打擊中國戰區的士氣。最後馬歇爾更堅持美國必須執行雅爾達密約（雖然連出賣中國以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的藉口已經消失了），公然應允蘇聯侵略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戰區上有馬歇爾有計劃的打擊與出賣，內有史迪威

的摻砂子、挖牆腳，中國還能支撐得住日軍的攻勢，其中的艱難真是難以想像。雖然沒有任何其他的證據，顯示蔣介石與馬歇爾有任何的個人恩怨，但我們可以就事論事，他的確大有不搞垮蔣介石，決不甘心的「堅忍意志」。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馬歇爾幾乎沒有一次放過蔣介石，最後雖然中國戰區成功地通過抗日戰爭的考驗，馬氏還專程到中國負責「調停」國、共內戰（交給別人作還是不放心），結果終於達成心願，把蔣介石逼到台灣，當然最後也讓美國付出參加韓戰與越戰的重大代價。

當時反法西斯陣營的結構，可以說存在著極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國家間利益的衝突。在盟國的四強中，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也是一個弱國，曾經也正是強權殖民主義欺凌與壓迫的對象。但是因為中國在對抗法西斯的戰爭中，參戰最久、犧牲最大，同時牽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軍力，因此中國理所當然的成為反法西斯盟國的四強之一。雖說中國只求恢復自己國家應有的權益，並無任何對外侵略與擴張的野心，中國甚至還樂意幫助其他亞洲國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決，但是中國的復興，卻會影響到蘇、英、法等強權在亞洲利益的維持與發展，因此她就成為這些盟國必須打壓與算計的對象。

美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自身經歷過反殖民主義戰爭而獲得獨立與發展。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所提出的「門羅主義」，以保衛西半球國家的獨立利益，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都有結束西方帝國主義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戰，同樣有著這種理想主義的色彩。當然美國的民族平等主張，仍然受制於文化與利益的結構，多少仍然以西方社會的觀點出發，特別是美國的軍政部門執行的官員，並未充分地了解與體認羅斯福總統高瞻遠矚之觀點。

不過美國究竟是一個僅有百多年歷史的國家，對於長遠的戰略與政略，缺乏歷史的遠見，雖然它的本土並未遭到戰火的攻擊，但是它卻是最急於結束戰爭的國家。美國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提早結束大戰，以減低美軍的傷亡——無論是發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國當成「戰利品」來引誘（邀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都是源於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歷史意識的缺乏。

當時的蘇聯，則是一方面打著無產階級全球革命的口號，對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一方面卻推動大斯拉夫主義的擴展，以老大哥自居，壓制與欺凌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與民族。蘇聯把侵略中國，當成推動全球革命的第一個前進戰略要點，列寧之「經由北京、加爾

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戰略佈局，促成了共產第三國際（Comintern）在中國的發展。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佔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傀儡政府（比滿洲國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爲了引爆中日兩國全面的衝突，以坐收漁利，俄國甚至出售其在中國東北的鐵路與利益給日本，以讓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國；又同時放出消息，表示蘇聯在必要時會與日本作戰，來鼓舞中國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

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進行到難解難分的時刻，蘇聯進一步派兵駐進新疆，實質控制了新疆的軍政運作；一九四一年史達林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甚至不准美國援華的物資，經蘇進入中國。此後蘇聯就全面杯葛盟國與中國的各種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蘇聯善運用其在全球滲透的外圍組織力量，進行不實卻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壞中國對日作戰的事實。這種高度組織化、靈活與潑辣的負面宣傳，配合上馬歇爾、史迪威的陰謀，終於使得美國決策階層錯誤地認爲，中國無力也無心抗日，美國若是要想提早擊敗日本，不能靠武裝中國，而是要給史達林利益，讓蘇聯出兵參戰。於是在雅爾達會議中，美、英兩國秘密應允俄國正式控制外蒙古與進軍中國東北的「權利」，作爲史達林「將」對日作戰的條件。

英國雖然實力已經不如往昔，但仍企圖在戰後維持其殖民帝國的架構，尤其是它在亞洲的屬地。英國多年來一直企圖染指西藏（英軍曾經在清光緒三十年短暫地佔領西藏首府拉薩），以破解中國在亞洲擁有戰略制高點的優勢。不過，英國也擔心假如中國獲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對日作戰中，轉守爲攻，那麼中國勢必能在戰後成爲強國，中國不但會要求收回香港，也會影響到亞洲其它國家擺脫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因此英國希望中國能在大戰中，耗竭掉所有的國力，最好還能爆發新的內戰，所以丘吉爾一直設法離間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利用他對美國的影響力，盡量地醜化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使得中國始終被排在盟國決策圈之外。丘吉爾甚至認爲，假如英國無法防止蘇聯的擴張，那麼不妨利用蘇聯擴張的壓力，以加強英、美的關係。

就形勢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蘇四強的反法西斯盟國陣營內部，有著非常重大的矛盾與差異。在反軸心國戰爭的初期，由於盟國處在失敗不利的局面，倒還能同心協力，以最低限度勉強支持中國對抗日本的侵略。但是當戰局開始好轉之後，盟國之間的明爭暗鬥，特別是分化與打擊中國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殘，甚至勝於戰場上敵人。蘇聯的戰略目標是建立新的赤色

帝國，因此要乘機佔領整個東歐，以及控制中國，英國則是要維持大英帝國的殘存結構。

31.5 出力最多、獲得最少支援的中國戰區

雖然羅斯福主張由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國的貢獻、給予她更多的支援，因為羅斯福一方面真正地了解與感謝中國過去五年中，單獨抗日的成績，一方面更是認為，假如美國要想擊敗日本，最快與犧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裝中國，利用中國使她成為攻擊日本的力量與基地。

但是多數的美國軍方將領，卻有著歐美本位的想法，認為戰爭優先順序，一定要先歐後亞，這樣歐美國家才能在戰後，維持支配世界利益的傳統霸權地位。這種想法特別受到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忠誠支持，他認為設置中國戰區，不是要武裝與增強中國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國直接插手掌控中國對日戰爭的策略。

馬歇爾從一開始就有意低估中國戰區的重要性，在他認為，中國的抗日作戰只是整個戰爭的輔助而已；中國戰區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軍，而美國絕對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裝中國的軍力。盟國要想真正打敗日軍，還是要出動美英蘇的「白人國家」軍隊不可，否則一旦中國成為擊敗日本的主力部隊，那麼美國就要面對雖然少了一個日本，卻多了一個復興的中國與西方國家爭取主導亞洲與太平洋發展之歷史新格局。

所以馬歇爾堅決主張，盟國對於中國戰區的任何支援，都一定排在最後的順位，就算有多餘的作戰資源，也是能夠不給中國戰區、就盡量不給，對中國的援助，只維持蔣介石還能牽制日軍的最低限度範圍。因此馬歇爾甚至對於羅斯福總統援助中國戰區的直接指示，都是盡量設法陽奉陰違，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統「能拖就拖」的絕招，虛報執行上困難重重，最後最好能夠不了了之。馬歇爾與史迪威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後要把中國戰區的指揮權拿到美國人的手中，否則就讓中國戰區保持不死不活的狀態。

當然不能說馬歇爾這種「應付」中國戰區的態度，完全是出於個人偏見，它也有一些作戰後勤與國家利益上的考量。因為當時美國要想援助中國，必須經過一萬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補給線，從印度的港口，以

火車轉運到印度東部，然後沿駝峰稜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這條運輸線，經過半個地球與跨越幾個歷史時代的地區，因此複雜的程度可以說是難以想像，平均美國每供應中國一噸的物資，在運輸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噸的物資。

這是作戰歷史上，後勤補給線最不經濟的記錄，因此馬歇爾認為，這種方式將補給品來武裝中國作戰，實在划不來，不如將物資另作他用。同時馬歇爾是一位傳統的陸軍將領，對於空權與空運的能力，所知有限，對於中國軍隊的多個世紀混合的作戰方式，更是聞所未聞，所以總是認為中國軍隊內幕重重，不堪聞問。由於馬歇爾認為空軍只是作戰與後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國軍隊無法以有限的空軍支援與空運後勤，就能發揮戰略上擊敗日軍的能力。因此他認為在盟國沒有完成反攻緬甸，打通滇緬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國的計劃，都是完全不合實際的做法。

31.6 悲劇的誕生 — 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原先華府屬意由一次世界大戰的猛將段瀾（Hugh Drum）中將，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但是段瀾發現馬歇爾的「敷衍」中國戰區的政策，與自己希望大量援助與武裝中國，並且在中國戰區建立強大打擊軍力的政策不符，當然就不肯出任這個搞權謀多於戰略規劃的工作。這時馬歇爾推荐自己的親信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其基本的著眼點，就是史迪威是一個意志與成見都極其強的「中國通」，他絕對不會改變的特點，是對於蔣介石的反感以及對中國人的輕蔑 — 這正是馬歇爾的人選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由史迪威把蔣介石纏住，不讓中國戰區的實情傳達到盟國的決策階層，這樣就可以為「中國最後」的戰略方針，得到最佳情報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並無統兵作戰的經歷與能力，只在中國擔任過長期的軍事外交工作。他對於中國的內戰與派系鬥爭，有著政客般的高度個人興趣，他對於蔣介石能夠擊敗群雄，取得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一直有著極大的成見與負面的評價。當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國抗日「無望論」的西方軍事專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權威的預測，中國早就該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國卻能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單獨抵抗日軍五年，因而讓史迪威的中國軍事權威專家之名譽掃地。此次他能夠出任中國戰區參謀

長，當然有機會讓蔣介石背腹受敵，並且運用影響力，扶植自己看好的軍方將領如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等人，希望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國當權。

原先史迪威在中國多年來，就與左傾的美國人物史諾（Edgar Snow）等人相熟，對中國的赤化與左傾的勢力，有著極大的同情與支持。他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後，身邊的主要政治顧問，如美國駐華使館的秘書戴維思（John Davies）與謝偉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傾的政治狂熱人物，積極企圖協助中國全面赤化，他們與延安的八路軍代表，有經常的接觸，因此他們對於中國戰區的民情與政局的報告，全都採用延安觀點——主要的目的，在於醜化、分化與弱化中國戰區與國民政府的抗日事實，並且極力創造與加深中國戰區內部的矛盾。因此他們的報告，對於中國戰區極端地不利，他們對於史迪威的影響極深，其中謝偉志還因為向延安洩露美國的機密文件，最後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審訊。

在馬歇爾與美國陸軍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著開始時先「監督」蔣介石，最終掌控中國戰區指揮權運作的使命而來。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就註定了緊接的將帥嚴重失和，以及中、美爭議不斷的悲劇。當時史迪威具有「雙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需要服從蔣介石的指揮，但是史氏又指揮所有在中國的美軍，掌控了所有美援裝備的申請與分配，以及負責在緬甸的作戰指揮。因此他可以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與蔣介石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認他實際上是美國派在中國的「監軍」，隨時向美國政府秘密報告蔣介石與中國內部的所有情報，動輒使用美援物資的申請與分配權，來脅制蔣介石，並且離間中國戰區的將領，以及設法培養美國在中國軍方的「代理人」。因此自從中國戰區設立，史迪威成為戰區參謀長之後，中國獨立自主的作戰決策就每下愈況，同時中美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就快速增加了。從此中國不但要對付日本從外面的軍事攻擊，還要應付史迪威在內部的挑撥離間，逐漸使得蔣介石所指揮的部隊，出現新的矛盾與彼此的猜忌，最後在日軍一號作戰計劃的攻勢下，中國付出了慘敗的代價。

平心而論，史迪威在中國戰區所造成之指揮系統的危機，一部分的確是來自中、美國情的差異，特別是當時中國的軍政結構，仍然屬於人治統屬的

方式。同時中國所有的作戰資源，已經消耗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瞞的方式，暫時地迴避問題之外，也別無其他的良策。軍委會無法提供軍隊足夠的兵員與補給，部隊也從來沒有真正按照實在的編制運作，因此史迪威認為中國的軍隊，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騙的體制。華軍不同系統的部隊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讓他覺得，中國政府仍然利用抗戰在搞山頭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務

而史迪威個人的個性孤傲，對於一切都有一種莫名的自大狂與刻薄、挑剔的心態³，基於他個人根深蒂固的成見，他根本鄙視蔣介石的為人與一切的作為（其實史迪威對於任何人物都帶有極強極強的成見——這很可能是來自史氏內心的自卑感），蔣介石越是勝利與成功，史迪威就越加地憤恨與不滿。他從來不肯踏實地履行戰區參謀長的職責，要受蔣介石指揮，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⁴。史迪威稱蔣介石是「花生米」、羅斯福是「橡皮腿」他也無法與英國的東南亞戰區最高指揮官蒙巴頓以及英軍將領相處，與陳納德更是幾乎是勢同水火。

史迪威對於中國的政治與軍情，全都是負面與挑剔的報告，從來不會主動為自己所代表的戰區利益而力爭，倒更像日本「中國派遣軍」的特務機關長，專門來中國戰區臥底，以離間中國戰區內部的合作、阻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援助，以及抽調中國戰區兵力到緬甸作戰。他最終的目的就是把中國戰區搞成不堪一擊，這樣盟國才能把蔣介石免職，史迪威就可以統帥六百萬華軍。雖然史迪威本人指揮作戰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卻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點子，以及操縱輿論媒體的報導。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對於參與中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更有著極大的興趣。從蔣介石的親戚到戰區的指揮官，史迪威經常喜歡聽取謠言、散播謠言，並且設法介入權力鬥爭，以幫助自己所欣賞的人物奪取權力——但這卻是盟國合作中，最要不得的舉動。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國內部權力鬥爭的救世主姿態，干預中國內部決策的鬥爭，以及直接涉入各組勢力間的權力傾

³ 史迪威的個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綽號之一就是“Vinegar Joe”。

⁴ 不過蔣介石與其他外國軍事將領的相處記錄，卻都非常愉快，像他與多位德國軍事顧問，幾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戰決策的地步，與幾位蘇聯軍事顧問也能相敬如賓。他與美軍的陳納德與魏德邁，也能合作愉快，唯獨與史迪威是個例外。

軌。史迪威平時多半時間，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緬的森林中，策劃他個人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但是只要他出現在中國戰區的境內，就會立刻爆發嚴重的政治鬥爭。

蔣介石絕對沒有想到，中國戰區成立之後，對於中國來說，可以說是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因為在一九四一年，中國開始從美國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國對中國抗日作戰的支援，就是提供中國空軍戰機五百架，以及三十個陸軍師的武器（當然全部的裝備都是中國要出錢買的，只是可以先記帳周轉）。這些軍事物資，在美國政府批准之後，就直接賣給中國，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就由中國自己依作戰的需要進行調配。

但是自從成立中國戰區之後，中國不但沒有得到新的援助，就連美國政府原先已經答應賣給中國的裝備，也經常要支援其他戰區的「緊急」需要而被抽調⁵。最大的問題是，所有中國戰區所需的軍事裝備，反而不能由中國政府自己向美國申請，而是要經由史迪威親自同意之後，才能向申請；而已經運到中國的美援裝備，更要經由史迪威個人指定分發，而非由中國戰區自行運用。史迪威於是動輒以凍結美援做為在中國戰區興風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資的優先順序，做為自己在中國內部拉幫結派的籌碼。

這就是中國戰區不能發揮戰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試想，假如美國對英國（是中國的四十倍）或是蘇聯（是中國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後，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在作戰需要時運到，而且少量的軍援運到之後，還要用美國軍官單獨負責控制分配的運作，加上戰區統帥與參謀長的立場與意見完全勢同水火，那麼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英、蘇還可能有什麼可觀的戰力發揮？

由於史迪威根本就不願成為蔣介石的副手，總是自以為是美國總統的代表，負責「監督」中國抗戰。蔣介石為了應付這樣一位監軍，只好投其所好，讓他獨當一面，負責指揮在緬甸與印度的中國軍隊，好讓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慶，每天大搞興風作浪與挑撥離間的活動，但是史迪威還是設法給中國戰區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

從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後，整個中國戰區就成為雙頭馬車的領導，中國戰區內部的「鬥爭」比對日軍的作戰，還要熱鬧。而原本團結一致

⁵例如英國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搶奪」中國藉道緬甸的美援軍事裝備，而鬧出軒然大波。

對日作戰的各個派系，因聽聞到內鬥的訊號，而又開始私下運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設法保存實力，一方面不斷大「告洋狀」，鬧得中國抗日陣營出現嚴重的內部分裂，使得羅斯福感到非常煩惱與困惑。史迪威這樣的做法，正是體察到馬歇爾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華」報告，馬歇爾就非常容易說服羅斯福，中國是無用的盟國，只要口頭敷衍蔣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實際支持中國戰區作戰，更別提裝備中國的作戰能力了。

31.8 中國戰區內部的「陸、空大戰」

在中國戰區的戰略觀點上，當時分成陸戰與空戰兩派，史迪威是陸戰派，這派的支持者包括馬歇爾與史汀生。陸戰派人士主張建築中國通印度的雷多公路，進一步反攻緬甸，建立中國對外的陸上交通線；同時訓練與裝備中國陸軍，在戰場上反攻日軍的戰線。而陳納德是空戰派，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與居理（Lauchlin Currie）是這派的支持者。這派的觀點是全力提高對中國的駝峰空運量、加強在中國戰區的空軍戰機，以及在中國境內建立更多的空軍基地，利用戰機切斷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運輸生命線，同時攻擊其本土的國防重工業，並對於中國戰場提供空中阻絕的空優支援，以對日陸軍造成重大的戰略打擊。由於羅斯福看到陳納德空軍的優異表現，因此傾向支持空戰派；蔣介石與陳納德的友誼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極大的不滿，竟然設法儘量制肘陳納德，造成中國戰區指揮部門裡，隨時都有可能上演一場陸軍與空軍的「大戰」。

陸戰與空戰兩派的觀點，當然是見仁見智、各有立場，但是若以時效與成本而言，則應是空戰派可行性更高。因為要想打通中國西南的陸上交通網，要涉及到英國的全面支持，以及冒著大量抽調中國戰區前線兵力的風險，同時要有效地裝備與訓練中國陸軍，所需要的時間較長。更何況史達林與丘吉爾都不會在決策上願意支持中國打通國際通路，所以陸戰派的計劃更是難以實行。

但是若是設法大量增加在中國的空軍數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戰鬥機）、提高駝峰空運數量（每月兩萬噸的物資），以及納入印度北部的空軍基地以擴充中國戰區的空軍戰力，這樣中國戰區空軍，就可以充分發揮戰力，一方面截斷日本的戰略運輸線，一方面阻絕日本部隊在中國戰區的後勤

補給線，這將會在中國戰區發生決定性的戰果。問題是，當時沒有人看出空軍在戰略上，可以擔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陳納德將軍是少數的空軍戰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權位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馬歇爾全力的打壓，根本沒有讓他發揮空權力量的機會。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緬作戰失敗後，史迪威擅自把華軍兩個精銳的師留在印度，名爲訓練，實爲控制做自己指揮的私人軍隊。當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慶之後，對於籌組盟國中國戰區的參謀指揮體系，毫無興趣，卻一心只想調用中國戰區的部隊，爲他反攻緬甸的日軍而復仇。史迪威出身傳統的陸軍，對於空權的發展與潛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對於開闢空中運輸走廊，是非常地悲觀。他醉心於建築一條從印度雷多經緬北到雲南的公路，希望這條公路能夠打通美援的補給，以支援他建立新式華軍的夢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設雷多公路所需費用的高昂、自然環境上的艱鉅、時間上的緩慢；更實際的困難是這條建築在深山蠻荒無人地帶的公路，其運輸能力既低，但修護與保養的工程費極大，因此以實際效益的觀點而言，是極端的浪費。假如同樣的資源、經費改爲投資在增加空運能力與戰機數量，結果會完全地不同。

而蔣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國能夠優先反攻緬甸，以打通援助中國的交通線，中國就可以力轉戰局了。但是這個看法與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處，是蔣介石認爲盟國必須全面控制東印度洋海域，然後與中國以水陸兩面、南北夾擊緬甸的日軍，以重新開放緬甸的海港與縱貫鐵路，才能達成打通援助中國的通路的任務（史迪威認爲局部收復緬北、開闢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爾知道，如果蔣介石能說服美國這樣作，將對大英帝國的殖民利益有深遠的影響，所以丘氏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是用盡一切力量、絞盡所有腦汁，反覆進行各種破壞的策略，羅斯福終於拗不過丘吉爾的死纏爛打，加上史達林在旁的助陣，使得反攻緬甸的戰略計劃，一拖再拖，盟國原先答應對中國大量的武裝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終都沒有讓中國拿到手。

當時中國對外獲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空運線。這條高危險、高難度的航線，乃是維繫中國抗日力量與心理的援助生命線，但是在英美相關官員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運輸量極其有限。美軍負責中國戰區空運的空軍第十航空隊指揮官畢賽爾，更是一位堅決執行馬歇爾與史迪威政策的美國空軍將領。在他認爲，駝峰空運支援中國的行動，不過

只有象徵性的意義，因此認定空運的數量既無必要，也很難實質地提高。

由於空運噸位極為珍貴，因此蔣介石希望進行最為有效的利用，所以將運補的重點，擺在空軍的支援上，以發揮以小搏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個沒有統兵經驗與能力的軍人，在中國停留的時間太長，已經錯過在美軍部隊裡能立功、發展的機會了。因此史迪威轉而產生強烈的「戈登情結」，希望能自己夠像清朝同治年間的英國軍官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在中國訓練與統領一支打敗太平天國的「常勝軍」。所以史迪威是有意在訓練與掌握中國的軍隊上投資，建立一支由自己訓練與統帥的中國部隊，然後為自己留下一個在異國立下顯赫戰功的「傳奇歷史」，同時洗雪他在緬甸戰敗的恥辱。

因此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訓練中國軍隊的計畫，其中已經退到印度的華軍部隊，由中國加派兵員補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裝、訓練，成為全部美式裝備的部隊；另外在雲南設法調訓中國三十個師的部隊，以進行反攻緬甸的夾擊作戰。這個計劃符合蔣介石認為中國部隊戰力必須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緬甸，打開對外通路的重要戰略佈局。這是中國抗日的主要戰略規劃之一，因此蔣介石指派陳誠在雲南，成立遠征軍總部。史迪威自己卻希望能夠乘機掌握中國的軍隊，在他率領下先反攻緬甸報仇，功成之後，再回師中國戰區，拿下蔣介石的軍隊指揮權，以成為在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因此史迪威計畫的前提是，盟國必須打通緬甸的陸上交通網，才能提供他組訓中國陸軍部隊所需的裝備。但史氏的這個觀點，又與丘吉爾、馬歇爾發生了衝突。

31.9 羅斯福總統遭到馬歇爾的蒙蔽

蔣介石眼見英國根本就在反攻緬甸的戰略上，大唱反調，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羅斯福提出挽救中國戰區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國戰區五百架飛機，以增加中國戰區打擊日軍與切斷日軍南北海運的空軍作戰能力。二、駝峰空運設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噸。三、設法提供三個美軍作戰師部隊，進入印度，以參加盟國的反攻緬甸作戰。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絕將申請飛機的要求，轉交華盛頓，而又不向蔣介石提出反對理由的報告，因而嚴重延誤了中國戰區的戰力佈署。

加上馬歇爾在沒有知會蔣介石的情形下，擅自以北非戰局緊急，而將原

先隸屬中國戰區的美國第十航空隊飛機，全都調走，引起蔣介石的憤怒反彈。蔣介石眼見盟國成立中國戰區之後，一直都在設法佔中國的便宜，中國根本沒有拿到實質的援助，反而要承受來自盟國的壓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個月，駝峰空運的援助物資，分別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噸。如此少的數量，簡直形同兒戲，而中國戰區幾乎已經到了飛機不能動、汽車不能走、工廠不能開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蔣介石設法要宋子文緊急求見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做出合理的交代。由於史迪威與馬歇爾不斷提出相反的情報，造成羅斯福在判斷上嚴重困擾，因此他決定了解中國戰區的真相，並且調解中國戰區將帥不和的問題，特派其行政助理居理，前往中國，與蔣介石進行全面的溝通，並且設法解決中美之間的誤會。

居理到達重慶之後，與蔣介石進行十多次的會談，他告知蔣介石，史迪威是馬歇爾最爲信任的部屬，而羅斯福又非常倚重馬歇爾，所以史迪威的立場與問題，背後實在是代表馬歇爾的看法；蔣介石若是打擊史迪威，就等於在華盛頓得罪了馬歇爾，以後會產生更大的困擾。

蔣介石在了解這層關係之後，又得到羅斯福許多親切的問候與保證，特別是盟國反攻緬甸的承諾，需要史迪威這種有緬甸作戰經驗與報仇心切的人來執行，所以蔣介石也就接受了居理的調解。在這接觸中，居理甚至揭露了美國軍政決策人士的亞洲戰略底牌——他們規畫中國東北與台灣的主權，在戰後將交由盟國託管，而不是直接歸還中國，以做爲西方國家削弱中國的手段。這當然引起蔣介石極大的震驚，也伏下蔣介石在開羅會議力爭中國領土與主權完全的決心。

但是史迪威卻沒有放過「告御狀」的機會，他對居理大量揭發蔣介石與日本人接觸談判的謠言⁶，以及誇張中國內部分裂的政治內幕，並且要居理建議羅斯福，採用兩個可以制服蔣介石的絕招：一個是控制美援的數量，一個是要叫蔣介石接受與延安組織聯合政府，這樣包管美國政府可以把蔣介石當成傀儡一樣來操縱。

⁶ 史迪威以及他身邊的政治顧問如戴維思、謝偉志等人，不斷在他們向華盛頓的報告中，言之鑿鑿地宣稱蔣介石已經秘密與日本達成停火協議，所以國民政府的軍隊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蔣介石只是個想騙取美援軍火、物資來儲備內戰本錢的狡猾機會主義者。這些指控已經被獨立客觀地證明是毫無根據的，美國在戰後（1951）對日本「中國派遣軍」高階軍官與資深參謀的審問結果，證實了蔣介石與日軍從來連正式的談判都沒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屬無稽。事實歸事實，直到現在還是有歷史著作採信史迪威、戴維思等所宣傳的謠言。

不料史迪威的建議與態度，卻造成羅斯福的不滿，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寫信給馬歇爾，特別提到史迪威採取控制美援，以威脅控制蔣介石方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希望馬歇爾能夠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蔣介石代表中國的事實。但是史迪威在馬歇爾的撐腰之下，仍然肆無忌憚地玩弄這種「脅迫」中國聽命的手法，繼續把中國戰區搞得是烏煙障氣。

盟國在二次大戰對於後勤支援的指導原則，就是一定把中國戰區放在任何排列順序的末尾。駝峰空運的量本來就相當有限，再加上畢賽爾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補給的嚴重不足。因此以這樣有限的援助物資，假如要裝備史迪威所訓練的陸軍師，就無法同時支援陳納德的空軍作戰。

當時陳納德在中國戰區，正負責新組成的美軍第十四航空隊，任務是支援中國戰區的華軍作戰，與切斷日本本土與南洋戰略物資的海上補給線。日本國內一切的軍火、工業生產，都仰賴這條海上補給線的暢通，因此這是一條決定日本作戰能力與成敗的生命線所在。空軍在支援華軍地面部隊的作戰上，為力量已經耗竭的中國軍民，維繫了抗日的士氣，因為中國戰區的六百萬部隊，實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繼續撐下去。

由於史迪威與陳納德對使用有限空運物資的優先權起了嚴重的爭執，陳納德認為，在有限的空運量下，與其分散著裝備陸軍，不如集中提供空軍使用。但是史迪威則堅持要將補給品交給陸軍，以協助訓練一支「史家軍」好早些讓他能率軍反攻緬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訓練美援的「史家軍」身上，但是由於當時長達六年的全面戰爭，中國的兵源已近枯竭，同時中國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與人謀不臧的狀況下，運作失當；戰時人民的生活困難，營養不良的情形相當普遍，身體合格的兵員更是極其有限⁷，因此當時華軍中缺員極多，為了滿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國甚至需要從前線抽調部隊的兵員，以充當「史家軍」反攻緬甸所需的兵力，無形中造成了中國戰區前線防守的兵力更為不足的問題。

由於中國作戰部隊的員額不足與裝備奇缺，華軍就更為需要空軍的支援，才能擋住火力、兵力均佔優勢的日軍攻勢。但是史迪威卻又要將有限的空運物資，優先支援反攻緬甸的陸軍裝備，畢賽爾則是不斷地推脫自己的責任，認為在現階段的情形下，駝峰空運的數量「無法改善」。因此在中國戰

⁷當時能被徵召的中國兵員，夠通過美國制定之體檢標準的比率，只有二二%。雖然中國的人多，但抗戰的消耗的確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經是嚴重地不足了。

區內的美國陸軍與空軍，爲了美援物資的分配，與戰略的重點選擇，爭得難解難分。

一九四三年五月，蔣介石眼見史迪威與馬歇爾的一再阻撓美國對中國戰區的援助，因此決定向羅斯福建議，直接召見陳納德，以提供中國戰區第一手的資料，讓羅斯福能夠徹底掌握中國戰區的實情。馬歇爾非常地驚恐，擔心陳納德會把實情告知羅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趕回華盛頓，在總統面前設法爲自己扭曲中國戰區的情報圓謊。史迪威在面見羅斯福時，竟然口不擇言地表示，蔣介石是一個『意見反覆、狡滑而不可靠的老無賴。』

當羅斯福首次從陳納德那裡得知中國戰區的真實狀況之後，簡直不敢相信這才是事實——美國不但只是近乎象徵性地援助中國，而且馬歇爾所呈報的中國戰區情報，與陳納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羅斯福立刻與宋子文見面，直接與主動地告知宋子文，美國政府決定將空運數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噸，再設法增加爲每月一萬噸，並且將給中國戰區五百架戰機，及同意召回不斷制肘中國空運的畢賽爾回國。

更爲令人震驚的是，羅斯福已經覺察到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問題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親自要求陳納德，有事不妨親自寫信給他報告。羅斯福特別指出，信不得經過參謀長馬歇爾的正常軍方管道。這在美國的政府體制而言，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外。因爲陳納德只是一個中國戰區的少將階軍官，竟然可以直接向總統報告，可見羅斯福已意識到他嚴重缺乏中國戰區真相的情報。馬歇爾當然更把陳納德擁有直通白宮的特權，當成必須要撲滅的危機處理，造成了美國陸軍部上下，對陳納德都採全面封殺的態度。

31.10 史迪威出賣中國戰區利益

此時，丘吉爾赴美以商討盟國的戰略，這就是在華盛頓舉行的「三叉會議」（一九四三年五月），在會中決定了盟軍繼續在地中海的對義大利半島攻勢⁸，以及決定了亞洲戰場的戰略。羅斯福允許中國的宋子文參與部分會議的討論，史迪威與陳納德也參與此會。丘吉爾當然率領英國代表團，不斷

⁸ 丘吉爾如願以償地得到羅斯福的同意，把盟國的軍力浪費在進攻義大利（與戰勝德國沒重要的關聯），而犧牲了提早渡過英法海峽直搗德國心臟的戰略計劃（BOLERO ROUNDUP Plan），使得收復歐陸的時間更被推後。丘吉爾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時間，由蘇聯來將日爾曼民族的德國揉成碎片，英國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少了一個最強勁的對手。

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英國甚至提出毫無實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蘇門答臘的作戰計畫，真是把美國搞得啼笑皆非——當時英、美連東印度洋的孟加拉灣都無法掌控，哪裡有力量去攻蘇門答臘？

總之，丘吉爾的心態非常明顯，就是絕對不會支持提前反攻緬甸，而讓中國打通援助的大道。因為丘吉爾清楚地知道，羅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裝中國軍隊，以成為反攻日本陸軍主力的戰略構想。英國了解中國人是能夠作戰的民族，目前之所以無法發揮戰力，主要原因是沒有適當的裝備與訓練而已。一旦得到適當的援助，有了可以擊敗日本的軍力，中國當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國的擺佈了。

所以丘吉爾在會議中，一再地東拉西扯，最後在美國與中國的壓力之下，才勉強對反攻緬甸達成一個含混的立場看法。英國同意盟軍在緬甸北部，進行反攻，以牽制日軍。這是由於英國擔心日軍進攻印度，同時這個作戰方案，對於打通補給中國的通路，也無法發揮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處」是，這可以抽調中國戰區的軍力到緬甸邊區，讓本土受到日軍正面的打擊，這樣中國就可能要爲了緬甸作戰，而犧牲自己。這當然是蔣介石所最爲擔心的戰略陷阱。

三叉會議中，羅斯福對於史迪威的表現與態度，相當地不滿，因此羅斯福就直接下令，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擁有優先使用駝峰物資供應，以及獨立作戰指揮的權力，而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也真的創下二次大戰的空戰歷史記錄。在極其有限的裝備與後勤狀況下，十四航空隊平均每月擊沈日本十五萬噸船舶（途經南海與台灣海峽）的記錄，日本的南北戰略運輸航線因此近乎癱瘓，經造成日本國防工業生產面臨中斷的危機。這就是日軍會動用最後的戰力發動一號作戰，以掃除美軍十四航空隊在中國華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會議上，與宋子文大唱反調，演出中國戰區內鬥的全場「鐵公雞」，而且不斷以違背實情的言論（比方「中國不抗日」）誣蔑中國，因此宋子文認爲，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職務，中國根本不可能在華盛頓爭取到盟國的支援。中國戰區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惡意中傷的立場下，陷入無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決定進行全方位的佈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換史迪威，以爲中國戰區的內部消除這個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經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就是在蔣介石長期的不滿，以及宋子文一再的努力遊說之下，羅斯福總統對於史迪威的許多言行與做法，也並不能認同，加上英國負責東南亞戰區的蒙巴頓也經常與史迪威發生衝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組中國戰區基本結構的建議，以徹底解決問題，以及改進戰區運作效率不彰的危機。

宋子文建議，爲了讓中國戰區代表，可以出席盟國的聯合參謀團，中國戰區最高長官，可以改由蔣介石任命一位中國將領出任，副長官由美國將領出任，參謀長由中國將領出任，副參謀長由美國將領出任，其餘參謀職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這樣中國戰區就可以參加盟國聯合參謀團會議，爲中國戰區爭取資源。同時史迪威也就可以因爲中國戰區全面改組的名目，毫無痕跡地加以調職。

羅斯福原則同意這個方案，交馬歇爾與宋子文商議。馬歇爾知道戰區結構改組事關重大，若是中國今後可以出席聯合參謀團與軍火分配委員會，將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而撤換史迪威的提議，則成爲中美之間相互協商後達成妥協的下限。馬歇爾在權衡利害之後，同意犧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國戰區的改組，宋子文也同意先換史迪威，再相機改組戰區的計劃。於是改組之事最後無定論，但當時中美的共識是，美國已經準備由索摩維爾（Brehon Somervell）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調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軍第四軍軍長。

31.11 抗日戰爭史上最錯誤的決定

不料這個事關重大的歷史安排，因爲史迪威設法牽動中國內部的政潮，而在最後一刻發生了變化。首先，各種有關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組中國戰區來擴大自己派系權力的謠言，開始大量地出現。特別是將由誰出任中國戰區最高長官，更是熱門的權力鬥爭焦點。由於宋子文代表當時所謂「政學系」的力量，開始批判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及何應欽等「舊派」團體，因此造成了他們的反彈，當時由孔祥熙夫人宋藹玲出面，整合宋美齡與「CC」派，開始與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觸。史迪威當然拿他的靠山做爲威脅，假如他去職，馬歇爾將會全面地報復中國，杯葛所有對中國的援助，因此蔣介石考慮這些問題之後，竟然動搖了撤換史迪威的決心。

最糟糕的是，此時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蔣介石，表示她們負責說服史迪威「悔改認錯」，就不要撤換他，以免遭到馬歇爾對中國戰區的全面報復。何況當時開羅會議召開在即，史迪威已經熟悉緬甸的戰況，假如中國熱切希望盟國反攻緬甸，那麼很難找到比史迪威更爲熟悉緬甸的「人才」⁹。當然這也可以壓制宋子文的政學系的「奪權」，而蔣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將中國戰區的司令官職務交給其部屬¹⁰。

在這個歷史重大的轉折時刻，蔣介石突然轉變立場，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頭認錯，那麼就不必撤換他，也不改組中國戰區。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從原先已經得到通知，將要被調職的前夕，由於獲得宋家姊妹以及國民政府守舊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這一場絕地大反攻的勝利，當然導致宋子文與蔣介石之間近乎攤牌的衝突。蔣介石與宋子文的關係於是絕裂，宋與政學系相關的人馬遭到冷凍，蔣與愛將陳誠等人一併保持距離，以防他們的權力串連與擴張；而何應欽則得到特別的重用，白崇禧卻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由於上層權力的變化，中國的第六與第九戰區，都暗中受到特別的「待遇」，兵員補充與後勤補給都遭到嚴重的影響¹¹。

在最後一刻變卦讓史迪威留任，可以說是蔣介石在領導整個抗日戰爭中，最嚴重的錯誤決策。這個錯誤，影響到開羅、德黑蘭會議對華所造成的歷史命運；種下日後華軍在中國戰區幾乎覆滅之危機的遠因，也使得盟國在雅爾達會議出賣中國，及日後整個中國抗日歷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運。因爲蔣介石續任中國戰區司令官，無法在盟國聯合參謀團中佔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參與戰略決策和爭取後勤支援。而史迪威本性難移，繼續在中國內部進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國戰區的指揮系統的人心渙散。一九四四年，在日軍一號作戰計畫的猛烈打擊下，中國戰區全線潰敗，羅斯福無法爲支持中國找到理由，最後決定出賣中國，以換取蘇聯對日參戰的承諾。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態度，用發動中國內部政潮的手段，從被撤換邊緣

⁹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理由非常正確，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樣，先亂指揮大軍而遭慘敗，隨後又爲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隊的將領，還不是件容易的事！

¹⁰宋家姊妹與長兄宋子文嚴重不和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齡前往美國進行遊說活動，多少有牽制宋子文勢力的謀略在內。蔣介石曾經被迫指示，在與美國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觀點與立場。

¹¹爲了防止個別戰區司令官發動兵變，何應欽祭出嚴格控制兵員與補給的制度，結果在後來的日軍全面攻勢中，甚至連在最爲危急的時刻，沒有何應欽的命令，連戰區司令官——包括湯恩伯、薛岳、孫元良在內——都不能拿到作戰物資。尤其在日軍進攻廣西的當頭，華軍眼看著後勤補給站中軍火充足，自己的部隊雖然面臨彈盡援絕的緊急關頭，但是沒有何應欽親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軍火作戰。

爭取到留任之後，當然更是要存心報復「花生米」給他的威脅。他一心盤算自己最後如何能夠統帥所有的華軍作戰。他的計劃是先設法在緬甸打場勝仗，以洗刷失敗的恥辱；然後扶植自己的人馬，再從蔣介石手上取得軍事大權，這樣就可以徹底地羞辱蔣介石，並全面掌握中國的軍政大權。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個月後，就代表中國戰區的軍方，參加開羅會議（原本多年來代表中國戰區的，都是由宋子文擔任這個角色）。史迪威在會中最後的關鍵時刻，報告羅斯福總統，中國已經無力與日本再戰，蔣介石隨時會垮台。因此最後造成丘吉爾觀點的勝利，讓羅斯福撤銷對蔣介石全面反攻緬甸計畫的支持。接著史迪威又佈署私下反攻緬甸北部計畫，然後由馬歇爾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出動的遠征軍，投入這個效益極差的作戰，罔顧中國戰區面對日軍決戰時軍力配置的優先順序，而在準備的佈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接著，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發起以後，史迪威更是想盡辦法破壞中國的防禦作戰計畫，繼續強迫蔣介石調派接受美援的中國軍隊，參加緬北原始森林作戰，造成中國戰區戰略預備隊全被抽空。而所有寶貴的援華作戰物資，也都被挪到緬甸戰場使用；陳納德所指揮的空軍支援華軍作戰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擾，根本無法全力出擊日軍，造成中國軍隊在從南到北，在所有戰線上都面臨潰敗。

在這個關頭，羅斯福終於對中國戰區失去了信心與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羅斯福乾脆直接要求蔣介石交出軍隊指揮權給史迪威，以解救中國戰區的危機。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處拉幫結派，準備要接掌中國軍事的指揮大權，並且揚言他將要給八路軍美式裝備，以威脅蔣介石政府。面對中國戰區的全面崩潰，蔣介石爲了挽救戰局，只有認真考慮接受這個安排，以爭取盟國的援助，來阻擋日軍的攻勢。美國總統羅斯福特派赫爾利（Patrick Hurley）做爲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以調解整個指揮權移交的過程。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職

此時，史迪威已經以「即將就任」之中國戰區總指揮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對國民政府施加壓力，造成中國戰區全面上下動盪不安。許多軍政領袖，擔心蔣介石成爲虛位傀儡後，自己的下場又將如何？中國內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誰能集中心力去面對日軍的攻勢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極其粗魯的態度，拒絕蔣介石調動遠征軍進攻緬甸八莫作戰的要求。因為在史迪威認為，中國的駐印軍與遠征軍，都是他個人的「私軍」，因此中國政府無權過問。史迪威的動作，進一步讓蔣介石覺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國軍隊指揮權，甚至可能會成為美籍的中國「軍閥」，可能完全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將蔣介石的調軍要求，喧染成爲蔣介石要保全實力，不願抗日的陰謀罪證，回報馬歇爾。這時丘吉爾找到狠狠地給中國臨門一腳的機會，那就是配合馬歇爾、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奪權計畫，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舉行戰略會議，丘吉爾見羅斯福爲中國戰區的戰局嚴重失利正苦惱不已，立刻施出絕招，一反其原來的立場，竟然主動地「口頭」答應美國的要求，表示願意派遣英國部隊，從海路、空降進攻緬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國軍隊，南北夾擊在緬的日軍。但是這個方案根本沒有知會中國，而完全是丘吉爾信手捻來的備案之一。

這原是中美兩國多年來，一直爭取英國參加反攻緬甸作戰的陳年老案，羅斯福當然相當高興。但是此時馬歇爾卻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有意將在緬北作戰的華軍，抽調回中國作戰。馬歇爾這種混淆視聽的講法，立刻激怒了羅斯福。他立刻憤怒地表示，盟國好不容易終於決定準備聯合反攻緬甸，怎麼蔣介石卻又要臨時抽腿¹²，他在憤怒與不滿下，接受馬歇爾的建議，再發電報給蔣介石，對蔣介石發出最後通牒，電文以極端率直與粗魯的語氣，要求蔣迅速交出華軍指揮權給史迪威，以免影響整個戰局¹³。

事實上，丘吉爾表示英軍將以海空軍反攻緬甸，根本只是英國政府整中國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羅斯福已經發怒，認爲「是蔣介石不肯配合」盟國方案，而向蔣提出最後通牒之後，其破壞中美關係目的已經達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國，英國實在無法調派部隊進攻仰光，所以必須取消聯合反攻緬甸方案。這種陰謀出爾反爾的做法¹⁴，當然不可能是英國政策決定的「錯誤事件」，丘吉爾根本就是以此手段，來破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要影響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支持。

¹²由於身體狀況的迅速惡化，羅斯福總統的思考這時候已經出現混亂的情況，常把問題的后果關係顛倒。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¹³事後檢討，當時羅斯福並未詳細地斟酌電報的內容與語氣，原來馬歇爾發出的電文是未經修飾的底稿，羅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簽發了。

¹⁴丘吉爾「爲了英國的利益」而信口說謊的記錄實在不勝枚舉，他的臉皮之厚，足以抵擋原子彈的轟炸。

但是羅斯福措辭嚴峻的電報，已在九月十八日傳到重慶的美軍總部。史迪威看了，簡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晉見蔣介石，要當面給蔣「好看」。而此時蔣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屬，擬訂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揮華軍命令的文件內容。史迪威不顧赫爾利的勸阻，堅持要當面交電文給蔣介石，他要親自看到蔣介石閱讀電報而受辱的表情反應。此舉果然產生了驚人的「反效果」，蔣介石無法接受這種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決心，甚至不惜與美國完全絕裂，也要驅逐史迪威離開中國。（可惜是太遲了！）

蔣介石立刻停止將指揮權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見已被冷凍多時的宋子文，草擬回覆羅斯福的電文。蔣介石在電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對於原先答應羅斯福，由美軍將領指揮華軍的立場與原則不變，但是史迪威已經失去全體中國軍民的信任，因此必須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職務離開中國，否則中國不惜承擔任何結果。中美之間的關係，在此面臨全面破裂的危機。

此時，赫爾利對於史迪威這種魯莽與不敬的行動，也大感不滿，他看出中國戰區正面臨崩潰的邊緣，他認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決裂，對於美國絕對是有害無益。因此他直接向羅斯福發出電文，指出史迪威已經成為中美盟國之間的真正問題所在，因此撤換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關係的必要條件。羅斯福這才發現，自己的魯莽而把問題給弄僵了，事實上美國絕對不能失掉與中國合作抗日的關係，於是開始力排眾議，思考撤換史迪威。

史迪威這時才知道自己的粗魯無禮，以及長期打擊、分化中國戰區，已經伏下了大禍，而由自己統率華軍，而建立一支「史家軍」的美夢，就此破碎。雖然史迪威想要設法挽回，馬歇爾也一再為史迪威說項，羅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將史迪威調離參謀長職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國戰區中負責訓練軍隊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來，史迪威種種惡劣已極的表現，是讓蔣介石徹底地絕望與清醒了，因此他是鐵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離開中國戰區不可¹⁵。

31.13 撤換史迪威以挽救中國戰區

這時候，羅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問題嚴重性。因為美國知道，盟國絕

¹⁵當然也因此伏下馬歇爾在杜魯門任內，對付國民政府，以全面報仇的歷史大禍。

對不能沒有中國來牽制日本的主力軍團。於是原先趾高氣揚，要求蔣介石解除兵權交給史迪威的羅斯福總統，終於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蔣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國戰區所有的職務，並建議由蔣介石提名三位美軍將領繼任。羅斯福最後圈選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中將成爲中國戰區的參謀長。而自從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後，中國戰區就不再發生任何中美之間戰略與意見的衝突。羅斯福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此開始懷疑到馬歇爾的陰謀。但是此時羅斯福已經衰弱到無法去追蹤這個懷疑了。魏德邁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同時將緬甸的職務交給美軍將領蘇爾登負責。在中國戰區，蔣介石與魏德邁立刻著手合作，設法穩住日軍凌厲的攻勢。

當史迪威被調離中國戰區之時，立刻引起外國媒體競相報導內幕，紛紛指責蔣介石運用權謀，打擊一位「了解中國國情」、勇敢善戰與正直批評中國腐敗的美國軍人，好像中國戰區調離不適任的美軍將領，是對美國的大不敬。（試問，當時中國戰區的潰敗，是誰該負主要的責任？）這些媒體多半是思想左傾的記者，與呼應西方分裂、弱化中國之謀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終於告一個段落，他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三年半的時間，根本就沒有組織中國戰區參謀部的運作作業，沒有中國戰區的作戰參謀作業，他多半時間躲在緬甸的原始森林策劃「羅賓漢式」的傳奇作戰，他對於中國戰區，除了不斷扭曲中國抗日實情的「戰報」之外，就是設法運用美援物資的分配，引爆中國戰區的內爭。他在外打擊中國戰區爭取援助的申請，在內訓練自己的「私人」軍隊，爲了個人的聲譽而非爲中國戰區作戰；他挑撥中美之間的關係，制肘陳納德空軍的作戰，在最後還想以權謀奪取中國的軍事指揮大權，因而讓中國在整個戰線上潰敗，這就是史迪威在中國戰區，對中國的「貢獻」

綜觀中國戰區的設立與史迪威事件之發展，固然英美軍政決策層所表現的狠毒與設計，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蔣介石也同樣要爲處理這個問題的失當，而負起重大的歷史責任。宋子文改組中國戰區的計畫，以及撤換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說是一個重要與關鍵性的歷史性政略，可惜蔣介石無法掌握時機與方向，因而造成歷史的大錯。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國戰區得以改組、史迪威被撤換，那麼無論是開羅會議還是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都會有比較好的結果。雖然丘吉爾與馬歇

爾仍然會加以破壞，但是由於沒有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內應，他們就少了關鍵的支援。特別是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勢的時候，假如當時的中國戰區，能夠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緬的遠征軍可以回防、盟國的空軍可以增援，那麼抗日戰爭的最後結果，會有一個歷史性的改變——也許就不會有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以及原子彈的投擲了。

31.14 魏德邁力挽狂瀾

接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¹⁶，可以說是出任艱鉅，因為當時的中國戰區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日軍正長驅直入地攻入華南地區、中國的政情出現分裂與鬥爭、經濟危機幾乎已經發展到失控的狀態、華軍在華南戰線失去戰力、美國駐華的空軍基地已損失了一半以上。而馬歇爾更是要看魏德邁如何處理他的職責，假如他與蔣介石能夠合作成功，馬歇爾當然會另外想辦法，以挽回他的計謀；美國新聞媒體也希望魏德邁失敗，以證明中國戰區的問題，是在蔣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國戰區幾乎覆滅的關頭，魏德邁匆促地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他在接任之後，簡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國戰區參謀部，只是一個空架構，沒有參謀部的組織與運作、沒有中國戰區的作戰計劃及後勤作業體系，史迪威事實上是丟下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這時魏德邁才明白，為什麼中國戰區的問題，會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國戰區近四年的時間，只全力在搞擴張自己權位的鬥爭，根本沒有為中國戰區的抗日作戰，進行任何的規畫與參謀作業。魏德邁雖然曾是馬歇爾拔擢的將領，但是他仍然發揮軍人本色的品德，優先解決中國戰區所面臨的危機，接著在一個月內，就組成了中國戰區的中美聯合參謀部，讓中美的軍事首長能夠在每週舉行的會議中，共同商討軍事與作戰的問題，以取得軍事合作的默契（這是中國戰區成立四年以來，第一次的中美高層軍事合作）。

魏德邁也從來不玩以美援做為勒索蔣介石與收買人心的監軍動作。他發

¹⁶魏德邁（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點軍校，在二次大戰前又從德國陸軍戰爭學院（Kriegsakademie）畢業，並為美國陸軍部主持了反攻歐陸之作戰計劃（The Victory Program）的設計，他可以被稱為盟國的首席「大戰略家」。但由於魏德邁對中國在二次大戰的貢獻與受到盟國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瞭解，而堅決反對馬歇爾、杜魯門不合理的中國政策（不僅沒有正義，亦根本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卻因此犧牲了他個人的整個軍旅前途。他於一九八九年去世。

現整個中國戰區的美援數量，竟是只夠一個美軍師的消耗量（每月二萬一千噸，而中國戰區當時有六百個師部隊），單是這種稀少的後勤供應，若是換成任何另外一個國家的部隊，早就戰敗投降了。他親自深入中國部隊，實事求是地了解問題所在，向蔣介石提出全面改善軍事訓練、後勤補給軍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議，建議中國必須設法縮減軍事單位的數量，及充實軍中的員額。由於魏德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誠懇待人的態度，蔣、魏之間幾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賞識的合作關係。蔣介石也同意參考美軍的編制，改革中國的部隊組織與訓練，特命何應欽成為陸軍總司令，負責調訓改編現代化的中國部隊。

魏德邁為中國戰區的利益，爭取更多的支持，他對於陳納德的空軍作戰計畫，給予優先與肯定的支持，使得空軍迅速在中國戰區恢復戰力，能夠連續重創日軍的攻勢與切斷日軍的補給，穩住中國戰區的局勢。同時魏德邁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此時已經出任駐華大使）合作，向美國政府提供正確的中國戰區情報。而魏德邁發現，原來英、法、荷等盟國，為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夠重新控制自己在亞洲殖民地的利益，竟然在中國境內，建立一個反華的情報系統，專門蒐集各種不利中國政府的情報，以提供媒體報導與其政府決策所需的材料；同時設法與中國內部的軍政勢力人物建立關係，以煽動他們進行權力鬥爭，用來削弱中國抗日的力量。更為可怕的是，這個顛覆中國的機構，根本無關抗日戰爭的軍、情工作，竟然可以享用極其稀有的駝峰空運之美援物資。因此魏德邁立刻停掉給這些機構的物資供應，赫爾利並且通知美國政府，提防這些「盟國」在華的陰謀。

魏德邁的做法，不但使得中美關係轉危為安，同時中國戰區的情況，也出現快速的好轉。日軍最後不但在發動進攻四川的決戰上，遭到中國軍隊有力的反擊，同時在華南的日軍，也受到盟國空軍，與華軍越來越強大的壓力。魏氏很快地就讓美援物資，發揮最大的作戰功效，他設法調訓與裝備中國三十個師，使華軍擁有全新戰力新式部隊的計畫，也進展迅速。他接著據理力爭而將中國駐印軍與遠征軍，都順利調回到中國戰區。魏德邁計畫，運用這些受過美式裝備與訓練的華軍，最遲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開始反攻華南，目標是先收復香港與廣州。只要中國能夠打通海港，美國的援助將會讓華軍的戰力大幅的提升，而將會對日軍展開致命的攻勢打擊。同時中國的強大，也是亞洲戰後安定的力量。

馬歇爾作夢也沒有想到，魏德邁會這樣實事求是，解決了中國戰區問題。魏氏原先是馬歇爾極其倚重的屬下，也是美軍擊敗德國之戰略計畫的核心設計幕僚，但是魏德邁到了中國之後，發現了中國戰區的抗日實情，主要的麻煩製造者，竟然是盟國錯誤的策略，因此不肯附和馬歇爾的路線。羅斯福總統更是覺得稀奇，中國戰區長達三年半的各種主要問題與困擾，竟然完全「消失」了。可惜的是，羅斯福已經瀕臨死亡邊緣，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但是馬歇爾沒有放過對中國的打壓。反正盟國已經有雅爾達密約的這張王牌，可以讓中國在戰後無法翻身，如何算計中國，可以慢慢設法，但是要先把陳納德好出一口氣。在馬歇爾、安諾德的壓力之下，陳納德眼見勝利在望，魏德邁的工作又日漸有功，在不願影響到魏氏工作的前提下，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退休離華。魏德邁當然知道，這是一個警告，假如自己想為中國出力，自己將不會再有前途，但是他仍然決定，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為中國戰區爭取最大的利益。此時歐戰已經勝利，他得到許可，接洽在歐洲作戰成功的名將如巴頓（George Patton）、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等人，要借用他們作戰指揮的才能，前來中國戰區負責指揮美軍反攻，絕對不能讓蘇聯席捲中國的北方。

不過，此時的日本政府，已經失去了作戰的意志，在美國扔下原子彈，以及蘇聯參加劫掠東北戰利品的衝擊之下，日本就倉促地投降了。由魏德邁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與所邀請的美軍指揮官，當然就沒有機會在中國戰區，證明自己的戰力。魏氏又立刻設法安排各種運輸的支援，由中國軍隊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宜，並且希望能夠全力支持中國的戰後復員工作，但是馬歇爾立刻下令，魏德邁的任務到此為止。美國政府為了優先遣返在中國境內的日軍、日僑，竟然挪用了大量援助中國的經費，在一年的時間之內，就限時完成了這個照顧前侵略者的龐大任務，卻把中國的復原和重建家園的沈重工作，全都扔給這個已耗盡一切國力抵抗共同強敵的盟友，讓她自己去承擔。

檢討整個中國與盟國合作的戰爭的歷史，再也沒有比史迪威事件，更為影響中國戰區之戰力的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戰區，能夠在統帥與參謀長公然對立與制肘，同時參謀長還控制後勤分配，並可以阻礙空軍指揮權運用的情況下，還能展現戰力的。而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不但刻意造成中國戰區內部全方位的權力鬥爭，又做出錯誤的戰力抽調與分配，並使得中美之間

的合作關係不斷出現摩擦，最後中國無法展現她的抗日實力，而遭到了盟國聯手出賣的命運。

中國抗日戰爭的光榮勝利，最後會演變成爲一個悲劇，「史迪威事件」具有歷史性的關鍵影響。日皇裕仁實在應該頒發一枚「大和」獎章給史迪威，表彰他在中國戰區進行的全面分化，使得日軍能在最後的決戰中，展現銳不可當的攻勢。而沒有能夠及時撤換史迪威，更是成爲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一個最爲嚴重的錯誤決定。假如中國戰區早就以魏德邁或是陳納德出任參謀長，中國會很快地學習到如何將部隊現代化，如何爭取空軍的支援，而能在戰場上擊敗日軍。中國與美國也不會產生如此多的（根本不必要的）磨擦與對立，蘇聯也就揀不到雅爾達會議的便宜，那麼整個抗日戰爭歷史後半段的結果，必定全然不同了。

保衛重慶

發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會戰與常德會戰，是美國開始介入中國戰區之後的主要對日作戰，中國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軍援助之外，可以說戰力並未得到美國的援助而實質地增進，卻必須要不斷地應付來自美國關切的壓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戰報」疑點，對於中國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國對於中國戰區地位的輕視，以及影響到中國上下團結一致的抗日精神，為明年的日軍最後攻勢，伏下了全面潰敗危機的根源。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重慶就代表了中國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對於重慶是恨之入骨，日軍曾經企圖以各種方法，來消滅或是摧毀重慶，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對於重慶進行日以繼夜的大轟炸，造成平民高達上萬人的死傷，但是所有的中國軍民仍然不肯屈服，重慶仍然是抗日的中心。日軍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再度對重慶發動長期的戰略轟炸，特別是在八月份，日本飛機的炸射簡直沒有一天停止過。當時中國的空軍，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無法阻止日機的襲擊，重慶幾乎被炸成廢墟，而中國的軍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機攻擊的危險下，但仍然繼續堅持自己的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重慶精神」成為日本皇軍無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當日本南方軍順利攻略東南亞與太平洋的戰略目標之後，回報日軍大本營：『南方軍之戰略任務已經完成。』日本是絕對沒有想到，先進西方國家的軍隊，是這樣不堪一擊，而對照之下，中國軍隊竟然是如此頑強不屈。日軍大本營在狂喜之餘，開始籌畫下一階段的戰略任務。對日本來說，冷酷的現實是中國的頑抗，假如中國事變沒有結束，日本就別想執行其他任何的戰略構想，因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夠分配。

所以日軍大本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盤檢討整個戰局之後，開始傾向接受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建議，就是日本對外作戰問題，是從中國戰場開始，就要儘量設法先結束在華作戰的觀點。因為只要「中國事變」不能告一個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夠的兵力，完成其控制東亞，與德國會師中東的戰略計畫。中國在抗日戰爭所表現出來的無限韌性，真是叫當時「無敵的皇軍」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軍曾經研擬進攻四川的五號作戰計畫

日本的大本營考慮到，既然重慶的國民政府絕對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汪精衛的偽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軍準備對於重慶政府，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打擊，直接進攻四川與席捲雲南，以擊潰中國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來解決「中國事變」了。何況此時正是反法西斯盟國的軍力最為低迷的時刻，在西北與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斷的情形下，中國的實際外援已被掐斷，正是日軍一勞永逸解決中國事變的最佳時機。

日軍直接攻佔四川，以解決中國事變的戰略構想，特別受到日本中國派遣軍的支持。中國派遣軍與日大本營在經過多次的協商之後，決定將日軍進攻四川的計畫，定名為「五號作戰計劃」，並且準備在日本國內，再動員二十三萬的後備軍人，以支持中國派遣軍進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軍名將冢田攻中將，特別從南方軍總司令部，調派為在武漢的十一軍司令官，日軍正是準備將當時的第一戰將，擔任進攻四川的先鋒指揮官。

當時日軍擬定的五號作戰計劃，是準備由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指揮，分成南北兩路向西進攻。日軍準備特別組成第五方面軍，統一指揮第一軍、第七軍與第二十八軍，共十個師團，是為北路軍，先由山西、河南交界處，分道渡過黃河，西攻關中平原與陝北，在擊潰延安與西安的中國守軍之後，主力

向南旋轉，越過秦嶺，與由漢水進攻漢中盆地的另股日軍會師，由北方的側背進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漢十一軍的五個師團組成南路的日軍，則由長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華軍在三峽山區的防線，直接攻入四川的東部，然後將兵力直指重慶。攻入四川的兩路日軍，最後在重慶會師，攻佔整個四川，再乘勝掃蕩華軍對外聯絡的基地雲南。這樣可迫使抗日的國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敗退，或是向日軍屈服求和，或是淪為地方游擊政府。日本希望這樣就可以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以調出部隊準備與盟國進行決戰。在日軍準備攻勢的壓力之下，當時的蔣介石甚至考慮過，假如四川遭到日軍攻陷，他將準備將國民政府遷到西康，繼續進行抵抗。

但是當日軍的五號作戰計畫所需之後勤準備與兵力集結，都在曠日費時地籌備時，日軍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線，因為開始受到美軍的反攻，而出現逆轉的狀況。一九四二年八月，美軍開始以強大的兵力，反擊日軍在所羅門群島以及新幾內亞的前進基地，迫使日本大本營決定，抽調在中國戰區的部隊與後勤支援，優先到南太平洋地區，設法頂住南方軍不利的戰局。

此時，日軍大本營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援中國派遣軍的五號作戰計畫，甚至還要從中國境內抽調兵力支援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營在一九四二年底，被迫決定中止五號作戰計畫，並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國派遣軍，設法維持在中國戰區現有的戰略局勢，而放棄執行進攻四川的構想。日大本營的決定，令中國派遣軍非常失望，第十一軍司令官冢田攻，雖然準備採取獨立的西攻計畫，但是他的座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國砲火擊落身亡。日本中國派遣軍進攻四川的行動，也就完全的停頓下來。

放棄進攻四川的「五號作戰計畫」，可以說是日軍在基本戰略上極大的失策。因為日本最高軍政當局，到此時雖然已看出，能否結束在中國戰場的戰爭，是日本整個大東亞戰爭勝敗的關鍵所在，但是它卻沒有斷然執行的決心。日本一則就要不惜代價地全力執行五號作戰計畫，以將中國的國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擊政府，要不然就要設法提出中國能夠接受的和談條件，好將日軍從中國的戰略陷阱中抽出，否則日本主要的軍力都陷在中國戰區，最後只有面臨慘敗的結局。

因為以日本這樣一個作戰資源有限的國家，絕對不能同時陷在中國的戰略泥淖之中，還能有能耐與國際強權在另外的戰線作戰。日軍大本營竟然為西南太平洋的戰局出現了初期的逆轉，就放棄在中國戰區的決定性攻勢，

足見日本軍方的最高領導人，根本就沒有掌握到日本戰略勝負的關鍵所在，又如何能夠贏得這場歷史大戰的全面勝利？

32.2 驚動國際瞻觀的鄂西會戰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大本營調出王牌，指派關東軍第四軍司令官橫山勇中將，出任武漢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是日本陸軍中，一員戰功赫赫的虎將，他出任十一軍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國戰區的日本戰略機動部隊，雖然日軍大本營放棄了五號作戰計畫，仍然設法運用現有的日軍兵力，增加對中國作戰力量的打擊。

橫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後，徹底地研究過日本第十一軍的戰略狀況。他發現十一軍，在經過三次長沙會戰之後，對於挑戰薛岳所指揮的華軍第九戰區，以及向南進攻長沙，都已有些怯戰的心態，所以在沒有增加兵力的狀況下，日十一軍不宜再攻長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號作戰計畫中，十一軍的作戰任務，因此橫山決定要測試一下，日軍能否通過這個複雜地形的阻礙，以及考驗一下中國第六戰區的防衛力量，以備日軍未來若是進攻四川，增加實戰的經驗。

此外橫山也在考慮，日軍若是進攻位於宜昌與長沙連線之間的常德，不失為一個可以迫使華軍兩個戰區發生難以兼顧的打擊點。同時日軍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脅貴州與四川。當然橫山還有一個打算，就是日軍的補給已經開始受到壓力，日軍需要設法從中國掠奪糧食的供應，常德地區是洞庭湖以西的糧食中心，所以橫山決定率領十一軍，轉攻宜昌與常德。

橫山所策畫的作戰計畫，事先是經過非常細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逐步增加十一軍的作戰力量，並且開始經略長江以南與洞庭湖以北的地區，先後增兵控制了長江兩岸的沙市與石首，然後準備對第六戰區發動攻勢，掠奪中國在宜昌的長江船隊，以及湖南北部的糧食，以增加日軍水運船隊的能力，同時順便測試一下中國第六戰區防衛四川的作戰實力。由於日本十一軍在這個地區的加強活動，使得中國的第六戰區也將部隊調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橫山勇極其擅長多路兵馬同步出擊，以及迅速改變進攻戰線佈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橫山勇指揮十一軍的部隊分頭出擊，一路日軍從沙市渡過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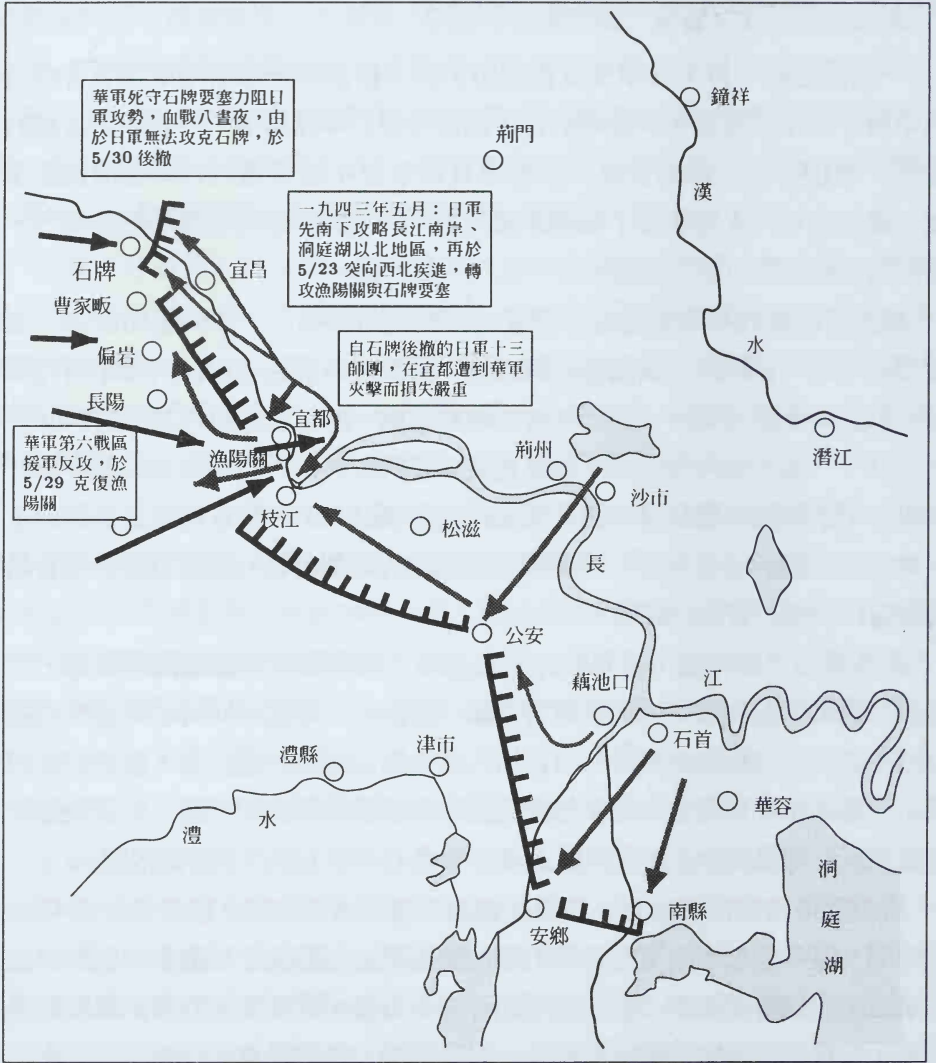


圖 32.1: 鄂西會戰圖

江，開始進攻公安一帶的長江南岸地區，另一支部隊由石首與華容向洞庭湖一帶的地區深入，並且到處劫掠糧食。接著橫山勇又從宜昌派出部隊，向南渡過枝江，擺出夾擊洞庭湖北部華軍主力的陣勢，因此造成中國的第六戰區判斷，日軍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勢，目標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軍防禦常德外圍陣地。

32.3 中國的「史達林格勒」

不料橫山勇卻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變日軍進攻方向，向西轉北疾進，同時命令宜昌的日軍向西出擊，沿江逆流進攻石牌要塞，並且渡江攻佔戰略據點漁洋關，掩護主力部隊向石牌要塞，進行多面圍攻。橫山勇的這項作戰佈局，甚至引起日軍的參謀總長杉山元的關切，親自前往漢口，視察作戰佈署。橫山更是將十一軍司令部移到宜昌，以親自就近指揮日軍進攻石牌要塞。日軍的企圖是，假如能夠突穿華軍在三峽的防線，就可以威脅重慶的安危，進而造成國民政府全局的混亂。

這時中國的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正在雲南與史迪威籌組遠征軍，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孫連仲，務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長江往四川的通路，絕對不能輕易地調動江防軍去支援長江南岸的作戰。因為陳誠認為，第六戰區的最主要責任，就是守住四川東部，以屏障重慶的安全，這個地區的安危，牽動整個中國戰區的民心士氣，因此不可以有所閃失。當陳誠接到日軍轉變進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趕回恩施的第六戰區司令部，親自指揮自己的嫡系十八軍，死守石牌要塞與外圍陣地。

果然日軍的攻勢，原有引誘華軍出擊護糧，甚至防衛常德的策略，然後再乘虛襲擊石牌要塞，以威脅重慶的安全。但是陳誠下令江防部隊，絕對要堅守長江通往重慶的陣地，結果日軍的主力作戰，雖突然改成從宜昌向四川進行的突襲，卻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軍阻擋下來，沒有成功地突穿華軍防線。

五月二十七日，日軍在長江水道中，劫掠了兩萬噸的各型船隻，以及不少的糧食補給，日軍藉此進行大肆的宣傳，希望能夠動搖中國部隊的戰略佈署。但是陳誠不但不為所動，反而將在雲南集結待訓的部分遠征軍，抽調到石牌作戰，五月二十九日，華軍收復漁洋關，威脅到日軍攻擊石牌要塞的側

背。

而在重慶的蔣介石，也感到這場作戰的重要性，因此宣佈石牌要塞是中國的「史達林格勒」，絕對要死守不退！在戰況進入危急之時，蔣介石甚至一度準備親自前往前線指揮作戰，並且動用衛戍重慶的預備隊，投入戰場決戰。而華軍的各路兵馬，更是奉到蔣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軍的支援之下，也開始匯集圍攻日軍。這時進攻的日軍，在漁洋關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戰八個晝夜後仍無法攻破，因此橫山不願戀戰，以免遭到損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橫山下令日軍退回長江北岸，但後撤的日軍第十三師團，在宜都遭到華軍的夾擊，受到嚴重的損失。

這場稱做鄂西會戰的作戰，相當受到美國政府的注意，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正在為如何援助中國而進行決策上的爭辯（當時宋子文與宋美齡都在華盛頓進行遊說），其中又以中國能否有能力協同美國作戰，早日擊敗日本，最事關重要。因為美國政府參戰的基本立場，是如何能以最少代價與最短時間擊敗日本，列為它最優先的戰略考慮。假如中國是個扶不起的阿斗，那麼美國政府就只能依賴蘇聯的參戰，來減輕美國對日本作戰的壓力。因此華軍宜昌的作戰成果，就成為中國展現戰力的指標。

32.4 史迪威的謊言

雖然中國軍隊成功地擊退日軍的猛烈攻擊，但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實在無法確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邊」的參謀長？），他本人既不前往戰場實際地察看，又不察核華軍所呈報的戰況，卻基本上引用日軍的宣傳資料，就向華盛頓提出報告，說鄂西會戰，中國方面是虛報戰功。史迪威聲稱，日軍的出擊，只是為了劫掠糧食與船舶而已，根本無意進攻宜昌外圍而進入四川防區的陣地；他嚴厲指責華軍竟然不敢出戰護糧，反而虛報日軍猛攻石牌要塞，其實日軍並無進攻四川的攻勢作戰，日方更沒有遭到重大的損失。馬歇爾當然把這個戰報，做為遊說羅斯福總統不要援助中國戰區的「第一手情報」。

事實上，這場作戰中，日軍的參謀總長杉山元還為此親自到達漢口，實地關切日軍對於宜昌的攻擊，因此這次作戰絕對不是日軍的劫糧行動而已，而是企圖進攻四川的測試攻擊。史迪威的說法，根本就是記錄抄襲「東京攻

瑰」的廣播詞，卻成爲他給華盛頓的一手機密報告。由於他對中國戰區的報導極其不利，因而嚴重影響到美國軍事決策階層，對於中國戰區的印象與支持¹。

因此在鄂西會戰的戰場上，日軍是付出很高的傷亡代價，同時並未獲得攻擊的勝利。但是不幸在國際社會的宣傳上，日軍卻因有史迪威與美國媒體報導的支持，而大獲全勝，那就是中國軍隊根本不堪一擊，對日軍的攻勢作戰只會進行龜縮的自保。這場作戰的不實報告，事關重大，因爲它開始影響到羅斯福對於援助中國的基本信心。羅斯福從此開始有些認爲，中國無力協助美軍擊敗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需要找蘇聯出兵；至於援助中國，則只要稍爲應付一下，無需給予大量的援助。後來史迪威在開羅，向羅斯福又保證，『只要日軍再打一次鄂西會戰級的攻勢作戰，蔣介石絕對潰敗，』以增加羅斯福決定縮減支援中國作戰的決心。

橫山勇發動的這場鄂西之戰，已經測試出中國部隊據守四川東部的實力與決心。橫山看得出來，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進攻四川，日軍很難有突破第六戰區的勝算把握。因此他決定，十一軍既不宜進攻長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這樣一來，適合日軍進攻的目標，就是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 片瓦無存的常德會戰

橫山勇希望能夠在常德一戰，能夠同時迫使中國的第六戰區與第九戰區的主力出動決戰，假如橫山能夠在常德大破兩個戰區的華軍，將可奠定十一軍壓制華軍戰力的基礎。此時日軍大本營對於中國軍隊準備與盟國，在緬甸北部發動攻勢，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軍進攻常德，可以牽制中國軍隊，無法放手在緬甸作戰。因此日軍大本營在核定十一軍進攻常德方案時，要求延後一個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開攻勢。

橫山對於鄂西會戰中國軍隊的表現，其實是相當的震驚，因此在準備進攻常德之時，橫山決定要求加強兵力，因此特別向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申請，希望能夠從駐守京滬地區的第十三軍中，抽調戰力最強的一一六師團

¹不但國際社會開始炮製中國戰區「無戰論」，就連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這個說法，說蔣介石自從武漢會戰之後，就不再與日軍進行「硬戰」。那麼三次長沙大捷、鄂西會戰、常德會戰，以及後來的衡陽會戰，所創造的血淚斑斑的英勇戰績，令日軍爲之震動，都是誰在打的？

（岩永汪），納入十一軍常德會戰之戰鬥序列。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軍反對，彼此還差點為這事件而翻臉。但是在十一軍的常德作戰為優先的考慮之下，最後由中國派遣軍司令官決定，一一六師團還是撥給十一軍，另外還設法從華北方面軍中，也調撥部隊支援。可見日軍已經認為，單憑十一軍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對第六戰區的中國部隊，進行有效的打擊（橫山勇幸好有這個先見之明，否則常德會戰，日軍就難以全身而退了）。

橫山進攻常德的作戰計畫，相當的著重欺敵的變化，橫山準備進行多組進攻路線，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個鉗形攻勢。同時日軍更為大膽的決定是，橫山下令進攻常德的日軍部隊，少帶糧食而多帶彈藥，日軍所需的糧食，將從洞庭湖地區，直接劫掠中國農民的儲糧，參戰的日軍高達五個師團以上，都以秘密運動的方式，前往攻擊發起線。

正當日軍全力集結兵力，準備進攻中國的第六與第九戰區之際，中國戰區最高的權力機構，正為史迪威事件，而爆發另外一波全面的內鬥。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運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間的關係，以及馬歇爾的支持，在最後一刻，反敗為勝而留任。宋子文與陳誠的權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應欽等人的得勢，這直接地影響到第六、第九戰區指揮官陳誠與薛岳的權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軍正式發動常德會戰，東路的日軍由第三與第十三師團組成，由正面渡過長江，由東向西攻擊安鄉，而北路的日軍由六八與一一六師團組成，由常德的側背，由北向南進攻煖水與王家廠。東路日軍在突破華軍防線之後，沿著洞庭湖的北岸，向東進攻津市與澧縣，與北路日軍會師。日軍完成對澧水以北地區的控制後，立刻分兵兩路向南旋轉，渡過澧水，分別攻擊位於常德西北方的兩個據點，慈利與漆家河。

此時另外一支日軍部隊，第六八師團則渡過洞庭湖，沿著沅江的正面，直撲常德的外圍重鎮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軍對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圍的態勢。這天剛好是蔣介石率領代表團，飛往開羅，參加中英美三國領袖會議的日子，因此蔣介石特別指示，第九戰區的部隊，也要動員支援常德會戰。

常德是處在第六與第九戰區交界，屬於第六戰區管轄，這時第六戰區的司令長官陳誠，因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擠，因此已經沒有過去那種大權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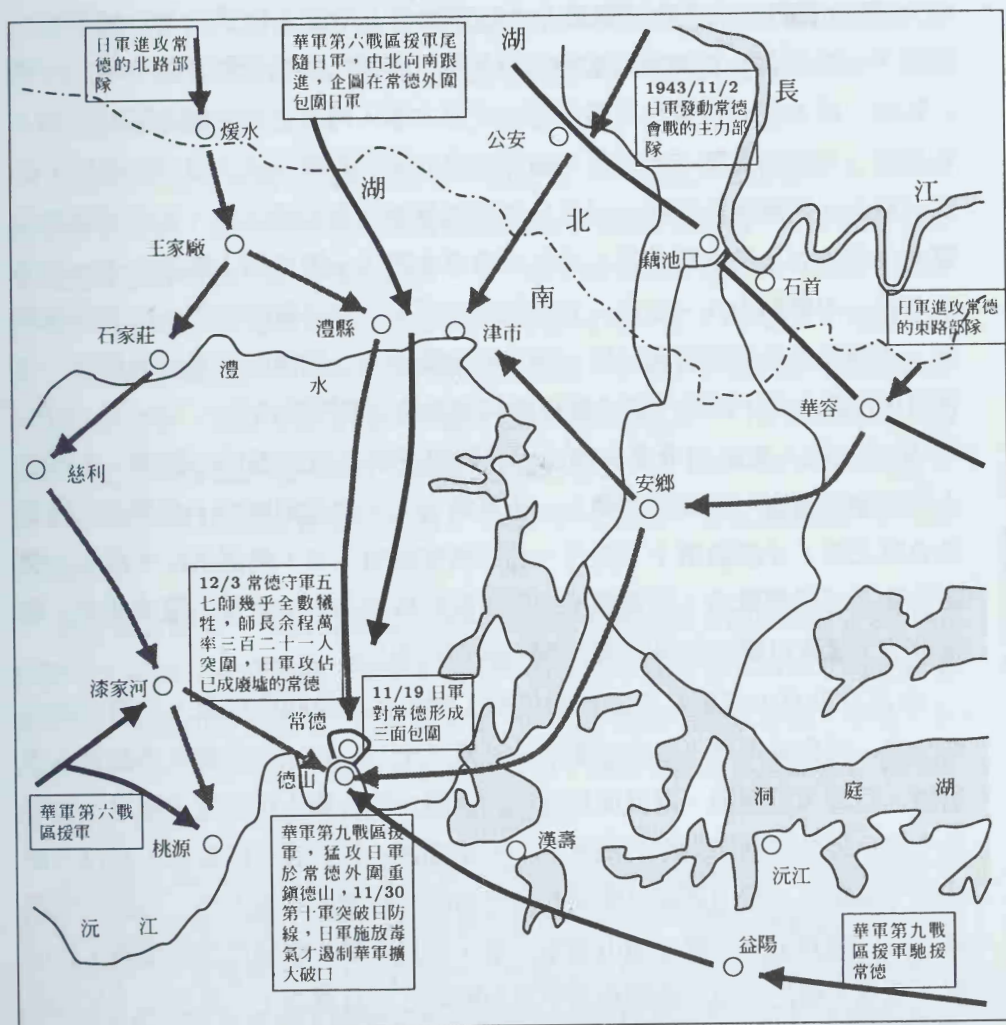


圖 32.2: 常德會戰圖

握的氣勢與決斷，而將指揮權交給孫連仲代行。

32.6 悲壯卓絕之守衛戰

當時負責防守常德的是華軍七十四軍的第五七師余程萬。七十四軍這支部隊，一直是蔣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戰區的戰略機動部隊。中國的第六戰區，原本擔心日軍在掃蕩洞庭湖北部之後，再攻宜昌外圍的戰略重鎮，有如第二次鄂西會戰，因此重兵鎮守宜昌外圍，沒有分出大軍來守常德。直到日軍六八師團進攻沅江，以及日軍攻勢全面向南旋轉之後，才確定這次日軍進攻的主力，是攻擊常德，而非向西進攻四川。因此第六戰區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發動十八、七三、七四與一百軍，尾隨日軍的後方，由北向南跟進，企圖在常德外圍包圍日軍。而當時由陳納德所指揮的中美空軍機群，也在這場作戰之中，擔任一個主動出擊與支援地面戰鬥的角色。

這時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也同樣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響，而被貼上被排擠的標籤，因此在作戰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獨斷做爲，在奉命支援常德會戰之後，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與暫編第二軍，越過沅江支援第六戰區作戰。這時華軍第十軍表現出最爲勇猛的攻勢決心，全軍以最快速度，馳援常德，猛攻日軍在常德外圍的戰略制高點德山。

日軍早就排出圍點打援的作戰佈局，開始沉著地四面接戰，只有在德山的作戰，遭到華軍第十軍的猛衝，十一月三十日，日軍的戰線竟然被第十軍突破，日軍大爲震動，再度使用毒氣的手段，防止第十軍的擴大突破。這時第十軍已經攻到常德對岸的汽車站，但是卻無法找到渡江的船隻，也沒有辦法與守軍聯絡。橫山勇眼見戰局的變化對圍攻常德的日軍不利，因此立刻調派日軍作戰的主力，圍攻德山的第十軍，並且使用空軍猛烈炸射華軍，造成第十軍重大傷亡。預二師師長孫明瑾力戰陣亡，日軍在十二月三日，又以優勢的兵力奪回德山，迫使糧彈與兵力不濟的第十軍退卻。

而負責守衛常德的第五七師，在經過十五天的血戰之後，整個常德城幾乎被日軍砲火打成廢墟，中國軍隊與日軍進行巷戰與逐屋作戰，雙方的拚鬥進入肉搏階段。但是由於援軍一直被阻在外圍，日軍甚至以開放通路撤退，以及勸降的方式，來動搖守軍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師拒絕。因此全師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戰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後才跟著師長余程萬突圍，

日軍終於在十二月三日攻佔了已成廢墟的常德。

日軍原來的作戰計畫，只想在常德痛擊第六與九戰區的華軍，並未打算長期佔領常德，因此橫山勇在攻佔常德之後，發現華軍援軍是越圍越多，因此就準備依原訂的計畫撤退。此時第九戰區的其他支援部隊，也在十二月四日陸續趕到常德，五八軍與七二軍猛攻德山，開始威脅到日軍在常德的陣地，日軍擔心遭到華軍的包圍，因此更無意戀戰，於是橫山下令攻佔常德的日軍部隊依梯次撤退。

但是這時日大本營卻突然的改變作戰計畫，參謀總長杉山元認為，日軍若是佔領常德，會有助於未來打通粵漢鐵路的戰略側翼掩護，因此急電橫山勇的部隊留駐常德。但是橫山認為，十一軍並無佔領常德的兵力準備，目前的戰線已在華軍的圍攻之下，所以斷然拒絕日軍大本營的命令，造成十一軍、中國派遣軍以及大本營之間的激烈電報戰。日軍大本營特派作戰部長真田少將到南京，前往了解實情，最後才依照橫山的意見，日軍放棄常德。這時華軍已經在常德四週，建立了可觀的圍堵兵力，十二月九日，華軍收復常德。日軍在十日開始全線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戰之前的戰線。

在常德會戰中，中國方面因為史迪威事件，對指揮系統所產生之衝突與影響，已經開始充分發酵。陳誠與薛岳一直是華軍駐守第六與第九戰區的主要戰將，但是由於受到權力傾軋與排擠，不僅作戰指揮難以發揮，後勤不足的問題，也已逐漸出現，雖然在常德會戰中，華軍仍然是英勇抵抗日軍的攻勢，但是開始失去精誠團結抗日的內在精神。

這時躲在緬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當然又向華盛頓報告，中國軍隊在常德並沒有認真地作戰，而讓日軍能夠「來去自如」²。羅斯福總統因此非常惱火蔣介石，認為蔣介石「要錢第一，作戰卻不肯盡力」。蔣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評，原本準備法辦從常德血戰突圍的余程萬師長，正好當時軍政部邀約外國記者，到常德實地考察，結果當各國記者到達常德，發現整個城市，已打到片瓦無存的廢墟狀態，中日雙方軍隊死傷之慘烈，已經超過西方國家軍隊所有作戰的標準，五七師的官兵已經是盡力而爲了，這樣余程萬師長才得以死裡逃生。在整個常德會戰中，中國犧牲了三位師長；日軍損失了

²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沒有離開野人山，如何能夠知道常德會戰的實情？

兩名聯隊長、與高達一個師團的兵力³。但是史迪威的戰報是，蔣介石的部隊沒有與日軍力戰。至今還有中國人呼應這種謊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綜論發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會戰與常德會戰，是美國開始介入中國戰區之後的主要對日作戰，中國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軍援助之外，可以說戰力並未得到美國的援助而實質地增進，卻必須要不斷地應付來自美國關切的壓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戰報」疑點，對於中國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國對於中國戰區地位的輕視，以及影響到中國上下團結一致的抗日精神，為明年的日軍最後攻勢，伏下了全面潰敗危機的根源。

此時，史迪威又一直設法抽走華軍部隊，控制美國援助華軍的裝備，以支援他在緬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戰的計畫，更讓中國戰區面臨內部空虛，與內訌再起的危機考驗。常德會戰後，第九戰區的中國軍隊，只能得到極少的裝備與兵員補充，所以一直無法從這場作戰的損失中復原，但是卻即將面臨日軍歷史性的全面攻勢作戰。

³日軍常德會戰的前線總指揮岩永汪中將，在攻克常德之後的戰報是，『常德已經自地球上消失，』可見這場作戰的激烈程度。

歷史分水嶺的開羅會議

中國在開羅的同盟國高峰會議中，雖然得到形式的禮遇與盟國支持的承諾，但是卻引發後續的全面翻案，最終讓中國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伏擊，結果是確定了盟國利用與出賣中國的陰謀。若從歷史發展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可以說是比中日之間的任何一場會戰，對於中國的影響還要深遠。中國在開羅唯一的成就就是確定收回被日本侵佔的失地，但是從此她也被盟國送上孤立與分裂的歷史悲劇之中。

中國的對日抗戰，當然沒有打到非洲的開羅，但是開羅卻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歷史性的重大影響，這是一場有關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政略會議，也是劃分戰後亞洲歷史發展的重要決策樞紐。在這場會議中，中國為亞洲爭取到未來發展的機會，卻因此為自己帶來了危機。

開羅會議是中國在盟國地位的歷史分水嶺，在會議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步步高升，中國從飽受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弱國，躍升到成為創立聯合國的四強，最後中國的領導人終於能夠與英美兩國領袖，在開羅平起平坐地討論戰爭的策略與戰後的安排。但是，卻也因為中國在開羅會議中，展現出大國的風範與復興的鬥志，因而刺激國際強權的領袖們，擔憂中國若是在戰後興起，將會影響到西方殖民主義帝國在亞洲的利益，所以丘吉爾與史達林決

定，設法設計說服美國，好一起聯手打擊與出賣中國。

若從歷史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對於中國歷史命運的影響，可以說是極端的嚴重，因為中國在開羅會議所得到盟國的允諾，在會後近乎全面地遭到翻案，在開羅會議之後，美、英、蘇等強權，開始修訂了它們對亞洲政略的目標，就是在擊敗日本之後，也絕對不能允許中國復興與強大。戰後的亞洲局勢，仍然是由西方的三強所掌控。

盟國執行這個基本策略的做法是，先以各種的政策花招，設法延遲打開援助中國的通路，這樣中國就得不到極其重要的作戰資源，中國的國力自然無法強大；同時還設法分散中國戰區最後保存的一點戰力，調往緬甸作戰，這樣中國在本國戰場上，將會遭到嚴重的挫敗，因而失去爭取國家利益的實力。然後同意蘇聯的紅軍，以「傭兵」的姿態，長驅直入地劫掠中國、分裂中國北部的外蒙古，同時英國也可以穩住它在亞洲殖民地的利益。戰後的中國則因為國力完全的耗盡，只能擁有戰勝國的虛名，不但無法為自己在國際間爭取到應有的權利，在國家重建上，更是百廢待舉而無法施展，這樣當然會產生強大的民怨，而累積內戰的火種。

33.1 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的珍珠港，迫使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正式凝成一個新的盟國結構，這對於中國而言，她才正式結束了長達四年，單獨對日本的孤軍奮戰。中國與盟國並肩作戰，正是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死裡求生的戰略規劃，就是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也是中國用無數的犧牲所支撐到的決定性時刻之來臨。但是中國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正要開始面對另外一場更為艱苦的歷史命運考驗，就是盟國的欺凌與出賣。

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夠真正能有實力與日本法西斯作戰的盟國，只有中美蘇英的四強而已，但是英、美、蘇三國都曾參與了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陣營，對於中國進行了肆無忌憚的侵略，並取得剝削中國的各種特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英美等國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不斷地侵略中國，這些國家都沒有依據國際社會的公理，主持應有的正義，也沒給與中國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擔心自己會捲入與日本的軍事衝突之中。但是當在日本侵略的

矛頭，指向它們，並以秋風掃落葉般地将它們打得潰不成軍後，這才想到，中國是對日戰爭中，作戰最久與犧牲最大的伙伴，假如沒有中國撐住半邊天，整個反法西斯戰局的歷史必然要重新排列過。

事實上，西方國家在中國開始獨力進行抗日戰爭，展現不屈不撓的作戰意志之後，就對中國開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強權國家開始研議，將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考慮廢除與中國所訂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以做為對中國努力自衛成果的尊重與回報。

到了珍珠港事變爆發，西方國家在東亞才真正面對日本軍力的打擊。這些世界級的強國，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日軍攻擊後，幾乎全面潰敗，這時他們才真正地親身體驗到日本皇軍的威力，因此對於中國的獨力抗戰，更是增加了尊敬，當然立刻把中國納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之中，並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發表之二十六國的聯合國宣言中，中國名列發起國家之中的四強。

當時美國與英國政府，更是願意優先考慮對中國的援助，因為他們在東亞與太平洋的作戰，可以說是一敗再敗，所以急切需要中國替他們先頂住日軍的攻勢，並吸收日軍的壓力，以分散日軍的兵力，他們不敢想像，假如中國放棄對日軍作戰，超過八十萬的日軍可以轉攻印度、中東，或是南太平洋，盟國可能就無法擋得住法西斯的攻勢了。

因此美國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國會批准，以五億美元的信用貸款給中國周轉（信用貸款不同於援助，將來要歸還的），以協助中國穩住戰時日益匱乏的經濟。另外英國也幾經談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萬英鎊的信用貸款，支持中國的戰時經濟¹。

同時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也覺得中國已經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若是仍然對中國保有帝國主義侵略時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說不過去，何況日本政府也裝模作樣地宣佈，要放棄對汪精衛偽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所以他們也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以終止這些不平等條約。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國家帶頭宣佈，廢止過去所有對中國各地的租界權（除了九龍、新界的租界之外）、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中國境內駐軍權，以及賠償的款項；接著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與中國政府完成平等

¹不過事實上，由於英美兩國政府的官僚體系阻撓，這兩筆貸款一直沒有爽快與及時地撥給中國使用，而是催一下、給一點，弄得中國政府在調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實上，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雖然窮，但是宋子文管理財政，從不要外國施捨，也極不肯發行外債。假如中國若不是因為對日本作戰，國民政府的財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向外舉債。同時中國的外債償還信用極高，過去各種的桐油借款、棉麥借款，中國都是依照規矩，絕無拖欠。

互惠的新約，從此中國才真正成爲一個主權獨立與國格平等的國家。

這是自從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所簽下南京條約之後一百年，也是中華民國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後，中國才真正「暫時」得到國際地位的平等²。這完全是靠中國全體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流血犧牲，才換得這樣的成就。

在觀念上，由於美國本身是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歷史，使得美國有著反殖民主義的背景與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曾經提倡民族自決，而與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起了嚴重的摩擦。可是在抗日戰爭之前，美國本身也沒有以身作則，完全放棄在中國所擁有的帝國主義特權利益。不過單就美國能夠肯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極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堅持要中國參與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強地位，就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有其特別的歷史眼光與領袖胸襟。但是也就因爲美國如此公開肯定中國的貢獻與影響，就種下中國要在盟國的政略中，遭到被陰謀出賣的命運。

當時的「大英帝國」，在遭到德國凌厲攻勢之下，幾乎已經無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國給予極大的軍經援助，英國才勉強地撐住局勢。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後，英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確定美國「先歐後亞」的戰略秩序。英國首相丘吉爾非常擔心，美國會急於先報日本偷襲珍珠港之仇，而進行「先亞後歐」的戰略安排。若是亞洲殖民地會先光復，而宗主國卻還在苦戰之中，那麼殖民帝國將會無法維持下去。

同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帝國蘇聯，一樣被納粹德國打到幾乎亡國，也是靠著美國大量的軍援，才轉危爲安。蘇聯最希望的是，美國全力援助蘇聯，但是絕對不能同時分給中國所需的援助。因爲假如中國獲得幫助，她必然能夠展現戰力，那麼蘇聯就失去侵略中國的機會了。

在美國的許多軍政領導人中，也很清楚這個決策的歷史性影響，因爲假設美國優先在太平洋反攻與優先打通緬甸援助中國，這樣亞洲會先得到和平與解救，而歐洲卻仍然在戰火中掙扎，那麼西方國家，將面臨自新航路發現以來，從主導全球歷史主流的龍頭退位的挑戰。丘吉爾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國最後的國勢，因此立刻趕到華盛頓，設法讓美國政府接受「先歐後亞」的戰略優先秩序。結果是美國幾乎將八五%的作戰資源，投入歐洲，剩下十五%投入亞洲，能夠援助中國的數量，更是微不足道。

²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中國又失去這個地位。蘇聯對中國「友好同盟」的邦誼可見一斑。

但是羅斯福總統念念不忘他的亞洲戰略佈局，就是大量援助英勇的中國部隊³，成為對抗日軍的主力，這樣可以減少美軍的傷亡與提早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丘吉爾當然極力反對羅斯福援華的戰略構想，因為丘吉爾早就開始在盤算著，如何在戰勝後繼續維持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亞洲策略是，擊敗日本，扶植法、荷，壓制蘇聯，與孤立中國。這樣英國才能在戰後繼續維持其日不落帝國的利益。史達林更是計劃著要擴大侵略中國的策略，哪裡肯讓中國獲得援助？因此蘇聯主動切斷了中國西北的國際援助通路。

33.2 盟國爭取私利而出賣中國

說起對日本作戰，英美兩國可以說是心情矛盾。在歷史上，美國開啓與協助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美國的輿論與政策，都是傾向支持日本。而英國更是在一九〇二年與日本結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國際戰略地位。因此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是得到英美最多友誼與支持的國家。不料日本因為要想稱霸東亞，仍然與英美產生了利益競爭，最後惡化成爲戰爭衝突。日本想要東南亞的戰略與經濟資源，就不得不與英美的利益發生衝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亞洲人團結，推翻歐洲人殖民統治的口號，更是讓英國感到危機四伏。

有了這個歷史的過節，更讓英國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與扶植亞洲國家的興起，否則大英帝國就要退出亞洲與歷史的舞台了。特別是蔣介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爲了鞏固亞洲地區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圖介入印度與英國的政治爭議；中國主張朝鮮與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更是威脅到西方殖民主義的戰後復辟。因此丘吉爾的亞洲戰略，就有爲了英國的利益，而要出賣中國前途的構想。

而蘇聯完全繼承帝俄對於侵略中國的「歷史大業」，要在中國尋找可以進出太平洋的不凍港，同時要瓦解這個土廣民眾的大國架構與格局。因蘇聯同時面對與日本競爭與對立的挑戰與威脅，因此史達林棋高數招、將計就計，讓中日之間先爆發戰爭的衝突，然後有限度地支持中國對抗日本，這樣日本與中國互相消耗國力，蘇聯就可以更爲容易的侵略中國，蘇聯也就不必擔心與日本的決戰軍力。

³請參看本書第二十八章，在長沙會戰後，美國對中國表達之敬佩與讚揚。

史達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蘇聯，雖然是一個歷史危機，但是更是一個歷史擴張的重要轉機，因為西方國家爲了這場戰爭，付出傷痕累累的代價；爲了戰勝軸心國，顧不得意識形態的對立，更拉攏與支援蘇聯參加反法西斯的戰爭。這樣蘇聯可以用美國提供的力量，擊敗德國，擴大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地盤，再利用對日本作戰的機會，掠奪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奠定蘇聯在亞洲發展的基礎。

因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國中，只有美國想要給戰後的全球，一個更爲公平與自由的世界。美國除了全力支持英國與蘇聯在歐洲擊敗德國之外，也想給中國一個復興與發展的機會，以中美英蘇四強國，構建戰後國際新秩序的結構。羅斯福總統的四強架構，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歷史遠見的看法，因爲他認爲西方國家不能排斥蘇聯於國際社會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國的潛力與意志。

但是羅斯福卻錯估了丘吉爾挽救大英帝國的謀略，以及史達林構建赤化世界的陰謀，會對世界在戰後的正義與和平，產生無法估計的負面影響。首先蘇聯對於中國加入四強的反對最深，英國也有極大的意見，但是在羅斯福的堅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終於在莫斯科發表了四強宣言，從此中國躋身在這個全球最高身價「俱樂部」的鬥爭之中，但是當時中國的國力仍然有待發展，她也沒有多少外交折衝的能力，因此在國際強權的鬥爭之下，中國就面對另外一場更爲艱苦的政略戰爭。在這個戰場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與日軍拼幾場大會戰的勝負，對於中國利益的影響還要深遠。

英美兩國以血濃於水的歷史關連，建立了緊密的對抗法西斯盟國關係，英美成立了聯合參謀會議，共同決定兩國的戰略合作、發展關係。但是英國最終的目的，不在構建戰後的和平，與歷史的正義，而是企圖挽救大英帝國的歷史衰頹。丘吉爾看出史達林的謀略，志在利用這個歷史的機會，以赤化而稱霸全球；同時也看出蔣介石復興中國的決心，因此丘氏認爲，打敗德國與日本，只是鞏固大英帝國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蘇聯的擴張與中國的復興，才是英國的歷史謀略所在。

所以丘吉爾的謀略是，假如不能壓制蘇聯在歐洲擴張勢力，就不如將蘇聯的勢力，同時帶入亞洲，美國將會立刻遭到蘇聯全面的挑戰，因而使得美國不但無法挑剔英國維持殖民帝國的政策，甚至還要拉攏英國支持美國來對抗蘇聯了。因此丘吉爾提出一個銳利但是關連的戰略，假如美國支持英國在

歐洲的地中海計劃，英美聯軍由地中海的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北上，與蘇聯軍隊在東歐會師，攻擊德國，那麼英國就答應中國與美國的要求，反攻緬甸，打通支援中國的交通線；假如美國堅持從法國開闢攻擊德國的第二戰場，那麼英國就不會支持中美反攻緬甸的提議。

從戰略觀點而言，英美盟國從地中海北上，與蘇聯軍隊會師，然後一起由東向西進攻德國的方案，與英美聯軍由法國登陸，由西向東夾擊德國的方案比較，前者可以說是非常不合戰略的常理。因為無論從作戰效果、後勤支援以及西歐國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當然都是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以夾擊德國的作戰方案，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爾的地中海作戰方案，幾乎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奇想」，美國軍方人員，在審慎評估這個英方的作戰方案時，發現在後勤與軍力調動上幾乎都不可行，何況美國已完成直接渡過英法海峽，及早在西歐打開第二戰場的方案⁴，可以迅速擊敗尚未進行西線防禦作戰的德軍。因為當一九四三年，德軍主力都在東線與蘇聯部隊進行決戰，美、英國部隊可以說是乘虛直搗德國，甚至可以迅速將軍力由西延伸到東歐，防止蘇聯對東歐的席捲。但是丘吉爾卻將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戰方案，作為英國玩弄政治權謀的棋子，硬是把美國軍方所定之反攻歐陸的日期往後拖。而蘇聯當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戰方案，因為這樣一來，蘇聯的整個世紀擴張計劃，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牽制。結果在英美中蘇之間，就產生了決定歷史命運的政略與戰略的選擇爭辯⁵。

另外，丘吉爾對於蔣介石的「野心」，也有極強的反應，蔣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訪問印度，企圖調停印度與英國之間嚴重的政治糾紛。其實蔣介石訪問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夠勸服印度尋求獨立的領袖們，如甘地與尼赫魯等人，能夠先共體時艱，協助英國人擊敗法西斯力量的威脅，以後再談獨立與自治的問題。但是蔣介石的訪問，並沒有贏得印度領袖的友誼，而更使得丘吉爾滿心的不高興，認為蔣介石竟然要串連印度，來瓦解大英帝國。加上蔣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負的著作《中國之

⁴美國提出的整套方案，代號為 BOLERO 及 ROUNDUP，計劃盟軍集結總數超過一百萬人的優勢兵力，集合海、空軍的支援打擊，於一九四三年夏由英國渡海反攻歐陸。但丘吉爾用盡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英國想藉延長大戰的時間，把德國徹底消耗掉，好讓英國一勞永逸，從此少了一個最頭痛的競爭對手。

⁵有關丘吉爾由地中海仰攻德國的奇想，做為英國的政治鬥爭手法，魏德邁在其《Wedemeyer Reports!》一書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評。

命運》，表達了中國抗拒帝國主義侵略，與在世界尋求發展和復興的決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者，強烈的反感，丘吉爾與史達林當然都看出蔣介石要帶領中國走向獨立強大之路。

由此可見，盟國之間的政治立場紛歧，以及彼此對於戰略的方向的衝突有多深。因此羅斯福總統認為對於戰後的秩序、國際利益的分配與安排，都需要及早舉行四強的高峰會議，因此他一再出面邀請，史達林前後拒絕了七次，蔣介石也不願意主動的拜會羅斯福⁶。只有丘吉爾再三的糾纏羅斯福，要推銷以英國利益為觀點的戰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與羅斯福會面十一次，不但爭取到美國對英國的全力支持，甚至一些政略安排使得美國爲了英國的殖民利益，而不自覺地扭曲了美國國家的利益。

33.3 美國支持中國的立場

但是羅斯福一直認為，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強領袖，不能總是避不見面，許多重大的決策，不能只靠部屬的傳話與協商，因此在羅斯福的再三情商與利誘威脅之下，四強領袖會議終於分成兩個梯次舉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開羅會議，以及接著召開的美蘇英德黑蘭會議。這是因爲史達林不肯與蔣介石直接見面會談，會議竟然要分成兩組進行，就已經可以看出這場四強領袖高峰會議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了。

主張召開四強領袖會議最爲心切的羅斯福，早已熟習丘吉爾那一套維護大英帝國殖民利益，可以死纏爛打到底的精神。不過羅斯福認為，英國這種構建在十七世紀架構的殖民帝國政體，遲早會被歷史所淘汰。但是羅斯福卻對於蘇聯的領袖史達林，有著一種非常浪漫的想法（當然羅斯福也受到美國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響），他認為蘇聯經歷過這場幾乎亡國的大戰之後，假如能夠有機會受到世界各國的平等與尊重，它應該會改變對於西方國家的敵視態度，何況蘇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開解散共產第三國際，不就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改變訊號嗎？此外，羅斯福對於蔣介石的處境相當肯定，一個仍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能有這樣一位軍方領袖，在現代化強敵的侵略下，卻領導國家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實在值得美國助

⁶這點非常的可惜，事實上，羅斯福在戰爭剛開始時，對於蔣介石領導對抗日本的貢獻相當的肯定，他是美國友華派的領導人，蔣介石不能與羅斯福主動地多次接觸，結果造成了反華派的軍人與官僚蒙蔽羅斯福的判斷。

以一臂之力。

雖然羅斯福的個人才略突出，卻不能掩飾美國人缺乏歷史深度的重大缺點，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國歷史中，它從來沒有見識過歷史性大奸大惡的冷血梟雄。史達林的深沉凶殘，必須從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被歐洲主流歷史所排擠，近千年處在被亞洲攻擊能力最強的遊牧民族的屠殺、恐懼之情結下，加上完全無情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三重深沉歷史所鑄造而成的梟雄性格來理解。因此羅斯福一番以誠心待人的善意，完全就被史達林操控，也被丘吉爾所利用與迷惑了。

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其實是一會兩開，形成了一個影響世界歷史方向的「政治戰場」，結果是中國實力與謀略不足，因此先勝後敗；美國的實力無人能及，但是謀略缺乏歷史深度，先後被英蘇所蒙蔽與利用；英國謀略深沉，但是實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蘇聯的實力與謀略都是有備而來，成為歷史短期的最大贏家。

33.4 中國代表團的內憂

一九四三年十月，因為史迪威介入與操縱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蔣介石最後一刻變卦，讓史迪威留任參謀長，導至宋子文等政學系軍政要員遭到整肅（詳情參考三十一章史迪威事件）。原本中國與美國進行的各種重大外交、軍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權負責。宋與包括羅斯福在內的美國戰略決策階層，有著深入與頻繁的接觸，以及良好的關係。他多次為中國戰區的利益，與美軍決策首長進行辯論與交涉，也非常了解英美戰略決策核心的人事與背景。他原本應是參加開羅會議的最佳人選之一⁷，但是此時卻因為史迪威事件所引發的政爭而遭到政治軟禁，所以改由宋美齡陪同蔣介石出席這次事關中國歷史命運的會議。而最為致命的安排，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國戰區出席這個歷史性的軍事會議。中國的命運就幾乎註定要被強權踐踏與出賣了。

當然若以中外的婦女界而言，在那個時代，宋美齡的確是位罕見、傑出的女性政治人物，但是若是與宋子文的能力與對外關係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況她並非政府裡的決策階層，出席這場會議，實在有些名不正、言

⁷宋子文雖然是蔣介石的姻親，但是絕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經常堅持自己的看法，而且與蔣介石鬧翻過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確，但他是一位很有堅持與風骨的政治人物。

不順，只給西方國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齡要想在政治與軍事專業上，與丘吉爾、馬歇爾、蒙巴頓等人較量，當然更是屈居下風了。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都可以說是犯了錯誤，在代表團的陣容而言，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這樣的中國代表團，既缺乏可以獨當一面的外交與戰略大將，又有內鬼通外神的嚴重隱憂，一旦蔣介石有所疏忽，中國的利益就會被盟國所算計了。

何況蔣介石於會前，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相當明白地批判國際強權對於中國的欺凌，同時表達了他希望中國復興的強烈民族主義觀點。蔣介石的這本書也許對中國的內政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卻遭到英美蘇各國政治與戰略專家的強烈警覺，更使這些西方強權中的政客，確定了要給中國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準備。因為他們認為，假如讓蔣介石領導中國，完成抗戰與復興中國的歷史大業之後，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利益，就要遭到中國的挑戰了。蔣介石沒有想到，在所謂四強領袖的歷史會議之中，會爆發如此可怕的傾軋與出賣的危機。

33.5 中國為戰後亞洲奠定發展方向

開羅會議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場，羅斯福與蔣介石在大體上頗能互相尊重，蔣介石則是過於信賴羅斯福，而低估了丘吉爾的手腕。羅斯福對於蔣介石意見的尊重，引爆了丘吉爾「誘敵深入」的大反擊佈署。事實上，丘吉爾原先希望英美領袖能夠先行在馬爾他島會面，集中力量討論全面反攻歐陸的策略，因為丘氏認為，亞洲問題根本只需要分別由英美兩國領袖，各自私下決定就可以了。但是羅斯福卻堅持，亞洲的問題，應該尊重中國的意見。所以丘吉爾對於羅斯福如此「遷就」蔣介石，未來必然會影響到英國對於亞洲的控制，當然心生不滿，所以決心非除掉蔣介石不可。蔣介石可是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世界級的政治鬥爭，丘吉爾是先佯退然後再突擊，於是蔣介石就掉入政治會戰的包圍之中了。

在開羅會議中，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先分別會晤，就各種的戰略方案，以及戰後的世界與亞洲的安排，進行意見交換。蔣、羅之間的會談，大體上都順利與和諧，中美對於下列十大問題，都有不少的共識：一、中國成

爲主導戰後國際社會的四強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將尊重日本人民的意願。三、中國協助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四、日本應以實物賠償中國。五、所有被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應該歸還中國，琉球地位未定，香港問題以後磋商。六、中美軍事合作，美國軍援中國，中國開放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七、朝鮮、越南、泰國應該協助其獨立。八、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九、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問題，應該與蘇聯協商解決。十、中國與美國建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

而在中英之間，蔣介石知道，丘吉爾絕對不會討論香港的問題，對於反攻緬甸，英國也有極強的意見，因此不便公開產生對立或是破裂，蔣介石相信羅斯福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歧見，因而只旁敲側擊的提議將香港改爲自由港，試探羅斯福的支持。英國全力反對允許韓國、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在雙方激辯之後，英國只在韓國獨立的問題上讓步，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獨立上妥協，香港問題只有以後再議。

由於當時中國退到西南部地區，對外的國際交通幾乎完全遭到切斷，而西南內地原本的生產力就不足，無法長期負擔抗日戰爭龐大的消耗與支出。因此重慶政府控制的地區，早已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特別是軍公教人員的待遇，幾乎已經接近難以爲繼的危機地步了。因此蔣介石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另外給予重慶政府十億美元的貸款（當然是要還的），以控制惡性通貨膨脹的毀滅性威力，同時也爲中國提升軍備與戰力，以配合盟國在亞洲大陸的反攻作戰，做好準備。這點羅斯福也表示相當的同意，並表示他將與美財經首長研商之後，再提出實際的做法。這個向美國要求十億美元信用貸款的協商，由宋美齡全程參與，因此宋美齡「誤認爲」，羅斯福總統已經正式答應給中國的借款，不料事後這竟然成爲中美之間最大的衝突所在。

在領土問題上，羅斯福曾經非常鄭重地提到琉球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蔣介石則依據事實指出，琉球群島過去只是中國的屬國，並非中國的領土，因此中國並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島，但是可以將琉球群島先予以國際託管，以後再決定其命運。這點蔣介石是相當精明，因爲美國遠在十九世紀，初次到達西太平洋之時，就有控制琉球的戰略規劃。假如蔣介石展現中國有控制琉球的意願，那麼絕對會被丘吉爾與馬歇爾當成包藏野心的頭號「公敵」，認爲中國有稱霸西太平洋的野心，那麼中國將會面臨更大的打壓，恐怕連台灣與東北的主權都會要不回來。

蔣介石自然了解，中國對琉球有過長期的宗主關係，琉球的戰略地位又極其重要，因此無論是回歸中國，或是能夠真正獨立，在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無奈當時中國的國力不足，只有先交給美國託管，日後再圖適當的安排。結果不幸竟然在國際強權的謀畫下，琉球又到侵略者日本的手中。

而蔣介石則兩度主動提起旅順軍港開放給美軍使用的問題，因為他認為，在歷史上，無論是日本還是蘇聯，都是因為要控制這個軍港，才給中國東北帶來無窮的兵禍。中國是一個需要重建的弱國，因此只有美軍的介入，才能穩定這個敏感的戰略地區。但是羅斯福沒有作明確的反應。蔣介石在琉球與旅順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知道中國即使能夠戰勝日本，在相當的時間之內，中國還是一個弱國，特別是在海洋上，因此希望美國能夠多關照這個地區，中國則盡力發展陸上的實力。

此外羅斯福也與蔣介石談到越南的歸屬問題。因為法國根本是戰敗國，在亞洲作戰更是毫無貢獻，所以羅斯福兩度詢問蔣介石，中國有無收復越南統治權的意願，蔣介石都明白地拒絕了。因為他了解越南過去大部分的時候只是中國的屬地，血統文化都已有相當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違背民族自決的歷史潮流的做法，更會平白得罪了法國與英國。

33.6 史迪威開始進行報復

而在開羅會議的軍事幕僚策略會商中，中國依照規章，是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的當然代表。而史迪威與蔣介石相處是勢同水火，他原本就不斷地對美國政府，提供中國戰區完全負面的報告，何況史迪威才剛剛被迫向蔣介石低頭認錯，心中充滿了屈辱心理的報復意志。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中，史迪威當然是繼續做盡任何可以打擊重慶政府威望的工作。這就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之前犯下的大錯，軟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國在開羅會議，遭到歷史性的失敗與危機。

在會議全程活動中，史迪威一再扭曲事實，加上惡意地攻訐，把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抗戰，說得一無是處與毫無貢獻。史迪威認為在整個大戰之中，中國是盟國的負擔，而沒有真正的貢獻。甚至盟國不必認真地援助中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會將盟國的援助，做為擴張自己割據力量的資源，不

會真正的用到戰場上。所以雖然蔣介石的各項見解與請求，原則上，都能得到羅斯福相當的支持，但是丘吉爾是已經決心杯葛到底，而羅斯福的軍政幕僚們，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儘量改變或是削弱羅斯福支持中國的指示。

有關中國參加聯合參謀團會議（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請求，原本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就積極爭取的安排，但是一再被英美參謀首長所拒絕。這次雖然由羅斯福指示，重新地考慮，卻在丘吉爾反對，與史迪威的運作之下，英美聯合參謀團，首先否決了中國參加聯合參謀會議的權利，這樣中國便無法直接與事先提出中國戰區的需要，也很難改變既定的軍事策略，這也是蔣介石日後在盟國政略戰場上，一敗再敗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讓羅斯福得到真確與及時的中國戰區情報，羅斯福對華支援的指示，又不能得到美決策執行單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國聯合反攻緬甸的決策上，丘吉爾、馬歇爾、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而由於宋子文沒有出席這個軍事幕僚會議（宋美齡更沒有出席這個純粹軍事戰略會議的名義與能力），中國軍方就由史迪威充當全權代表。史氏不但不能為中國的立場進行力爭，反而主動提出負面的評價。因此軍事幕僚會議對高峰會議的決策，也就無法為中國戰區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評價。

不過在領袖的決策會議中，羅斯福卻全力支持蔣介石，羅斯福甚至動用個人的威望，表達盟國應該將反攻緬甸的作戰，列為優先的戰略佈署。一方面羅斯福認為，若要以較少的傷亡，較短的時間擊敗日本，就要充分武裝中國軍力，利用中國的戰略地緣與人力的優勢；另一方面羅斯福也表達對於中國過去抗日所做重大犧牲的關切與補償。丘吉爾力爭無效之後，只在表面「停火」，其實他正準備聯絡史達林，進行會後的翻案大反擊。

總之，中國在開羅會議中，反而為中國以外的事務，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韓國戰後獨立與中南半島的前途，都爭到了決定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在這些方面，羅斯福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因而與丘吉爾產生不少的摩擦與辯論，也就更為堅定英方要防堵甚至打擊中國的成見。因為在丘吉爾看來，當時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存亡命運掙扎的衰落國家而已，竟然對於戰後的亞洲事務，就有這樣大國的風範，那麼在戰後，中國一旦復興起來，她必然會領導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控制。何況，羅斯福完全同

意，中國在戰後可以收復被日本所奪取的所有失土，那麼中國要回香港、九龍，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

由於丘吉爾自始至終全面杯葛蔣介石，讓會議進行得相當不順利，連羅斯福都感到十分的憂慮，因而明白的向蔣介石表示，會議的最大問題，就是丘吉爾不願意中國強大。不過蔣介石了解，中國當時仍然是個弱國，又處在生存危機與實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國一向缺乏攻擊的個性，因此對於一些關於自身利益的問題，並沒有針鋒相對地堅持到底，以免會議破裂，或是增加羅斯福的困擾。對於蔣介石而言，在開羅會議中，能夠確定收回中國的失地、決定反攻緬甸作戰，以及得到美國十億美元信用貸款的允諾，單是這三項的成果，就足以稱之為成功了。

因此在最後的開羅會議宣言中，盟國明白表示團結一致，對日本作戰到底的決心，並且列出中國的東北、台灣、澎湖的失土當然歸還中國，以及讓韓國在戰後獨立的公開宣言。開羅會議在形式上，單是中國元首能夠與英美兩國領袖，平等地舉行高峰會議，共同發表了歷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已經大幅提升了。因此蔣介石還算滿意地離開了開羅，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蘭會議盟國對於反攻緬甸的具體軍事行動決議。但是盟國真正出賣中國的陰謀，卻在開羅會議之後，正式登場。在接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中，史達林與丘吉爾聯手策劃，最後造成羅斯福改變立場，使得在開羅會議中，絕大部分對於中國的承諾，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7 德黑蘭會議全面大翻案

開羅會議才剛剛結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蘭會議就接著登場。這場西方盟國英、美、蘇領袖之間，第一次的高峰會議，原本就在史達林的全面設計之中，他以極高的政治謀略，爭取羅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諾，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以加速完結對德國的作戰。其實是使蘇聯能夠獨佔攻佔東歐所有的戰略利益。史達林並且正式提出，蘇聯考慮在德國投降之後，對日本宣戰，這樣蘇聯也可以成為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的主要戰力來源。

當然史達林非常技巧地推銷中國沒真正用全力抗日的觀念。這個概念一直由馬歇爾設法擴大傳播，又有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馬歇爾的密友）之

「第一手報告」的堅決支持，加上美國務院左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爾也是站在同一戰線助陣。這個觀念主要的主要目的，在防止羅斯福大力援助中國。因為假如中國因為獲得援助而強大，就會嚴重妨礙到蘇聯紅色帝國在亞洲的發展，與英法殖民帝國於戰後的復活。

羅斯福的戰略觀點是一心希望能夠越早結束大戰越好，這樣能夠減少美國軍民的死傷，同時他也缺乏歷史戰略佈局的遠見與耐心。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政治、社會上組織嚴密，因此軍隊的動員能力強，它又有不錯的工業基礎，加上了美國大量的援助後，其作戰兵力的數量與質量均佳，對外又善於宣傳作戰的表現，所以羅斯福對於蘇聯在終結二次世界大戰，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羅斯福在得到史達林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之後，開始動搖武裝中國部隊承諾的信念。

英國的最高戰略優先原則是要維持大英殖民帝國的利益，當丘吉爾發現，既然無法阻止蘇聯在東歐形成支配性的擴張，那麼不妨利用蘇聯擴張的壓力，以加強英、美的關係。因為反資本主義的蘇聯若是在戰後強大，必然會威脅美國，美國既然受到蘇聯全球的威脅，當然就要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美國就就不會在戰後，強迫英國放棄殖民地的統治。當西方國家在亞洲打敗日本之後，英國唯一要對付的，就只有中國了。而延後反攻緬甸，是壓迫中國走向崩潰與衰弱的最高戰略。因此英國將盡全力地促使羅斯福支持打消反攻緬甸的承諾。

因此，丘吉爾全程陪同羅斯福往返開羅與德黑蘭，用盡每一個機會，遊說放棄支持蔣介石反攻緬甸的決定。在史達林的巧妙協助之下，羅斯福最後竟然被說服，美國並不是要「放棄」反攻緬甸，而只是「延後」反攻緬甸或是「縮小」反攻緬甸的作戰而已。羅斯福經不起丘吉爾與史達林的聯合攻勢，最後竟然傾向同意「延後」反攻緬甸的承諾。這樣就等於將極待援助的中國戰區，置於危機的刀鋒之前⁸。

在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後，羅斯福與丘吉爾又同時回到開羅，與英美雙方的高級軍事參謀，進行會後戰略行動計畫的具體會商。這時丘吉爾還是繼續遊說，希望美國放棄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丘氏這種「精誠所至」、死纏爛打的功夫，終於扭轉了羅斯福的堅持。此時的羅斯福與美軍將領，幾乎

⁸當時的英國與蘇聯，都已經獲得美國幾十億到百億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撐住戰局，而中國參戰比它們還早、國力原來比它們還弱，所以需要先打通滇緬通路，獲得實質的援助之後，才能展現戰力，配合盟國的反攻計劃。

已經完全陶醉在諾曼地登陸戰的歷史偉大場景中，因此決定將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都投入這場登陸戰上⁹，因此登陸印度洋的安德曼島，切以斷日軍在東印度洋作戰力量的方案就無法執行，反攻緬甸的計劃，也被無限期的延後了。

事實上，羅斯福原先是非常堅持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但是在考慮史達林答應蘇聯將會對日本作戰，以及反攻歐洲的諾曼地登陸戰之準備，必須要萬無一失的狀況下，盟國很難再抽調海軍登陸艇到緬甸。所以羅斯福最後同意，盟國反攻緬甸計畫只有延期。羅斯福在做出延後反攻緬甸的決定時，曾經最後召見史迪威，詢問中國的抗日戰力究竟如何。身為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竟然「保證」，中國事實上已經處在不堪一擊的狀況之下，只要日軍再發動一次類似鄂西會戰的攻勢作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必然崩潰，因此美國是否履行對中國的承諾，打通緬甸援助中國的通路，根本就沒有實際的意義¹⁰。

這樣羅斯福認為，中國既然連自保都有困難，也就根本沒有力量協助美國提早打敗日本。這時蘇聯已「答應」要幫忙進攻日本，那麼美國只有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延後反攻緬甸。羅斯福甚至還憂慮假如蔣介石垮台之後，美國應該如何收拾中國的殘局。

33.8 盟國對中國背信棄義

很令人感傷的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雖然為韓國、泰國爭到獨立，甚至為日本力爭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又為越南的獨立發展，也留下了伏筆，但是為中國僅僅確定到台灣、東北的領土回歸，卻無法要回香港，以及爭取到中國在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的應有權利。蔣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棄對琉球與越南的主權，以及沒有積極回應派兵佔領日本之建議¹¹。中國為東亞地區

⁹盟軍登陸諾曼地的作戰，所投入的兵力是超過實際的需要很多。根據作戰實況的發展，盟軍其實只要使用一半的資源，同樣可以成功地登陸。

¹⁰這是史迪威最為惡毒的做法，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竟然專門做出賣中國戰區的事情，而預言中國將立刻被日本打敗，根本就是史迪威自從七七事變以來，「職業性」的預測。歷史的事實證明，中國不但沒有像史迪威過去所說的，在中日全面戰爭六個月之後就被打敗，更沒有像他又預測的，中國再打一次鄂西會戰就會崩潰。中國後來又打了比鄂西會戰規模還要大的六次會戰，她還是沒有倒。

¹¹有關中國派軍參與佔領日本，是羅斯福總統強烈的主張，蔣介石不敢明顯表示同意，是擔心這樣會遭到蘇聯與英國的暗算。因為這兩大盟國可沒有資格佔領日本本土，假如中國成為日本佔領軍，在亞洲聲威豈只大振，英蘇兩國若是有這層顧慮，將更會在打通援助中國的戰略通

國家爭取到的權利，甚至超過爲自己。

從開羅會議的記錄可以看到，在中國贏得戰勝之後，蔣介石並沒有放棄對日本索取戰爭破壞的賠償。當時會議具體的結論是，中國準備要日本以實物，來補償日方對華所造成的破壞。同時蔣介石也企圖運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兩次對羅斯福提到開放旅順爲自由港，希望能夠引進美國力量，牽制蘇聯索的可能性（當時蔣介石是出於預感的防衛而提出旅順問題，沒想到會惡夢成真）；並且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低姿態，以避免刺激丘吉爾阻攔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但英國根本不但不領情，反而是絕對不歸還香港，連反攻緬甸也決定杯葛到底。

檢討開羅會議，假如不是史迪威、馬歇爾從中不斷進行負面破壞，假如不是史達林在德黑蘭背後出招、不是丘吉爾鍥而不捨地打擊中國，假如宋子文能夠出席開羅會議，及史迪威已被撤換，那麼對於中國與整個亞洲的利益而言，開羅會議應該是可以圓滿成功的。但是羅斯福個人的意志，卻在完全負面的情報中動搖，無法堅持自己原先對中國的承諾；蔣介石又過於相信羅斯福的善意與保證，而不能了解，國際會議之中的角力，實際上要比一場與野蠻敵人的肉搏戰還要可怕！

蔣介石起先認爲，盟國對中國至少要比敵國仁慈一些，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所有會議的公開結論，會被盟國私下改得面目全非。從此以後，中國的命運，就一再遭到「盟國」的出賣與踐踏，中國實實在在成爲盟國獲取戰爭紅利的犧牲品。最爲可悲的是，中國當時還以開羅會議爲中國帶來了突破性的成就，誰知道會議的結論，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國既不會優先打通緬甸的通路，美國也不會給中國十億美元的貸款，中國卻要從萬分吃緊的戰區中，被迫抽調最精銳的部隊，讓史迪威在緬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沒有戰略意義的消耗，同時更嚴重影響到中國本身的安危。這就是在1944年日軍全力進攻下，中國戰區出現全面崩潰的主因。

開羅會議是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分水嶺，在形式上而言，中國在開羅會議時，剛剛走出長期挫敗之歷史記錄的陰影，邁向國際四強歷史舞台的強國巔峰，中美英三國領袖能夠平等協商，完成對於戰後亞洲歷史佈局的安排。但是中國再也沒有想到，西方盟國竟然會聯手，把中國當成一個出

路上作梗。中國若沒有得到實際的軍援，未來的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而已，蔣介石最後只含糊地答應，軍事佔領日本，由美國作主，中國願意配合。

賣打壓的對象。雖然史達林、丘吉爾的心胸奸險，以及羅斯福總統的缺乏遠見與堅持，都是出賣中國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國自己內部四分五裂，出席會議的陣容不強，又有史迪威這種通敵的內奸，中國要想在世界頂尖謀略的會議上，爭取自己國家的利益，當然會容易遭到暗算。

33.9 惡夢開始降臨中國

開羅會議結束不過十天，惡夢就開始降臨中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蔣介石還在等待盟國反攻緬甸的佳音，羅斯福突然電告蔣介石，盟國因為要全力進行諾曼地登陸戰，所以要延後全面反攻緬甸的計畫。蔣介石接到這個消息後，可以說是遭到了極大的打擊，這等於說開羅會議的實質結果作廢。中國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開緬甸的國際通路，接受美國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戰能力，擊敗日本，重建家園。但是延期反攻緬甸的決定，就使得重開滇緬公路，在可見的將來已經是不可能了。中國的作戰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抗戰將陷入更為艱苦的戰局。

在緬甸通路遲遲無法打通的情形下，蘇聯又繼續地封鎖西北通路，中國戰區的民心士氣與作戰資源，實在無法單靠每月一萬噸的空運來支撐。蔣介石擔心，大後方經濟危急的狀況，迫使中國可能無法再支持六個月以上。因此他只好向羅斯福提出要求，希望增加空運數量到每月兩萬噸，以及根據開羅會議時的協定，撥給中國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以因應中國戰區處理惡性通貨膨脹，及增加作戰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實這兩個要求，本來也是在會議中，得到羅斯福所同意的，但是卻突然「意外地」引起了中美之間爆炸性的衝突。

首先是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電華盛頓，提出與蔣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國並不需要美國新的援助資金，要想解決中國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中國所需的是大量物資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緬甸的通路，援助物資無法大量運到中國，所以美國政府目前不要答應蔣介石的貸款要求。史迪威更是站在絕對反對的立場，他向馬歇爾報告，這是蔣介石慣用的政治勒索手腕¹²。史迪威宣稱，因為美國不能

¹² 其實史迪威要是時間偶爾照照鏡子，應該可以發現他自己才是愛用政治勒索的慣犯（使用美援物資的申請與分配權，作為威脅勒索的籌碼），史迪威的這一個性的特點，連美國人都無法否認。

履行承諾，打通經由緬甸援助中國的陸上通路，蔣介石就開口要十億美元做爲「交換的條件」

沒想到這個由史迪威捏造的「交換條件說」¹³，竟然會刺激了整個美國政府上下一心的強烈反彈，從陸軍部到財政部，從馬歇爾到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都對蔣介石要求十億美元的借款，產生了敵愾同仇、連成一氣的看法；加上隨後重慶政府又依照中美的協議，要求美國支付在成都修建戰略空軍基地，以及駐華美軍的費用。當這個消息經過美國大使高思傳回美國之後，蔣介石立刻成爲華盛頓特區內，人人喊打的「公敵」了（美國政府對於日本首相東條英機都沒有過這樣情緒化的反感）。

所有的美國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是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中，原則同意加以考慮的；而支付美軍在中國的機場與生活費用，更是美國政府主動同意支付的款項¹⁴。

更糟的是，蔣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權統領中國駐印軍，開始在胡康河谷展開攻擊日軍的軍事行動，以掩護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這時史迪威與蒙巴頓竟然自己「私下」決定，乘機提前發動局部反攻緬北的作戰計畫，以拖住中國的軍隊，同時可以減輕英軍在印度所遭到的軍事壓力。因爲當時日本的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大將（即擴大盧溝橋事變成爲中日全面戰爭的元凶），正在準備對印度發動全面的攻勢。

然後史迪威透過馬歇爾，要求羅斯福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要中國派遣接受美援裝備的華軍出兵支援，這原是蔣介石所堅決反對的進攻緬甸「替代」方案——就是若盟國沒有配合從印度洋進攻緬甸的行動，中國不宜單獨進行緬北作戰。因此蔣介石覺得中國有充分、正確的理由，拒絕出兵（而羅斯福原先也同意蔣介石的這個看法）。但是羅斯福在馬歇爾的誤導下，居然認爲是蔣介石出爾反爾。史迪威與蒙巴頓現在要出兵反攻緬甸了，蔣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羅斯福在十二月數度致電蔣介石，要求中國合作，出兵反攻緬北。這時的美國政府上下，一致地認爲，「中國只要求大量的援助，而

¹³蔣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國反攻緬甸以支援中國戰區的承諾原是一個騙局，十億美元的貸款，是中國在開羅會議中就提出，羅斯福同意優先考慮的。因此反攻緬甸與貸款並無關聯，時間順序也證明交換條件說的荒謬。

¹⁴中國是美國的盟國，爲了打敗日本，她已經是犧牲到民窮財盡的地步了。當時盟國並肩作戰，由美國提供軍火與經費支援，原是同盟國間合作的標準模式。中國比英國與蘇聯所做的犧牲，都要超過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卻少之又少，更何況這只是筆貸款，用來周轉與維持抗日戰爭而已，將來會全數還清的。美國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國借錢的要求，當成頭號公敵來對付。

不想出兵作戰」。突然間蔣介石成爲「勒索盟國」的頭號公敵了，中美關係幾乎面臨破裂的危機。

事實上，真正背信棄義的是美國。因爲是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中，親自答應蔣介石的兩個項重大決定，一是盟國合力反攻緬甸，二是原則同意貸款中國十億美元。蔣介石回國之後，正式向羅斯福提出十億美元貸款的要求，完全是依據開羅會議的結果行事，毫無過分之處，更和盟國延後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無關。但是美國政府卻「認爲」這是蔣介石獅子大張口的「交換條件」。其實真正要感到愧疚的應該是羅斯福總統，自己推翻了對中國軍事反攻的承諾，又扭曲十億美元貸款的考慮。

但是此時的美國政府，上下一致認爲這是蔣介石的勒索。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指出，中國原先的五億美元貸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當時美國一直以空運困難，拖延中國購買黃金，收回法幣的財政計畫，所以導至資金無法依照計畫使用），而中國嚴重的經濟的問題，需要等到重開滇緬公路，可以將大量的物資運到中國之後，才能穩住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¹⁵，所以美國財政部堅決反對給中國新的借款。

對於蔣介石依照中美的協定，要美國償付修建機場費用，以及駐華美軍的開銷，美國政府則藉口說，蔣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兌二十法幣的官價匯率，可以說是極端的不合理（當時黑市匯率爲一美元兌二百三十元法幣），所以美財政部也反對到底。蔣介石的答覆是，中國政府必須維持法幣官價的匯率，否則中國的財政信用會崩潰，因此堅持不肯改變匯率。這點當然更是藉機敲詐美國的滔天罪證。

美國財長摩根索的觀點，說中國需要爲要大量增加物資的供應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當時發行過多的法幣，更是克服惡性通貨膨脹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確相當危急；不過中國政府堅持維持官價固定匯率，而完全脫離市場價格，在當時雖然是見仁見智的經濟政策問題，但是以後見之明而言，恐怕是蔣介石與孔祥熙一個錯誤的政策性決定。因爲以這樣水準的匯率，使得美國政府無法對其國會交待（援助中國換算美元的費用成本，竟然會達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實國民政府應該直接以美元換法幣的方法，來回收超額發行的法幣，而不用黃金收回法幣。結果使

¹⁵問題是，盟國又自己推翻決議，取消了反攻緬甸的計畫，重開滇緬公路已經無望，那麼中國只有等死？

用黃金收回法幣的操作，因為戰時交通極端的困難，經常發生延誤，而造成政府幣值信用的破產。

不幸的是，此時蔣介石對美國政府採取壓力交涉的方式。蔣介石通知美駐華大使高思，假如美國堅持不支付駐華美軍的費用，中國政府實在已經無力負擔美軍在華所有經費的支出了（單是爲了在中國建築許多處空軍基地，就讓中國前前後後支出了近百億法幣的代墊資金，造成了後方地區性的惡性通貨膨脹），因此國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國政府再不依協議付款，那麼最遲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駐華美軍要開始自己設法張羅供應品。這原是盟國之間常用的談判手段，但是美國政府卻爲此事，出現更爲激怒的反應。

33.10 中美關係突然瀕臨破裂邊緣

這時羅斯福已經直接介入中、美之間的爭執，他要求蔣介石出兵，以支援史迪威與蒙巴頓的緬北作戰計畫，但他「忘記」了中美之間原來的緬甸作戰共識，是中國絕對不能單獨進行緬北作戰。因爲這種局部反攻，既不能擊敗緬甸的日軍，反而造成中國戰區實力不足的危機。此時馬歇爾卻極力批評蔣介石，他指出這就是蔣介石一向的陰謀，中國拿了美軍的援助，卻不肯讓部隊參戰，因此美國政府應該以中斷對華援助，來壓迫蔣介石出兵參加緬北作戰¹⁶。

這時候，羅斯福從失信於蔣介石的感到遺憾，一變而爲對蔣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滿，這種變化之大，簡直無法理喻。但此時中美關係，突然就瀕臨破裂的邊緣。馬歇爾這回可抓到機會，可以置「盟友」蔣介石於死地，因此他全面煽動美國政府內部的反蔣情緒。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國政府聯席會議上，一向極端左傾的財政部次長懷特（Harry White），以充滿煽動的言詞，猛烈批評中國的要求；財政部長摩根索等人趁機提議（非常奇怪的是，國務院竟然缺席），全面中止美國對重慶的支持、停止在中國修建機場、撤退所有美國在中國的軍事人員。陸軍供應部長索摩維爾甚至提議，乾脆懸賞一億美元，收買在中國的政

¹⁶難道馬歇爾忘了，盟國並未批准史迪威、蒙巴頓私自決定的緬北作戰計劃，蔣介石那有義務出兵支持史迪威個人的作戰冒險，中國戰區還要不要軍力來維持了？事實上，當時中國還沒有拿到多少美國的援助，因爲滇緬公路沒有打通呢！此外，難道中國接受了美國援助，就必須要爲英國在緬甸做「傭兵」，而不顧自己國家的存亡了？

客，動手進行推翻蔣介石的政變，另外組織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

整個會議，簡直成爲對中國的一個私設裁判法庭。與會人士全都成爲「中國私刑隊」的成員，以最爲刻薄的方式，聲討中國借錢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後來在東京大審對日本戰犯的聲討，還要嚴厲的多¹⁷。

這個會議的結論，當然得到馬歇爾與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們認爲，只要這個備忘錄能夠傳到重慶，那麼保證中美關係全面破裂，美軍也會撤離中國戰區。幸而在最後關頭，羅斯福總統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介入，參加意見。赫爾力排眾議地指出，假如美國政府這樣對待蔣介石，美國對日本的作戰，將會失去中國的合作。假如中國與日本停戰，那麼整個亞洲的局勢將會全面逆轉，美國就沒有把握控制亞洲的戰局了。赫爾的這一簡明的分析，才點醒了「中國私刑隊」情緒化決策的不當，美國絕對不能沒有中國在亞洲的支持，否則美國再多花兩百億美元與一百萬部隊，也不一定能挽回亞洲、太平洋戰場，因失去中國所造成的危機與後果。

因此在國務卿赫爾的斡旋之下，美國內部最後達成一項協議，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萬美元的駐華軍費，原先的十億美元貸款免談、修建機場的費用也免談，匯率另行商定（最後是以一美元兌七十法幣達成協議）；史迪威的緬北作戰計劃，蔣介石必需要出兵協助，否則美國絕對不再援助中國軍隊。

這場中美之間，莫名其妙的「離奇」衝突，可以說是荒謬已極。盟國不但在戰略上欺騙、出賣中國於先，又背信於援助中國的承諾，最後突然完全怪罪中國向美國勒索。同時還不顧中國戰區的安危，強迫中國出兵進攻緬甸北部，進行一場最耗費軍力，卻幾乎沒有戰略價值的作戰。這個衝突使得中美之間的關係降到了冰點，精疲力竭的中國，不但將面臨日軍最後的瘋狂猛攻，還要更爲孤單地面對來自盟國的遺棄與打擊。

結果當然是史迪威在緬甸，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與火力大勝日軍。蔣介石的中國戰區，戰力被抽調一空，空軍戰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結果中國軍隊從北到南，都遭日軍擊潰（詳情請參看三十四章）。美國政府的結論就是，史

¹⁷對照其他盟國向美國要求的援助，總共都在百億美元以上，而且有許多筆錢是有借無還的。中國爲了遵守與盟國並肩作戰，不單方面與敵方談判的協定，拒絕了日本多次和談的要求與越來越有利的條件。如果蔣介石真是美國反華勢力所描述的一個「只要錢、不抗日」的機會主義者，他早就取汪精衛而代之了，幹嘛那麼辛苦，想要美金還一定要等美國參戰，才向美伸手借？打戰爭就是打錢，中國是規規矩矩向美國借錢，而且保證會還錢的，竟然要受到這樣的羞辱！

迪威是可以領導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的「名將」，中國的軍隊必須交給史迪威統帥。蔣介石與中國軍隊完全不是日軍的對手，因此中國軍隊在對日戰爭中，可以說是「一無貢獻」。

這個「中國抗日無價值」的刻板宣傳，有了中國戰區大敗事實的支持，造成羅斯福逼迫蔣介石，交出中國政府軍隊指揮權給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爲在後來的雅爾達會議中，盟國毫不留情陰謀出賣中國的主要原因。

其實整個中國被否定與被出賣的歷史，都是盟國政治野心家一連串的政治陷阱所設計造成的。中國絕對沒有想到，盟友會比敵國還要殘酷。此時的中國正處在被盟國出賣的全面危機之中，但她仍必須要爲自己的命運，做出最後的掙扎。

日軍孤注一擲的瘋狂反撲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決定將最後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擲地投入華南。結果日本並未能因此而擊敗中國，以挽救自己的敗局，反而造成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兵力嚴重空虛，給予蘇聯「參戰」（其實是劫掠）而輕鬆獲勝的可乘之機。實力被抽調一空的關東軍，對於蘇聯紅軍的攻擊，表現的是近乎毫無招架之力。日本終於在歷史的決戰上，給俄國撿到洗雪日俄戰爭恥辱的機會。同時蘇聯入侵中國的東北與朝鮮半島，給東北亞帶來半世紀的戰火與威脅。這些都是日本一號作戰計劃得到「勝利」的歷史後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後，由東條英機所領導的日本政府，已經開始知道，無論是和是戰，都無法解決中國事變了。日本既然沒有足夠的兵力爭取戰爭的勝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設法保持現有的戰果，以謀求一個較好條件的停戰交易。東條政府於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絕對國防圈」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本質上，已經是不求勝利之被動與守勢戰略，但是卻成爲支配日本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

東條英機政府之所謂絕對國防圈，就是設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與維持戰爭資源供應，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間。日軍大本營認爲，在太平洋中，日本

最少要據守千島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印尼群島；在亞洲陸地上，日軍則要控制中國的平漢、粵漢鐵路，及中南半島，並延伸到緬甸與印度東部。

這個建立絕對國防圈的戰略要求，對於已經不求戰略勝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領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極端缺乏國家安全感的集體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去執行與達到目標。此外，在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以及南方軍總司令部中的高級將領，已經有了更為奇特的戰略構想，就是在必要時，日本的戰略決戰主體，將從日本本土，轉到亞洲大陸進行。因為日本島嶼的戰略空間太小，無法承受強大的攻擊；在亞洲大陸，日本則控有足夠寬廣的戰略空間，以及較多的戰爭資源，可以適合長期作戰。所以日軍有意擴大在中國的戰場空間。

日本的海空軍，這時候已經在太平洋地區遭到美軍猛烈的打擊，擴張與反擊已經是不可能了。由中國華南基地起飛的盟國轟炸機，更對日本絕對國防圈之運輸通路造成重創，特別是陳納德指揮以華南為基地的美軍第十四航空隊，與中國空軍密切合作，非常有效地攻擊日本的戰略運輸船隊（由南洋經台灣海峽到其本土之航線），造成日本運輸船隊每年高達一百萬噸以上的損失。在這種狀況之下，日本的軍備與工業生產，由於缺乏原料與能源的供應而面臨全面停工之危機。這是威脅日本絕對國防圈安全運作，最為嚴重的問題。日本的整個作戰武器軍火的生產，以及民生必需品，供應上都開始發生嚴重的困難。

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確保其絕對國防圈內運輸線的安全，就必須要在中國以及緬甸戰區，同步進行孤注一擲的大反撲作戰，作戰核心的目標，就是消滅中國戰區內的戰略空軍基地及補給線，以確保日本絕對國防圈的安全。在緬甸戰區的攻勢，是要切斷駝峰運輸的通路；而在中國戰區的攻勢，則是徹底破壞中國華南地區的盟國空軍基地。

34.1 規模空前的「一號作戰計劃」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軍大本營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開始依據大本營的絕對國防圈戰略指導原則，擬定一個決定日帝國戰爭勝敗的作戰計劃。計劃的目標是，一、攻略中國南方與西南方的中美空軍基地。因為這些空軍基地的戰機，已經嚴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線；這是維

持日本戰爭機器運作的生命線所在，若是繼續受到威脅，日本將很快就失去長期作戰的能力。二、打通亞洲大陸的陸上交交通線。日本在必要時，可以在陸上進行聯絡，將關東軍、中國派遣軍、以及南方軍結成一體，用亞洲大陸的戰略空間進行決戰。三、是打擊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日軍力與作戰意志。

日本中國派遣軍在接到大本營的指令之後，開始研擬一個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勢作戰計劃，也就是打通平漢與粵漢鐵路，與徹底掃平華南的盟軍空軍基地。其實這個作戰攻勢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戰爭初期，中國最為擔心的日軍攻略戰法，但是日本卻一直不能掌握這個戰略構想。直到六年後，面對山窮水盡之時，日軍才想採這個作戰方向，為日本帝國的命運，進行最後的反撲。經過日軍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參謀幾次全面會商，最後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營經過御前會議，核定這個挽救帝國命運的行動方案，是為「一號作戰計劃」（Operation Ichi-Go）

此計劃的綱領是，日本本土將再增加兵力的動員與投入，關東軍與南方軍則儘量提供支援。第一期作戰，是先由華北方面軍發動攻擊，打通平漢鐵路，同時殲滅華軍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戰再由駐武漢的日本第十一軍，發動直攻衡陽的大會戰，徹底擊潰華軍第九戰區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軍，負責打通粵漢鐵路的作戰，與華南的第二十三軍配合，發動由廣州北上、與十一軍的會師行動。第四期作戰，則在打通粵漢鐵路之後，再出兵攻佔廣西與越南的通路。一號作戰計劃的戰略重點目標，是攻擊與摧毀中美空軍在江西、湖南與廣西所有的空軍基地。

為了發動一號作戰計畫，日軍可以說是設法將明治維新以來，所有累積的陸軍戰力，都要孤注一擲地投入。日大本營決定，中國派遣軍在執行一號作戰計劃中，所有的兵力與支援要求，都給予最優先的配合。在兵力動員上，日軍決定再動員五十一萬部隊，優先補足中國派遣軍所有的缺額；儘量將原先在中國戰區的乙種師團與丙種師團，調升為甲種師團¹。此外大本營並且還抽調日本本土與關東軍的部隊，進一步支援中國派遣軍的一號作戰。

日軍對於一號作戰計劃的先期後勤準備，周全到幾乎難以想像的地步。先是改組了整個在中國戰場的航空兵團，單是空軍作戰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儲量，彈藥的儲量多達兩年。並特別派出從未在中國戰場上使用過的裝甲師團，參戰各軍的糧彈後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準備；馬六萬七千

¹使得日軍甲種師團在加上所有補充、特種作戰單位之後，作戰的兵力達到三萬兩千人。

匹，運輸汽車一萬三千輛，運輸補給船艇一萬艘。並且調動日本全國所有的道路、橋樑工程支援人力與器材，投入戰線後方道路的維修。日軍在一號作戰計劃所有的作戰需求，上至野戰醫療設備，下到士兵軍靴的修理，都一應俱全，它成爲日本皇軍成軍以來，歷史上空前的全面出擊作戰，其動員規模，超過了明治時期日俄戰爭的兩倍以上。

日軍的中國派遣軍，在受到大本營如此強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說是喜出望外，因此也決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國生死存亡的大決戰。所有參加作戰的野戰師團，都組織特殊的作戰敢死隊編組，特別加強突擊、夜戰與城市作戰訓練；並且舉辦各種作戰研習會議，徹底檢討過去與華軍作戰的經驗，提出改進的對策方案。日軍從大本營到前線參戰部隊，一再進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軍的戰前演訓與競賽。

34.2 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

但此時的中國守軍，卻正處在戰力嚴重空虛的階段。由於中、美爲了軍經、援助的問題，爆發了嚴重的摩擦，雙方關係幾乎瀕臨破裂；在史迪威的運作之下，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壞，不但所有援華的陸軍裝備、物資²，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緬甸作戰準備之中，而且中國最精銳的八個軍的部隊，被抽調去參與緬甸作戰。

史迪威在這時一再強調，日軍根本無意對中國軍隊發動任何的作戰攻勢，最多只是破壞與劫掠的「軍事演習」罷了；所謂日軍即將在中國戰區發動全面攻勢的情報，只是蔣介石藉口來「勒索美國」的援助物資而已，同時蔣不願派遣接受美援裝備的華軍，參加緬甸作戰。因此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與參謀長，不僅存在著嚴重的摩擦與政治鬥爭，在最爲重要的關鍵時刻，對於日軍的作戰動向與情報判斷，看法也幾乎是南轅北轍。

史迪威這時掌控著一切的美國援助物資，以及中國的戰略預備隊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動員華軍，早些幫他完成反攻緬甸的作戰；同時他還有一個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蔣介石的部隊在中國本土能夠遭到一敗塗地的打擊，這樣他才能有機會全面的接收中國部隊的作戰指揮權。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視日軍集結的情報，不斷向華盛頓報告蔣介石根本無法作戰，日軍在中國戰區

²以中國戰區華軍的需要來說，由駝峰空運輸人的美援物資在數量上僅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其實沒有威脅。

由於美國政府拒絕貸款中國十億美元，以挽救中國後方所爆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因而與國民政府產生了嚴重的摩擦與誤會。同時盟國決定延後打通援助中國的緬甸通路，因此中國能得到的實際援助，仍然只靠駝峰空運的一點點物資，來維持中國戰區最低限度的戰力。但這時中國的整個局勢，已經因為多年的戰爭而使力量面臨枯竭，同時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動搖；華中地區又碰上連續兩年嚴重的旱災，造成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發生了嚴重的糧食、物資匱乏與惡性的通貨膨脹，不但數以百萬的人民可能因飢荒而死，就連軍隊的衣食補給，也發生極度地惡化的問題。

國民政府在領土與人口日益緊縮的狀況之下，收入難以增加，但是戰費則不斷飛躍成長，爲了應付抗日戰爭的龐大戰費支出，只有擴大法幣的發行之量。一九三七年六月，盧溝橋事變之前，國民政府的法幣發行總餘額，只有十四億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幣的發行總餘額，已經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億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當時的法幣是在美國印製的，單是爲了印刷法幣，就動用了美援貸款的十分之一，合計高達五千萬五百萬美元。每個月爲了運送這些法幣回國，占用了駝峰空運量達一百五十噸，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侖的汽油。

由於法幣近乎無限量地發行，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物價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價指數爲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價指數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裡，物價幾乎是到了天天上漲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軍公教人員，受害最深；同時前線的部隊，也普遍缺乏衣食、醫葯與裝備。在史迪威與其同路人設法分化、離間之下，後方人心對於政府的失望，已經接近不滿與沸騰的狀態，於是各個政治派系的人物開始借題發揮，國民政府內部開始湧現政潮，而原本全國上下團結抗日的精神開始渙散³。

爲挽救經濟的問題，國民政府企圖以美國的貸款，在美購買黃金，然後運回中國市場拋售，以設法收回法幣。但是這項工作又受到美國財政部次長懷特不少的行政干擾，因此時斷時續。雖然收回部分法幣，不過由於黃金數量不足，並沒有建立人民對於政府的財政的信心，也就沒有發生所預期之控制通貨膨脹的效果。

³例如孫科與蔣介石就幾乎翻臉，其他各個派系的軍政領袖，甚至戰區指揮官，都開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國軍中的經費，更是短缺到不夠官兵生活開支的地步，幾乎每個部隊都普遍有謊報兵員人數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強彌補經費不足的問題。在前線的部隊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應，都發生問題，更別說作戰裝備了。部隊普遍都有營養不良、裝備落後、武器和訓練不足與士氣低落的嚴重問題。在上層權力鬥爭的影響之下，整個抗日的精神開始瓦解，逃兵情況開始越加嚴重⁴。

更糟的是，許多將領與政客，開始拉幫結派，設法與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夠從美軍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處；更有人開始迎合史迪威，準備推翻蔣介石，而做美國所擁立的新政府領袖。因此重慶軍政的上層，開始出現抗戰以來，最為嚴重的分裂與內訌。上下逐漸失去精誠團結、一心抗敵的意志，這都直接對軍心士氣與作戰指揮產生極不利的影響。

當時蔣介石政府沒有一套嚴格控制戰時物資分配的措施，而讓一小撮人得以乘機大發國難財，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鬥爭的謠言運作下，引爆了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懷疑。

其實當時經濟空虛與戰力不濟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抗日戰爭的大量損耗，日軍有計劃地劫掠大批的糧食、物資，加上一直沒有辦法得到外來的援助，導致中國所有的國力，都幾乎面臨消耗一空、山窮水盡的地步了。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曾向羅斯福總統告急，表示中國的經濟危機甚至大於軍事危機。但是這個向美國借款的要求，卻被史迪威、馬歇爾所扭曲，羅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內部左傾官僚的蒙蔽，所以國民政府無法得到這筆貸款，以穩定抗戰的經濟與人心。反攻緬甸打開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無限期延後，更讓中國的戰力受到打擊。

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最糟的，因為中國還要優先抽調精銳的部隊支援緬北作戰。雖然根據日軍大量集結與演訓的情報，蔣介石認為敵軍極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發動全面的反撲，而在二月以後，重慶方面對於日軍準備打通平漢與粵漢鐵路的攻勢，也掌握了更為清楚的情報，無奈參謀長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緬甸野人山進行作戰，對於日軍準備在中國戰區發動新攻勢的情報，根本不加理會，而造成部分華軍將領也跟著附和，因此華軍無法集中力量，準備迎戰日軍空前的重大攻勢。

⁴作者的先父回憶，由於當時部隊的經費嚴重不足，全靠指揮官「吃空名」來維持實際運作。大部分軍眷的生活，更是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軍中的士氣開始低落，多數部隊還是使用抗戰前所配備的武器作戰。

當然重慶方面的軍力，因為在陝西佈署了監視共軍的部隊⁵，又要優先支援緬甸作戰，所以兵力更加不夠分配。這次日本的華北方面軍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時正是共軍與蔣介石進行政治對抗的時刻。共軍在山西、河北、江蘇與山東地區，進行「放水」行動，樂意袖手旁觀日軍痛擊蔣介石的部隊，而拒絕發動大規模的敵後全面游擊戰，來牽制日軍。

因此在這種敵實我虛的情勢之下，一九四四年註定將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要受盡挫敗與屈辱的一年。日軍是傾全國、全軍之力，在中國戰場進行決死大反擊，中國則是外援未到，內爭先起，這樣如何能夠擋住日軍充分準備而發起的空前攻勢？

34.3 日軍打通平漢鐵路

日軍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對於華北日軍負責打通平漢鐵路，捕捉河南華軍湯恩伯主力的作戰任務，原是有著不同的意見。因為他認為，這次日軍大本營能夠撥出如此強大的兵力給中國派遣軍，與其進行大陸交通線的打通，不如讓他執行西攻西安，截斷重慶左翼的作戰計劃，但是日大本營並不同意他的觀點（幸好日本大本營沒有同意這個作戰計劃，否則中國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大本營下令由關東軍調出精銳的第二七師團、鐵道聯隊、汽車兵團等特種部隊，以支持華北方面軍的一號作戰任務，務必全力打通平漢線，捕捉在河南的華軍主力。

華軍河南陣地的防務是由蔣鼎文與湯恩伯負責。由於日軍在中條山會戰之後，將近三年都沒有在華北發動攻勢，使得華軍失去作戰的警覺與士氣；加上河南連年天災，民生困苦到了極點，軍隊的補給不足，兵員補充又以遠征軍優先，因此戰力已經降到空前的低點。在日軍發動攻勢之前，蔣介石與駐華美軍的將領，對於日軍的作戰企圖，缺乏共識與掌握，由於史迪威堅持認為，日軍的攻擊只是例行出擊的演習，根本無意深入華軍陣地與進行長期的佔領作戰，當前華軍應該以靜制動，故將擁有美式裝備、員額充足的華軍部隊，調入緬甸原始山區進行作戰。所以湯恩伯奉命以靜態防禦，在嵩山以東的密縣、鞏縣一帶陣地佈防。

⁵所謂監視共軍的國軍部隊約有十二個軍的兵力。當然不是完全監視延安，也是防守黃河沿線，阻止日軍從山西渡河進攻陝北與關中，作者的先父當時正在此地任職。

在表面的數字上，中國戰區的空軍要優於日本，史迪威卻下令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正式的編制有五百架戰機，要鎖定二百架戰機，負責防衛成都等地的美國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安全，不得彈性運用；另外要出動一百五十架戰機，支持盟軍反攻緬甸的作戰，因此陳納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戰機可以投入中國戰場的支援與打擊作戰。問題是，這些戰機的基地都在華南，很難在遙遠的黃河流域，取得制空權。因此陳納德想盡辦法出動飛機，企圖炸斷黃河鐵橋，與支援華軍作戰，但是戰機實在分配不過來。日軍源源不絕地越過黃河，機械化的部隊在黃河以南的平原上縱橫馳騁，對華軍陣地造成極大的壓力。

而剛好河南發生嚴重的大旱災，幾百萬以上的中國百姓九死流離，糧食供應非常缺乏，物價上漲已經是七七事變當年的五百倍。社會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慶的內爭浮現，美國介入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軍力上補充兵員的嚴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紙上談兵的遲遲沒有到手，這一切都使軍心更爲渙散。

執行這項任務的日軍敵前指揮，是由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內山英太郎中將負責，他率領四個師團、四個旅團，以及一個戰車師團，加上大量的工兵與運輸部隊，總兵力達十五萬人。在關東軍支援修復黃河鐵橋的協助下，日軍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過黃河，夜襲華軍在河南的陣地。日軍行動前的欺敵工作與情報擾亂，佈署的非常成功，重慶方面以爲日軍應在五月底才會發動攻擊，美軍的情報判斷更離譜，認爲這最多只是日軍的騷擾行動而已，不值得華軍勞師動眾、嚴陣以待。

事實上，日軍在大軍渡過黃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決死突擊隊，滲透華軍陣地，找到華軍防線的弱點，然後引導日軍，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對中國第一戰區的陣地，全力發動攻擊。湯恩伯原想主動對渡河的日軍部隊，進行反擊，但是其他將領都缺乏主動作戰的意願，以及作戰的支援與兵力，因此只消極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陣地之中，不願配合出擊，而讓日軍機械化部隊，任意在華軍陣地之間馳騁。

日本第十二軍順利渡過黃河之後，全力發動攻勢，四月十八日，日軍三十七師團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師團攻克鄭州，這樣日第十二軍已經成功地撕裂中國第一戰區的正面防線。日軍然後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擊，準備沿平漢線攻克許昌後，與來自武漢的第十一軍部隊會師，以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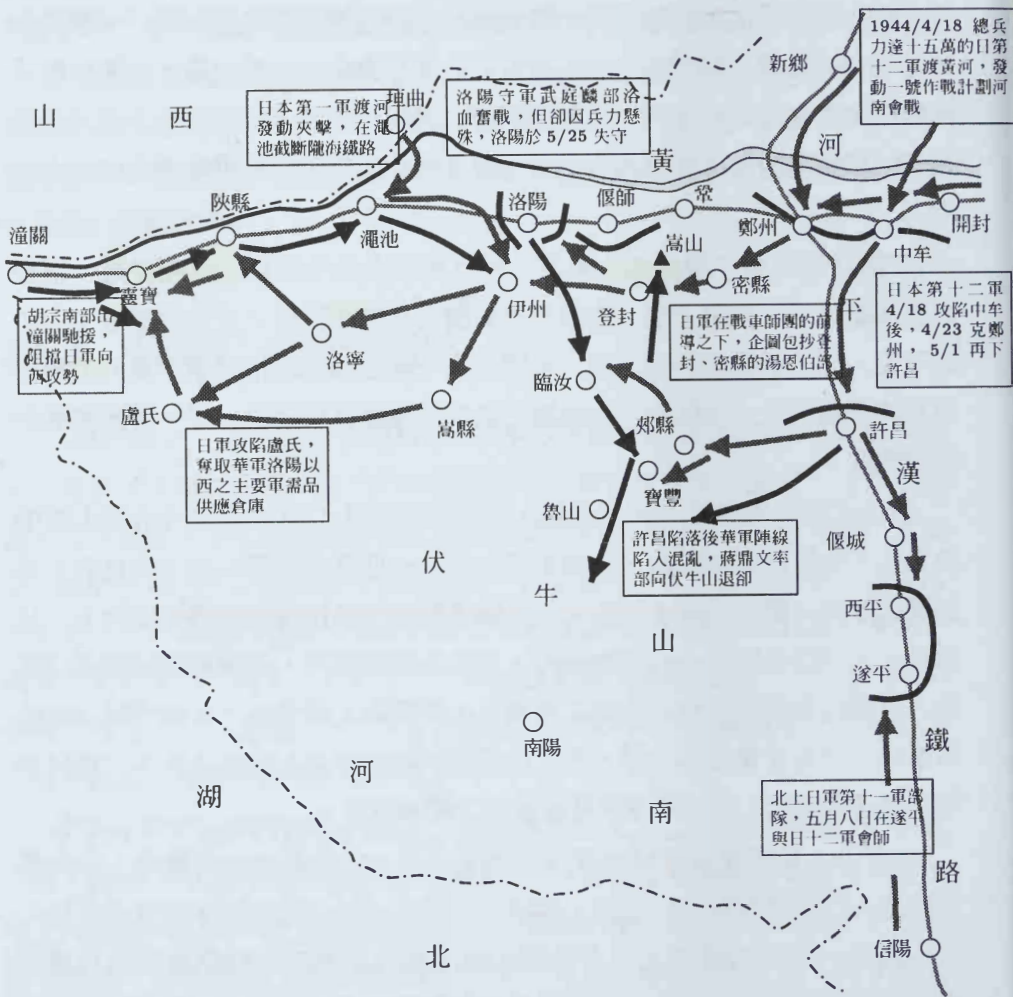


圖 34.1: 日軍一號作戰計畫河南會戰

成打通平漢鐵路。外一路的日軍，則是向西突進，準備攻擊華軍湯恩伯部的主力。

由於日軍的攻勢凌厲而且充滿變化，三個師團的日軍部隊迅速包圍了平漢路的重鎮許昌。日三十七師團擔任主攻，六十二師團與二十七師團在外圍進行包圍分割作戰，以徹底孤立於許昌的中國守軍。日軍在戰車、突擊隊與砲兵聯手下，迅速迫進許昌的陣地，打得華軍陣地陷入混亂之中，才兩天的時間，許昌就在五月一日棄守。

此時日軍情報發現，湯恩伯的部隊在登封、密縣附近集結，反擊日軍的攻勢。因此日軍司令官內山，立刻將南攻的部隊，由南向西方旋轉九十度，企圖捕捉湯恩伯的部隊。另路日軍則在戰車師團的前導之下（這是日軍首度在中國戰區使用戰車師團），在河南平原勢如破竹地疾進，企圖以鉗形攻勢，包抄湯恩伯部。日軍這種靈活的攻勢，其速度與方向不斷變化，充分展現裝甲與機械化部隊的戰力優勢。不過湯恩伯的主力第十三軍石覺部，並未踏入日軍的口袋，而設法退入嵩山，日軍失去了圍殲十三軍的機會。

這時候華軍在河南的戰線與陣地，可以說是陷入了一團混亂之中，事先的作戰情報與計劃，幾乎完全與事實的發展不符。由於華軍的員額不足、士氣低落、補給不濟，上級領導階層又面臨美軍介入政策與權力的鬥爭，因此實在無法面對日軍空前強大、靈活與凌厲的攻勢。許昌陷落之後，由於蔣鼎文擔心自己受到圍殲，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湯恩伯部勢孤，也只有設法突圍。因此其他的華軍部隊，產生兵敗如山倒的連鎖反應，河南戰場近乎失控。

蔣介石企圖抽調接受美軍裝備的遠征軍回來參戰，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絕，而且在羅斯福親自介入的壓力下，於四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被迫下令遠征軍由雲南出動，渡過怒江，參與緬北的作戰。這時候日軍剛攻陷鄭州，開始擊潰華軍在河南的防線，蔣介石卻只能眼看著中國戰區受到日軍攻勢無情的蹂躪。在盟國的眼中，裝備中國的軍隊，只是為了英國在緬甸與印度的利益而戰。

日軍南下的攻擊，很快又恢復行動。十二軍攻陷許昌之後，日軍第十一軍橫山勇，同步派遣一個旅團北上夾擊，於五月八日南北兩軍在遂平會師，日軍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七年後，才終於勉強的打通平漢鐵路。

接著日軍的主力又朝向西方發動連續的攻擊，企圖圍殲湯恩伯的主力不

成；日軍立刻朝向洛陽外圍發動快速攻擊，徹底擊潰了洛陽外圍的中國守軍。然後在五月十八日，日軍六三師團負責由東向西進攻洛陽，而日軍一一〇師團與戰車第三師團則由洛陽的西方迂迴攻擊。不過日軍對洛陽的全面攻勢，這次遭到華軍強烈反擊。洛陽守軍是武庭麟的第十五軍，以旺盛的作戰意志，擋住日軍極凌厲的攻勢，此舉驚動了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於是日軍調集部隊，於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圍之勢，再攻洛陽。華軍在兵力懸殊、援軍不到的狀況之下，仍然拒絕招降，浴血奮戰之後，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從洛陽突圍。三十六集團軍司令官李家鈺則在後續的作戰中陣亡。

此時日軍駐山西的第一軍，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兩個旅團，渡過黃河的澗池，截斷了隴海鐵路的交通，阻止華軍向東的馳援；同時掃蕩華軍在洛陽以西的主要後勤基地，以及奪取華軍在盧氏的主要軍需品供應倉庫。華軍在第一戰區，出現了全線潰敗的局面。這時候國內外的輿論出現大量悲觀與恐慌的報導，說華軍已經失去戰力，蔣介石只有撤換蔣鼎文與湯恩伯的職務，急派陳誠前往坐鎮指揮，調胡宗南負責監視延安共軍的部隊，東出潼關，進入河南，暫時阻擋了日軍的攻勢。由於日軍立刻就要在湖南發動大兵團作戰，因此停止了繼續向西的攻勢。

於是一場推諉責任的內部攻防戰，立刻就在華軍、美軍之間展開。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國記者，當然趁機發表他們的「證據」，指出蔣介石的部隊根本不戰而退，卻完全不提自己情報判斷的嚴重錯誤，導致中國戰區沒有預先作好準備，以及在作戰期間，整個後勤支援遲遲未到，與空中掩護嚴重不足的责任。事實上，以中日雙方當時在河南的兵力佈署與作戰準備而言，華軍由誰去指揮，結果都不會好到那裡去。華軍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殲滅。有誰問過，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認為日軍只是演習的情報判斷，讓中國軍隊無法得到戰前的補充與準備，應該負起多少的責任？

34.4 日本十一軍發動長衡會戰

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河南戰場獲得大勝之後，日軍一號作戰的重心，就轉到湖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對於第十一軍準備攻佔長沙、衡陽的作戰，寄予極大的期望，因為整個一號作戰計劃的成敗關鍵，就在長、衡之戰的贏輸，日軍必須擊敗長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號作戰計劃。所以

畑俊六特別前往武漢坐鎮指揮，同時加派更多的部隊助攻。受命指揮日軍作戰的第十一軍軍長橫山勇中將，當然更知道這場戰役的結果，事關重大。橫山對於進攻長沙，早已有了萬全的準備，因為過去日軍曾經三度試探，都未能佔領長沙，使得華軍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更是因此成爲華軍將領中的虎將。所以此次日軍進攻長沙、衡陽的大會戰，將是橫山個人軍旅生涯最大的挑戰了。

由於日本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對於一號作戰計劃的湖南之戰，給予全力的支持，使得橫山可以指揮的部隊高達八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單是在兵力上，日軍就擁有前所未有的絕對優勢。因此橫山在詳細檢討過去三次長沙作戰的得失之後，擬定出一個全面包抄薛岳部隊的計劃。過去日軍進攻長沙的部隊兵力，最多是三個師團加上特種作戰部隊，作戰支援的準備，也是

（三十六萬人以上），他更將日軍的作戰縱深，根本延伸到衡陽，所以日軍在兵力的優勢以及作戰計劃的規劃上，都早已經超越薛岳過去防禦長沙的「天爐作戰」之架構。

橫山的作戰計劃是，利用五個師團，做爲第一線兵力，三個師團爲第二線機動兵力，進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將主力放在左翼的攻擊，沿著湘、贛交界南下，大迂迴長沙的東南方，先攻佔瀏陽，再包抄長沙後側。橫山判斷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擊，因此日軍的佈陣，以打擊長沙外圍的華軍爲主攻對象，然後再進攻長沙城。日軍中路的攻擊則是依照傳統的進攻長沙模式，沿粵漢鐵路南下，擊破華軍正面防線直逼長沙。另外派軍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從側後方進攻長沙的制高點嶽麓山陣地。由於橫山掌控絕對充裕的作戰兵力，因此決定在日軍包圍長沙的同時，也對衡陽進行長距離的奔襲，乘華軍全力在長沙作戰之時，出其不意地一舉攻佔衡陽。

而橫山勇還設法進行大規模的欺敵行動，有意無意地透露出日軍的作戰目標，有可能是沿著長江西上，進攻重慶，或是準備再度進攻常德。由於橫山對於這兩個戰略要點的攻擊，都有實戰的經驗，所以也讓重慶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視。蔣介石保留衛戍部隊放在第六戰區，做爲保衛重慶的準備，而沒有全力支援第九戰區薛岳的部隊。

但是蔣介石仍然認爲，日軍以打通粵漢鐵路的戰略爲主，因此特別派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前往第九戰區，協助薛岳佈陣對抗，但是由於「長沙之

虎」薛岳，已經在防衛長沙的作戰上，三戰三勝，對於防衛長沙，有著相當的自信與執著。他相信史迪威的美軍判斷，認為日軍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對長沙進行更大規模的作戰，同時也認為自己的天爐作戰，已經是天衣無縫，所以決定以不變應萬變，決定仍將在長沙決戰，再次合圍進攻的日軍。

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隊，也已經發生員額與裝備不足的問題。這不僅是當時華軍普遍的現象，特別是第九戰區的軍隊，常德會戰之後，戰力都還沒有恢復，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陳誠，已經因為史迪威事件的影響而失去大權。在政潮沖擊之下，蔣介石又重用何應欽來防止軍中將領的「叛變」，而何應欽與薛岳以及粵系將領，本來就有不愉快的經驗，薛岳實際上又功高震主、鋒芒畢露，何對薛當然相當的「感冒」，更加要給薛岳一些不方便。於是在大戰前夕，第九戰區的兵員與補給，不但沒有優先得補給，反而是能拖就拖。從客觀的角度來看，一支精實、充裕的日軍與虛弱內鬥的華軍對陣，雙方的勝負，在未戰之前，早已有了定數。白崇禧曾經建議薛岳，考慮將決戰南移到衡陽，以拉長日軍的補給線，加強華軍在衡陽的防務，但是薛岳沒有完全接受，仍然決定在長沙與日軍對決。

橫山勇決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軍在對馬海峽大破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的歷史光榮紀念日，在湖南發動對華軍全面的攻勢作戰。裝備充足的三十六萬日軍，在優勢火力的支援之下，分成七路撲向華軍陣地，來勢之凶猛，遠遠超過華軍的預估。日軍精銳的第三、十三師團以及二十七師團，從左翼（東線）先攻，一舉深入地插進平江，再突進瀏陽，直搗薛岳預控的反擊部隊基地。

接著在中路的日軍第六八與一一六師團，分成六路強渡新墻河，第三四與五八師團隨後跟進，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連續擊破華軍的層層防線，直撲長沙；第四十師團與五、十七旅團，渡過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進攻長沙的西方。日軍這樣全面的攻勢，使得華軍在湖南的陣地，全都遭到日軍猛烈的攻擊，薛岳在長沙東南所佈署的反擊部隊，更是首先陷在日軍的多重包圍攻勢之中，天爐作戰計劃就完全失去了應變的能力，湖南成為日軍全面縱橫的戰場。

這時候在緬甸原始叢林指揮作戰的史迪威，在看到華軍全線潰敗之後，才「想起」了他還是中國戰區參謀長。他於六月八日突然出現在重慶，幸災樂禍地宣佈『中國陷入危機』，接著立刻派員督導美軍從桂林的訓練中心進

行撤退，同時不斷設法干預陳納德的空軍後勤支援，並且開始推動接掌華軍指揮權，以及尋找可以推翻蔣介石軍政領袖的活動。史迪威完全不管這個中國戰區作戰慘敗的災禍，是誰做出嚴重錯誤的情報判斷，以及致命的錯誤作戰佈署？到底是誰仍在制肘空軍出擊日軍的任務？史迪威居然認為，只有他接掌華軍的指揮權，才能在中國地區擊敗日軍，而其他任何對於戰場的補救與支援措施，根本無濟於事⁶。

由於薛岳軍力不足以及佈陣錯誤，加上軍方上層的嚴重內鬥，在日軍絕對優勢兵力的多重攻勢與連環包圍之下，華軍在湖南的整個戰局失去了控制。長沙外圍的戰略據點，很快地就先被日軍攻佔，六月十四日，日軍攻佔瀏陽，截斷了薛岳反攻長沙的外圍作戰部隊；次日陷寧鄉，長沙於是受到日軍全方位的包圍。中國第四軍已無法用傳統的防禦方式，來守住長沙；原本在長沙外圍待命的機動部隊，先遭到日軍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援長沙的防禦作戰。這時候，另外一支的日軍，更成功地攻佔了岳麓山的長沙砲兵制高點。

此時守城的華軍與敵軍的兵力懸殊，制高點又遭日軍攻佔，外圍援軍更已被日軍主力猛攻而自顧不暇，因此日軍終於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長沙，而打破了華軍過去長沙作戰不敗的記錄。蔣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槍決突圍而出的長沙第四軍軍長張德能，但是仍然無法挽回湖南戰局潰敗的發展。

日軍作戰計劃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時奔襲衡陽。橫山勇在日軍在還沒有攻陷長沙之時，就已經下令第六八師團與一一六師團，繞過長沙外圍，馬不停蹄地沿著湘江兩岸，直接撲向衡陽華軍陣地。此時薛岳所指揮的主力部隊，則向江西方向敗退，根本無法攔截日軍的長趨直下，整個第九戰區的防衛系統為之瓦解。

這時湖南前線的作戰陷入危機狀態，蔣介石無法把擁有美式裝備以及員額充足的八個軍部隊，調回東線作戰，而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手下戰力不足的部隊，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擊。事實上，日軍指揮官橫山勇最為擔心的，就是蔣介石會把這八個軍調回，在湖南與日軍決戰。橫山也擔心美軍會調動一切的空軍，支援華軍作戰，對自己脆弱的補給線進行全面切斷的空中攻擊。

但是這兩個擔心都沒有發生。因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極力阻止中國戰區進行反擊，並且抬出羅斯福總統與馬歇爾助陣，主張當前反敗為勝

⁶這種完全瘋狂與違背常理的行爲，也只有史迪威這種人才作得出來！

的要務是，由史迪威接掌華軍指揮權，最好能夠順帶推翻蔣介石政權。由於華軍接連在河南與湖南戰場的慘敗，史氏又早已在重慶政府中，進行各種搽沙子、挖牆腳工作，使得前線部隊急於等待後方明確的指揮，以及派軍援助之時，後方卻陷入全面的權力鬥爭、指揮系統混亂、以及後勤失控的狀況。

這時候，拼命為華軍出力的，還是指揮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陳納德將軍。他設法透過管道向華盛頓反應中國戰區所面臨的危機，以及史迪威利用機會奪權的真相，無奈當時華盛頓與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諾曼地登陸戰的勝利，因而對於中國戰區的惡化逆轉，產生極大的輕視與厭惡。西方主流意見於是認定：『果然是史迪威有遠見，早就說蔣介石的華軍不堪一擊，現在得到證明了吧！不僅如此，還要連累美軍替蔣介石收拾殘局。』

這裡也不能不提陳納德的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在這場逆勢作戰中，奮不顧身的英勇表現。儘管史迪威把能夠動用支援湖南戰場的空軍戰機，縮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彈的供應上，盡可能做到百般刁難，同時湖南的天候又豪雨不斷，影響到戰機出擊，但是陳納德仍然想盡一切的辦法，率領部屬出動戰機，全力攻擊日軍的補給線與陣地，為支援華軍作戰爭取更多的油彈與補給品。美機飛行員平均每天出擊四次，中間休息的時間只夠吃飯與聽取攻擊目標的簡報而已，戰機沿著湘江的航道低飛攻擊日軍，甚至低到連螺旋槳都濺起水花；美軍二十三大隊的四個中隊長以及半數的飛行員被擊落。

炸毀日機九十架，造成日軍補給線多次的中斷。從長沙到武漢的日軍補給線

就著火光，無需導航而直飛漢口，進行轟炸。日軍承認，在湖南的作戰之中，約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機攻擊下致死的。假如陳納德能夠得到三百架戰機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後勤供應⁷，應該可以全力摧毀日軍部隊的補給系統，那麼戰局會有極大的變化。

34.5 鬼泣神嚎的衡陽保衛戰

日軍以為在長沙會戰中，已經將華軍第九戰區的防禦系統，予以徹底的

⁷如果沒有史迪威的阻撓，美空軍給予這種程度的支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擊潰，雖然沒有圍殲中國的主力兵團，但是華軍在受到重挫之後，已失去再戰的能力，對於日軍進行長距離奔襲衡陽的作戰，橫山勇更以為把握十足。事前衡陽在日機猛烈的轟炸之下，衡陽市區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橫山認為，日軍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佔衡陽。但是橫山沒有想到，由方先覺所率領的中國第十軍，卻在衡陽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陣地保衛戰，差點把橫山的完勝攻勢，搞成淒慘的大敗仗。

由方先覺將軍所率領的第十軍，是一支作戰表現出色的部隊，曾在長沙與常德的會戰中，與日軍進行多次正面的惡戰，有著非常優異的表現。參與衡陽防衛作戰的華軍部隊，包括了預十師（葛先才）、第三師（周慶祥）一九〇師（容有略），暫編五四師（饒少偉）。第十軍在奉命防禦衡陽之後，立刻在衡陽地區，利用山岳與河道的複雜地形，開始構建防禦工事，此時美軍在桂林的步兵訓練中心，感到戰局的發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將一批帶不走的美軍訓練用裝備，交給第十軍使用。當時方先覺根本沒有想到，湖南的戰局，會惡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隊要孤軍防守衡陽四十二天，血戰到彈盡援絕的崩潰地步。這也是抗日戰爭中，中國部隊被日軍全殲的唯一軍級單位。

由於薛岳把第九戰區的殘餘的部隊，集結在湖南與江西交界的一帶，企圖等日軍深入之後，反擊日軍的側後。但是薛岳的這個佈陣，卻遭到日軍主力兵團向東旋轉的多路圍攻，因此不但無法發揮側翼包抄日軍的效用，反而讓南方的衡陽陣地，出現兵力支援分配不足的危機。日軍在攻佔長沙的同時，橫山勇對衡陽發動長距離的奔襲突擊，日軍第六八師團（佐久間為人）與一一六師團（岩永汪），沿著湘江東西兩岸，分途包抄衡陽；第六八師團的決死突擊隊，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佔了美軍在華最大的空軍基地衡陽機場，得到了日皇親自的傳令嘉獎。

六月二十八日，日軍奔襲衡陽的兩個師團，對衡陽完成鉗形包圍，同時日本飛機對於衡陽守軍的陣地，進行全毀性的地毯式轟炸。日軍認為單是這樣的打擊，以及優勢的兵力與火力⁸，衡陽已是日軍的囊中之物。但是橫山萬萬沒有想到，鎮守衡陽的華軍第十軍，陣地被毀，戰志依然不為所動。中國軍隊對日軍展開猛烈的反擊，造成日本六八師團長佐久間為人受到重傷，

⁸日軍在華作戰，一向是一個師團攻華軍的四個軍，從來沒有像這次的兵力配置，用兩個師團圍攻中國一個軍。因此橫山勇認為，據守衡陽的華軍，應該一觸即潰。

日軍的攻勢爲之受挫。

橫山沒有一舉攻下衡陽，甚至造成東京的震動，因爲此時東京的最高軍政負責人首相東條英機（身兼總參謀長、陸相、軍需大臣），已經岌岌可危，面臨著辭職的壓力，他需要日軍更大的勝利消息，才能支撐他的地位。因此他透過私人親信作戰部長真田穰一郎少將，到達武漢，直接向「中國派遣軍」施加壓力，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更是急得不斷催促橫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陽，並且加派參謀長松井久太郎，直接到達衡陽前線，對橫山施加壓力。

這時橫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陽是遇到對手了，必須要小心應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壓力之下，調集所有的兵力，圍攻衡陽，他準備把衡陽當成決戰地點，企圖以圍點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東部的部隊前來支援，然後日軍再發動多重包圍，一舉圍殲華軍第九戰區的主力部隊。不料日軍第二度的攻勢，仍然無法得到明顯的進展。中日兩軍在衡陽陣地爭奪戰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階段，雙方在充滿血水的壕溝之中廝殺；每天都在焚燒腐爛的屍首，以防止瘟疫的發生。但是日軍對衡陽的攻勢，只推前了兩公里，仍然被第十軍給擋住了。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陽之戰，不但是中日主要戰場的決戰，更是發展成爲中日兩國內部的政治戰。對於蔣介石與東條英機而言，衡陽作戰的勝負，都關係到自己最高軍政領導權的掌控。因爲在七月七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求蔣介石將華軍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國戰場的敗局。因此除非蔣介石能夠證明，他能指揮華軍擊敗日軍攻勢，否則蔣介石將要面臨美國孤立、外援中斷，以及部屬叛變的危機。而日本首相東條的情況，同樣需要戰勝的消息來支持，否則日本的軍政領袖，已經對於他的領導與政策失去信心，東條將會被迫辭職。

但是在爭取這場決戰的指揮上，蔣介石無法把最有戰力的部隊，從緬甸戰場調回，因爲這是史迪威爭取華軍指揮權的本錢。史迪威使用優勢兵力，在緬甸獲得勝利；而同一時候，蔣介石在華南卻遭到日軍猛烈的打擊，所以羅斯福認爲，這足以證明蔣無法應付日軍的攻勢，而史氏有能力指揮華軍打敗日軍。在日本方面，東條則是將所有的軍力，包括抽調關東軍的二十軍，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師團，都投入了湖南的戰場。可是日軍仍無法在七月攻下衡陽，同時日本又在緬甸與塞班島遭到慘敗的打擊，日皇裕仁已經對於

戰局感到震動，東條在元老重臣集體的施壓下，只有被迫辭職下台。

蔣介石此時急切希望能夠解衡陽之圍，至少能夠救出第十軍。但是薛岳已無兵力馳援衡陽，因為他手邊只剩下有限的殘兵，退到湖南江西邊界集結，又得不到兵力與裝備的補充。不過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設法從湖南、江西的邊界，對日軍的後方發動側擊。雖然這種攻擊對於日軍進攻衡陽的補給線造成壓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擊位置又遠離衡陽，因此無法對日軍造成真正的威脅，對於衡陽的守軍，更是沒有多大的幫助。這時蔣介石只有親自介入，指揮六十二軍、七十九軍與九十九軍，參與衡陽解圍作戰，但是由於作戰密碼完全被日軍解破，讓橫山能夠充分掌握到華軍的作戰動態，進行各種有效的攔截，並在在衡陽外圍設下多面埋伏，造成華軍更大的作戰傷亡。中國援軍的兵力與火力仍有限，始終無法突破日軍層層的包圍圈。

此時第十軍全靠一些美機的空投物資，繼續進行防守作戰。但是由於史迪威希望華軍作戰失敗，所以對於陳納德的空軍支援作戰，總是設法加以制肘。陳納德要設法四處張羅更多的油彈供應，以增加對日軍的空中壓制⁹。陳納德若是充分能夠得到美國軍方、政府全力的支援，應該可以達成阻絕日軍補給的作戰任務，因為日軍支援衡陽作戰的補給線，已經多次受到美機嚴重的打擊，日軍的彈藥與糧食幾度都無法接濟上攻勢的運作，其部隊也瀕臨作戰失敗的壓力。

華軍前往援救衡陽的部隊，在七月底時，曾經一度前進到與守軍只相差幾公里左右的距離，但是最終還是被日軍靈活的截擊壓退，沒有達成救援第十軍的任務。這時方先覺的部隊，已經是傷亡過半，不但是彈盡援絕，連吃飯的補給都成了問題¹⁰。

但日軍在衡陽的作戰，也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迫使橫山一度也在考慮，是否值得在此繼續打下去。因為即使日軍的作戰力量，也到了極限。但是這場作戰的勝負，已經成為中日兩國軍力對抗的榮譽之爭了，說什麼橫山也不能放棄，何況關東軍的戰將坂西一郎，已經到達湖南，接掌長沙的指揮權，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後的結果恐怕不妙，連職務都會有變數。最後橫山勇決定，將日本十一軍的全部軍力當賭注，完全都押在衡陽，再增調十

⁹當時美軍駐成都第二十航空隊，有自己獨立的油彈供應，負責對日本本土的戰略轟炸任務，但是對於華軍在湖南的緊急作戰需要，卻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觀。

¹⁰當時華軍野戰部隊幾乎是沒有醫藥補給的。第十軍的傷兵與病患，不但完全沒法得到照顧，還要在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的天氣，與發炎的傷口下，繼續作戰。

三、五十八師團，參加衡陽決戰。他並且不惜代價地運送威力強大的巨砲，到達衡陽陣地，準備給孤立無援的方先覺部，最後致命的一擊。

八月二日，日軍對衡陽發動最後一波的攻勢，橫山勇帶病親自前往衡陽前線指揮作戰，而四個參戰的日軍師團長，當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著橫山，準備拿出老命一搏。各師團紛紛組織敢死隊，對華軍陣地進行冒死攻擊。日軍的巨砲再度轟平華軍的每一個陣地，日軍的敢死隊對華軍的據點，一個接一個地展開攻擊，守軍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軍五十七旅團長志摩源吉少將，更是由自己擔任敢死隊的隊長，親自帶兵衝鋒華軍陣地，結果戰死衡陽。有受城市作戰特別訓練的五八師團，師團長毛利末廣中將作戰負傷，卻不肯就醫，躺在擔架上親臨戰場指揮作戰，可見戰況之激烈¹¹。

此時衡陽的決戰，其慘烈程度已使陣地成爲了人間地獄。蔣介石在最後時刻，仍然設法派軍隊救援第十軍，連第五軍的坦克車部隊都派到戰場。但是此時中國戰區的華軍，已經無法將士用命地拼力作戰了。因爲有了國際力量的介入與刺激，內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復燃，而更加惡化了軍隊人員不足、裝備後勤嚴重缺乏、軍心動搖、士氣低落的情況，因此無法動員軍力突破日軍層層包圍的防線。第十軍方先覺部，在堅持血戰四十二天之後，最後在八月八日，終於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軍也損失慘重，無力再進攻下去。因此雙方經過交涉之後，在日軍允許保持軍隊建制與榮譽，以及救助受傷官兵的條件下，結束了孤軍拒敵的抵抗。中國第十軍在衡陽的保衛戰事實是以交涉之「終戰」而結束，而非投降日軍。

但是，事後橫山勇卻宣佈，日軍終於攻陷衡陽，完成「圍殲」華軍的第十軍，把原先答應第十軍的「終戰」禮遇，改成「俘虜」的對待，這是中日戰爭中，華軍唯一被「俘虜」的師級以上單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軍高級指揮部，對於方先覺的第十軍，作戰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無限的敬意¹²。

衡陽終於陷落，史迪威理所當然地開始進一步的向蔣介石逼宮。蔣眼見自己部屬們的戰志出現動搖，並且開始私下運作而向史迪威靠攏。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國的要求讓步，準備交出華軍的作戰指揮權

¹¹ 不知所謂國民政府自武漢會戰之後，就沒有與日軍決戰的歷史抹黑說法，看到長衡會戰的這種打法，還有沒有良心造謠下去。

¹² 方先覺與多位高級部屬，先後從日軍手中安全逃脫，他們全都否認，曾經正式向日軍投降。日軍也拿不出正式降書的證據，當時雙方只是協議終戰而已，因此他們受到禮遇，才能順利地脫逃。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說成終戰，而把方先覺將軍第十軍的終戰，說成投降。

給史迪威。當時中國上下，獨立奮戰的信念已失，企圖依賴美軍直接的介入，能夠給中國的抗戰，帶來起死回生的力量。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危機時刻。

34.6 日軍「一號作戰」的檢討與其造成之後果

中國軍隊在河南、長沙與衡陽決戰中，連續地受創與失利，的確影響到中國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佈局與民心士氣。特別是過去第九戰區的薛岳，已是日軍無法擊敗的英雄形象，如今卻遭到連串重大的挫敗。美軍在華南所使用的主要空軍基地，也遭到日軍的攻佔與破壞。在史迪威與外國記者的爭相報導之下，中國戰區重大敗仗的新聞，與盟國在諾曼地、蘇聯戰線以及馬里亞納群島的大勝對照，更是使得西方國家的輿論，斷定中國戰區的戰力表現，根本是一無是處，因此要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呼聲大幅地提高。

檢討整個一號作戰，日軍是將最後能夠動員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擲地全都投在中國戰區裡。日本要給中國一個致命的打擊，以挽救作戰資源航線的安全，與建立其亞洲大陸的決戰腹地。但是在中國戰區內，史迪威卻以參謀長的身份，誤導情報判斷、干擾戰區整個作戰的準備、故意延遲援助行動、不斷製造中國戰區內部的矛盾與危機、阻止空軍的全面參戰¹³，這樣才造成日軍能夠集中運用各種的作戰優勢。而中國僅有的一點新生作戰力量，還要全數分散到緬甸戰區作戰，當然會造成華軍的慘敗結果。

不過，日軍在戰場的勝利，也贏得相當辛苦與僥倖。在華北戰場上，假如當時八路軍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對於華軍採取見死不救的策略，以共軍當時在華北的實力，可以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全面切斷日軍的補給線，那麼日軍很難在華北平原上，進行快速與飄忽的攻擊行動。因為這時候的延安與重慶，幾乎已經進入全面的政治鬥爭狀態。為了提防八路軍對國軍發動攻擊，重慶方面以二十一個師的部隊，在陝西中北部地區佈防，一部分的任務就是盯著延安。

此時的八路軍，則擁有六十萬行動敏捷、作戰剽悍的游擊部隊，竟然是坐視日軍對中國從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勢。事實上，當時的共軍若是全力出

¹³除了十四航空隊的一五〇架戰機外，美空軍並沒有面臨其它緊急、特殊的狀況，卻奉命只可袖手旁觀，不准支援危急的華軍戰線。沒有任何道理可以為史迪威辯解的。

戰，可以讓抽調一空的日軍，在華北全面地癱瘓。如果要抗日，這絕對是戰略上的打法。但八路軍卻除了收編華軍殘兵，與擴大地盤之外，沒有果決全力的出擊。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期間，八路軍樂為缺席的旁觀者，是造成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悲劇收場的最大原因之一。因為在盟國中，最後支持中國的政治力量，就在這場作戰中崩潰，從此他們轉而認為，中國沒有實力可以痛擊在亞洲大陸的日軍。因此中國遭到雅爾達密約之陰謀陷害，從此成爲了不可挽回的發展。在抗戰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刻，中國除了要遭到美國與英國內部反華勢力的打擊之外，自己裡面還進行全方位的內鬥，如何能夠抵擋日軍最後傾全力出擊的攻勢呢？

而在長沙與衡陽的作戰中，薛岳的失敗，固然與他拘泥於過去長沙大捷的作戰佈局有關，但是當時處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由於史迪威在中國進行拉幫結派的反蔣活動，因此使得蔣介石面臨權力鬥爭的危機，不得不冷凍宋子文與削減陳誠的軍權，而重用何應欽。但是何應欽一向與兩廣的軍方將領不和，何既然當權，白崇禧、薛岳與張發奎當然都會受到排擠，造成這些參加指揮湖南決戰的將領們，既得不到足夠的兵力與軍火補給，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層的情報與命令，因此薛岳只有憑藉自己的獨斷，來進行作戰。這樣何應欽也就更有理由懷疑薛岳等人的忠誠，不敢把僅有的一些武器與兵員，放心交給將領們運用。而當時的薛岳，卻是最需要這些作戰的力量來進行決戰。

在史迪威在中國參加權力鬥爭的運作之後，蔣介石開始懷疑兩廣將領的忠誠，是有事實根據的。當時的廣東將領李濟琛，的確在衡陽戰事最爲緊急的時刻，向美國提出推翻蔣介石的建議。他表示他正在與西南八個省的軍政領導人連絡，只要美國支持他的行動，他就會發動政變，推翻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同時山西的閻錫山（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也早在壓力之下，與日本進行妥協的安排，所以中國僅有的一點戰力，還受到政治傾軋的考量，不能全力發揮。

而在戰略的佈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軍採取孤注一擲作戰的實力與決心。這次日軍動用的兵力，已是歷次長沙會戰的三倍以上，整個作戰的戰線，覆蓋整個湖南北中部，但薛岳連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適當補充，他在作戰縱深的安排更是不夠。如果他把決戰的地點安排在衡陽以南，而非長沙附近，同時要把更多的部隊佈署在湘江以西，而非傳統的湖南東部山區，這樣

日軍在東邊的主力攻擊就會撲空。而在湘江以西，華軍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軍掩護以及複雜地形地保護，有效牽制日軍戰線的側翼。

事實上，日軍進攻衡陽主要的補給線，是由武漢經洞庭湖及湘江的水運。薛岳若是能夠在衡陽以南佈置決戰大軍，並且在湘西佈署重兵，以進行截斷日軍湘江水運的作戰，在美軍戰機的優勢戰場阻絕攻擊下，應該可以嚴重摧毀日軍的補給系統。這樣一來，日軍很可能會在衡陽會戰中，遭到兵力更大的華軍抵抗，補給線也更為脆弱，橫山勇能否贏得衡陽會戰，反而真的大有問題了。因為在衡陽作戰的日軍，幾度因為補給不濟，被迫吃樹皮草根，戰場運動又遭到美國空軍的壓制，造成重大傷亡，迫使橫山勇曾經打算放棄對衡陽的進攻。

蔣介石當時也在內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狀況下，失去指揮全局的權威與信心。在整個衡陽會戰的過程中，蔣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屬（這時究竟誰是史迪威的內應，誰會參加推翻蔣介石重慶政府的政變，誰都沒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應欽以及蔣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陽作戰的指揮，如此分散的指揮系統，如何能夠集中有限兵力，做出有效的運用？

當然，假如史迪威能夠扮演一位稱職的中國戰區參謀長，能夠了解中國戰區決戰的勝敗，關係亞洲的戰略全局的未來安排，而不是躲到緬甸叢林去打突擊戰，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國戰略預備隊，去為他自己進行緬甸原始山區的作戰，而不能回師中國戰區解危。這樣中國戰區的戰局也會有決定性的不同。

假如史迪威能認真執行其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責，面對這場大決戰，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全局作戰佈署的策略，其實他是可以在歷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國戰區面臨決戰的警告，要求美國迅速大量增加對中國作戰物資的援助，增調美國空軍支援中國戰區，放手由陳納德指揮空軍，以及全力支持蔣介石將精銳的遠征軍回防湖南，參與衡陽決戰，那麼整個戰局的結果必然完全不一樣。日軍若在衡陽遭到慘敗的打擊，整個中國戰區的局勢必成為日軍的夢魘，日本很可能會提早考慮投降與和談。不但不必蘇聯參戰，美國也不必對日本投擲原子彈了。

以整個戰局分析，假如當時盟國的領袖，能夠把長衡會戰當成盟國在亞洲大陸的主力決戰，看成是同盟國可以利用的歷史機會，以擊潰日軍在亞洲大陸的主力，那麼盟國可以提前展開亞洲大陸戰的攻擊矛頭，直接擊潰日軍

在中國戰區的戰略行動。這樣不但可以減輕盟軍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區所受到的軍事壓力，日後也無需接受蘇聯參戰的勒索，甚至會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減少雙方軍民的傷亡。

所以面對衡陽會戰這樣一個事關重大的會戰，盟國應該在接到情報之後，就擬定一個跨戰區的緊急軍力動員計劃，全力優先支持陳納德指揮中國戰區所有的美國空軍作戰；同時至少能夠增派二百架最新的 P-51 野馬式戰機，與一百架 B-29 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給陳納德全權指揮。盟軍飛機必然可以徹底地炸平日軍在漢口、岳陽、到長沙的軍需補給中心，以及完全封鎖長江、洞庭湖與湘江的日軍補給航道¹⁴。在此狀況之下，不但日軍從武漢到衡陽的補給線將會被盟國空軍炸到柔腸寸斷，造成前方部隊根本動彈不得（當時進攻衡陽的日軍，就在陳納德有限的空軍攻擊下，部隊的口糧、軍火曾經幾度遭切斷的危急狀況），而且盟國空軍擁有的絕對空優，將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萬的部隊完全暴露在戰機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隊的運動都必須要付上極大的傷亡代價。同時蔣介石若能夠調回八個裝備與戰力齊全的駐印軍與遠征軍，參加衡陽會戰（試想假如全部美式裝備的新一軍與新六軍參加衡陽解圍，結果會有多大的不同！），那麼橫山勇不但無法得逞，日軍反而會在衡陽，遭到徹底的挫敗。

綜觀這場事關中日之間的大決戰，假如八路軍不坐視重慶軍的受到猛攻，能夠全面在華北發動攻勢，以及中國的遠征軍能被調回參戰，美國空軍又能不受到人爲的制肘並得到大量的支援，那麼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必定會在衡陽以慘敗收場。影響所及的是，美國將會大幅增加對中國軍隊的支持與信心，中國軍隊可以乘勢打通華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時羅斯福可以看出中國軍隊可以有力量痛擊日軍，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簽訂雅爾達密約，將蘇聯的力量引進東北亞。

而事實上是，日軍能夠取得一號作戰的勝利，讓中國陷入抗日信心危機的大混亂之中，主要的功勞應歸給馬歇爾與史迪威。因為他們長期從基本上破壞中國戰區的戰力，同時在戰況最爲危急時，沒有大幅增加美國空軍的攻擊，也不准中國調回遠征軍馳援受困的部隊，反而急著在中國戰區進行奪取軍權的逼宮鬥爭。在這種情形下，華軍方先覺將軍所率領的第十軍，在絕對

¹⁴這對盟軍來講，一點都不困難。因為美軍在歐洲擁有五千架第一線戰機，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線戰機，隨時可以調動三、五百架，前往印度與中國的基地，對日軍進攻湖南的補給線，進行毀滅性的轟炸，以全力支援華軍在湖南衡陽的決戰，而在此一舉擊敗日軍主力。

劣勢當中還讓日軍幾度受挫，中國軍隊所作得甚至是超過血肉之軀的絕對極限了。這種悲壯卓絕的戰力，證明了華軍是敗在盟國裡企圖壓制中國的一撮人手中，而橫山勇與岡村寧次的勇敢善戰，只是中國戰敗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與馬歇爾才是決定中國在這場會戰失敗的真正關鍵人物。

但是日軍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戰略的大錯誤。如此一來，日本將最後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擲地投入華南。結果日本並未能因此而擊敗中國，以挽回自己的敗局，反而造成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兵力嚴重空虛，給予蘇聯「參戰」（其實是劫掠）而輕鬆獲勝的可乘之機。實力被抽調一空的關東軍，對於蘇聯紅軍的攻擊，表現的是近乎毫無招架之力。日本終於在歷史的決戰上，給俄國檢到洗雪日俄戰爭恥辱的機會。同時蘇聯入侵中國的東北與朝鮮半島，給東北亞帶來半世紀的戰火與威脅。這些都是日本一號作戰計劃得到「勝利」的歷史後果。

從重創中復原與反攻的計畫

這場廣西會戰，可以說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華軍方面最為慌亂與失控的作戰。中國當時的情況可用「人心動搖」與「軍心潰散」來形容，史迪威的效應，在此充分地發作，中國戰區內外都陷入一團亂戰之中。幸好蔣介石最後終於做出斷然處置的決定，撤換史迪威，以終止中國戰區整個指揮系統的根本亂源，然後又大膽地從西北抽調部隊，到華南防止日軍的進攻。同時蔣介石也與新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配合無間，最後在這個幾乎亡國的邊緣穩住了局勢。

日軍在取得衡陽會戰的勝利之後¹，其精銳的軍力，卻陷在離本土遙遠的中國華南，這正是日軍戰略佈局上致命的失誤。不過這時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極為需要一些「勝利」的消息，來維持已經露出崩潰的作戰意志。特別是剛剛組成的小磯國昭與米內光政聯合內閣，已經奉命開始設法尋求結束戰爭的方式。從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經不再追求戰爭的勝利了，而是希望能夠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戰協議。

日本政府一直認為，設法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更是其第一優先之政略目

¹其實日軍的這個勝利，贏得相當倥倥，主要是歸功於馬歇爾、史迪威與丘吉爾的聯手「合作」，把中國戰區所應得的外援掐住，使得華軍戰力耗竭，在日軍投入決戰兵力之時，中國還要把戰略預備隊投入在緬甸的原始森林中，進行無謂消耗。

標，所以希望能夠軟硬兼施地要求蔣介石，能夠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因此小磯國昭政府對蔣介石，提出相當低姿態的和談條件：只要國民政府肯接受和談，日將放棄所有長城以南，滿洲國之外的所有佔領地區，並且將香港交給中國。這是中日全面戰爭以來，日本姿態最低的條件了。但是蔣介石仍然拒絕接受。

蔣介石這種抗日到底的決定，迫使日軍大本營在面臨生死存亡選擇的關鍵時刻，繼續將其有限、也是最後的軍力，進一步推進到遠離日本國防核心的中國戰區。因此日軍就算成功地攻佔華南，也不能彌補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戰略據點的損失。如果日本決策核心真有智慧與勇氣的話，既然它已決定尋求停戰和談，就應開始全面收縮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國的東北地區，全力加強防務，才能使得盟國無法順利打擊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時公開宣佈接受停戰，這樣盟國才可能考慮，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價，而願意與日本進行投降條件的商議。但是日軍大本營這時卻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衛出現戰力空虛的問題。盟國因而得以乘虛進擊，將日軍主力隔絕在中國戰區，而能以較少的代價，就打擊到日本的本土了。在這種情況下，盟國當然不會接受日本的停戰要求。

35.1 日軍決定發動廣西會戰

日軍為了進一步的擴張在中國華南的戰果，以迫使中國屈服，特別在武漢組成了第六方面軍，統帥日本的十一軍、二十三軍與三十四軍，準備在華南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入作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軍大本營下令，由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出任第六方面軍的司令官，準備完成一號作戰計畫的第三階段作戰任務，就是打通大陸走廊，消滅華南美國空軍基地。

日大本營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別派遣參謀本部作戰部長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陽前線視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軍的日軍將領表示，日軍目前唯一的作戰希望，全都寄託在中國派遣軍的表現上了。因此大本營正把最後所有可以動員的力量，都將投入中國派遣軍，而第六方面軍的勝利表現，已經成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託。日本軍部再度展現出這種輕重難分的拙劣戰略觀，當然註定日本要無條件投降、大軍全數戰敗繳械的命運。

這時，日本十一軍的司令官橫山勇，更是把日本興亡與十一軍的表現，完全視為自己的責任。因此橫山動用戰場的獨斷指揮權，下令部隊儘量擴張其戰力的延伸，並決定不顧日軍戰力的疲憊，更不理會中國派遣軍的限制命令，強行將十一軍的追擊線，從衡陽四周擴張到廣西。日軍在九月十四日攻佔了全縣，掌控了進入廣西省的戰略隘道，為進攻桂林做好地緣戰略的準備。盟國在全縣建有極大的軍需供應基地，在華軍倉皇退卻之時，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連燒數日，讓中國部隊的戰力受到不小的影響。

而橫山勇的獨斷作戰之所以成功，當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內應「幫忙」正當前線全面軍情告急之時，中國戰區的決策階層，卻在史迪威的指揮下，進行全面的權力鬥爭。因此中國戰區指揮系統陷入癱瘓，後勤與兵力補充完全各自為政，各個戰區指揮官都已失去作戰的信心。橫山勇於是撿到了便宜，雖然中國派遣軍司令畑俊六嚴重不滿橫山作戰的獨斷與不顧命令，但是他既然獲勝，連司令也是無可奈何。

橫山勇的大膽冒進成功，將兵力直指廣西，也引動廣東日本二十三軍躍躍欲試，以免功勞全被十一軍給搶走。二十三軍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進，攻克廣西的梧州。這樣一來，日軍即將對廣西發動兩路夾擊，廣西作戰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了。

果然日軍的勝利更增加了日軍大本營的信心。大本營繼續動員軍力加入第六方面軍，九月二十七日，從關東軍調來三七師團，二十八日又將二十軍調到衡陽，二十軍統帥二七、六四、六八與一一六師團，同時還從日本本土調來第四七師團，全都納入第六方面軍的戰鬥序列。

日軍大本營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準備繼續在華南，進行孤注一擲的戰略延伸作戰了。問題是，以全面的戰略佈署而言，日軍大本營在此犯下了極大的錯誤，因為當時日本的本土已經受到直接的威脅，日軍必須要加強鞏固接近本土決戰的地緣戰力，萬不應該把最後可以運用的力量，陷在遠離本土的華南。何況蘇聯的威脅已經日益明顯，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佔領，或是中國東北受到蘇聯的攻入，日軍主力卻集結在遙遠的華南，怎能對於整體戰局發生任何的用處？但是當時日本急於需要更多「勝利」的消息來支撐，顧不了這種戰略上重大的考慮。

一九四四年九月，當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華南，進行遠離本土的廣西決戰之時，中國也正陷在抗戰時間，內憂外患最為嚴重的危機之中，由於史

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造成中國無法及時做成各種兵力安排與迎戰的佈署。各個部隊指揮官，觀望蔣介石是否會交出權力，重慶的命令當然也就無法貫徹執行了。這種在作戰生死關頭，內部的離心離德，以及指揮後勤系統的錯亂，造成中國的野戰軍主力，北起黃河、南到粵江，全都遭到日軍重創。美軍在華南的主要空軍基地，同樣也遭到日軍極大的破壞。

中國在遭到這一連串的重大軍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經出現經濟嚴重困境的後方社會人心，產生了整體意志動搖的不安，因而影響到法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更是惡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國整個的政治局勢，也再度出現嚴重的分裂與內訌，不但延安與重慶之間勢同水火，此時八路軍更是擁兵不戰，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來「召安」。共軍利用日軍大量南下，擊破國民政府軍隊的有利時機，儘量擴大自己在黃河與淮河一帶的兵力與地盤（而不是對抽空的日軍佔領區發動果斷的攻勢以牽制日軍）。此時，國民政府各個戰區的司令長官與蔣介石之間，也發生了忠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與奪權鬥爭也在運作之中，因此造成華軍對日作戰戰力的全面下降。

一九四四年十月，當日軍調整好新的指揮架構，開始進行打通粵漢鐵路，及多路夾擊廣西的作戰之時，中國方面卻爲了史迪威所引起的複雜權力鬥爭，正鬧得不可開交。史迪威對蔣介石奪權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雲南的龍雲開始有準備自立的動作試探，軍事參議院議長李濟琛更是直接與美國的桂林領事館聯絡，聲稱只要美國政府支持他，他將準備聯合西南各省的軍事將領，共同「推翻」蔣介石的重慶政府，組織一個親美的西南聯省政府。史迪威開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試探他們取代蔣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沒有正面回應）

此時做爲蔣介石身邊親信的參謀長何應欽，在這種情況之下，則更加小心控制兵員與補給，他不敢充分補充忠誠受到懷疑之將領的部隊，特別是在前線禦敵的薛岳與張發奎部。因爲何應欽必須擔心，他們是否會參加響應反蔣介石的政治運動。因此在這個中日最後決戰的前夕，在中國方面，從中央到前線，都是陷入一團混亂的權力鬥爭之中，根本沒有擬訂任何可行的戰略，以進行軍力的準備，因應日軍一號作戰計畫的最後一波攻勢。

對負責指揮一號作戰華南攻勢的日軍最高戰地指揮官岡村寧次而言，日軍進攻廣西的戰略目標，是放在攻佔美軍在廣西桂林、柳州的空軍基地，以

及殲滅中國在華南地區的野戰軍，這是第六方面軍發動廣西會戰的主要作戰任務目標。至於與南方軍會師，打通大陸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為在盟國空軍取得壓倒性優勢，以及中國沿途都有游擊隊破壞的情況下，日軍根本缺乏陸路的運輸工具，也無法有效維持陸上全線的交通安全。因此這條貫通南北的「大陸走廊」，是不可能發揮實質的運輸功能。

岡村寧次對於廣西會戰，是設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勢，他令兵力最強的第十一軍橫山勇，由湖南經湘桂走廊，由東北向西南發動主力攻擊，先攻克桂林之後，再迅速將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應圍殲中國在廣西的野戰軍主力。而在廣東的二十三軍，則是沿著西江，由東向西前進，負責進攻柳州，這樣日本的十一軍與二十三軍的廣西會師，既可攻佔桂林與柳州的美軍基地，又可夾擊與殲滅華軍野戰軍在華南最後的主力。同時爲了分散中國守軍戰線的兵力，岡村寧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島的日軍，協調在越南北部的日軍，對廣西南部進行同步進攻。所以華軍第四戰區的張發奎部，就處在一個多面包圍的狀況之中，但自己又沒有生力軍可以調派。華軍在廣西可以說是危機四伏，也就難逃失敗的結果。

35.2 日軍作戰的內部衝突

不料日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竟然有著更爲旺盛的搶功企圖，他覺得自從日軍發動湖南作戰以來，十一軍的戰功，已經成爲日本全國軍民的精神寄託。因此他斷然決定，要將攻佔桂林與柳州的光榮，全都由自己「包辦」，而造成了十一軍公然的抗命事件，日軍因此無法在廣西圍殲華軍剩餘的主力。岡村寧次與橫山勇之間的「戰爭」，顯示出當時日軍指揮系統各自爲政的危機結構，仍在繼續惡化之中。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軍終於發動多面夾擊的廣西會戰。十一軍從湘桂走廊出擊，進攻桂林；二十三軍（田中久一中將）則是沿西江推進，目標是柳州；從雷州半島的日軍越過十萬大山進攻南寧，及從越南出動的日軍部隊，攻擊鎮南關。這時中國戰區的「史迪威內戰」才剛剛告一段落，蔣介石確定他的指揮權，美軍將領魏德邁在中國戰區最混亂與危亡的時刻，匆促上任中國戰區參謀長。蔣、魏所面對的，是信心動搖與士氣耗竭的華軍部隊，以及殘破與潰敗的中國戰局。「東京玫瑰」還直接廣播：『歡迎魏德邁

上任送死，假如魏德邁沒有成爲日軍的俘虜，還有機會在當年十一月底吃感恩節大餐的話，地點應該是在印度的加爾各答。』

長期以來對日軍造成最大傷害的第九戰區薛岳的餘部，在長衡會戰之後，早已殘破不堪，因爲忠貞遭到懷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編待命，而沒有進入廣西佈署。只有楊森的部隊退入廣西（這樣的安排是擔心薛岳與張發奎聯軍反蔣），張發奎的部隊也在支援衡陽會戰時遭到嚴重損失，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兵力整補。因此面對日軍多面的攻擊，第四戰區可以說是完全無力招架，美軍只有設法破壞在桂林與柳州的空軍基地與設施後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廣西一直是抗日大後方的地區，因此極多的學生、軍眷、與公務員集中在此。日軍一旦攻到，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後方進行盲目的逃難。因此在廣西通往貴州的一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擁擠與運輸的困難。這一幅幅人民顛沛流離與無助的景象，嚴重地動搖了整個中國抗日的人心士氣，當然也成爲盟國與西方新聞傳媒的笑柄。這些大量無助的逃難民眾，也經常影響軍隊的運動與補給運輸的順暢，更加深了士氣動搖的嚴重問題。

這時候橫山勇的日本十一軍，以六個師團，沿湘桂走廊猛攻華軍陣地，日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與火力，首先擊破兵力薄弱的華軍戰線，十一月八日，日軍重兵包圍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戰之桂軍的重鎮，李宗仁與白崇禧已經經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時軍心離散與人心思二，因而根本無法集中足夠的兵力防守，而發揮強勁的抵抗與反擊。日軍在圍攻桂林的同時，橫山另外派兩個師團的兵力，越過桂林外圍陣地，直撲柳州，企圖搶在二十三軍之前，同時吃下桂林與柳州的兩大重鎮。橫山勇沒有按照原先的計畫，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與進攻柳州的二十三軍，合圍中國第四戰區的野戰軍。

這時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眼見十一軍貪功抗命，破壞日軍夾擊華軍主力的作戰計畫，急電十一軍不得擅自搶攻柳州，但是橫山認爲，十一軍的戰功，主導整個一號作戰計畫的成敗，因此竟然大膽決定抗命，堅持由十一軍同時急攻桂、柳兩個重鎮，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軍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岡村寧次乾脆斷然下令，將十一軍圍攻柳州的第三與十三師團，改隸二十三軍指揮。不過，此時日本的二十三軍，剛好又遭到張發奎部隊，在桂平發動的反擊，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失，一時之間，無法即時進入攻擊柳州的戰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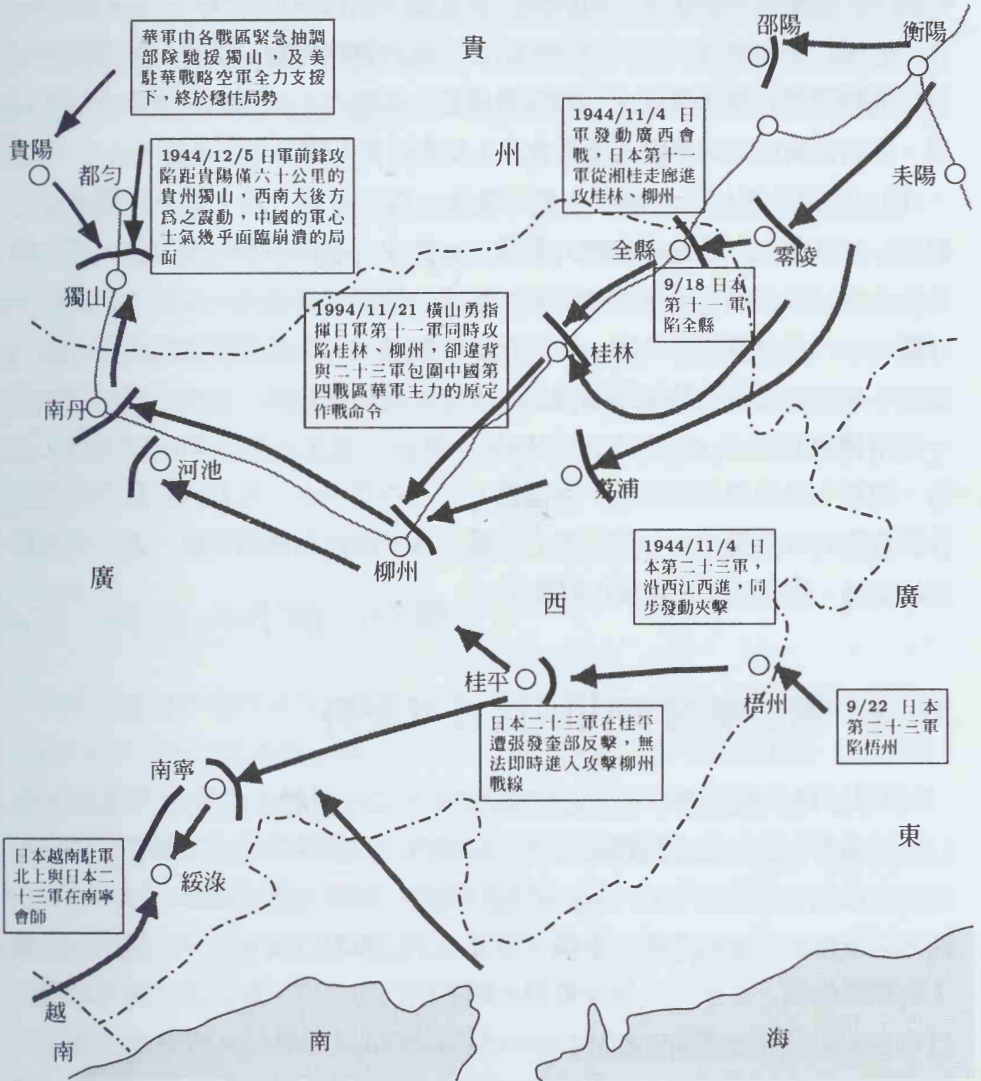


圖 35.1: 日軍一號作戰計畫廣西會戰

十一軍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藉口，因為準備改隸二十三軍的兩個師團，長期以來都是十一軍的子弟兵，師團長與橫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藉口當時軍情緊急，通訊聯絡不便等理由，拒絕接受改隸的命令，仍然聽從十一軍的調度。結果當然是由十一軍的橫山勇指揮，順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軍同時攻下桂林與柳州兩個主要的戰略據點。但是日軍卻因此沒有完成包圍第四戰區華軍主力的作戰構想。這時二十三軍也與越南入侵的日軍，分別在廣西的南寧附近完成會師，日本終於打通了大陸走廊。

橫山眼見華軍出現兵敗如山倒的亂象，廣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動的難民，以及失去組織建制掌控的華軍，因此決心繼續發動追擊掃蕩。橫山斷然下令攻佔柳州的日軍，設法沿著桂黔鐵路繼續強襲貴州，以擴大對華軍的打擊。十一軍這種近乎不顧一切的旺盛攻擊精神，驅動日軍進行馬不停蹄的攻勢，果然造成第四戰區華軍殘部的士氣更嚴重地耗竭。日本的騎兵部隊，一直沿路強攻貴州，華軍幾乎已經失去抵抗的意志，日軍簡直如入無人之地，驅趕中國的難民與敗兵一路逃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軍的前鋒打到貴陽的外圍獨山，中國的軍心士氣，幾乎面臨崩潰的局面，連自重慶撤退的提議，都已被正式地提出討論了。

35.3 緊急馳援獨山阻擋日軍攻勢

不過，蔣介石這時已經從「史迪威惡夢」中清醒，他堅持與重慶共存亡，以安定人心，並且從西北地區，抽調防共的部隊南下，準備在貴州迎擊日軍的攻擊。美國的軍方，則一路協助華軍，炸毀主要交通線上的橋樑，以遲滯日軍銳不可當的攻勢。不過在事實上，日軍的強攻貴州，原是橫山勇個人的獨斷作為，主要是一個乘勢擴大戰果而為的強攻，對於這種深入攻擊，日軍並未有事先的戰略安排與後勤補給，來支持部隊深入雲貴高原地帶作戰。至於立刻進攻重慶，更是沒有這個準備與能力。此時陳納德得到魏德邁全力的信任與支持，終於能夠動用美國駐華的戰略轟炸機支援，將漢口的日軍後勤中心，夷為平地，日軍整個華南作戰的後勤補給，受到極大的影響。

蔣介石又急調湯恩伯負責指揮貴州的防禦。從第一戰區中，抽調十三軍、二十九軍；從監視延安的胡宗南部，抽調第九軍與九八軍，並且先行下令衛戍重慶的九七軍，及軍校四分校的學生團，全力前往貴陽進行防衛。這

些部隊都要在崇山峻嶺中，徒步行軍最長達三千公里的路程，才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先後趕到廣西、貴州的前線。

事實上，當增援的華軍抵達貴州之後，日軍的攻勢力量，也到了耗竭的地步。當時攻入貴州的日軍，甚至沒有在雲貴高原冬季所需的棉衣供應。在華軍開始在貴州增加防禦能力的情況下，橫山只有下令日軍停止攻擊，調回衝進貴州的日軍。華軍增援部隊陸續地抵達貴州，因此對日軍的撤退發動了追擊，一直推進到廣西的河池，兩軍才形成了對峙的戰線。

這場廣西會戰，可以說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華軍方面最為慌亂與失控的作戰。中國當時的情況可用「人心動搖」與「軍心潰散」來形容，史迪威的效應，在此充分地發作，中國戰區內外都陷入一團亂戰之中。幸好蔣介石最後終於做出斷然處置的決定，撤換史迪威，以終止中國戰區整個指揮系統的根本亂源，然後又大膽地從西北抽調部隊，到華南防止日軍的進攻。同時蔣介石也與新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配合無間，最後在這個幾乎亡國的邊緣穩住了局勢。

35.4 中美合作戰局好轉

中國在這場作戰的慘敗，當然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正當日軍組成第六方面軍，要發動廣西會戰之時，正是中國戰區內部，因史迪威事件，出現權力鬥爭的休克狀態，大部分前線的部隊指揮官都受到這股政潮的影響，也都面臨戰志消沉與補給無著的困境。當日軍進行部隊的整編與裝備的補充的同時，華軍則進行內部的權力鬥爭，所有殘破的部隊，都得不到應有的整補，更別提新部隊的支援了，這樣的佈局對照，華軍自然無法避免慘敗的命運了。

日軍的橫山勇，固然是日軍前線的第一戰將，他那種獨斷抗命的作風，既創造了日軍強襲貴州的驚人勝利之舉，但是也失去了完殲第四戰區華軍的機會。因此在廣西會戰的戰事告一段落之後，岡村寧次升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立刻將橫山勇以及旗下參與抗命的三位師團長全都調走，徹底改組十一軍，將華南的作戰主導兵力指揮系統，改由二十軍負責。

雖然中國在廣西會戰中，以近乎慘敗的結局收場，但是中國戰區在史迪威去職後，很快就恢復了活力與生機。史氏一離開之後，魏德邁上任，中美

間過去持續發生誤會與摩擦而造成的緊張，幾乎得到全面的改善。美軍在華的空軍與指揮部之間，也取得空前合作與互信的狀態，中國的將領也再度團結一致地抗日。

魏德邁相當支持陳納德的各種空軍作戰建議，陳納德終於能夠成功地動員所有在中國的空軍戰力，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對於日軍進攻華南的後勤中心武漢，進行一次近乎摧毀性的大轟炸，由美國二十航空隊出動七十架戰略轟炸機，以及十四航空隊出動二百架各式戰機配合，將日軍在華中的補給中心以及其空軍，給予殲滅性的打擊，這就是陳納德苦苦請求史迪威長達四個月，都沒有得到批准的「打斷日軍補給中樞」的計畫²。在美機對漢口基地，進行焦土戰略轟炸之後，日軍對於華南部隊的整個補給數量，大幅下降了四〇%。同時魏德邁對於中國的後勤補給援助，也從來不玩政治考慮的分化遊戲，因而也能得到最佳的利用與分配。唯一可惜的是，一切都來得遲了。

魏德邁知道中國戰區的戰略地位重要，設法與蒙巴頓協商，將中國派在緬甸的美援部隊，分批的調回中國戰區作戰。這時英國政府又站在強烈反對的立場，因為英國需要中國軍隊的幫忙，擊敗在緬甸的日軍，才能更為早些收復在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而丘吉爾竟然又完全忘記了他的「中國軍隊無用論」，不同意中國軍隊回國作戰。不過，由於蔣介石與魏德邁站在同一戰線，中國當然有權調回自己的部隊，去防衛自己的國家。其實假如英國不是從中國調用最精銳的軍事力量，英國就連緬甸都無法收復，根本就沒有資格談對日作戰的貢獻了。

同時魏德邁看到中國部隊在緬甸作戰的戰績，深知只要給與中國軍隊適當的裝備與訓練，中國軍隊絕對能夠擔當大任，因此他決心加強訓練與裝備中國的陸軍部隊，準備在半年之內，推出擁有美式裝備與現代化編組的全新華軍，以參加反攻華南的作戰。因為此時美軍已經在太平洋戰場，攻克菲律賓，因此美國海軍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國華南的海岸。只要中國軍隊能夠攻佔華南的海港，美國的援助物資，就可以從海港運送。而一次十二艘的美國運補船隊，就可以運送等於美國駝峰空運援華全年的噸位總和。

蔣介石於是令何應欽負責中國新編陸軍的「陸軍總司令」職務，與魏德邁合作，在雲南進行編組全新陸軍部隊的工作。當時的計畫是分成四個方面

²由此可見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國慘敗，好讓他能控制中國軍事指揮權。

軍，準備組成三十九個「攻擊師」，三十一個「防守師」，這將是現代化新編華軍的骨幹，負責西南總反攻的作戰計畫，作戰目標是開放湛江港，以及收復廣州與香港。這樣中國就可以與美軍在華南會師，有了港口，中國也就可以得到美國答應很久，但是一直沒有給中國軍隊的援助與裝備了。

35.5 青年軍的組成與日軍的末路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當中國面臨全面慘敗的打擊之時，在抗日的後方，出現了知識青年從軍的熱潮，也是一個中國知識青年感人的愛國奉獻行動；由於蔣介石對於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的特別優待，在抗日戰爭國家面臨如此困難的狀況之下，學生仍然可以免費上大學，也不必當兵，國家還供給學生衣食。但是當學生青年看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局勢，面臨功敗垂成的危機之時，決定犧牲特權，投身軍旅。這時正是國民政府急需高素質的兵源，以接受美援軍事裝備之時。

所以當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救國的口號，立刻得到了青年學生熱烈的反應，兩個月內，多達十二萬青年報名參加從軍，造成人心士氣從低迷中的大振³。這些從軍的知識青年，最後組成九個師，番號為二〇一到二〇九師，定名為「青年遠征軍」而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素質最高的部隊。這股知識青年從軍熱潮，也是穩住當時局勢民心的力量之一。

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新任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認為唯一可能扭轉日本戰敗命運的作戰計畫，就是拚下最後的本錢，攻克中國的四川，迫使中國失去作戰的能力，這樣日軍可以有更多的籌碼，與盟國進行有條件的和平談判。岡村寧次的這個戰略構想，卻來得太遲了。日軍在打完一號作戰之後，日軍大本營已經沒有力量，再支持岡村寧次進攻四川作戰計畫。其實日軍在一九四四年，原先應該發動五號作戰計畫，進攻重慶與西安，對於日本扭轉整個戰局，可能會有更大的效用。

更為關鍵的是，日本在中國戰場上，再也沒有史迪威做為「內應」，因而日軍要想發動攻佔四川的攻勢，成功的機率將是極低的，單是來自中國戰

³作者的先父也報名參加青年軍，成為二〇七師中的一員。青年軍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蹟可以敘述！

區空軍的壓力，就可以徹底中斷日軍補給線（這時候已經沒有史迪威干涉空軍的作戰，美軍飛機得到全力的後勤支援，可以盡量發揮作戰打擊能力）同時裝備較佳的中國遠征軍，也開始從緬甸回到中國戰區。所以岡村寧次曾經發動湘西芷江與老河口的作戰，以試探日軍西進四川的可行性，但是遭到中國守軍相當強烈的反擊，制空權更是已經完全落在盟國的手中，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在中國戰區表現的最後機會，已經結束；更糟的是，日軍的主力完全深陷在華南，若想長途運動，必定飽受盟國空軍的炸射，因而無法順利調回東北與華北備戰。

此時，日本全面的戰局已經陷入了十分危急的狀況，美軍在一九四五年的五、六月間，攻佔琉球，日本帝國海軍在琉球海域，遭到殲滅性的慘敗之後，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作戰能力；日本殘餘的空軍，也只能在本土進行非常有限的活動。美國下一個目標是準備進攻日本南部的九州，蘇聯開始調動空前的兵力在西伯利亞集結，正進行攻擊關東軍前的戰略準備。此時日軍大本營才從錯誤的迷夢中清醒，下令中國派遣軍應將主力從華南大幅的撤退，以支援關東軍在東北所面臨的決戰，同時要兼顧防禦美軍可能從華東登陸的攻擊。

日軍早先於一九四五年年初，還在中國的戰場上不斷企圖發動攻勢，因為日本在中國戰區的勝利，已經成為其作戰意志與心理的唯一支柱了。岡村寧次當然捨不得叫日軍自動撤退，「放棄」所佔領的中國領土。但是岡村這種缺乏全局的戰略眼光，只看到自己戰區的「風光」，沒有想到日本的整個戰略佈署，已經因為日軍主力集中在遙遠的華南，無法回防本土、東北與朝鮮，將會造成日本戰略核心空洞的危機。

日軍大本營開始不斷施加壓力，岡村寧次也發現日軍把主力放在華南，不但無法有重大突破的作為，同時更是造成東北與華東防禦空虛，萬一蘇聯進攻東北，或是美軍登陸華東，那麼留在華南的日軍主力，將會成為後路被切斷的孤軍，所以岡村寧次才開始下令日軍退出廣西。但是在整個戰略的大局上而言，已經是太遲、太慢了。

當日軍奉命從廣西撤退之時，正是新編華軍開始佈署反攻華南的時刻，因此中國部隊在廣西展開尾隨的追擊行動。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收復了廣西全境，而在東南的福建地區，華軍也順利光復了重要的城市與口岸；負責反攻廣州、香港與湛江的新編華軍部隊，也開始進入作戰集結的位置，只等準

備完成，就對日軍發動攻擊，以打開華南的海港⁴。

此時日軍向華北與東北調動的運輸，一路上受到中國與盟國空軍密集的攻击，而損失慘重，日軍部隊甚至被迫放棄一些重裝備，狼狽地向北撤退。這時候岡村寧次仍然寄望在中國的日軍軍力，能夠成為日本與盟國要求投降條件更佳的談判籌碼。但是日皇裕仁已經無法忍受日本近乎全面潰敗的壓力，他要求首相鈴木貫太郎，設法迅速與盟國求和，也准許岡村寧次自行與蔣介石接觸，商討中日之間的和談條件。

35.6 日軍最後的求和

一九四五年七月，岡村寧次派遣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在河南與何柱國見面，日本提出中日停戰的條件，日軍準備在一年之內，從中國的關內全面撤軍，以換取中國不對日本進行攻擊。但是中國方面認為，日軍必須全面撤出韓國的釜山，中國才會考慮與日軍商談停戰，因此雙方無法進行談判。

這時可以看出岡村寧次完全缺乏掌控戰略全局的能力。事實上，此時日本唯一所能求的，是爭取有條件投降的機會，所以岡村寧次要做得，當然是全面快速的撤軍。先能讓日軍退出關內，全部集結在東北與日本本土，阻擋蘇聯部隊撿到便宜，以及防衛美軍進攻本土，這樣日本或者可以爭取到更好的戰後條件。在日軍投降之後，日軍再全面地退回本土，這也是日本軍隊唯一可以贖罪的機會。

這也是蔣介石在獲悉雅爾達密約，盟國決定出賣中國之後，一個可以設法利用日軍維護中國權益的最後機會。只要中國允許日軍在關內有秩序地快速後退，全部集中到中國的東北，中國就可以在持續勝利的「追擊」中，大幅拉高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逐步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以及增強軍隊的士氣，這樣當然可以增加中國對抗蘇聯與盟國壓力的籌碼。

中國若能照這計劃，在半年內光復整個關內，總比突然接收整個佔領區的工作，要更有準備。而日軍既然大軍集結在中國的東北與本土，蘇聯與美國勢必會對於下一步的作戰計畫重新考慮。此時中國可以代日本提出投降條

⁴此時先父任的青年軍二〇七師，已經在雲南接受美軍的裝備與訓練，軍隊的士氣與戰技，都有極高的改善。大家都認為，這回西南總反攻，絕對會把日軍打得潰不成軍，一洗過去戰場上屢戰屢敗的記錄。其實中國軍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隊，只因裝備、訓練太落後，才會讓日本侵略中國得逞。當日本軍隊沒有裝備的優勢之後，馬上就被中國軍隊痛擊了。

件，只限保留日皇制度，這樣中國或許就不必向蘇聯低頭，而簽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政府甚至可以完整地收回已經被蘇聯佔領的外蒙古地方，連琉球未來的命運，也可以有所調整。但是歷史沒有朝向這個戲劇化的方向發展，中國面臨的是比戰敗損失還要巨大的「慘勝」了。

碧血長空的英雄

單以在空戰戰場的傲人戰績而言，中國極其有限的空軍，表現出如此重大的戰果，就足以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了。而美國的空軍志願隊，更是展現空中遊俠式的正義化身，給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頭。在抗日戰爭的神州大地上，中國方面是少有戰場的勝利，但是在寬闊的藍天之上，中國與美國的空軍卻少有戰鬥的敗績。中國人的優異戰鬥能力與潛能，就此表現無疑。空軍健兒們，真是捍衛中華民族的先鋒軍！

在長達十四年的中日戰爭之中，最為動人與傳奇的作戰歷史事跡之一，就是中國與美國空軍的並肩作戰。因為在抗戰期間，中國戰區的陸海兩軍，固然以艱苦卓絕的犧牲，面對優勢的日軍而周旋到底，但是由於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裝備與訓練的援助，所以單就戰場的較量而言，中國總是失敗的居多。但是令人感到幾乎難以置信的是，在中國戰區的空軍英雄，卻多能在空中獲勝。這種空戰的勝利，不但振奮了人心，而且在擊敗日本的整體戰爭中，也做出重大的戰略貢獻。

因此，空軍在中國戰區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與不一樣的角色，不但經常在戰鬥中獲得大勝，也是造成日本絕對國防圈的癱瘓，以及誘導日本在最後採取錯誤戰略（日軍爲了要摧毀盟國華南的空軍基地）的主要因素。在空軍

之中，更有著無數忠烈青年的英雄事蹟，以及高貴感人的異國友誼故事。

36.1 以寡擊眾的中國空軍

由於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確是一個分裂、落後與貧窮的國家，而空軍是屬於一個高資本、高科技密集的軍種，依照常理而言，中國當時連支持最爲原始的陸軍裝備與訓練，都還力有未逮，如何能在空軍的作戰之中，讓先進日本空軍的軍威盡喪？這的確是中日戰爭史上，最令人感到振奮的戰鬥傳奇事蹟了。

從世界的戰史來看，空軍是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才開始逐漸嶄露頭角，成爲了一個情報與輔助作戰的兵種。當時世界各國的軍事領導人，都無法擺脫幾千年來作戰的傳統思想，即陸軍與海軍的架構。所以在當時，空軍是分別屬於陸、海軍的輔助兵種，而且很少有軍事將領或是戰略專家，能夠真正看出空軍在整個戰爭中，可以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可是日本卻是世界上第一個看出空軍在海戰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所以日本海軍在發展海軍航空兵上，比西方國家都有更爲認真的投入。這也造成日軍在偷襲珍珠港，以及橫掃西太平洋的初期作戰上，獲得壓倒性大勝的主要關鍵。美國是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立刻掌握到海軍航空兵，在海戰上所擁有的支配性力量的觀念，所以全力投入海軍航空兵的發展，甚至停止建造主力戰艦。結果美國後來居上，以絕對優勢的海軍航空兵，迅速擊敗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力。從此美軍縱橫七海，成爲全球最大的海權國家。英國反而一直沒有在海軍航空兵上面進行重大的投資，二次大戰戰後，英國也就失去了海權國的地位。

不過，日本的陸軍對於空軍的發展，卻沒有像它的海軍那麼掌握到重點。日本陸軍主要是用飛機來攻擊對方防守戰線的部隊，以及轟炸戰線後方的軍政與平民目標。在中日戰爭中，日本戰機對於中國的部隊，以及整個抗日的人心，都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日本空軍在中國戰區的作戰，並未產生決定性的戰果。

蔣介石雖然是傳統的陸軍將領，但是對於空軍的認識，卻有獨到的看法，提出了「無空防即無國防」的前進觀念。抗戰之前的中國，不但是民生貧困、百廢待舉的情況，還要負責償還天文數字的外債。而在面對日本近乎

無止境的侵略與欺凌下，中國急需建立一支能夠保家衛國的軍隊。在兵種建設的優先順序中，蔣介石獨具慧眼，認為中國一定要有一支能夠對抗日本空軍。所以中國設法在捉襟見肘的財政下，動用各種方式（包括了非常封建的「捐機祝壽」之類的活動），設法為中國建立現代化的空軍。

當時中國的整體國力處在極端落後的狀況，根本沒有能力去建立整個空軍的發展基礎。無論是人才、技術都極端匱乏，所以只有借重外國的幫助，邊學、邊摸索、邊推動，而當時科技先進的國家，對於中國發展空軍的計畫，當然更有著五花八門的考慮，以及不同的利益動機。一時之間，中國本身常常又難以掌握真正關鍵，結果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憑藉中國人的努力與才智，中國空軍還是展現了驚人的作戰成果。

抗戰前期的中國空軍，是由三方面的力量結合而成的，蔣介石親自督導的中央空軍（蔣介石是航空學校的校長，宋美齡是航空委員會的秘書長）張學良發展的東北空軍，以及兩廣政府所建立的空軍。這三支空軍在戰前大體完成了整合，但是機型複雜，其中擁有較好作戰性能的飛機，多數是採購自美國的產品，當時中國空軍編組為九個大隊以及學生暫編大隊，所有的飛機為三〇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戰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

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認為中國最多能夠以陸軍，勉強抵抗三個月，至於中國還在編組訓練的空軍，只是兩個星期就可以給日本空軍用「打活靶」的方式解決。不料中國空軍，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竟然旗開得勝，成功地轟炸了日本第三艦隊，以及擊落日機六架，造成全球注目的新聞焦點，當然更是激怒了日本皇軍。日軍決定全力優先消滅中國空軍，一場淞滬大空戰就此展開。不料日本駐台灣精銳的木更津與鹿屋空軍聯隊，竟然成為首先被中國消滅的對象，中國空軍健兒一直保持著戰場上勝利的比率，實在不能不佩服他們出生入死的過人表現。

不過，究竟中國空軍的數量與質量，都比不上日方。從南京撤退之後，中國的一線戰機，只剩下十一架，也就是說中國在抗日戰爭前所培訓的空軍人員，幾乎已經犧牲到九成以上了。日軍付出了兩倍於中國所犧牲的代價，於是全面控制了中國戰區的領空（事詳見淞滬會戰）

幸而此時蘇聯的援助到達，中國空軍顧不得適應的問題，全面換裝蘇聯戰機；蘇聯也組成百人的正義之劍空軍志願軍，與中國空軍在領空中，共同攔截與攻擊日機。在武漢、蘭州等地，立下了讓日本空軍慘敗的戰績。同時

在武漢會戰中，給予日軍部隊相當嚴重的攻擊與破壞。但是在日本的零式戰機出現之後，蘇聯 E 型戰機的性能無法匹敵，而使中國空軍在空戰上，蒙受極大的損失（事詳見武漢會戰）。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日軍利用中國空軍力量耗盡與外援不濟的狀況，對於抗日的根據地四川，特別是陪都重慶，發動了一連串的飽和性空襲，日本的飛機日以繼夜連續轟炸，造成中國軍民極大的傷亡。日軍企圖以這種空軍戰略轟炸，折服中國的抗日意志，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重慶軍民最爲艱苦與困難的一段歲月。中國後方的上空，一直籠罩著日本戰機攻擊的烏雲。兩年後，幸好日本爲了發動太平洋戰爭，而將空軍主力調離，中國才得以稍稍喘息。

36.2 「中國之虎」陳納德

在蘇聯與日本發展「和平共存」關係，共享佔領中國領土利益之後，俄對華的軍售援助於一九四一年就中斷了。美國逐漸開始在中國空軍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先是美國退役的空軍中校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加入中國空軍指揮系統，改變了中國空軍的命運。陳納德是一位極爲傑出的空軍人員，對於空軍的作戰，更有超乎常人的遠見，他曾經編寫過空軍作戰的典範教材，由於身體健康不佳以及政策主張不受重視而退休。

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派人到美國徵募空軍人才，陳納德毅然報名參加，從此成爲抗日戰爭中，決定中國空軍發展命運的傳奇性人物。一九三七年八月，陳納德到達中國，他首先就發現中國空軍拼湊的系統，有太多的問題——特別是義大利在中國空軍所立下的不良傳統與結構，造成人員與裝備極大的誤置與浪費。在號稱三百架的飛機中，事實上只有一百多架能夠參加作戰。

不過，在空襲天天都威脅著中國的狀況下，陳納德首先設法建立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報系統（當時沒有雷達裝置），使得日本空軍一旦進入中國的領空，中國空軍指揮系統立刻就能充分掌握了日機入侵的情報，而能做出最佳的作戰反擊規畫，反而讓數量與質量都佔優勢的日本空軍，因爲無法掌握中國空軍的情報，而在中國的空中戰場上，日軍總是遭到重大的損失。

陳納德很快的就以其專業的才能與正直、勇敢的品德，贏得中國空軍領導階層的信任，讓他擔當指揮與建軍顧問的重任。陳納德為中國設計出許多空中作戰的戰術，充分發揮了出其不意、靈活作戰的方式，使得中國空軍更能展現以寡擊眾的戰果。但是在日本空軍裝備零式戰機之後，俄製的 E 型戰機性能，無法與日本飛機較量，造成中國空軍大量的傷亡，最後俄援空軍幾乎全軍覆沒。

36.3 美國志願空軍的英勇表現

一九四一年，陳納德決定，自己設法回到美國，招募一批美國非現役的空軍人員，購買美國較為先進的戰機，以美國空軍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或簡稱 AVG）的名義，來中國戰區與日空軍作戰。在剛開始之時，美國政府擔心日本的壓力，根本拒絕陳納德的建議，最後幸而羅斯福總統改變主意，才特准這個方案實施。當時由中國政府出錢，購買美國飛機，在美國招募飛行員與地勤維修人員。在英國同意下，先在英屬緬甸組成與訓練空軍志願隊的飛行員，然後再進入中國進行作戰。中國政府給美國空軍志願隊（AVG）起名為「飛虎隊」（Flying Tigers）

飛虎隊的成軍可以說是歷經無數的困難與波折，美國政府答應賣給中國政府一百架 P-40C Curtiss（英國稱此型戰機為 Tomahawk II）戰機，但是卻不准購置備份零件。這對空軍志願隊戰機的維修，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迫使陳納德要設法在亞洲各個市場，尋找替代的零件。美國飛行員無法適應南亞的環境生活，也是一個人員管理上的嚴重問題。不過能夠參加飛虎隊的成員，都是一些膽識過人的熱血漢子，而陳納德則是訓練他們成為一支「空軍遊騎兵」，以全新的觀念與戰法，創造捍衛中國領空的歷史。

飛虎隊在極端困難下成軍後，首先就受到緬甸英軍要求助戰的請求。飛虎隊出動半數的戰機，在緬甸迎擊日本優勢的空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機共九十架空襲緬甸的仰光，留守緬甸的飛虎戰機起飛攔截，結果旗開得勝，飛虎隊當天竟然創下二十四比零的「完勝」戰績。陳納德的空軍志願隊更繼續以優異的戰果讓日本空軍吃足苦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直到日軍攻佔緬甸，志願隊退入雲南），日機總共二一七架被擊落，飛虎只損失十六架，創下令日軍喪膽的作戰記錄。飛虎隊出色的戰績，不但穩住

了中國西南領空與運輸的安全，他們也開始出擊日軍在中國戰區的基地。

不料，AVG 的優異戰績，卻遭到美國政府致命的打擊。在美日沒有正式作戰之前，美國政府藉口日本的外交壓力，儘量設法減少對飛虎隊的支持與供應（主要是零件與油彈，中國政府出錢也買不到）。在美日宣戰之後，美國政府竟然以直接的政治壓力，要求將飛虎隊改編為美軍正規部隊，番號是美國空軍第二十三戰鬥大隊。這點遭到中國政府與陳納德堅決的反對。因為飛虎隊的飛機是由中國政府出錢購買的，人員也是與中國政府簽約的志願軍，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發揮旺盛的作戰精神。美國政府沒有法律的根據，可以要求 AVG 成為美軍的正規部隊。因為一旦成為正規軍，就會受到美軍政策的干預，人員與裝備都要聽命美國政府官僚系統的安排，就發揮不出獨立的戰力了。

但是，馬歇爾是軟硬兼施，非要取消這支戰績彪炳的空中遊騎兵，以免它發揮驚人的戰力。馬氏答應 AVG 在改編為美國正規軍之後，美國政府會大量充實這支空軍（這是不要中國出錢的一個利誘），但他也發出威脅，假如 AVG 不肯被美國政府收編，美國將會停止供應飛機與不准美國公民參戰。在美國政府一再威脅利誘之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這支志願軍終於停戰「易幟」，原有的志願軍人員，多半受不了美政府官僚系統的束縛而紛紛求去，這支世界傳奇的空軍部隊就此被美國政府解體了。

更絕的是，美國政府答應的正規軍編組，當時根本沒有依照協議的時間到達。飛虎隊遭到解散，美國正規軍卻沒有成軍，造成當時中國戰區出現了一段的空窗期，日軍當然趁機大舉攻擊。幸好有些飛虎隊的隊員不忍見中國遭到無情戰火的蹂躪，竟然決定再自願義助中國作戰，以等待美國正規空軍到達與佈防。這種義薄雲天的情誼，也是舉世罕見的。總計飛虎隊成軍作戰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在中國戰區擊毀日本飛機二六八架，中國只耗費了八百萬美元的購置與人員開支而已。而二次世界大戰中，這支在「反法西斯軸心國」作戰中戰功居首的空軍自願隊，就被美國政府所消滅了。日本政府與日本空軍飛行員對此當然是最喜出望外的了。

36.4 癱瘓日本絕對國防圈

在蔣介石強烈要求美國以空軍援助中國戰區，以及陳納德全力爭取之

下，羅斯福總統開始瞭解，援助中國戰區，空軍是代價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羅斯福特別欣賞陳納德所提以空軍切斷日本南洋運輸線的作戰建議，就是在中國戰區佈署有限的空軍，就可以切斷日本從南洋經台灣海峽到日本的運輸生命線，以造成日軍戰力的根本崩潰。因此羅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國成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恢復現役並晉升為空軍少將，統帥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戰區作戰。

幸而中國戰區有了陳納德統帥的十四航空隊，可以充分發揮空軍打擊與支援的作戰任務。否則在盟國一再壓制支援中國戰區的政策下，中國的抗日戰爭，恐怕還會遭到更大的挫敗與損失。當然也幸好馬歇爾與史迪威不太了解空軍所能扮演的重要作戰角色，否則陳納德恐怕也難發揮自己先進的戰略構想。

當時美國政府主流的意見認為，只有打通對中國援助的通路，才能大量的裝備中國的軍隊，這樣中國才能在擊敗日本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史達林切斷中國的西北通路，丘吉爾一再延期反攻緬甸、干擾打通西南通路的計畫，造成中國戰區根本得不到作戰必須的物資援助。而當時維繫中國抗戰後勤生命線的，全靠駝峰一點點的空運。但是史迪威在陸軍為主的觀念下，認為駝峰空運只是象徵性的作用，因此並不積極支持空運能量的擴張，造空運的數量極低，根本不能滿足中國戰區的需求。

在如此不足的空運量中，史迪威又希望以裝備中國的陸軍為主，以協助他反攻緬甸。由於英國不肯重新恢復東印度洋的控制權，就算反攻緬甸，也根本一樣無法打開緬甸通路，只不過是消耗中國的有限軍力，導至中國戰區戰力不足的危機而已。陳納德力爭空運應該優先支持空軍作戰，以切斷日本的海運運輸線，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最後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三叉會議」中，還是由羅斯福總統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國戰區空運量，並且支持陳納德的空軍為優先。而陳納德也不負所託，以有限的空軍，對日本的海運線，給以致命的打擊。但是他也因此遭到馬歇爾與史迪威的嫉恨，因此經常受到制肘。

日本爲了徹底殲滅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在一九四三年夏季，發動一連串的空攻。七月二十日，日本第五航空飛行師團，從漢口與廣州基地出擊，連續八晝夜，猛烈攻擊十四航空隊在衡陽、桂林與零陵的機場。幸而中國的防空預警系統發揮功效，同時修護機場的平民全力投入，使得盟國能夠

掌握日機飛行的情報；機場遭到夜襲後，甚至第二天就能修復使用，讓戰機再度升空作戰。

美軍也同樣反擊日軍在漢口與廣州的機場，在戰鬥最為緊急的時刻，美軍甚至從北非調來第四四九戰鬥中隊飛機助戰。結果日軍整個夏季攻勢，損失的戰機高達一五三架，美機損失二七架，日本空軍以慘敗收場，從此華南的制空權，重新在盟國的控制手中。

十四航空隊只擁有五百架戰機的編制，同時各種油彈與零件的供應，受到路途遙遠與政治安排的影響，結果都是經常地不足。後勤的短缺與匱乏，成為陳納德最為苦惱的問題與最大的敵人，雖然想在中國戰區得到上級史迪威的支持，比起應付日軍的攻勢，還要困難很多，但是在陳納德的指揮之下，十四航空隊卻創造了最為輝煌的空戰戰績，先後擊沈了日本二百萬噸以上的運輸船隊。日軍戰力全面的崩潰，與十四航空隊成功地重創日本運輸生命線，有著極大的關係。

此外，陳納德又建立一支中美混合編組作戰的航空軍，設法說服羅斯福總統，支援美國戰機，改編中國空軍——因為只有培訓一支能夠獨當一面的中國空軍，中國戰區的戰鬥能力才能迅速地增加。羅斯福再度批准陳納德的建議，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基斯坦建立培訓中國空軍的基地，於是中國空軍又再度的在浴火之後重生。與美國空軍組成中美混合戰鬥機隊，捍衛後方的領空，並且在鄂西會戰、常德會戰中，都對日軍的攻勢，造成很大的破壞。

當時美國政府急於針對軸心國的作戰支援能力，進行致命的打擊。美國空軍方面提出「戰略」轟炸的方案：所謂戰略轟炸，就是以空軍對於敵方的主要工業、軍火與人口中心，進行飽和性的「焦土」轟炸；也就是將整個目標區，完全加以摧毀。但這種毀滅性的戰略攻擊，需要花費極高的作戰成本與造成平民極大的傷亡，也只有美國的長程重轟炸機群，能夠負擔這種的作戰方式。美國軍方選定了德國與日本的重工業區與主要城市，作為這種全面摧毀性的戰略攻擊目標。

由於戰略空軍飛行半徑的限制，美軍在攻克中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之前，只能設法在中國建築攻擊日本的戰略空軍基地。因此美國要求在中國的成都平原，迅速建立九處空軍基地（原來說好是由美國政府出錢的）以駐進特別組成的第二十航空隊的長程重轟炸機與人員，以成為盟國首批空襲日本

國防工業中心的戰略空軍基地。在國民政府的動員配合之下，四十萬的中國平民，以人工方式，於九十天之內，硬是修建完成這個空襲日本本土的戰略空軍基地群（總共花費了三十億元），於是美國的戰略空軍，開始進駐中國。

由於史迪威又想控制這組機隊，而造成了指揮系統的紛爭，於是美國政府最後乾脆將美軍第二十航空隊，直接隸屬於美國陸軍的空軍總部控制；其所有的補給與作戰，也都是獨立作業，以免形成新的權力鬥爭。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起，從成都起飛的戰略空軍，開始對日本九州的鋼鐵工業中心，進行毀滅性的戰略轟炸。截至一九四四年年底，駐在中國的美軍第二十航空隊，總共對日本進行幾十次的戰略轟炸，投擲三六二三噸炸彈，對於日本的國防工業造成可觀的破壞。但是由於美軍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攻佔馬里亞納群島之後，美軍從這裡設立空襲日本的戰略空軍基地，在補給上不必繞道印度洋與飛越駝峰航線，便利許多，因此，美國攻擊日本的戰略空軍主力，也就不再以中國四川做爲主要的基地了。

不過，根據戰後的檢討，其實將空軍的大量資源，對敵方進行戰略轟炸，耗費極大，收效並不如預期的好。因爲敵方可以設法將生產地下化與防護化。因而空軍的最大的用途，是攻擊與切斷敵方的運輸線與補給線。因爲交通線本身非常的脆弱與難以防護，所以只要將交通線切斷、運輸工具摧毀之後，敵人的工廠就無法運進原料、生產工具機與器材，也無法運出成品、零件，整個工業重鎮根本不必加以毀滅性的破壞，也一樣會失去作用。同樣的，在前線激戰的野戰部隊，更是需要作戰的後勤補充，假如補給線遭切斷，整個野戰部隊幾乎就無法繼續作戰了。

所以，對於日本戰爭工業能力造成決定性破壞的，不是美國龐大的戰略空軍攻擊，而是陳納德第二十航空隊，對於日本通往南洋海運線的破壞。日本的運輸船隊，在損失了高達二百萬噸的運輸能力之後，根本無法將日本所需的原料運到本土，也無法將成品運給部隊。事實上，假如美國當時充分使用 B-29 長程戰機，嚴密封鎖日本的所有交通補給線，徹底摧毀日本的運輸系統，比直接進行戰略轟炸，還要能夠提早迫使日軍面臨戰力耗竭，而選擇投降的命運。

36.5 日本企圖不惜一切以摧毀第十四航空隊

日本軍部最後發現，除非能夠徹底的打擊陳納德十四航空隊戰力，否則日本的絕對國防圈根本就失去效用。所以日軍大本營才在最後關頭，動員一切的戰力，在中國戰區發動「一號作戰計畫」，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毀十四航空隊在中國華南的基地。因為在一九四三年，陳納德所摧毀的日本運輸船舶噸位，已經超過日本所能建造的噸位，日本已經開始看見戰敗命運的陰影了。

但日軍的空前攻勢作戰，竟然成爲史迪威準備在中國奪權的機會。史迪威故意誤導中國戰區，而對於日軍攻勢的嚴重性做出誤判，他又將中國的戰略預備隊調往緬甸作戰，連空軍主力也遭到分割使用。當日軍的攻勢造成了突破的戰果之後，史迪威又設法對陳納德的空軍作戰，進行各種的制肘；在最爲危急的時刻，史迪威竟然還想免除陳納德的職務。因此蔣介石與陳納德即無法獲得足夠的空軍力量，來應付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這樣史迪威就以中國戰區危急，促使美國政府要求蔣介石交出中國戰區的作戰指揮權。

當時，陳納德已經看出，在湖南的長衡決戰之中，假如盟國能夠成功運用優勢的空軍力量，徹底摧毀日軍的補給線，那麼日軍的失敗，是可以預期的。但是史迪威卻一直設法限制陳納德的空軍作戰、不准動用戰略空軍多餘的油彈、更遲遲不准陳納德動員全部空軍的力量（包括申請戰略空軍支援）以全面摧毀日軍後勤中樞漢口基地的計畫——這真是人類戰史上，最爲莫名其妙的作戰決策。戰區參謀長竟然設法要自己的戰區部隊面臨慘敗的打擊，以中國幾十萬戰士的死傷、幾百萬百姓的流離，來「實現」自己可以高升，成爲戰區執行司令官的夢想。

陳納德知道，日軍一號作戰的主要目標，以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計畫，都是要徹底打擊自己屢建奇功的十四航空隊。面對外有強敵垂死掙扎的最後一擊，內有長官的打壓制肘，當時的十四航空隊是想盡了一切辦法，動用了每一種可以運用的力量，來反擊日軍的攻勢。但是最終還是因爲力量不濟而告失敗，日軍攻克了十四航空隊在衡陽、零陵、桂林、柳州以及遂川的基地。十四航空隊的官兵，甚至在敵人攻佔基地之前的幾小時，仍然起飛作戰，然後轉到另外的基地降落。由於基地遭到嚴重的損失，以及戰機受到「飽和作戰」的耗損，十四航空隊終於受到嚴重的創傷（事詳見日軍一號作

戰)

日軍的一號作戰計畫攻勢，本來正是讓中國戰區空軍作戰力量充分發揮的最佳機會。假如盟國能夠充分支援中國戰區的反擊作戰，抽調幾百架戰機駐進印度與中國基地；盟國的上級長官，又能與陳納德的作戰計畫充分配合，那麼日軍長距離進攻的戰線，將是盟國空軍的一個最佳攻擊目標。具有絕對空中優勢的盟國空軍，能夠將從漢口，經長沙到衡陽的運輸路線，全面地封鎖，並且徹底摧毀日軍沿線的補給轉運中心；同時對於戰場，進行徹底的空優戰鬥壓制，相信日軍會因力竭而無法取得衡陽會戰的勝利¹。

36.6 盟國空軍在中國戰區的浴火重生

史迪威在中國戰區一直提出陸戰為主的戰略，並指出陳納德的空戰為主的戰略，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假如在中國戰區的空戰戰略成功，必然會引動日軍大舉進攻中國的空軍基地。而由於中國的陸軍戰力不足，因此會遭到極大的損失，所以當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給中國戰區帶來生死存亡的危機，似乎是完全「應驗」了史迪威的看法。

其實是，假如盟國真的全力支持空戰派的戰略，在中國戰區的戰機，能夠增加到一千架以上，那麼史迪威認為的問題，就根本不存在了。因為在中國戰區絕對優勢的空軍，早就會切斷日軍補給線，以及協助陸軍，擊敗日軍的攻勢，甚至可以提早讓中國軍隊發動攻勢。

雖然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就開始立刻改善中國戰區空軍的運作，但是當時盟國的心目中已認為，中國戰區只是個「殘兵敗將」的脆弱結構，是名扶不起的阿斗了。不過陳納德仍然設法與魏德邁合作，重新恢復十四航空隊的戰力。此時由於歐洲戰場已經勝利在望，美國可以有更多的空軍兵力東調，加上陳納德全力地爭取，十四航空隊在一九四五年年年初，又再度活躍在中國戰區的領空之上，岡村寧次最後企圖進攻四川的作戰而失敗，十四航空隊猛烈的轟炸是主因之一。戰爭結束前，日軍發現蘇聯已經準備要進攻關東軍之後，曾經企圖大量抽調在中國華南、華中的日軍北上，但是沿路遭到了盟國空軍的炸射，不但損失慘重，而且有

¹但是如此一來，馬歇爾與史迪威要控制中國軍隊指揮權的陰謀，以及需要蘇聯參戰的計畫，都無法實現了。

些部隊根本動彈不得。沒有多久，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

在中國戰區立下奇功的陳納德，當然是日本與美國反華派軍部的首號「戰犯」，日本人想盡辦法，都無法擊落陳納德，但是馬歇爾最後終於辦到了。由於陳納德所指揮的中國戰區空軍，表現太為優異，馬歇爾就不斷對魏德邁施加全面的壓力，要求一定撤換掉這個飛虎英雄。陳納德眼見日軍已經敗退在即，爲了避免魏德邁受到太大的留難，而影響到中國戰區的局勢，因此決定提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退休。

陳納德是一位爲中國戰區出力最多的空軍英雄，竟然無法分享抗日戰爭勝利的光榮，但是全體的中國軍民，沒有忘記陳納德將軍對於中國戰區的重大貢獻，成千成萬的百姓以最高的熱情歡送陳納德離開重慶。無論是擔任中國的空軍顧問，還是飛虎隊的領導人，或是十四航空隊的指揮官，陳納德代表的是人類正義以及軍人勇氣的真正力量，他那種近乎出生入死的付出，同時面對日軍與美軍上司的雙重打擊，盡量爲中國戰區做出無與倫比的貢獻，真是歷史上少有的傳奇軍人俠客。而他的空軍戰略作戰觀念，更是領先當代美國所有的高階指揮官，成爲空軍戰略發展的真正先驅者。

36.7 空戰英雄永留青史

在整個中日戰爭的過程中，由於中國陸軍的火力與機動力不足，因此只有極少的機會，在戰場上直接擊敗日軍。中國只能以無比的毅力，接受犧牲，但是絕不屈服的對抗下去。不過，在空軍方面，卻完全「爆出冷門」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空軍，在中國空戰戰場上，常以數量與質量的劣勢，贏得痛快乾淨的勝利。假如不是中國空軍的力量不足，及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受到盟國上級太多的制肘，而能夠讓這群捍衛自由與正義的猛鷹全力出擊的話——那麼中日戰爭的戰史，是可以有許多地方要改寫了。

千萬不要以爲空軍在戰爭中，只是一個輔助的軍種，事實上，假如戰略運用得當，空軍是在戰爭中，是一個具有決定性力量的軍種。由於當時太多的將領不知道如何充分發揮空軍的力量，才會使得空軍成爲一個輔助軍種。

假如蔣介石能夠有著超越時代的空軍戰略思想，以及進一步看穿盟國的策略與陰謀——英國與蘇聯不可能真心支持打通援助中國的陸上通路——而不要一再陷入反攻緬甸爭論的陷阱中，卻將主要的談判力量，直接用來爭取羅

斯福支持更多的空軍戰力，那麼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前，中國戰區能夠擁有一千兩百架以上戰機的戰力，以及直接掌握空軍的後勤補給作業（其實只要停修史迪威公路的經費就夠了），這樣中國戰區的戰史，將會完全改寫。

這樣戰力提升一倍以上的空軍，在陳納德的全權指揮下，徹底掃蕩日本在華中的空軍；採取全面的封江作戰，炸沈長江水系所有能夠移動的船舶，佈下無數的水雷陣；摧毀所有日軍的補給中心與陸上交通線，全力攻擊日軍上海到漢口的長江運輸通路，以及完全封鎖與癱瘓漢口到宜昌的運輸線。相信只要半年的時間，就可以徹底削弱日軍在華中的戰略據點力量，然後再配合中國陸軍，集中兵力，開始圍點打援、攻擊宜昌與南昌等地，空軍再以飽和攻擊日軍陣地相配合。這樣後勤已經嚴重不足的日軍，將會無法兼顧這些戰略據點。但是日軍又不可能接受皇軍在中國戰場敗退的挫折，所以會拼命苦撐下去，甚至冒險發動反擊，那麼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戰力很快就會耗竭。然後中國再發動致命的總攻擊，這樣日本將會在華中戰場將會遭到無法承擔的重創。

只要中國戰區出現重大勝利的結果，那麼羅斯福就更願意排除萬難，投入更多空軍，來支持中國。這時候再將目標指向緬甸西部，使用同樣的空軍戰略，配合陸軍的作戰，全力打通與印度的連繫，華軍就可以獲得美國支援中國陸軍的武裝；最後再打下湛江，河內，配合美軍反攻菲律賓。這樣中國軍隊可以得到美國更多的援助，也會出現比蘇聯、英國更佳的作戰成績，那麼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遠東戰場，不但完全不一樣，甚至不會有雅爾達密約的歷史錯誤發生了。

無論如何，單以在空戰戰場的傲人戰績而言，中國極其有限的空軍，表現出如此重大的戰果，就足以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了。而美國的空軍志願隊，更是展現空中遊俠式的正義化身，給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頭。在抗日戰爭的神州大地上，中國方面是少有戰場的勝利，但是在寬闊的藍天之上，中國與盟國的空軍卻少有戰鬥的敗績。中國人的優異戰鬥能力與潛能，就此表現無疑。空軍健兒們，真是捍衛中華民族的先鋒軍！

出賣中國的雅爾達密約

當然蔣介石在盟國集體出賣之下，被迫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固然是他個人在重大壓力下所犯的錯誤，但這也是當時分裂與衰弱的中國，必然得到之歷史悲劇結果。假如中國當時不是陷入國共內戰的前夕，國力殘破不堪，而無力應付國際強權的壓力，蔣介石應該會有全力一搏的本錢與勇氣。事實上，假如蔣介石不同意雅爾達密約，延安也會同意讓蘇聯掌控中國所有戰後利益的。更為現實的是，就算分裂與衰弱的中國，不接受雅爾達密約，蘇聯一樣要侵略中國，不但奪走外蒙古，甚至還會加上東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蘇三國領袖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充分表達出國際社會中，最為殘酷與現實的層面。雖然盟國曾發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1），強調世界的正義與民族自決的原則，是世界所有「反法西斯盟國」共同遵奉的戰爭目標，但是盟國中的強權，不但仍然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賣貢獻最大的盟友的歷史陰謀。

雅爾達會議中，英、美、蘇三國竟然「私下」劃分了反法西斯陣營的戰後勢力支配版圖：英法可以重回亞洲的殖民地，蘇聯則是大幅擴張，控制東

歐國家以及進入東北亞。而最慘的是中國，名義上，中國為四強盟國之一，竟然卻將在戰勝之後，喪失更大的領土與主權，以滿足同盟國強權的私利安排。

爲了設法防止中國在戰後的復興與強大，西方的強權聯手，陰謀陷害這個爲抵抗日本侵略而盡力最多的國家，這就是國際政治的冷酷與現實。半世紀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繼續，未來也不會有多少的改變，因爲這原本就是二十世紀國際強權對中國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國真地成爲一個富強的國家之後，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與尊嚴的國際地位。

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國，在歐洲與亞洲的戰場上，都已經可以說是勝利在望。特別是德國已經被迫在其本土作戰，隨時都會崩潰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頑抗的姿態，但是由於與南洋的通路已經遭到切斷，日本的戰力也到了強弩之末。因此如何處置即將戰敗的法西斯軸心國，以及如何規範戰後的國際秩序架構與強權的利益，就成爲英美蘇三國領袖最爲關心的議題。蘇聯的領袖史達林元帥，於是出面邀約英美兩國領袖於黑海濱的雅爾達舉行會談，這也就成爲英美蘇瓜分戰後利益的強權領袖會議。

而唯一較有國際正義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此時正在生命盡頭的邊緣，他的思考與記憶能力，事實上已無法負擔高度鬥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爲顧慮的事情，就是如何在減少美軍傷亡的前提下，儘早結束對日本的作戰，最好他還能夠來得及親睹大勝利的歷史光榮。

由於英蘇兩國的強烈杯葛，同時中國遭到日軍一號作戰的猛烈打擊而元氣更爲大傷，加上中國內部又有重慶與延安近乎公開分裂的局勢，所以中國沒有「資格」出席這個支配戰後世局架構的會議¹。其實雅爾達會議的議題與結論，只是延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蘇的德黑蘭會議方向的「必然結果」——既然允許英帝國延續其殖民主義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蘇聯擴大在歐亞形成一個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國。而美國一直是希望能夠不惜任何代價來早日結束戰爭。

¹中國無法拿出強權的實力，也就失去四強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對戰勝日本的真正貢獻是多麼重要。

37.1 史達林開始謀畫奪取大戰利益

在雅爾達會議中，主要的議題分別為，如何處置歐洲與亞洲的法西斯戰敗國，以及如何畫分盟國的利益。而在戰後如何處置德國，特別是劃分歐洲勢力版圖的決定。由於美國羅斯福政府不顧蘇聯共產黨要赤化世界與建立一個新霸權的事實，而拼命地將無以計數的軍火、物資、與設備源源不絕輸送給史達林，所以當可以看出納粹德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時候，蘇聯的軍力已由美國充實到足夠獨佔與支配東歐國家的領土與命運而有餘了。更近的原因，則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蘇三國領袖在德黑蘭會議中，決定英美聯軍在法國開闢第二戰線，讓得到大量美援的蘇聯軍隊，單獨席捲東線戰場。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兩國在雅爾達會議中，只能追認這個已成必然的事實而已。

但是在討論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條件上，卻是英美兩國白白送給蘇聯的「禮物」，也給亞洲帶來戰亂的禍源。因為在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之中，蘇聯不但沒有以盟國的身份，直接的參加對日作戰，甚至還不准美國借道西伯利亞，空襲日本與援助中國，這那裡有盟國的立場可言？更別提蘇聯還在一九四二年策畫暴動、佔領中國新疆，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實上，一個新的赤色法西斯蘇聯，已經開始在盟國陣營之中，利用反軸心國的戰爭，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國主義勢力²。

在二次大戰中，蘇聯純粹是因為被德國進攻，才參加反納粹作戰的，否則蘇聯絕對會坐山觀虎鬥，等著接收二次世界大戰的漁利。當全球反法西斯陣營開始凝聚起來以後，蘇聯卻單獨提升與日本的關係，蘇、日進入準盟國關係的蜜月時間，兩國簽署中立條約，而相互承認彼此所掠奪到手的中國領土：外蒙古與滿洲國。蘇聯不准盟國使用蘇聯領土攻擊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國，它這種對日本友好的立場與關係，實在不知要把蘇聯算成同盟國的一員，還是算成與日本結盟的國家？

但是，等到日軍連續在太平洋戰線慘敗，其主力作戰部隊又都深陷在中國戰區，日本本土已經被美國空軍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戰略運輸已經完全中斷，日軍作戰力量與意志趨於崩潰，正在到處張羅著投降條件的時候，蘇聯卻開始獅子大張口，要求盟國給它「代價」而參戰。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

²以歷史的事實而論，蘇聯這個新赤色法西斯帝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對於人類所造成的災禍，絕對遠超過右翼法西斯國家。單是它對於中國領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萬平方公里以上。

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國，還要先從盟國身上攫取利益，好做爲「參戰」代價的做法。這等於是自比爲強盜，受雇爲參戰的「傭兵」一般，而非並肩作戰的盟國。

但是英美兩國的領袖，仍然任由史達林予取予求，熱烈要求蘇聯參戰。史達林一開始就露出「傭兵」的面目，公開索取參戰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歸還」日俄戰爭的失地，這點還算勉強說得過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的利益，這就完全成爲「赤色」的新法西斯主義的侵略了。中國是反法西斯的盟國，爲蘇聯擋住了日本所有兵鋒的力道，卻竟然要喪失自己的領土與主權，淪爲蘇聯參戰勒索的代價，那還有什麼國際正義可言？但是，不但蘇聯敢開口要中國付參戰代價，連英美兩國的領袖，竟然都爲這個要求背書；羅斯福甚至還要擔任對中國施壓、強迫中國接受的角色。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爲，真是歷史上最爲荒謬的一刻。

其實丘吉爾早就了解史達林的野心，但是因爲羅斯福極力希望提早結束戰爭，要想借用蘇聯強大的軍力。所以丘吉爾明白，既然西方國家不能壓制蘇聯力量的興起，那麼英國就要採取混水摸魚的策略，樂於讓蘇聯擴張勢力以牽制美國，特別是同時可以打擊到中國、壓制東方民族力量的興起，如此一來英國在戰後，就有機會重頭收拾殖民帝國的亞洲霸業。

缺乏歷史深度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始終受希望「越早能結束對日戰爭越好」的觀點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軍的殘留戰力，一方面又有著相當天真的想法，認爲假如能西方國家停止孤立蘇聯，把它帶入世界級的大國的俱樂部之內，那麼蘇俄會對於未來的國際事務，採取更爲合作的態度。因此英美兩國的領袖就在雅爾達會議中，任由史達林漫天要價，而完全忘記進行反法西斯作戰的目的，就是實現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讓全世界的各個民族與國家，都能擁有平等與正義的關係。

史達林早就準備好蘇聯對日宣戰的條件——就是要染指中國的利益。事實上，在日本敗相畢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應史達林的勒索條件，蘇聯都絕對會參加對日本的戰爭的。原因非常簡單，蘇聯在對德國作戰之中，已經成爲一個全面軍事動員的國家，擁有一支戰力極強的美援軍隊，而且控制了東歐國家所有的利益，史達林哪裡會放棄在亞洲掠奪利益的機會。因爲蘇聯只有通過對日本的「作戰」，才能名正言順地在亞洲進行擴張。因此英美兩國若是能夠看穿這點，根本就不必對史達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讓步，或

是在蘇聯無理而且破壞國際正義的勒索中，成爲蘇聯的幫凶。但是英美兩國還是主動屈服於史達林的壓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機利用蘇聯打擊中國，防止她復興與強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間的參謀首長聯合會議中，丘吉爾對羅斯福注射了最後出賣中國的「毒素」，丘氏仍然一再「提醒」羅斯福說，雖然美國一直「大量」援助蔣介石³，但是中國的作戰表現是如此令盟國感到失望，因爲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只有中國戰區處在敗退的狀況。這是刺激美國決定接受蘇俄勒索的一個主要關鍵所在。羅斯福終於悲觀地認爲，中國對提早結束對日本作戰上，沒有辦法提供重要的貢獻，美國只有寄望蘇聯的參戰了。因而答應蘇聯開出來的「條件」，也是勢在必行的了。

37.2 雅爾達密約決定出賣中國

二月四日，雅爾達會議正式開始，史達林從頭到尾主導了整個會議進行，英美兩國領袖只是跟著「紅軍的刺刀」劃押而已，根本連討價還價的餘地都沒出現。二月十一日，在史達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蘇三國領袖，除了同意戰後對德國以及歐洲的瓜分處置之外，還簽署了暫時不能對外公佈的雅爾達密約。這一份盟國出賣中國領土與主權的歷史文件，代表了「強權即公理」的國際現實，也是世界強權繼八國聯軍之後，再一次對中國的蹂躪與欺凌。

這份密約規定，蘇聯將在對德國作戰結束的三個月內，參加對日的戰爭。蘇聯要求盟國接受它的參戰條件，一、外蒙古維持現狀，也就是承認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導演外蒙古獨立，從中國領土中分裂的「事實」。二、恢復帝俄時代，俄國在中國東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蘇聯控制旅順、大連兩個不凍港，與穿越中國東北的中東與南滿鐵路。三、日本歸還千島群島與庫頁島南部給蘇聯。羅斯福則承諾，將由美國來設法迫使中國接受蘇聯的參戰條件。

³這是極大的政治謊言，事實上，中國最終實在得到的美國援助，只有五億美元而已，這和英國得到鉅額的三百億美元，蘇聯得到一百億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蓋世的羅斯福總統，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國戰區的實情，還要依賴陳納德少將的私人報告，才能知道一點真相。更糟的是，由於盟國根本沒有全面反攻緬甸，打開援助中國的管道，因此當時中國還沒有真正「得到」美國應許的美援。中國最需要援助的時候沒能拿到，所造成的後果不是援助金額之多少可以顯示出來的。

這份密約的最為可怕之處，就是英美蘇三國，根本的不顧反法西斯戰爭的基本立場：

- 一、出賣中國（同為作戰盟友）的領土與主權，將它送給在對日戰爭中，根本毫無貢獻的蘇聯。
- 二、身為反日本法西斯盟國的中國，不但爲了這場戰爭盡了最大的貢獻與努力，但在戰勝之後，卻要喪失領土、主權。
- 三、中國一直堅持東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領土，才對日抗戰到底（蔣介石多次拒絕日本企圖保留「滿洲國」的和談條件），中國人所爭得就是國家的尊嚴與主權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強迫中國在對日作戰十四年後，把帝俄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享有的一切特權再給蘇俄。中國如果應該接受這樣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犧牲一切來打抗日戰爭了。

天底下哪有這種戰勝國的下場？而中國之所以會遭到出賣，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國當時是一個弱國，也因為中國未來有可能成爲強國。國際強權當然要設法利用中國因爲抗戰而拼得元氣大傷、無力反抗的機會，趕快先把她壓制下去再說。

中國在同盟國之中，得到援助的順序永遠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軍援極少。但是中國爲了反法西斯戰爭犧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爲一個被戰火蹂躪、對外交通被封鎖的弱國。而一個弱國是沒有資格在國際強權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維護自己權益之機會的。不過矛盾的是，中國經過戰爭的洗禮，舊有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結構，都有了極大的變化，假如中國從此同舟共濟，團結復興，那麼中國將會成爲亞洲影響力最大的國家。這樣會嚴重的危及到蘇聯與英國的帝國主義利益，所以英蘇兩國當然要設法的打壓中國。

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中，可以說是大獲全勝，蘇聯從戰前被西方國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戰後可以左右逢源，支配東歐與東亞的所有戰略利益，成爲戰爭最大的受益人。藉著反法西斯戰爭，蘇聯的國勢的擴張，得到無法想像的大幅進展。英國爲了維護自己殘破的殖民帝國利益，而犧牲了國際正義；美國則是爲了提早結束戰爭的眼前利益，而出賣了中國。但歷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國只爲其殖民帝國延長不到二十年的壽命；美國則爲亞洲冷戰

的衝突，參加了韓戰與越戰，付出極高的生命與財產的代價；就連蘇聯也只是昌盛一時，在四十五年之後，整個赤色帝國土崩瓦解，人民現今過著乞討國際社會援助的悲慘歲月。

37.3 美國鑄成歷史大錯

雅爾達密約的簽定，事實上，得助於美國國務院與軍方單位裡親共勢力的影響很大。國務院拒絕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參與其會，也未曾通知美軍在太平洋的將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與尼米茲（Chester Nimitz）。因此雅爾達密約邀請蘇聯參戰，就等於是開出空白支票，做為給蘇聯在遠東參戰的代價（不過首先付帳的卻是中國而非美國）。

會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只通知國會，雅爾達對於歐洲部分的協議，而隱瞞了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代價的密約。當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聽到這份密約相關的傳聞之時，曾經親自晉見羅斯福求證。當時瀕臨死亡的羅斯福總統，竟已經「記不清楚」這份密約的主要內容與可能的影響，於是羅斯福將密約的備忘錄，交給赫爾利大使研究。當赫爾利提出報告，力陳這份密約的不當之時，才讓羅斯福感到大驚失色，而發現這份密約已經犯下大錯。美國如何能夠背棄大西洋憲章的原則與精神，充當蘇聯的「打手」，強迫中國接受有損領土與主權的侵略行爲？假如蘇聯的野心更大，那麼美國不是平白地將赤化亞洲的機會，奉送給蘇聯？

因此羅斯福要求赫爾利設法進行補救。赫氏奉命後，想先說服丘吉爾修改立場，希望英國能夠放棄對香港的佔領，以迫使蘇聯放棄控制旅順、大連，但是被丘吉爾一口回絕。赫爾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羅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赫爾利見到了史達林與蘇外長莫洛托夫，他們一再向赫爾利保證，蘇聯純粹是爲了打擊日本才會進兵中國東北，蘇聯絕對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尊重蔣介石的領導，願意幫助中國的統一與復興。對日作戰所要索取的代價，是要對蘇聯人民有個交待而已。

由於杜魯門在繼任總統之前，對於美國在發展核子武器或是雅爾達密約的簽訂，都是被排斥在決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爾利特別要求杜魯門總統，能否重新考慮雅爾達密約，對於亞洲全局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因爲這個密約，不但是影響戰後東亞的國際戰略平衡，更是會妨礙美、

中的國家利益，同時更是違背了大西洋憲章與美國立國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魯門卻非常堅持美國必須徹底執行雅爾達密約。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魯門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訪問莫斯科，商討蘇聯參對日作戰的時間，以及探尋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史達林表示，只要中國同意與蘇聯依照雅爾達密約的原則，簽訂中蘇的條約，蘇聯將在當年八月對日本宣戰。史達林並且特別重申，蘇聯絕對尊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也願意幫助中國的統一與復興，它與中國共產黨並無政治與軍事的直接關連。

雖然根據史達林的要求，美國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蔣介石，有關雅爾達密約的內容。但是紙包不住火，謠言還是慢慢流傳開來。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是在五月二十日，應蔣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爾達密約的大概內容。當蔣介石知道中國要為蘇聯參戰，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之後，可以說是痛心疾首已極，但是蔣介石卻想不出破解之道，因為中國已經因為戰爭的摧殘，到了無力再戰的地步，更何況國、共的內戰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當年的六月九日，蔣介石派行政院長宋子文在美國進行訪問，在風聲走漏的壓力之下，杜魯門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爾達密約的大概內容。宋子文對於這份密約，竟然是拿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做為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代價，大感不滿。無奈杜魯門忠心耿耿地根據史達林的要求，強迫蔣介石就範。

這時候英美蘇三個「盟國」聯手，擺出比敵人還要可怕的态度，強迫中國必需接受雅爾達密約，否則中國自己接受一切的後果。當時的中國，事實上已經再度分裂為重慶與延安的兩個政府，八年抗戰造成國力的耗竭與人心的不安，都已經使得中國無法再經得起「三強聯軍」的孤立與圍攻。同時國際強權正在進行各種介入中國內政分裂的活動，假如蔣介石所領導的重慶政府，不願接受雅爾達密約，那麼這些國際強權就會轉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蔣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領代表團，在六月三十日親自到莫斯科與史達林交涉。

37.4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史達林對於侵略中國，早已有著極長的謀畫，因此他對於宋子文一再宣稱，蘇聯支持重慶政府與蔣介石政權、絕對尊重中國對於東北與新疆的主權，以及絕對不會干預中國內政的分裂⁴。史達林解釋，蘇聯之所以要求在東北的特權，完全是爲了便利蘇聯協助中國共同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至於承認外蒙古獨立，因爲外蒙古早已脫離中國統治長達二十四年（更爲正確的說法是，外蒙古已經成爲蘇聯的傀儡二十四年），當時早已成爲一個「獨立」運作的國家，中國不應違背蒙古人民獨立的「意願」與事實⁵，因此目前中國所要做的，只不過是接受這個既成之事實而已。

在中蘇的交涉與談判中，史達林用盡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國讓步，否則就要中國承擔所有盟國關係破裂的責任。這時候，蘇聯已將擊敗德國的百萬精銳部隊，開始大量的調往西伯利亞進行作戰集結，這時根據美國軍方的評估，無論中國是否屈服，與蘇聯簽訂城下之盟，蘇聯都絕對會派兵進入中國的東北與內蒙古，以搶奪在遠東的戰利品。而當時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足夠的兵力，能在這個地區，阻止蘇聯軍隊的行動。因此美國力勸中國不如設法接受蘇聯的要求，這樣至少可以限制蘇聯在中國境內的擴張與掠奪。

在這種情形之下，蔣介石終於決定，假如能夠簽定中蘇和約，以換取中國的統一與建設，以及穩定中蘇之間的持久的和平，那麼中國可以接受史達林的條件，史達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約條件，一、蘇聯保證東北的領土、主權與行政的完整。二、蘇聯保證不參予新疆的動亂，由中國自行解決。三、蘇聯只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並且提供中國統一與復興的援助。而中國方面則願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決脫離中國而獨立的事實。

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經試爆成功，美國軍方對於蘇聯在東歐與德國那種跋扈的擴張行爲，也深感警惕與不安，因此美國參謀首長會議主席李海上將（William Leathy），曾經建議杜魯門總統，是否可以重新考慮要求蘇聯參戰的立場。因爲美國已經清楚知道，日本已經接近失去作戰能力與意志的地

⁴請所有的中國人爲史達林這些「保證」，做歷史的見證：史達林遵守過那一點了？

⁵在歷史中，數不清的悲劇，都是獨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決定。千萬不要以爲，民意不會被操縱。

步了，同時日本正在慌亂地尋求蘇聯以及其他的中立國協助，向盟國進行投降的外交接觸。蘇聯的參戰，無關作戰的結束，只是純粹戰利品的掠奪，並且會嚴重的影響到亞洲的戰略均衡。

但是這個建議，「當然」遭到馬歇爾與陸軍部的強烈反對。中國是已經賣給蘇聯的戰利品，絕對不能退貨毀約了。在馬歇爾的觀點裡，二次世界大戰亞洲的戰場戰略，除了要擊敗日本之外，必須順便要分化與削弱中國。因此杜魯門仍然決定要給蘇聯這個歷史性，免費的擴張機會。目的當然在打壓中國在戰後的復興。

這裡存在的一個歷史問題是，假如蔣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國軍隊指揮權給史迪威，六百萬的中國軍隊都成為美軍將領麾下的部隊，那麼美國還會同意蘇聯白撿這個歷史的便宜嗎？馬歇爾是否會爲了美國的利益，而放過在中國製造歷史的悲劇？

不過假如先前蔣介石向馬歇爾屈服了，那麼國民政府還能算是代表中國主權的政府嗎？又有多少投靠美國的軍人與政客會出來興風作浪呢？

37.5 中、美、英發表波茨坦聯合宣言

中美英三國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國的波茨坦（Potsdam）聯合發表盟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其中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的領土條款必須實現，日本的領土只限於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國所指定的島嶼」。蘇聯雖然也參加波茨坦會議，但是卻在宣言上根本無法列名，因爲當時蘇聯還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國家，既未與日本斷交又未與日本宣戰，所以沒有地位與立場，來與盟國要求日本投降。史達林參加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對盟國施壓，要求大家聯手逼迫中國承認雅爾達密約，好讓蘇聯能夠早些對日本宣戰。

八月二日，杜魯門離開歐洲返回美國，正式批准了美軍對日本進行原子彈的攻擊。八月六日，美軍第一顆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廣島，造成日皇裕仁極大的驚恐，因此加強了日本政府投降的決心與行動。這時蘇聯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來史達林非常堅持中國必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才能出兵攻擊日本的關東軍。但是，此刻蘇聯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彈攻擊之後，會突然宣佈投降，這樣蘇聯就會師出無名，也就無法順理成章地在遠東搶奪

戰利品了。

所以蘇聯只有不顧還沒有與中國達成協議的事實，就搶先八月八日夜間，下令蘇聯與外蒙古的軍隊，對日軍發動三路總攻擊，次日蘇聯與外蒙古才補行對日本宣戰。當蘇聯向日本正式宣戰的當天，美國的第二顆原子彈攻擊了長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潰。（外蒙古的獨立還沒有獲得正式承認的法律程序，就已經與蘇聯同步的對日本宣戰了。）

這時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雖然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對於是否接受「無條件投降」的問題，仍是議而不決，由於日皇裕仁決定要儘快投降，最後只有由首相鈴木貫太郎恭請日皇「聖斷」。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體制的前題下，接受盟國招降的波茨坦宣言，這時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時。於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託中立國瑞士政府向盟國照會，日本願在保留天皇體制下，同意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國代表盟國回覆日本，以日本的天皇體制，也需聽命盟國佔領軍的號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無條件投降中留下一個彈性的空間。

這時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經在世界與中國各地傳開了，日本的中國派遣軍與南方軍以及關東軍，對於日本準備無條件投降，都採取強烈反對的態度，特別是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最為激烈，岡村寧次認為，日本仍有幾百萬軍隊，應該可以與盟國周旋，以獲得較好一些的和平條件，而不能無條件投降。因此日本軍部再度要求日皇考慮更改投降條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潰，因此對於軍部的反對，根本不加理會。

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成投降的敕令程序，並且宣佈在十五日，將會公開廣播日皇裕仁的「終戰」演說。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與蘇聯簽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喪權辱國的「友好同盟」條約，（還不如稱為戰敗投降條約比較名符其實）。中國才在結束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蘇聯的正式侵略，身為盟國中國領土所受到的損失，比戰敗國日本的還要大得太多了。

37.6 蘇聯紅軍準備大舉劫掠中國東北

事實上，蘇聯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佈中止日蘇中立條約，就

已經開始將作戰的物資，開始先行運到西伯利亞東部儲存備用（當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資），在五月初德國投降之時，蘇聯更是立刻將精銳的紅軍部隊全數東調。到了七月份，整個西伯利亞鐵路已經停止民間運輸，完全專門運送軍隊與作戰物資，前往中蘇邊界。這時蘇聯爲了增加劫掠戰利品的實力，竟然調動了一百五十萬大軍進入遠東地區。史達林動員如此龐大的兵力駐進遠東，根本就擺出誰也不能阻攔紅軍前進的架勢，難怪美國得到情報之後，馬歇爾的結論是，不管中國是否接受雅爾達密約，蘇聯都要在遠東進兵，除了使用原子彈之外，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紅軍的行動。

史達林下令由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出任遠東軍總司令官，由馬林諾夫斯基（R.Y. Malinovsky）出任進攻中國東北的總指揮官，蘇聯的軍隊準備在八月中旬以後，完成對日本關東軍發動攻擊的準備。這次蘇聯大軍出擊的行動，有著極爲重大的多重歷史意義，不單要爲日俄戰爭的歷史屈辱報仇，也是要完成俄羅斯兩百年的宿願，在遠東搶到出海的不凍港。同時蘇聯更要在中國的東北，搶劫日本投資建設的大量戰利品，作爲資助中國共產黨打內戰與對抗國民政府的本錢。

史達林知道，蘇聯要乘機劫掠遠東的戰後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夠的實力才行，既然美國政府願意出錢支助大部分的戰費和裝備，蘇聯當然樂意出力。同時蘇聯也與延安以及朝鮮半島的共軍聯絡，要求他們務必派出大量的部隊，「協同」蘇聯軍隊進攻內蒙、東北與朝鮮半島。

蘇聯在一九四一年之後，「嚴格遵守」日蘇中立條約（蘇聯從來沒有如此認真的遵守過國際條約），不但沒有與盟國同一戰線，對日本發動攻擊，甚至不准美國援中國抗日的物資，經過蘇聯領土，也不准美國利用西伯利亞做爲攻擊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沒有後顧之憂，得以在中國戰場上，發動毀滅性的攻勢。但是在日本已經開始進行投降程序，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之後，蘇聯的軍隊才姍姍來遲進入東北。與其說是對日本作戰，不如說是來劫掠戰利品，強奪中國的不凍港。

37.7 關東軍最後不堪一擊

由於關東軍在整個中日戰爭之間，經過不斷的被抽調支援各個戰區作戰，早已虛弱到只有少數象徵性的野戰部隊駐守。最後因支援中國派遣軍的

一號作戰，幾乎將所有還有戰力的部隊，全都抽出，以支持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孤注一擲。雖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軍大本營開始覺察到蘇聯有可能參戰，因此在開始增強關東軍的戰力，但是此時的日本已經是沒有人力與裝備，再進行武裝了。新增的部隊，只是空有番號的「老百姓隊伍」而已，日本大本營只有下令中國派遣軍調動部隊北上支援關東軍。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在大連召開軍事會議，要求中國派遣軍必須設法支援關東軍備戰。

這時琉球決戰已經在日軍慘敗之下結束，本土已經遭到美國海空軍的直接攻擊，日本帝國正面臨全面崩潰的邊緣。可是日軍還有能力進行野戰大兵團作戰的部隊主力，又全都擺在遙遠的華南與華中地區，到了緊急的歷史決戰時刻，要想大量抽調北上，將會在整個運動的途中，遭到盟軍猛烈的空中攻擊。此時受過美式裝備的華軍部隊，也開始佈署，對後撤的日軍進行反擊作戰，因此在中國戰區的日軍，要想支援關東軍備戰，實在是千里迢迢與困難重重。何況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時刻，手上能夠握有重兵，這樣方便自己進行緊急狀況的處置，因此並不願意將日軍大量調往東北。

在這些不利的情況下，只有少數的日軍部隊實際抵達關東軍防區。更糟的是，日本對於蘇聯的實際參戰行動，仍然有著不確定的判斷，特別是日本正在「委託」蘇聯為日本投降之事，與盟國進行外交斡旋。因此史達林應該知道，日本根本已經是投降在即，而沒有繼續作戰的意願，蘇聯何必參戰？日本卻不瞭解，它即將投降的決定，正是蘇聯必須立刻提前參戰的原因。因為蘇聯的參戰，絕非為了擊敗日本，而是為了搶奪它在遠東的地緣、戰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瀕臨投降的時刻，蘇聯越要全力的參戰。

史達林清楚知道，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日本立刻的反應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動」，因為蘇聯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間人⁶，因此史達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軍令，要求蘇聯遠東軍司令官，立刻準備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對日軍發動攻擊。雖然當時蘇聯部隊與後勤的集結，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軍隊，奉命絕對必須在當天夜間，對日本關東

⁶美國事實上也清楚這一個事實，因為日本政府與駐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館的通訊密碼已被美軍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過駐莫斯科、伯恩的使館進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國掌握之中。

發動全線攻擊。

接著在當天半夜十二時，史達林緊急召見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史達林表示，由於日軍仍然準備頑抗美軍，因此蘇聯決定立刻對日本宣戰。（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點召見美國大使，只為了告訴美國這個老掉牙的情報判斷。史達林其實是擔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佈投降，蘇聯就沒有漂亮藉口來佔領中國的東北了。）

蘇聯的紅軍，就在八日夜間十一時，不宣而戰，對日本關東軍發動了全線的攻勢。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蘇聯也會在日本已經同意投降的時刻，進行「偷襲」。蘇軍發起總攻擊的當夜，山田乙三正在大連視察，並未在長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戰情，他在第二天趕到長春時，才了解蘇聯以絕對優勢的軍力與火力進攻的全面戰況，關東軍不但沒有完成戰備，蘇軍的攻勢已經超出山田所能掌握與抵抗的範圍了。

華西列夫斯基指揮精銳的紅軍部隊，共有八十個戰鬥師，二萬六千門大砲，五千五百輛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飛機，兵團分成三路進攻。其中左翼兵團，由中東鐵路的南北兩頭的重鎮，滿洲里與綏芬河，同時在八日夜間發動閃電夾擊。擁有重裝備的紅軍裝甲兵團，在突破日軍防線之後，沿中東鐵路南北同時疾進，兩軍在哈爾濱會師之後，立刻沿南滿鐵路向南切入，攻擊長春的關東軍司令部。

紅軍的中央兵團，則是由蒙古高原直撲熱河，這路行動迅捷的機械化部隊，每天前進作戰的速度超過一百公里，在穿越熱河的中部與南部之後，將主力指向東北的南部，向關東軍司令部長春攻擊，以南北合圍關東軍。而右翼兵團，則沿著庫倫到張家口的公路，迂迴攻擊察哈爾，甚至企圖進軍北平與天津，準備攻到渤海海邊，以打通與延安共軍會師的交通路線。

這個蘇聯大軍全力出擊的歷史鏡頭，正是日本皇軍創立者山縣有朋所擔心之惡夢的實現（也是日本參謀本部半世紀以來，準備終有一天要打得戰爭）。但是日本爲了侵略中國，與發動太平洋戰爭，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軍力。如今日本關東軍，落得只以空城來面對這個歷史的決戰。

關東軍的作戰能力這時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調入中國東北的援助部隊，不但數量有限，又遲遲無法到達。這時關東軍的每條防線，同時遭到紅軍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圖大幅收縮戰線，放棄北部平原地區，只圖在東北南部的山地，進行抵抗。在蘇聯發動攻勢之後，關東軍司令部立刻就遷移到了

靠近朝鮮的通化。因此擁有絕對優勢火力的蘇聯紅軍，在關東軍自動收縮戰線的配合之下，進展速度更是驚人⁷。

當蘇聯軍部迫進關東軍南部防衛圈之時，日皇投降的詔令下達，關東軍召開將領會議，雖然有些軍官仍然主張拚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經失去作戰的意志，決定「承詔必謹」，下令關東軍全體向蘇聯紅軍投降⁸。蘇聯部隊對於投降的關東軍，一個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去勞動改造，與充當開發西伯利亞的苦工，結果有高達六成的被俘日軍死在異域。一向飛揚跋扈、自視極高的關東軍，其下場竟非戰死疆場，而是成為俘虜，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〇年，還活著的俘虜，才開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〇年，最後一批九死一生的關東軍戰俘才歸國。

雖然關東軍決定停戰投降，盟國總部也下令整個戰區就地停戰，但是蘇聯的紅軍卻沒有片刻的停留，大軍依然按照作戰命令而兼程疾進，以攻佔所有的戰略目標。特別是紅軍右翼兵團，一路猛攻日軍在內蒙的陣地，打通張北而與中共共軍會師。蘇俄紅軍並且在攻佔張家口的日軍內蒙補給中心後，讓共軍林彪、聶榮臻以及賀龍的部隊，得到了大量的補給與裝備。而蘇軍中央兵團擊破承德之後，也接應李運昌與林彪的共軍部隊進入東北。

本來紅軍還想攻過長城，直下北平與天津的，但是這時魏德邁已經感到局勢失控，蘇聯根本不是來打日本人，而是來搶戰利品的。因此立刻與蔣介石達成協議，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軍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令投降日軍必要時與蘇聯紅軍不惜一戰，以確保長城防線；一方面則由美國的陸戰隊，在渤海灣登陸，控制平津到山海關的戰略要點，然後立刻空運國民政府的部隊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蘇聯紅軍席捲整個華北的企圖。

中國從關東軍侵略東北，與日軍作戰了十四年，打得民窮財盡，耗竭了一切的國力，最後還要落得被盟國出賣的命運。而蘇聯只對日本「作戰」七天，就恢復帝俄時代所有在中國東北的帝國主義特權、奪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國東北二十億美元以上的投資。當然蘇聯也搶奪東北中國人民的財產。六十萬的關東軍，只在象徵性的抵抗下，就向蘇聯投降，史達林的賭

⁷在此更可以看出，現代化的作戰，與軍隊的裝備、訓練、後勤，有多重要的關係了。一向以精銳著稱的關東軍在抽空之後，也一樣不堪一擊。因此華軍這麼長期的艱苦抗戰，更是一個只有中國人才做得到的作戰任務。

⁸這是關東軍第一次真正沒有討價還價，或是陽奉陰違敕令。整個日本侵略的戰禍，就是由於關東軍自行其事，不肯聽命令所引爆的。過去關東軍一直是日軍中自視最高，與自認是決戰干城的部隊，一向不把詔命放在眼裡。但是最後面臨歷史決戰的時刻，卻決定「承詔必謹」了。

注可是下得快、狠、準，免費得到了巨大的戰利品，而到今天還由中共與西方政府的主流歷史，以各種荒謬的謊言為他的暴行粉刷、掩飾。

對於攻佔中國東北的蘇軍而言，絲毫沒有把東北當成是盟邦的領土，也無視於中蘇「友好」條約的約定，而是把東北當成戰利品，蘇聯有計劃的把東北所有的工廠與設備，以及所有有價值的物件，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帶走的，也加以破壞燒毀。蘇聯紅軍在軍紀的放縱之下，部隊有如罪犯土匪集團⁹，東北人民普遍覺得，蘇聯「盟軍」比日本敵軍還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說蘇聯紅軍應該在日軍繳械投降之後，依照中蘇的相關協定，在三個月內撤出在東北的部隊，但是事實上，蘇聯部隊根本就沒打算在搶光東北所有東西之前離開。中蘇雙方幾經交涉，根本毫無結果，蘇聯紅軍自恃軍力強大，華軍拿它無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最後連美國都加入施壓，蘇軍才宣佈撤軍，大搖大擺的將所有劫掠的物資帶走。蘇聯軍隊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爾濱，留下了滿目瘡痍、劫後的東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唯一沒有遭到戰爭嚴重破壞之處，只有富饒的東北地區了，同時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資建設，這是中國戰後重建最關鍵、重要的工業基地。但是被蘇聯劫掠之後，不但赤地千里，中國戰後復原的機會也付之一炬了。）

至於外蒙古獨立問題，蘇聯迫不及待的立刻炮製了一個公民投票的「活動」，結果當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這是非常「正常」的結果，蘇聯政權七十五年，所有在蘇聯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結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場），都贊成外蒙古獨立。國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此時國民政府還抱有一絲絲的希望，希望「盟邦」蘇聯，能夠因為得到搶劫戰利品的飽足，能夠暫時放過中國。

雅爾達密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可恥的一個條約，因為這個不公義的陰謀秘密協定，完全違背了參與反法西斯作戰的二十六國所支持之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就是「沒有經過參戰國家人民的同意，不得變更國家固有的疆界」的明確主張。雅爾達密約清楚地表明，在國際社會中，強權的力量仍

⁹單是紅軍在長春日本人集中地區，對於日本僑民的姦殺凌虐，就高達萬人。由於紅軍根本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任何婦女施暴，造成東北人民為了自保，部分婦女甚至將頭髮剃光，穿上男裝，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還能大體約束其部隊的暴力行為，簡直是有天淵之別。

然大於正義，中國雖然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極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本身的國力耗損最大，於是以弱國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國無情的踐踏。

37.8 悲劇的發生與歷史的代價

由於中國東北的資源豐富，以及戰略地位重要，特別是旅順是天然的不凍港，所以。蔣介石早就擔心國際強權，會對中國東北採取不利的行動，而造成新危機的可能發生，所以在開羅會議中，兩次向羅斯福總統提到有關渤海海的戰略地位，及中國願意開放旅順軍港給美軍使用，以免再有強權打這個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國沒有這種遠略。

丘吉爾雖然也看出史達林的野心，但是由於羅斯福要把蘇聯當成平等伙伴來交往，因此不願與英國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強權興起。對缺乏歷史深度的羅斯福而言，美國最高的戰略方針，只是尋求眼前的解決方案，能夠最快與最少損失的情況下，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他眼見蘇聯軍力強大，因此就千方百計拉攏蘇聯參加對日戰爭。而英國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夠設法破壞中國的統一與復興，同時擴張蘇聯的權力，來壓制美國的勢力。當然還有要讓蘇聯強佔旅順，英國才有理由繼續強佔香港。

美國在歐戰結束之時，也發現蘇聯在德國與東歐的擴張野心，美蘇軍方幾度幾乎要在歐洲發生衝突，造成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於蘇聯極大的不滿。東歐各國淪為蘇聯的勢力範圍，是木已成舟難以挽回，但是美國應該可以及時在東亞，協助中國，來化解雅爾達密約所帶來的東亞危機。假如美國政府當時能夠及時醒悟，優先、迅速地加強對中國的軍力與經濟的援助，延後甚至不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攻擊（只要繼續空中封鎖日本就足夠了），讓日本能夠將最後的力量，往北方收縮，也同步地將中國的力量往北方擴張。

假如杜魯門真的是一位有膽識與遠見（當然他都不是）的總統，決心要扭轉蘇聯共產勢力的擴張，應該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軍停止進攻琉球群島，而將太平洋美軍主力部隊，改在越南與華南之間登陸，與中國的反攻西南的部隊會師。這樣中美兩軍很輕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內、湛江甚至廣州、九龍的港口，建立中國華南直接的聯絡線，這個聯絡線的海運能量是駝峰空運的百倍以上，中國立刻就由海運得到大量的軍事裝備與補給，而讓華軍的

戰力迅速的增強。

同時讓重慶與日軍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聯絡（從一九四五年二月開始，南京與重慶之間的中國與日軍，就有直接聯絡的電台），清楚告知日軍，蘇聯的大軍即將攻擊關東軍，假如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被蘇聯攻佔，那麼在中國境內的日軍，根本就連困獸之鬥都無法進行了。因此給他們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立刻將日本在中國戰區的大軍全部北調，與關東軍聯手，進行對蘇聯紅軍作戰的準備，同時盟軍飛機停止攻擊在中國戰區北調的日軍。這樣蘇聯的部隊當然就要面對日軍主力部隊的抵抗，說不定蘇聯就會延後對日軍的作戰時間。

在肅清華南與華中後撤的日軍陣地之後，中、美大軍可以繼續北上，直接攻到長城一帶，這時蘇聯軍隊可能還沒有參加對日作戰，或是日蘇才剛剛開始在進行苦戰。這時美國可以公佈準備要動用原子彈的最後通牒，日本在這種危機狀況下，早已失去作戰意志，投降是已經是必然的結果。這樣中國有了強大的部隊，直接可以越過長城，進入東北與內蒙古，那麼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強迫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更不會有日後中國內戰、韓戰與越戰的重大犧牲了。

在猛烈打擊敵軍、迅速結束日本抵抗、減少盟軍傷亡的戰略前題下，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應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作戰決定。但若是從當時歷史的全局眼光來衡量，杜魯門決定使用核子武器轟炸日本，則是犯下政略的大錯誤。因為日本投降在即（杜魯門等美國決策階層已經知道這個事實），蘇聯準備大軍掠奪中國，中國本身尚未完成勝利與接收的準備，美國投擲原子彈，只給蘇聯增加機會，與給中國產生混亂而已。並不是如通俗歷史所說，原子彈是迫使日本決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經決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間人——史達林來傳話）

因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磯國昭奉命組閣，日本就已經有意以和談方式解決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小磯集中力量，企圖解決中國事變，但失敗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鈴木貫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願意以投降來結束戰爭。但是日本政府當時最大的錯誤，就是私下委託蘇聯來進行和談斡旋，而給蘇聯獲得內線消息。因此蘇聯以「參戰」為名，進行掠奪東北亞的大計劃。其實日本政府應該公開表達和談立場，或是與瑞士、瑞典等國進行直接明確的投降接洽。

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國海空軍開始接近日本本土，對它進行猛烈的攻擊，已經使日軍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當時美軍的參謀首長李海上將，就反對美國使用核子武器，因為他認為，日本已經崩潰與就要投降了，沒有理由要對日本投擲原子彈，而讓美國留下歷史的爭議；李海也強烈反對把蘇聯引進遠東戰場，更不贊成美國應許蘇聯任何利益，徒然讓蘇俄來中國與亞洲製造更大的問題。

何況，此時中國已將在緬甸作戰的部隊，全數調回中國戰區，其他中國的部隊也開始獲得美軍的大量援助與訓練，作戰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國政府應該能夠記取歐洲赤色法西斯興起的危機教訓，而設法更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彈實驗成功的威力，同時加速在華南港口登陸，將巨量的作戰物資，經由海港運送來支援中國的軍隊。只要中國能夠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會增加中國軍隊的戰力，更為鼓舞中國全體軍民的抗日士氣，只要中國軍隊全力對日軍發動攻擊，美軍繼續轟炸日本，切斷所有的交通路線，美國根本不需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攻擊，日本就已經決定投降。

因此美軍使用原子彈攻擊日本，只為蘇聯減少參戰的成本，增加參戰的勝算而已，並沒有縮減多少盟國戰勝日本的時間與成本，但卻讓東亞成為紅色法西斯掠奪與發展的歷史悲劇成真。

當然蔣介石在盟國集體出賣之下，被迫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固然是他個人在重大壓力下所犯的錯誤，但這也是當時分裂與衰弱的中國，必然得到之歷史悲劇結果。假如中國當時不是陷入國共內戰的前夕，國力殘破不堪，而無力應付國際強權的壓力，蔣介石應該會有全力一搏的本錢與勇氣。事實上，假如蔣介石不同意雅爾達密約，延安也會同意讓蘇聯掌控中國所有戰後利益的¹⁰。更為現實的是，就算分裂與衰弱的中國，不接受雅爾達密約，蘇聯一樣要侵略中國，不但奪走外蒙古，甚至還會加上東北。

在談判中蘇友好條約之時，蔣介石眼見當時的大局，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無論中國是否簽約，蘇聯的軍隊都會侵入中國的東北、內蒙甚至華北，簽約還有可以約束蘇聯的交涉機會，不簽約只有面臨一戰。但是當時的中國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的邊緣，那裡還能在對外全面孤立，與內部分裂的狀態下，再來承擔與赤色法西斯決裂的壓力？假如簽約能夠讓中國享有統一

¹⁰只要看延安的八路軍如何密切配合紅軍的行動，尾隨紅軍接收東北，就知道雅爾達密約對共軍發展的重要性了。

與復興的機會，那麼十幾二十年之後，中國富強了，中國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糾正過來，因為在國際社會之中，有實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礎。台灣是在馬關條約中，正式的割讓給日本，但是在中國戰勝日本之後，還是一樣的可以要回來。所以只要中國統一與強大，中國不怕外蒙古不歸心，也不用擔心大連旅順要不回來。

因此，蔣介石在萬分無奈的狀況下，接受了雅爾達密約。盟國就這樣的出賣了中國，同時也伏下日本戰後免受懲罰、迅速復興的機會。在西方國家的戰略架構下，雅爾達密約鑄成了歷史大錯，蘇聯藉口僅以七天的對日作戰（不如說是參加劫掠），而將勢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國需要全力穩住日本，以圍堵蘇俄的擴張。

蔣介石面對盟國的狠毒，與蘇聯的凶殘，所經歷的煎熬與痛苦是無法形容的¹¹。而此時岡村寧次曾經與蔣介石聯絡，假如中國能夠放過日本與日軍，他願意為蔣介石效力，率領日軍對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雖然這個謀略蔣介石沒有採納，但是蔣也不能不對日本寬大，以留下必要時的「聯日制蘇」活棋。

這就是為什麼在開羅會議中，蔣介石曾經提出要戰後日本以實物負責對中國進行戰爭賠償的建議，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後，卻宣佈「以德報怨」的政策。這種做法，不完全是基於寬大的道德情懷，更是有著非常嚴重的現實政治考慮因素。因為當時的中國，所面對的最大敵人，已經不是日本而是蘇聯。中國處在被盟國出賣，國土殘破與新的內戰危機狀況下，蔣介石有必要留一手來對付險惡不測的局面，所以只有放過日本¹²。

中國與盟國終於戰勝了日本法西斯政權，但是唯獨中國，卻要付上被蘇俄侵略的代價。中國這種輪番被侵略與出賣的悲痛歷史事實，只說明了一件事，在人類的歷史中，強權常越過正義的原則，而支配著弱國的命運。當時的中國，雖然是出力最大的戰勝國，卻在河山殘破、國力耗竭、內部分裂的狀態下¹³，因此成為被盟國欺凌的對象。

從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而言，盟國基於自身利益所做的殘酷決定，甚至比敵人的侵略還要可怕。歷史的結論是，日本曾經如此無理地侵略與大

¹¹魏德邁回憶，當美國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說明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的真相的時候，他永遠無法忘記蔣介石的反應。

¹²或許這也是史達林最後會同意從東北撤退的一個顧慮因素？後來岡村寧次等日軍將領，曾經擔任蔣介石的高級軍事顧問。

¹³「不幸」的是，中國卻又同時是一個非常擁有發展潛力的國家。

肆破壞、劫掠中國，結果戰敗的日本，不但沒有付出任何的賠償，反而還能得到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琉球群島¹⁴，做為日本發動侵略的「獎勵」。而曾經爲了與侵略者殊死纏鬥而付出了最高代價的中國呢？卻是外蒙古永久的喪失，東北主權、利益受到侵害，與中國百姓受到的蹂躪。

歷史的教訓是，只要中國處在分裂與衰落的狀況之下，不管她站在歷史正義的那一邊，不管她曾經爲世界的自由與理想付出過多少的代價，只要中國人不夠團結與強大，最終都是成爲被侵略與出賣的對象，下場甚至要比戰敗的侵略者日本還要悲慘。

這也就是中國在近代歷史中被出賣的悲劇命運之一。而這類極不公義的陰謀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現在未來的歷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觀刻意扭曲雅爾達密約的實情的狀況下，中國人絕對不能忘記這個慘痛的事實，更要從歷史事件的教訓中，看出歷史挑戰的軌跡，才能面對未來的考驗。

¹⁴美又國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將琉球群島「還給」了前侵略者日本，這完全違背了同盟國在開羅會議的決定。

戰爭的結束，勝利的代價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百年的歷史恩怨與衝突、長達十五年的戰爭對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戰，都終於達到了一個全面清算的歷史時刻。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萬在中國戰區與越南的日本軍隊，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大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正式投降，所有日本從甲午戰爭起所侵略的中國領土，全部無條件地歸還，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國取得的特權，全部放棄，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偉大與榮耀的一刻。中、日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以及中國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歷史，加上無數中國人所有的血淚，都在這一刻得到勝利與光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錄音帶，透過電台的廣播，親自向日本與全世界公開發表「終戰」演說¹，當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與海外軍民，都要肅立恭聽裕仁的「聖斷」。在這篇演說中，裕仁親口宣佈，日本政府與日軍大本營決定，接受波茨坦的宣言，全體日本軍民都必須遵守。

¹這就是日本的歷史心結所在，明明是無條件投降，卻不敢明講投降，硬說是終戰，因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極重，無法承擔投降的事實。不過日本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卻沒有完全白費，五十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台獨支持者，也擁抱「終戰」的說法。

在日皇裕仁投降廣播宣讀完畢之後，日本全國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驚恐與迷惘情緒之中，這是日本開國二千六百年以來，第一次正式向外國投降，也是外國部隊將第一次佔領日本的本土。對一向封閉孤立與自卑感極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臨千年未有之奇變。但是日本政府與人民，已經清楚知道，日本實在是沒有力量再負擔戰爭的損失與消耗了，它只有投降的選擇。

雖然日本的軍方，仍然有人感到無法接受，這個無條件投降的事實，特別是在海外戰場的日軍，曾經有極強的反對意見。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國派遣軍態度最為激烈。因為當時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的軍力最強，所以反彈的聲浪也最高，不過在日本本土的軍民，則是絕大多數同意日皇的投降選擇，因為他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為了疏導日本海外軍隊的反彈情緒，日皇裕仁特別派遣三位親王，帶著日皇投降的詔書，前往關東軍、中國派遣軍與南方軍司令部，進行投降詔命的宣達。

38.1 日本在華駐軍正式向中國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國招降文件的正式簽署之後，鈴木貫太郎內閣就在第二天宣佈總辭，改由東久彌宮親王，組成善後內閣。而日本的近衛師團部分軍人，企圖發動政變，以阻止日皇宣佈投降的演說，但是終於卻無法挽回日本決定投降的大局。當天夜晚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切腹自殺，日本的軍方最高位階將領杉山元、畑俊六，聯名發出命令，要求海內外所有日軍「奉詔唯謹」；同時日本軍部則立刻出現一片火海，日軍開始大量的焚燒所有的作戰機密資料，以防這些資料會成為未來戰犯審判的罪證（這也就是在東京大審之中，一些關鍵的罪證，缺乏直接的文件資料作證之原因）

在中國與盟國方面，事實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經知道日本透過瑞士提出的投降文書，也同意美英等國政府在十二日回覆日本投降的立場，全世界的傳播媒體也於同日報導這個消息。中國的軍民，就在八月十日的當天，陷入了狂喜之中，慶祝戰爭即將結束，同時中國因戰勝日本而躋身為世界四強之一。蔣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回應當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廣播，在重慶的電台，發表了「以德報怨」的演說，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

降。這時只有蔣介石等少數中國決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卻正面臨另外一次的侵略，這回是來自盟國動的手腳。蔣介石是在無可選擇的狀況下，只有輕輕放過對日本的追究，因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國甚至可能需要與日本合作，共同對抗赤色法西斯蘇聯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無條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閣員都在投降詔書上簽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長王士杰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下了喪權辱國與後患無窮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個再次否定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不平等條約，就烙在中國人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上。這代表著，抗日戰爭並非中國對抗侵略者的全部歷史，有意侵略中國的國際強權，還是沒有放過中國。

事實上，正當日軍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軍事敵對行動之同時，蘇聯的軍隊，也正在中國的東北、內蒙古，繼續加速進行作戰行動。中國東北的人民，照樣成爲蘇聯紅軍燒殺掠奪的對象之一，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戰爭的結束？還是開始？蘇聯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國的外蒙古，日本跟著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日本透過瑞士通知盟國的這一天），蘇聯卻在八月八日，進軍中國的東北與內蒙古，這就是盟國出賣與中國內戰的歷史悲劇開始。

在日皇正式宣佈投降之後，盟國宣佈由太平洋盟軍總司令官麥克阿瑟上將，負責整個日本的投降事宜。經過接洽之後，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終於正式進入日本的東京灣，美軍開始進駐日本的本土。第二天，麥克阿瑟率領部屬到達日本的厚木空軍基地，接著盟國代表與美軍也陸續的駐進日本本土，實施佔領，日本帝國就正式亡國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軍大本營代表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在東京灣的美國主力艦密蘇里號，正式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上將、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等盟國將領投降，簽下了日本投降的歷史文件。麥克阿瑟根據這份文件，獲得全權支配日本軍政的權力，麥帥下令在中國戰區的所有日軍，全部向蔣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蔣介石下令，將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訂爲中國軍人節，以表彰中國軍人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世代代代做爲中國軍人的紀念²。

²這樣還有誰認爲蔣介石不肯抗日？值得注意的是他沒有把自己發跡的黃埔建軍，當成軍人

這時候，中國戰區的司令長官蔣介石，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派代表向中國接洽投降。蔣介石同時劃分中國與越南為十五個受降區，要求各地的日軍，設法在受降區集中，向指定的中國指揮官投降。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軍總部的嚴重抗議與杯葛，八路軍要求日軍直接向他們投降，以方便接收日軍的軍火與物資，同時控制主要的戰略據點。蔣介石拒絕同意延安的要求，於是日軍還沒有正式的繳械，國共新的的戰爭衝突，就開始在中國各地點燃了。

在抗戰勝利之時的華北一帶，八路軍已經成爲當地最大的軍事力量集團，而國民政府的部隊，則多數集中在中國的西部與西南部。因此要趕到華東與華北各地，接受日軍的投降，實在是距離遙遠與運輸困難，全靠美軍以空運方式，讓重慶指派的代表與軍隊，到達華北與華東各地日軍集結區，完成日軍受降的儀式。但是在華北大部分地區，國民政府的部隊並未控制城市之外的鄉區，這些地區的秩序大亂，出現權力交接的掠奪。而組織嚴密，行動迅速的八路軍，就很快的利用這個機會，完整地掌握了地盤與人心，爲國共戰爭奪到了致勝的先機。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百年的歷史恩怨與衝突，以及長達十四年的戰爭對抗，八年的全面作戰，都終於達到了一個全面清算的歷史時刻。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萬在中國戰區與越南的日本軍隊，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大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正式投降。所有日本從甲午戰爭起所侵略的中國領土，全部無條件歸還，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國取得的特權，全部放棄。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爲偉大與榮耀的一刻，中日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以及中國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歷史，加上無數中國人所有的血淚，都在這一刻得到勝利與光榮³。

但是這個突如其來光榮的背後，卻掩不住中國面對歷史突然發生巨變的無奈，當時中國根本沒有任何的準備，來面對日本突然投降所產生的「變局」，所以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腳亂的衝擊之中。因爲中國無法在國力近乎耗竭、政策毫無準備，又有極大的內訌的狀況下，而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同時面對蘇聯與盟國對中國凶狠的出賣，與進行日本節。

³同樣的，國民政府訂九月九日——中國戰區日軍的投降紀念日——爲陸軍節，可見蔣介石多麼以能戰敗日本爲中國軍人足以自豪的歷史。

佔領區的接收、整理與再造。中國飽受破壞的殘破山河如何重建？所有變節降日的漢奸如何處理？多達百萬的偽政府軍隊如何改編？如何收編幾百萬的擁槍自重的「游擊隊」？如何安置上億流離失所的民眾？如何讓重慶與延安兩個敵對政府達成合作的協議？這些難題之大與工作之沈重，實在遠遠超過當時剛從九死一生之危局中，獲得喘息的中國政府，所能處理的。

38.2 河山殘破中國再遭出賣

不過，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時間去規畫與運作，抗日勝利就突如其來的衝擊到中國整個的佈局，這個勝利同時代表著中國要面對新的外來侵略壓力，以及解決國內全面內戰的衝突。特別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境內遭到空前嚴重的破壞，人民更是受到劫掠與戰火摧殘的損失，中國是否應該要求日本政府負擔應有的戰爭賠償？

雖然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明確地提出，在戰勝之後，中國將會以實物賠償為原則，要求日本必須付出應付的代價，這點是得到盟國領袖的支持。但是蔣介石卻在宣佈抗戰勝利的廣播演說中，主動放棄了這個權利。這個決定，對外公開發表的理由是，中國應該抱持「以德報怨」崇高的大國道德理想，其實蔣介石不能對外宣佈的理由是，為了對付盟國的壓力，中國在必要時，可能要以日軍做為挽救政治局勢惡化的籌碼之一。

當時近乎全面殘破的中國，已經再度遭到蘇聯的侵略與威脅。加上英國殖民主義繼續對華明爭暗鬥，同時一場全面的內戰已經是無可避免了，因此蔣介石認為，需要給國民政府留下餘地，以在必要時可以利用日本做為對抗赤色法西斯的戰略棋子⁴。中國雖是戰勝國，卻處在如此的困境之中，中國不能合理地要求敵人賠償，是因為中國正面臨「盟國」友邦的侵略與出賣。

這時美國才感覺到蘇聯全面擴張的壓力，共產主義正在歐亞兩洲全速的擴展之中，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安全開始受到了威脅。因此美國立刻擺出一付日本保護國的架勢，準備先全面穩住日本，以抵抗蘇聯在太平洋的擴張。美國要求中國立刻以「第一優先」的方式，將所有在中國戰區投降的日

⁴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當時就已經看出這個局勢的變化，所以他曾經向蔣介石指派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將提議，在中國戰區投降的日軍不繳械，以協助蔣介石與蘇聯及共軍作戰。這個建議蔣介石最後並沒有接受，但是卻給岡村寧次在戰犯審判中，留下生機的伏筆。這可以對比最新的密件，揭露丘吉爾曾經企圖武裝投降的德軍與蘇聯紅軍作戰的構想，幾乎一致。

軍與日本僑民，可以攜帶個人財產，並且以最快的速度，運送回日本，以充實日本空虛的國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這種優先運送日本軍民回國的政策，竟然是運用美國援助中國的美援「撥款」項目支用，總數高達三億三千萬美元。美國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中國的全部軍事援助，帳面統計也只有十億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與優待遣送日本軍民，帳卻記在援華的項目中。

而當時中國內部的狀況，豈只百廢待興而已。軍隊需要調動接防，以平息社會在交接前後而產生的不安，離鄉背井的民眾需要趕回家鄉，儘快地團聚家人與重建家園，以及各種的工、商、農業生產需要之運輸調節。但是當時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時專送」運送日本軍民回國為第一優先。結果是投降的日本軍民還有錢可帶回國、有優先使用車船的權利，戰勝的中國軍民，在戰後不但一貧如洗，行政、治安與交通系統都是全面混亂。中國的復員與重建工作，真是舉步為艱，中國境內到處可以說是災民遍野。看到這種景象，實在有點不知誰是戰勝國？誰又是戰敗國⁵？

38.3 日本受到美國的特別優待

爲了穩住日本的政局以應付蘇聯的威脅，美國政府也對處理日本戰犯，採取空前寬大的態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特別對於有日本的皇族身份的戰犯，幾乎全都無罪開釋。總計盟國在東京只起訴了二十八名甲級戰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殺之外，二十五人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無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盟國在各地總共起訴五四一六名戰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佔領日本的盟國最高當局下令，徹底解散日軍大本營，皇軍也成爲歷史的名詞。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爲首的佔領軍，爲日本設計了一套非戰憲法，保留日皇體制（事實這是蔣介石爲日本力爭的結果），但採取文人的責任內閣制。美國給予日本大量的經濟援助以及國防保護，使得日本迅速從戰後的廢墟中復興，成爲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後勤基地。美國更在一九七二年，擅自將所託管的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政府。日本已儼然成爲在冷戰時代，美國

⁵歷史告訴我們，寧可做美國的敵人，比做美國的朋友要好許多。當然更不能做俄國人的兄弟了。

在太平洋最為重要的戰略伙伴。

但日本對於發動戰爭的認知與反省，一直存在著極大的集體自卑感的抗拒心理。因為日本立國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國投降，日人至今仍無法完全接受這個事實，深恐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會因而崩潰。所以日本人自欺地認為，他們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級強國美國，投擲人類無法抗拒的原子彈所擊敗。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它在戰略上被中國打敗的事實。

由於在戰爭結束的前夕，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戰敗打擊，所以當然不肯承認自己是被中國打敗。事實上，日本在中國的失敗，是戰略與政略的基本失敗。在全面的總體戰爭而言，戰略與政略的失敗才是根本的失敗，戰場上的勝負只是外表的過程而已（假如不是蘇聯與英國對中國一直採取暗中打壓排斥的戰略、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而能讓中國公平地得到美國的軍援，那麼華軍當然是可以在中國戰區的戰場上，痛擊日軍的）

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輕，還是民族的智慧有問題，竟然堅持，日本的失敗根源，只是一連串戰場上的失利，而非戰略根本的失敗——所以日本是被美軍，而非被中國打敗。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國真正認錯與道歉，是反應了心理上對中國仍不服輸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誤以為」他們在中國戰場上沒有輸，中國人其實打不過日本人（日本人有沒有看到韓戰，中國軍曾經力戰聯合國的二十六國聯軍，並有擊敗美軍第八與第十軍的戰績）。所以中日之間的問題，就存在著這個不正確的心理障礙，在現在與將來，仍然潛伏著引爆中日之間摩擦與衝突的可能性。

38.4 列強設計對日和約的陷阱

當然盟國對於中國出賣的戲碼，並未落幕，由於國共鬥爭出現急轉直下的變化，國民政府在大陸全面失敗而退至台灣。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政府，因為支持北韓的南侵作戰，很快地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集團，爆發戰況慘烈的韓戰。美國終於知道，自己在雅爾達會議上，所犯下的歷史錯誤⁶，所以美國急迫地需要一個穩定的日本，做為自己控制東北亞戰略地緣的基地，因此立刻提議與日本簽定和約，以結束對日本的佔領。對日本來說，這正是它在戰敗之後復興的歷史契機。

⁶特別是馬歇爾應該在韓戰時就知道，出賣中國要讓美國子弟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問題是，此時中國因為國共內戰，而分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疆土與人民，因此它已經成為代表中國的繼承政府，應該可以合法代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否則，曾經與盟國並肩作戰，共同發表聯合國宣言、四強宣言、開羅會議、波茨坦宣言，以及正式與盟國一起在日本降書上簽字的，都是中華民國政府，所以若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參加對日和約，也說得過去。

但是當時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已經感到共產主義陣營擴張的壓力，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在朝鮮半島與英美法等國交戰，所以西方盟國的陣營，不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簽署對日本和約。同時盟國藉口，只擁有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國的策動之下，盟國也排斥中華民國參與對日和約的簽訂。結果盟國進行一項帶有陰謀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兩岸政府，都不能參加對日本的舊金山和約簽字。而結束中日戰爭狀態的條約，改由東京與台北進行雙邊條約的安排。西方盟國的這項舉動，受到蘇聯與東歐集團的反對，所以他們也沒有與日本簽訂和約⁷。

在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上，對於日本領土的規定，出現了可怕的政治陰謀安排。因為在舊金山條約內，趁著中國「缺席」（事實上是不准出席），「故意」明文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南沙與西沙群島的主權。但是卻沒有說明這些領土，在日本放棄之後，應該歸屬於那個國家。這是西方盟國分裂中國的策略伏筆，因為依照開羅宣言⁸，這些領土是明白指出，必須歸還中華民國的。

開羅宣言的領土主張，又被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條中，重申開羅宣言的領土主張，必須實現。日本的投降基礎文件，就是清楚記載它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台灣主權當然歸給中國，原本是沒有任何法理上之問題的，但是此時由於有了兩個中國的政府，所以盟國有意在中國缺席的舊金山和約中，留下了台灣「主權」歸屬不明的模糊空間，給台海分裂的台獨勢力，找到一個否定台澎歸屬中國的藉口。

事實上，兩岸的政府既然都沒有參加舊金山對日本和約的簽字，當然不

⁷排斥中國簽訂對日本和約，是完全違反盟國之間，於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中，盟國和戰「共進退」的共同立場。盟國這種反覆的道義標準，實在讓人大開眼界。

⁸除了台澎、南沙與西沙外，開羅宣言還明列出東北四省主權屬於中國。日本憑暴力侵略地方的主權要再討論，至少應包括琉球群島。

能拿舊金山和約，當成中日兩國之間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與東京完成「中日和約」，這時候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任何的實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賠償與道歉，但是蔣介石仍然設法在領土與主權的問題上，彌補舊金山和約的漏洞。

但是，日本已經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敵人」美國做為靠山，台灣卻要看「盟友」美國的臉色（看起來，做美國的敵人還真好，做美國的盟國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簽訂「中日和約」的談判上，日本人的本性再度暴露無疑，已經擺出一付無賴的嘴臉，事事都要佔了便宜還賣乖。特別是在台灣主權的問題上，日本談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舊金山和約內容，做為搪塞。同時其交涉態度之惡劣，好像日本是戰勝國的樣子。

不過，在蔣介石的力爭之下，日本還是稍為做了一些妥協，在和約的第四條與第五條規定「將中日兩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專約與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也就是包括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在內（其實也包括放棄琉球的天津條約）。另外在中日和約第十條，清楚地記載「台灣、澎湖的人民與法人，全是中華民國的人民與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權不屬於中國，那麼台澎的人民與法人，如何能夠自動的成為中國的人民與法人，日本又如何能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定中日的和約呢？

因此在舊金山和約中，所謂的台灣主權未定，在中日雙邊的條約中，已經加以補正。何況以歷史事實而言，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境內外的台灣人民，都依法恢復中華民國公民身分。此外，自日本投降之後，台灣依中華民國法律正當治理，台灣人民依中華民國法律所選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與中國各省代表一樣行使政治權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憲與行憲，以及一九四七年選舉中華民國的總統——所以台灣的主權自然屬於中國，這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放棄要求日本賠償與道歉，而在台澎的領土主權上，和約第二條載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與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守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因此日本在這份和約上，也正式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來自重慶與延安的兩個抗日政府，終於分別在法律上，先後以

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與日本簽訂和約，而正式結束了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

但是在「大和民族」自卑感的深處，日本人卻沒有對中國認輸，內心既沒有悔過，更談不上道歉與賠償。日本在國際強權的暗中支持下⁹，日本更是「理直氣壯」地否定侵略中國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充滿著可以產生衝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間是完成了結束戰爭狀態，但是離達到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著很多的問題存在。

38.5 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回顧

回顧整個抗日戰爭的歷史，的確是一個歷史的悲劇與浩劫，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場歷史的決戰原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從古至今，中日之間原本並無歷史的深仇大恨，當時又無絕對的利益衝突，反而是中國的文明與強盛帶給了日本極多的幫助和影響。在日本西化成功之後的二十世紀，中國方面，既無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夠與日本合作，以發展經濟，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日本當時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國廣大的資源與市場，以支持其工業化的發展，二是需要中國協助抵抗蘇聯與國際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戰略壓力。這兩點在當時都是中國願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為她的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都需要日本的參與，中國抵抗蘇聯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後援。中日兩個東方民族國家的合作親善，原是互補互利的。

但是，日本這個極度缺乏歷史安全感的海島民族，對於力量有著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紀初年，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分裂與衰弱的時期，在國力落後的狀態下，故對於日本一再的侵略，一直抱著「以和為貴」的立場，對於日本的侵略與欺凌是百般的忍讓，結果反而激起了這種海島民族「吃硬不吃軟」的侵略凶性。日本在少壯派軍官的誤導與把持之下，對中國進行了沒有止境的分割與蠶食，企圖要將中國羞辱、分割、滅絕後才準備罷手。

反觀日本念茲在茲的「敵人」蘇聯，原是日本皇軍創始者山縣有朋一再擔心的日軍「終極決戰者」，日本參謀本部更是將蘇聯當成建軍備戰的假想敵。但是在史達林巧妙地展現硬碰硬的作風之下，日軍竟然不敢冒然對蘇聯

⁹包括美國於一九七二年擅自將琉球交給日本，成為日本的領土，並順帶還「奉送」釣魚台列嶼作為紅利。

採取斷然的行動，甚至不敢利用德蘇戰爭初期，蘇聯紅軍全面大敗的歷史良機，攻擊蘇俄，反而選擇中國與美國進行作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與美國都希望能夠以和談與退讓的方式，換取避免爆發戰爭的機會。結果被日本誤解為「示弱」的表現，最後彼此之間的戰爭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日兩國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當時雙方的政府，對於關東軍的謀畫，全都處理不當；加上史達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勢利導，擴大中日衝突，才使這個事件成為中日歷史決戰悲劇的起源。中國的不抵抗政策，剛好給關東軍的冒險出擊，提供一個致命的誘惑。日本政府模糊軟弱的不擴大方針，更讓關東軍敢於突破政府的約束。

假如當時中國在東北佈置了全面就地反擊的準備，日本政府又能斷然處置關東軍抗命的行爲，那麼九一八事變，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了。當然，假如史達林拿出行動的決心，堅決的要保護蘇聯在北滿的利益，日本政府勢必只有果決地制裁關東軍的抗命行動。那麼關東軍也就沒有辦法在日後，逐步將日本捲入戰爭漩渦的機會。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炮製了滿洲國，擴大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略。這個侵略，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復興，開始凝聚了中國百姓準備抗日的力量。雖然由七七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的戰爭，可以說是有些意外與突然。對於中國來說，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實在是早了三年（國民政府的建軍正剛開始進展有望）。但是當時的局勢變化到連蔣介石也壓不住民意要求決戰的壓力了。日本軍方的擴大派，更是以為這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歷史良機，結果七七反而成為日本無法結束中國事變之「夢魘」的起點。當時西方國家眼見日軍公然侵略中國，不但不能出面主持正義，反而繼續大量出售作戰物資給日本。假如國際社會保持真正的中立，停止供應戰略上必要的物資，中日戰爭根本就不會打到如此慘烈的地步，日本也未必敢發動太平洋戰爭。

若以戰力而論，日本假如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能夠全力投入作戰，它應該是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但是日本始終沒有進行這樣全力一擲的總攻擊。日本一再誤認，「中國即將崩潰與投降」，結果讓中國竟然能夠撐到最後一刻，而終於拖垮了日本。

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所做得犧牲與付出，無論在生命、財產與時間上，都超過任何一個反軸心國作戰的國家。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若是處在中國

當時的失利狀況，早就放棄抵抗而投降了¹⁰。但中國就是在面對山窮水盡之時，仍然想盡辦法支撐下去，絕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國力與軍力，為盟國的勝利，奠定了戰略上勝利的基礎。

而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最難令人接受的事實是，日本軍隊經常所展現出來那種毫無軍紀、燒殺擄掠的行爲。由於日軍在中國境內，普遍地對於戰俘與平民施加暴行，使得日軍在不少的時候，不是軍隊作戰的樣子，更像盜匪在劫掠與發泄獸欲。由於中國軍隊沒有化學武器的能力或是防護的裝備，二次大戰中惟有日軍，在中國對華軍部隊大量恣意地施放毒氣¹¹。還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殺等等），顯示出日軍的行爲更惡於禽獸。所以中國所忍受的戰爭傷害，要比其他的國家與人民在二次大戰所遭到的傷害，還要嚴重許多。抗日戰爭不只是中日之間的戰爭，根本就是對中國全面的浩劫。

就中日之間的戰略而言，日本表現最差的是，在漫長的八年全面戰爭中，日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決中國事變，它就一天不能脫困。可是結果是，日本決定「戰」，又不能徹底動員主力，而在中國的戰場上以集中的絕對優勢求勝；日本決定「和」，又斤斤計較於所侵吞的小利。最後日本是費盡心機，無論是和或戰的策略，都沒有辦法解決中國事變，它也就無法與其的大敵（美、蘇），進行傾力的一搏。在最後決戰中，日軍更虛擲兵力到華南，只給蘇聯創造了侵略東北的歷史機會。也許這就是這個島國的文化與心態，沒有大開大闢的心胸與眼界吧。

若是以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角度而言，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衝突，又不僅止於是中日之間的戰爭而已。國際強權雖與中國成為反法西斯軸心的盟國，卻一樣沒有放過對中國的算計與欺凌。蘇聯始終就沒有停止利用中國與侵略中國的策略，英國也是始終一貫提防中國的發展壯大，美國則是受到馬歇爾、史迪威等人與美國左傾官僚、媒體的影響，對於中國既有幫忙，也有出賣。

成立中國戰區，竟然變成盟國陰謀打擊中國的大設計（中國一直以爲是爲了盟國與中國並肩抗日而成立的）。蔣介石兩次允許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更是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歷史錯誤選擇，因爲由史迪威所發出的惡

¹⁰ 比比看歐洲先進國家，尤其是法國，面對德國侵略的表現。

¹¹ 但日軍卻沒有、也不敢對美軍用過毒氣。道理很簡單，根據日內瓦公約的協定，美國雖然不用化學武器，但美軍擁有充足的備用份量，如果日方膽敢使用，美軍立刻可以還以顏色，所以日本在不能得到優勢的情況下，就不會用了。

意中傷中國的「情報」，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蘇反華的西方勢力，扭曲了中國戰區的價值，削弱美國對於中國戰區的戰力支援。

在戰爭決定性的關頭，蘇聯乾脆切斷對中國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國則在打通援助中國的西南通路上，不斷製造事端，破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結果是，中國在整個大戰中，根本得不到應有的援助，反而促成了中國內部的鬥爭加劇。而在最後的關鍵時刻，中國被迫將決定勝負的戰略預備隊，派到緬甸原始森林中進行無關大局的遠征作戰。卻使得中國戰區因面臨日軍的全力出擊，而幾乎遭到全面的潰敗。當中國正從重創中復員之時，已是日本力竭而準備投降的前夕，中國因為已經沒有國力與軍力做為後盾，也就使得強權在雅爾達秘密協定中出賣中國，成為不能避免的結果。

38.6 沒有完全落幕的歷史悲劇

就歷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結束了，但是就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制度而言，國際強權對中國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歷史的傷痕。最大的損失，就是全體中國人民對於抗日戰爭歷史的集體失憶症，讓這段在歷史上，中國為全世界付出最為悲壯之犧牲與貢獻的史實，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與淡化了。結果是，中國人患了可怕的歷史失憶症，中國人誤以為在大戰中，自己是一個沒有重大貢獻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憐無助的人質，看著自己的國家被蹂躪，看著自己的同胞被殺害，看著自己的婦女被強暴，只能等著偉大的盟國大軍來拯救中國。所以，中國人在戰後，完全缺乏對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對於民族的認同，也產生了混淆。中國人沒有這段歷史真相的認知，中國當然無法成為泱泱氣度的國家，去展望與開創未來。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經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香港與九龍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歸還中國，台灣的政客至今還在所謂「主權未定」的歷史陰影下，拒絕承認中國主權統一的原則。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國與日本在背後干預；琉球的主權以及釣魚台的歸屬，目前都有極大的問題需要釐清。

38.7 中國抗日的光榮不能遭到抹殺與扭曲

更不幸的是，中國英勇抗日的歷史，竟然因為國內外的各種政治因素，而遭到了遺忘與扭曲的命運。多數中國人無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光榮，與不幸命運的歷史，這些都是源於對歷史失憶所留下的後遺症。

日本在戰敗之後，立刻就得到美國的優待而展開重建，日本人充分了解，盟國是萬分不願面對中國在二次大戰提供了重大貢獻的事實，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要出賣中國利益的嚴重疑問。英、美盟國自我欺騙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在整個的戰爭中，貢獻極其的「微不足道」，出賣中國的國土與利益給蘇聯，以圖提早結束戰爭，實在是個「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順帶假裝認為，戰爭對中國的傷害「其實有限」¹²，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國服輸，也更難承認其歷史的錯誤了¹³。

但歷史的事實是，中國抗日長達十四年之久，造成日軍深陷在中國的戰略陷阱中，而無法自拔。從中國的空軍基地起飛的空軍，更是關鍵性地切斷了日本運輸作戰資源交通生命線，比美國空軍對日本進行直接的戰略轟炸，對日的總體戰力產生的破壞效果更大。這樣日軍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及攻佔南亞，當然無法完成軸心國全面的戰略目標——攻陷印度到達中東，與德國會師。

我們承認，由於中國始終無法得到美國大量的軍援，造成華軍無法在亞洲大陸的作戰中，扮演一個積極反攻者的角色。（假如英國與蘇聯沒有得到比中國多幾十倍的援助，他們又如何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戰中，扮演有份量的角色？）但是這絕非是中國方面的錯誤，或是中國的軍隊不能作戰，而是盟國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難與有預謀來犧牲中國。中國在幾乎山窮水盡之時，仍然堅持將抗日戰爭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盟國有過這種堅

¹²史迪威、謝偉志、及戴維斯等人對中國抗日的一向宣稱是：『中國抗日戰爭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軍打了「百團大戰」和平型關的伏擊戰，剩下的就僅止於遊擊戰（「打了就跑」，「麻雀戰爭」）的規模。蔣介石的重慶部隊根本沒有、也不敢碰精銳的日軍，只曉得躲起來監視延安的部隊，還有囤積美援的物資與裝備，好用來對付自己人而已』。假如這是「真況」的話，中國那裡有什麼抗日可言？既然中國根本沒有力戰日軍，貢獻在哪裡？那能受多少傷害？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億的中國人相信這就是對日抗戰的歷史。幸好這種惡意的謊言錯的太離譜了，只要攤開中、日二十二次會戰的記錄（雙方兵力達十萬以上），共軍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擔當重要角色，就足以證明史迪威這伙人對中、日戰況的描述絕非無心之遺漏，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誣蔑中國抗日的歷史事實。

¹³在所有中日之間的有關戰爭歷史真相與責任的爭論中，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昔日之盟國一直保持離奇的沈默，好像這場戰爭真相，與它們沒有相干似的。

毅的記錄），她並且成爲牽制與切斷日軍作戰力量的主力基地。這些重要的貢獻，都是中國軍民忍受無比重大之犧牲所提供的。中國這種義無反顧、把自己所有老本都跟強敵拼掉的結果，正是使得她虛弱到無法抗拒來自盟國新一輪侵略陰謀的地步。這就是中國贏得勝利，卻失去和平建國的歷史悲劇主因。

日本嚴重的民族集體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傾向「不能」也「不敢」承認，他們無法打敗比他們落後的中國，以及他們在與中國的作戰中，是在戰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錯誤。日本更不願承認，他們在中國表現出比禽獸還不如的滔天戰爭罪行。因爲盟國也「不太」希望日本這樣做。國際強權擔心的是，越是討論，事實、真相就越容易水落石出。這樣一來，盟國利用中國，與出賣了中國的歷史真相，也會跟著曝光。

到現在，日本政府還膚淺的認爲，他們並沒有在中國戰區的作戰上，輸給中國，所以日本當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國是戰勝國的事實¹⁴。假如日軍不是在中國戰場上的戰略失敗，日本根本不至於發動太平洋戰爭（裕仁在對美國的宣戰詔書裡，全都在「怪罪」美國爲袒護中國，而威脅要中止賣戰爭資源給日本），假如日軍的絕對國防圈不是在中國戰場上遭到嚴厲的破解，日軍不會把最後的力量，投入中國進行一號作戰，而在讓日軍在太平洋與東北的關東軍戰線遭到慘敗。足見日本只是一個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夠的歷史深度與廣度，而無法反省到決定歷史成敗的基本原因。日本若是在未來再犯下歷史的大錯，也並非沒有可能。

檢討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日本就是在中國戰區上的戰略一敗再敗，導至國力的耗竭，以及戰力無法負擔戰略的需要，最後才會走上全面潰敗的道路。對中國戰略上的失敗，才是日本整體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至於戰場上的一些勝負，只是過程與外表的現象而已。而直到如今，日本政府還不敢承認這個事關歷史勝敗最根本的事實。竟然把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設在戰場的表現，而不是戰略與政略的基本層面。這種膚淺的歷史觀察與見解，顯示日本根本沒有足夠的遠見與能力，洞察歷史變化的根本關鍵，如何能對二十一世紀的風雲變化，做出正確的策略判斷？日本民族不肯承認整個

¹⁴在裕仁最後的回憶錄中，一直強調美軍的強力打擊，以及原子彈的轟炸，造成日本面臨危機，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聖斷」，裕仁完全不提日軍在中國戰區，戰略全面失敗的根本問題。更不提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之前，日本事實已經決定投降，正由外交管道試圖透過蘇聯

侵華戰爭的錯誤與失敗，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紀，中日矛盾與衝突危機的新起點。

世界和中國自己，難道能夠這樣的扭曲與淡化中國全體軍民曾經在這場人類最爲巨大與重大戰爭中，所做的貢獻與犧牲嗎？無論國際現實的利益如何結合與發展，特別是擔心中國復興與強大的錯誤心理，仍然潛伏在國際社會之中，拒絕承認中國的犧牲與貢獻，仍是世界歷史正義的盲點。有了這個盲點，圍堵中國的意識也就更爲方便滋生與運作。圍堵中國、分化與弱化中國的政策，不是國際強權今天才有的戰略鬥爭，而是遠在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就已運作成形，現在如此，未來也不會減緩。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一點：在中國，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支配事實與現狀，但是歷史事實仍然就是歷史事實，它的真相當然不能永遠被隱藏下去。何況這個歷史的真相，是所有中國人的血淚犧牲之記錄，更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爲人類的正義，而寫下了一頁不朽的光榮歷史。政治立場絕對不能成爲扭曲抗日戰爭歷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爲鑑，中國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場，坦蕩蕩地面對歷史真相。

38.8 歷史的鑑戒是人類共同的資產

在中國的領土上，經過歷朝歷代，曾爲了防衛國土而建造了長城的偉大建築，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極其浩大的國防工程，也充分顯示出中國人有著防禦重於侵略之民族性。中國的長城直到如今還是令所有參觀的人，都感到肅然起敬。但是，事實上，歷史的長城，並沒有辦法保障中國不受敵人的侵略。而中國的軍民，曾經在抗日戰爭之中，以中國人的生命，築起一條又一條的禦敵防線，成爲不屈不撓的血肉長城。這個讓中國境內每寸山河，都被血淚浸泡的抗日史實，以及中國人絕對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國人永遠不能被敵人消滅的關鍵所在。這些在神州大地無數血肉長城的歷史，應該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國人心中。同時更應該爲人類歷史上，最爲寶貴的共同資產與鑑戒。

雖然抗日的歷史事實，還有太多可以敘述的地方，但是本書在此不得不告一個段落。作者衷心希望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知道，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重大犧牲與付出，是造成世界正義能夠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這是中

國人所有血淚結成的不朽榮耀。只要中國人能記得，國際強權就沒有辦法抹殺與淡化。

最後，本書引用蔣介石代表所有中國人，在「最後關頭」演說的內容，做爲作者對於抗日戰爭歷史鑑戒的總結：

「苟吾人自暴自棄，而不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友皆成爲明日之敵。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始不可成爲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國難之際，惟有努力自助與自求而已。」

記住！無論是中國的敵人還是盟友，都曾經參與過侵略與出賣中國的歷史，中國唯有自立自強與團結復興，建立一個富強文明的國家，各國才會尊重中國的權利與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與繁榮。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但是一旦最後關頭來臨，中國將會絕對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縱使戰到一槍一兵，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

中國人愛好和平，不輕言戰爭，但是她也絕不能接受被侵略與被出賣的欺凌。假如國際強權還是抱著反華的政策，企圖妨害中國的生存發展，甚至干涉她的領土與主權完整，而逼得中國人決心對抗，那麼中國無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會堅持奮戰到底，最後勝利絕對會在中國的這一邊！

只要所有的中國人齊心努力，記取歷史的教訓與啓示，來建設一個富強文明的中國，世界才能有繁榮與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在抗日戰爭中，所有犧牲奮鬥的中國軍民。

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貢獻事蹟，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永遠不朽的光榮記錄。

三千萬死難忠魂爲證 十四年流血青史明鑑！

「看試手、補天裂」

後記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寫歷史的書，正如從來沒有規劃過自己會在異國寓居。但是一切都成爲事實，五十萬字的抗日戰爭史，就這樣的完成了。同樣自己竟然也離開中國多年了，但是想的、念的居然全都還是中國。

歷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越是研究，越是覺得窮無邊際，初步的結論是，「歷史並沒有真的過去，未來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因爲歷史不只是發生在過去的事實，也是造成今日現狀的過去，更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過去，所以歷史同時擁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重特性。研究歷史不但是追溯過去，也能了解現在，更能規劃未來。歷史事件的本身，不會完全地重演，但是歷史會有其運作的軌跡。不能記取歷史教訓，就很難避免歷史的悲劇。寫作這本中國史中，鮮血濃度最高、真相曲解度最大的抗日歷史，的確是有著太多感想與發現，自己既是一個歷史資料的蒐集者，也是一個歷史謎團的發問者，又是一個歷史真相的解答者。最後，自己從追尋中，更加認識了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的命運。

抗日戰爭可以說是中國振衰起蔽的大歷史轉折點，從這場存亡繼絕的歷史空前危機中，中國通過考驗，因而走上了歷史的轉機。雖然中國付出了幾乎是前所未聞的驚人之代價，但是終於在民族主義的支持下抗戰到底，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半世紀了，但是這個歷史記錄所隱藏的錯誤，仍然沒有得到應有之糾正。特別是日本的戰爭責任與戰後的賠償等問題，目前不但還停留在原地打轉，日政府重建軍力態勢的發展，更已經昭然若揭地正

進行之中。而遺憾的是，中國的抗戰真相與作戰貢獻，也仍然沒有得到歷史應有的尊重。假如歷史不能將公道與真相還給中國，二次世界大戰的記錄就永遠留著一個無可彌補的缺憾，直接影響到人類對於歷史教訓的認知。

身兼作者與出版者，其中的過程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作者唯一的希望是，本書能夠問世，對中日戰爭歷史真相與有個交待。當然也把自己家的兄弟，全都捲進複雜的流程之中。而令人感動的是一些讀者已透過網路，給我們的鼓勵。作者只有期待更多的回饋與反應。

本書只是對於發掘抗日戰爭歷史真相的一個嚐試而已，並非歷史的結論，因此期待更多讀者與對抗日戰史有研究之有心人的投入。希望能夠透過網路的溝通 (www.npla.org/glory)，繼續與讀者共同探討歷史與關心中國。這將是一個開放的網站，會容納所有抗日歷史與中國面對挑戰的主題。

假如作者預料得沒錯，中國很快就會遭到一次新的歷史考驗，而且絕對又會與日本有關。因為國際強權不會坐視中國邁向復興與強大，而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不公的歷史遺毒所隱藏的危機，也會再度出現在未來的歷史之中。中國人必須要從歷史教訓中，看出歷史挑戰的軌跡，中國才能順利通過風雨，迎接考驗。

只要我們今天對於歷史已有掌握，就不必擔心歷史在明天對我們的挑戰。

參考資料

本書各章主要的參考資料分列如下：

第一章

易顯石等聯合著作的《九一八事變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蔣永敬的《抗戰史論》，都有深入的記錄、考證與分析。

第二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Meirion & Susie Harries 之《日本皇軍興亡史》。

第三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易顯石等合著的《九一八事變史》。

第四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易顯石等合著之《九一八事變史》。

第五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易顯石等合著的《九一八事變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蔣永敬的《抗戰史論》。

第六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易顯石等合著的《九一八事變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蔣永敬的《抗戰史論》，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

第七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易顯石等合著的《九一八事變史》，及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

第八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易顯石等合著的《九一八事變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

第十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劉鳳翰的《抗日戰史論集》，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及王禹廷的《細說西安事變》。

第十二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及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第十三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永敬的《抗戰史論》，及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

第十四章

有關中國當時的改革進展，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有非常的詳細的資料，張玉法的《中國近代史》及黃仁宇之《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有極佳的整理歸納。

在軍事上的準備，劉鳳翰的《抗日史論集》有最爲詳細的資料。在整體社會與文化上的問題，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有很深入的分析。

第十五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有關中國內部分裂的狀況，可參考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綱》，及張玉法的《中國現代史》。

第十六章

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及蔣永敬的《抗戰史論》。

第十七章

有關西安事變最爲詳盡的資料，應推王禹廷的《細說西安事變》，以及司馬桑敦的《張學良評傳》，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綱》也有很好的評述。蔣永敬的《抗戰史論》提供了許多基本的歷史資料。

第十九章

蔣緯國編《抗日禦侮》，劉鳳翰的《抗日戰史論集》，對七七事變有很精密的考證，蔣永敬的《抗戰史論》對於當時華北軍政局勢，有很生動的內幕報導，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記錄非常詳實，以及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對於日軍的佈署，有很好的資料。

第二十章

劉鳳翰的《抗日史論集》與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有更爲詳細的兵力資料與分析。

第二十一章

劉鳳翰的《抗日戰史論集》，對於平型關的作戰，有非常精密的考證論述，蔣緯國編的《抗日禦侮》有國軍詳細的作戰資料，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有分析日軍的作戰資料。也可參考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與黎東方的《細說抗戰》。

二十二章

蔣緯國編《抗戰禦侮》，吳相湘的《第二次中國戰爭史》，黎東方的《細說抗戰》，王輔的《日軍侵華史》，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及劉鳳翰的《中日戰史論集》。

二十三章

孫宅巍的《南京保衛戰》與《1937 南京悲歌》，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王輔的《日軍侵華戰爭》，張純如的《被遺忘的浩劫》，李恩涵的《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以及唐德剛之《李宗仁回憶錄》。

二十四章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蔣緯國編《抗戰禦侮》，黎東方《細說抗戰》，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及王輔《日軍侵華戰爭》。

二十五章

蔣緯國編《抗戰禦侮》，張洪濤《血祭大江》，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王輔《日軍侵華戰爭》，及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

二十六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及馮子超《中國抗戰史》。

二十七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蔣永敬《抗戰史論》，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及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二十八章

蔣緯國編《抗日禦侮》，王輔《日軍侵華戰爭》，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及黎東方之《細說抗戰》。

二十九章

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對於共軍抗日的一些重大事件個案，有非常深入的記錄與分析。王輔《日軍侵華戰爭》，則從共軍的觀點與資料，來記錄共軍抗日以及與國軍的各種衝突。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對於國共在抗日戰爭前後的衝突與發展，有更廣角度的看法。

第三十章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黎東方《細說抗戰》有一些特別的資料；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F. F. 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 F. Romanus & R. Suth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蔣緯國編《抗日禦侮》，及王輔《日軍侵華戰爭》。

三十一章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有很好的論述，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更有最新的資料與分析，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陳納德《陳納德將軍與中國》都有大量的資料，報導這個事件的真相。當然魏德邁的《魏德邁報告！》，更是重要的一手資料。

三十二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緯國編《抗日禦侮》，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王輔《日軍侵華戰爭》，及陳納德《陳納德將軍與中國》。

三十三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梁敬錚《開羅會議》，對於開羅會議

的前因後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論述。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中美在開羅會議前後的關係變化，有非常珍貴與最新公開的資料。魏德邁的《Wedemeyer Reports!》對英國慣以狡猾的手腕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有詳細的描述。

三十四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王輔《日軍侵華戰爭》，陳納德《陳納德將軍與中國》，及黎東方《細說抗戰》。

三十五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緯國《抗日禦侮》，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王輔《日軍侵華戰爭》，及黎東方《細說抗戰》。

三十七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永敬《抗戰史論》，王輔《日軍侵華戰爭》，魏德邁的《Wedemeyer Reports!》。

三十八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王輔《日軍侵華戰爭》，蔣緯國《抗日禦侮》，馮子超《中國抗戰史》。

作者對抗日戰爭參考書目的簡評與介紹

如果要想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有一個完整詳實的了解，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內容豐富，而且大量引述當時的文件，以及各種相關歷史著作的論述，史料非常的豐富與生動，是值得一讀的抗日歷史佳作。缺點是戰爭部分的分析比較薄弱，而且沒有提到中共方面的活動。另外此書已經絕版，只能在圖書館中借到。

假如要想簡單扼要的知道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張玉法的《中國現代史》，對於這段歷史，都有很精要與重點的論述，同時對於資料考據都非常的深入徹底。

要想以大歷史的各方面角度來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個人推薦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蔣介石日記》，這本書雖然是以史料佐證來評析蔣介石的日記，但是對於抗日戰爭的大歷史環境以及前因後果，都有獨到的見解；對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更是有最新的資料，觀點深刻廣泛，是一本很有創意的歷史佳著。

有關抗戰前期的中國內部問題，蔣永敬《抗戰史論》，因為引用當時重要關鍵人物一手的日記資料，所以很有內幕性與參考性的論述，可惜大部份資料，也只限於抗戰前期的歷史，但是卻非常生動的刻畫大歷史的變動內幕，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

若是要以深入及專業研究的角度了解抗日戰爭，應參考由蔣緯國主編的《抗日禦侮》。這是由三軍大學資深教官，引用中日兩國作戰資料，由作戰角度編寫的書，一共十冊。而劉鳳翰的《抗日戰史論集》，在資料收集與考據上，是專業的學術著作，可惜的是，主要內容只有論及武漢會戰以前的資料，但是在有關中共參與抗日的重大作戰史料上，這部書的考證非常地專業，是學術性的論文。另外，中國大陸的王輔先生所著之《日軍侵華戰爭》，同樣收集極其豐富的作戰史料，做到專業資料的考據，特別是有關日軍方面的細部資料，非常值得參考。在有關共軍抗日以及與國軍衝突的報導，也有從中共方面的觀點與記錄。

梁敬錚的《史迪威事件》、《開羅會議》，對於抗日戰爭，中美之間的合作與爭執，都有非常重要的論述，更有非常珍貴內幕的資料考證，是解讀這段歷史曲折變化內幕的重要歷史著作。

《Wedemeyer Reports !》（英文原著，未見有中譯本）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中國戰區各種的狀況與問題，都有一手資料的記錄、分析與詳述。魏德邁以受知於馬歇爾而得到擢升，但最終因為中國戰區的戰略利益問題，而與馬歇爾漸行漸遠，主要原因就是魏德邁看到，國際強權基於政治謀略，扭曲中國抗日事實的嚴重問題，並將會給美國以及全世界帶來極大的危機。也由於他對於這個觀點的堅持，使得魏德邁的前途遭到馬歇爾與杜魯門聯手冷凍的命運。無論如何，魏德邁以親身詳實的資料，為盟國當時在中國戰區

的錯誤政策，做出歷史的見證。當然魏德邁並未放棄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一些錯誤的揭露與批判。這本書非常具有歷史的價值。

✓ 由陳香梅翻譯，陳納德著的《陳納德將軍與中國》，是從美國軍人親身參與中國抗日的觀點，論述抗戰期間的中國戰區內外情勢，以及揭露馬歇爾、史迪威對於中國戰區的可怕策略，有關中國戰區的空軍戰史奇蹟，更是陳納德功績所在。

王廷禹《細說西安事變》，是一本討論西安事變資料最為充實與完整的書籍。易顯石等合著之《九一八事變史》，對於九一八事變有著很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極多，最有學術性的著作是李恩涵的《日本軍暴行之研究》，最新的是張純如的《被遺忘的浩劫》，而孫宅巍的《南京保衛戰》，更將範圍擴大到整個南京作戰歷史的層面，資料考證非常的精確。是作戰個案研究的典範著作。

參考文獻

- [1] 吳相湘.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綜合月刊社, Taiwan, 1973.
- [2] 柳風. 《抗日 一血祭太陽旗》. 風雲時代, Taiwan, 1995.
- [3] 張洪濤. 《血祭大江》. 中共中央黨校, China, 1993.
- [4] 張玉法. 《中國現代史》. 東華書局, Taiwan, 1995.
- [5] 司馬桑敦. 《張學良評傳》. 星輝圖書公司, Hong Kong, 1986.
- [6]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曉園出版社, Taiwan, 1994.
- [7] 黎東方. 《細說抗戰》. 遠流出版社, Taiwan, 1997.
- [8] 蔣緯國. 《抗日禦侮》. 黎明文化, Taiwan, 1978.
- [9] 蔣永敬. 《抗戰史論》. 東大圖書公司, Taiwan, 1995.
- [10] 馮子超. 《中國抗戰史》. 文海出版社, China, 1946.
- [11] 黃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時報文化, Taiwan, 1994.
- [12] 曹華. 《太陽帝國投降內幕》. 團結出版社, China, 1993.
- [13] 梁敬錫. 《開羅會議》.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8.
- [14] 梁敬錫. 《史迪威事件》.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
- [15] 日臻出版社. 《對日抗戰現場系列》. 日臻出版社, Taiwan, 1995.
- [16] 唐德剛. 《李宗仁回憶錄》. 曉園出版社, Taiwan, 1993.

- [17] 何應欽.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黎明文化, Taiwan, 1983.
- [18] 李恩涵.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台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1994.
- [19] 李雲漢. 《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傳記文學, Taiwan, 1987.
- [20] 易顯石等. 《九一八事變史》. 谷風出版社, Taiwan, 1987.
- [21] 王輔. 《日軍侵華史》. 遼寧人民出版社, China, 1990.
- [22] 王建朗.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東大圖書公司, Taiwan, 1996.
- [23] 王禹廷. 《細說西安事變》. 傳記文學, Taiwan, 1989.
- [24] 王節君. 《第二次世界大戰百幕風雲》. 藍天出版社, China, 1997.
- [25] 服部卓四郎. 《大東亞戰爭》. 軍事釋粹社, Taiwan, 1978.
- [26] 劉鳳翰. 《抗日戰史論集》. 東大圖書, Taiwan, 1987.
- [27] Iris Chang (張純如).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U.S.A., 1997.
- [28] 孫宅巍. 《1937 南京悲歌》. 台灣先智出版社, Taiwan, 1995.
- [29] 孫宅巍. 《南京保衛戰史》. 五南圖書公司, Taiwan, 1997.
- [30] Claire Lee Chennault (陳納德). 《陳納德將軍與中國》(陳香梅譯). 傳記文學, Taiwan, 1978.
- [31] Meirion & Susie Harries. 《日本皇軍興亡史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 金禾出版社, Taiwan, 1994.
- [32] Frederick Fu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U.S.A., 1956.
- [33] C. F. Romanus and R. Suth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CMH), Washington,D.C., U.S.A., 1956.

- [34]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NY, U.S.A., 1990.
- [35]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魏德邁報告). 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U.S.A., 1958.

索引

一至二畫

- 一夕會, 29
- 一二八事變, 63
 - 「輿論」對蔣介石的批評, 70
 - 日本爲掩護滿洲國登場, 64
 - 十九路軍與軍委會間的誤會, 68, 70
- 一號作戰計劃, 320, 421
 - 中國處於內外交困的狀況, 470
 - 日軍打通平漢路, 475
 - 日軍空前的動員, 468
 - 日軍解破華軍作戰密碼, 484
 - 日軍橫掃中原, 473
 - 八路軍袖手旁觀, 486
 - 史迪威妨礙軍機, 483
 - 史迪威逼宮, 479
 - 史迪威嚴重誤判敵情, 469
 - 河南會戰, 472
 - 長衡會戰, 476-486
 - 長衡會戰日軍之兵力, 477
 - 第二次衡陽決戰, 483
 - 陳納德搏命相救, 481
 - 華軍被抽調赴緬作戰, 471
 - 廣西會戰, 見：廣西會戰
 - 戰略構想, 467
 - 衡陽決戰, 482
 - 衡陽淪陷, 485
 - 衡陽機場陷落, 482
 - 檢討, 486
- 七七事變, 194
 - 中共要求立刻全面抗戰, 202
 - 中國決定全面迎戰, 213
 - 中國政府的四點原則, 205
 - 日本決定增兵華北, 203
 - 日本政府不擴大方針, 201
 - 日本海外駐軍都請戰, 201
 - 日本想迫華接受停戰, 211
 - 日軍決定攻佔永定河, 204
 - 日軍首先開火, 200
 - 日對中國最後通牒, 207
 - 平津淪陷, 208
 - 各路諸侯支持應戰, 202
 - 宋哲元不戰而退, 207
 - 宋哲元妥協, 204
 - 宋哲元發現上當, 206
 - 事件最關鍵的變化, 212
 - 兩軍交火與停戰協議, 200
 - 前因, 194
 - 國際社會的反應, 209
 - 現場, 198
 - 槍聲與失蹤士兵, 199
 - 廣安門事件, 207
 - 蔣介石提防日軍藉口生事, 201
 - 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 205
- 九一八事變, 1-9, 11
 - 中、日直接交涉, 59
 - 中國向國聯提控訴, 59
 - 中國國內民意與輿論, 59, 60
 - 中國學生對國民政府的抗議, 59, 60
 - 內涵與影響, 86
 - 日本國內的初步反應, 8
 - 國聯的反應, 60
 - 蘇聯幕後的謀略, 85

- 九國公約, 253
- 八一四空戰大捷, 247
- 八一宣言, 見: 中國共產黨
- 八百壯士, 252
- 八路軍, 見: 共軍
- 十九路軍, 65
- 閩變, 117
- 三畫
- 土肥原賢二
- 被薛岳兵團包圍, 295
- 提議炮製滿洲國, 73
- 滿洲國, 73
- 大山勇夫, 243
- 大沽事件, 164
- 大陸政策
- 逐步蠶食中國, 112
- 小磯國昭, 491
- 山田乙三, 531
- 山縣有朋, 531
- 川島芳子, 64
- 三叉會議 (Trident Conference), 390, 418
- 史迪威唱反調, 419
- 三月亡華論, 219
- 三宅光治, 32
- 上海派遣軍
- 金山衛登陸, 253
- 組成, 249
- 增援上海決戰, 253
- 上高會戰, 347
- 凡爾登戰役
- 與淞滬會戰規模之比較, 241
- 于兆麟, 54
- 「日蘇中立條約」, 327
- 不抵抗政策, 549
- 不擴大方針, 549
- 四畫
- 中日的外交談判, 162
- 中日戰爭
- 日本不承認被中國打敗之原因, 545
- 日本政府求和, 491
- 日本無法挽回戰局, 502
- 日軍最後向中國求和, 503
- 對日之戰局全面好轉, 501
- 中村事件, 31
- 中東路事件 (1929), 50
- 中美關係危機
- 停止反攻緬甸計畫, 460
- 強迫中國出兵緬甸, 461
- 貸款問題發生決裂, 460
- 赫爾調停, 464
- 中島今朝吾
- 南京大屠殺主犯, 274
- 中國「以德報怨」的政策, 537
- 中國共產黨
- 八一宣言, 155
- 成立與其宗旨, 151
- 成立蘇維埃政府, 152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56
- 抗日先反蔣, 154, 170
- 抗日的理由, 170
- 抗日運動, 174
- 長征, 135
- 建軍, 152
- 捍衛蘇聯的抗日立場, 153
- 國際共產黨的支持, 191
- 第三國際成員, 153
- 對國民政府的四大保證, 184
- 對張學良的態度、立場, 182
- 滲透東北軍, 175
- 獨立革命路線, 152
- 中國的輿論
- 膚淺的紙上抗日專家, 108
- 中國空軍, 467
- 八一四空戰大捷, 247
- 中國戰區
- 中國未蒙利、先受害, 430, 442
- 日軍戰力遭嚴重耗竭, 402
- 史迪威留任, 421

- 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412
 宋子文推動戰區改組, 420
 改組計劃受挫, 420
 兵源的枯竭, 417
 後勤物資分配成爲鬥爭工具, 412
 英國對中國的算計, 407
 參謀長的專斷跋扈, 410
 唯一擋住日軍的戰區, 401
 將帥通力合作, 426
 陸空戰略爭論, 413
 悲劇的誕生, 410
 盟國的陰謀, 403
 盟國與中國的歷史矛盾, 406
 裝備中國軍隊, 415
 雷多公路, 414
 遭到歧視與隔絕, 405
 轉危爲安, 427
 蘇聯繼續侵略中國, 406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526
 歷史的悲劇, 536
 尹奉吉, 69
 五三慘案, 見: 濟南慘案
 五號作戰計劃, 431
 今井武夫
 桐工作, 337
 最後向中國求和, 503
 內山英太郎, 350, 473
 反攻緬甸
 中美爆發衝突, 394
 中國觀點, 385
 三叉會議, 390
 史迪威的個人戰爭, 386
 加爾各答會議, 390
 美國硬把華軍拖下水, 394
 英國用來打擊中國的手段, 386
 英國緩兵之計, 389
 牽制日軍進攻印度, 388
 華軍大勝, 397
 華軍出擊, 395
 華軍會師芒友, 398
 開羅會議的結論, 392
 盟國的爭論, 386
 盟國欺騙中國, 387
 蒙巴頓與史迪威冒進, 393
 檢討, 398
 天羽聲明 (1934), 121
 太原會戰
 娘子關作戰, 237
 忻口作戰, 235
 孔祥熙, 136
 方先覺
 率第十軍保衛衡陽, 482
 與日軍交涉停戰, 485
 日本「絕對國防圈」, 466
 日本少壯派軍官, 5
 支持關東軍抗命侵略, 36
 二二六政變, 161
 流產政變, 30
 秘密參謀本部, 19
 秘密結社, 18
 日本南方軍, 354
 日本政府
 「大陸政策」, 14
 不擴大方針, 34
 對美、蘇的戰爭威脅, 23
 日本海軍
 積極參與製造上海衝突, 64
 日本陸軍的兵力與編組, 217
 日本駐屯軍
 強佔豐台, 164
 日俄戰爭, 86
 日皇裕仁
 支持關東軍炮製滿洲國, 74
 日本決定投降, 528
 批准日本對華北增兵, 203
 發佈進攻南京作戰詔書, 265
 傳諭嘉獎日軍侵略熱河, 103
 頒佈侵略中國的第一道敕令, 98

- 親白宣佈日本投降, 539
- 木更津聯隊, 248
- 毛澤東
- 「擁蔣抗日」, 190
- 反對共軍發動百團大戰, 364
- 大養毅, 61
- 王以哲, 102
- 王敬久, 247
- 王銘章
- 滕縣血戰, 286
- 王耀武
- 七十四軍, 348
- 上高會戰, 348
- 第一次長沙會戰, 346
- 第二次長沙會戰, 350
- 五畫**
- 卡港會議, 見：卡薩布蘭加會議
- 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 會議, 388
- 占北口, 102
- 占莊幹郎, 322
- 史迪威, 219
- 戈登情結, 411
- 全力阻撓華軍長衡會戰作戰, 480
- 在三叉會議中全力出賣中國戰區, 391
- 直接捲入中國的派系鬥爭, 411
- 指揮滇緬作戰, 374
- 突擊密支那, 396
- 捏造十億美元交換條件說, 460
- 設法使中國戰區慘敗而自己升官, 514
- 開羅會議的伏擊, 422
- 滇緬作戰戰敗棄軍逃命, 382
- 經歷背景, 409
- 對中國戰區扭曲的報告, 404
- 對蔣介石的絕地大反攻, 421
- 對蔣介石最後的奪權, 494
- 遊說宋家姊妹護航, 421
- 逼宮, 424
- 謀取中國軍權, 422
- 離職後外國媒體製造的餘波, 425
- 嚴重怠乎參謀長職守, 425
- 史迪威公路 (雷多公路)
- 通車, 398
- 無法發揮運輸效益, 398
- 史迪威事件, 400-429
- 史特列特 (Hans von Seeckt), 140
- 史達林
- 利用中國, 325
- 建立赤色帝國的野心, 521
- 背棄中國, 327
- 鼓勵日本侵略中國, 86
- 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 39
- 蘇聯侵略中國的大戰略佈局, 77
- 台兒莊大捷, 見：徐州會戰
- 台灣主權確定屬於中國, 547
- 四行倉庫, 252
- 外蒙古的分離, 128
- 外蒙古獨立
- 成為蘇聯傀儡, 533
- 左權
- 戰死麻田, 364
- 平型關大捷, 234
- 林彪師作戰真相, 235
- 本庄繁, 5, 31
- 成為滿洲事變主導人物, 74
- 要求軍部支持關東軍侵略, 37
- 最後下場, 7
- 擅自下令關東軍攻擊東北, 35
- 正義之劍, 507
- 甘麗初, 374
- 田中奏摺, 25
- 田中義一, 25
- 「對華政策綱領」, 25
- 田代皖一郎, 162, 198
- 白川義則, 67-69
- 白崇禧, 269, 494
- 防衛武漢, 306
- 長衡會戰, 477
- 南京保衛戰, 267

- 參與台兒莊作戰指揮, 289
- 石原莞爾, 2, 5
- 板垣與石原的合作, 27
- 「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 27
- 不擴大派, 195
- 反對與中國全面開戰, 210
- 滿洲國, 73
- 丘吉爾
- 反攻緬甸的詭計, 423
- 出賣中國之計畫成功, 457
- 阻撓盟軍渡英法海峽反攻歐陸計劃, 418
- 為保護英國殖民利益而出賣中國, 325
-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 145
- 安諾德, 389
- 六畫
- 「曲線救國」, 337
- 多田駿, 366
- 反對直攻南京, 262
- 宇垣一成
- 主張和談, 302
- 出任外相, 302
- 寺內壽一, 231, 279, 292
- 提前攻略緬甸, 376
- 朱紹良, 251
- 江橋, 54
- 牟田口廉也, 199
- 英發爾之戰, 395
- 百團大戰
- 日軍反擊, 367
- 毛澤東反對, 364
- 共軍突擊日軍, 366
- 規模擴大, 365
- 彭德懷, 364
- 發起, 364
- 賀龍, 367
- 劉伯承, 366
- 聶榮臻, 366
- 百靈廟之戰, 165
- 西安事變, 166-185
- 山頭各有立場, 180
- 中共要求處決蔣介石, 179
- 史達林要求釋放蔣介石, 179
- 各派的共識, 181
- 和戰的爭論, 178
- 周恩來前往西安, 179
- 前因, 167
- 挾持蔣介石, 178
- 張、楊所提八項主張, 178
- 張學良決心釋放蔣介石, 180
- 張學良遭到法外懲處, 182
- 張學良護送蔣介石脫險, 182
- 結局, 184
- 檢討, 186
- 西尾壽造, 281
- 西南政務委員會
- 正式撤消 (1936.7), 160
- 西園寺公望
- 壓制關東軍, 32
- 共軍
- 井崗山會師, 152
- 百團大戰, 見: 百團大戰
- 袖手旁觀日軍一號作戰攻勢, 486
- 共軍抗日
- 日軍三光政策, 363
- 日軍治安肅正方案, 363
- 日蘇中立條約簽定後的態勢, 368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360
- 專打游擊, 362
- 麻雀戰爭, 358
- 發展為主, 360
- 發展第一優先, 368
- 吉屋文, 199
- 七畫
- 何梅協定, 125
- 何應欽, 127, 251
- 刁難薛岳等將領, 479
- 出任陸軍總司令, 500

- 負責擬定華北決戰計劃, 226
 接受日軍投降, 542
 處理河北事件, 124
 嚴格控制軍隊補給, 494
- 吳佩孚, 333
- 吳福國防線, 266, 267
- 宋子文, 95, 98
 出席三叉會議, 390
 西安事變, 181
 改革財經制度, 136
 建立中央銀行, 137
 建議改組中國戰區, 420
 爲蔣介石違背對張學良諾言終生遺憾, 183
 推行法幣政策, 137
 進行國際外交, 120
 整理國債, 136
- 宋子良, 338
- 宋希濂
 中國遠征軍(十一集團軍), 397
 血戰富金山, 312
 堅守固始, 312
- 宋美齡
 公開表示對不起張學良, 183
 西安事變, 181
 前往上海慰問傷患官兵而負傷, 251
 參與開羅會議, 451
- 宋哲元
 未遵指示處理盧溝橋事件, 202
 兩邊觀望, 197
 接任平津衛戍司令(1935), 126
 掌冀察政務委員會, 163
 對日交涉底線, 163
 與日軍周旋, 197
 與日軍壓力周旋, 164
- 志村菊次郎, 199
- 李玉堂
 第十軍堅守長沙市區, 354
- 李宗仁, 283
 北攻南守的戰略, 284
 武漢會戰, 313
 指揮徐州會戰, 見: 徐州會戰
 淞滬會戰, 252
- 李服膺, 233
- 李品仙
 防守武漢(第四兵團), 306
- 李家鈺, 476
- 李頓(Edward Lytton)
 反應西方強權瓜分中國的立場, 76
 國聯之滿洲國調查報告, 75
- 李漢魂, 311
- 李濟琛
 計劃推翻蔣介石, 487
- 李覺
 率七十軍固守廬山, 309
- 杜聿明, 374
- 杜魯門, 524
- 杉山元
 三月亡華, 203
 到漢口視察鄂西會戰, 435
 常德會戰, 441
 擴大派, 195
- 余程萬
 防守常德, 440
 常德突圍, 440
- 余漢謀, 322
- 芒友會師, 398
- 谷壽夫
 南京大屠殺主犯, 274
- 辛丑和約, 44, 162, 197
 外國駐軍權, 164
- 防守貴州, 498
- 沈崇誨, 248
- 汪精衛, 93
 由重慶出走, 335
 立場動搖, 331
 成爲漢奸, 337
 曲線救國的做法, 340

背景, 331
 病死於日本, 339
 第三勢力之失敗, 336
 塘沽協定, 119
 落入日本控制, 336
 藉故打擊張學良, 94
 豔電, 335

八畫

- 佟麟閣, 207
 板垣征四郎
 板垣與石原的合作, 27
 九一八事變陰謀, 4, 7, 11
 主張擴大對華戰爭, 302
 出任陸相, 302
 於忻口受挫, 237
 南口之戰, 227
 陰謀製造上海衝突 (1932), 63
 策反華北漢奸, 113
 進攻山東, 282
 進攻平型關, 234
 滿洲國, 73
 製造華北自治的計劃, 103
 臨沂慘敗, 286
 「長沙之虎」, 357
 「長城謠」愛國思鄉曲, 62
 「門戶開放」政策, 133
 「東京玫瑰」, 495
 兩廣分裂復歸統一, 160
 居理 (Lauchlin Currie), 413, 416
 岡村寧次, 502
 正式向中國投降, 542
 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501
 出任第六方面軍司令, 492
 西攻西安的作戰構想, 472
 抗拒投降, 528
 為爭功而搶先攻入武漢, 314
 統軍進攻武漢, 306
 岳麓山
 華軍重砲兵旅陣地, 354
 明治維新, 12
 侵略中國, 23
 周佛海
 暗通重慶, 339
 周慶祥, 482
 河北事件 (1935), 124, 125
 河南會戰, 見：一號作戰計劃
 河邊正三
 七七事變, 199
 緬甸方面軍, 395
 河邊虎四郎, 265
 波茨坦宣言, 527
 法幣政策, 138
 花谷正, 3
 謊報南滿鐵路遭破壞, 8
 近衛文麿, 196, 262
 從報上得知日軍進攻南京, 265
 金谷範三, 41
 金恩 (Ernest J. King), 388
 長征, 135
 長衡會戰, 見：一號作戰計劃
 阿南惟畿
 出任日十一軍司令官, 348
 第三次長沙會戰, 352
 阿部規秀, 363
 服部卓四郎, 492
 東方會議, 25
 東久彌宮親王, 540
 東久邇宮親王, 見：稔彥王
 東北軍
 入西北剿共, 174
 三次擊敗漢奸對錦州攻擊, 55
 主力隨張學良入關, 7
 受到不平等待遇, 168
 承擔不抗日的非公罪名, 167
 將校都支持兵諫, 178
 歷史的孤軍, 189
 遭到內外打擊, 174
 東北義勇軍, 75

中國各地民眾興起支援, 62

發展的規模, 89

驚醒中國民族意識, 55

東條英機

急催日軍攻下衡陽, 483

絕對國防圈, 466

進軍內蒙, 226

林久治郎, 36

林彪

平型關大捷真相, 見: 平型關大捷

松井石根, 249, 264

支持進攻南京, 264

下台, 285

武庭麟, 476

武漢會戰

中日空軍之較量, 312

中國絕不屈服, 317

日本認為中國必投降, 314

日軍在南線遭到反擊, 309

日軍作戰佈署, 306

日軍爭功, 314

日軍突破田家鎮, 310

日軍倉卒定案, 304

日軍戰略的爭論, 305

日軍獲得之成果, 324

白崇禧企圖包圍日軍, 309

血戰富金山, 312

華軍佈署, 306

華軍決定誘敵深入, 303

華軍的作戰指導方針, 308

萬家嶺大捷, 310

戰略檢討, 316

武藤信義, 90, 108

青年軍, 217

知識青年從軍, 501

番號編組, 501

九畫

畑俊六, 285, 292

一號作戰長衡會戰, 476

武漢會戰, 311

指揮進攻武漢, 306

衡陽決戰, 483

「重慶精神」, 430

南口之戰, 227

南天門, 102

南次郎

壓制關東軍, 32

南京大屠殺, 273

主犯, 274

美國因政治理由故意放過皇族主犯,

275

南京保衛戰

日軍攻入南京, 273

日軍決定進攻南京, 265

日軍戰鬥序列, 270

白崇禧反對南京設防, 267

松井石根臥病, 270

唐生智拒降, 270

缺乏防衛佈署, 269

國民政府遷都準備, 267

無周延撤軍計畫, 271

蔣介石力主保衛南京理由, 267

蔣介石下令撤退, 271

衛戍部隊企圖死守, 271

戰略爭論, 261

檢討, 276

姚子菁

死守寶山, 250

建川美次

五課長會議, 29

奉命約束關東軍, 32

鼓勵關東軍進攻北滿, 37

滿洲國, 73

調查關東軍的滿洲事變密謀, 8, 11

俞濟時, 311

柳川平助, 253

要求進攻南京, 264

柳條湖, 2

- 美軍第十四航空隊，見：第十四航空隊
- 美國
- 寬待日本戰犯，544
- 施肇基，60
- 虹橋機場事件，243
- 軍閥
- 割據中國的勢力，133
- 重慶大轟炸，430
- 香月清司，202, 205, 227, 296
- 胡宗南
- 在武漢會戰中潰敗，313
- 河南會戰，476
- 英美對華貸款，445
- 英國
- 切斷中國的西南通路，325
- 袒護日本的立場，103
- 飛虎隊
- 成軍傳奇，509
- 被強迫編入美軍部隊，510
- 緬甸大捷，509
- 十畫
- 冢田攻，432
- 唐生智
- 出任南京衛戍司令，268
- 容有略，482
- 峨嵋軍官訓練班，144
- 徐永昌，541
- 徐州會戰
- 日軍作戰計劃重點，292
- 日軍原無事前計畫，279
- 日軍進入陷阱，288
- 日軍越過制令線攻擊，285
- 日軍撲空，296
- 日軍戰鬥序列之組成，292
- 台兒莊大捷，291
- 台兒莊血戰，289
- 李宗仁缺乏企圖心，294
- 發動會戰之決策過程，291
- 華中派遣軍任務，292
- 黃河決堤，296
- 滕縣血戰，286
- 檢討，297
- 臨沂大捷，286
- 徐源泉，309
- 桂永清
- 徐州會戰作戰不利，295
- 娘子關作戰，見：太原會戰
- 孫中山，49
- 孫元良，247
- 孫立人
- 在仁安羌解救英軍，379
- 率稅警團奪回蘊藻濱，251
- 孫明瑾，440
- 孫連仲
- 台兒莊陣地的佈署，289
- 防守台兒莊，288
- 防守武漢（第三兵團），306
- 武漢會戰，312
- 保定作戰，232
- 娘子關作戰，237
- 孫震
- 力戰羅山，312
- 秦土協定，125
- 琉球群島，215
- 郝夢齡，237
- 馬占山，40
- 同于兆麟部大敗偽軍於江橋，40, 54
- 重創關東軍於江橋，40, 54
- 馬歇爾
- 中國戰略，408
- 長衡會戰，480
- 堅決支持雅爾達密約，527
- 對付中國戰區的手段，405
- 與史迪威的默契，408
- 壓制中國戰區，404
- 馬關條約，15
- 高志航，248
- 高宗武

- 中間人, 332
- 對日本和平運動的覺悟, 337
- 麥克阿瑟, 541
- 十一畫
- 國民政府
- 現代化財政制度, 136
- 國民黨
- 清黨, 152
- 國共合作
- 第一次, 152
- 國共和談, 171
- 國共衝突
- 外交與文宣戰, 370
- 重慶軍委會報告的數字, 369
- 黃橋事件, 369
- 新四軍事件, 369
- 國聯
- 對日侵略東北的決議, 60
- 張北事件 (1935), 125
- 張自忠, 208
- 血戰潢川, 312
- 於南瓜店壯烈成仁, 347
- 徐州會戰, 294
- 臨沂大捷, 286
- 張作相, 99
- 張作霖
- 在皇姑屯被日軍刺殺, 28
- 張治中, 244
- 淞滬會戰, 249
- 張淦, 309
- 張發奎
- 防守武漢 (第二兵團), 306
- 淞滬會戰, 249, 251
- 廣西會戰, 495
- 張德能, 480
- 張學良
- 四維學會, 173
- 防守熱河得不到支援, 92
- 決定與國民政府合作, 28
- 秘密與共產黨接觸, 175
- 帶東北軍入關支持全國統一, 51
- 移居夏威夷, 183
- 第一手史料委託哥大收藏, 183
- 終生軟禁, 183
- 準備強行收回中東路, 50
- 與周恩來秘密會談, 175
- 教導師, 141
- 梅思平, 335
- 梅津美治郎, 296
- 常德會戰
- 中美爭論, 441
- 日軍攻勢多變, 438
- 日軍作戰準備, 437
- 日軍施放毒氣, 440
- 守軍五七師拒降, 440
- 受史迪威事件影響, 438, 441
- 華軍第十軍突破德山, 440
- 帷幄上奏, 13, 265
- 第六方面軍, 492
- 第一次長沙大捷
- 日本東路軍受阻, 344
- 日軍包抄華軍左翼落空, 346
- 日軍無功而返, 347
- 作戰佈署, 344
- 前因, 343
- 第二次長沙大捷
- 日軍作戰計劃, 348
- 日軍緊急撤退, 350
- 宜昌日軍告急, 350
- 陳誠牽制性攻擊, 350
- 華軍應戰, 348
- 檢討, 351
- 第十四航空隊, 467
- 成立, 511
- 長衡會戰中搏命相救, 481
- 盟國空軍傳奇, 511
- 對中國抗戰的貢獻, 511
- 第三次長沙大捷

- 中外同欽, 356
 中國發動全線反擊, 355
 日軍全體參謀要求撤退, 355
 日軍攻陷長沙的笑話, 355
 日軍更改作戰任務, 354
 日軍冒進, 352
 日軍狼狽而逃, 355
 日軍牽制性作戰任務, 351
 日軍搶先發佈「捷報」, 355
 日軍遭到慘重打擊, 354
 氣候因素, 354
 華軍岳麓山重砲兵旅, 354
 盟國在亞洲戰區之大勝仗, 356
- 第三國際, 149
 在中國的發展, 407
- 清水節郎, 199
- 淞浦淳六郎, 311
- 淞滬會戰
 大場爭奪戰, 251
 大場陷落, 252
 中國自上海撤退聲明, 259
 中國掌控戰略主動, 255
 中國調集兵力, 244
 日本海軍的激烈反應, 244
 日軍反應, 230
 日軍眼裡的「可恨之師」, 252
 八、一三衝突現場, 244
 八百壯士, 252
 決戰規模, 250
 前因, 242
 虹橋機場衝突, 243
 粉碎日本三月亡華論, 254
 華軍主動搶攻日租界, 246
 華軍成立第三戰區, 249
 華軍撤退, 254
 戰略考量, 230
 檢討, 256
 羅店血戰, 249
- 陳公博, 339
- 陳納德, 508
 切斷日軍補給生命線, 511
 切斷日軍補給線, 467
 協助發掘中國空軍的問題, 508
 直接報告總統, 418
 空戰派領袖, 414
 建立防空警報系統, 508
 美國空軍志願隊, 509
 重擊日軍補給, 500
 統帥第十四航空隊, 511
 組建中國戰區空軍, 417
 被迫提早退休, 516
- 陳瑞河
 率部防守富金山, 312
- 陳誠
 出任武漢衛戍司令, 306
 因史迪威事件遭排擠, 421
 第二次長沙大捷, 350
 淞滬會戰, 249, 251
- 陳璧君, 337
- 陶德曼 (Dr. Trautmann)
 德國駐華大使, 263, 281
- 鹿鍾麟, 227
- ## 十二畫
- 開羅會議
 中國代表團之危機, 451
 中國的成就, 456
 中國要求日本賠償方式, 459
 中國國際地位的分水嶺, 443
 史迪威報復, 454
 史達林的陰謀, 447
 伏下英國以華為敵危機, 455
 丘吉爾全面杯葛中國的需求, 456
 丘吉爾的考慮, 447
 宋美齡參與, 451
 美國信用貸款的爭議, 453
 盟國會後大翻案, 456
 領土規畫, 453
 戰後歷史方向的討論, 452

- 羅斯福的觀點, 450
- 畢賽爾 (Clayton Bissell), 390
- 傅作義, 99
- 太原衛戍司令, 237
- 百靈廟之戰, 165
- 進駐綏遠百靈廟, 126
- 喜峰口大捷, 102
- 斯立姆, 380
- 朝香宮親王, 見: 鳩彥王
- 湯玉麟, 93, 99
- 湯恩伯
- 台兒莊會戰, 286, 289
- 百靈廟之戰, 165
- 河南會戰, 472
- 南口之戰, 226
- 指揮貴州防禦, 498
- 彭德懷, 364
- 發動百團大戰為被整肅之罪證, 365
- 稅警團, 251
- 華中方面軍
- 組成, 254, 264
- 華中派遣軍
- 組成, 285
- 華北方面軍
- 山東作戰的制令線, 283
- 軍力抽調華東, 239
- 組成, 231
- 深入中國作戰企圖心, 279
- 戰略佈署, 232
- 錯失南攻中國心臟機會, 239
- 華北自治, 126
- 華北決戰
- 中國改變決戰地點佈署, 229
- 華軍西調山西, 233
- 華軍佈署, 232
- 華北駐屯軍
- 違法演習, 198
- 擴編, 162
- 華西列夫斯基, 529
- 華軍第九戰區, 306
- 華盛頓公約, 123
- 華盛頓會議, 230
- 華僑對中國抗日的參與, 66
- 焦土戰略, 145
- 鄂西會戰
- 中國之「史達林格勒」, 435
- 中國展現戰力指標, 436
- 史迪威謊言中傷中國, 436
- 作戰構想, 433
- 雅爾達密約
- 中國被出賣, 525
- 史達林對華的謊言, 526
- 歷史悲劇的檢討, 534
- 蘇聯大軍壓境, 526
- 鑄成歷史大錯, 524
- 雅爾達會議
- 丘吉爾將計就計, 521
- 出賣中國的密約, 522
- 排斥中國參加, 519
- 蘇聯索取對日參戰利益, 520
- 蘇聯奪取戰勝成果, 520
- 飯田祥二郎, 376
- 馮治安, 199
- 馮聖法, 311
- 黃杰, 102
- 徐州會戰, 296
- 稅警團, 251
- 黃橋事件, 見: 國共衝突
- 黃郛, 114, 123
- 化解日本迫使華北自治壓力, 117
- 以外交手腕與日本周旋, 122
- 收拾華北政局, 116
- 向蔣介石報告對日談判的電文, 118
- 為國民政府向銀行團借周轉金, 115
- 對國家寶貴的貢獻, 117
- 裕仁, 見: 日皇裕仁
- 十三畫
- 園部和一郎, 347

塘沽協定, 103, 116, 118
 新四軍事件, 見: 國共衝突
 新生活運動, 143
 楊虎城, 174
 建議兵諫, 176
 悲劇的結局, 183
 滇緬作戰
 日軍全力突破東線, 380
 日軍攻佔臘戍, 381
 日軍作戰編組, 376
 史迪威指揮嚴重失誤, 377
 史迪威棄軍而逃, 382
 史迪威對戰局致命誤判, 381
 英軍敷衍應付, 375
 英國猜忌中國協防的建議, 373
 華軍二百師浴血抵抗, 377
 華軍被英延遲佈署, 374
 華軍解救英軍, 379
 盟軍佈局錯誤, 376
 檢討, 383
 盟國的中國策略, 446
 盟國空軍
 在中國戰區浴火重生, 515
 基地遭到日軍攻擊, 514
 遭到史迪威的制肘, 514
 義大利
 為中國漢奸政權扮演之角色, 334
 義籍空軍顧問造成之不良後果, 142
 葉肇, 311
 萬福麟, 102
 萬寶山事件, 31
 稔彥王, 311
 統軍進攻武漢, 306
 雷多公路, 391, 見: 史迪威公路
 鳩彥王
 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 270
 南京大屠殺主犯, 275
 福爾肯豪森, 140
 反對南京設防, 267

徐州會戰, 294
 淞滬會戰後對華戰力的估計, 281

十四畫

閩變, 117
 葛先才, 482
 滿洲國
 對中日兩國決戰之影響, 76
 漢奸領袖名單, 75
 赫爾 (Cordell Hull), 464
 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要求撤換史迪威, 424
 與魏德邁攜手合作, 427
 調解中國戰區指揮權移交, 422
 趙登禹, 207
 蒙巴頓 (Louis Mountbatten), 393
 蒙古國, 129
 蒙疆兵團
 攻陷大同, 233
 幣原重喜郎, 32, 42, 59
 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則, 60
 漢奸政權

 日本的構想, 330
 正式登場, 338
 曲線救國, 337
 周佛海路線, 337
 桐工作, 337
 真相大白, 337
 偽軍投共, 339
 第三勢力, 335
 義大利政府之角色, 334
 豔電, 335

十五畫

廢兩改圓政策, 137
 廢除對中國不平等條約, 445
 廣田三原則, 見: 廣田弘毅
 廣田弘毅, 262
 中日停戰條件, 263
 日本對華親善的陰謀, 123
 廣田三原則, 126

- 廣西會戰
- 中國戰區內訌嚴重, 493
 - 日軍攻入貴州, 498
 - 日軍作戰佈署, 493
 - 桂柳失陷, 496
 - 橫山勇搶功, 495
 - 難民潮, 496
- 廣東作戰
- 之檢討與其影響, 323
 - 日方延緩行動之原因, 321
 - 日軍構想, 321
 - 日軍戰鬥序列組成, 321
 - 余漢謀不當的佈署, 322
 - 華軍低估局勢, 322
 - 華軍棄守廣州, 323
- 影佐禎昭, 335
- 德王, 128
- 入侵綏遠, 164
 - 成爲日本傀儡, 129
 - 在百靈廟慘敗, 165
- 德國軍事顧問團, 140, 146
- 武漢會戰前被迫離華, 304
- 德黑蘭會議, 456
- 開羅會議結論被全面推翻, 457
- 徵兵制度, 144
- 歐震, 311
- 劉汝明, 226
- 徐州會戰, 294
 - 羅文峪防守戰(長城作戰), 102
- 劉家琪, 237
- 緬甸方面軍
- 日軍擴充駐緬甸軍力, 388
- 蔣介石
- 「最後關頭」演說, 123
 - 五次圍剿中共紅軍成功, 122
 - 允史迪威留任而鑄大錯, 420
 - 全力支援李宗仁在徐州擴大打擊日軍之戰果, 292
 - 全力發展空軍, 506
 - 安內攘外, 134, 154, 168
 - 百靈廟之戰, 165
 - 冷凍宋子文, 421
 - 防守貴州, 498
 - 決心撤換史迪威, 424
 - 拒絕日本政府和談條件, 492
 - 拒絕與日本和談, 281
 - 武漢會戰戰略指導方針, 306
 - 非親日派, 150
 - 面對復興中華民族的考驗, 133
 - 接受日本投降, 540
 - 疏遠東北軍, 173
 - 處理東北軍的錯失, 189
 - 設立抗戰的「大後方」, 145
 - 鄂西會戰, 436
 - 準備撤換張、楊, 177
 - 準備遷都重慶繼續抗戰, 267
 - 對日決戰地點改在華東的決定, 243
 - 違背對張學良諾言, 183
 - 領導中國長期抗日, 222
 - 領導層面的評價, 222
 - 親到徐州視察, 289
 - 親往上海前線指揮, 252
 - 聯蘇容共的抗日策略, 156, 169, 184, 186
 - 廬山談話, 205
 - 蔣光鼐, 65
 - 蔡廷鍇, 65
 - 蔡智堪, 25
 - 衛立煌
 - 太原會戰之忻口作戰, 237
 - 指揮遠征軍, 397
 - 保定作戰, 232
 - 遠征軍(進攻緬甸), 396
 - 駝峰空運物資, 327, 328
 - 駐屯軍, 見: 華北駐屯軍
- 十六畫**
- 閻海文, 248
- 閻錫山, 487

-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127
 冀察政務委員會, 127
 戰略空軍, 512
 整編師, 143
 橫山勇, 433, 477, 485
 大膽抗命, 496
 奔襲衡陽作戰, 480
 被岡村寧次調職, 499
 進攻宜昌、常德的構想, 433
 獨斷擴大華南戰線, 493
 橋本欣五郎
 流產政變, 38
 密電關東軍日本軍部行動, 33
 橋本群
 徐州會戰大本營派遣班, 292
 諾曼地登陸戰, 481
 諾蒙罕衝突(日、蘇), 342
 盧溝橋事變, 見: 七七事變
 龍雲, 494
- ### 十七畫
- 戴笠, 339
 閻錫山, 233
 太原會戰, 237
 霍揆彰, 397
 濟南慘案(1928年5月), 27, 50, 168
 聯合國
 中國名列發起四強, 445
 臨參命, 19
 蘇嘉制令線, 264
 薛岳
 天爐作戰, 351, 352
 包圍土肥原師團, 295
 防守武漢(第一兵團), 306
 決心保衛長沙(第一次長沙會戰),
 344
 長沙之虎, 357
 長衡會戰佈陣, 477
 常德會戰, 440
 遭到猜忌, 496
- 韓復榘
 不戰退出山東, 282
 遭軍法審判被槍決, 283
 聯省自救、華北自治, 117
 磯谷廉介
 進入台兒莊口袋陷阱, 288
 進攻山東, 282
 舊金山和約
 台灣主權未定論, 546
 出賣中國的陰謀, 546
- ### 十八畫
- 豐台事件, 163, 197
 豐島房三郎, 354
 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 374
 魏德邁
 反攻華南作戰計劃, 427
 支持陳納德重創日軍補給中樞, 500
 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425
 背景, 426
 從緬調回遠征軍, 500
 裝備訓練華軍準備反攻華南, 500
- ### 十九畫
- 廬山軍官訓練班, 142
 羅卓英
 第一次長沙會戰, 344
 滇緬作戰, 377
 羅斯福
 不滿史迪威, 417
 三叉會議, 391
 延後反攻緬甸, 392
 長衡會戰, 480
 美、中抗日的戰略, 408
 接受空戰派意見, 418
 對中國情況之瞭解遭到蒙蔽, 415
 撤換史迪威, 425
 關東軍, 17
 失去戰力, 530
 決定接受日皇投降之命令, 532
 察哈爾派遣兵團, 229

違抗臨參命進攻江橋, 40

關麟徵

長城作戰, 102

龐炳勳, 286

二十畫及以上

蘇聯

切斷中國的西北通路, 327

一再拖延自東北撤軍, 533

在九一八幕後的謀略, 85

赤化中國以抗日的策略, 151

空軍援助中國, 507

侵略中國的野心, 151

侵略中國東北, 529

紅軍大破關東軍, 531

飛行志願軍, 313

掠奪中國東北, 532

饒少偉, 482

饒國華, 269

Arnold, Gen. H.H., 見：安諾德

AVG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見：

飛虎隊

Bissell, Gen. Clayton, 見：畢賽爾

BOLERO plan, 418, 449

Casablanca Conference, 見：卡薩布蘭加

會議

Chennault, Gen. Claire Lee, 見：陳納德

Churchill, Winston, 見：丘吉爾

Comitern, 見：第三國際

Falkenhausen, Gen. Alexander von, 見：

福爾肯豪森

Hull, Cordell, 見：赫爾

Hurley, Gen. Patrick J., 見：赫爾利

Ichi-Go, Operation, 見：一號作戰計劃

King, Adm. Ernest J., 見：金恩

Lytton, Edward, 見：李頓

MacArthur, Gen. Douglas, 見：麥克阿瑟

瑟

Marshall, Gen. George C., 見：馬歇爾

Mountbatten, Louis, 見：蒙巴頓

Roosevelt, Franklin D., 見：羅斯福

ROUNDUP plan, 418, 449

Seeckt, Gen. Hans von, 見：史特列特

Slim, Gen. A.J., 見：斯立姆

Stilwell, Gen. Joseph, 見：史迪威

Trident Conference, 見：三叉會議

Truman, Harry S., 見：杜魯門

Verdun, Battle of, 見：凡爾登戰役

Wavell, Gen. Archibald, 見：魏菲爾

Wedemeyer, Gen. A. C., 見：魏德邁

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1931 — 1945）

在二次世界大戰反抗法西斯的同盟國中，中國是最早挺身與軸心國裡的日本展開全面戰爭的國家。在這場全世界的大戰中，中國犧牲最多、獲得援助最少、對盟國勝利的貢獻卻最大。中國在大戰中英勇的表現，是使得同盟國陣營能夠勝利的非常主要原因之一。

抗日歷史最爲動人的真相，就是中國人是英勇的戰士而非無助的人質。中國從東北打到西南，在二十二次的會戰、四萬多次的作戰中，中國可以戰敗，但是絕不屈服。華軍更在幾場關鍵的大型會戰裡，擊潰了日軍兇猛的攻勢，使得日軍大本營匆促地改變對華的戰略，雖然明知會踏入中國所設的戰略陷阱，卻仍自投羅網。從此中國完全掌握了戰略上的主動，日本在戰略上卻是一敗再敗，越陷越深。在漫長、艱苦的抗戰歲月裡，中國全體軍民以幾乎不可思議的堅毅與犧牲到底的決心，終於寫下了光榮勝利的歷史新頁。

從九一八事變到日軍最後的投降，中華民族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爲艱苦的煎熬，從日本軍閥的狂妄凶焰，到英、蘇、美盟國的聯手出賣，從盧溝橋經開羅到雅爾達，中國所面

對的是全方位的歷史考驗。中國需要記得這些歷史的教訓，才能順利通過未來的難關。

本書以歷史全方位的角度，來掌握抗日戰爭複雜的前因後果。從中、日整體國力的評比、主要會戰的敘述與檢討、戰略與政略的分析、中國戰區與史迪威事件、開羅會議的急轉直下、英、蘇兩國打擊中國的不擇手段、雅爾達密約的前因後果、抗戰勝利卻帶來了國共內戰等等，都以最清楚的筆法表達出來。對於當時歷史的決策與作戰勝敗的原因，都有相當深入的原因解說，而不是單純的事件記錄而已。作者並指出一些決策上的選擇，與可以改變事件結果的建議，讓歷史不僅是過去事件的記錄，更是人類經驗的成長與鑑戒。

《不朽的光榮》的網址是：

<http://www.npla.org/glory>
歡迎讀者來共同探討中日戰爭史的真相與意義。



ISBN 0-939083-54-X